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David Halpern◎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 黃克先·黃惠茹◎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這本精采絕倫的好書，以流暢細緻的筆法、權威性十足的語調寫成，內容包羅萬象。我甚至希望此書是出自我的筆下——在研究社會資本領域的文獻急速增加下，至今它是我見過，介紹的最棒且最全面性的一

Robert Putnam，哈佛

Alone的作者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是當前從事研究工作及政策制定者所探究的焦點。

它意味著促進個人與集體行動的社會網絡、非正規結構和規範。

愈來愈多顯示社會資本如何對經濟成長、健康、犯罪，乃至於政府效能造成衝擊的證據，帶動此一探究社會資本概念之風潮。

David Halpern藉由各種社會資本的定義（甚至有時是令人困惑的），提供進入此概念的指南。他把檢視關於社會資本重要影響的跨學科研究文獻加以匯集，用以展示社會資本的廣泛效應，並進而提出一個模式，以此來闡釋創造社會資本以及由社會資本到其結果的因果路徑。

David Halpern以來自各國的證據證實社會資本是否正在衰退，並以這些證據處理社會資本是否具傷害性及排他性等爭議性問題。

最後並考慮了政策上的意涵，包括對於社會資本如何進行測量、創造與運用。

《社會資本》一書提供了多年來社會科學最重要且令人興奮的新興領域之概觀。

本書並未以任何文獻或統計知識做為前提；

對於政治學、社會學、社會行政、社會心理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

以及有志探索社會資本如何影響自己生活的一般讀者來說，同樣都有其重要性。

ISBN 978-957-732-302-6



9 789577 323026

00450

統一編號

1009701941

CAJ0029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David Halpern 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 黃克先、黃惠茹 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08年7月出版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Copyright © 2005 David Halper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社會資本 / David Halpern 著；黃克先、黃惠茹譯。-- 初版。-- 台北市：巨流，2008，07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Social Capital

ISBN：978-957-732-302-6（平裝）

1. 社會關係 2. 社會價值

541.6

97008034

社會資本

原著：Social Capital

原著者：David Halpern

譯者：國立編譯館主譯／黃克先、黃惠茹譯

發行人：楊曉華

責任編輯：薛尤軍、黃麗珍

封面設計：楊芳菁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出版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41 巷 12 號

電話：(07) 2235267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302-6

GPN：1009701941

2008 年 7 月初版一刷

定價 45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http://www.nict.gov.tw>

地址：10644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 33225558

序

15年前，當時我還是年輕天真的博士生，卻進駐到英國最惡名昭彰的住宅地區及計畫中，想看看物質環境與居民心理健康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當時，不論在政界或學界，這都不是個時髦的議題，我們也不期待會做出什麼成果來。

vii

其中有一個研究是想看看，若對居住的物質環境做出一連串改善，居民的心理狀態會有什麼改變。那時，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很糟，半數以上的成年婦女都飽受臨床上的憂鬱及焦慮之苦。有位居民的情形一直深印在我心底：她是如此地焦慮，因此在我們數次登門後，她才願意開門接受訪談。她毫不掩飾自己不喜歡住在這裡的事實，說自己與鄰居毫無往來，並認定假使鄰居看到她的錄影帶，就會想偷取。兩年後，她有了180度的轉變。她看起來十分輕鬆自在、快樂，並且很窩心地說自己的鄰居就像是朋友一般。她的例子並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之處，然而，這樣的故事不斷在整條街上重演。憂鬱症及有焦慮傾向者的比例減少一半以上，不信任的氣氛被一種友善、相互支持的鄰里關係取而代之¹。

建築的工程並未進行得特別順利。最初的兩位承包商因為施工粗糙且不夠專業而被解約，同時一場大火也對其中一間房屋造成了嚴重損害。然而，這些變數，包括彼此對這項工程本身的相同抱怨，卻將居民們凝聚在一起，使他們能發現傳統社區的好處，但時下的社會學家一直將這種傳統社區歸為不可復得之過往歷史。

viii

接下來幾年裡，即便我並未自視為一位「社會資本」研究者，但這類神奇的研究結果卻不斷出現，猶如一塊活化石的報告一樣。對於少數族群心理健康的研究出乎預料地指出，聚居在條件不佳地區的弱勢少數族群成員，比單獨住

¹ 針對此個案的研究乃在 Halpern (1995a, 第七章) 中記載。

在富裕社區的成員展現出較佳的心理健康狀態。² 一項針對年輕專業人士之成就的研究指出，人們儘管宣稱自己活在不分階級的社會裡，但擁有良好的家族關係這項特質，的確對他們產生出巨大的影響。³ 關於生活安適（well-being）的研究不願證明收入與幸福之間有強烈的關聯，但個人關係與社群關係確實產生了很大的效果。⁴ 針對二次戰後少年犯罪和失序逐漸升高的情形，一份大型的跨國學術調查無法找到任何解釋，但此調查並未檢視正在變遷中的社會組構（social fabric）。⁵

此處存在著一個弔詭。鑲嵌在地方層面上的傳統社群若非被視為已完全消失，就是被認為已急遽衰頹。而且，除了少數冥頑不靈的保守人士外，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並不會對他們的逝去感到悲傷。就像評論家 Matthew Parris 曾在一場我們都被捲入的爭論裡說過的，要重回一個「快快拉上窗簾」（twitching curtains）的世界（譯註：這個動作指的是在以往守望相助的社區裡，許多人〔尤其是老人家〕常守在家中的窗前，注意是否有任何不尋常的事發生，一旦有，就迅速拉上窗簾報警或連絡鄰居），這個點子對大多數學者或政策制定者而言，都不太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所有證據都隱隱暗示我們，類似如社會組構的東西，即便在世界主義、自由主義的現代世界中仍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人直觀上可知——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譯註：曾任英國首相，為英國新自由主義的舵手）可能是個例外——往昔曾有一個叫做「社會」的東西，它極為重要，而且它不單單僅是形式上的制度而已。我在研究生時期曾積極參與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公民身分委員會，此委員會曾推行這樣的理念，⁶ 但在1990年當時，並沒有資料、概念架構或政治興趣，來促使這個議題繼續往前走。不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時機都還未成熟。

那麼，打保齡球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1997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當客座教授時，首次見到了普特南（Bob

² 請參考 Halpern (1993) 以及 Halpern 與 Nazroo (2000)。

³ 請見 Halpern (1992)。

⁴ 這個發現並未發表，它是在1995-6年於 Nuffield 大學進行的，但也可參考 Donovan 與 Halpern (2003)。

⁵ 請見 Rutter 與 Smith (1995)。

⁶ Commission on Citizenship (1990)。

Putnam)。我們後來又再次見面，但這是拜他的耐性而非我的求知欲所賜。我的藉口是當時我主要聚焦在其他的議題上，像是政府應該如何與個人區分責任、第三條路等等。他無疑地是個洞見獨具的專家，把這些議題與義大利區域治理、美國人看電視的習慣連結起來。⁷

自此之後，我與 Bob 逐漸熟識，對他的研究更加熟悉，也更加尊敬他。我們在許多地方有共識，但畢竟在這個領域裡他是如此具有影響力，所以若我提出一些我們在看法上有所不同的論點，或許可以對讀者大有助益。

首先，相較於 Bob，我著重在較廣泛的社會資本定義。對我來說，社會資本概念延伸的範圍不只包括中觀層面（meso-level）的傳統社群及個人熟識的社會網絡，還包括使人際互動可能的廣泛的「生活習慣」或國家文化、地區文化。（對一些社會資本專家來說）難以想像的是，我認為「社會組構」也算是「社會資本」。因此，我認為每天在倫敦地下道裡靠左邊走是一種社會資本，但對許多社會資本專家並非如此（欲知完整的討論，請參考第一章）。同樣地，對我來說，非正式的約束力量是整套環節以及概念裡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理由我希望能闡明清楚（例如，請參考第四章），但對普特南來說，其核心概念並不包含約束力量。

其次，我切入的角度以及旨趣更國際化，至少是較注重跨國的比較（例如，本書中的第二、四、五或七章）。美國本身是一個相當龐大、內部差異也很大的國家。儘管如此，跨國檢視確實能提供不同的觀點。這個觀點之所以不同，部分也是因為「從大西洋的另一端來看這個世界，是有些不同的」這個事實；同時，也是因為跨國的比較能使我們有機會在方法論上檢視其他類型的對比與變項。例如，從美國內部與從跨國的觀察來檢視電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差異是非常大的（請參考第八章）。

第三，因為有觀點與定義上的差異，導致彼此間的關鍵結論出現微妙的差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社會資本演變的大方向究竟是「日漸衰竭」（Putnam 版本）或是「逐漸轉化」（Halpern 版本）。對我來說，即使是美國的例子，在某個程度上也可以被解讀為逐漸轉化，而不僅僅視之為日漸衰竭，畢竟普遍性的社

⁷ 在該年年底前，我寫了一篇有關社會排除與社會資本的論文，稍後將它改寫、更新為一篇名為〈社會資本：一雙新的金雞母？〉的新聞報導性評論，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它是在 Westminster 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但英國智庫仍對出版此論文感到猶疑不定，擔心它所能引起的興趣很有限。當這篇論文的更新版靜悄悄地放進 2002 年的英國內閣部會表現與創新小組中後，光是在頭一個月就有一萬人下載了這篇文章。

會規範如今取代了傳統社群內非正式的認知（第七章）。當然，這並不是說轉化完全不會在某些領域中帶來影響或負面效果，比如說在心理健康方面，而這對個人及社會都會造成嚴峻的問題。

x 第四，我們對社會資本的文獻在政策制定的建議上，也有非常不同的觀點。尤其是，我比較傾向把重點放在政府以及大眾媒體可以扮演的正面角色，還有經濟不平等的負面角色（第九章）。當然，政策性結論中許多的差異都與我們所工作及參與的政治脈絡有關係。在瑞典寫作的 Bo Rothstein 無疑地就推導出很不一樣的政策性結論。

然後，我需要感謝很多人……

研究社會資本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能遇到這群人。或許，正是這個領域，才會吸引到一些近乎病態的樂觀主義者前來，但包括這群人以及領導社會資本研究發展的這些人在內，幾乎都是非常能信任他人且值得信任的，他們有高度的社會參與及公民參與，心胸開闊且熱心助人——當然，也擁有眾多社會連結。比起 1990 年代晚期，如今這個領域的規模更加龐大，這不可避免地扭曲或改變了在此領域工作的性質，但我希望那股原有的精神特質仍能保存下去。

現在，該是致謝的時候了。我確信我一定遺忘了某些人，也要命地冒犯了某些人，我會設法致上適當的歉意。首先得感謝在社會資本的辯論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戰、教導並刺激我想法的同事，以及學術上的伙伴，這些人包括 Bob Putnam、Tom Healy、Mike Woolcock、Tom Sander、Richard Wilkinson、Peter Hall、Simon Szreter、John Helliwell、Sylvain Cote、Peter John、Perry 6 以及 Stephen Aldridge。在這串名單裡的兩位 Tom 值得特別感謝一番，因為他們會細心且鉅細靡遺地審視本書初稿並提供建議。另外還有許多人以某些別具意義的方式，在我主要以探索社會資本為主的廣泛學術旅程上，刺激、影響、協助我，或在完成本書的工程上提供實際幫助，他們是：Lisa Berkman、David Blunkett、Brendan Burchell、David Good、Roz Harper、Tyrill Harris、David Held、Erika Jacobs、Louise Kennedy、Julian Le Grand、Sue Leigh、Joni Lovenduski、Vivian Lowndes、Zoe Morris、Geoff Mulgen、Avner Offer、Bo Rothstein、Jenniffer Rubin、David Saunders、Robert Sampson、Fiona Sewell、David Smith、Danielle Stolle、Nir Tsuk、Jan Van Deth、Paul Whiteley 以及

Stewart Wood。當然，必須特別感謝的是我的另一半 Jennifer，還有我那兩個很棒的孩子，他們在美式足球、古生物學和破壞玩具的功力是我望塵莫及的。

目前，雖然我仍與劍橋大學保持聯繫，但我過去三年間多半在首相策略小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中，擔任高級政策顧問。我非常感謝在社會暨政治科學院以及策略小組的同事，支持我並給予我許多彈性，使我能在多種角色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完成這本書。雖然，我在策略小組裡的大多數研究與社會資本並無直接關係，但它們經常以各種方式出現在社會資本的研究議程上。社會資本的變遷是當今社會所面臨眾多挑戰中很關鍵的一個。我們將會看到，社會資本也影響到許多重要政策成效，以及公共服務與公共財的提供。最後，我應該附帶一提的是，能在普遍認為這類議題、證據很重要且願意接納的行政機關及政治氛圍中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但是，證據不僅是提供給菁英看的，也是讓我們能瞭解，並用來形塑我們所期待居住的世界。

我應該強調，這本書代表的是我對社會資本既有文獻的理解與看法，絕非政府的政策或立場。這是一本學術用書，但其內容涉及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很要緊的，因為它是一面鏡子，反映了當代社會，因此我們不僅可以反思我們的社會是什麼，也讓我們能促使它變得更美好。我已許久沒有回去研究生時期所研究的許多身處劣勢的住宅地區，事實上其中有些地方已經不復存在。我猜想那些居民大概不會愛看這本書，但從某個角度來說，本書是為他們而寫。有時，你們所填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問卷確實可以促成某些東西，雖然那需要等一段時間。

DSH，2004年五月

目 錄

序	v
第一章 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1
那麼，「社會資本」是什麼？	2
「社會資本」概念的歷史	4
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組成元素	9
分析層面：從國家到家庭	12
以功能來區分的社會資本次類屬：	
黏著性（bonding）與架接性（bridging）	18
權力與「連結性」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公共財嗎？	21
將概念串兜在一起	24
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中遭遇的實際問題	30
結語	37
第一部分 社會資本為什麼重要？	
第二章 經濟表現	41
微觀層次的經濟效應	42
中觀層面的經濟效果：做為市場的社群	48
鉅觀層面的效果：區域及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	56
結語：社會資本為何、如何影響經濟成長？	66
第三章 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	69
微觀層面：你只需要愛？	70
中觀層面：社群與健康	82

鉅觀或國家層面	90
結語	103
第四章 犯罪	107
微觀層面：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社會資本	108
中觀層面：社群與犯罪	115
鉅觀層面：各國與各地區的犯罪差異	121
結論：犯罪與社會資本——各層面間的互動	127
第五章 教育	135
微觀：支持性家庭	136
中觀層面：學校與社群效果	143
鉅觀層面	151
結語	157
第六章 政府及有效能的國家	161
微觀層面：地方或次級地方政府	162
中觀層面：地區政府	164
鉅觀層面：國家政府	167
為何社會資本與較佳的政府表現有關聯？	172
總結	180
第二部分 我們能建造出社會資本嗎？	
第七章 社會資本的趨勢	185
美國的情況：30年來持續衰退	185
其他國家的趨勢	196
找尋社會資本變遷的原因	212
價值觀與消費變遷的環境學	219
總結：當代社會資本的轉化	225

第八章 原因	229
微觀敘述：爲什麼有些人擁有較多關聯，及更受信賴？	229
中觀層面的原因及社團的角色	240
鉅觀論述：文化、經濟及制度	249
綜觀：朝向一個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的模型	257
結語	260
第九章 政策意涵	265
主動介入的建議	266
如何介入？	267
政策的意涵：美國的教訓	273
激發微觀或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	276
激發社區層面或中觀的社會資本	283
激發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293
結論	301
參考書目	305
索引	349

第一章 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社會生活的特點（包括社會網絡、規範與信任），能使參與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動，以追求共同的目標……簡而言之，社會資本就是指社會連結，以及伴隨而生的規範及信任。 1

Putnam, 1995, pp. 664-5

「社會資本」這個詞彙，如今已變成政治及學術菁英界裡的行話了，但對一般人而言卻仍較陌生。即便是使用這個詞彙的政治人物與學者，也經常搞不清楚到底「社會資本」是什麼，或該怎麼測量它。只要稍加檢視這個詞彙的使用，你會發現它與「社群」（communit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有關，大略是指人們如何彼此相互連結；但如此鬆散的定義聽起來似乎指涉了一切事物，但同時什麼也沒說。因此，對某些人而言，社會資本就只是最新流行的玩意兒，只是知識分子的噱頭，沒什麼太大的意義，這個看法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對其他人來說（這當中有些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學者），社會資本是社會科學近 50 年來，所出現過最重要且令人興奮的概念。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之所以令人感興趣，主要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對許多政策制定者而言，這個詞彙掌握了當今政治上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它讓人感受到腳踏實地的經濟味道，同時又重新詮釋了社會性的重要。它間接反駁了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盛行於美國、英國、紐西蘭那股粗糙的政治經濟風氣——如同柴契爾夫人這句名言所說：「像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社會資本被很多人用來表述，在經濟學簡化的世界觀之下，令人感到若有所失的東西。這個詞彙的使用也反映了整個西方世界，在 1990 年代中期興起的中間偏左政黨在政治上復興的趨勢。它也暗示了為何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尤其在前共產體制的國家），簡陋的市場模式的應用會遇上麻煩。社會資本是經濟學家過去所忽視而遺失的變項。 2

第二部分則可以從近來學術研究領域所做的努力，看出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受到的重視。大量湧現的文章和研究調查，都顯示出社會網絡的形式、品質以及在某些層面的結果之間是有關聯的，包括經濟成長、健康、犯罪、教育成就，甚至是政府的效能。我們常看到，各種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個別發現這些關聯，而且他們所使用的社會資本之定義經常是互異的。直到最近，這些研究者才開始瞭解彼此的研究核心要旨之間具有共通點。

那麼，「社會資本」是什麼？

想知道社會資本為何，最簡單的方法或許是舉一些實例。大多數的人都身處各種不同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團體中。我們都有朋友，與工作上的同事們交往。我們可能隸屬於某個工會或專業團體，讓我們能跟自己工作場所之外但從事類似行業的專業人士們保持連繫。閒暇之餘，我們或許會參與某個運動性的社團或俱樂部，也可能隸屬於其他因擁有同樣興趣而組成的團體，像是打毛線、玩鐵路模型或是研究天體物理學。或許，我們也可能隸屬於某個政治團體，或更常見的諸如拯救鯨魚、關心環境或爭取槍枝擁有權的遊說團體。而在居家生活中，我們也都是某個家庭、鄰里、宗教或族群的一分子。這些日常生活的網絡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此外也包括許多有助於界定、維繫網路的社會習俗與連繫。

3 這種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的存在，對身在其中的個人與社群有許多助益。而在柯爾曼（James Coleman）一篇討論紐約鑽石批發市場的論文，可說是一個經典實例（Coleman, 1988）。柯爾曼提到，在這個市場裡，商人們經常可以氣定神閒地將裝有價值數千美元以上的鑽石袋子，交給其他商人檢查，而這項舉動並沒有任何保險或正式協議。對一個局外人來說，它似乎是極度冒險且不明智的，因為似乎根本無法阻止其他商人趁機竊取這些鑽石。然而，這個市場相當成功且極有效率。在這些商人的網絡裡，資訊自由流通，交易毋需詳細且所費不貲的契約或保險就能進行。

唯有當鑽石商人社群之間能緊密連繫、高度信任和彼此可靠，這市場才能運作下去。對商人而言，能夠進入這個對「行止合宜」有共同看法的同業網絡，這本身就是一項資產，在做生意時能更得心應手。然而，這種助益良多的社群或網絡，即便它對那些得以進入此網絡的人產生很大的好處，卻不能算

是種財務、物質或人力上的資本。要描述這種網絡，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視之為「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請參見表 1.1）。

我們稍後將看到，針對什麼是社會資本，什麼又該被排除在此概念之外，已經產生了可觀的討論與爭議。本章主要的目的，是釐清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範圍及較細緻的內涵。但是，這個概念本身其實相當簡單，或許對概念本身爭議不感興趣的讀者會想跳過，直接進入後頭的章節。社會並非由「原子化」

表 1.1 資本的形式

類型	定義
資本（泛稱）	(1) 各種曾經使用過或可供使用的物質財富，可用以生產更多財富；(2) 在扣除所有債務後，某個企業或個人仍具有的資產；即淨值。(3) 任何有利的條件或優勢；拉丁字源 <i>capitalis</i> ，意指「為首者的」、「重要的」、「主要的」（節錄自 <i>Heritage Dictionary</i> 國際版）。
金融資本	金錢或書面上的資產；例如，在銀行裡的存款總額。雖然它可用來購買生產貨品、勞務的元素，但無法直接生產出貨品、勞務。
物質資本	有助於生產其他貨品與勞務的資產；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到的機械設備、裝置用具、建築設施。
其他有形資產	自然界所供給的生產要素，例如上地，這與物質資本不同，後者乃是被生產出來的。
人力資本	勞動者專業技能的積累；做事的能力；例如專業訓練。用以衡量未來賺取收入所具備的潛力（註）。
社會資本	社會網絡、規範以及對人們的身分地位有決定力的約束。衡量它的方式，是根據是否有潛力讓個人或團體的行動更有效，尤其是透過「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這種方式來進行。

註：在此有一些對於人力資本的爭議是，除了那些能增進賺錢潛力的專業技能之外，是否也應包括其他的特質，如體力、智力、外表吸引力等。有一種看法認為，若這樣定義的話，將導致同語反覆（tautological）；人力資本包含了能增進賺錢潛力，以及不能增進賺錢潛力的個人特質。

的個人所組成，人們透過居間的社會結構相互連結，包括各種聯合交織的網絡以及共同的行為規範。這類的社會結構將大大影響我們互動及合作的對象、方式，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恰恰是想捕捉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的連結結構，以及隱然存在的合作關係。

「社會資本」概念的歷史

在現今的學術場域裡，常見到這樣的情況：年輕有為的學者自稱有某項具開創性的發現，但較資深的同僚卻說他們一直以來都知道這個現象。社會資本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許多當代社會科學的開山祖師之研究裡，我們都可看到它理論的雛型，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與涂爾幹（Durkheim），甚至有人認為，早在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這種古代學者的著作中就能發現。事實上，若說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是突顯出社群對於個人生活福祉的重要性，則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獻上就可發現這個概念（例如《易經》，請見 L. Sun and Jiang, 2000）。

今人對於人際連繫在社會中扮演之角色的興趣，早在 150 年前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就已可見其先聲。他特別強調他所認為的美國民主制度之基石就是：「在我眼中，沒有什麼比起美國的知識團體及道德社團更值得被注意。美國的政治團體及產業團體很容易吸引人們的注目，但其他的社團卻常被忽視。」（de Tocqueville, [1840] 1960, p. 517）托克維爾認為「社團統合了個別心智所產生的能量，並強而有力的將人們指引到一清楚明確的目標。」（同上，頁 190）這大大地促成了社會合作的產生，或用當代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說，即促使集體行動的問題得以解決。這種結社的生活也成爲一股解消個人主義危險的力量，若非如此，個人主義最終可能墮落爲「一種過度的自戀，以至於人們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衡量一切，或忽視他人的利益」。托克維爾認為，在結社生活裡，「藉由人與人之間相互的行動，感覺與想法被汰舊換新，心靈更寬廣，同時也培養了識見。」（同上，頁 515）

雖然政治學者最常徵引的對象是托克維爾，但與今日許多社會資本的研究遙相呼應的觀念卻可在另一位 19 世紀學者涂爾幹的著作裡找到：「一個國家（nation）唯有在以下條件中才可能維繫，即在政府（state）與人民之間能安插一系列的次級團體，讓個人在行動上足以被強烈地吸引，並以同樣的方式

牽引著他們進入社會生活的普遍潮流裡。」(Durkheim, [1893]1964, p.28) 涂爾幹觀察到，即便在最個人主義的層面上，若要理解個人的行為，亦無法抽離社群的特點及其所鑲嵌的人際關係。他最著名的作法正是對自殺進行實證分析，藉此來說明此一論點。他發現，雖然自殺被認定是一種純粹個人主義式的行為，解釋自殺率最好的方法卻是從個人以外的社會力量著手。尤其是涂爾幹揭示了在混亂失序與社會連帶薄弱的社會及團體裡，自殺現象要普遍的多；相反地，高度融合且連帶緊密的社會中，似乎就可以「透過道德上的相互支持，防止個別成員走上絕路；其進行的方式並不是藉由個人自己的資源來幫助他們，而是帶領個人一起享有團體的能量，並在他們自己的資源耗盡時成為他們的支柱。」(Durkheim, 1897, p.210, 引自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p.175)

經濟學家有理由可以宣稱，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先聲同樣可以在他們的學科裡發現，並可回溯到 18 世紀亞當斯密的研究裡（雖然其他學科的人士也可能宣稱，亞當斯密也是他們陣營裡的人！）。亞當斯密早年即暢言市場的好處，他的論點相當聞名，此外他還很重視在維繫此市場的過程中，相互共感 (mutual sympathy)、網絡與價值觀的重要性 (Bruni and Sugden, 2000)。他舉的例子不全都是正面的，例如他曾提到「商人們的聚會」(merchants meetings) 成為他們達成共謀的機會，一同為了獲取更多的私利來欺瞞大眾 (A. Smith, [1776] 1979)。然而，雖然這個起始看起來如此大有可為，但普遍說來，經濟學家對經濟生活裡社會網絡和社會規範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當然還是有些例外，像費沙 (Irving Fisher)，他早年曾試圖擴大資本的定義，想將「社會組織的形式」含納進來 (I. Fisher, 1906)；或是科斯 (Coase) 曾出版討論廠商性質的著作 (Coase, 1937)，以及 Loury 關於不同種族之收入差異的研究 (Loury, 1977)。但直到最近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領域實在是興趣缺缺 (Piazza-Giorgi, 2002)。

根據普特南 (私下信件，同時見於 Woolcock, 1998) 指出，最早使用「社會資本」這個特定詞彙的似乎是 Hanifan (1916, p.130; 1920, p.16)，以此指稱「那些影響人們大半日常生活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1920, p.78) 關於 Hanifan 使用這個字眼，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它的定義十分類似今日的用語，更強化了過去與現在的思考之間具有的連續感。第二，Hanifan 選擇這個詞彙，是因為他覺得運用這個經濟的語言，比起訴諸「較平凡無奇」的社群概念，更能讓與

他討論的那群實事求是的商人印象深刻。他的策略性考量也恰恰呼應了當前許多社會科學家的情況：爲了向一心只考慮金錢的政策制定者解釋此現象的重要性，因此決定使用這個詞彙。

雖然許多研究者持續在與 Hanifan 關注的相關議題裡努力，像是本於地緣關係的重要性 (Young and Willmott, 1957; Jacobs, 1961; Gans, 1962) 或是「社群的能力」(community competence) (Cottrell, 1976)，但「社會資本」這個詞彙並未被廣爲使用；當它真的被使用時，又幾乎都是在互不相干的專業文獻裡（例如在 Jane Jacob 於 1961 年的研究；在 Lee Martin 於 1963 年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發表的論文；在 Servadio 於 1976 年發表討論黑手黨歷史的文章裡）。

7 主流學術圈是到了 1980 年代末期才對這個概念產生興趣，當時歐洲與美國一些優秀的社會學者注意到了這個概念。歐洲學者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提到，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主導當前政策與社會科學的思維，但他們卻忽視了社會及經濟生活裡許多領域的重要性 (Bourdieu, 1986)。他認爲經濟學的正統刻意將自己限縮在社會認定爲「經濟實踐」的範圍裡做研究，但這麼做將無視於以下事實：「資本展現在三個基要的類別上（每一項又各自有其次類別），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119) 他爲社會資本提出了這樣的定義：

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資源的總和，它能加諸個人或群體，方法是透過擁有一個具持續性的網絡，此網絡則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識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瞭解這個事實，是我們解釋分化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119)

幾乎與布迪厄有相同想法的是美國社會學家柯爾曼，他發表了一篇引發許多學者興趣的論文。事實上，柯爾曼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與布迪厄共同合作，他和布迪厄一樣，提出了一個含括非常廣泛、不單限於狹窄研究領域的社會資本概念：

社會資本乃是由它的功能來定義。它並非單一的實體，而是由很多種不同的存在物所組成，這些存在物之間有兩項共同的元素：由社會結構的某些

面向所構成，而且它們在那結構下都促進行動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的特定行動。社會資本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也具有生產性，它能让特定目的被達成，而且若沒有它，此目的就不可能達成。（Coleman, 1988, p. 96）

在今日的學術圈裡，有一個人名幾乎已成為社會資本的同義詞，雖然就像他自己說的，他從未發明這個詞彙。這個人就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普特南。他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已被廣為引用，包括在本章的開頭。

讓普特南在此領域享有盛名的，就是他那本開創性十足的鉅著 *Making Democracy Work* (Putnam, 1993)。此研究比較了義大利不同的地區，試圖解釋為何某些地方的政府機關較能有效運作（欲瞭解其細節，請參閱第六章）。普特南發現地區政府是否有效運作——它們行動的速度、工作的效率、民眾對它們的觀感），並不能以預算的多寡或政策的架構來解釋。根據細緻的資料搜集，普特南做出了以下這個著名的結論：決定地區政府是否有效運作的重要因素是結社生活是否有活力，及在這個區域裡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程度。

普特南的論點基本上就是：各個地區政府的成功與否，取決於這些區域之間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一般而言，最成功的地方政府都在北部，這些地區都有較高程度的社會資本，而這是經由以下的指標所測得：包括參與像合唱社團這類「水平式」的結社組織，或據稱在陌生人之間有較高度的社會信任（底下將有更深入的討論）。普特南認為，高社會資本的根基可回溯至近一千年以來的文化及政治實踐。運作較不順暢的地方政府（普遍在南部），當地陌生人之間的不信任感高，人們幾乎完全轉向自己的家人尋求信任與支持。在這些地方，參與水平式自願結社而成為會員的比率要低得多，相對而言，主要的社會組織在本質上都是「垂直式」或是階層式的，裡頭的關係都是建立在權力與侍從恩庇（patronage）上。同樣地，這類社會模式之所以產生，似乎可以在過去找到深層的根源，歷史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形塑當前的制度與人們的生活。

在社會資本概念的早期發展史裡，另一位重要人物是 Fukuyama (1995a, b)。雖然切入的角度相當不同，但他與布迪厄都認為經濟學家普遍極度低估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忽視信任的重要。Fukuyama 認為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將北美自由主義模式和亞洲的政府干預模式置於光譜上的兩個端點，這種做法會產生很大的誤導，因為它並未注意到它們彼此在社會資本上的相似性。他認

為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美國與日本是在同一個端點上，同樣在陌生人之間享有高度信任感。他認為這是兩國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經濟表現的相同根源；相對來說，像俄羅斯與許多非洲國家之所以經濟差強人意，是因為它們的人民之間缺乏信任（欲瞭解其細節，請參閱第二章）。

1995 年之後，「社會資本」這個詞彙被使用的次數有爆炸性的增長（請參見圖 1.1）。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普特南在 1995 年那篇極富爭議性的文章（認為美國的社會資本正嚴重衰退），引發了後續的文獻來討論（Putnam, 1995；請參閱本書第七章）。隨著這暴增現象而來的是一波波新興的實證研究，其中大部分會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討論。近幾年來，一些發表出來的研究已提供了說服力十足的嶄新洞見，讓我們更瞭解社會資本的廣大效果，其中大多出自美國學者之手，並且通常是受到普特南論文的影響。由於在美國蒐集到的比較性資料是橫跨各州，並且美國各地在社會資本上的變異也很大，因此我們可運用美國當地的研究發現格外豐碩的成果。此外，美國社會科學界本就以實證和量化為導向，十分適合於這類型的研究。然而，今日的社會資本研究實際上已遍及世界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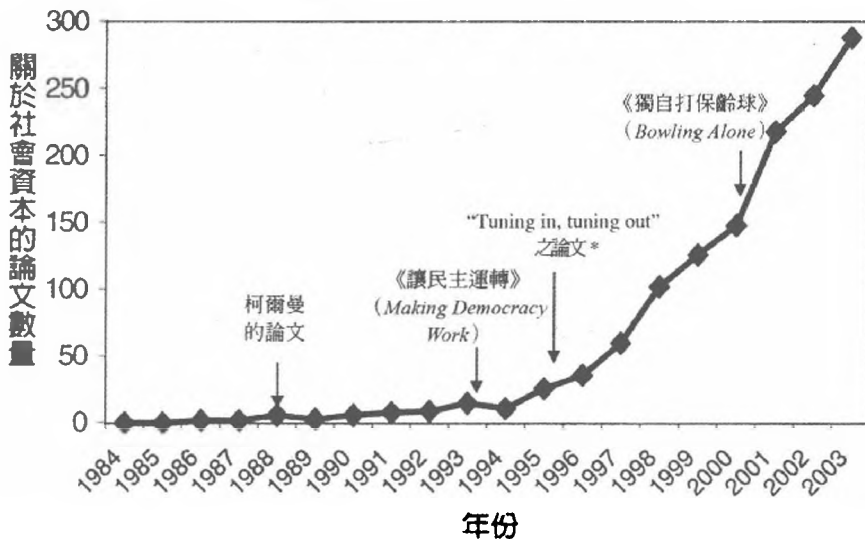


圖 1.1 關於社會資本的學術論文數量 (1984-2003)

資料來源：1984-93 年的數據來自 Econlit、Psychlit、Crimlit and Medline 的綜合研究；1994-2003 年的數據來自 Web of Science；2003 年僅統計到該年的部分，其整年數據乃按比例推算所得。

* 譯註：普特南的論文，討論美國社會資本的消失現象。

另外也有一些人試圖精煉或緊縮社會資本的理論意義，現在我們就把焦點轉到這些發展上。

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組成元素

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因為使用的定義眾說紛紜，因此產生了不少混淆，有些評論家也主張在社會資本的組成元素上須有更清楚的區分（Portes, 1998; Anheier and Kendall, 2002; Nuisl, 2002）。之前討論的簡史裡可看出，即便在早期擁護此概念的人士之間，不論是在形式或對定義的強調重點上，仍存在著顯著的分歧。或許是第一位使用此詞彙的 Hanifan，在內心似乎將它界定為每日人們習以為常的親友交往及寒暄互動：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安定人心的社會規範。布迪厄將強調的重點轉往身處社會網絡下的個人享有的物質優勢。普特南一開始包括了規範與網絡，在之後的研究裡，他偏好採用以社會網絡為焦點的嚴謹定義。他同時傾向以公共財的角度來架構這個概念，很明確地將促進合作的指涉包含進來；這樣的定義，有時會與布迪厄較冰冷、私人化的定義形成強烈的對比。

10

那麼，社會資本究竟是由什麼所組成的？大多數形式（像親屬關係、因工作或利益建立的關係）的社會資本都具有三種基本元素，包括：網絡（network）；由群體內的成員所共享的規範、價值觀及期待（norms, values and expectancies）；以及有助於維持規範及網絡運行的約束力量（sanctions）——可能是懲罰或獎勵。

幾乎在任何形式的社會往來裡，應該都能找到這三項元素，但我們在這裡用其中一種最熟悉且到處可見的社會資本形式來舉例說明：鑲嵌在地方上的傳統社區，或所謂的「鄰里」。第一項元素是社會網絡：我們大多數都至少認識幾位鄰居，這些人際關係的性質可能變異很大，可能只是點頭之交，或是偶爾遇到時會寒暄幾句，乃至於經常拜訪對方或彼此提供感情上、物質上的支持。這些人際關係並非總是讓人覺得是正面的，也有可能伴隨著敵對或厭惡的感覺。在某些情況下，社區或組成其中一部分的網絡可以用地域或明確的形式來界定，例如一處鄉下小村莊。有時它的界線可能很難被界定，而其網絡的特性則可經由它的密度（互相熟識之人的比例）及緊閉程度（closure）（其社群內部的連結程度勝於與其他社群的連結）得到確定。

11 第二項元素是社會規範，包括社群（或網絡）成員所擁有的規則、價值觀及預期。生活在鄰里之中以及我們與鄰居的關係，都伴隨著特定的規則或「社會規範」。這類規則很多（假如不是所有的）都是不成文的。這些規範裡有些帶有行為性（需要我們去做一些事），而有些規範在本質上是較情感性的（與我們對社群或團體的感受有關）。在現代的鄰里裡，這些規範可能包括：儘可能幫助鄰居、禮貌並為人著想（避免在夜間製造噪音；整理好自己的庭院或住處；將自己住處前走道的樹葉與積雪掃除，以免有人滑倒；對鄰里抱持著正面且願意協助的態度；或許還會包括更明確的互惠習慣），當鄰居出門時協助守望相助；互相注意對方的小孩；出借給對方一些設備、食物或金錢。當然，有些共同的規範不見得是獨一無二的，在別的脈絡下也會發現。

第三項元素是約束力量。約束力量並不僅限於正式的，例如違反法律時遭受懲罰。大多時候是非正式的，儘管如此，仍很有效地維持了社會規範的運行（Luzzati, 2000）。在鄰里生活會涉及一些跟好或壞的行為相關的約束力量，雖然看起來常常十分輕微，但仍非常有效。鄰居之間會找出一些方法，以便在有人做出違反鄰里中不成文規定的行為時（例如時常舉行吵吵鬧鬧的派對；在自家販賣毒品；放置了一株 20 英尺高的閃亮聖誕樹在你家屋頂上），能表達出不滿。約束力量或許透過個人直接地傳達，包括不滿的眼神、憤怒的言詞交鋒或是威脅性的動作；然而，約束力量較常通過間接且細微的方式表現，例如透過街談巷議或個人名聲。約束力量也可以是正面的，像是感激他人的幫助，或讚美油漆刷得好或花園照料得當。

這三項元素可用來分析任何一種社群或網絡（請參見表 1.2）。想到自己在學術界的工作環境時，我能相當輕易地指出我的系上有誰，在其中的群組關係（網絡）為何。系上許多工作的進行，都必須仰賴相互理解彼此的行為模式，以及合理程度上的善意——例如共同分擔行政與教學上的責任等（共同的規範）。系上偶爾有個別成員並未按照這些共同的相互理解來處理事情，而其聲譽將可能同步受到折損。這些人可能會被系上其他成員告誡，甚至由系主任開口；最嚴重的情況下則可能被要求離職（約束力量）。

同樣地，我目前任職的單位擁有明確的成員界線——事實上，我可以找出一張組織表，上頭清楚寫明誰隸屬哪個分支以及他們的電話分機是幾號（網絡）。我們有一非常清楚的精神特質，並擁有共同的願景（甚至嚐試將其化為文字給新進同仁參考，有時在舊同仁離職的當天也會討論其內容），一般而

表 1.2 社會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

實 例	網 絡	規 範	約 束 力 量
	網絡的成員	規則及認知理解	遵守帶來的獎勵或違反 網絡規範帶來的懲罰
傳統的社區	鄰居（互相出借東西、照顧或保護——有時也會互相敵對或看不順眼）	互惠、對住處合宜的看顧照顧、詢問陌生人的意圖	肯定及好名聲，相對的則是耳語和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
紐約的鑽石批發市場	其他的交易商（提供管道以獲取鑽石並完成交易）	值得信任的交易、毋需索費、檢視尚未加工的鑽石	贊許、鄙視或排除在外
高速公路法規（?）	其他用路人	符號及相互合作的用語，例如何時啟動、何時停止	陌生人的憤怒（駕駛人因不滿前車或搶道的怒氣）、非正式的「道謝」手勢、警方採取行動

(?) 表示有爭議的例子

言，也存在著一股互助合作的氣氛（規範）。此外，有助於建造或暗中破壞成員名聲與生涯發展（約束力量）的八卦消息、回饋、反應也都不曾間斷過。 12

網絡、規範及約束力量同時兼具正式（在制度上明確地成文規定）及非正式的（不明確或不言而喻）面向。一個鄰里地區的範圍可能經由明文條例或行政機關正式界定，也可能是大家私底下所理解的一種「社會的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K. Lynch, 1960）。社群裡的規範大多是非正式或不言而喻的，但有時會在鄰里條規或契約裡明文訂定，偶爾甚至會寫入地產的契據或租契裡。同樣地，鄰里間的約束力量通常屬非正式，但也可能是正式的，尤其是在相關規範也是正式的時候。有些研究者傾向認定社會資本專指非正式的社會習俗與程序，但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經常很難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劃出界線。 13

我們可以說，這三個組成元素在各種脈絡中都能被辨識到，包括如家庭這種較親密的脈絡，以至於像民族國家這種超社群（super-community）。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幾乎就是靠這幾個元素來界定那些社會結構。這麼一來，我們將遭遇一個問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適用範圍有多廣？

分析層面：從國家到家庭

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對於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應該涵蓋哪些現象，也存在著潛在的爭議（OECD, 2001a）。此爭議之所以產生，是因為被稱做社會資本的各類現象與網絡之間存有很大的差異。以下是一些例子：各國在社會信任上的差異；或是使某些移民或族裔團體得以成功的社會網絡，卻使其他團體失敗；或是低犯罪率社區的實踐及習慣；協助學校與學生成功的家長網絡；或是五花八門的志願性結社；運動型或因其他特殊興趣所組成的俱樂部；由朋友形成的社會網絡；家庭的結構及特性，包括雙親家庭或家人共同用餐的次數。簡而言之，這個詞彙已不只用來指涉社群及志願性團體，也被用來指涉大規模的「文化」現象，或是小規模、微觀層面、家庭內的現象。

這種多樣指涉的情況，令一些人擔心社會資本這個詞彙如今已有逐漸被榨乾意義的危險（Portes, 1998），且是個十分薄弱的概念（Durlauf, 2002）。Ben Fine 或許算是最直言不諱的社會資本批評者，他更進一步將此概念斥為「徹底混亂、含糊不清的普遍範疇，幾乎在任何目的下都能使用這張概念的大傘」

（Fine, 2001, p.155）。Fine 的批評雖有些過度渲染，但在許多研究或政策性文件裡，什麼算是社會資本的問題的確是隱然存在且經常令人混淆的。在各個領域裡，許多實證取向的研究者已開始將社會資本這個詞彙應用在他們的著作中，但卻沒注意到他們所指涉的特定網絡、規範或約束力量彼此之間的差異性頗大（請參見專題 1.1）。

- 14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社會資本最明確清楚的例子，就是那種成員幾乎都彼此認識的非家庭式社會網絡，就像是傳統的地方社區或柯爾曼筆下的鑽石商人。較具爭議的例子通常是非常親密的網絡（如家庭），或是另一個極端的情況：成員都是陌生人的「網絡」。

將社會資本視為鉅觀層面概念的觀點

- 15 在較陌生的人群間，究竟存在何種特質或形式的關係，才算得上是一種社會資本？許多研究者對以上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每當造訪不同的國家時，我們鐵定會為當地一般人的行為方式（日常生活的習慣與風俗）如此殊異而感到震驚。南歐人覺得英國人愛排隊的習慣非常奇怪且令人費解，而英國人則對想插隊的外來遊客感到十分憤怒；到德國去的遊客覺得很驚奇的是，雖然行人指

專題 1.1 過度擴張的社會資本概念之實例？

正值「社會資本」概念被愈加廣泛地運用之際，我們有時會發現它出現的脈絡彼此間差異頗大，而被用來指涉的意義也大為不同。例如，最近有一篇名為〈從碳的所有權而來的社會資本：為原住民創造出公平〉，內容在討論由碳帶來的「信譽」(carbon credits)如何在交易過程裡被形構，它並未成為資本家另一種用來剝削原住民的工具，反倒成為原住民一種「社會資本」(Saunders, Hanbury-Tension and Swingland, 2002)。用我們的術語來說，這些作者所談論的是使一組有形資產轉化為公共財的過程，而此公共財有益於當地居民，但其所指的不是社會科學家口中的社會資本。

另一個例子是社會科學界一篇名為〈「如果你膚色淺，就沒什麼問題」：討論淺膚色如何成為女性的社會資本〉(Hunter, 2002)。此論文分析膚色的階序如何被建立並且維持，以至即使在非裔女性社群裡，膚色較淺與較高者的地位、所得產生相關性。究竟與淺膚色相關的「價值觀」如何作用，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但這並不表示「社會資本」的概念適用於此。有些人可能視之為一種人力資本，比較類似身體的體力，但這些論點仍有待商榷。

更難以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是否一個社群所具備的各式各樣社會規範與習性都可以稱做社會資本？例如，大多數的蘇格蘭人都愛喝威士忌，而法國人偏好葡萄酒，但這些共同的社會規範能構成社會資本嗎？就我的觀點而言，限定我們私人的消費形式的社會規範（例如我們偏愛的飲品），以及形塑我們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的社會規範（例如互惠的規範），兩者必須有所區辨。前者可做為「文化資本」的例證，而後者則是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然而，其他人可能不同意我這樣的看法。

示燈號顯示「停止」，但駕駛人仍會禮讓行人走過車子可暢行的馬路；而令造訪印度的遊客同樣感到驚奇甚至害怕的是，在壅塞的道路上大家無懼於死亡威脅造訪地橫衝直撞；到美國的遊客可能會發現自己在面對店員喊出「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時，感到手足無措；而習於割喉戰競爭的美國商人也會哀嘆，在

世界上其他「彼此信任度較低」的地方做生意十分困難。這一切都只是讓我們感覺新奇古怪的「文化」差異嗎？還是它們其實都呈現了社會資本的重要面向？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某個程度上得視自己的理論觀點而定。可以肯定的是，一國的人民共享這些文化習慣，彼此相處起來就容易的多，身處其中的個體也能在與別人發生最小程度衝突的情況下達成自己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文化與區域文化在許多面向上就吻合了表 1.1 裡對社會資本最寬鬆的定義。

爲了讓這個論點更加清楚，我們可舉日常生活裡的道路規則爲例。只要我們藉由汽車、腳踏車或公車前往某個地方，我們的生命必然冒著風險，不像紐約鑽石商人冒的是金錢上的風險。然而，至少在大多數的現代工業國家裡，我們其實很少冒類似的風險，因爲大多數的人都嚴格遵行一套相同的道路守則，以規範我們在道路上的行爲。當你更進一步地思考時，會發現它其實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這樣一個近乎非正規的體系竟然運作得如此順利。例如，在英國這個交通事故死亡率非常低的國家，公路法規（Highway Code）甚至到近期才被列入法律條文裡。

違規的機會或誘惑（像在明顯無車的路口闖紅燈）時常出現。事實上，在世界上大多地方，違反類似的「規則」是件習以爲常的事，有時甚至已到難以辨別的地步。但是，在那些視謹守道路規則爲一種規範的國家裡（即使偶爾個人會因爲違反規則而受益），一般而言，遵守規則的人仍然會比違規更快速及安全抵達目的地。

16 這個例子與我們先前提及的社會資本三元素有什麼關係呢？規則或社會規範可清楚地被看見（基於對如何舉措持有相同的理解，最終促使每個人的行動更便利）；約束力量也可輕易被辨識出（可能包括正式的懲罰、罰款及非正式的制裁，像駕駛人會對違反道路規則的人咒罵、按喇叭或比出不雅的手勢）。較難以指認出的是網絡。同一個民族國家的所有成員很難都彼此認識，但他們卻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與別人互動（與本國人而非他國人）；他們通常一樣擁有某種鬆散的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說對如何彼此互動持有一套相同的理解。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柯爾曼影響深遠的定義可以很自然地將鉅觀層面的文化規範，含括入社會資本的概念裡——預設這些規範以某種方式促進了相互合作的行動。但相對而言，柯爾曼功能論式的界定正因爲在這

張寬廣的概念大傘下包含太多迥異的現象，因而受到了批評。

有一個強力支持將鉅觀層面的現象納入社會資本概念的論點，由研究以下議題的人士所提出：不同區域（與國家）中的陌生人彼此信任程度的差異及這些差異與各種實證結果之間的關聯；主要的倡議者包括 Kimberly Lochner、Ichiro Kawachi 和他們的研究夥伴，還有 Steve Knack 等的經濟學者（Lochner,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Knack and Keefer, 1997；請一併參見第二、三、四章）。

如果我們決定讓社會的鉅觀面向（像是文化的或社會的習俗）含括進社會資本的概念裡，那麼立刻就會面臨的問題是，是否應將那些因著社群、地區與國別的差異而有不同且更正式的面向納入。我們尤其必須考慮，是否應該將制度性的結構視為社會資本的一部分。柯爾曼的定義無疑地可以包含一個國家或社群正規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

明確地支持這種「海納百川」式定義的，還包括了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十分積極地投入研究並試圖將此概念操作化，它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定義，清楚明確的含括各類制度：

社會資本指的是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量的制度、關係及規範。愈來愈多的證據指出，社會的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社會資本不僅是依附在社會底下的制度總和，它還是使它們能緊緊一起的黏合劑。（World Bank, 1999）

對很多研究者（包括普特南）與實務參與者〔包含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來說，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海納百川式定義是走過頭的。有趣的是，主要反擊海納百川式定義的論點反倒不是從概念上，而是從實際層面上。有人會擔心，將政治、法律與制度性結構納入定義來，會使此概念變得更難以掌握，並且使原本極受忽視的領域更得不到注意（非正式網絡與規範的重要性）。

17

將社會資本視為微觀層面概念的觀點

Kawachi 等人雖然暢言應讓社會資本概念包含鉅觀層面，但他們也為此概念的過度延伸感到不安。Kawachi 很關切社會資本被人用來指涉兩種領域，其

一是新生代針對鉅觀或環境層面的研究，另一則是從舊時持續到當今的著作，主要針對社會網絡對於個人或微觀層面的效應。

這種概念上的爭辯讓人感覺就像是一對夫妻，想要一起蓋一條單人的毯子。對 Kawachi 而言，這個概念的核心部分在於中觀與鉅觀層面，他想要看到這二個層面包含進來，也樂見微觀層面被排除在外：「社會凝聚與社會資本，指的都是社會在集體或環境層面，應該與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有所區別，後者主要是從個人層面測量出來。」（Kawachi and Berkman, 2000, p.175）Kawachi 等人認為，社會資本概念應僅僅保留來指涉環境與鉅觀層面的現象，這個建議和大多數在早期對此概念所做較寬定義的嘗試大相逕庭，如柯爾曼與布迪厄的研究。相對於此，有另一群研究者僅用這個概念來指涉 Kawachi 等人想要排除在定義之外的親密網絡。舉例來說，這類的著作會研究家庭裡只有單親或雙親的影響，或是研究親密的朋友或親戚所提供的支持（如 Furstenburg and Hughes, 1995; Teachman et al., 1996）。

18 至於將較為鉅觀層面的現象納入社會資本定義的作法，在較偏重理論的陣營裡，有不只一篇針對社會資本著作的後設回顧研究對此持懷疑立場（最著名的就是 Portes, 1998; Edwards and Foley, 1998）。Portes 在討論社會資本是否可被視作「社群與國家的一項特徵」時，下了這樣的結論：「我相信社會資本在理論上的前景最被看好之處，就在於個人層次。」他繼續指出：「若將社會資本重新定義為大集合體的結構性特質，這種作法本身並無誤謬，但這種概念上的偏離之舉需要更多的關注與理論方面的精煉，然而目前尚付之闕如。」（1998, p.21）雖然 Edwards 與 Foley（1998）運用非常不同的論證方式，但最終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站在實證研究的立場，我們認為社會資本應該脫去任何加於其上的社會—心理學式的價值，而被當成一個限制較緊的社會—關係性的概念，適用在社會網絡與組織之上。」（Edwards and Foley, 1998, p.136）如此一來，我們清楚地看到，相對於 Kawachi 等人的建議以及世界銀行寬鬆的定義，這些人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反遊說行動，試圖將社會資本的定義帶往相反的方向；換句話說，就是朝向較微觀且扎根於實據（grounded）的取徑。

做為一個多層面概念的社會資本

不論是在國家、鉅觀層面那些廣泛又薄弱的網絡與規範，或是在親暱、家庭或微觀層面那些密度高、連繫強的網絡與規範，兩者都符合較寬鬆的社會

資本定義。雖然在每個分析層面裡所看到的網絡、規範、約束力量其本質都迥異，但仍然可以辨識出來。

儘管如此，將希冀限制這個概念的意見並置觀之，結果仍令人驚訝。若用一個隱喻來說明，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似乎扮演一個知識上的羅沙哈測驗（Rorschach test）* 的角色，不同的研究者與文獻回顧者依據各自關注的焦點，在概念的墨跡 * 中看出包含了自己旨趣的定義，而這個定義經常會排除其他人的旨趣。

我們應該將這個詞彙「授予」某個團體或區分出不同的定義？還是應該尋找一個能同時包括微、鉅觀區分的概念？Kawachi 等人認為將社會資本這個詞彙應該只能指涉鉅觀層面的效應，我認為這種建議是禁不起考驗的，同時也與最初使用此詞彙之人所採用的定義格格不入。環境影響的效果在小團體（甚至是家庭）裡仍清楚可見，然而鉅觀層面的環境影響效果仍需要考量微觀層面的解釋。然而同樣地，我也認為 Portes、Edwards 和 Foley 等人排除鉅觀層面現象的立場有誤，許多研究者如 Kawachi 等人，近年來藉由實證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像是發現在一個州或國家，陌生人間平均信任度與健康水準兩者間有密切的關聯，假使不援引在鉅觀層面上進行操作化定義的社會資本概念，我們很難解釋這些發現。因此，如果我們不願在那樣的脈絡下使用這個詞彙，就必須再發明另一個意義很類似的詞彙。

19

更進一步來說，就像我們在之後的章節裡將看到的，各個不同且不斷演進的社會裡，如何以某一層面的社會資本取代另一層面的社會資本，這當中的內容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這告訴我們，在不同的層面之間的確存在著某些功能相同的對應物，也強而有力的證明需要有一個能包括這些不同層面的概念外延。由此看來，應該要注意這些相異的分析層面，並隨時準備好以便加以區分。就此意義而言，我們需要兼顧這兩個立場，我們得區分出不同層面、分層或是「種類」（species）的社會網路；然而，我們也必須謹記，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它們都隸屬於同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屬別」（sociological genus）*。

* 譯註：一種心理學測驗，運用十張墨水點繪的圖形請受試者解釋看到了什麼，進而判斷其心理狀態或人格特質。

* 譯註：即類比羅沙哈測驗裡受試者，看著墨跡，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說出它像什麼。

以功能來區分的社會資本次類屬： 黏著性 (bonding) 與架接性 (bridging)

近來在理論上的努力，已試圖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分出不同的次類屬，最重要的區分可能就是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

不管是經由選擇或必然如此，有些資本是內聚型的 (inward looking)，傾向於強化排他性認同與同質性團體。這種黏著性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包括在單一族裔中彼此稱兄道弟的組織、本於特定教會的婦女讀書小組、時髦的鄉間俱樂部。另外，有些網絡是外展型的 (outward looking)，包括了分屬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這種架接性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包括美國民權運動、許多青年服務性社團、推動普世教派合一的組織……黏著性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強力膠，而架接性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除膠劑 (WD-40)* (Putnam, 2000, pp. 22-3, 黑體字為本書作者所加)。

20 普特南將創造出黏著性—架接性二分的概念歸功於 Gittel 與 Vidal (1998)。我們可以清楚見到，很快地，這樣的區分已獲得廣泛的使用，這不只是因為它本身捕捉到了網絡及社會認同裡很重要的特質。從網絡的角度來看，它隱約地呼應了稍早由 Mark Granovetter 所做的「強」連帶與「弱」連帶 (strong/ weak ties) 的區分 (M. S. Granovetter, 1973, 1985)。他提到，諸如僅僅認識或由各種管道「接觸過」(contact) 的弱連帶，在獲取資訊、機會與工作時非常有用；與家人、好友之間的強連帶，則可提供較濃厚的多重支持，因此可以想見它能對於情感的狀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¹簡而言之，不同形式的社會網絡具有著不同形式的人際連帶，似乎會帶來不同的優點與益處 (Six, 1997a; de Souza Briggs, 1998；請一併參見之後的章節)。

* 譯註：意即，各個分層（作者喻之為生物學上的分類「種」）仍隸屬於同一個概念（生物學上「種」的更上一層分類「屬」）。

* 譯註：此種發明於1953年的化學產品，本用於軍事用途上，做為避免火箭外殼生鏽而被腐蝕的隔水劑，後來成為家戶清潔用品後，也有除膠的功能。

¹ 黏著性與強連帶、架接性與弱連帶之間並非完全平行呼應的 (Tom Healy, 私人信件)。例如，有些人會認為雖然從互動頻率及彼此相距的物理距離來看，有些遠親與我們的關係比較近於弱連帶，但我們跟他們的網絡性質是黏著性的。

Granovetter 的實證著作從網絡的角度預見了黏著性 / 架接性的區辨，而黑格爾較富哲學性的著作則可說是從規範的角度預見了這個區辨。黑格爾曾對比以下兩者，一是家庭或小型社群內的互惠和關懷所形成的強烈連繫（我們可稱之為規範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一是較陌生的人之間很常見的自我利益取向的規範。由於陌生人之間通常缺乏合作，於是黑格爾強調要透過國家的介入，在社會裡建立起一種「非個人的利他主義」（impersonal altruism）之規範的重要性，藉此讓相對陌生的人能成功地合作（我們可稱之為「規範性的架接性」社會資本）。²

Michael Woolcock 曾發表一篇與 Gittel 與 Vidal 的研究相呼應的重要論文，嘗試要發展一個理論架構，以解釋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為何在各個社會中的普及與程度不一（Woolcock, 1998）。如今再回過頭來看，他用不同的詞彙來指稱相似的概念，造成了一些混淆。例如，Woolcock 為呼應黏著性—架接性的區分，而將社群內的連帶〔他稱之為「整合」（intergration），也就是黏著性〕，與社會外的網絡〔他稱之為「連合」（linkage），也就是架接性〕對立並陳。他認為在一社群或國家內，這些連帶的不同結合形態將決定該社會所屬的類型（請參見圖 1.2）。

Gittel 與 Vidal（1998）以及 Woolcock（1998）所做出的理論性區辨，無疑地將得到許多支持者加入。Woolcock 隨後展現出他對連結性社會資本特別有興趣（請見底下的討論）。Fedderke、De Kadt 與 Luiz（1999）也主張將社會資本橫切，區分兩種功能：「透明度」（transparency）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透明度指的是一個社群的社會資本如何使資訊的流通更加便利，如何普遍降低「交易成本」（請見以經濟為主題的第二章，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因此，一個擁有較多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社會，將被視為擁有更多的透明度，而資訊將更快速地在社群與團體之間流通。理性化指的是社會資本從重視實質內容的規則與規範轉變成重視程序的規則與規範之程度（Fedderke et al., 1999）。因此，某

21

個社群的社會行為若由嚴格的傳統規定所管轄，另一個社群行事規則卻由情境與結果而定，則前者的理性化程度較低。

以上各種社會資本的區別、面向及對比的概念組，最終究竟何者能脫穎而出，取決於它們是否能在研究或政策中證明自己是有用的、有啟發性的，同時

² 我很感謝我學生的 Nir Tsuk（在研究所時請我做指導），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黑格爾與這個網絡的相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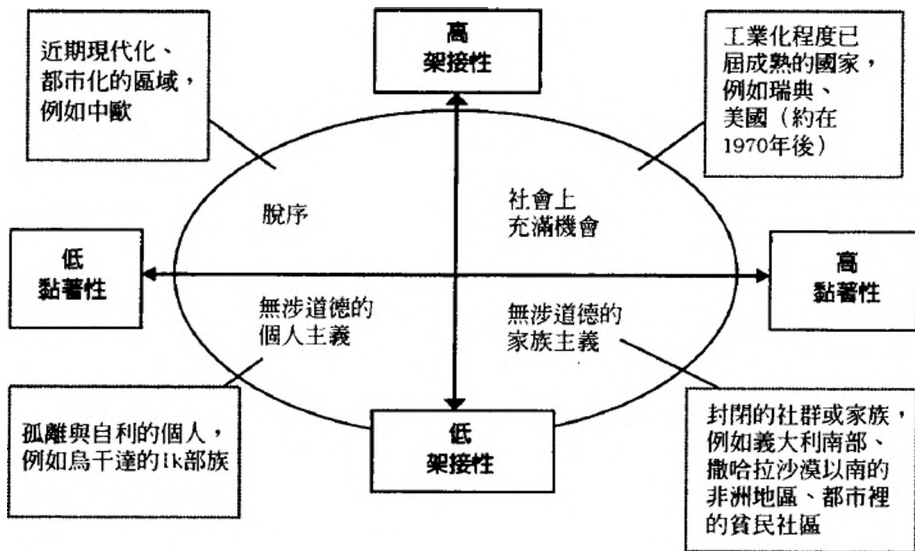


圖 1.2 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不同的混成方式如何創造出不同型態的社會
資料來源：修改自 Woolcock (1998) 的著作，但做了調整以含納入 Gittel 與 Vidal (1998) 所做的黏著性—架接性的分類。

有能力解釋現有資料在實證上的規律性，而不是取決於理論本身的優美與否。例如，我們最近發現在個人層面上（至少是美國），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彼此間存在著極高度的相關性（Putnam, 私人信件）。換句話說，有些人和地域與當地其他類似的個人擁有較多連結，同時也較容易與距離遙遠或差異頗大的個人擁有高度的連結，這與許多人的設想恰好相反。這告訴我們，雖然黏著性—架接性的區辨在某些實例裡很重要，但或許我們毋需過度操心，時時都去測量黏著性和架接性社會資本。如果一個人或社群充裕地擁有其中一項，那麼他們或許也充分擁有另一項。另一方面，近來有些研究指出，架接性與黏著性社會資本擁有迥異的實證性質，這更強化了做此區辨的重要性。例如，架接性社會資本比黏著性社會資本衰竭得更快。針對銀行家的社會網絡所做的研究發現，在某一年裡的架接性關係於次年，就已有 90% 消逝不見，即便這種關係具有高價值，同時會帶來同業間的正向聲望以及較高的報償（Burt, 2002）。

總而言之，黏著性—架接性的區分日漸廣為使用，而其他的區分則還未普及。

權力與「連結性」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公共財嗎？

不像其他形式的資本，談論到社會資本時常見的一種論點是，它是一種有益於團體的公共財，而非僅屬於個人的財產，因此常會出現搭便車現象。如果你隸屬於某個社會網絡，或居住在合作與互助的規範盛行的社群裡，即使你對社群的維持幾乎毫無貢獻，你也可以自此網絡或規範中獲益。

然而，人們逐漸認識到，實際上有許多形式的網絡並非完全算是公共財，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機會從中受益。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經常只是一種「準公共財」或「俱樂部財」。事實上，在一些情況下，它存在的形式會被更廣大的群體視為是壞的或病態的，例如黑手黨。

有些研究者想要設法把社會資本這些較黑暗的面向或可能性排除在其定義之外，這種作法較符合通俗大眾對此概念的呈現方式，而較不具有學術式呈現的特質。普特南有時被歸入此陣營，因為人們認為他賦予此概念過於正面的選擇性看法 (Edwards and Foley, 1998)。然而若是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就會發現他很充分地意識到社會資本的負面例子。事實上，在他對此主題考察最完備的著作裡，有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社會資本的黑暗面」(Putnam, 2000, ch. 22)。³ 他與其他人都指出，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能用來達成被某些人視為「壞的」目標。社會資本促進了相互合作的行動，但這並不保證此行動一般而言將產生好的或壞的效果，就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也可能被用來造成好或壞的結果一樣，產出的可能是良藥，也可能是武器。

儘管如此，Edwards 與 Foley (1998) 的文獻回顧準確地抓到社會資本這個過於正面及強調公共財的面向。他們認為研究者應該重回布迪厄更為實察的定義，強調與其將社會網絡視為公共財，倒不如視之為個人的資產。有趣的是，重新強調個人面向讓社會資本的概念變得比較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一般人認為它們原則上都是為私人擁有的、為私人所消耗的。有些長期被肯定的社會學文獻就個人網絡的特性及範圍裡討論階級差異 (例如 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Hall, 1997, 1999)，它們恰可替上述的立場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相較於勞動階級或較不豐裕的個人，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較容易擁有更廣大且更多樣的網絡。用前文引介的術語來說，中產階級所擁有的架接性社會資

23

³ 請一併參考 Halpern (1999, 第五部分〈社會資本的黑暗面：它會造成傷害嗎？能被排除嗎？〉)，或是 Aldridge and Halpern (2002, 討論〈社會資本潛在不利的一面〉的部分)。

本（弱連帶）遠比勞動階級多出很多，這對他們的工作上或專業方面的向上晉升帶來重大的個人優勢。

Edwards 與 Foley 更細緻地探索了這個議題，他們指出僅僅描述個人網絡的大小及密度是不夠的，還必須檢視這個網絡幫助個人連結到哪些資源。我們可以假想一下，將你的社會網絡拿來跟一位著名的億萬富豪相比較（如果你是億萬富豪，不妨將自己的網絡拿來跟你手下的中階主管相比較）。如果你是一位擁有極佳連結的中產階級，你的網絡數量可能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Richard Branson（譯註：英國億萬富翁，旗下的維京集團打造了全球最著名的品牌之一）、Prince Al Waleed bin Talal（譯註：沙烏地阿拉伯王儲）之類的人相距不遠（雖然有可能稍小一點）。事實上，你的網絡或許比他們更富架接性，橫跨了更多社會階級，畢竟一般的億萬富豪不太可能與社會上各類人有太多的接觸。但是，如果我們檢視億萬富豪的網絡所能提供或接觸到的資源，並與我們自己相比較，就會發現二者有天壤之別。億萬富豪的社會網絡必然包括了該國（或許也包括其他國家）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金融鉅子、工商領袖等等。只要評估人們社會網絡裡蘊含的資源，就能給那些單以公共財的觀點看待社會資本的人一記當頭棒喝。

長期以來，研究社會網絡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意識到了這個議題。例如，40年來討論「社會性支持」的相關文獻裡，研究者估算個人從各自的社會網絡裡接受到資源的層級與類型，發現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中所獲得的正向情感支持和物質支持有很大差異（請一併參考第三章）。

24 然而，察覺到社會資本具有私有財的面向，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這個詞彙。相反地，它促使我們將權力、資源一併融入這個概念裡，同時指認出它具有「俱樂部財的」面向（Szreter, 2002）。Woolcock 的著作就是嘗試要執行前者，至少是就國家權力與掌控的菁英而言。他認為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有項重要的特色，就是政府與其所（鑲嵌）的社會之間的連結或鑲嵌有多緊密，這種現象被他稱為「綜效作用」（synergy）。他還強調了橫切面的重要，包括政府於制度上的融合、勝任情形與能力，他稱之為「組織完整程度」（organizational integrity）。比照在微觀層面上以架接性一黏著性組成的特定模式來區分各個社會（請見上文的討論）的方式，Woolcock 試圖在鉅觀層面上以綜效作用/組織完整程度的特定組成模式，來區分各個政府與社會之關係的不同形態（請見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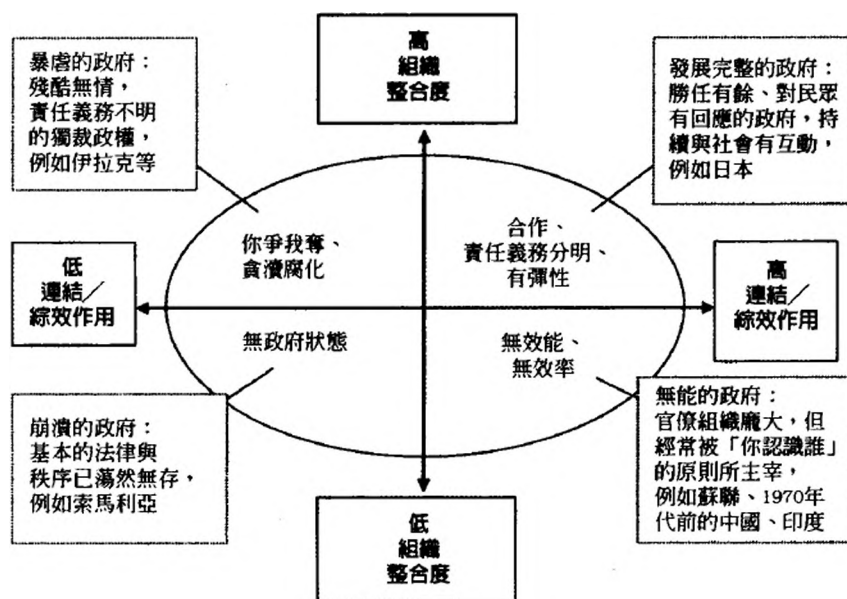


圖 1.3 不同型態的政府，各自在距觀層次上擁有何種綜效作用與組織完整程度的組成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Woolcock (1998)

Woolcock 利用這個四向度乘以四向度的縱橫矩陣，創造出由 16 個不同的國家型態組成的類型學，雖然他並未真的替每個方格填入相應的國家（當然，如果你在每個向度上採用更細緻的區分，而不只是「高」或「低」，那麼你將得到一個由更多型態組成的類型學）。他並未精確地指出向度與向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例如，他並未說明綜效作用與組織完整程度的某種特定組成模式，是否更容易在微觀層面上蘊生出某種架接性與黏著性社會資本的組成模式（或是反過來的情況）。

25

社會如何處理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這個議題絕不僅限於政府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每當我們考慮到兩個擁有非常不對等資源的個體、社群或制度時，這個議題就會浮現出來。Woolcock、Szreter 與其他人已開始運用「連結性」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描述個人或社群的網絡如何與擁有非常不平等的權力或資源者形成連結性。這類的連結原本就具有不對稱性，因此連結性社會資本可能必然含括了相互尊重或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規範，以平衡資源較豐富者偏狹又理性的自利行爲（此即「規範性的連結性」社會資本）。因此，連結性社會資本或

許可姑且視之為一種特別與權力相關、特定形式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它是一座垂直架接的橋樑，接通不對稱的權力與資源。⁴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引進連結性社會資本的概念僅能處理 Edwards 與 Foley 關切之議題的一部分。就某個程度而言，問題再一次出現於分析層面上。我們可以從鉅觀的層面來檢視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要不然也可以改變焦距，將鏡頭對準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如果該社會擁有高度的架接性與連結性社會資本，那麼當我們把焦點對準微觀層面時，不論鎖定的對象是什麼，照理說都會得出一個很類似的畫面。這是因為架接及連結上的豐富，意味著此社會是高度相互連結的，也因此透過無窮無盡、結網均勻的連結網，能使成員享有共同的權力與資源。另一方面，假使這個社會在架接與連結上十分貧乏，那麼依照每一個社會之不平等程度，我們在微觀或個人層面上所得到的畫面差異也將很大，因為該社會被切割為彼此較為隔絕的個人網絡或階層。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會看到權力與資源嚴重地叢集，成為被隔離（且受保護）的俱樂部財、派系的禁籟，或被劃為自家的「保護屬地」。

即使是在最接近理想的社會裡，其連結性社會資本的數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們從平均或鉅觀的測量值來推斷社會中個人或階級的經驗時，應格外的謹慎。我們將在稍後的章節裡重新回到社會資本的潛在黑暗面這個議題，尤其是在某些特定形式中的情形。接下來，我們將試著把到目前為止已勾勒出大致輪廓的幾串概念兜在一起。

將概念串兜在一起

26 當我們從上文的概念爭論中抽離出來，就會看到某些有趣且有用的東西——也就是此領域的概念地圖。每個觀點都可以做為一種連接社會資本的迥異向度，而大多時候，向度之間似乎彼此呈現垂直。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看見三個主要的橫斷向度：

1. 組成元素：網絡、規範、約束力量。
2. 分析層或分析域（domain of analysis）：個人、團體、社群、國家等等。

⁴ 這樣的定義就會將架接性社會資本推向指涉跨越團體和社群間的「水平性」連結，而連結性社會資本指涉的就是穿過社會的權力與資源分層的「垂直性」連結。

3. 特質或功能：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

下圖 1.4 以格式化的型態將上述內容呈現出來。這張圖的複雜度告訴我們，針對某個社會或社群的社會資本程度是高是低，我們不應驟下總稱性的判斷，因為社會資本可能在某個類目之下是高的，卻在另一個之下是低的。

讓我們來想想，這個架構在實際運用上有何潛力。假使我們對個人的社會資本（或至少針對個人身處脈絡的社會資本）感興趣，我們可以從詢問他們的黏著性社會資本開始：他們跟誰維持著親密的關係（家庭網絡等等）；在這些關係裡運作的規範是什麼（信任、關懷與支持等等）；或許也得問當規範被違反時（收回情感等等），約束力量如何運作。我也需要問到個人網絡裡較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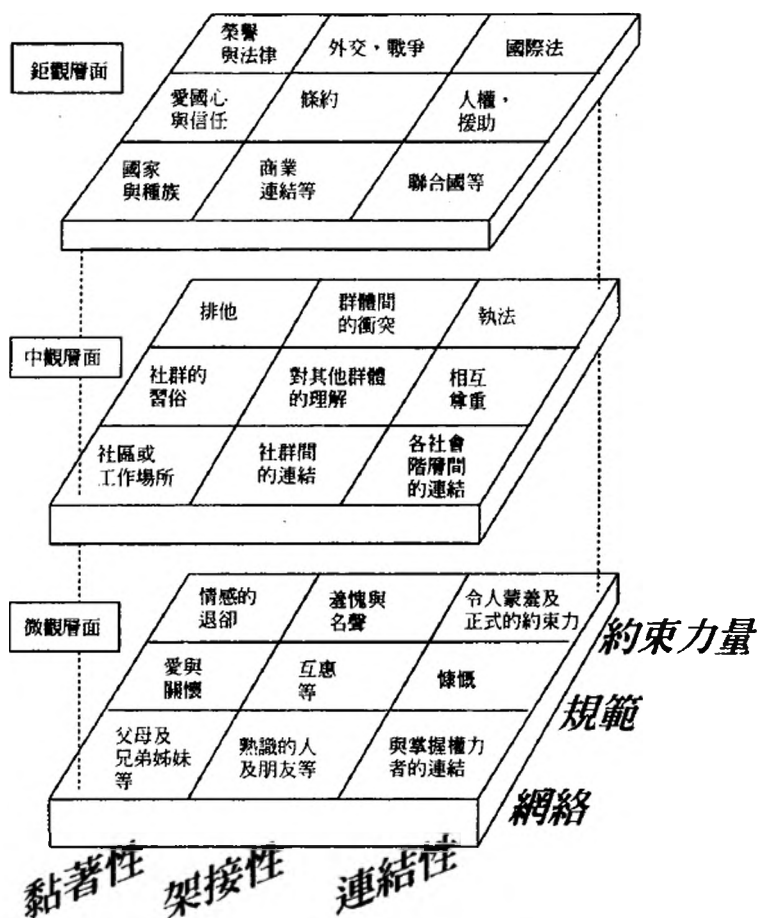


圖 1.4 社會資本的概念圖示（以及實例）

延伸擴充的一些面向（他們連結的對象有誰），這些面向涵蓋了最直接的網絡之外的朋友與相識者（架接性社會資本）；還有，他們與擁有較多或較少權力與資源者如何連結（連結性）。

這種個人層面的分析，能讓我們對於此人的社會資本更為認識，但它無法得出整個故事的全貌。理想上，我們也希望能知道此人的社會網絡如何與該社群、社會裡其他人的網絡相連——此即環境層面。此人是否位於「星型社交網」（sociometric star）之中心位置，高度連結並善於社交，而他身邊的人都形同處身在缺乏連結的沙漠裡嗎？或是這個鄰里或社區的每個人彼此連結的情形是相同的？簡而言之，我們需要檢視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各自在社群間的普遍性如何（在中觀層面上）。同時，根據自己所接受的定義的廣度不同，我們希望得知在區域或國家層面上，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的網絡、規範、約束力量的程度如何。

總而言之，我們可由當前理論的辯論中取得一張內容豐富的地圖或一套類型學，藉以在後面的章節裡導引我們探討分布範圍廣闊的社會資本文獻。

「社會資本」是一個適切的詞彙嗎？

27 現在我們要再次簡要地思考一種批評的聲音：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將太多東西綁在一起了，我們應遺忘這個詞彙，僅注意其組成元素即可。

28 這個問題歸根究底在於：究竟社會資本是否就是其組成元素的總合，還是不止如此？社會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彼此之間顯然存在著系統性的關聯。網絡有一部分要由團體規範來界定，同時也可幫助團體規範的形成（Tajfel, 1970, 1981）。團體規範在某個程度上得仰賴約束力量的存在才得以穩定維持（Posner and Rasmusen, 1999）。反過來說，約束力量若要起作用，關鍵在於共同規範、網絡結構的存在，例如某個程度的封閉性（Coleman, 1988）。同樣地，微觀、中觀、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彼此之間也很可能存在著某種實證上的因果關係。去描述社會資本不同功能（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之間的特性及互動，是很有必要的。這些功能在定義上是彼此互補的。因此，我們有很充分的理由將這些相異的組成元素、層面、特質一併放在同一個標題底下，即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因為我們相信它們彼此具有相當密切的因果關係。它們都在處處連結的系統或結構中占有一部分。若想解答謎團，重要的是理解這個更廣大的整體如何運作，而不僅測量它的組成元素。

另外還有第二種強有力的論點，也贊成應該將這些元素歸在相同的概念標題下：認為這些元素能夠相互補足、取代（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可將這些元素放置於一個大家庭或類屬之下，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對應的功能。柯爾曼其中一項出色的洞見就是他也認識到了這種功能對應的事實，這項認知更引爆了當前對社會資本的興趣。規範、網絡與約束力之間，具有一部分相互補足的特點（欲知實例，請參見 Katz, 2000）。因此，一個高度封閉或密度很高的網絡，雖然僅有極少的明確規範仍可能有效地運作下去；一個密度甚低的網絡，如果擁有高度明確的規範以及嚴格的約束力量，仍可以展現出高度信任及有效的運作。同樣地，高度一般化的規範，例如一國的公民禮儀（civility）或陌生人間正式的行爲守則，或許可以一部分取代社會發展較早期階段中的傳統社區裡的網路，以及微觀層面較親密的規範所具有的功能（請比較 Hawthorn, 1998；請一併參考第七與八章）。在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社會資本之間，可相互替代的程度較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即便個人甚至是社會，有時似乎會爲了某種社會資本（例如架接性的）而放棄另一種（例如黏著性），例如遷居都市的移民是拋下他們村莊裡的黏著性社會資本，以追求都市裡豐富的架接性社會資本所提供的機會。

它真的是「資本」嗎？

從當前的理論之爭議抽身前，我們至少還應該討論許多人所關心的問題：社會資本實在不能算是「資本」。有些經濟學家已極具說服力地闡述了這個觀點，最著名的就是 Arrow 與 Solow（請參見 Dasgupta and Stiglitz, 2000）。舉例來說，另一種思考方式是將它視爲減低「交易成本」的因素（使人們更容易在一起工作），但不將它描述爲一種資本（Paldam and Svendsen, 2000）。

29

此種關注將焦點放在「可替代性」（fungibility）；也就是說，資本能從某形式轉變爲另一形式，可以用共同的計算標準來比較不同形式資本之間的價值與對等，同時資本是可以交易與販售的。我可以在市場上賣出克魯格金幣（krugerrands，譯註：南非發行的金幣，上頭印有前總統 Kruger 的肖像），然後買下一些股票，但我可以對社會資本做出相同的行爲嗎？有些研究者認爲，這個詞彙將造成「隱喻的混淆」（metaphorical confusion），無法分辨究竟社會「資本」爲一種實質上的數量，或者是一種被鑲嵌、目標取向的關係建立之過程（Bankston and Zhou, 2002）。

這將引發一則需要我們探討的實證問題：我們能夠代換、以不同方式投資，甚至去交易我們的社會資本嗎？在前一節裡曾提及，我們有可能可以這麼做，至少在某個程度上。不論是個人或社會，都可以選擇自己投資社會資本的程度多寡，甚至選擇自己要投資哪一類型的社會資本。人們、公司與社群都定期在「投資」社會資本上做出決定，像是舉辦派對、晚宴、其他的社交活動。有些人勤於寄聖誕卡片給所有的朋友及同事，確保自己能掌握對方的住址變動及狀況；其他人則覺得這太麻煩了，而且，顯然這類投資都帶有機會成本。

最近的實證研究告訴我們，人們的確精明地投資於社會資本，正如理論所預測（Glaeser, Laibson and Sacerdote, 2002）。舉例來說，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呈現先增後減的趨勢，這反應出它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請參見第二章）；坐上某個職位能帶來更多的社會網絡與技能時，它就會增加；當預期之後即將換工作時，就會減少，因為在變動之前，理性建議減少社會資本的投資。有些人認為，即使是最基本的人生抉擇，像是要不要進入長期的關係、要有幾個孩子（或是不要有），最好都能理解為顯而易見的社會資本投資（Astone et al., 1999）。

30 同樣地，不管是個人、公司或是社群，都在選擇是要在社會資本或其他形式的資本上做投資，雖然它們未必這樣看。公司主管可以選擇買進新機器（物質資本）、送員工參加訓練課程（人力資本）或是在週末辦理員工及業務相關人士的自強活動，以建立彼此的網絡及信任（社會資本）。

另一方面，我們確實也無法打個電話給經紀人，請他（她）出售我們某部分的社會網絡或規範，再買進另一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個公共財或俱樂部財，因此並非全然在個人的掌握之下（或能掌有其所有權）；然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資本不論是形成或經歷變動，都是個緩慢的過程。有些與我們的社會資本相關的決定，即使看起來有一部分在我們的掌控之下，像是決定結束一段婚姻或離開一個社區，但是「交易」本身可能是很麻煩費力、影響廣泛且不可逆轉的。然而，我們或許注意到，這些限制也同樣適用在其他形式的資本上。例如，我們或許有把握將道路及鐵路網絡、其他形式的實物基礎建設稱為資本，雖然就某個角度而言，它們也算是公共財。同樣地，人力資本的變動也是緩慢的，也很難用像資本的特定古典概念所期待的那樣，可以在所有權轉換的意義上進行賣出。即便是金融資本，其價值與可替代性的形式也不全然完美。就像普特南指出的：「在國家的帳目計算裡，一個

打蛋器與一座航空母艦似乎都算是物質資本，但是打蛋器對防衛國家並沒有太大幫助，而航空母艦也無法幫你在早晨時做出炒蛋。」(Putnam, 2000, p.21)

有些人則認為，社會資本被使用時將產生更多的社會資本，而不是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被耗盡（你愈去與人交際，你的網絡會變得愈廣）。然而，這種看法有可能被誇大了；有人發現社會資本的過度使用將導致消耗殆盡。例如一項針對轉型經濟的投資研究指出，與一些比較性的團體對照之下，能完成一項初期社會資金計畫的社群，較不容易再完成其他地方基礎建設計畫，「這意味著社會資本在這些初期計畫裡已被耗盡」(Chase, 2002, p. 219)。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個人身上，若是一味使用社會網絡而無意回饋，就會發現自己逐漸被孤立而最後僅剩隻身一人（請參見第三章對憂鬱症效應的討論）。

當然，就像一些會計專業人士不樂見「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有些經濟學家也不樂見人力或其他形式的資本概念出現 (Miller, 1996; Helliwell, 私人信件)。但如我們太受制於狹窄的定義，將會發現「資本」這個概念不但失去旨趣所在，甚至連經濟學上的價值也盪然無存。一個忽視社會資本、人力資本以及對公共財之投資的經濟模型，將是個乏善可陳的模型。

31

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都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大感興趣 (Temple, 1998; Piazza-Giorgi, 2002；請同時參見第二章對經濟成長的討論)。OECD 對這個領域的興趣也為此概念增加了不少可信度，尤其是它出版了一份為各國財政部長所做的報告：《國家之安和樂利：人力與社會資本的角色》(*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ECD, 2001a)。在 2010 年之前，這個詞彙所引發的爭議性至少不會大於人力資本在今天所引發的爭議。

諷刺的是，有證據顯示一些社會科學家因為社會領域的「經濟學化」而感到不安，他們對此詞彙也做出反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Ben Fine，他譴責那些研究社會資本理論的學者，根本就是和主流經濟學沆瀣一氣 (Fine, 2001, p.193)。不只 Fine 有這樣的看法，也有其他人認為社會資本「以其在意識形態上的重要影響，模糊了分析上重要的區分」(S. S. Smith and Kulynych, 2002, p.149)；或說它是新自由主義所用的「特洛伊木馬」(Spies-Butcher, 2002)；或說它模糊了關切貧窮的焦點 (Adams, 2002)。這麼一來，我們看到了一對奇妙的組合共同起舞，一邊是一群擔憂經濟學會被「基礎不扎實」的社會學污染的經濟學者，另一邊是一群社會學者，他們憂心社會學將被經濟學「扎實生硬」卻狹隘的理性選擇世界觀所染指。或許我們應該將這種兩邊不討好的情況視為

吉兆，意味著這些長久以來相互敵對、不相往來的學科，如今將被迫回到一個更實際的共同基礎上。

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中遭遇的實際問題

有些經濟學家及其他人不喜歡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原因之一就是它似乎很難以測量。同時，由於不同的研究者採用相異的方式去測量社會資本，更加深了原本的困境（Schuller, Baron and Field, 2000）。

上文的概念討論指出有更多、更廣的社會網絡及規範可以合理地被稱為社會資本，如此可以解決測量上不一致所引發的部分問題，但同時也為任何想大膽進行「社會資本審計」（social capital audit）的研究者或政府，出了一道艱澀難解的測量難題。專題 1.2 將闡述這個難題的各個面向。

一種方便但粗糙的測量方式：「社會信任」

- 32 測量社會資本的一種常見方式，就是檢視在某地區的志願性組織的數目或密度（例如 Paldam and Svendsen, 2000）。此測量方式在普特南研究義大利的經典例子（Putnam, 1993）裡占有重要的位置，似乎也因而得到了權威的背書。然而，儘管它廣為人知，仍存在著三個重大的缺點。第一，它似乎只選
- 33 定一個狹隘的社會資本定義——著重在中觀層面、以網絡為主。根據上文的討論，當測量這種概念採取單薄的定義將會很危險。第二，事實已證明這種測量方式在實際上是極度困難又具有爭議的，畢竟團體的組成及性質可能含糊不清，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任何一份組織的名單都很可以被指控為不完整、有偏誤的，或是無法應用在跨國比較上（Rich, 1999; Lowndes, 2000; de Ulzurrun, 2002）。更進一步來說，這種測量密度的量化方式可能根本無法捕捉到不同組織類別之間的重要質性差異。第三，自從普特南的義大利個案研究以來，我們在不少研究裡都看到其無法複製組織密度與預期被影響的變項之間的關聯模式（例如，Knack and Keefer, 1997）。這意味著預測效度上乏善可陳，而這本身可能也反映出以關聯為基礎設計的測量方式的狹窄以及不可信度。⁵

然而，有許多社會資本的研究成功地採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來進行測

⁵ 這裡提到的實質上的難題——也就是為什麼這項測量方式在義大利的例子裡顯得如此重要，但在其他地方卻不必然是那麼重要——將在第八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專題 1.2 優質的測量由何產生？

信度 (reliability) 指的是這個測量是否在重覆的情況下得到相同的結果。例如，我們詢問一百個人是否認為自己的鄰居值得信任，然後在一個禮拜後再用同樣的問題詢問同樣這些人，這兩次施測之間的相關性就可稱為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如果在這間隔的一個禮拜裡，此鄰里裡並未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將預期這個相關性會很高。一般而言，信度會被視為是有效測量的一個必要但非充要條件。

表面效度 (surface or 'face' validity) 指的是整個測量「看起來是否合適」——換句話說，測量是否在直覺上掌握到我們想要測量的概念。這很明顯會是我們判斷一個測量是優是劣的起點，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判準。例如，「會回答民意調查的比率」、「是否對其他駕駛人做出不雅的手勢」，也被證明是測量社群的社會資本上兩個可靠的測量方式，雖然乍看之下它們都不像是個合適的指標。

效標關聯效度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指的是某個測量方式是否與同一現象裡具有「黃金標準」地位的獨立指標相關。例如，若要判斷人們自稱是組織成員的回答是否具效度，就可以拿那些組織本身的記錄來比對人們的答案。

預測效度 (predictive validity) 指的是這個測量結果是否準確預測該項特殊旨趣其他的效果或變項。有些人認為它是最重要的一種效度。例如，我們或許最終並不太關心一項社會信任的測量結果是否與組織身分相關，而是較關心這個測量結果是否預測了其他重要的效果，例如經濟成長、健康、犯罪等等。

量，即測量在某個社群、區域或國家裡的大多數人民彼此信賴的程度如何。一般而言會經由以下的問題來進行：

「一般來說，你會認為大多數的人能夠被信任嗎？或是覺得自己得小心翼翼地跟人相處？」

1. 大多數的人能夠被信任
2. 得要小心翼翼
3. 不知道

(世界各地價值觀調查，1981-3, 1990-2, 1995-7)

根據先前的理論探討這種測量社會信任的方式具有「表面效度」(請參見專題 1.2 裡的討論)。在社會網絡裡，相互合作行動的共同規範將人們連接起來，造成的淨效果應該就是信任。有人可能會說，更基本的重點不在於信任本身，而在值不值得信任這件事上。畢竟，如果我們信任的人事實上是不能被信任的，那麼產生出的「合作」將是單方面的且短暫不長久。這麼說來，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上述問題所得到的答案反映了人們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更進一步來說，認為普遍存在的信任及值得信任感，本身就是社會資本在規範性向度上的一部分(請與 Coleman, 1988 做比較)。

34 結果我們看到，人們同意「大多數的人能夠被信任」的比率隨著國別以及地區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請參考第二章，圖 2.1)。從 2001-2004 年的資料顯示，認為大多數人能夠被信任的比率，最高的是挪威等北歐國家的三分之二左右，最低的如巴西等南美洲國家的二十分之一。資料指出，這種測量結果儘管時間不同仍是非常穩定的(至少在我們資料有搜集到的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這也告訴我們這個測量方式具有信度(欲知這趨向裡的更多細節，請參見第七章)。這種針對社會信任的測量方式已被不少研究者運用在一國範圍內，當成是測量社會資本的一個「方便但粗糙」的指標，而它能成功地預測其他重要的效果，也有力地證明了此測量具有預測效度(例如，Knack and Keefer, 1997; Whiteley, 1997; Halpern, 2001)。

35 我們若將社會信任的測量與其他設計較精良的社會資本測量方式相互比較，可檢驗此測量是否具有關聯效度。近來有人針對美國各地區的受訪者所表達的社會信任程度做出詳細的研究，發現各地區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這項研究就成為進行上述比較的機會。普特南(2000)建構了一個精細的指標來測量美國不同州之間社會資本的差異，其來源十分多樣，共有 14 種各州的測量數據被結合在一起，包括測量家戶娛樂與朋友交際、團體成員數及參與程度、各種志願性或社區性的服務、公共集會的參與度、選舉投票率以及社會信任等等。最終的結果顯示，各項單一的測量方式裡與總體指標具有最強烈相關

專題 1.3 個案研究：找出「不投入公共事務」者 (civically disengaged)

2000 年的英國家戶普查 (British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裡，曾進行了一系列有關「社會資本」的題組，涵蓋的範圍包括公民參與、敦親睦鄰、社會網絡及社會支持等，每個領域裡都問了許多問題，但它們彼此之間通常都會相關。在每個領域裡，互相高度關聯的項目被結合成為指數，例如它將不投入公共事務界定為：

- 未曾參加當地的組織。
- 未曾採取行動以解決當地問題。
- 不覺得充分被知會。
- 不覺得自己在鄰里相關事務上能影響決策，不論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跟別人一起合作。

大約有 16% 的人屬於這個範疇，其分布狀況在最富裕的地區裡約為 7%，而在最貧困的地區則是 22%。不投入公共事務的人，最有可能有下列特質：

- 年輕（年紀愈大，將逐漸地增加投入的程度）。
- 女性。
- 少數族裔。
- 教育程度較低。
- 必須撫養未成年孩子。
- 在公私領域都是租客（相對於擁有所有權的人）。
- 最近剛搬家。

欲知更進一步的資訊，請參見 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 (2002)

性的，就是人們同意大多數人能夠信任的百分比，這個相關性高達 0.92。這就表示此總體指數掌握到的變異量裡，有 85% 能僅藉由社會信任這一個項目的

測量就能掌握到。

總而言之，涉及（在社群、地區或國家內的平均）社會信任的問卷項目，在總體的層面上來看，似乎是個測量社會資本既簡單又具有信度、效度的指標。

測量社會資本的較精緻方法：朝建立「維他命模型」的方向前進

理論方面的討論已畫出社會資本一些不同向度的輪廓，像是黏著性、架接性以及連結性，因此，我們最理想的狀況就是應該對每一項都進行測量，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一組測量的方式。「快捷但簡陋」的測量雖然有用（至少在全國調查中可以爭得一些有價值的空間），但大多數嚴謹的研究者也想要更確切地瞭解，社會資本裡究竟是哪些面向產生哪些效果，而它們彼此之間又具有什麼關係（Boix and Posner, 1995; Rothstein, 2001; Nuissl, 2002; 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2004）。

本書會有一些地方使用同一種隱喻，就是維他命模型（請與 Warr 的就業維他命模型做比較，Warr, 1987）。一個健康且運作良好的社群，需要各種不同種類的社會資本混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個人需要在飲食中攝取各種不同的維他命才能保持身體健康一樣。於是，我們原則上就需要測量每一種社會資本（或維他命）的方式。

就個人層面的黏著性社會資本而言，我們會看到大量心理學文獻討論社會支持，幫助我們在設計測量方式的過程裡提供線索。直至今日，心理學家已花了數十年的時間，研發並琢磨可用來測量人們社會網絡之支持性質的方法，包括他們感覺到歸屬的程度、接受到情緒上或實際上支持的程度（例如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有趣的是，結果顯示我們若使用像上述社會信任
36 這個廣泛的簡單問題，最終卻可對於捕捉個人支持性網絡的特質大有幫助。通常會以下面的方式形塑這個問題：「如果你遇到了一個問題，或是有件令你困擾的事情，你會找誰幫忙？」

然而，在許多的領域裡，我們並沒有一套歷史悠久且完整的文獻資源來指引我們，以使用最簡短、單純的問題捕捉每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因此，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不斷努力研發這樣的測量方法。⁶有幾個國家正利用簡易的問卷調查嘗試研發或執行所謂的國家「社會資本審計」的計畫，填寫問卷的時間從

⁶ 舉例來說，英國國家統計局（British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就研發出來一套包括範圍很廣的問題模型。

十來分鐘到超過一個小時都有，樣本大小則從幾千人到二萬人以上都有。因為各方的強調重點仍有爭論及歧異，一如我們在前述的回顧裡看到的，所以這些各色調查裡所使用的測量方法之間，無可避免地也有實質上的差異，雖然這幾個國家的研究者之間針對核心的關懷焦點已達成共識。

雖然有人的確不斷嘗試在研發測量方式的過程中抄捷徑，但實際上仍難以達成。有一個團隊使用神經網絡模型來實驗，想藉此找出哪些是格外重要的區辨變數 (Veiga et al., 2000)。就像之前提到的，一些早期的研究曾使用社團數目、社團成員數來測量 (中觀) 社會資本。然而，這些研究後來常被批評，認為它們對何為社團設下的定義太過狹隘，忽視了新形態社團的出現以及其他非正式社團 (Rich, 1999)；也有人批評說，被認定為社團的名單是帶有男性偏見的，忽視了更多女性組成的社團，像是有關托兒事務的團體 (Lowndes, 2000)。這些研究者理想上，都希望找到一個平衡點，不單能在合理範圍內包含廣泛，因而同時兼具信度、效度的測量方式，也可成為簡短明白而可以實際應用的測量方式。不幸的是，有時得花上好幾年才能找到那個平衡點。

當我們一併考慮社會資本在不同文化中展現形式的差異時，測量方式的難題將變得更加難以處理。無疑地，在國家間及地區間存在著社會資本形式的差異。大多數的組織都以地區為根據，因此所找到的實際組織類型會隨著地點而有差異。例如，在英國我們就看不到類似美國來福槍協會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的組織，同樣地在美國也找不到類似英國國民信託組織 (National Trust) 的機構。更增添難度的是，相互合作的規範以及組織結構的形式，也可能隨著地點而變動。因此，英國及北美洲排隊的習慣並非由所有國家共同擁有，而特定東方國家中將社群利益置於個人之上的規範也不必然為某些西方國家所接受。

37

建構出指數的這種標準化作法，未必可以解決測量上遭遇的問題。要將兩個項目置入同一個指數裡的前提通常是它們彼此之間具有合理地相關性。但即使是兩個功能對等的指標，一個在某個地區或國家非常普遍；另一個，在另一地區或國家也是如此，然而這兩個指標之間可能並不相關 (也就是說，在統計上關聯性低)。儘管如此，它們還是有可能指涉著相同的一件事；換句話說，它們可能是同一個相互合作之基礎類型或社會結構在功能上對等的形式，雖然它們 (受限於文化而) 有著不同的形式。

社會資本在不同的文化中 (至少某部分) 以不同的方式外顯出來，這件事讓跨國的測量變成一個複雜的過程。這些差異不僅會造成測量上的誤差，社

群與國家必然有著質與量上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這些差異或許也會造成社會資本與其依變項之間因果關係的一些變異。例如，相較於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民，美國人對於以國家做為解決集體問題的手段這種做事方法，抱持的敵意要大的多。這將關聯到美國與歐洲的社會資本模式是不同的，我們幾乎可以明確地說，這會導致許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有所不同（請見第八與九章）。

這個複雜性導致有些人認為社會資本僅能在其當地的脈絡下被理解（Edwards and Foley, 1998）。然而，就像我們會在之後章節引用的文獻裡看到的，儘管橫跨各式各樣的社會脈絡，但仍能看到社會資本的許多相同效果與因果模式。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看到了社會資本的形式變化巨大，但基本的功能與因果效應卻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總括來說，我們必須要朝著多方面的社會資本模型努力，一如在本書第二部分所陳述的（尤其在第九章），我們已在這個方向看到可觀的進步。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出各種有效的跨文化測量方式，而過程裡很有可能引起無止境的爭論，並成為未來幾年的焦點。

由此該往哪走？

38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逐漸步入成熟且廣闊的社會資本研究議程的出現。如今，有一些國家進行了標識著社會資本的調查，目前也開始出現與過去的調查截然不同的資料，因為過去的資料通常來自針對一般性目的所做的調查。這些嶄新的調查創造出新的基準點，讓我們可用來追溯貫時性的變動，這應該也有助於研究者從實證上來豐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在一些國家中，為數可觀的研究機構以及政府部門都緊盯著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包括它如何影響他們所關切的地區、要如何測量它。例如，隨著布希政府以擴展志願服務和公民參與為國內首要政策，如今也一併開始搜集關於志願服務、社會資本的資料。⁷

國際性組織也開始對社會資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像先前所提到的，較早進入這個領域的是世界銀行，它曾召集了一組堅強的研究團隊，針對 1998 年末之際社會資本在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進行研究。它也設立了一個網站，

⁷ 附帶一提，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白宮在將社會資本的測量併入哪一項國家巨型調查時，遭遇了困難而無法達成共識。原本計畫將社會資本問題組併入的調查是現前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經過冗長的討論之後（在其中，還有人說「在我死以後」），這個問題組最終在另一項調查裡找到歸宿，而社會資本資料如今是經由美國犯罪受害調查（American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中被搜集。

當中有不少與社會資本相關的有用題材，試圖藉此發展出一個可應用在各國的測量方式，甚至還主持著一個名為「一起聊聊」(Let's Talk)的電子討論區，以便讓世界各地的專家彼此交換資訊與想法。隨後 OECD 也跟進了，從它 2001 年報告的封底展現出對社會資本的興趣，包括一場以測量方式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這場 OECD 國家統計部聯合研討會於 2002 年九月由倫敦所主辦，共有來自 20 個以上國家的專家與統計機構齊聚一堂，討論社會資本的測量並進行合作。社會資本同時也是聯合國在 2002 年於錫耶納 (Siena, 譯註：此城市位在義大利中部，佛羅倫斯以南 48 公里) 舉行的團體會議的主要討論議題。

最後，在當前的社會資本研究裡值得一提的面向還有它所包含的學科範圍。若說這領域的研究是純然跨學科，此說法其實是種誤導，畢竟它目前仍被鎖在嚴格的學科分割之中，而此種現象也在當代學術的活動裡屢見不鮮。儘管如此，確實很少有概念能同時引發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教育等領域的興趣。這本書將這個正在浮現的驚人研究體系集結起來，也正是因為這個現象才讓本書得以成形。

結語

20 世紀初期以來，社會資本這個詞彙一直零星地被使用，但隨著 1980 年代晚期及 1990 年早期柯爾曼、布迪厄、普特南的著作之後，它被更廣泛且頻繁地使用。這個詞彙指涉的是有助於個人及社群之間相互合作行動出現的社會網絡、規範及約束力量。1995 年以後，在範圍廣泛的各學科中，針對這個主題的研究有了爆炸性的增長。這股擴張的趨勢不但沒有減緩的跡象，而且國際上的政策制定者及機構甚至對這個概念與它顯見的效果，逐漸產生了興趣。

39

儘管各個研究者對它的定義或使用方式有所差異，但我們仍可找到一個社會資本的總類型學。這套類型學包含了社會資本三個不同的向度：它的主要組成元素 (網絡、規範、約束力量)、採用的分析層面 (個人的、中觀的、鉅觀的)、它的功能特性 (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

究竟社會資本這張概念「帳幕」應該擴張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尚無定論。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邏輯論點，認為應該擴張這個定義，將制度及形式化的規範納入。然而，也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實際考量，要求我們謹慎地將定義維持在比較精簡的狀態，以將研究和政策的焦點擺在重要但易被忽視的非正式社會

網絡上。社會資本是否算是「資本」，同樣也有一些爭論，但仍能提出一個相當扎實有力的論點來反駁這些質疑——至少像維護「人力資本」這個詞彙的論點那麼扎實有力。

關於如何測量社會資本，仍然環繞著許多爭議，但「社會信任」（也就是，在某特定社群或地區裡的人們感覺他人就普遍而言可以信任的程度）仍是個有合理信度與效度、方便但粗糙的測量方法。目前在一些國家所進展的相關工作，都以國家社會資本的「審計」為名，而這些努力應該會為關於社會資本的各種類型與其引發的效果等議題增加許多細緻的資訊。然而，因為文化差異以及建立功能對等的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可能讓研發足以測量社會資本所有不同面向的跨國比較性方法的努力付諸流水。

進階閱讀

如果想對社會資本的概念有一基本且準確地掌握，柯爾曼在 1988 年的經典論文仍是一非常可以信賴的選擇，裡頭除了頗具說服力的理論性分析外，還舉了許多的實例。假如想要找些較學術性的討論，我們也很推薦 Michael Woolcock 的著作，不只是 1998 年那篇篇幅很長的論文，還包括一本由他編輯、即將面世（在作者寫作之際）的新作，後者在很廣泛的各國發展脈絡裡，探究了社會資本概念如何被應用。

40 若想要找尋社會資本概念的批判性學術評述，Portes (1998)、Edwards 及 Foley (1998) 的論文是值得推薦的。Ben Fine 也曾出版一系列的批判性評論，以及一本炮火猛烈且犀利（雖然有些偏頗）的書 (2001)。

今日，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多由政府及官方體系所撰述的研究。對於學術界以及政策制定者而言，世界銀行的網站都是個提供極豐富資源的園地，裡頭還置有許多研究論文的摘要，非常實用。請留意它們持續在進行的這項工作（發展一套能應用在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脈絡下的現成社會資本測量工具。請瀏覽 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OECD (2001a) 的報告也值得閱讀，尤其是它探索了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間的相似之處，以及兩者之間有何關聯。最後，在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網站 (www.statistics.gov.uk/socialcapital) 裡也可以找到一個有用的資料庫，裡面有所有（曾）被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問題。

第一部分 社會資本爲什麼重要？

第二章 經濟表現

Tony Restell 於聖約翰學院（劍橋）修習經濟學及管理學，1996 年畢業。 43
在此，他與我們分享身為一個聖約翰人，如何在他開創網路事業之際讓他與眾不同。

……我用拇指翻動著我的通訊錄，找到數不盡的聖約翰人願意而且有能力助我一臂之力。因此，一般人可能得花上幾個禮拜的工作天才能克服的困境，我得以將它濃縮成幾個工作天就解決。熱臉貼冷屁股的電訪動作被轉化為愉悅的引介。

……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打造一個網路事業是重要的——你愈能建立起一個有力的人脈或聯繫網絡，你將創造愈大的生產力以及成功。

《聖約翰人通訊》，第七期，2000 春季號

在理論的思考上，我們有極佳的理由去假定社會資本會影響經濟表現。市場能否有效率運作，一方面有賴資訊順暢流通，以便連繫起買賣雙方；另外還需要能夠不費力、不費錢地確保契約或其他協商已定的措施能被執行。帶有以上特徵的經濟體，應該有助於下列結果的產生：創新、企業家精神、不懼冒險與投資的精神、有效競爭、資源有效率的分配。

社會網絡的大小與特性，對於資訊流通與否有很大的影響。在極端的情況中，原子化彼此孤立的狩獵或採集模式，事實上就排除了市場出現的可能。但是，資訊流通對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而言，雖是必要但並非充分的條件。是否能進行賣出、交換、購買的動作，也仰賴於「交易成本」的多寡（例如佣金、法律上的成本、涵蓋的風險）。這些交易成本也證明受到社會資本的重大影響，尤其是受到普遍存在的規範與約束力量影響。社會資本藉由以下幾種方式來降 44

低交易成本：改變交易條件、去除或大量減低協調契約所需的昂貴成本、產生決策時的彈性、節省時間 (P. N. Wilson, 2000)。簡而言之，信任、聲譽以及非正式的約束力量，能夠有力地補足正式契約、法律體系、正式的約束力量。

在本章以及後續的章節裡，我們將依據下列的分析層面順序來組織與評述相關的證據：個人或微觀層面、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國家或鉅觀層面（欲知針對這些層面的差異所做的更完整討論，請參見第一章）。

微觀層次的經濟效應

有一句話可以具體而微地說明社會資本在微觀層面的經濟效應：「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些什麼，而是你認識誰。」本章開頭所引用的言論出自一位大學畢業、進入網路業創業的人士口中，他並非第一個注意到通訊錄是自己最有利的一項資產的人。

社會資本能影響個人經濟行為成效的一個重要管道，就是透過影響個人的教育成就及是否為中輟。擁有一個在自己年輕時能給予支持、鼓勵的家庭，將會大大影響將來的教育成就以及隨後的收入多寡（請見第五章）。但是研究發現，即使我們在統計上控制了教育成就、智商、父母資源等變項，在年幼時擁有較有限或較不具支持性的社會資本之指標（例如在單親或不和諧的家庭中成長），仍能顯著地預測成年後的失業風險 (Caspi et al., 1998)。社會資本似乎早從小時候就開始影響日後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請一併參考第四與八章）。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

45 多年來研究長、短期失業情況的學者發現，擺脫失業的機會深受個人社會網絡的影響。這是因為相當高比例的工作是透過「非正式管道」找到的，亦即透過口耳相傳以及個人關係 (M. S. Granovetter, 1973; White, 1991; Montgomery, 1991; Six, 1997a; Hannan, 1999)。同樣地，在移民或遷居者當中，能運用個人網絡的人也比較可能找到較佳 (Eby, 2001) 且較持久的工作 (Aguilera, 2003)。

雖然藉由口耳相傳而取得的工作比例到底有多少，各方的估計都不同，但普遍來說幾乎都很高。例如，最近有一個針對低薪勞動力市場所做的研究指出，60%的職缺由在職員工推薦而填補 (D. Brown et al., 2001)。這現象並不限

於低薪工作而已：針對高階主管的研究，也發現其中很多人都透過非正式管道而找到工作（Boxman, de Graaf and Flap, 1991）。另一個最近的例子檢視了美國一個中型高科技組織，在 1985-1994 年間的徵才過程中 35,000 位申請工作者，發現 80% 的白人僱員使用個人網絡而找到了這裡的工作機會，但只有 5% 的黑人僱員是如此（T. Petersen, Saporta and Seidel, 2000；請見底下的討論）。

許多想找工作的人，由於朋友都不在勞動力市場，便無法從那些熟知工作機會的人口中得到消息，以致找工作的過程非常不順利（W. J. Wilson, 1987）。這有助於解釋以下兩個變項間的強烈正相關：個人朋友網絡的大小以及勞動力的參與（Aguilera, 2002）。然而，就像 Granovetter 的大作所告訴我們的，具有「弱連帶」，也就是與關係疏離的同事、遠親和朋友的連結的人，將在勞動力市場裡占盡優勢；而透過這些連結，也就是架接網絡的社會資本，個人能接觸到範圍更廣、更多的資訊及機會（M. S. Granovetter, 1973, 1985）。

個人所得

較廣泛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不僅能讓求職者受益。一系列針對受僱者的研究顯示，那些升遷最快且得到最高職位的人，通常是擁有最廣泛人際接觸的人（Podolny and Baron, 1997）。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最難以生存、競爭最激烈的世界金融中心裡，很多商業活動仍是在信任關係的基礎上得以不斷地進行的，因此成功的商人都很努力地想維持自己值得信任的聲譽（Burrough and Helyar, 1991）。

有很多可觀的證據，說明了擁有較廣泛網絡的人較可能擁有較高的薪水（雖然何為因、何為果還需要仔細檢視）。相較於勞工階級而言，專業人員及管理人員較可能擁有較大、較多樣化的社會網絡，而我們在許多國家都可發現這個模式（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Aldridge, 2001）。

46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不管你是農夫或富商，凡擁有較廣泛社會網絡的人較有可能在財務狀況上獨占鰲頭。例如在 Boxman 等人針對荷蘭的大公司裡的 1,359 位高階管理人士所做的研究裡，我們看到管理人士的收入與社會資本（以對外的工作連繫、會員資格來測量）有很密切的關聯，甚至在控制教育、工作經驗、在組織內的年資、底下管理的人員數目的情況下，結果仍是如此（Boxman, de Graaf and Flap, 1991）。同樣的，遠在世界另一頭的馬達加斯加，我們也看到買賣農產品的人，其經手的銷售額及附加價值，與其社會網絡

的範圍有著顯著的關聯，即使在控制了個人特質及實物投入的數目後仍是如此（Fafchamps and Minten, 2002）。

表面上看來，單從經濟的角度來想，理應善加培養廣大的社會網絡（尤其當裡頭包括了有錢人及權貴人士時）；同時，那些在團體或個人之間仲介資訊的人士，能從他們在社會網絡裡的這個位置攬得可觀的好處（Burt, 1999）。這個情況也發生在有錢人之間。例如，在其他條件保持相同的情況下，假使公司負責人願意多用點心，主動認識銀行經理的話，銀行也將提供廠商條件較好的合作內容（Uzzi, 1999）。同樣地，針對科技為主的公司進行的生命史研究也發現，其創立者如果與創業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公司將明顯地較容易取得資金並獲得成功（Shane and Stuart, 2002）。

簡而言之，社會網絡幾乎就像許多其他的變項一樣，可視之為一個有助於解釋個人收入差異的因素（請一併參考提及教育與犯罪的第四與五章）。較廣泛的社會網絡能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讓人得知更多、範圍更廣的工作機會以供選擇；假若取得了工作，也會更有機會接觸到重要的客戶、其他商人、同業或資金提供者（Fafchamps and Minten, 2002; Shane and Stuart, 2002; R. A. Baron and Markman, 2003）。

然而，事情不盡然如此完美。雖然普遍而言，我們的社會網絡是正面的、有力的資源（至少對那些擁有這些網絡的人而言），它們有時仍會傷害我們。
47 如果在我們網絡裡的某個人與我們作對，此人有可能成為可怕的敵人，阻礙我們職場生涯的升遷，並破壞我們的網絡（Moerbeek and Need, 2003）。我們必須注意這個重要的論點：一如我們將在這本書裡不斷看到的，我們的社會資本不會是我們永遠的朋友。

族群、社會、性別的差異：社會資本會導致雪上加霜嗎？

我們已經看到，擁有較廣泛社會網絡的人較有可能占有經濟優勢，而且中產階級相較於勞工階級也具有較廣、較多樣化的社會網絡，而這種差異也導致社會上弱勢階級劣勢的持續。社會資本有助於解釋為何在社會流動的文獻中一直都發現，向上流動遠較向下流動來得普遍，換句話說，向上爬的似乎不會往下跌（Aldridge, 2001）。中產階級家庭帶來豐富的社會接觸，使其孩子即使能力較差，仍能找到好工作；然而連結較不豐富的勞工階級孩子，則必須仰賴自己的能力來博得注意（請一併參加第五章）。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許多族群差異上。例如，就像前面提到的，Petersen 等人（2000）發現美國黑人員工比起白人員工，較不容易透過個人網絡找到就業機會（前者為 5%，後者為 80%）。研究發現，一旦我們將找到工作機會的方式考慮進來，種族這個因素對受僱過程的結果並不會產生進一步的效果。因此，Petersen 等人做出以下的結論：接觸到社會網絡的管道以及對社會網絡的有效運用，將可解釋勞動力市場中黑白人種間大多數的差異。

這個觀察早至 Loury 時就已被察覺（1987, 1992）。他認為即使美國白種人在財務上及人力資本上的優勢已經由某些方式被抹除，美國黑人仍會因著他們與主流制度的連結較弱而站在劣勢。

同樣的，一份英國政府委託針對少數族裔的研究報告指出，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升遷過程中，其中一項阻礙就是缺乏社會連結。黑人及少數族裔的專業人士尤其感受到，他們缺乏能讓自己在職場上升遷的網絡。他們也感覺到，因為在自己被養育成人的過程裡，並未提供能接觸到專業社會連結的管道，所以如今身處劣勢（Cabinet Office Strategy Unit, 2002）。這呼應了以往的研究發現，擁有一位立足於某專業領域的父母或親戚，將顯著地幫助個人取得關鍵的專業地位與人事安排（Halpern, 1992）。

48

另一方面，在許多移民族裔團體裡的強連帶，為團體成員的經濟維持與提升，提供了一個無價的墊腳石。研究已不斷證實，經常被排除在主流金融和公民體系之外的第一代移民社群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們形成一塊自足的領域，結合了許多能相互支持的固有社會制度（Waldinger, Aldrich and Ward, 1990; Massey and Espinosa, 1999; Sanders, Nee and Sernau, 2002）。這種伴隨著連鎖性遷移（chain-migration，即家人與朋友隨著時間演進，逐漸加入遷移的行列）的現象，充分解釋了為何勞動力市場具有演變成族群區隔的傾向，特定的職業逐漸為特定族裔團體所主宰（Portes and Zhou, 1992; Oigenblick and Kirschenbaum, 2002; Wang and Hsiao, 2002）。¹ 有趣的是，當移民浪潮一波波接續而來，使得他們對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時，這個強而有力的黏著性社會資本最終反而將抑制這些做為企業家的移民在經濟上的進展。這有助於解釋為何許多移民後來選擇與這塊提供安全感的自足領域劃清界線，透過改變自己姓名的

¹ 這個普遍規則中有個有趣的例外：最近一項針對荷蘭營建業的個案研究發現裡頭並無或極少見到族群區隔的狀況，即使這個產業一向被認為是「適合外來移民從事的典型行業」。作者認為，在荷蘭當地的社會、經濟與制度性過程阻絕或改變了這個過程的正常動態變化（譯按：即指著族群區隔）以至於不甚明顯（Rath, 2002）。

過程，逐漸使其族群淵源難以辨識，避免自己當初辛苦掙得的資產因後來新進的移民世代所縮減。

類似的觀點也被用來解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相對劣勢的地位，或可能形成的性別區隔現象。這方面歷來的文獻討論十分豐富且完整，雖然它們也直到非常晚近才開始使用社會資本的語言（Metz and Tharenou, 2001; Scantlebury, 2002）。基本上，使女性身處劣勢的原因，就是她們缺乏打入「老男人圈」（old boy network）（就字面上來說）裡，尤其是在較高階的勞動力市場上，總是有個「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在隱隱作用著。

在社會資本上多多投資，就會助你成功或變得富有嗎？

針對這個問題，簡要的答案就是「或許吧」（投資應該有助於提升個人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投資在有助你打入「正確」的圈子中的架接性及連結性社會資本）。但是，在我們爲了追求經濟向上提升而一頭栽進永無止境的雞尾酒會、社交場合之前，在微觀層面的文獻中仍有一些地方值得我們多加考慮的。

49 首先，有些人認爲這些發現當中的某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在方法上採用最適切的控制後，仍有人對於個人社會網絡與其經濟提升二者間因果關係的方向存疑。許多研究基本上都是橫斷性的（cross-sectional）（亦即僅在某個時間點上測量變項間的關聯）。因此人們之所以擁有較廣泛的社會網絡，可能是因爲順利找到工作而導致，或是因爲當前工作的角色、表現或是財富所導致，而不是因爲網絡的廣泛而導致取得工作或擁有較高薪資。社會網絡與成功之間的關聯性中，至少有一部分源自更基本的個人差異，像是社會智能或能力。然而有證據顯示，社會智能與社會資本對財務上是否成功，二者分別具有一些獨立的影響。例如，一項最近針對在高科技與化妝品業的企業家們在財務上的成功所做的研究顯示：社會資本（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等）協助企業家接觸那些對其成功而言很重要的人士。然而，一旦接觸到了以後，就變成企業家本身在社會上競爭的能力好壞，影響他們最終得到的成就（R. A. Baron and Markman, 2003）。同樣地，每個人動員自己可得的社會資本的能力不同，而有時因爲取得新技術和經驗而造成的財務優勢，這個因果連結是由更有效的動員這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技術所中介的（Ma, 2002）。

對因果關係的方向加以討論，將是本書不斷出現的一項話題。在這特定的

文獻中，大多數的專家都很有自信地認為，在和勞動力市場效果的關係中，大多數的因果關係都是由網絡影響結果。例如，追溯就業情況進進出出（例如在大規模裁員之後）的貫時性研究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那些具有較廣泛社會網絡（尤其是與那些目前正占有職位者的連帶）的人，很明顯地較有可能取得新工作（White, 1991; Six, 1997a）。相對而言，就個人社會網絡與其所得的因果關係而言，我們所能提出的證據就較不具決定性，能夠初步看到的事實是：愈廣泛的社會網絡，能讓你在起跑點上略占優勢，但你也需要具備相關的技能以延續你的優勢。

第二，雖然大多數研究都強調廣泛的社會網絡，尤其是架接性社會資本或弱連帶有利於個人職場上的升遷，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同時也存在著不利的一面。例如有研究發現，雖然擁有一個龐大、稀疏的非正式連帶網絡的確對職場升遷有正面效果，但那些擁有龐大工具性（buy-in）網絡的人，在工作滿意度上也是最低的（Podolny and Baron, 1997）。同樣地，成功的移民或向上流動的勞工階級所運用的策略（犧牲豐厚的黏著性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安全感，以換取架接性社會資本所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有時也會付出代價，較明顯可見的就是在健康以及生活品質上（請參考第三章）。

50

最後，微觀層面的證據引發了一個問題，即廣延的社會網絡帶來的顯見好處究竟是不是個零合遊戲。如果某個人透過廣泛的社會網絡取得一項優勢，這是否意味著不具此社會網絡的人必須付出對等的代價呢？就像 DeFilippis (2001, p. 793) 認為：

如果有一個工作機會，而每個人都連結到相同的網絡，並且實現了相同的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利益，那麼你將不再擁有普特南與柯爾曼口中的那種網絡……如果每個人被連結了，那麼每個人……將失去那些連結所帶來的利益，因為他們將不再從其中取得資本（在這個例子裡，就是該工作機會）……正因如此，雅痞人士間相互連結能夠領先其他人。

對於 DeFilippis 的說法，有另一個強而有力的反駁。如果資訊透過較廣泛的社會網絡更自由地流動著，那麼即便這些網絡是均等地散布著，勞動力市場應該也會因為分配效率的提升而運作得更順暢。網絡會使人們只花低廉的成本就能取得適當的工作，這麼說來就不僅是一場零和遊戲了。但是，這個重要的

問題並無法在個人層面以實證的方式來解決，而是需要在中觀層面或鉅觀層面藉由環境的分析來幫忙，這就是我們接下去討論的。

中觀層面的經濟效果：做為市場的社群

柯爾曼經典研究中所呈現的紐約鑽石市場正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告訴我們在中觀或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所具有的潛在經濟利益（Coleman, 1988，請參見第一章）。鑽石商人的社群內部存在著一種高度共有的相互理解與可信賴感，大大降低了與檢視對方的鑽石、追求相互獲利的交易相關的成本。大多數個別的交易商都從這樣的非正式協議中獲利——它並非僅是場零和遊戲，因為整個交易商的社群都會從這個相互依賴的網絡裡獲利。

或許有人會說紐約鑽石市場只是個特例，因此無法讓我們瞭解大多數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因為前者是仰賴一個原已存在的傳統猶太社群為基礎，彼此之間原本就有強烈的連繫及共同的道德規則。然而，在其他的商業脈絡裡同樣可以看到情況不那麼戲劇性但基本上相似的例證。商業團體之間的關係，通常建立在非正式的契約以及不言而喻的協議上（Burrough and Helyar, 1991）。事實上，社會資本概念最早期應用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商業活動的共識上，像是研究日本產業的特色（Lorcher, 1982）。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以電子為本的世界性市場中所見到的高科技領域中，大多數的廠商往來互動仍然不只是藉由價格訊息，同時也靠著社會網絡（Urry, 2002）。人們喜歡與熟識的對象談生意、買東西，不管是農人或城市裡的金融家都一樣，也因而商業午餐在今天一如以往一樣四處可見。今天的市場走向高科技，但它仍舊是「高接觸」（high touch）的。

鄰里與社群的效應

我們即使控制了個人層面的特徵，仍然可明顯看出鄰里或社群效應對鄰里層面經濟成就的衝擊，這就是鄰里或社群效應存在的最有力證明。例如，Buck（2001）告訴我們，不論個人劣勢的情況如何，只要該地區的失業率上升，那麼個人逃離貧窮的機會就會下降。一旦該地區失業率超過了25%，逃離貧窮的機會將劇烈地向下下降。

這種禍不單行的情節，是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學家都不陌生的，

它正是 Wilson 在其經典著作《真真正正的劣勢》(The Truly Disadvantaged, W. J. Wilson, 1987) 中所討論的現象。Wilson 的著作描寫的對象是芝加哥的黑人貧困社區，這種劣勢集中的類似故事也在各大城市中不斷上演。例如在倫敦，雇主找不到人填補出缺員工（像是在旅館業中）的同時，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質性研究顯示，在這個地區的年輕人經常幾乎沒有意識到在僅距他們數哩之遙的工作機會。即使他們知道了那些工作機會，他們因著若干因素而自認無能力取得這份工作，或這個工作機會是位在幾十哩外的地區，而他們及其朋友對該地不熟悉，因此就放棄應徵這個工作的機會。

這些發現都告訴我們，社會網絡及規範如何在鄰里層面上自我強化（尤其是當你極度缺乏與身居主流職位的有權人士之間的連結）。這樣的鄰里與其社會資本一同崩解，好比一個不斷縮小的星塵轉變成一個吸噬一切的黑洞。貧窮再加上缺乏鄰居、朋友的網絡，二者相互強化，讓問題更加嚴峻而且常讓人覺得似乎無可救藥。相反地，當一個貧窮社區的成員向外跨越，擴大找尋工作與機會的範圍（例如透過暫時的經濟性遷移），他們可扮演一座有力的橋樑，引領裡頭的人走向豐富的新資源 (Potot, 2002)。

52

就一定程度而言，一個地區是否擁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可藉由房價差異的形式來取得其貨幣價值。這些差異有一部分反映出鄰里中其他的特徵，例如低犯罪率升學率高的學校（二者本身也會受社會資本影響，請見稍後的章節）。但是，這種貨幣化有助於鞏固鄰里社會資本的差異，其中較富裕及關係良好的人們將為自己取得進入更有價值的社會網絡的機會，而其他人仍被鎖在網絡貧乏的死胡同裡。

有些地區及鄰里因為設法扭轉局勢而露出了些微希望。這類故事的關鍵，往往在於居民當中一個人或團體挺身而出，激發整個社區的活力，讓居民能夠開始相互合作、走向一個較有自信、有眼光、有願景的未來。

密西西比州的 Tupelo 所發生的實例，就是一個振奮人心且有詳實記載的故事。它曾是 1940 年代美國境內最貧窮的一個郡，卻能自己扭轉局勢，成為十分成功的社區發展及經濟成長的典範 (Grisham, 1999)，儘管此地缺乏天然資源，也沒有通往其他地區的便捷交通，又也沒有大學座落於此；更糟的是它曾遭受到一個劇烈的龍捲風蹂躪，以及在 1930 年代末期失去了境內唯一一座稍具規模的工廠。它之所以可從逆勢上升，很多人將功勞歸給當地一位報業負責人出眾的領導能力。他說服當地企業領袖與農人共同出資買下一頭種牛，這

個決定創造出後來令當地獲利無數的酪農業。當地原先的商業協會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隨後成立而開放給每個人參與的社區發展協會。這個重大的文化轉變引進了較不講究階序而注重平行合作、自助助人的風格，改善了學校教育，創建了一座教育中心、一座醫療中心以及推行了社區大掃除的運動。

53 巴西的 Curobato 城是另一個實例，它鹹魚翻身的過程是由一位曾任建築師的市長所推動的。在缺乏金錢或資源挹注的困境下，仍然開始推動社區榮譽方案，那些來自貧民窟的孩童可以藉由資源回收而獲得獎勵，讓他們的环境改善得更乾淨、更健康。其他的方案也隨後推出，像環境榮譽體系不但能鼓勵發展，也創造了大眾可使用的公園。最終獲得的成果不僅是改善了環境而已，還改變了整個文化以及城市的經濟成長率，使它一直以來都能在巴西各城市之間獨占鰲頭。

在其他的地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論點。例如，在非洲的農業社群之間，更具生產力的新技術被散播與採用的過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以社群或族群為基礎的聯繫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與諮詢性規範有關的聯繫）(Isham, 2002)。同樣地，影響學術部門生產力的不只是該單位本身是否有凝聚力，還包括了它與其他單位之間的連結與聯繫關係 (Bjarnason and Sigfusdottir, 2002; Del Favero, 2003)。

廠商做為一種社會資本

我們可以指出（而且相當具有說服力），廠商或公司是最普遍且最重要的社會資本形式之一。許多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把廠牌名稱與核心的管理工作留在公司內部之外，都試圖將想到的每一項活動向外擴張，這種措施引發一個謎團：我們究竟為什麼需要公司的存在？這個令人感興趣的疑問在六十幾年前就被科斯提出來；他問道：如果個人就可以直接地進行買、賣勞動力與商品，那麼為什麼廠商還必須存在？(Coase, 1937) 當然答案就是：當我們將彼此在技術上互補的個體集結成群，形成緊密的協同網絡，彼此具有共識及意願，願意為了使生產力達到最大而相互合作時，將會產生可觀的經濟利益。廠商的存在意味著內部的個人能夠信賴彼此，相信在他們需要對方時，對方將在那裡提供協助，包括分享資訊，或者需要協商以調和各自為政的行為時，也無需細細琢磨的契約或討價還價，就能達成任務 (Szreter, 1999; Donalson and Dunfee, 1999; Spangnolo, 1999)。當交易成本可能很高，商品本身的價格不高，需求量

又沒有彈性，團體持續互動了一段時間，而每次互動之間的時間又很短的情況下，仰賴以廠商為基礎的社會資本，應該比靠正式價格體系運作更具吸引力（Borcherding and Filson, 2002; Annen, 2003）。

簡而言之，廠商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資本（而且或許主要是「黏著式」社會資本）。個別的經濟行動者聯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相對密集的網絡（一種勞動力）。他們發展出共同的規範與共同的目標（公司文化、對角色與適當舉止的認識、對產品或公司目標的共同認識）。而且，廠商也會將約束力量含納進來，以維持這些規範與內部網絡（同儕與管理階層的壓力、經濟上的報償與升遷，以及在表現不佳或違反規定時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懲罰）。

54

廠商之間的社會資本及經濟群聚（economic clusters）

無論界定廠商本身的內部連結（群聚）何等重要，廠商與其交易夥伴間的連結也很重要。這就像「弱連帶」對個別的經濟行動者而言是很重要一樣。如果一個廠商缺乏適當的供應商網絡，或缺乏接觸產品潛在消費者的連結，那麼在廠商內部的強連帶或凝聚性連帶可能不太有用。

廠商之間的策略聯盟，能藉著彼此共同擁有更多有價值的消息來源、資金或一起發展產品的機會，創造出明顯更有競爭力的優勢（Ireland, Hitt and Vaidyanath, 2002; Shane and Cable, 2002; Koba and Prescott, 2002）。例如，許多從事高科技工程的成功廠商，不管它們位在美國、歐洲或亞洲，如今都採用可互通的設計及指令的軟體，並且共享著各種商業上十分敏感的資訊。這種密切地共享軟體與資訊的舉動也讓它們能完成工作、準時交貨，維持最適切的效能。這種高風險的策略唯有在一種網絡的脈絡下才可能出現，即網絡中的供應商彼此互相信賴，並具備相同的共識（Lane and Bachman, 1995, 1998）。

在許多成功的傳統產業廠商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情節重演。瑪莎百貨（Marks and Spencer）這個零售業廠商為自己產品的品質建立了世界性的商譽，但事實上它根本未曾製造任何產品。它的成功乃是仰賴與供應商培養起密切的關係——建立長期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製造商保證所提供的產品品質，以換取零售商的忠誠及承諾。成功的汽車製造商以及其他各種零售集團的情形也與此類似。

近年來，有不少人對以下這個問題感興趣：為什麼在同一個產業的各公司會連結起來，成為緊密的群聚，即使它們常常都是相互競爭的對手（例如，

Leadbeater, 1999)。最著名的例子或許就是加州的矽谷。另一個例子就是紐約州羅徹斯特附近的光學產業；還有義大利北部的時裝業與手工藝產業、英格蘭南部的賽車業。群聚以追求經濟優勢的例子也可以在發展中的經濟體裡發現，
55 像是在印尼 (Weijland, 1999)。

這類群聚之所以產生，原因之一即這些公司可在以既存的專業技術網絡為靠山的情況下建立起來，就像該地區擁有一所在某領域具優勢的大學（例如，在英國劍橋附近成功發展出科學園區）。在其他的例子中，群聚是從愛好者形成的非正式團體發展出來的，賽車的例子就是這樣，一級方程式賽車的產業，包括戰後接連出現的一些賽車俱樂部以及一個由愛好者形成的網絡 (M. Jenkins, 2001)。一旦形成後，群聚本身將成為網絡的骨幹支柱。基本上，廠商之間地理緊接性 (close proximity) 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更容易與其他廠商彼此連結起來，交換資訊、產品、想法，甚至是人力。同樣地，廠商發現透過推薦或「關係」而招募進來的員工，平均素質通常會比較高 (Montgomery, 1991；請一併參考前一節)。在產業群聚內的廠商因彼此交換細緻、默會知識而獲益，而當地微妙的「外溢」(“spill-over”) 效應也帶給它們好處。創新以及成本削減都會外溢，一併減少了廠商本身及其當地對手的成本，製造出有利的條件，促使在地的合作與競爭進而創造性地融合為「競合」(co-opetition) (Soubeyran and Weber, 2002)。

但就像許多想仿效矽谷的失敗案例所示，光靠地理緊接性是不夠的。成功的商業網絡通常在性質上既具社會性又具商業性，正如加拿大的一篇研究發現的，想在這兩者間做區分是非常困難的 (Araujo, Bowey and Eastern, 1998)。例如，在波士頓的 128 公路地區雖然有高科技廠商齊集，但仍無法像它所仿效的加州矽谷一樣，洋溢著充滿創意的活力，而原因恰是因為 128 公路地區的廠商無法擺脫公司階序分明、對資訊守口如瓶、本位心態、各據山頭的傳統規範 (Saxenian, 1994; Putnam, 2000；譯按：前者於 1999 年已有中譯本《區域優勢——矽谷與 128 公路的文化與競爭》，由天下遠見出版)。

廠商之間的合作及社會資本所具備的潛在利益可以是很雄厚的。最近一項針對丹麥、愛爾蘭、英國的研究發現，政府推動中小企業廠商之間的合作與建立網絡的計畫，乃會關係到商機、知識以及創新表現的增加 (Cooke and Wills, 1999)。許多被納入這些計畫的廠商，發現了社會資本擴大的好處，打算在未來即便需要自行出資，仍要持續推展它。同樣地，Fountain 認為美國聯邦政府

應該在科技產業中直接投資在社會資本的形構上，而不僅直接投資在科技，以此追求最大的創新及經濟回饋 (Fountain, 1997)。

以上所有例子都可視為架接性社會資本在中觀層面起作用的故事：廠商如何與其他廠商結成網絡、相互交易，發展彼此互利的非正式共識。

這些關係中也都具有「連結性」的元素，因為它們可能包含了經濟權力不均的廠商、社群間的連結。大多數成功的廠商很早就得知與上層連結的價值所在，像是與政治菁英的連結。廠商能做的最佳投資之一，就是當政策制定者在研擬你所操作的環境中的稅賦及管制規則時，能確保你公司的觀點被傾聽。另一方面，地區及當地的政策制定者也知道與在地企業建立關係的意義重大。這種連結在中央或聯邦需要爭取資金時就會大有用處，當地有規模的企業能透過像「守護天使」之類的方案，以資助廠商的成長或革新；也能透過學校與企業間的連結及企業雇主與社區間的公共論壇，來強化社區層面的種種條件。

廠商也學會了這件事：與它們所在的社區扎根、建立連結，就長遠看來，將會帶來利益 (Pike, 2000)。部分是因為，在這個消費者意識高漲的世界裡，商譽是很重要的。這類投資能增進員工的忠誠度，進而強化廠商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吸引高品質的人來應徵。同時，就長遠的角度來看，廠商所在的社區能繁榮起來，對廠商本身以及其中的人們都有好處。而一個有趣的特點是，有些廠商（目前很明顯仍是極少數）已開始採用社會資本文獻裡的語言。

然而，文獻裡也包含了一個重要的警告。許多（甚至是全部）產業群聚最終都走上末路。共享默會知識能讓群聚享有優勢，但假使不被挑戰或革新的話，也可能成為更激進創新與變革的一個阻礙。例如我們可以想想，英國境內群集在 Sheffield 曾經盛極一時的鋼鐵業，或英國的汽車業如何被更加創新與更具企圖心的歐洲、亞洲和美洲競爭者所取代。一個經濟群聚能長時間存活下來，其重要因素不只是內部具備的合作模式，還包括它發展出能開發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能提供連結到群聚之外的知識和趨勢的種種社會資本及制度 (Molina-Morales, Lopez-Navarro and Guia-Julve, 2002)。

使廠商之社會資本達到最佳

社會資本的形態有好幾種，而它們在創新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異 (Landry, Amara and Lamari, 2002)。廠商與群聚有可能在某一種社會資本中花費過多或過少的注意力（請一併參考第九章）。廠商經常藉由重新安排它們內

部的組織（合併或拆夥等），來重新調整自己的網絡性社會資本。想改變一個廠商之社會資本的規範性面向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一般稱為「企業文化」的社會規範。這個文化很有可能是拙於因應變遷的。一般而言，這是因為這些未曾言明的規範中，有些會因為市場條件的變遷而顯得不合時宜，這些共享的預設及規範於是變成革新的障礙（例如 Clausen and Olsen, 2000）。

倘若廠商的內部黏著太緊，它很可能忽略了架接性社會資本（它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這可能讓它冒著與市場、供應商、競爭者失去聯繫的風險。針對企業廠商所做的民族誌研究證實，的確存在著一個黏著性或鑲嵌性（*embeddedness*）的最適程度，一旦超過的時候，將使廠商與自己內部網絡以外的資訊相互隔絕，而黏著性社會資本也將成為有礙於生產的因素（Uzzi, 1997）。這對許多大公司而言可能是個問題，尤其是如果它們在公司設立以來大都能維持著有效壟斷的話。克服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設法顛覆內部化研發工作（*internalizing, R&D*）的傳統商業理論，取而代之地透過企業創投（*venture capital*）來將研發外部化。這個策略已被一些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所採行（如思科集團、英特爾及昇陽）（Ferrary, 2003）。

在那些想脫離傳統策略、移向這個新典範的公司裡，當前最火紅的例子就是英國電信業龍頭——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它的研究總部很龐大，但只把焦點放在內部，讓人覺得儘管外表看起來軍容壯盛，但員工的創造力及企圖心卻乏善可陳且近乎停滯；約六千人集中在高度保密措施的前軍事基地從事研發工作，保密防諜的氣氛十分凝重。這一切如今都改觀了。藩籬被撤除，其他廠商受邀進入它的廠區，員工也被鼓勵出去自行創業。這種試圖離開黏著性，開創架接性社會資本的廠商再投資舉動，十分具戲劇性。基本上，英國電信正在努力讓自己及合作廠商能從 128 公路模式轉進到矽谷模式。

58 另一方面，廠商若只針對架接性社會資本來投資，忽略建立內部緊密的社會網絡或文化，將很難抵抗四分五裂或是喪失認同感的危機。企業不能將研發工作毫無止盡的進行委外：廠商仍需在內部維持充足的技術知識，以便能瞭解、判斷外面所做的研究是否有價值（也就是所謂的「吸收能力」：Anand, Glick and Manz, 2002）。² 而過多的架接性及連結性或許也會創造出廠商腐化的

² 類似的情節也發生在國家的層面上。由 OECD 所進行的橫跨 20 年，遍布 16 個國家的計量經濟分析（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2001）清楚地顯示，國家性研發計畫所能提供的主要經濟效益中，不是直接發現到的知識，而是能瞭解其他國家所做的卷帙浩繁的研究並從中取得收穫的能力。

可能性（尤其當廠商連結的對象是政治場域），進而降低了整體經濟表現（例如，Hillman and Ursprung, 2000）。

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的英美企業，似乎較傾向遵循「彈性雇用」（hire-and-fire）的觀點，而較傳統的公司福利模式以及企業忠誠的想法則走入歷史。有些評論家（包括「弱連帶的長處」論點的開創者 Granovetter）認為這是錯誤的方向，尤其在看到日式的企業福利計畫為廠商帶來顯著的經濟利潤時（M. Granovetter, 1990）。小型、密度高且穩定的人際網絡能帶來顯著的好處，像是提供一致的角色期待，這將反過來增進員工工作滿意度，並減低員工離職率（Podolny and Baron, 1997）。事實上，工作場合中的社會資本似乎不像傳統的看法，認為能看出員工、公司或工作環境的特質，它反倒較能有效預測工作生活的品質以及工作滿意度（Requena, 2003）。而且，重視員工、看重信任和相互關係的管理風格，的確可以提升員工的士氣以及生產力（Donkin and Lewis, 1998）。

以上的討論，其實重點還是在於均衡與否這件事上。至於怎麼分配最能達成均衡，這在不同的產業部門會有差異。今日，有愈來愈多的文獻告訴管理者，他們公司缺乏什麼樣的社會資本，而他們該如何去打造此社會資本。愈來愈多人認為，管理者可以有系統性發展並管理網絡。例如，管理大師 Cross 與 Prusak 認為，高級主管應該利用網絡分析來找出自己組織裡誰能扮演四個關鍵角色：位在核心的協調者、跨疆界人員（boundary spanners）、資訊中介者（information brokers）以及在外圍的專家（Cross and Prusak, 2002）。一旦管理者知道誰在扮演這些角色，他們可以藉此運作整個組織，而如果網絡內缺乏這些人，他們也可主動培養人才來扮演這些角色。最近另外一些論文觸及的議題包括：從賽局裡學到的教訓（Orbanes, 2002）、增加彈性並發展人力資源管理，讓工人能累積或獲得社會資本（Ferrary, 2002）、投資於建立信任與溝通，並以員工為重（employee focus）（Watson and Papamarcos, 2002）、組織公民權（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Bolino, Turnley and Bloodgood, 2002）、激勵機制（Rob and Zemsky, 2002）、全面檢視員工互動網絡（Gant, Ichniowski and Shaw, 2002）。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資本扮演重要的角色，左右廠商之所以成功或失敗的過程，同時也發揮「黏著膠」、「潤滑劑」的功能，使組織能順暢運作下去（Anderson and Jack, 2002）。事實上，廠商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重要的

社會資本的形式，成功的廠商與地區經濟體都能投注心力在不同社會資本（如黏著性（廠商內部）、架接性（廠商之間）、連結性（例如，在廠商與限制它們行為的規定之間））的過程裡找到均衡點，並避免過度投資在某一項社會資本上。

鉅觀層面的效果：區域及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

以上的證據告訴我們，具有豐富且多樣的社會資本做基礎，應該和鉅觀或總體層面上擁有較高經濟成長的現象有關係。早期擁護這個立場的人士之一，就是著名的社會評論家福山（Fukuyama）。他認為不同國家政治經濟學上的關鍵差異，乃是反映了它們背後社會資本上的差異（1995a, b）。他指出，一般人認為美、日的經濟表現都占有世界性領導地位，同時視它們為兩種完全相對的政治經濟體系，這兩項看法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而一旦我們能認識到這兩個國家都具有很高的社會資本這個特色後（尤其是陌生人間具有高度信任），這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

社會資本與國家經濟表現

接連出爐的不少實證資料已印證了福山的基本命題。具有高社會資本的國家十分有可能就是較富裕的國家（在世界價值觀調查裡是以陌生人之間的社會信任來測量；請參見圖表 2.1；以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來測量）。研究已發現，社會資本與成長率有關，無論是在國家之內（例如，義大利內部，Putnam, 1993），還是國與國之間（Whiteley, 1997; Knack and Keefer, 1997; La Porta et al., 1997）。

61 Whiteley 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方法，是將以下三個問題所得到的回答綜合起來：對一般人的信任、對家族成員的信任、對自己國人的信任（一個因素的分數）。他比較各種模型對於 1970-1992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能力。Whiteley 發現，即使控制了 1970 年平均每人實質國內生產總值、投資金額、初等教育註冊人數、人口成長、政府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經濟開放程度、政府的性質（儒家文化、社會統合主義或共產主義）等因素，社會資本仍很顯著地預測了成長率。他也發現社會資本的效應是穩定持續的，即使在拔靴法（bootstrap）與複迴歸中仍是個顯著的預測值；換句話說，它不只是因為一個或二個數值極端的國家才變得顯著的。

們設定的假設是社會資本會導致未來較高的成長，我們真正想看到的其實在時間上是倒逆的。換句話說，是 1990 年左右的國家的社會信任，與 1990-2000 之間的經濟成長，兩者之間的相關。顯然，我們在這方面受限於目前可得的資料。然而，還有兩份證據讓我們比較有信心的說，它們確實存在著因果關係。比較 1981-1993 年及 1990-1993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與社會信任有關的資料，會發現這個時期幾乎沒有變動，這也因而支持著一個假設：在國家層面，社會資本在時間變動中其實是非常穩定的（因此在不長的時期內可視為「外生」(exogenous) 的，請一併參考第七章)。第二，Whiteley 進行分析時，棄 1990-1993 年的資料而獨採 1981-1993 年的資料，之後發現雖然國家的樣本數較少，但出來的模式仍很類似並且仍維持顯著水準。

Whiteley 最精簡的模型（刪除沒有顯著影響的所有因子）指出，對經濟成長而言，社會資本比人力資本更重要，這一點也是內生成長理論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關注的主要焦點之一。它對經濟成長也具有幾乎相同的衝擊，成爲一個「趕上」變項 (catch-up variable，意指起跑較慢但很可能迎頭趕上的國家)，雖然重要性仍比對實物資本的投資略低。Whiteley 如此做結：

很明確的是，社會資本於解釋各國經濟成長差異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這個變項被納入一個修正後的新古典模型，它在眾多控制變項裡，就成爲預測各個國家成長的一個極顯著的指標……，因此我們若想建立一個預測經濟成長的適切模型，實在不能忽略社會資本 (Whiteley, 1997, p.18)。³

Knack 與 Keefer (1997) 與 Whiteley 幾乎有相似的結論。他們發現在 29 個市場經濟體中，信任及公民道德規範乃與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尤其在較貧窮的國家裡，信任與成長的關係格外緊密；相對地，結社活動如參與志願服務的多寡、成爲俱樂部的會員，則與經濟成長率沒有關係。

Knack 與 Keefer 的論文令人很感興趣，他們試圖指出是哪些因素造成這些國家在社會信任上有著根本的差異。由於看出結社生活不管和經濟成長或信

³ 東亞四小龍在 1998-1999 年間的成長減緩現象似乎並未影響這個模型。首先，檢視圖 2.1 會發現，雖然有像福山那樣的意見，但這些國家在社會信任上仍只達普通的程度，因此它們成長的減緩，事實上只是回歸到基本面，而有助於使這個模型更好。其次，每年成長率的短期波動，對國家長期在成長率上的差異造成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任的關係都很薄弱，所以他們對普特南所謂「由下而上」(bottom-up)的模式(1993)(即認為社會信任從結社生活中萌生)產生懷疑。他們指出，扮演正向角色的是正式制度，這些正式的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財產以及契約所載的權利，因此可為經濟交換中非常重要的社會信任背書。Kentworthy 也提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相較於公民行動主義(civil activism)，制度性設計在培養經濟合作乃至於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一個較重要的角色(Kentworthy, 1997)。Knack 與 Keefer 也認知到在階級或族群的光譜上倘若過於對立、分裂，將導致負面的影響。⁴ 這種極端對立將減少團體之間的社會信任，尤其是彼此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導致資訊流通減少、交易成本提高。

愈來愈多以各國為個案進行研究的成果，強而有力地支持一個結論，即不論是規範性或網絡的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上對經濟成長是很重要的。低度或不合適的社會資本，導致了以下各種經濟表現奇差的情況：非洲國家(Collier and Gunning, 1999; Azam, Fosu and Ndung'u, 2002)；經濟面臨轉型的中歐國家(Neace, 1999; Geib and Pfaff, 2000)；雖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情況仍然不佳的墨西哥(Robey, 1999)。同樣地，個別國家的研究也告訴我們，社會、經濟或族群上的分裂對立，將很有可能破壞當地的經濟成長。有不少的例子都可用來說明，其中一個就是斐濟，有研究指出當地印度裔斐濟籍的家族企業網絡與斐濟政商菁英之間的裂痕，「限制甚至排除了當地社會資本的創造，以致當地經濟無法進入自足的階段」(M. Taylor, 2002, p.302)。

相反地，在東亞四小龍相對而言算是成功的經濟中，社會資本(呈現於結為網絡或推崇網絡義務之形式)長久以來被認為扮演很主要的角色(Barnes and Crawford, 1986)。同樣地，一新興市場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多寡，可以有效地解釋該地(藉由多邊或雙邊的制度)發展金融方案的有效程度(Tufarelli and Fagotto, 1999)。另外，有項針對歐洲低地國(譯註：即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所做的研究指出，該地普遍被認同的人文主義規範(對其他文化抱持相互尊重的態度)，是它們維持經濟長期成功的重要關鍵，這也說明了不對立分歧與具包容的特質對一個社會的好處(Krug, 1999)。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個以貿易為導向卻缺乏強大軍事武力的國家內，商人若能抱持著尊重與接納的心

⁴ 他們注意到，中等教育達到較高的水準乃與高社會信任有關聯(受到較高等的教育者，在自述社會信任時將達到較高的程度)。但是，在鉅觀層面上，這很難去做因果的推斷(或許是擁有較高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的國家，會將較多的心力投資在教育上)。

態去與其他人民接觸，這個國家較有可能成功發展。

最終，許多細緻的個案研究結果都支持 Knack 與 Keefer 的觀察，即在貧窮的國家中，社會資本與經濟成長有著特別緊密的關係，因為這些國家較缺乏能使契約順利執行的替代性正式機制。有些在東歐前共產集團國家中所進行的研究將焦點放在商業發展，並針對成功企業進行訪談，結果顯示互惠及信任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社會資本讓企業家在欠缺確保契約執行之制度的大環境下，獲得金融資本及其他必備的資產 (Kolankiewicz, 1996; Neace, 1999)。然而，我們也看到相對於 Knack 與 Keefer 一般性觀察的結論，即在這些東歐國家裡，參與公民組織的程度似乎較社會信任更能預測成長 (Raiser et al., 2002)。同樣地，以坦尚尼亞的商業網絡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商業人士社會網絡中的信任，在創新中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但正式制度的缺憾也會令製造商們受挫，以至於無法將他們的社會關係擴展到自己的核心網絡之外 (Murphy, 2002)。簡而言之，非正式社會網絡與信任在每個國家內都很重要，而在一些沒有可替代或有效的正式辦法可確保契約順利執行的國家內，更是如此。

國家內部的地區效果

在國家內部的地區經濟表現及社會資本之間，也可以發現類似的關係。普特南最初對義大利的研究，記錄了高社會資本的地區（主要在北部）如何成為最具經濟生產力的地方 (Putnam, 1993)。在美國各郡之間，我們發現社會資本對成長率產生了正面的效果 (Rupasingha, Goetz and Freshwater, 2002)。而在英國境內的各地區間，公民參與程度和經濟生產情況之間也存在著強烈的相關 (Casey, 2003)。

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間有相關，並不代表兩者間就有因果關係。我們同樣可以說，一個地區在經濟上的繁榮，以某種方式刺激了社會資本的形成。例如，財富的增加有可能導致更多的休閒時間，或較不會不信任他人，因為人們毋需汲汲營營計較稀少的資源。

64 加拿大經濟學者 John Helliwell 曾在義大利從事一項貫時性的地區性研究，其追蹤分析發現，在義大利新的地方政府層級建立後的幾年裡，高社會資本地區比起低社會資本地區，擁有較高的經濟成長率 (Helliwell and Putnam, 1995；請一併參閱第六章)，這個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來說服因果關係，證明地區的社會資本的確會導致經濟的成長。

一地區的高社會資本有助於成長，這個假設近來面臨由 Richard Florida 及其同事所提出的細緻挑戰 (Florida, Cushing and Gates, 2002)。Florida 等人運用美國 206 個地區的資料，認為最具創新力的地方，是那些社會資本雖低卻歡迎外來者對它們的觀念提出挑戰的地區，像是舊金山、西雅圖以及華盛頓特區等。Florida 等人的重要發現就是在以下兩者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地區的創新活動，以及社會寬容、多樣性的程度〔尤其是「同志指標」(一地區同志伴侶的比例)、「波希米西指標」(bohemian index, 音樂家、設計家、作家、攝影家、舞者占勞動力的比例)〕。Florida 等人更進一步指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個別的公司中，雖然可能得犧牲內部的凝聚力，但公司為了成功，仍應該在內部發展出多樣性及開放性來。

Richard Florida 以這本著作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取徑提出了直截了當的反駁，尤其是針對普特南。⁵ 事實上，若我們由一個較實際、多面向的社會資本概念來思考，他的著作最終反倒有力地證明，我們稍早（在個人層面與中觀層面）得到的結論，即「任何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本（通常是黏著性的）假使過量的話，將阻礙經濟的榮景」，能應用在地區的層面上。顯然，社會資本、多樣性、經濟成長三者的因果關係非常複雜。一個城市中的經濟成長很可能對外來移民產生磁吸的作用，讓其人口在中、短期間能變得比較多元。這種多樣性及居住人口的高移動性很可能傷害了社會信任及社會網絡。然而，一旦我們控制了像多樣性及移動性這些因素，將發現社會信任仍然與經濟表現維持著穩固的關聯性。這種研究需要運用更細緻的多變項模型，我們不應武斷地宣稱任何單一或簡單的二元變項的相關性。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了多樣性及社會資本，我們將看到這兩者都非常重要。例如，Rupasingha 等人發現族群多樣性、收入的不平等、社會資本都有助於解釋美國各郡在經濟成長率上的變異 (Rupasingha, Goetz and Freshwater, 2002)。對經濟生產而言，一個理想的環境不僅要內部凝聚力強、互相信任，同時也要充滿自信、願意向外開放、崇尚多樣性（用我們的詞彙來說，就是兼具黏著性及架接性社會資本）。

顯然，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在地區的層面上確認因果關係的方向，才能確切瞭解到底是社會資本的哪個面向（或甚至是各種社會資本的哪一種組合）能將成長率最大化，以及是在哪些條件的限制之下。

⁵ 在公開演說裡，Florida 走的路線要較書本裡的溫和些。

與政府、制度、文化的關係

諸如司法體系的優點及一致性這類的制度性設計，算不算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存量裡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的答案端視你所採用的社會資本定義有多寬鬆（請參考第一章）。高社會信任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而此效果可能有部分是透過前者對政府及國家的正式結構所產生的正面效應而來。高社會資本與下列因素有強烈相關：政府的貪污較少、較佳的官僚體制、較願意納稅、較佳的基礎建設、司法體系較有效率且健全（La Porta 等人，1997；請一併參考第六章）。在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中與政府相關的政策走向（優良的社會及公共投資）和政治正當性，都可以更進一步地創造出適合經濟成長與繁榮的條件（Szreter, 2002; Azam, Fosu and Ndung'u, 2002）。創造出一個好的公共基礎建設並使人口都能健康及受到好的訓練，這些都能促進經濟成長。當然環境層面的效果也會發揮作用——當某個人周遭環繞的人都是學有所長、能力優良的情況下，此人也會變得較具生產力（Currie, 1996）。此外，被視為具正當性的政治行政體系能創造出穩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以減少像產業紛爭的衝突。經過比較各國情況後，我們看到高度的政治正當性是可能與較少發生罷工與產業紛爭有關聯的（Bornschieer, 1989）。

這些資料一旦彙整起來，將讓我們發現一個長期且正面的循環，在其中社會信任、高度健全的政府、經濟成長三者是彼此相互強化的（請參考第八章）。這些對成長的影響在某些條件下才會產生，因為它們會與其他像貿易契機的因素有互動。如果幾乎沒有任何交易的機會發生（例如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那麼社會資本與信任的水準將幾乎與經濟表現毫無關係。

在社會規範及期待中的文化性差異，也很有可能對經濟成長產生直接的影響。如北歐國家與南歐國家相較之下，更不能容忍諸如將拾獲的金錢據為己用的自利行為（Halpern, 1995b）。在國家的層面上，社會信任的程度與自利價值的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Halpern, 2001）。如果在文化上高度自利是可被接受的（有機會就行騙），那麼經濟交易將更需要仰賴正式契約、保險及嚴厲的制裁。簡而言之，文化規範性的基礎將強烈且直接地影響交易成本的多寡（Autiero, 2000; van-de-Klundert, 1999）。身處在含有高社會資本文化中的人們，很可能會印證科斯的模型，即「人們絕不會放棄為互利的交換而進行合作的機會」，而反駁馬基維利式的模式，即「若能圖利自己單邊的利益，即

使必須利用另一方，此機會也是沒有人會放棄的」(Hirshleifer, 1994)。

文化的重要性：賽局理論的實驗所提供的證據

從賽局理論發展出的實驗，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或規範性基礎的重要性，發現人們採取的立場乃受到社會規範明顯地影響 (Guttman, 2000)。一般而言，人們（在工業化的西方社會）會相互合作，即使情況並不是非常合理。例如在「基本賽局」(ultimatum game) 中，由某個人分配一袋錢，但雙方都必須同意此安排才能得到錢，此時當事者願意合作的比率高於狹隘的理性考量 (Camerer and Thaler, 199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無權分配的那一方得到的比例低於某個程度（大約是四分之一），那麼這個安排將被該方拒絕，即使這意味著他什麼都拿不到了。

另一個相關的發現是，在這種賽局裡，如果拿到的報酬較低就可避免自己所同情的對象承擔風險的話，人們是願意接受的。當然，這種情感網被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視為經濟世界和社會世界之所以能有效運作的核心關鍵 (Smith, [1776]1979)。這種情感的普遍存在，減低了人們搭便車及為求個人利益而不履行義務的傾向，因此即使沒有任何特定的個人能予以保證，卻將在鉅觀層面產生可觀的效益。據此，具備良心也會產生經濟的意義（至少在鉅觀層面上）(R. H. Frank, 1987)。

67

這則故事裡的一個有趣轉折就是有研究發現，研究經濟學的人（而且尤其是很熟悉古典自利模型的人）比研究其他學科的人較不常合作 (R. Frank, Gilovich and Regan, 1993)。例如，在囚犯兩難的實驗裡，以經濟學為主修的人選擇背叛另一方的比例為 60%，而非以經濟學為主修者只有 39%。同樣地，經濟學教授比起其他的同事較不會從事慈善捐款。這似乎是學習而非自然的結果。非以經濟學為主修的學生，在邁向畢業的過程中在囚犯兩難實驗裡表現出更願意合作的傾向，但以經濟學為主修的學生卻沒有這種傾向。簡而言之，經濟學者最終似乎仍相信自己的自利模型，因此預設了其他人一旦有機會也會出賣別人的想法。經濟學者社群裡較低的合作程度，意味著將使他們實際的生產力比應有的低。

國家經濟的形式與社會資本

福山也認為，社會資本的形式會影響一個國家發展出來的經濟類型。一個

國家中，倘若在陌生人之間的信任上表現出高度的社會資本，那麼就更能夠支持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及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類型，像是汽車生產或重工業。反之，假使一個國家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是家族之內的信任（請注意：有些理論家或許不會將它當成社會資本；請看第一章），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將主要以小型的家族企業為主。這種工廠在變遷快速的特定商業領域中是有好處的，但在需要大規模生產或組織的領域就很有可能導致失敗。在這種國家中，假使重工業想要發展，勢必得仰賴政府的力量（如法國）。

基本上，福山認為一個社會中最普遍存在的社會資本形式將帶給某些部門優勢，但相對地也會使其他部門喪失優勢。因此在陌生人之間存在著高度信任的美國，就較可能去建立股份有限公司，而這些股份有限公司所得心應手的行業就成為美國的強項（例如汽車或飛機製造業）。相對而言，在家族內有高度信任的義大利就較有可能產生小型的家族企業，因此小型家族企業擅長的行業（例如時裝業），就成為義大利的強項。

68 請注意，Whiteley 所做的分析並未區辨社會信任的不同類型，反而以它們顯著共變為依據而把它們混為一談成為單一指數。然而，福山的理論可以說在 La Porta 等人針對世界價值調查之資料分析中得到了強而有力且有系統的支持（La Porta et al., 1997）。控制了經濟成長後，我們看到以陌生人間之信任來測量的社會資本，以及由前 20 大上市廠商買賣營業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資料取自 WorldScope Global, 1996），兩者之間有高度相關。相反地，我們發現堅強的家族連帶對發展大企業而言是不利的，前 20 大廠商占一國經濟的比重與家族信任之間存在著高度負相關。

不同形式的信任與不同形式的經濟組織存在著關聯性，這個發現並不表示某種特定信任形式必然與經濟高度發展之間具有關聯性，一切還得視市場的條件而定。

同時，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事實上也可能在國家或地區的層次上對經濟表現造成傷害。亞當斯密曾舉過一個經典的例子：商人們藉由一些方法，可以在私人商業組織之中共謀，為了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來哄抬物價。這個假設已在針對英國某些地區經濟表現之研究中得到證實。雖然我們發現大多數形式的社會資本與較佳的地區經濟表現有相關，但較高的商業協會會員參與，實際上曾導致較差的經濟表現（Casey, 2003）。同樣地，密西西比的 Tupelo 之所以能止跌回升，有部分的原因就是解散了具排他性的商業協會，並以向所有人開放

的社區發展協會取而代之（Grisham, 1999；請參考之前的討論）。⁶

福山預測，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將在未來變得更加重要。例如他認為就中國而言，公眾信任相對來看低於家族信任，此情況最終將形成阻礙，這也意味著中國將來若非擁有缺乏重工業或大型產業的不均衡經濟發展，就由國家以無效率的方式來經營這些產業。⁷目前有一種普遍存在的信念：「新經濟」（側重於知識及無重量物的交易，以此相對於以沉重物品的生產、運輸為基礎的傳統經濟）在散布甚廣、有彈性、包含高信任的社會網絡中，最能繁榮發展。相較於一些擁有密度較高、碎裂的社會資本的國家及地區，擁有這類社會網絡及規範者應該能在這種經濟中取得更佳的表现。

在全球層次的社會資本

還有一個問題，即這種一般性的社會資本，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提升全球層面中的經濟成長。就像我們可以認為一個國家中共同的社會規範及互相連結的社會網絡，能夠促進相互合作的經濟行動，我們同樣也可以認為全球社會資本能促進全球的成長。

69

有一個簡單的例證，就是文化連結、共同規範及相互尊重如何讓國家之間的交易變得更容易。Krug 的研究就是一個表現出色的例子，他指出在低地國成功的商業背後，那種相互尊重的人文主義式規範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Krug, 1999）。美國經濟中由移民所扮演的正向角色或許也算是另一個例子，而這其中的好處通常不僅是流向人口輸出地，也使移民接收國受益（Laws, 1997）。同樣地，針對在跨國企業裡旅居國外工作者的研究也發現，這些人不僅在帶動當地專業技能上發揮作用，同時也在打造企業內多樣性的工程裡占有關鍵地位——而且事實上，這些旅居國外的工作者參與愈多的橫跨界線、搭建連結的活動，他們在公司裡所擁有的權力就愈大（Au and Fukuda, 2002）。

以下是一個令許多人都興致勃勃的議題：在國際上發展像人權法案（通常

⁶ 在這個議題上，兩方的論點都能清楚得到實例的印證。例如，有項針對八個非洲國家的研究提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在非洲的商業社團較吻合多元主義模型下利益團體的行為，反倒是亞當斯密的共謀商人模型較無法得到印證（Goldsmith, 2002）。或許在非洲的情況是，為了對抗有可能貪瀆腐化的政府機構，並克服族群間的分裂，一定程度上的共謀總的來說是有幫助的。社會資本一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好是壞經常得視脈絡而定。

⁷ 我們或許注意到從圖 2.1 中可看出，世界價值觀調查會認為，福山將中國視為一般性社會信任很低的國家的描述是錯誤的，雖然有不少人對世界價值觀調查中中國樣本的代表性仍存在疑慮。

被認定為促進社會或道德發展的工具)這類共同的規範性架構,實際上是否能被證明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我們認為在國家層面上共同的規範性架構會發揮潤滑公民日常生活交易的作用,因而會促進經濟活動,那麼我們應該會期待,只要將一項日漸普及的規範性架構推行到全世界,同樣會提升全球經濟的表現。

有項重要的證據告訴我們,即使在較為全球化的世界中,社會網絡仍舊是十分要緊的。經濟學者已經注意到不同國界之間的資本流動及其他形式的交易都顯著地下降了(Feldstein and Horioka, 1980; Helliwell and McKittrick, 1999; Keller, 2002)。例如有項研究估計,美加邊界所造成的交易量下跌,就相當於美加各自境內一萬哩距離所造成的交易量下跌(McCallum, 1995)。顯然,這種大量的下降不能只從距離或運輸成本、有無關稅壁壘來解釋(Grossman, 1997; N. Chen, 2004)。相反地,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這個謎一般的效應反映出人民社會網絡的結構。這個假設已被電話流量以及遷移現象的模式有力地印證了(Mackay, 1958; Obstfeld and Rogoff, 2000; Helliwell, 2003)。進一步的證據來自以下的發現:迄今,以使用歐元的國家與不使用歐元的國家做為對此,歐元並未讓同樣使用歐元的歐盟國家之間的交易強度增加(N. Chen, 2004; Helliwell, 2003)。或許諷刺的是,雖然不同國家在經濟成長率上的差異似乎深深受到社會資本及其他社會規範之差異的影響,但當我們論到全球貿易時,社會網絡仍然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即使我們訂定了各種全球貿易協議,但我們仍然喜歡與我們認識的人交易。

結語：社會資本為何、如何影響經濟成長？

在個人層面,擁有較廣泛的社會資本〔尤其是接觸範圍廣大的網絡(架接性社會資本)〕,同時感覺你可以信任其他人(規範性社會資本),乃與較低的失業情況及較高的薪資所得有相關。這些個人層面的變異確實幫助我們瞭解經濟大餅如何被分配,但它們本身並未告訴我們社會資本影響了總體經濟成長。事實上,社會資本的變異也關係著不同社會階級以及族群在經濟成就上的差異會不斷持續下去,因為窮人或弱勢受制於相對缺乏管道的情況,無法有連結良好的朋友或認識的人能伸出援手。

儘管如此,中觀層面的證據顯然支持一種理論:社會資本普遍來說有助於經濟生產力與發展」。失業情況集中的鄰里地區其經濟表現將加深其中的個人

本身占的劣勢，這種情況可以被歸因為缺乏與已受僱者或占經濟優勢者的社會連結。廠商本身也被視為一種重要且常見的社會資本形式，由個人所結合而成的網絡，這些人擁有一些相同的規範與瞭解，增進他們在經濟上為彼此的好處而合作的能力。文獻中有許多例子說明了一般而言廠商內的黏著性及廠商間或與外界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兩者如何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產業集結的地區或群聚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證明了社會資本在中觀層面能帶來的潛在正面效益。

不過，文獻也指出過度投資在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也是可能發生的問題，例如某個廠商或地區可能變得全然朝向內部的黏著，斬斷自身與市場的連繫，與內部企業社群之外的任何想法完全脫節。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種特定種類的社會資本過度就像任何一種不足一樣，都會對經濟造成傷害。這樣的證據也吻合第一章所提出的維他命模型。廠商與社群都需要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以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某種社會資本過度豐盛或過度貧乏，都可能造成傷害。同樣地，有些形式的社會資本，像是企業聯合議價或議量，雖然會使相關人等受益，但卻會抑制總體經濟的表現。

現存的鉅觀層面資料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觀點：社會資本普遍而言會促進經濟成長；特別是陌生人間的社會信任，與一國的經濟成長率有密切的相關。雖然這些鉅觀的研究無法證明出因果關係，但許多實驗室內做出的成果、中觀層面及國內研究的證據，全都支持這樣的因果關係。一個規範性的價值基礎，能決定個人帶著可信任的方式來行事（即使欺騙可導致短期得利），它能夠自上而下地促進整個經濟的運轉（請參見圖 2.2）。也就是說，當我們論到全球貿易，以及試圖解釋跨國交易如此戲劇性地下降時，我們就隱約看見我們社會網絡的結構正默默地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然，社會資本絕非唯一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有些地區顯然擁有類似社會資本，但在成長率上卻出現分歧，這類實例就足以直接說明這一點（Engstrand and Stam, 2002）。普遍來說，微觀、中觀及鉅觀層面的資料，都指出在改善經濟體中資訊流通以及普遍降低交易成本的過程中，社會資本所扮演的角色。此外，社會資本也可能對經濟體產生間接的正面效果，例如鼓勵成員發展出進一步強化信任且有助於長期人力或實體投資的司法與公共政策。

71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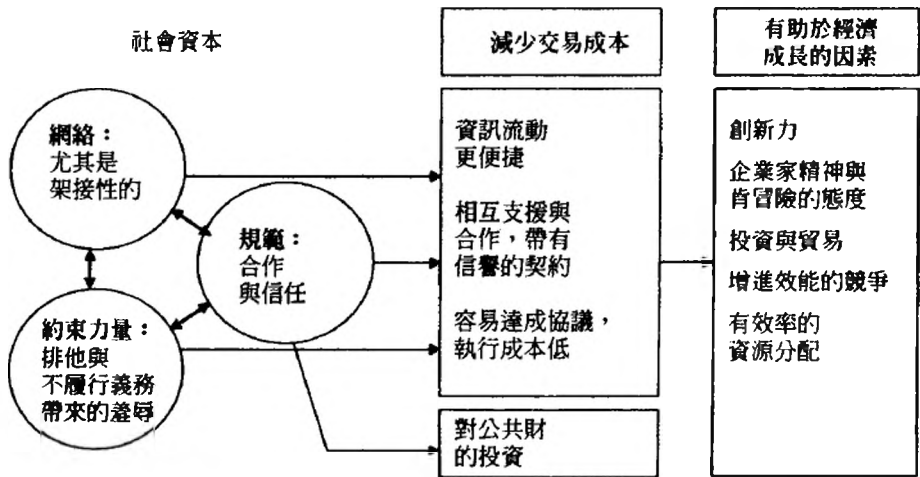


圖 2.2 社會資本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

進階閱讀

讀者如果想要追溯經濟學者如何使用「社會資本」或該詞彙之歷史，可以閱讀 Glenn Loury (1987) 的著作，他這本討論種族不平等的原因的著作，使他時常被讚揚為這個詞彙早期的關鍵支持者與獨立發明者。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福山的著作可讀性高、影響範圍廣，而且讀者可以選擇閱讀他篇幅較長的專書《信任》(Trust) (1995a，本書中譯本為立緒出版社所出版)，或是討論相同主題的較簡短文章 (1995b)。如果你僅僅想選擇一篇優秀的實證研究文章來讀，我推薦 Knack 與 Keefer (1997) 的著作。若想對社會網絡如何解釋跨國貿易有全面性且分析精闢的瞭解，我建議參考 John Helliwell (例如 2002b) 的著作。

如果想找一些強而有力的反對觀點，請參考 Florida、Cushing 和 Gate 合作的研究 (2002)，其內容至少在用辭上表現出猛烈的批判。

第三章 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

在我所探索的社會資本產生效果的全部領域裡，就屬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 73
這個領域中，最能看出社會連結性的重要性是如此根深柢固。

Putnam, 2000, p.326

針對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來進行的研究，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涂爾幹引發後世諸多靈感的研究：《自殺論》(Suicide) (Durkheim, 1897)。涂爾幹觀察到，雖然自殺帶有濃厚的個人性質，但一般而言一個社會自殺的總數非常穩定，雖然不同社會及地區之間的差異很大。涂爾幹嚴謹地檢視了許多統計數字，所下的功夫足以令許多當今的研究自慚形穢。他發現已婚者的自殺率低於鰥寡者或離婚者；冬季的自殺率低於夏季；天主教地區或國家的自殺率低於新教地區。他認為：

儘管這一切外顯樣貌似乎是彼此獨立的，但它們事實上顯然必定肇因於能支配個人的某一個或某一組原因。倘若不是這樣，那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切不知彼此存在的個別意志每年都以相同的數目達成相同目的呢？至少他們大多數都未曾對彼此產生過影響，他們也未曾聯合起來；然而，整件事情卻彷彿是他們遵從著某一項秩序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在他們共同的環境裡，必定有股力量迫使著他們往同一方向前進，那力量的強弱決定了 74
個人自殺數目的多寡。現在看來，揭示這股力量的效應並不是根據有機的及宇宙的環境而變動，而是單單根據社會環境的狀態而變動 (Durkheim, [1897]1951, pp. 304-5)。

涂爾幹討論了各種「類型」的自殺。他花了大多數時間探討「利己型」(egoistic) 自殺，並在自殺率較高的新教徒（高於緊密連結的天主教與猶太

教徒)、未婚鰥寡者、小家庭(意指家戶被打散為較小的單位)生活為主的地區以及都市地區等例子得到驗證。在每個例子裡,較高的自殺率似乎與較高的「過度個人主義」有關聯。在這個面向上,涂爾幹注意到自殺率在戰爭期間經常會下降,這反映出當國家受到某共同外敵的威脅時,國家的凝聚力便增強許多。他的結論是:「自殺與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內的凝聚程度呈負相關」(同上,頁 209)。

涂爾幹的著作之所以為人稱道,不僅因為它是使用統計數字的先鋒,也因為他在其中融入了細緻的理論,而且他辨識出我們今天所謂的環境層面的效果。遲至 1960 年代才有心理學家燃起了一股新興的旨趣,想瞭解「社會支持」在人們健康情況(尤其是心理健康)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個人的社會網絡如何幫助人緩衝生命逆境所帶來的痛苦。最近,醫學研究者也開始進入這個領域,提升了人們對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生理健康的注意。

這類心理學與醫學的文獻大多都把焦點放在個人身上,檢視個人的人際關係與其健康之間的關聯性(屬於微觀層面的分析)。儘管初期有涂爾幹的影響,很少有研究針對中觀及鉅觀層面進行分析,直到最近才興起了中觀層面及鉅觀層面分析的興趣(例如,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有些研究健康差異的社會學著作也與我們的關懷有關,即想探詢社會資本究竟如何在鉅觀層面影響健康(例如, Wilkinson, 1996)。

在底下的章節裡,我們將從個人的、社群的以及鉅觀的層面,依序檢視社會資本對生、心理健康產生影響的證據。

微觀層面：你只需要愛？

75 過去幾十年來,心理學家注意到健康(特別是心理健康)不佳的人社會網絡通常較小。簡而言之,那些為慢性疾病所苦的人擁有的熟稔的關係以及朋友都比較少。苦於病痛的人們也較容易表達出自己得到的支持品質較低,無論他們社會網絡裡的人數是多是少(Sarason, Sarason and Pierce, 1990)。

許許多多橫斷性的研究,指出人們的健康與其社會網絡的大小、品質之間的高度相關性,社會孤離的傾向較低、較積極投入社交或公民活動的人,比較可能擁有較佳的健康狀態(例如 F. E. Baum et al., 2000; Veenstra, 2000)。然而,這樣的結果可以有外其他的解釋。首先,受訪者表達出的相關性可能源於其偏

誤 (Halpern, 1995a)，問題在心理健康方面。例如，一個為憂鬱症所苦的人很可能陳述比事實更多的症狀，而且即使受到同樣程度的支持，而他感受到的任何程度的支持也會比一般沒有患憂鬱的人來得更低。同樣地，有些人對於生命的觀感十分正面，因此陳述出來的人際關係和健康程度會比其他人更好，即使他們客觀條件相同。這種偏誤會導致橫斷性的資料朝正相關方向偏斜，尤其是當這些資料仰賴的方法是自我陳述健康狀態與人際關係的時候。

第二，因果關係常常是不清楚的。有可能是因為生病才讓人變得比較孤癖，而不是反過來。究竟是個人關係保障了健康，還是健康保障了個人關係？例如，較早退休以及隨之而來與同事們失去連繫，常常跟健康狀況惡化有關；然而，較早退休常常是因為當時已罹患某些疾病，而不是反過來說。同樣地，有人發現憂鬱症乃是導致婚姻及其他關係產生危機的原因，其中摻雜以下的狀況：溝通不良、衝突增多、常被視為是「累贅」而感到沮喪的伴侶或朋友 (Bothwell and Weissman, 1977; Hokanson et al., 1989; Gotlib and Macabe, 1990)。

此外，有證據顯示，人格特質有時能夠解釋個人層面上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健康身體之間的共變關係。例如，有的人擁有非常強硬的個性：這包括了內部控制的所在 (locus of control) (自覺能掌控自己命運)；傾向把逆境視為挑戰而非危機；不管做什麼都全力以赴。這種「強硬性格」使得他們不但自視同時也自覺自己是個較健康的人 (Kobassa, 1979; Blaney and Ganellen, 1990)。

這些方法論上的議題，對所有有志瞭解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因果關係為何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挑戰。

心理健康

一如之前所說，當我們試圖解開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或社會支持間的關係謎團時，遭逢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回答時的偏誤。心情憂鬱的人當然會抱怨自己的人際關係，而無視於事實上到底是否如此。

克服這個難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藉由第三者來進行客觀的評估。這是當初一個針對倫敦婦女抽樣、討論憂鬱症的重要經典研究所採用的方法 (G. Brown and Harris, 1978)。緊接在巨細靡遺的訪談之後，受訪者生活的狀態以及他們憂鬱的程度，都由獨立的觀察者來評估。Brown 與 Harris 發現，經歷過重大失敗或受慢性疾病所苦等重大生命變故的女性，顯著地較容易罹患憂鬱症。即便如此，許多遭逢重大生命變故的女性卻仍未罹患憂鬱症。研究者發現，擁

有緊密、值得信任的人際關係，似乎會大大減低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在經歷了重大生命變故之後一年，無男友或丈夫可以託付情感的女人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是擁有這類關係的女人的四倍之多（罹病率是 41% 比 10%）。親密、值得信賴但非伴侶的關係（像與父母、手足或朋友的）也提供人們免患憂鬱症的一些保護，但不像伴侶關係那麼有效（26% 的罹病率）。有趣的是，這類關係的缺乏，本身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危機因子——在未發生生命變故的情況下，不管人們是否擁有此種人際關係，憂鬱症都鮮少發生。

Brown 與 Harris 的研究如今已被廣為複製，大家一般都接受這樣的說法：親密、值得信任的關係能扮演緩衝器的角色，保護個人免受生命逆境的傷害。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孤立而缺乏親密社會支持的人們，較有可能在壓力之下罹患憂鬱症，在罹患後也可能比有那類支持的人花更久的時間才能擺脫憂鬱症（Sherbourne, Hayes and Wells, 1995）。

介入性研究已提供我們進一步的資料，證明在保護人們免受憂鬱症之苦的過程中，支持性的關係扮演了因果關係裡的角色（Kawachi and Berkman, 2001）。Harris 等人針對一個與他們原先經典研究的樣本類似的樣本進行隨機嘗試，發現樂意與人為友的人們相較於控制組，在罹患憂鬱症後一年期間，明顯在症狀上有減輕的趨勢（T. Harris, Brown and Robinson, 1999）。同樣地，Mittleman 等人也發現，家族的集會、個人的諮詢、接觸支持性團體等因素，都顯著地降低了以配偶身分照顧阿茲海默症患者之人罹患憂鬱症的風險（Mittleman et al., 1995）。

Brown 與 Harris 指出另一項強大的危險因子就是，在 11 歲以前遭逢喪母或失去母親照顧之痛（G. Brown and Harris, 1978）。年幼時的情感支持（溫暖、親情），對於往後抵擋憂鬱症而言是很重要的保護因子，這個發現已被貫時性追蹤研究成果以及針對在機構內被撫養成人的孩童所做的研究所印證。一個關鍵的中介因素是對個人自我價值感與自尊感的衝擊。我們清楚地看到，倘若父母在孩子童年時較不常花時間在孩子身上，對他們較不友善、不親切時，孩子很有可能在長大成人後變得鬱鬱寡歡（Crook, Raskin and Elliot, 1981; Lefkowitz and Tesiny, 1984）。

更廣泛來說，社會凝聚（即人們在多大的程度上擁有範圍大而且頻率高的社會接觸）很有可能造成「主效應」（main effect）。換句話說，無論一個人受到多大的壓力，具有較高程度之社會接觸的人，較有可能陳述出較佳的心理健

康 (A. W. Williams, Ware and Donald, 1981; 請參見 Cohen and Willis, 1985, 這裡有較細緻的討論, 能幫助我們瞭解在心理健康上相對於主效應觀察的緩衝效應)。這個現象並非僅存在於西方, 如一項在俄羅斯所做的研究指出: 「情感健康」中有大約 10% 的變異量, 社會凝聚之測量值來解釋 (R. Rose, 2000)。

同樣地, 相對於失業狀態, 持續工作似乎能對心理健康及生活安適程度產生正向的效果 (Warr, 1987)。當然, 有許多理由能解釋為何工作能帶來正向效果。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工作將帶來金錢, 且保護個人免受經濟困窘的威脅, 這是工作的「顯性」功能。工作也能帶來一套社會網絡、認同感以及意義 (Jahoda, 1972, 1982, 1995)。失業對生活安適程度所帶來最嚴重的衝擊, 確實實超越了失去所得實質上對生活安適感所造成的傷害 (Clark and Oswald, 2002; Helliwell, 2002a; Donovan and Halpern, 2003)。貫時性研究也清楚地推斷出工作所能帶來的社會接觸及支持 (Holohan and Moos, 1981)。

持平而論, 我們應該注意到並不是每個人的人際關係都會為心理健康帶來普遍正向的效果。與有虐待、憂鬱傾向或心理異常的人建立起的親近關係, 常常會為心理健康帶來傷害。同樣地, 當支持演變成了依賴, 則可能帶來無助感或憎惡感 (G. R. Lee, 1985; Kawachi and Berkman, 2001)。

有趣的是, 也有人認為, 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率之所以比較高, 部分得歸咎於她們較高度仰賴值得信任的人際關係, 以及這類關係帶來的義務。因此女性面對失去這類支持時較無力抵抗, 且當自己社會網絡中之他人遇到逆境時, 會連帶遭受較嚴重的影響 (Belle, 1987; Busfield, 1996)。例如, 一項針對美國南部黑人社群的大家庭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所做的研究指出, 這種支持對年輕男性是有助益的, 但對女性則沒有幫助。之所以如此, 原因是年輕女性必須背負很重的責任義務 (Dressler and Badger, 1985)。

人際關係會引起的預期效應不只是憂鬱症而已, 還包括了許多其他的心理異常症狀。例如, 具支持關係較少的人, 特別容易在發生創傷事件後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erry et al., 1992)。在創傷發生的時期缺乏支持, 也意味著不管發生之初的症狀嚴重與否, 往後長達六年都可能產生嚴重的壓力失調情況 (Dalgleish et al., 1996)。同樣地, 一些貫時性研究也指出, 社會網絡與社會參與似乎能起保護的作用, 而抑制 65 歲以上的老人罹患痴呆症或智能衰退 (Fabrigoule et al., 1995; Bassuk, Glass and Berkman, 1999; Fratiglioni et al., 2000)。

在心理健康的領域有一個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重要議題，就是緊密的個人連帶與阿茲海默症之間的關係。在生命中的特定時間點，大約有百分之一的人會受到阿茲海默症的影響，而且經常是日後一輩子使人不斷衰退的症狀。一般而言，大多患者會有變得「瘋狂的」跡象，例如幻聽和一些不合宜的舉止出現。¹ 早期的著作和一些心理分析的研究都認為，親密關係可能是這類嚴重精神失調的原因 (Laing and Esterson, [1964]1970)。一個常見的假設認為，有些親密關係並不會起保護的作用，反而含有一些病態的互動模式，以至於使個人身陷「進退兩難」(double binds) 的死胡同裡。例如，一個苛刻的父親或母親或許會對孩子說：「為什麼你從來不帶朋友來家裡玩呢？」但一旦孩子真的把朋友帶到家裡來，孩子可能又被責怪說：「怎麼交了這種壞朋友呢？」

79 早期關於這類進退兩難的假設並未被後來的研究所支持，之所以這麼說部分是因為所謂的病態模式，後來證明也普遍存在於成員未罹患精神病的家庭之中。儘管如此，研究仍發現在下列條件下再次發病的比率會顯著地較高：將苦於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交由病人家屬照顧，尤其是這個家庭在互動時帶有高度「情緒」，並常是負面且批評性的意見。例如，有個研究發現患有阿茲海默症的病人若被送回情緒表達強度高的家庭，其再發病的比率比回到情緒表達強度低的家庭高出四倍，即使其仍在進行藥物治療 (Vaughn and Leff, 1976)。在同一個研究裡還發現，減少和情緒表達強度高的親人面對面接觸，能夠有效地減低再發病率，因此精神病學家一般都會建議阿茲海默症病人，儘量減少與自己家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有一些介入性研究以減少家庭內的情緒表達強度為目標，將關於失調以及家庭治療的教育做了一個結合，如此確實可以奇蹟似地降低再發病率，這些研究更加肯定了情緒表達強度的確會影響身陷高風險中的個人 (Hogarty et al., 1991)。

一般而言，這些研究成果會導出下面的重要觀點：緊密的人際連帶很可能保護個人免患憂鬱症，但卻也可能使阿茲海默症更加惡化。然而，更準確的詮釋應該是：人際關係的品質是很要緊的，尤其是對身陷阿茲海默症風險的個人而言。因此可以這麼說（就日常生活精神錯亂、憂鬱症及阿茲海默症而言）：密切的、正向的、值得信賴的個人關係，很可能幫助個人免受心理疾病的侵犯。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雖然大多數的緊密個人關係都是正向的、具支

¹ 在阿茲海默症中典型的幻聽情況是聽見有第三者在批評你的聲音。「不合宜的舉止」指的是在錯誤的時刻表現出錯誤的情緒，像聽見一件不幸的消息時，卻報以笑聲。

持性的、值得信賴的，但絕非每一個關係都是如此，而此種正面效應也可能因為家中某個成員的心理疾病而繃緊以致崩潰。

快樂

或許有人會猜想，影響個人正向主觀的生活安適程度的因素，就是那些導致人們日常生活精神錯亂的因素的鏡像反射。在這種觀點下，當我們發現快樂或生活滿意度乃受到個人關係的強烈影響時，也就不會太意外了。儘管可能會有些受基因的關係影響所產生的例外情況（有些人似乎就是因為基因排序而比別人更容易快樂），但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確實一直都是預測個人快樂與否的因素中最棒的一個。已婚者很明顯地比未婚者快樂；住在一起的人比獨自居住的人快樂；分居的人尤其是很不快樂的（Donovan and Halpern, 2003）。

儘管交友情形所提供的預測力略低於婚姻狀態，但友情狀態也是預測生活安適程度的一個好指標。其他的社會連結測量值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像是上教堂或是加入某些志願性社團的情況（Argyle, 1987; Helliwell, 2002a）。

80

將收入之於快樂的重要性，拿來與人際關係之於快樂的重要性相比較，將帶給我們一些啟發。富裕與快樂與否是相關的，雖然這組關係是非線性且不太顯著。收入所產生的效益似乎在遞減，非常富有的人幾乎不會比小康之家來得快樂——儘管這個快樂的坡度在富裕的 OECD 國家之外的地方才比較明顯。同理，樂透大獎的得主儘管在得獎後的短時間內確實樂不可支，但從長期來看，似乎不比一般人來得快樂。相反地，強而有力的個人連帶產生的正面效應，似乎特別強又持久。一如普特南透過美國各地進行的大規模調查資料得出：「以粗略的量化語言來看，結婚帶來的快樂就像是讓你的年收入增加四倍所帶來的快樂一樣多」（Putnam, 2000, p. 333; DDB Needham Life Survey data）。同樣地，經濟學者 Oswald 粗估說，結婚帶來的快樂差不多與你每年的薪水增加十萬美金所帶來的一樣多（Donovan and Halpern, 2003）。²

普特南認為「這些發現幾乎不會令美國人感到訝異」（同上，頁 332），不過我倒不像他那麼肯定。在問卷調查中要求（美國人）直接評估不同類目對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性時，財務狀況往往位居首位，而且其數值一定比婚姻或家庭生活高出許多（Campbell, Converse and Rodgers, 1976）。因此，雖然資料很明顯地指出個人關係對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性高於收入的重要性，一般人的想法卻反

² 這些龐大的金錢總額有部分是收入與快樂兩者關係的函數。

其道而行。

生理健康

我們或許會覺得心理健康（尤其是憂鬱症）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並不令人驚訝，大多數人都猜想得到這種結果，但生理健康呢？

81 結果是，支持性關係的缺乏也能預測各種生理疾病。文獻所記載的影響包括：另一半死亡後兩年內配偶死亡率顯著提升；分娩時生理上發生併發症的頻率；在熱浪侵襲中死亡的可能性。我們以最後這一項為例，近年來有個針對芝加哥受熱浪侵襲的分析發現，那些死去的人有超高比例具有社會孤立的傾向（Klinenberg, 2002）。³ 支持性關係甚至成為對抗一般感冒的緩衝（事實上是已知最有效的保護因素之一）。Sheldon Cohen 曾謹慎地進行不少控制變項的實驗，刻意將受訪者分為兩群，一群服用一般感冒藥，另一群則服用無害鹼鹽，實驗發現在其他因素都被控制的情形下，個人罹患完全感冒的機率，強烈地受到他的支持關係所影響（Cohen et al., 1997）。

早期的貫時性研究，恰能說明正向的個人關係能帶來顯而易見的保健功用。在 1950 年代，一群被隨機選取的哈佛學生被問到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是否良好。35 年後再去檢視他們的醫療記錄，發現當時認為自己與父母關係很溫馨的、親密的人，約有略低於一半（47%）的人在中年時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疾病；但那些將自己與父母關係描述為緊張的、冷漠的人，全數（100%）都在中年時診斷出患有嚴重疾病（Russek and Schwartz, 1997）。同樣地，有項針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男學生追蹤 50 年的調查發現，那些將親子關係描述為親密、充滿愛的人，很明顯地較不容易在這段時間內患病，也較不容易在當下為疾病所苦（Thomas and Duszynski, 1974）。事實上，生命早期父子關係的親密程度已被發現是一個預測往後是否會罹患癌症的最佳指標，甚至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的行為及社經因素後仍是如此。

在面對壓力所產生的負面效果時，支持性關係似乎是一項特別重要的緩衝力量。例如，研究者發現在經歷過生命中重大轉變的孕婦中，缺乏支持性關係的準媽媽罹患生理併發症的比率要高出其他人三倍（Nuckolls, Cassel and Kaplan, 1972）。

³ 同樣的模式也可在更近期一份法國 2003 年夏季的記錄裡清楚地看到（Tom Sander, Harvard, 私人信件）。

一如在本章剛開始時提到過，健康與人際關係之間的因果關係很難在方法論上釐清。然而，採用執行上困難（同時成本很高）的貫時性研究，可將這項爭論往前帶一大步。除了一些懷疑至上的死硬派之外，這些研究的成果已說服了所有人，人際關係的品質確實對其心理與生理健康造成實質上的影響。一篇最近的評論提到：「有項橫跨美國、北歐、日本等各國歷時過去 20 年，針對 12 個世代團體進行的追蹤性研究指出，孤立或不與他人連繫的人，有越來越高的早逝機率。」（Berkman and Glass, 2000, p.158-9）這類的研究比起橫斷性研究要更能免於被批評，因為個人對其社會網絡所做的評估，此動作要早於疾病的病發。上述引文的作者之一 Lisa Berkman，本身就是執行 Alameda 郡這些重要追蹤性研究裡的代表性人物（Berkman and Syme, 1979），在 1964 年這個研究一開始，社會連帶是由評估婚姻狀態、與朋友、與親人接觸的情況、參與教會及團體與否所組合而成的指標來測量。隨後，受訪者經過了九年的追蹤，在 1974 年完成。結果發現，在研究初期缺乏社會連帶的男性及女性，在研究期間死亡的比例要比擁有較多社會接觸的人高 1.9 至 3.1 倍。即使控制了抽煙、飲酒這類影響健康的行為，以及運動、預防性健康檢查、一些與健康有關的基本數值以後，社會連帶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會改變。更進一步來看，死亡風險的提高並不僅源於單一病因。那些缺乏社會連帶的人，更容易死於缺血性心臟疾病、腦血管及循環系統疾病、癌症以及所有其他的死亡因子（一個殘餘範疇）。

82

所有追蹤性研究都發現十分類似的結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孤立所引起的死亡危險增高的現象，在女性身上要比在男性身上較不一致（效果在兩性身上都會看到，請參考 Berkman and Syme, 1979; Orth-Gomer and Johnson, 1987；但是，主要在男性身上的研究有 House, Robbins and Metzner, 1982; Blazer, 1982; Schoenbach et al., 1986; Welin et al., 1985; and R. M. Kaplan et al., 1988）。支持的主觀品質比社會互動的客觀數量對死亡率造成更大的影響，這與心理健康領域的文獻所發現的結果很類似（Blazer, 1982；請一併參考之前的討論）。一般而言，相較於擁有強社會連帶的人來說，社會孤立的個人早逝（不論因為何種原因）的風險會高出二到三倍（Berkman and Glass, 2000）。

針對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論。有些針對罹患心肌梗塞（MI，或俗稱心臟病）的人所做的研究指出，那些擁有親密社會連帶的人比起社會孤立的人，在發病後數年間存活下來的可能性要高出許多（Ruberman et

al., 1984; Orth-Gomer and Johnson, 1987; Berkman et al., 1992; Case et al., 1992)。一般而言，社會孤立者相較於擁有緊密社會連帶者，在心肌梗塞發生後幾年間死亡的風險要高出大約三倍。至於在心肌梗塞第一次發病過程中社會連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則在學界尚無定論。有些研究找到了關聯性（例如 Orth-Gomer et al., 1993），而其他研究則未發現（Kawachi et al., 1996）。這樣的結果或許部分反映了方法論上的問題，即是否擁有夠多的追蹤樣本數目以在統計上找到顯著的⁴效果。同時，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也告訴我們，社會孤立的動物比起較不孤立，罹患動脈硬化症或血管阻塞的可能性要高出許多（動脈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發展過程裡很重要的一個過程）（Shiverly, Clarkson and Kalpan, 1989）。

這些結果指出相較於一個人是否罹患疾病的風險高低，社會網絡對其死亡率的風險高低會有更大的影響（Vogt et al., 1992; Kawachi et al., 1996）。換言之，若說社會網絡讓你免於生病的威脅，倒不如說它在你生病時，對你的康復較有幫助。這就類似 Brown 與 Harris 所提及社會網絡對憂鬱症的緩衝效果——社會網絡無法保證你不會面臨生活中常見的困境，但卻可以助你平安度過它。

最後，同時也是最值得一提的證據是來自實驗性干預研究的成果，這些研究裡擔任實驗組的個人接受了社會網絡的支持，而對照組則沒有。例如，有個研究是將患有心臟病的男性隨機分配到三組內。一組完全沒有額外的支持；第二組則有人提供飲食、運動及心血管的病理生理學等相關資訊與建議；第三組不但有人提供與前一組相同的服務，而且還參與了病友支持團體（support group）。五年過後，我們發現有接受建議與資訊的人比起沒有的，其心臟病再發率較低（前者是 21.2%，後者是 28.2%）；再者，那些同時參與了病友支持團體的人，其再發率下降得非常多，僅有 12.9% 而已（Friedman et al., 1986）。

有人批評 Friedman 等人的研究說，支持團體其實是專門針對 A 型人格（譯註：心理學家認定的所謂 A 型人格，是指性急、求好心切、好強爭勝的一種性格，同時這種人格類型被認為與心臟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有高度相關）或易生敵意的行為，而這可能解釋了為何支持團體的功效如此顯著，所以並非支持團體本身真的這麼管用。然而，這類批評卻無法抹滅另一項類似的研究所印證的結果，該研究是針對罹患轉移性乳癌的女性。這些病患被分為兩組，一組僅接受一般醫療照護，另一組在接受相同療程的同時，也鼓勵她們每個禮拜花

⁴ 即使樣本數有好幾千人以上的問卷調查中，也僅有極少數人在當時患有心臟病一年或二年。

90 分鐘的時間見一次面，為期一年。結果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這些定期見面的女性存活率竟比控制組的要高出一倍（Spiegel, 1993）。同樣地，Fawzy 等人的研究發現，將罹患惡性黑色素瘤或皮膚癌的病人隨機分成兩組後，參加為期六週支持團體的那一組在六年後的存活率，明顯比另一組要高（Fawzy, Fawzy, Hyun et al., 1993）。一如因發現飲食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能有效減低心臟病發生而聞名的醫學研究者 Dean Ornish，對這些結果所做出的結論：「如果有間大藥廠發現了 X 藥能讓罹患轉移性乳癌的女性存活年數增加一倍，我想幾乎所有的醫生都會在處方裡開立這藥……，在醫學期刊與時事雜誌上會有全版的廣告宣稱它的療效」（Ornish, 1998, pp. 56-7）。倘若未來介入性的研究證實這些結果，那麼可想而知屆時醫學將不只視社會資本為促進健康的一項可能因素，同時也是治療疾病的方法。

84

探索因果的路徑：壓力的角色

為何社會網絡與支持如此普遍地保護個人的健康呢？這是一個有趣的謎題。答案的一大部分似乎在於「壓力」所產生的作用，包括身體對它的反應、社會支持如何影響它。將時間拉回到 1930 年代，Hans Selye 在其醫療執業過程中注意到，不管檢查病人不適的類別為何，病人常會抱怨自己全身關節及肌肉酸痛、腸胃不舒服、沒有食慾、體重減輕，以及其他一般性的症狀（Selye, 1956）。Selye 從這些臨床觀察出發，進而在實驗室中對老鼠進行研究。他發現不論老鼠所接觸帶有警告或傷害意味的因子是什麼（例如細菌感染、創傷、冷熱或其他刺激），在任何一個特定因子所造成的傷害之上，還外加了某種程度的非特定性傷害。

Selye 假設，在面對到這類威脅時，有機體將展現出一種一般性、非特定的動員反應——即所謂一般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剛開始是一種警告性的反應，由共感腎上腺髓部系統引發的身體改變、消化過程受到抑制、新陳代謝活動加速進行（即攻擊或逃避（fight-or-flight）反應），伴隨的是壓力源也會愈來愈敏感於外在變化。如果這個初始階段延續下去，那麼有機體將邁向一個所謂抵抗的階段，這是由下丘腦腎上腺系統驅動的，將會維持一個較高的新陳代謝率以及血糖濃度，而同時會降低性慾，最終也會抑制免疫系統的活動。最後，如果有機體持續曝露在密集的壓力下，那麼它將進入精疲力竭的狀態，行為和生理調適的儲備能量將被耗盡，身體會變得對疾病極度

缺乏抵抗力 (Selye, 1956, 1978; A. Baum, Singer and Baum, 1982; Kiecolt-Glaser et al., 1994, 2002)。

85 一般適應症候群可解釋各種不同類形的壓力源為何導致基本上很相似的結果。就像 Freeman (1986) 提到的：「我們看到的現象，不論是決定它的因子及它的結果，都是非特定的……，促使一般性地對疾病缺乏抵抗力，而不是扮演一個特定病原學上的角色。」(p. 293) 我們可用一個簡單直接的想法來理解這個情形：受到壓力的有機體會忽視例行性的、能維持身體健康的功能，因此表現出加速老化的效果。

較少被提到的是，Selye 也觀察到有些「治療方式」的確具有非特定性的療效，像休息、吃較軟的食物、甚至是放血。親密的社會網絡是另一種非特定性的治療方式嗎？答案似乎是「沒錯」，目前也有快速累積的醫學文獻，試圖理清這當中的過程。

雖然持續的壓力似乎會驅使身體去壓制生物性自我維護的功能，尤其是免疫系統的作用，但正向的社會人際關係似乎會產生另一個方向的效果 (Kiecolt-Glaser et al., 1994)。今日的研究已顯示，具有較廣泛的支持性社會網絡，將大大減少感染從一般感冒到愛滋病毒各類疾病之可能性，而這過程有一中介變項，即免疫系統的功能得到改善 (Cohen et al., 1997; Therell et al., 1995)。

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確認在壓力、社會連帶、健康之間的因果路徑究竟為何。很明顯的是，不論是在人類或其他哺乳動物身上，支持性社會人際關係都能帶來緩和或抑制壓力所帶來的影響，但更確切的細節仍有待探索。至少有以下四條路徑是有可能的。

首先，具有支持性關係，意味著個人面對的壓力較小。根據生活事件量表的測量，人類壓力的一大部分乃與社會網絡的崩解或缺乏有關。事實上，有人認為一個人必須因應的最嚴重壓力源與社會支持的情況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深愛的伴侶或親人過世 (T. H. Holmes and Rahe, 1967)。

第二，我們已知社會支持有助於舒緩壓力的影響。在最淺顯的層面上，社會支持能藉由提供替代性、補充性或工具性的支持，來緩衝個人遭受特定損害或威脅時的傷害。如果你失去了一筆錢，但你擁有一個富有的親戚能助你解圍，那麼相較於一個缺乏這類支持的人來說，缺錢對你生活安適程度造成的威脅就會小得多。其實，在開發中國家的一般日常生活情境下，這種支持可能創造出天堂與地獄般的差別來 (Woolcock and Narayan, 2000)。在歷經饑荒或其他

天然災害後是否能存活下來，關鍵在於你是否擁有一個會相互分享食物、飲水以及遮避場所的家族或社群網絡。同樣地，即使自己是社群中最貧困的一群，但生病時仍可以因為家族或朋友一同負擔花費，而得到昂貴的醫療照顧（Aye, Champagne and Contandriopoulos, 2002）。

86

支持也有助於個人心理及情緒上的提升，改變我們對壓力事件的解讀，或給予我們處理壓力事件的心理力量。以下的實驗正可做為例證。在實驗中，個人必須公開發表一段談話，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壓力的，而且與古典理論中的壓力反應是有相關的。受試者當中有些人被告知：只要有需要，門外有人將隨時給予協助，即便實際上他們並未得到任何協助，但對壓力的反應仍較為和緩，不論在講話前或講話中所測得的血壓都較低（Kamarck, Manuck and Jennings et al., 1991）。這樣的結果吻合了長期以來的研究成果，即產生影響的不只是壓力本身，還有如何看待壓力，以及是否覺得壓力可以被控制（Glass and Singer, 1972）。

第三，社會支持可以形塑人對壓力的行為反應。例如，你在面對危機時是否會在創傷中被淚水和痛苦淹沒，還是會試圖找尋更合適的解決之道，這端視你周遭的人所提供的引導與支持。這也決定於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以及你是否正面地看待自己（你的自尊以及對自己能力的信心），而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也反過來地受到「你感覺他人如何看待你」所決定。在這個方面，我們會看到諸如抽煙、喝酒、不愛運動、飲食習慣不良等有礙健康的行為，與社會孤立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Berkman and Syme, 1979; Berkman and Glass, 2000）。

第四點也是較細微的一個面向，即個人對壓力的基本反應是受到生命早期支持關係之品質所影響。Selye 在早期的實驗中提到，持續曝露在壓力之下，將導致生理及行為上的長期調適。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早年受到過多壓力的經驗，可能讓人在日後的生命中對壓力的反應過於敏感（Gunnar and Nelson, 1994; Suomi, 1997）。這類反應的情況將有助我們去解釋以下的發現：孩子年幼時處在家庭長期不和的情況下，長大後在 30 到 75 歲之間的死亡率將比一般人高出 50%（Lundberg, 1993）。

小結：個人網絡對健康的影響

總而言之，那些討論緊密的、值得信任的個人關係，對健康產生的正向影響的文獻是極具說服力的。普特南認為：「照統計看來，能證明社會連結對

87

健康產生效果的證據，就如同最初外科醫生對抽煙所做的報告一樣有力。如果社會上日漸趨向互不連結的趨勢就像我們認爲的（在美國內部）那樣普遍的話……，那麼『獨自打保齡球』就代表這個國家當前公眾健康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之一。」（Putnam, 2000, p. 327；請看第七章，針對社會資本的趨勢有所討論）這個說法引發了若干的爭論。問題當然依舊存在——例如，在生理健康上的保護效果，爲何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要顯著的多。然而，主要的結論仍是簡潔明瞭的：緊密的個人關係，尤其是親密且值得信任的人際關係，普遍上對個人心理健康、快樂程度、生理健康都具有十分正面的影響。

中觀層面：社群與健康

就像之前的章節所提到的，影響個人健康的不只是親密的個人關係而已。擁有較多的朋友、上教堂、參與志願性社團，大致來看也都會對健康產生若干正面的影響。不管是來自貫時性或橫斷性的研究成果，都印證了以上說法。

個人層面的調查資料顯示，朋友情誼、社群以及因工作建立起的社會網絡，都對健康有正向的效果，這也指出對健康而言，社群或中觀層面社會資本所占有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者認爲，中觀層面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個較爲嚴謹、適切地測試中觀層面（或區位）效果的真正方法，則是探討是否從這個層面解釋健康，能在個人層面上超出人際關係帶來的效果，或說是否前者產生效果的層面在後者之上。在工作上或鄰里之間擁有支持性友誼的個人，較可能感到快樂或較健康，這是一回事，但底下的說法又是另一回事：有些廠商或某些鄰里創造出一個正面的氛圍，使得平均生活安適程度比起僅從個人處境來預期的有所增加。有個頂尖的研究團隊所進行的研究，也足以讓他們宣稱這些個人層面的效果應該被指稱爲社會支持，而「社會資本」一詞應單獨保留給較高層面的「環境」效果——即中觀層面或鉅觀層面（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請看第一章）。

心理健康與快樂

88 本章一開始即引用涂爾幹討論自殺的研究，此著作可說是研究社會凝聚對心理健康之影響的經典之作。然而，跟隨他步伐研究心理健康的後進中，絕大多數都把焦點擺在個人而非社群層面的效果上。

Brown 與 Harris 對憂鬱症的經典研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當中使用自己領域的專門用詞。這兩位研究者下結論道，唯有親密的人際關係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他們認為，沒有證據顯示鄰居或更大的社群對心理也有影響（Harris，私人信件）。然而問題是，從他們的研究方法出發，根本無從得出上述的論斷來。該研究乃針對單一城市內某個小地區中的幾百位婦人，研究設計上也未含納明顯不同的鄰里或社群脈絡，因此在這份研究裡，更大的脈絡根本不可能解釋任何的變異。

有一些研究納入了有關鄰里地區的問題，當中發現鄰里地區與個人陳述的心理健康有著顯著的關係。例如，一項以英國家戶調查（British Household Survey）進行分析的研究發現，陳述自己鄰里的社會資本程度低的人與自陳鄰里社會資本程度高的人相較之下，其精神狀態不正常的可能性是二倍之高〔以 12 個項目的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裡得分超過三分者，McCulloch, 2001〕。然而，這種研究裡的鄰里社會資本乃仰賴個人陳述，因此可能受到表達偏誤的影響。

跨文化研究已指出，較傳統的社區內存在著較緊密、凝聚力較強的社會網絡，有助於解釋為何他們所陳述的心理疾病程度往往較低。例如 Old Order Amish 是賓州境內一個嚴格的教派，如今仍維持一個緊密連繫、封閉的社群，竭力與現代世界隔絕。有項針對它的研究發現，Amish 成員為憂鬱症所苦的比例出奇的低（Egeland and Hostetter, 1983）。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罹患憂鬱症的比例上並未有男女的差異，這也反駁了「西方的女性有較高的罹患憂鬱症比例，是因為生物性因素所致」這種普遍說法（Watts and Morant, 2001）。

針對這類跨文化的研究，有一種質疑聲音：這些發現可能反映出的是不同文化在陳述自己症狀時表達方式上的差異。為了克服以上質疑，我們得轉向下列的研究：針對居住在不同社巷群脈絡但型態類似的個人或團體，以他們的心理疾病比例相互比較。

很多這類的研究已在進行，其結果是：同一種族群、宗教甚至是職業團體的成員彼此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時，此團體內類型相似的成員擁有心理疾病比例較低。早期在芝加哥進行的一項研究也為我們證實了這個效果（Faris and Dunham, 1939）。研究者發現，居住在以黑人為主的社區中的黑人，與住在以白人為主或人種混居地區而生活較優渥的黑人相比，前者的心理疾病程度要較後者為低。

這種結果即所謂的「團體密集效應」(group density effect)，如今在許多脈絡下的各種團體中被發現(欲見概要，請見 Halpern, 1993)。這種效應格外令人驚奇，例如少數族裔團體經常住在各種不利因素兼具的地區，即使一般而言，我們會以為當地居民的心理與生理健康情況會較糟；相對地，那些身為少數族裔的個人，倘若藉由經濟的改善而「逃離」原來種種條件不良的地區，住進較富裕的地區，我們會預期(透過挑選及簡單因果推斷)這些人將享有高於一般水準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狀態。結果再次令我們感到驚訝，它絕不可能是社會挑選下的結果，而必定是某種「社會因果關係」(social causation)下的結果。最合理的解釋是：被鑲嵌在一個社群裡，就擁有更多來自朋友、親人的支持(黏著性社會資本)，也可躲避外在在大環境直接的歧視(Halpern, 1993)。

唯一可信的替代解釋則是：這些發現是住在不同集中程度地區的少數族裔團體成員，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所造就的結果。例如，住在團體集中度高地區的少數族裔團體成員，較不會融入主流文化，於是語言上的差異或是不同的陳述模式或許就能解釋團體密集效應。然而，有一份研究以住在英國的各種族裔團體之心理健康為議題，大規模且嚴謹地檢測了這種解釋。受訪者可以選用自己喜歡的語言來進行訪談，針對那些似乎有心理疾病的對象則再進行追蹤性的確認，同時整個研究過程中都採用與受訪者相同族群身分的訪問者。再一次，我們見到在來自少數族裔的個人當中，住在團體集中度高的人比住在團體集中度低的人享有較佳的心理狀態，雖然前者飽受客觀環境不利之苦，後者生活的地區通常較為富裕(Halpern and Nazroo, 2000)。在統計上即使控制了融入主流文化以及英語流利程度的條件，我們仍可發現該效果是顯著的。

另一項發現也能印證鄰里對生活安適感潛在的影響力有多大，即居住滿意度受到與鄰居相處好壞的影響，要比住處物質條件的影響更大(Halpern, 1995a)。例如，研究發現65歲以上的老人家的主觀生活品質，顯著地受到個人及鄰里的社會資本所影響，儘管我們控制了社會期待、人格特質、心理特質(傾向樂觀—傾向悲觀)、健康情形、財富多寡(Bowling et al., 2002)。相對地，社經差異所具有的解釋力則非常有限。

雖然團體密集效應已被證實可信，但偶然出現的例外仍被會提出來。例如，有些學術著作告訴我們，愛爾蘭某些地區的天主教徒間，或英國的巴基斯坦社群中，存在著負面的團體密集效應(Halpern, 1993; Haloerb and Nazroo, 2000)。就像在個人層面曾提過的，我們應該對以下的預設謹慎以對：所有關

係及社群都一致地對心理健康有助益。不管是關係的特質、團體內的需求等，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以下是說明社群對心理健康而言有如兩面刃的例證，即有證據顯示在較高社會資本的地區，本來就患有精神病症狀的人再次回到醫院就診的比率較高（McKenzie, 2000；社會資本被操作化為具有高社區安全程度的地區）。McKenzie 推斷說，這是因為社區對偏差行為的容忍度較低使然。同樣的效果也在另一個案例裡發現：本就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在社區抗爭搬遷政策過程中的情況。當居民認為該社區將被夷為平地，他們尋求醫療諮商的次數將會增加，但本就患有精神疾病者的次數卻會減少；但當該社區成功地被保留下來，而社區居民士氣高昂的同時，一般居民進行醫療諮商的次數會下降，但曾患精神病者的次數卻會上升（Halpern, 1995a）。

這種社群對心理健康的潛在雙面刃效果，也可以在古典研究裡找到例證。涂爾幹討論自殺的研究不斷被引述，被視為證明社會網絡、社會整合擁有使個人遠離自我毀滅舉動之力量的完美例證（例如 Putnam, 2000; Berkman and Glass, 2000）。就如我們在本章開始看到的，涂爾幹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證據，說明強而有力的社群連結具有潛在保護效果，能抵禦自殺的危險。大多數的資料都有力地支持以下的命題：社會孤立的人具有較高的自殺風險，而較為「脫序」（anomic）、個人主義傾向的文化，有著較高的自殺率。然而，涂爾幹也提供一個恰恰相反的明顯例子，只是較少為人們所引用。他觀察到，軍隊中的自殺率是一般人的十倍之多。

乍見這個事實會令人十分訝異，因為我們或許會認為有許多因素會護衛著軍隊以至於不會去自殺。首先，從生理的角度來看，組成軍隊的人象徵著該國的菁英，是經過嚴格的挑選後產生的，沒有任何身體上重大的缺陷。再者，團隊精神以及正常的生活應該也有預防的效果，一如它們在其他地方產生的作用一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的自殺率如此嚴重？（Durkheim, [1987]1951, p. 229）

涂爾幹檢視這是否因為軍隊中有著極高比例的未婚男性等因素所致。但軍隊自殺率仍比該國的未婚男性要高出許多。他繼而檢視這是否為菜鳥新兵想用來逃避服兵役義務的偽裝法，但發現自殺率乃隨著服役年資的增加而提高（雖然在入伍頭幾個月確實比較高）。接著，他檢視是否因為服役情況的辛苦程度

和條件差異所導致，但卻發現在工作條件最佳的菁英單位裡，自殺率一直都是最高的。

涂爾幹的解釋是軍隊生活方式的特性——緊密網絡及強調責任，激發出他所謂「利他型」或「英雄主義式」的自殺。他認為軍中的行為規範及講求榮譽至上，雖然可能讓軍隊更有效能，但也意味著個別的士兵有時會因為其實無關緊要、但關乎榮譽或面子的事情，而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也解釋了以下這個看似矛盾的發現：雖然最傳統且社會最具凝聚力的國家擁有最低的總體自殺率，但該國的軍事人員卻擁有最高的自殺率。看來這股在公民場域中把人束在一起、保障人們免於自我毀滅的力量，在軍隊場域（處理暴力相關事務的高度反個人主義的緊密組織）中卻產生出恰恰相反的結果。這也一併解釋了那個最終的謎團：在涂爾幹寫作的年代中，許多有助社會凝聚的傳統力量都開始翻攪，雖然普遍來看自殺率向上增加，但是每個地區內的軍隊自殺率卻都在下降。

生理健康

健康相關的文獻中充斥著環境的效應。你可以想像：一個致命的病毒，能在人群之中較容易地被散播開來；如果有某些離群索居的人染上了這疾病，儘管他們可能死亡，但整體造成的傷害卻是有限的。如果這些人是住在熙來攘往的都市中，則勢必會釀成大禍。顯然，這個病毒對人類造成的衝擊可大可小，端視整個脈絡而定，也就是在這裡面大大發揮作用的「環境效果」。

92 如果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社會資本影響了生理健康，那麼我們應該檢視在社群健康中難以被化約為個人特性的變異。我們可以舉一份以 Roseto 為對象所進行的優秀研究為例。Roseto 是美國賓州的一個小鎮，研究者注意到該鎮的死亡率奇低無比，難以單憑如抽煙、飲食習慣、運動這類個人危險因子就能解釋（Bruhn and Wolf, 1979; Egolf et al., 1992; Wolf and Bruhn, 1993; Wilkinson, 1996）。尤其像心臟疾病這類老年人易患的疾病導致的死亡率，更是鄰近鄉鎮的一半不到。儘管 Roseto 鎮民熱愛烹調高脂肪類不健康的食物，但心臟方面的疾病卻還是很少見。

我們以這個義裔美籍的 Roseto 社群中長達 20 年期間的資料，與其他鄰近的社群相比較後，證據強烈地指向是文化特徵（社會組織的各種特質）以某種方式影響了個人免受心肌梗塞或猝死威脅的能力。這其中隱含的意思

是說，一個在情緒上有支持作用的社會環境是具有保護功能的。同時反過來看，缺乏家庭或社群的支持，或是在社會上未被賦予明確的定位，這些因素都會構成危險因子 (Bruhn and Wolf, 1979, p. 134)。

研究者發現 Roseto 當地居民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群人，同時具有平等主義傾向的生活氛圍。這個城鎮內居住的大多是義裔美國人，其祖先於 1880 年代移民到這裡來，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特殊的城鎮文化：

感覺有共同目標，彼此之間共享著同志情誼，這使得富人不至於招搖，窮人不至於困頓，人們會關懷鄰居，任何鎮民都不至於被忽視、拋棄。這個突出的社會凝聚模式以家庭為軸心和生活上的堡壘，提供了一種能對抗各種大災大難的安全和保障，這一點乃與當地鮮少有心肌梗塞、猝死的現象有關聯 (Bruhn and Wolf, 1979, p. 136)。

Roseto 地方的人難道只因擁有心臟健康的基因，所以才這麼幸運嗎？不，我們知道答案不是如此，因為就在醫學研究者開始研究 Roseto 的時期，這個彼此緊密交織的城鎮社群也正正面臨著動盪。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在 1970 年代，美國其他地方的物質主義傾向所衍生的習性正進入這個小鎮，年輕一輩開始偏離了小鎮本身的公民習性。在這些變遷下，小鎮的罹病率開始急遽升高，到了 1980 年代，當地心肌梗塞的比例事實上比鄰近其他鄉鎮還高 (Egolf et al., 1992; Wolf and Bruhn, 1993)。

93

Roseto 與其鄰近地區在死亡率上的差異並非單一個案。例如，英國政府近來的一項報告指出，在曼徹斯特 65 歲以下冠狀動脈引發的心臟病的死亡率，幾乎是生活愉悅的倫敦郊區 Kingston 及 Richmond 的三倍之高 (在 1996-1998 年間，前者是 10 萬分之 74，後者是 10 萬分之 25；Department of Health, 2000)。同樣地，研究顯示，在心臟疾病中有一顯著程度的變異得歸因到地區而非個人層面的因素 (Hart, Ecob and Smith, 1997)。然而，過去並未有官方統計數據將社會資本的變項含括進來，因此無法得知數字中究竟有多少程度可歸因到地區性變項。大部分的變異量都是由飲食、生活型態、與貧窮相關的壓力等非社會性的變項來解釋。我們實在無從得知其他的可能。

然而，就和心理健康的文獻一樣，我們發現研究鄰里社區的種族構成狀況

以及健康之間關係的成果，能提供我們重要的證據，來說明社群層面對生理健康的效果。

例如，有項在芝加哥進行的研究發現，社區中黑人居民占的比例愈高，則當地黑人嬰兒出生時體重過輕的比例就愈低，即便在控制了母親個別的相关變項後仍是如此 (E. Roberts, 1997)。換言之，即使黑人貧民窟的生活情況較匱乏，但在那裡出生的嬰兒，出生時的體重較重（這不僅對孩童時期，也是其一生健康的重要指標）。同樣地，一項針對紐約 166 個社區進行的研究發現，住在以黑人為主之社區的黑人，因心血管疾病或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比例，比起住在白人社區的黑人顯著較低，這是在控制教育、職業別、貧窮情況、就業與否、收入及出生地後所得的結果 (Fang et al., 1998)。最近有一項針對德州居民心臟病導致死亡所進行的多層面分析發現，黑人與西班牙裔人士若住在自己族裔占較高比例的社區中，他們因為心臟疾病而死亡的比率，低於住在族群組成較異質的社區的同胞 (Franzini and Spears, 即將出版)。即使在控制犯罪情況、住自宅者的比例、房屋市價、教育程度之後，社區造成的效果仍是很明顯的。

94 這些研究所發現的社區效果，事實上並不是非常巨大（通常能解釋的變異量範圍在 5% 到 10% 之間）。儘管如此，結果仍是令人吃驚的，因為這告訴我們，從同一社群的其他成員所得到的支持，與住在匱乏社區中造成的負面影響相比，前者要比後者來得強而有力（尤其是在心理健康上；請見前面的討論）。

反過來看，我們也必須考慮社會網絡是否可能使疾病更加惡化，因而對健康產生負面的效果。基本上來說，黏著性社會資本應該會使社群中傳染病蔓延的情況更快，就像乾燥的天氣會加速森林大火的道理一樣；架接性社會資本應該有助於傳染病從某社群散播到另一社群。一些針對疾病散播的研究，的確支持以上這些命題。疾病的轉移乃大大為社會網絡的模式所形塑，並且可以藉由以下因素所預測：網絡的密度與組成的狀態、來往交通的情況、人與人之間其他的接觸模式 (Neaigus et al., 1994; Morris, 1995; Wallace and Wallace, 1997)。因此，社會網絡的密度與特質能預測使用藥物的頻率，以及愛滋病散播的情況 (Newcomb and Bentler, 1988; Latkin et al., 1995; 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Lovell, 2002; Soskolne and Shtarkshall, 2002)。⁵

⁵ 一個有趣的例外就是，在那些垂垂老矣、病奄奄之吸毒者不幸的陰影下被養育成人的年輕人，較有可能遠避吸食毒品之害，如此徹底反向的效果實在很少看到 (Lovell, 2002)。

另一方面，一些實驗的成果顯示，倘若接觸到了傳染病的媒介，支持性網絡就會產生對抗疾病的保護作用（Cohen et al., 1997；請見上述的討論）。更進一步來說，社會網絡（尤其是當它帶有高度信任、相互關懷的特質時）若從健康行為的角度來看，正是散播「良性」行為的一個很重要管道。Berkman 與 Glass 也提到：「從網絡的價值觀及規範衍生而來的社會影響力，將構成網絡影響健康過程裡一個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的途徑」（2000, p.146）。這個影響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得看這些規範及價值觀的性質、被傳遞的知識之準確性而定。例如，在控制了性別、族群、社會階級等變項後，我們發現學校的整體氣氛與孩子是否會抽煙，兩者之間有顯著的關聯（Wuille and Schenkel, 2002）。同樣地，瑞典一項針對公共健康的調查發現，社區對體力不佳與否有強烈的影響，但社會資本本身並未影響體力不佳與否，也不受體力不佳影響（M. Lindstrom, Moghaddassi and Merlo, 2003）。

研究 Almada 郡的資料顯示，一般而言，社會資本帶來的影響裡，正面的要較負面的多；具有較高社會整合程度的人，會擁有較低程度對健康有高風險的行為（Berkman and Glass, 2000）。這反映出的不只是心理上的因素，也包括知識的因素。例如，社會孤立的人可能因為缺乏知識以至於無法戒煙，也可能因為他視抽煙為自己生活中極少數的愉悅之一，因而戒不了煙癮（Marsh and Mackay, 1994）。

小結：住在凝聚力強的社群中，為健康帶來的好處

由上述看來，我們不能預設一個凝聚力強的社區總是可以為其成員的健康帶來幫助，雖然凝聚力強的社群一般都會產生這類益處。對生理健康以及與健康相關的行為而言，社會資本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群本身的文化以及習慣。如果你的社群積極鼓勵你抽煙，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太可能對你的健康有太大助益。

超越個人因素或在個人層面之上的社群效應，一般據評估後認為是相對較不強烈的。我們認為社區發揮的效應，事實上必定是經由個人自身的社會資本之品質來中介，雖然以下這一點也必須謹記在心：後者本身有部分也是被環境的因素所決定的。對個人來說，在一個由心之所向相同、文化類似的個人所組成的社群之中，要建立起一個緊密且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將是較容易的。對弱勢團體以及少數族裔而言，避免與具敵意的他者或直接的歧視等接觸，也可

能造成若干影響。

相對而言，我們很少看到哪些研究能處理方法論上的困難，並能辨識出社會資本在社群層面對健康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因為很少有資料在蒐集時考慮到社會資本，至於能將社群層面的結群包括進來的就更少了。這種情況如今開始有了轉變，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人們逐漸認識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例如，醫學流行病學家一直在思考，為何住在芬蘭的瑞典裔少數族裔（約占總人口的5%），擁有較長的預期壽命，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社會資本因素所導致的，就跟在美國的 Roseto 鎮中所看到的一樣。這股較為濃厚的興趣意味著在未來幾年內，我們應該可以對社會資本在中觀或社群層面對健康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瞭解，同時，我們應該會有範圍更廣的例子可供徵引。

鉅觀或國家層面

96 我們在本章一開始看到涂爾幹對自殺的解釋，他認為在普遍環境中必定存在著某股力量，驅使著毫不相干的人們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由於自殺很少發生，所以自殺的人不太可能認識彼此或共享一個緊密的網絡。相對來說，他們之間共同連結必定是源於更高層面的社會型構（也就是說，是在文化上或鉅觀層面上的連結）。

心理健康與快樂

令人好奇的是為何今日相對而言，較少有研究直接檢視以下的假設：各國人民罹患心理疾病比例的差異，有一部分可以由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所解釋。這或許大體上反映出針對不同國家之間心理健康數值的可比較性上的爭議。事實上，官方的心理健康數據（諸如因為精神失常而強制拘禁）或許向我們透露出更多的訊息是關於法律架構、提供服務的情況，而不是心理不適的比例。同樣地，各國到很晚近才開始進行以國家層面或社群層面心理健康為主題的調查研究，直至今日這類調查仍很少見，也尚未將彼此的項目標準化以便進行跨國比較。

然而，已有針對快樂及生活滿意度的跨國比較研究出現了。各國之間的差距是很可觀的。例如長期以來，丹麥人陳述出的快樂程度及生活滿意度，都比法國人及義大利人高出許多。將超過 15 個從 1970 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計量調

查的歐洲國家資料加總，合計之後的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約有 55% 的丹麥人陳述對生活「非常滿意」；相對而言，義大利人或法國人只有約 10%。

最近以來，對各國間差異的解釋都朝著以下的方向進行，即認為它們只不過反映出資料中的「雜訊」罷了，尤其是在表達上的文化或語言差異；丹麥人並非真的比較快樂（他們只是口頭上說比較快樂而已）。但這種懷疑論式的解釋遭遇到一些論點的駁斥。首先，針對測試裡關鍵個案的再檢視結果告訴我們，語言差異並無法完全解釋國家間的差異。許多人特別注意的是瑞士，這個講法語、義語、德語的人混聚在一起的国家。結果發現，不論他們講的語言為何，瑞士人陳述出的快樂程度顯著高於與他們擁有相同語言的法國人、義大利人及德國人（Inglehart, 1990）。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比利時，在該國講法語的人和講法蘭德斯語的同胞幾乎是一樣快樂，而前者又比同講法語的法國人要快樂的多。如此看來，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別，而非使用的語言。更為重要的是第二點，雜訊是隨機發生的，因此也應該產生隨機的模式來，然而就像底下所要談的，事實並非如此。

這些差異能以社會資本解釋嗎？丹麥人不但自覺較快樂，他們陳述出的社會信任也是比較高的（相較於法國人與義大利人；請參考圖表 2.1）。如果我們把檢視的國家範圍增大，把歐洲以外的工業化國家也含括進來，我們會發現在社會信任與生活安適程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的正相關（ $r = 0.66$ ；資料得自世界價值觀調查）。這是一項有趣但尚不能具體達成定論的發現，就像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高信任的國家往往比較富裕（有可能部分可歸因於它們的高社會信任及資本）。如果我們在統計上控制財富這個變項，那麼信任與快樂之間的關係就會大為減弱，這說明了或許較高信任的國家會比較快樂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們較能相互信任，而是因為它們比較富有。再者，假使我們引進範圍更廣的國家來討論，那麼關聯性的強度也會再度減弱，這是因為南美洲國家雖然信任度奇低，但人民卻都活得很快樂。

爲了在這個問題上有突破的機會，我們需要一個細緻的模型。我們需要將一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控制起來，例如收入、年齡、教育及健康。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去控制整組個人層面的變項，然後看看是否還剩下國家之間的差異有待解釋。很幸運，這類的分析已由加拿大經濟學者 John Helliwell 首開先河（Helliwell, 2002a）。就像之前提過的，此分析印證了微觀層面的效果：透過婚姻、教會、志願性社團而有較佳社會連結的個人，顯著地會較為快

樂。Helliwell 的努力並未在此打住，這也正是其精采之處。他繼續探索總體層面的差異。

此分析所運用的資料來源，是三波世界價值觀調查，總數共有來自 46 個不同國家的 87,606 人，資料樣本數十分龐大，以至於可以允許我們把許多因素都考慮進來。引入考慮後，我們就注意到 Helliwell 有關於收入的發現。我們幾乎可以斷言，Helliwell 發現在個人層面上，賺愈多的人會感到愈滿足，儘管金錢帶來的邊際效用會遞減。他發現在國家的層面上也出現類似的模式，愈富有的國家感到愈滿足，但同樣具有邊際效用遞減的模式。然而，他發現當控制了個人層面的差異後，在總體層面上收入較高與生活滿意度較低有關。換句話說，當你周遭的人變得更有錢時，你的快樂程度將會往下降，這就是所謂的「負向的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98 把焦點轉往社會資本，我們將看到一個迥然不同的模式。當控制了個人層面在信任及團體成員身分等差異後，總體層面的信任、團體或教會成員數仍是顯著的，而且與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有關聯。換句話說，倘若你周遭其他人愈能彼此信任、愈常上教堂或參與志願性團體，不管你是否也這麼做，你仍會比較快樂。相對於收入而言，從生活安適度的角度來看，社會資本似乎能散發出正向的外在性。同樣地，自己的同胞是誠實的（通常以是否能容忍逃漏稅的行為來測得）也與具有較高生活滿意度有關聯，即便控制了個人自己對逃漏稅的態度後仍是如此。

這個模型裡一項有趣的細節是，教育對生活安適度的影響被排除在方程式之外。在簡單（雙變項）的層面上，教育程度較佳與較滿意生活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但這個模型則認為並非教育本身帶來了快樂，而認為教育程度高的人之所以較快樂，是因為他們賺了比較多錢、擁有較多的人際關係、參與社會的程度較高、較易信任他人、身體較健康。

Helliwell 在最終的版本中納入超過 40 個變項，建構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模型來。儘管如此，由於它使用了橫斷性的資料，它仍難逃脫一個常見的批評：因果進展的方向可能有數種可能性。或許是快樂的人會加入俱樂部，而非俱樂部使人快樂？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或許存在著某個其他的變項或系統性的回答偏誤，因此導致帶著特定模式的結果？尤其我們都知道，有些人回答問題或看待世界的心態本來就比較正向，而這就在橫斷性資料中產生虛假的相關性 (Halpern, 1995b)。

Helliwell 採用了一項聰明的小技巧，起碼處理了上述第二項潛在的問題。他帶入了個人對自己健康狀態的觀感，把它當成是控制變項。對健康的觀感與主觀的生活安適感之間存在著相當強的相關；就像我奶奶經常說的話：「只要你能維持自己的健康，那就……。」將對健康的觀感帶入方程式，幾乎可以確定會產生「局部謬誤」(partialling fallacy)，人為地降低了方程式裡生活滿意度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程度。⁶ 在這個意義下，它就是一個保守的分析。但是將該變項用做控制變項，此舉的漂亮之處在於這應該會控制住樂觀主義或正面回答方式所產生的偏誤。如果人們在陳述上過度正面，那麼他們就會像過度陳述自己生活滿意度那樣，過度陳述自己的健康情況。所以將以上兩者之一控制住，將可消除這類偏誤的效果。

近來，Helliwell 已將其焦點從快樂轉向了自殺，回到了涂爾幹早年的關懷 (Helliwell, 即將出版)。他初步的結論完美地印證了涂爾幹當時的發現，只是前者擴展到許多國家，並使用現代統計方法。他發現，社會資本與其他相關的變項解釋了各國自殺率間實質變異量的一半以上。例如，該模型指出，在社會信任的測量值中每增加 10% (這並非是很巨大的差距，因為在 2001-2004 年的資料裡，巴西的 3% 左右是最低，最高則是北歐國家的 65% 左右)，將減低男性自殺率十萬分之四，以及女性自殺率的十萬分之 0.5。當我們知道各國平均的自殺率約莫是男性十萬分之二十五及女性的十萬分之八後，就會明白上述造成的差異有多可觀。

99

總之，Helliwell 做出結論說，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 (從公民參與到合作的社會規範) 對於快樂與自殺都有影響，而且其效果超過個人社會資本的差異。雖然他的分析最終仍仰賴橫斷性的方法，但其細緻的程度已達這類分析裡所能做到最好的情況。同時，因為各國之間在生活滿意度、自殺以及其他採用的變項上有巨大的變異量，使得它在統計上的說服力很強。他的研究之所以令人感興趣，不只是因為其展現的結果如此完美，而是因為它立下了一個方法論上的標準，可供其他研究者依循。

⁶ 局部謬誤乃發生於我們在統計上控制了一個相關的變項後造成另一項統計關係的程度的減弱，這有可能讓人下結論認定這項關係的程度比起它實際上的要弱。例如，如果你想去評估智商與收入之間的關係，然後你將「鞋子的大小」這個變項 (恰好與智商有關聯) 加入到方程式裡，這個加入的動作可能會人為地減弱了智商與收入的關係。

生理健康

若要佐證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對健康有影響，最有力的證據來自美國的資料。Kawachi 等人發現，美國各州的（按年齡做過調整的）死亡率以及加總到州層面的各類社會資本數值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係（Kawachi et al., 1997）。（按年齡做過調整的）死亡率與團體成員數（ $r = -.49$ ）、認為缺乏幫助（ $r = .71$ ；透過「人們大多得自己留意」的回答製成百分比）、社會不信任（ $r = .79$ ；透過「與人相處時，你必須愈小心愈好」的回答製成百分比）的平均水準之間有顯著關聯。事實上，社會不信任解釋了各州在總體死亡率上 61% 的變異。

100 問題是，社會不信任究竟真的是原因，或者只是個徵兆。社會不信任程度較高的各州也很顯著地較為貧窮（低於州定貧窮線的家戶，占全州戶數的百分比）（ $r = .52$ ）。貧窮也與較高的死亡率有關聯（ $r = .57$ ）。若是控制貧窮程度，的確可減弱死亡率與社會信任之間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仍是非常顯著的；不只是與總死亡率，也包括與嬰兒死亡率及因惡性腫瘤和腦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數目之間的關係，都是顯著的（Kawachi et al., 1997）。

在團體成員數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類似但較微弱的模式。在任何統計控制之前，團體成員數層面解釋了 22% 的州層面在死亡率上的變異。控制貧窮這個項目將減少這個效果，但在與總體死亡率及與惡性腫瘤的關係上，在統計數字上仍是顯著的。

Kawachi 等人此後就複製了這個研究裡的重要發現，使用美國人自我感覺的健康以及青少年生育當成結果的測量值（分別可參考 Kawachi, Kennedy and Glass, 1999; Gold et al., 2002）。自我評估的健康被視為預測死亡率及殘疾的絕佳指標，儘管它看起來只是個簡單的變項（Idler and Benyamini, 1997）。再次，社會不信任較高的州裡，陳述自己健康狀況「尚可或不佳」的人口比例要高出許多（ $r = .71$ ）。但是這項研究裡有一個顯見的進展，就是在個人層面上有關社經因素、健康相關因素的資訊也都可以取得。

從更多的文獻裡推知，自我評估的健康和年紀、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少數族裔的身分、抽煙、肥胖、缺乏健康保險等因素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從微觀社會資本的討論裡，我們可推知獨居也與自我評估健康高度且獨立地相關（風險比為 1.93；95% 信賴區間下介於 1.34-2.80）。然而，即便在控制這些所

有變項後，住在低社會資本州的個人往往陳述出較差的健康狀態（控制了其他變項後住在低社會信任州裡的居民，相對於住在高社會信任州的，描述自己健康不良的風險比為 1.41；95%信賴區間下介於 1.33-1.50）。作者的結論是：「這些發現與州層面社會資本對個人生活安適明顯產生的情境性效果是一致的，這效果是獨立於最可能預測自我評估健康的指標之外。」（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p.184）

類似的結論也在橫跨美國 39 州、針對青少年生育的路徑分析研究中得到（Gold et al., 2002）。青少年生育率受到貧窮以及收入不平等所影響，但不平等的效果似乎主要是透過其對社會資本造成的負面影響而產生的。

針對橫越俄羅斯 40 個地區以及橫跨匈牙利 20 個郡所進行的研究，也都產生十分相似的結果。使用橫斷性、區位式分析，再一次讓我們發現在社會資本的指標（政治上的公民參與、工作關係的品質等等）與預期壽命、死亡率之間有顯著相關（B. P. Kennedy and Kawachi, 1998）。有人解釋說，在後蘇維埃的俄羅斯裡，住在非正式支持較低的地區中的人，尤其無力抵抗隨著轉向市場經濟而帶來的艱困與不適。

101

匈牙利的例子更是相似。計算年齡介於 45-64 歲之間的死亡率發現，其與人們認定的信任、互惠、從公民和宗教組織中取得的支持等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Skrabski, Kopp and Kawachi, 2003）。死亡率乃與不信任的程度最相關，這一點與美國的研究資料結果相近。研究也提及性別的差異：男性死亡率受到最大的影響來自公民組織提供之協助的變異，女性死亡率受到最大的影響則是對互惠的觀感。作者下結論道，在前蘇聯國家裡，「心理—社會因素事實上的確是影響死亡危機的決定因素」，同時「在相對傳統的社會裡，中年男子似乎較無法應對社會環境中的快速變遷。」（p. 118）令人好奇的是，後一個結論竟呼應了以下的發現：在早期報導出來的貫時性健康研究裡，社會資本似乎對男性比對女性的影響要來的大且持續，或許這反映了男性社會資本的變化性較大，或是男性對缺乏社會資本是比較敏感的。

一個關於公衆健康的爭論：物質性的解釋相對於心理—社會式解釋

究竟是物質性及經濟的因素，還是心理—社會因素（包括社會資本）對健康比較重要，這個爭論已經沸沸揚揚地持續許多年。尤其，對於造成國家之間健康差異的原因何在，更是爭論不休（R. M. Kaplan, Sallis and Patterson, 1993; F.

Baum, 1999)。

無疑地，在健康與壽命上，各國之間存在著實質差異。例如，儘管擁有相同財富，在人民的平均壽命方面，希臘人比沙烏地阿拉伯人多活八年；冰島人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多活五年；日本人比美國人多活四年；瑞典人民較德國人民多活三年。同樣地，在美國境內儘管有些州的平均收入雷同，但卻有著明顯不同的預期壽命。

然而，至今仍未有任何已出版、具信服力的證據，能說明跨國間的健康數值變異（不像美國各州間的變異）能被社會資本變項解釋。事實上，在歐洲國家裡，社會信任與死亡率間似乎存在著負向的關係，至少在心臟病方面是這樣。102 換句話說，高信任的北方國家，如瑞典與丹麥，相較於低信任的南方國家，如義大利與希臘，前者調整年齡後之死亡率經常較高。

美國的資料告訴我們，社會資本與經濟不平等都有很強的影響。Kawachi 等人以「羅賓漢指標」來測量不平等：為達所得的平等，高於平均所得之家戶必須取出的部分，加上低於平均的家戶必須被給予的部分，合計而成的各州家戶收入。人們或許會這麼想，這與貧窮應有高度關係，因為低於貧窮線的家戶愈多，從有錢人那裡轉移以達至收入平等的就會愈多 ($r = .74$)。羅賓漢指標也與死亡率 ($r = .65$) 及社會不信任 ($r = .71$) 有高度相關。

這些高度相關的結果指出，收入不平等、社會不信任、死亡率三者之間，都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以至於很難去切割它們。Kawachi 等人使用路徑分析的技巧想加以切割，結果指出社會不信任乃中介於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係。基本上，當我們控制了不信任的程度，不平等對健康的影響就大大減低，而當我們控制住不平等時，社會不信任與健康間的關係卻仍維持顯著。這個分析結果最簡易的解釋就是不平等導致了社會不信任，接著社會不信任又導致人們較差的健康狀態。然而，這個解釋本身需要更仔細地加以檢視，因為這些變項都是相互混合的（彼此高度相關），當然，資料本身也是橫斷性的，這會使因與果更難有效區別開來。另一個可能性是，不平等撕扯著社會型構，導致了社會資本的崩解。這是 Kawachi 等人的解釋（1997），同時也得到了一些來自於犯罪研究的支持（請見第四章）。

然而，當我們轉而探討各國間的差異時，整個情況就較不明朗。普遍來說，住在貧窮國家的人比起住在富有國家的人，其平均健康狀態較糟、預期壽命較短。幾乎沒有人會反駁「在最貧窮國家裡，缺乏金錢與資源對健康造成莫

大影響」的說法。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在美金 1,000 元左右或以下的國家，其平均預期壽命是低於 50 歲的；相反地，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在美金 5,000 元左右的國家（以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標準來看仍然很貧窮），平均預期壽命則接近 70 歲。然而，財富愈可觀，在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增加將帶來愈來愈小的邊際效果。最富有的國家中，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美金 25,000 元，而其平均預期壽命接近 80 歲（比起賺的錢只有其五分之一的國家多出了可觀的 10 年，但長壽得到的益處卻只是收入少於其五分之一的一半而已）(J. Lynch et al., 2000a, 2000b)。⁷

103

這個邊際效果遞減的模式意味著，在較富有的工業化國家裡，國家財富與健康之間關係的強度實際上消失了。如果我們拿 1995 年時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為例，財富與健康間僅存在著很微弱的相關 ($r = -.11$; Wilkinson, 2000)。在這些富有國家之間，健康上仍存在著很可觀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似乎用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來預測，比用國家間的經濟差異要來的好 (Wilkinson, 1996; G. A. Kaplan et al., 1996)。⁸ 有些人（尤其是 Richard Wilkinson）認為社會資本正是整個故事裡重要的一環。

收入在個人層面對健康的影響顯示出一個逐步遞減的簡易模式，告訴我們較不平等的國家可能較不健康，因為它們內部處在貧窮狀態的比例較一般國家高，因此也有過高比例的病人。然而，研究顯示若控制了個人層面的財富，並不會減除國家間在健康上的差異，這種情況也在 Kawachi 等人在美國各州差異的資料中發現 (Daly et al., 1998; Soobader and LeClere, 1999)。究竟無法被財富完全解釋的剩餘影響，最適合以「生物社會環境」、「社會資本」(Wilkinson, 1996, 2000; F. Baum, 1999)，還是「新物質」(neo-material, 譯註：新物質取徑認為健康的不平等，是由於人們對於物質世界的資源擁有不同的經驗與取得能力，所累積造成的) (J. Lynch et al., 2000a, 2000b; Muntaner et al., 2002) 來解釋，在後續的研究中引起了很多的爭辯。

Wilkinson 堅決認為，在富裕的國家裡，主要影響健康的是相對的收入而非絕對的收入。他認為絕對的富與貧決定了購買商品的能力，但相對的不平等

⁷ 1993 年的數據。

⁸ 這個發現本身並非毫無爭議。關係的強度仰賴的是資料中校正與調整動作，但這些動作並未受到研究團隊的檢視，尤其是使用了備受爭論的盧森堡收入調查。

決定了在社會中的位置。⁹ 在物質充足的社會中，即便相對貧窮者仍能負擔得起基本維生所需物品（飲水、食物、棲身之所、基本的健康照顧）。然而，相對貧窮仍然意味著低下的位置、曝露在不安全及較大的壓力之下。

除了繪製出在鉅觀層面上不平等與健康間的關係強度，Wilkinson 還提出其他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他指出很多研究都顯示，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的情況與健康之間的緊密關係。在這些研究裡，最為人熟知且方法論上最嚴謹的就是 Marmot 等人所做的努力。在廣為人知的英國政府研究裡，Marmot 等人檢視了英國各級公務員的位置與健康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即使是在職位上非常細微的差異（外顯在薪水、辦公空間大小、辦公桌大小、地毯、甚至是衣帽架上），都與顯著且有系統的生理還有心理健康差異相關（Marmot, 1986; Marmot et al., 1991）。職位愈高的公務員（隨年齡調整過的），生理與心理健康情況愈佳。

104

Wilkinson 也引徵大量的動物研究結果指出，處於社會階層中非支配性的地位，對其健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他說，在人類與非人的靈長類動物中，有兩種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基於支配階序的「互分高下」（agonistic）社會，以及基於平等、互助合作的「享樂為尚」（hedonic）社會（Trower, Gilbert and Sherling, 1990）。基本上，Wilkinson 認為經濟不平等的國家屬於互分高下的社會，內部存在著清楚的支配階序，在這階序中，權力與強制力使人取得資源且無視於他人的需要。相反地，較平等的國家則具有較多相互合作的社會關係，在其中人們的需要透過分享與互惠的義務而得到實現與中介。他認為在一個階序分明的社會，社會關係會比較萎縮，同時「社會連繫和朋友網絡似乎對健康有高度保護作用，就像地位低下與健康惡化有關一樣。」（Wilkinson, 2000, p.142）

反對 Wilkinson 的論點是認為他的心理—社會性解釋忽略了物質條件的重要性。有些人甚至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很有效地在健康不佳的問題上「將過錯歸在受害者身上」，忽視了鉅觀層面的社會與經濟政策產生的效果（Pearce and Smith, 2003）。其他非社會資本的解釋仍舊存在。普遍而言，健康較差人口居住的地段，對公眾健康產生了超乎比例的影響。例如，假若有一群貧窮且衣衫襤褸的人住在你周遭，他們將成為「沈淪的一群」，像肺結核之類的傳染病於

⁹ 確實，相對不平等也對絕對購買商品的能力產生了影響，像是特定低成本的商品會變得較難取得（例如煤）。

是找到棲所並開始散播。富有的人絕大多數都逃離這個問題並移往郊區，因此保護他們免受傳染的威脅，以上說法並未得到證據的支持。疾病迅速地從「沈淪的一群」裡沿著運輸與通勤而散播：「在主要大城市中的貧窮社區，身受政策所引發及維持的都市衰退所苦，它們對美國人口裡廣大的一群國民之健康、安全以及生活安適，產生了超出應有比例的影響。」(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p.1344)

Lynch 等人 (2000a) 以一個隱喻來說明，即在空中長途飛行許久的飛機裡經濟艙乘客的健康比在頭等艙裡的還要差。他們指出是在經濟艙的乘客在飛行時忍受的較糟條件 (較差的食物、較擁擠的空間)，而不是那些乘客在下飛機時看見頭等艙的座位寬敞而心生嫉妒 (J. Lynch et al., 2000a)。同樣地，他們認為不平等影響健康，是因為它與健康相關的基礎公共建設得到較少的抑注有關 (教育、健康服務、交通運輸、環境控制、住宅品質以及職業上對健康的規定)，而不是因為不平等或社會資本本身。

105

以下的發現印證了他們的論點，即在加拿大各省分之間 (不像美國各州那樣) 幾乎未看見不平等與健康之間有關係 (N. A. Ross et al., 2000)。他們認為這暗示真正關鍵的關係並不是不平等、心理—社會環境以及健康之間的，而是服務的品質與健康之間 (因此，加拿大普遍優秀的公共服務品質消除了原效果)。類似的證據也能在社會歷史學者的研究裡看到，他們指出了公共投資對於抵銷工業發展對健康的負面影響有多麼重要 (Szreter, 1999)。另一個證據是之前提過的，即在歐洲各國，社會信任與死亡率之間似乎存在著負向的關係 (至少就心臟疾病而言)。

Wilkinson 的研究整體看來是強調心理—社會的路徑，這點頗具爭議地給人一種忽視較傳統公共健康之解釋的印象；或許在他想反駁「經濟成長本身永遠是件好事」觀點的關懷中，他低估了絕對的財富能產生有益健康的效果。Lynch 等人的研究，也強調了可能有助解釋龐大總體差異 (像地中海式飲食) 的其他文化因素占有的潛在重要地位，而這在美國脈絡下可能並不是以同樣的效果出現的。儘管如此，他們的批判仍讓人覺得在某些點上過度推論了。

加拿大的例子很有趣，但以加拿大各省整體看來，不平等的情況和緩許多 (同時數目也小)，因著統計上直截了當的原因，導致大大限縮了以不平等解釋變異的能力。事實上，另一項更近期的研究確實發現在加拿大的健康地區之間，收入不平等與死亡率之間存在顯著關係 (Veenstra, 2002a)。有趣的是，同

一個研究發現，由社團參與、公民參與測得的社會資本，與較低的死亡率有關聯（而且財富本身與死亡率無關係）。

106 第二，上文飛機的比喻巧妙之處在於其簡單明瞭，但仍有些誤導的成分。爲了使它能與真實的研究進行比較，我們必須控制住個人層面的特質（乘客的財富、座位的大小等等），然後看看是否在不同層面的座艙之間存在著差異。在同樣針對國內層面（以及在美國）的研究裡，原本的差異仍舊存在，這意味著在這個比喻裡，控制了座位大小等因素後，仍然在座艙之間遺留下有待解釋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論點裡很關鍵的一部分並非只是經濟艙乘客最終的健康比起頭等艙乘客差，而是不同座艙間的差異本身產生了超越個人物質條件（座位大小等）或在其之上的影響。因此，較適當的測試應是比較擁有不同座艙的飛機與只有一種座艙的飛機之間的差異。透過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看，隨著時間過去，在「乘客」之間建立起的社會關係（不論是在艙內或艙間），都是整個故事裡很重要的一部分。

事實上，在 Lynch 等人最近的論文裡（分析 16 個富有國家年齡與特定原因致死的死亡率），他們發現經濟不平等與死亡率有關係，尤其是與出生、嬰兒存活以及意外傷害（Muntaner et al., 2002）有關。然而，他們發現了證據以證明物質論者的解釋，即一國財富狀況與死亡率間的顯著相關。國家中有愈多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傾向的投票支持者，國會裡有愈多社會主義者及女性議員，社會民主傾向或福利國家傾向的政府執政愈久，該國具有愈低的死亡率。社會資本也與較低的（隨年齡調查）死亡率有相關，但這個關係比起與經濟不平等以及與福利國家傾向關係還弱。

諷刺的是，跨國層面社會資本（以及不平等）的影響之所以不是那麼顯而易見，或許是因為在中觀層面及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所致。人們在面對不平等以及地位階序體制帶來的負面效果時，最有效的因應策略之一，就是尋找一個能讓他們不會感到低人一等、愚蠢、不受重視的社會環境（或受保護的特定地區）（Charlesworth, 2000; Wilkinson, 2000）。人們試圖打造這樣一個有別於外界的地帶強度，在邏輯上受到鉅觀層面不平等程度的驅動——而他們達成所望的程度，也端視他們如何解消鉅觀層面上不平等的負面效應。

小結：解釋鉅觀層面上發現的結果

快樂與生活滿意的資料，都強而有力地支持了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上對

生活安適度的影響。Kawachi 等人集結而成關於生理健康變異的資料也能提供支持，而且似乎顯示在美國、俄羅斯、匈牙利有巨大的環境層面上的效應。然而，仍存在著一些不足，像關於跨國心理健康差異與社會資本的研究上；而且針對生理健康及預期壽命的跨國資料中仍有模糊之處，因此爭議仍籠罩在此議題上。

在鉅觀層面的效應被看到之處，存在著三條關鍵路徑，能成為最適切的中介項。

首先一般來說，身在高信任的州或地區中的人們，可能會對其他人較為「友善」。這意味著生活在這些州的人普遍較沒有壓力 / 這些州的生活壓力較輕——不論是朋友或陌生人，都是以愉悅態度及公民精神來相互對待，讓日常生活運作更順暢、更無衝突。它也指出了人們一般較能相互支持，不管是朋友或鄰居，都能在需要時伸出援手，而對陌生人也能幫忙指引方向、不占便宜。這可能有一部分反映了社會資本在中觀與微觀層面上未能被測量出的作用（請見之前的討論），但也可能反映出鉅觀層面的真實效果——一個具有公民精神及陌生人間相互尊重的文化。

其次，對於健康的影響可能與經濟不平等有關。不平等可能與較差的健康有關，這是因為非常貧窮者其健康情況格外差，並將疾病散播給其他的人。不平等經常被發現與總體層面的社會資本數值之間有高度相關，而試圖釐清這個關係與健康之間的關聯則是非常困難的。例如普特南提到，在不平等與一個測量他研究的義大利例子之公民參與複合指標之間，存在著很強的關係（ $r = .81$; Putnam, 1993；請一併參考第八章）。在這領域裡所有意見相左的研究團隊，都發現在統計上控制住不平等可大大減低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的相關強度，反之亦然，雖然它們對於此現象的解釋各異（Kawachi et al., 1997; Veenstra, 2002a, b; Muntaner et al., 2002）。團體成員在面臨不平等時將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此事實所產生的抵銷傾向又會增添這個故事的複雜程度。

第三個可能性是高社會信任的州之所以健康情況較佳，是因為它們的公共服務做得比較好。Lynch 等人認為政府對醫院、福利服務、公共設施的投資，被認為對人民健康產生了實質的影響（Muntaner et al., 2002）。但再次看到，這個例子確實證明了在州層面的社會資本與政府表現、政府研發與實行政策的能力之間，還有經濟不平等和福利國家傾向的程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相互增強的關係（請看第六章）。高社會資本陳述的地區擁有較佳的健康照顧的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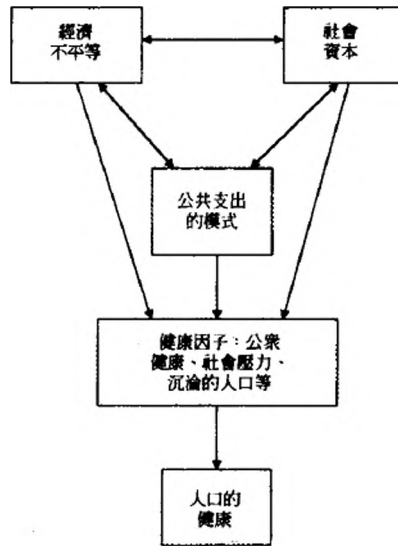
108 管道，美國各大都會地區內的情況正是例證 (Hendryx et al., 2002)。在各個政策領域裡，已得出「較高的社會資本導致較高的支持與較有效的公共服務的遊說」這個論點。在健康的脈絡裡：

例如，社會資本藉由影響對重新分配政策的支持、對普遍健康照顧保險的支持（這兩項都是政府的核心目標），來影響這項能力。一個政府所管轄的範圍內社會資本低，可能欠缺選民對其介入的支持，因而不願配合（或至少在配合時無法不帶著可觀的政治風險）(Lavis and Stoddart, 1999, p.14)。

如引述之言所說，政府的行動乃位於不平等程度的差異之後。事實上，社會不信任在美國各州中與「最大福利協助占每人收入之百分比」呈現高度負相關 ($r = .76$; Kawachi and Berkman, 2000, p.186)。因此，至少在美國的脈絡下，我們發現有證據能支持介於社會資本、不平等、政府行動之間互相加強的三角關係（請看圖 3.1）。

109 總之，當前的文獻告訴我們，至少有些健康與生活安適在鉅觀上或大規模總體實質的差異，能被社會資本以及關係的平等所解釋。我們有個很強但未經證實的例子，可說明社會資本差異部分地中介了不平等對健康的影響，但也有個很強的例子說明不平等透過另一條路徑展現其影響力，像「沈淪」的不健康的人直接威脅公眾健康這樣的解釋。政府行動幾乎可以很確定地說，對公眾健康也具有很顯著的影響，而政府贊助的計畫在解釋鉅觀層面差異上也有幫助，雖然這種行動本身有一部分是仰賴一國或一地的社會資本 (Woolcock, 1998; Szreter, 1999; Lavis and Stoddart, 1999；請一併參考第六章)。

這個基本三角關係如圖 3.1 所示，逐漸受到各方的審視，但我們應賦予不同連接之上的重視仍有待最後的確定，而且可能出現差異。我們尤其需要以下這種研究：利用標準化的測量方式，嚴格控制住個人層面如飲食習慣這類健康行為，比較心理與生理健康的跨國差異。或許「我們在每條因果路徑上要放置多少重要性，這個問題是有個絕對答案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它們本身或許得視不同的情境而定。例如在加拿大，不平等扮演的角色就顯得比在美國弱了許多，這部分反映了兩國在健康照顧體系上的差異。同樣地，社會資本的不同也可能在美國比在歐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歐洲，政府行動上的差異可能就足以解釋更多的變異。



■ 3.1 社會資本、不平等及健康，三者在此觀層面的關係

結語

本章探索了社會資本與生理、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在個人或微觀層面上，證據告訴我們確實存在著很強的關係。從事以下行為的人比不從事者擁有更佳的健康狀態，而其重要性依底下順序遞減：結婚、擁有親密的朋友、參與教會或成為俱樂部會員。不同類型的關係之間似乎存在著相互替代性——只要你擁有愛你與支持你的人，你就能享有保護性的效果。

普遍來說，一個類似的模式也在心理與生理健康上看得到。有許多貫時性研究顯示，在某一時期裡的社會孤立能準確預測往後的健康不佳以及（隨年齡調整過的）死亡率，這些結果重覆印證了前述命題，也加強了我們的信心。擁有支持性人際關係的個人較少患憂鬱症；到了老年時認知衰退的程度會較低；比起社會孤立者，較不容易早逝的機率是好幾倍之多。

110

對於這些非常正面的結果，仍存在著許多必須存疑之處。與男性比起來，對於女性生理健康比較沒有一致的影響。在許多的疾病上，像心臟病、中風，個人關係展現在疾病首次發作後存活率上的效果，比起展現在預防疾病發生的效果要較明顯。另外，親密的人際關係對健康的影響，也發現不全然都是正面的。人際關係可能成為傳染病與不健康行為的流通管道，而在特定的不適症狀

上，例如阿茲海默症，倘若關係會帶來沈重的責任義務或在本質上非常重要，有時會使預後惡化。

不少著作如今都在探索能解釋「人際關係一般而言如何產生保護健康的作用」的生物—心理—社會路徑。這包括了工具性的緩衝效果（例如在艱困時的財務幫助）、認知效果（例如改變觀感或回應壓力的方式）、生理效果（例如對朋友有信心會改善免疫系統的功能）。這些個人層面的有力發現，深植於普特南對於社會資本與健康間關係的堅強立論裡。

在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上，也存在著合理證據來說明社會資本對健康的正面效果。美國小城鎮 Roseto 這個令人驚豔的個案研究似乎顯示，一個緊密、平等主義傾向的社會，能保護成員免受心臟病之害，即便它並非鼓勵成員採用健康的飲食習慣。同樣地，在高度凝聚的社會中罹患憂鬱症的低比率（像 Amish），告訴我們一種對心理健康類似的正面效果。族群與團體的密集效應，對心理或生理健康的影響也提供進一步的關鍵證據來支持論點。群集在一起的團體似乎可以使社群成員的健康受益，透過的方法是減低他們所受到的歧視，並增加他們相互的支持。然而，這些區位上得出的結果在規模上其實很有限，至少相對於個人層面社會資本對健康的影響上是如此。

在鉅觀層面上，有堅實的證據證明社會資本對快樂、生活滿意度及減低自殺率，能產生的正面區位效果。至於對生理健康上，證據就比較複雜。在同一國家的各地區，尤其是美國，社會資本對生理健康產生影響乃有清楚的證據（超過收入水準及個人層面的健康相關行為的效果，或在其之上）。¹¹¹ 跨國差異的研究也顯示出有大量生理健康變異無法藉由收入水準之差異來解釋。然而，許多的爭論圍繞在「什麼可以解釋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累積下來的證據指出了社會資本、不平等與公共支出模式三者之間相互加強的三角關係，能夠解釋鉅觀層面在人口健康上的差異（結合傳統上一些其他的解釋，像飲食習慣與生活風格）。至於在國家層面上，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則鮮少甚至完全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

既存的證據已經讓一些專家提出意見，認為健康政策應該把焦點放在社會資本的概念上，將之視為重要且以往被大大忽視的一個能改善公眾健康的手段（Abbot, 2002; Gilbert and Walker, 2002; D. M. Petersen, 2002; Pilkington, 2002; Watt, 2002）。但是，卻仍存在著很強的反對意見（Pearce and Smith, 2003）。此時，我們需要的是在臨床試驗裡加入合適、細心打造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中

觀層面)。

在急忙將社會資本理論應用在健康議題上時，很重要的是我們也必須指認出能解釋社會資本在健康上的影響的因果路徑，並非在所有分析層面上都是一模一樣的。就像有個評論如此陳述：

決定社會資本的原因及結果的過程，或許在每個集合體中的層面上都是相當不同的。例如在地方社群的層面上，社會資本十分仰賴鄰居們每天的日常互動更勝於只是支微末節的社會政策。相反地，在州或國家層面上的社會資本程度很有可能反映文化、社會、經濟政策及其他鉅觀社會力量的影響 (Lochner,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p. 11)。

就像我們已看到個人關係的品質在微觀層面深具影響；在鉅觀層面，國家政策的魅影揮之不去；然而也是有重疊之處的。有些政府行動可以產生可見的影響來改變日常生活關係的品質；同時，文化性的互動習慣與信任可能也對政府運作及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請參見第六及八章)。

在各分析層面上都看得到兩個普遍的因果議題浮現。我們不斷發現關係的品質很重要。僅僅認識某人是不夠的 (這關係必須是支持性、正面的，才會對健康有所助益)。其次，對健康最有效的影響似乎來自最親密的關係 (微觀層面的黏著性社會資本)。然而，雖然後一論點似乎顯而易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適用在所有的結果變項。例如經濟提升似乎較仰賴於散播四處的架接性社會資本 (請參考第二章)。

112

最後的這組對比有助於解釋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個人層面的向上社會流動，經常與較糟的健康狀態有關聯 (即使一般而言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職位與較佳的健康狀態有關)。簡而言之，當我們決定接受某個遙遠城市裡一個令人嚮往的工作機會，而離開我們卑微的出身時，這個決定對我們的銀行存款來說可能是項利多，但對於維持我們健康及生活安適的親密關係而言可能就是項惡耗。潛在的壓力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我們在稍後的章節裡將再回到這個問題上。

進階閱讀

由 Berkman 與 Kawachi (2001) 編輯的著作含括了許多頂尖學者討論社會資本與 (主要是生理的) 健康, 是近期在此議題上很傑出的選集。這些作者也另外撰寫了一篇對心理健康簡潔但面面俱到的評論 (Kawachi and Berkman, 2001)。另外, McKenzie、Whitley 與 Weich (2002) 也針對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 寫了一篇簡短的評論。若想瞭解生活滿意度與自殺, 請參考 John Helliwell 精采的文章 (例如 2002a)。若想認識較為民粹主義的取徑, 請參考 Ornish (1998)。

想要瞭解社會資本、不平等與健康之間關係, 請參考 Richard Wilkinson 那本書 (1996), 將能取得一個有洞見、具挑戰性的觀點。如果你真的找來看, 或許你再找另一類的觀點, 像 J. Lynch 等人 (2000b) 或 Muntaner 等人 (2002), 以取得均衡, 這也很不錯。

第四章 犯罪

一位六個孩子的母親，最近剛隨著丈夫從底特律郊區搬到耶路撒冷，她說之所以這麼做，其中一個原因是讓她年幼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享有更多的自由。她能放心地讓八歲大的孩子帶著六歲大的弟妹搭市區公車穿過鎮上去上學，也能放心地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讓小孩獨自在市內公園遊玩，這些事都是她在以往居住的地方不敢做的。

113

Coleman, 1988, p. 99

犯罪學者經常提醒我們，犯罪是一項複雜、變化多端的現象。像殺人這樣的暴力犯罪與偷竊這類的小過之間似乎不太具有共通處。儘管如此，當中仍有一些清晰可見的模式還有待我們提供更一般性的解釋，像是跨文化觀察到較年長的青少年違法的高峰期，或是戰後西方工業國家中普遍增加的犯罪趨勢。

當然導致犯罪的原因有很多——而其理論幾乎也一樣多。俗民觀點充斥，但許多都缺乏佐證。例如，人們認為是貧窮導致了犯罪，或覺得兩者間有高度相關，然而一般說來卻未有證據支持這論點。像經濟大蕭條這類經濟困頓時期並未與異常偏高的犯罪情形有聯結（D. J. Smith, 1995）。這證據讓我們相信，如果貧窮對犯罪有影響，那麼也是做為條件式或其他的變項（Faulkner, Hough and Halpem, 1996）。

114

和理論充斥的犯罪學理論相較，社會資本是較新的概念，儘管大多數犯罪學者對其體現的想法都不陌生。照定義來看，社會資本將注意焦點放在社會關係、互助合作規範與非正規約束力對違法行為的潛在影響。它在既存理論間串起解釋的脈絡，隱然為長久以來涇渭分明的微觀性（心理學）及鉅觀性（社會學）方法架起了一座橋樑。此外，社會資本理論也有助於激發嶄新而具前瞻性的研究，同時也提供想降低犯罪情形的政策制定者一項新的關注焦點。然而，就如同預期的，社會資本與犯罪之間的關係證實是盤根錯結，尤其是社會資本

的構成元素有時似乎對犯罪有著反效果。

一如對經濟與健康影響的討論，本章將從社會資本與犯罪在個人或微觀層面的關係開始，隨後再檢視能證明中觀及鉅觀層面影響的證據。最後，我將試著更綜合性地歸結社會資本與犯罪間的因果關係。

微觀層面：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社會資本

令人訝異地，在全世界各地犯罪行為都是年輕人間的普遍活動。最具代表性的是約三分之一的年輕男性在 30 歲前都曾犯過至少一起嚴重或可遭起訴的罪行 (D. J. Smith, 1995; Home Office, 2003)。如果先將官方數據置於一旁，轉而去查看針對「普通」大眾所做的調查，我們或許能有信心地定下結論指出，大多數男性在年輕時都曾短暫「經歷過」犯罪。大多數年輕人在經過一到二次定罪後就不再犯。然而，少數人仍持續犯下許多罪行。約 5% 的男性似乎要承擔起三分之二可歸屬於個人的罪行，包括在年紀很輕時就開始犯罪的累犯在內 (Faulkner, Hough and Halpern, 1996; Hagell and Newburn, 1994)。犯罪者通常都是多樣的，犯下的罪行五花八門，而不會限於某幾種 (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

這些穩固的模式對所有一般犯罪理論拋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相較於年紀更輕者或更大的成人，為何會有這麼多年輕人犯罪？在大多數人都不再犯罪的情況下，為何會有少數人一直持續犯罪？為什麼是男人犯罪，而不是女人？

讓我們從年齡與犯罪之間續存的關係開始。這個問題一直是犯罪學領域裡最大的謎團之一，而且這個模式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從自首資料裡發現，幾乎所有犯罪行為都在 15 到 18 歲之間到達巔峰 (Farrington, 1986)，但是從逮捕數據裡看到的巔峰時間要再晚個幾年 (D. J. Smith, 1995)。¹ 或是讓我們換個方式來看：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曾經犯過罪，但之後卻能戲劇性地拒絕再犯？

主要的解釋似乎在於社會資本與生命週期中關係的常態發展，及與非正規「社會控制」的連帶關係上。在常態的發展中，孩子會與家人及父母緊緊地連繫在一起，但這些親子連繫在青少年時期會有減弱的傾向 (Leffert and Petersen, 1995)。

¹ 當然，某些犯罪類型發生的時間會偏向較晚，像是家庭暴力與商業詐欺——特別是因為青少年通常還沒結婚，也沒有在公司裡擔任較高階的職位。

年輕人在工作上安定下來及組成新家庭之前，一般都會有一個不穩定的時期……，在這個轉換的階段，年輕人脫離了他／她的父母所加諸的約束力量，但卻還未投身於未來可能會帶有約束力的相互成人關係中。在這種情形下，青少年因為游移在適用於孩子與成人的非正規社會控制機制之間，因而極難駕馭……目前這個研究領域非常活躍，但社會連繫的形成如今似乎變成解釋青少年時期過後中止再犯罪的主要理由（D. J. Smith, 1995, pp. 428-30）。

這個理論並不新鮮（例子請參閱 Trasler, 1980），但從 Sampson 與 Laub（1993）的研究之後，這個論點有了顯著的提升。他們以 1940 年代及 1950 年代 500 位遭判罪的青少年，以及 500 位非行為偏差者的生命史資料做為樣本重新進行分析，發現工作穩定度、於常態教育的投注程度、職業角色、婚姻狀況，都能在因果上有效地預測是否會中止犯罪行為。他們的結論是：「社會連繫……，創造了責任和約束的獨立體系，這種體系對想將犯罪傾向付諸行動者強加了昂貴的代價。」（p. 141）這些社會連繫同時也提供獲得成就感與滿意度的機會（它提供了紅蘿蔔，而非只有棍子），鼓勵年輕人捨年少時犯罪的歡愉而去換取成人世界和主流社會裡的滿足（Trasler, 1980）。

Sampson 與 Laub 的研究精采之處，在於它不但有助於解釋大多年輕男性都曾有過犯罪經驗的原因，也一併解釋了為何少數人無法忘情犯罪（這是另一個犯罪學上的重要謎團）。使得大多數人遠離犯罪的正是非正規的社會控制和特定規範的內化，而非法律的威脅或正式的懲罰。因此，那些尚未建立起新的、強健社會連繫的初成年者，就會是持續犯罪的高危險群。

116

我們也必須考慮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假設：要是缺乏社會連結本身只是一種「反社會」或「偏差的」人格呢？已經有許多人以及心理變項被提出來解釋為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犯罪，如智商低、自我控制能力低、容易衝動和具高度攻擊性。或許正是這些特徵，導致某些人遠離了慣常的成人人際關係，並導致其他人不想與他們結交，同時這些特徵也個別地增加他們犯罪的可能性。

這種根據人格做出的解釋可以在早期犯罪因素中看到，如心理不安、濫用藥物、早年受到暴力與虐待的經驗等，甚至在基因研究中也看到這些解釋。在與持續犯罪的完全相關性中，有許多在因果上都含糊不清，像是不穩定的工作紀錄、擁有行為不檢的朋友、早年被退學或輟學。在每個狀況中，我們都無

法立即判斷出該關聯性是由潛在個人特徵所致，或者是由社會脈絡導致犯罪。例如，被退學僅是「犯罪人格」的一個癥狀，抑或是促成稍後犯罪行為的原因呢？（因缺乏求職時的所需條件，而使得年輕人轉向以犯罪做為謀生的最佳選擇）

答案是兩種類型的因果關係都起著作用。個人特質在某個程度上會影響環境與人們置身的社會網絡。例如，童年時的過於好動乃與之後青年時期具高度侵略性及行為不檢顯著地相關（Brannigan et al., 2002）。然而，同樣也清楚地顯示，環境與網絡對年輕人的未來犯罪行為有著實質、額外的影響（Sampson and Laub, 1993）。同樣地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年輕人往後選擇及轉變的個人特質，本身也受到其社會環境的影響。例如在童年時與父親關係疏遠或父親身在遠方；經歷過粗暴或喜怒不定的管教方式，或父母的教養方式帶有敵意；父母的工作不穩定。這些都是對日後犯罪與否的額外預測依據（Farrington, 1992; Brannigan et al., 2002）。因此，在個人社會脈絡及其逐步發展的性格、生活方式之間，可以看到一個鬆散的相互補強關係。然而，這並不是完全決定論式的關係。一個機遇或正向的關係，也可能戲劇性地改變一個人的生命歷程。

117 在支持性社會關係提供潛在正面效果方面，Zoccolillo 等人的研究（1992）提供一個很好的說明。他們針對身陷麻煩與種種不利條件下的年輕人進行貫時性研究，提出一個類似發現：童年時的行為不檢，能有效地預測成年後的反社會人格以及其他問題。但他們也支持 Sampson 與 Laub 的論點，他們發現少數會身陷麻煩，後來卻能反抗這個走向的孩子，往往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支持他們且非行為偏差的配偶或伴侶。Quinton 等人（1993）發現支持性同居關係所產生的類似正面效果，但同時也提到行為不檢的年輕人較不可能搭配到這種具支持性的伴侶，因此造就了微弱社會連繫與更偏差行為的惡性循環。

相同的詞彙也可以用來解釋部分的性別差異，但同時也要注意文化與生物性因素的潛在有力影響。女孩及年輕女性被強烈鼓勵將精力投注於照護的關係中，如同男性與年輕男孩具侵略性的行為容易得到寬恕一樣。儘管某些行為上的性別差異可能是基於部分的生理差異，其餘的則不是；文化上可以接受某一性別擁有的行為，在另一性別上卻不被接受。例如，哭泣的行為在年幼的男孩、女孩身上發生的頻率大致相同，但在西方父母的眼中，女孩哭泣被視為正常行為，在男孩身上卻成了有問題的證據（Simpson and Steveson-Hinde,

1985)。不論是受到文化因素還是生理因素的驅動，女孩較有可能在家庭內投注精力於照護的關係上，並於日後會在小小年紀時就步入婚姻。基本上，女孩與降低年輕男性犯罪行為的關係有較緊密的關係。

社會控制或社會資本的假設，已得到蒐集自各國與各種情境的經驗證據所支持。例如，美國一項針對費城出生的世代研究分析顯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其在合法領域內的優先權和所得，以及強化個人與社會的連繫如何增加個人對偏差行為所要付出的代價，因而降低了犯罪的可能（J. Williams, 1997）。社會資本（如年少時的同情影響力）是透過年輕人的人力資本（如受教育的年數）預測犯罪的重要因素（J. Williams and Sickles, 2002）。在瑞典，一項針對 800 位 15 歲學生所做的研究顯示，父母的參與（不論在個人或是學校總體層次上）如何產生影響青少年避免各種偏差行為的社會資本（P. Lindstrom, 1993）。在德國，一項針對 500 位年輕人的研究指出，父母與學校在壓制違法行為與右派極端主義上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前東德脫序現象普遍橫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Hagan, Merkens and Boehnke, 1995）。在中國，一項針對 269 位被逮捕過兩次以上的累犯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常見的風險變項後，假使犯罪者後來結婚或被釋放後找到工作，那麼其再犯的可能將大大減少（Liu, 1999）。而在加拿大，從兩份針對街頭青年的研究看出，父母的遺棄、家庭破裂、負面的學校經驗能解釋他們為何在街頭遊蕩，以及就業如何能夠重新將他們的生活帶離無家可歸及以犯罪維生的生活方式（Hagan and McCarthy, 1997）。總而言之，親密與主流人際關係的存在與否，大大地決定了年輕人是否涉及犯罪行為以及是否會持續下去。

幫派以及「負向」社會資本

到目前為止所呈現的分析敘述的都是社會網絡在防止犯罪上所扮演的正面角色。基本上，這暗示著與社會脫離就非常有可能做出犯罪的行為。但是，這種敘述並不完全，並且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實際情況是更複雜一些。

持續犯罪的典型青少年罪犯不僅脫離主流社會網絡，他們可能也與一個「爭鬥」（rival）或偏差的社會網絡有連結，在那之中認為違規是無妨，甚至是受到期待的行為。Hagan 與 McCarthy 針對多倫多與溫哥華的街頭少年所做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證。街頭少年不僅與主流社會結構脫離，同時也在社群上結合了會傳授他們街頭犯罪技巧與知識的關係——作者稱之為「犯罪資本」

(criminal capital) (Hagan and McCarthy, 1997)。同樣地，一項針對哥倫比亞少年偏差行爲的研究指出，「墮落的社會資本」(capital social perverso) 扮演產生少年偏差行爲的主要角色 (Rubio, 1996)；同時，根據團體研究的記載，同儕的影響力經常沒有勸阻，反而鼓勵了犯罪的發生 (J. Williams and Sickles, 2002)。

有一份讀起來很像出自狄更斯小說作品的美國政府報告，內容很重視「壞蛋學園」(schools for scoundrels) 的存在問題，它是由職業騙徒所籌組而成，專門教授其他騙徒「敲竹槓」的精妙技巧。警方的報告指出，在離開某地區去另謀新市場時，騙徒間經常會交換「肥羊名單」(即會受到騙徒詐騙者的名單) (U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93)。

119 很明顯地，這個例子突顯了社會資本的潛在缺點——任何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對所有相關人等並非都是「良好的」。這個研究領域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然就是黑手黨的組織型犯罪 (Servadio, 1976)。犯罪社會資本(擁有也參與犯罪的朋友)當然是一種社會資本形式，它讓人更容易犯罪。身為幫派的成員才能參與更大的案子；在其他人的犯罪時才能有人在外頭把風；才能提供一個連繫的網絡去銷售贓物以及購買非法物品。在社會的更高層次上則會表現為貪污及濫權(例子可參閱 Blomberg, Maier and Yeisley, 1998)。這種犯罪資本對社會上其他人來說顯然並不算是優點，而且它也證明了以下論點：就像資本的其他形式，社會資本不但可促進「好」行爲，也可「助紂爲虐」。

有個研究者創造出「負向社會資本」(negative social capital) 這個詞彙，用來指涉像幫派這類非常態、反社會的關係 (Liu, 1999)。在針對中國被逮捕過兩次以上累犯的研究中，Liu 發現，雖然常態形式的社會關聯能減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幫派的身分(或「負向」社會資本)則明顯地會增加再犯的可能 (Liu, 1999)。在這個例子裡，使用「負向社會資本」這個詞彙頗引人注目，但放到更大的脈絡下就會產生問題，畢竟它依據的是從何謂負面的特定觀點做出的後設 (post hoc) 判斷(請見第一章)。例如，要視某個地下反抗運動為正向或負向，端賴你本身的立場而定。

先將語義學擺一旁，顯然某些帶有目標的社會資本形式常令整體社會覺得困擾。於是，政策目標就變成要打破或導正這些犯罪社會資本型式，並鼓勵身陷犯罪高危險群的個人與較主流的社會網絡產生連結。矛盾的是，社會處理犯罪的主要工具之一很可能剛好產生與政策目標相反的效果：把犯錯的人關進監

牢，往往會減弱其與家庭及主流社群的連繫，而且也對重建這些連繫或受到影響的社群無太多助益（D. R. Rose and Clear, 1998; Hagan and Coleman, 2001）。同時，監獄可能會強化個人與其他類型或犯罪類型社會資本的連結。

受害者

本章走筆至此，討論仍集中在個別犯罪者的社會資本上。有趣的是，我們也能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做類似的文獻討論。這類的文獻討論最終會導出一個令人驚奇的類似結論——與主流社會脫離的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成為犯罪事件中的受害者。

120

援引 1979-1985 年之間費時性死亡研究的資料，Kposowa、Singh 與 Breault（1994）根據 20 萬份針對美國成人男性的樣本，檢視婚姻狀態、社會孤立對在殺人事件上的影響。他們發現，殺人事件的受害者有明顯較高比例都與未婚、社會孤立相關。控制了年齡與其他的社會經濟共變項，單身者被謀殺的可能性是結婚者的 1.9 倍；離婚、分居與鰥寡者被謀殺的可能性是結婚者的 1.7 倍。與社會脫離者被謀殺的可能性是與社會有連結者的 1.6 倍。

更普遍來看，尤其是在老年人之中，社會孤立與犯罪之間有著確定的關係（B. Holmes, 1985; U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93; Yin, 1982），社會孤立與恐懼間也有確定的關係（Gomme, 1986）。例如，英國犯罪調查指出，分居或單身者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已婚者的四倍（8.9%與 8.7%的機率相較於 2.1%的機率；Povey and Allen, 2003）。這些數據有一部分反映了年齡，但即使是離婚者（可能因為較老，因此身處在暴力犯罪下的風險較小），可能成為受害者的機率仍是已婚者的兩倍（4.8%相較於 2.1%）。婚姻狀態的結果削減了家庭收入與就業情況等因素對成為受害者的影響。

一個完善紀錄孤立與成為受害者間會產生關聯的方法，考慮就是當有些居民（通常是年紀較大者）在經歷一波波移離都市貧民區（inner city）的遷移潮後被遺留在原處，就像美國從 1960 年代發生至今的現象。那些選擇留下來或無法離開的原居民發現，有許多自己熟識的朋友與鄰居都已經離開，留下他們面對社會孤立的處境。他們於是成為其周遭年輕新居民的「首要目標」（prime target）（Nova Institute, 1977）。

在某個程度上，社會孤立與恐懼也會是對犯罪的一種回應（Lewis, 1981）。尤其是受害者因為失去對其他人的信任感，常覺得被迫進入了社會孤

立狀態 (Bard and Sangrey, 1979)。不幸地是，這可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並進一步地加強恐懼感與可能的脆弱感。

121 犯罪學的文獻較常專注於都市內高犯罪率的地區。然而，社會性與地理性的孤立也可能是富裕郊區的風險因素，至少就闖空門而言是如此（請參閱下一節針對社區與犯罪的討論）。在特定地域內，獨立房屋或公寓被盜竊的風險變化相當大。主要的危險因子包括該地在地理位置上的孤立（位在鄉間；觸目所及的房屋少於五棟；房屋位置遠離主要道路）；該地具有易監看性（從其他住家看不到房屋正面；從公共空間看不到房屋多數的側面）(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這類因素的結合就影響被闖空門的機率，比率可差到十倍以上之多。

犯罪學文獻裡其中一個最具一致性但也最令人困擾的發現，就是孩童時代或青少年時期曾受虐過的人，在成年後更有可能再經歷更嚴重的暴力或虐待。在對女性性侵害或暴力相向的例子裡，更是有豐富的記錄可以證明此發現（範例參見最近一項針對澳洲 6,800 位婦女所做的調查；Coumarelos and Allen, 1996）。這個結果的重要訊息之一似乎指出，幼年時的受虐深刻地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與其往後人際關係的形成 (Irwin, 1999)。由混亂且有虐待歷史的家庭所開啓的早年發展劣勢，會經由連鎖的負面互動、關係與行為持續存在。社會正向的選擇消失了，而在更極端的例子裡，與常規社會的連繫甚至會斷裂 (Whitbeck and Hoyt, 1999)。

這個模式看起來與（之前）描述偏差行為的模式很類似。早年受到性侵害，往往會導致負面發展歷程的持續。缺乏信任以及與值得信任的成人世界的些許連繫，這創造了一個不斷向下沉淪的情況。一個正面、值得信任的關係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他們的個人歷史與處境使得這種正向關係很難出現。因此對於在街頭遊蕩的年輕人而言，潛在犯罪者更是近在咫尺，而虐待、不信任、與人分離的循環會更加惡化下去 (Tyler, Hoyt and Whitbeck, 2000)。

有趣的是，對那些最後在街頭生活的人來說，他們保護自己免於成為更嚴重暴力的受害者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組成無家可歸的年輕人所謂的「街頭家庭」(street families)。研究顯示，這些擬似親屬關係能為暴露在危險之下的年輕人提供相當的保護作用，他們都缺乏較常態的社會資本 (McCarthy, Hagan and Martin, 2002)。

中觀層面：社群與犯罪

最後一點告訴我們，犯罪經常會變得與脈絡息息相關。雖然我們在某個程度上能從個人的角度（從犯罪者，甚至是受害者的個人歷史）來理解犯罪，但犯罪明顯也是情境下的一項特徵。犯罪就發生在潛在犯罪者與潛在受害者聚集的情境中，而且該社會及環境脈絡中缺乏通常能約束犯罪的力量（Miethe and Meier, 1994）。這點將我們帶往另一個議題：中觀層面或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犯罪？

122

不同社區的犯罪率有非常大的變化（Levy and Herzog, 1974; 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城鄉的差異。例如，在城市裡往往較常見搶劫與個人攻擊，尤其是在超過 25 萬居民人口數的城市裡，其搶劫與個人攻擊出現的頻率更是比郊區或人口少於 25 萬的城市來得高；而在城市間，攻擊往往會高度集中在內都市貧民區（Walmsley, 1988; Halpern, 1995a; Povey and Allen, 2003）。然而，相同的城鄉差異卻不是在世界每個地方都能發現，也不被認為會持續存在於歷史上所有的時期——事實上，一般認為在 500 年以前，城市外的犯罪事件普遍來說還更多。

在社區層面上的犯罪率及其他「社會病理學」的測量方法之間，可以發現明顯的共同變項，如偏差行為、流浪及心理疾病的存在（Faris and Dunham, 1939; Wedmore and Freeman, 1984; Levine, Miyake and Lee, 1989）。至少在這些共同變項中，有些要被視為選擇效應的結果（selection effects）以及社會遷移的結果。一旦一個社區留下惡名，其中較富有、經濟上較有能力的居民就會傾向搬離，而這接下來會導致社區進一步的衰退以及螺旋式地向下沉淪，這有時被稱為「質變」（tipping）。

重要的是，犯罪的發生並不必然侷限於貧窮社區。一項以英國犯罪調查為對象的詳細分析指出：「艱苦掙扎」（striving）與「前途似錦」（rising）的社區，這兩種看起來迥然不同的社區中，犯罪的情形是最嚴重的（Aitchison and Hodgkinson, 2003）。「艱苦掙扎」地區符合一般人對犯罪嚴重地區的印象，其特色是住在公共住宅（或計畫）裡的年老、單親及失業居民，通常都是多重族群組成且收入微薄。相反地，「前途似景」地區的特色是生活富有的單身專業人士及夫妻。然而，這兩個地區往往皆具有低社會資本及高流動性。在這兩種地區裡失竊的比率約略是其他地區的兩倍（每年 5% 相較於其他地區的 2%—

3%)。同樣地，在這些地區車輛失竊率也比其他地區高出三分之二(15%—16%相較於9%—10%)。

123 關鍵的問題是，如區域中犯罪者集中程度這類的個人層面變項是否能充分地解釋這個社區變項。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這並不會對社會資本的解釋有所妨礙，因為個人層面的效果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仰賴年輕人的社會網絡。但是，社會資本理論家相信有更多東西在社群層面起作用，而它可以被歸因為各部分的加總：一項生態層面的結果。

社區的作用超過各部分的加總，其方式之一正是透過微觀或家庭層面社會資本的正向外部性。普特南與其他學者曾指出：

社區裡有許多穩定家庭的存在，此情形之所以與青少年違法程度較低有關聯，並不是因為成人扮演了青少年的楷模或監督者，而是因為成人教養出調適得宜、行為恰當的孩子。因此，「好家庭」藉由增加其他家庭的小孩能結交的「好同儕」數量，而起了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如果我們將會製造麻煩的少年視為具有傳染性的疾病：一種行為上的水痘，會在中學及朋友圈體裡散播開來；那麼，穩定的家庭就提供了疫苗，能減少會傳染給別人的帶原孩子的數目(Putnam, 2000, p. 314)。

這個觀點得到以下證據的支持，即穩定家庭有減少學習中輟及偏差行為的正面效應(Simcha-Fagan and Schwartz, 1986; Darling and Steinberg, 引自 Putnam, 2000)，同時在沒有其他有力的替代性社會資本出現的情況下，對青少年幫派具有負面的效應(K. Scott, 1993; Covey, Menard and Franzese, 1997)。甚至有證據可以支持普特南傳染的比喻，顯示出偏差行為與暴力犯罪的散播已經成功地被塑造成如愛滋病這類疾病的散播(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124 關於社區變項的出現，也有其他相當直截了當的方式可加以觀察。簡單地說，當為數相當多的潛在犯罪者在地理上接近為數不少的受害者時，預期犯罪情形會比較嚴重。一項說明此論點的例證指出：約有四分之三犯下竊盜案的人是步行前往目標物的(至少在英國是如此)(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同樣地，夜間的暴力與飲酒有強烈的關聯，而且此研究發現，大多數攻擊都發生在從飲酒場所通往深夜交通運輸設施之間的主要幹線上(Poyner, 1983)。因此，典型的犯罪高風險社區通常也有較多主要的道路、高比例的商

業及混合的土地使用、更易跨越的邊界、鄰近貧困地區，及較多公共停車場及閒置空地 (Repetto, 1974; Bevis and Nutter, 1977; Greenberg and Rohe, 1984; Evans and Fletcher, 1998)，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意外。普遍來說，犯罪高風險地區顯示了高度易達性，同時土地的使用也較不具同質性——這些是讓潛在犯罪者較容易到達、閒逛，且匿名出現的地區。

然而，這類犯罪高風險的社區往往也可能具有另一項特色，一如上述討論所暗示的：它們的社會凝聚度低；鄰居間彼此多不認識或互不信任，居住者的替換很頻繁，而且一般而言，人們對該地區較沒有向心力。問題是，這些零散部分是如何拼湊在一起的？這類社區的社會凝聚力較低是因為犯罪的關係嗎？或者低度的社會凝聚力真的會促使犯罪產生？更仔細地來看，特定社區的易達性，甚至是社會混雜程度，是不是有可能分別導致較高的犯罪情況及較低的社會凝聚力？

「集體效能」的概念

我們應該認知到，要將糾葛難辨的因果關係區分清楚實在很困難。但仍有許多證據指出社會凝聚與社會資本確實在社區犯罪的程度上扮演了其作用。

再一次地，犯罪學者 Robert Sampson 已超越眾人一步。在一系列優秀、周密的論文中，Sampson 等學者檢視了芝加哥 343 個社區在社會凝聚、非正規社會控制、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Morenoff, Sampson and Raudenbush, 2001)。研究者詢問居民在哪些情況中可以依靠鄰居介入幫忙，藉此測量「非正規社會控制」，他們提出的情況包括：小孩翹課在街上閒晃、外面有人打架、當地消防隊面臨預算被刪減的威脅。另外，他們還用居民對「這是一個緊密交織的社區」及「這個社區裡的人一般來說都處不好」這類句子的同意程度，來測量「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度」(第二個句子的計分方式是相反的)。他們發現在各社區之間，這兩個測量值間有高度關聯性 ($r = .8$)，因此將兩個測量值結合成為單一指標，並稱之為「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利用多層次模型的統計技巧，Sampson 等人發現集體效能與社區暴力犯罪間具高度負相關。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層面的特質，像是婚姻狀態、是否擁有房產、種族、遷移性、住在社區的時間長短、年紀及社經地位等特質之後，仍存在著此負相關。然而，人們仍可以說因果的走向是從犯罪走向集體效能，而非

反過來，有可能是住在曾經歷過嚴重犯罪情況社區的居民會變得害怕參與社會控制的行動，因而一般變得較不信任鄰居。為了檢測這個可能性，Sampson 等人控制了之前犯罪的程度——以五年前的三年平均謀殺事件比率來測量。當然，之前的暴力程度的確顯著地預測了五年後較低的社區效能 ($r = - .55$)。但是，當之前暴力程度被控制後，集體效能仍是一個能顯著負向預測五年來犯罪情況的指標。

後一個結果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為它代表的是一個相對較嚴謹的因果走向測試，顯然透露出走向應該是從社區效能往犯罪，而非相反（儘管也有發現支持相反走向的證據）。作者繼續提到，齊聚的劣勢與暴力之間的關聯多是透過集體效能來中介，就如同住戶的不穩定性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種族混雜以及住戶替換率高的社區暴力犯罪之所以較頻繁，就是因為這類地區的社區較不容易在彼此之間建立起值得信任的關係，或打造出給予彼此充分信任以力行共享「道德秩序」的共識。

Sampson 等人主張，集體效能有減少犯罪的功能，不是因為它讓住戶較有主動直接介入嚴重犯罪事件的可能性，而是因為它使得住戶有較多介入犯罪前兆的意願，如勸阻少年幫派分子聚集、阻止吸食毒品或其他不良行為。他們認為集體效能也透過引發社區做出法定作為之外更多的服務、支持及介入，因此減少了犯罪。除了籌辦社區聯歡活動之外，一個凝聚力強、組織完善的社區還會致力於更多維護街頭安全的行動。

Sampson 等人發現，集體效能與朋友和親屬連繫 ($r = .49$)、組織參與 ($r = .45$) 及社區服務 ($r = .21$) 之間存在著正面相關性。但是，連同其他明顯因素一併控制住這些網絡社會資本的測量值後，集體效能仍是目前為止預測暴力犯罪的最有效指標。Sampson 等人下結論道：「……這些結果指出，密集的個人連繫、組織與當地本身的在地服務是不夠的：暴力減少似乎更直接歸諸於非正式的社會控制以及居民間的凝聚力。」(Sampson et al., 1997, p. 923)

關於對犯罪的恐懼，也有一些證據支持類似的敘述。社區居民若以「人們會彼此相助」而非「人們自掃門前雪」來描述其居住地，他們對犯罪的恐懼一向都較低 (Fletcher and Allen, 2003)。在居民描述為「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社區裡，人們會較擔憂竊盜、車輛失竊、遭受攻擊、被強暴、受到侮辱或騷擾，其比例為 33%—83%。在這類的地區裡，獨自步行時會覺得不安全的比例比其他地區高出三分之二，而在家裡覺得不安全的比例則是其他地區的兩

倍。另一項研究發現，與鄰居的非正式連繫能減低由社區動盪引發的恐懼與不信任，然而正式參與社區組織僅能做到些微的正向緩衝效果（C. E. Ross and Jang, 2000；請參考之後對於「社區守望」計畫的討論）。同樣地，有一項研究針對紐約一部分最窮住民居住的 487 棟大樓住宅中發生的犯罪指出，房客對社會規範的遵守與對房客協會和大樓正式組織的參與，都能事先預測出被研究大樓的低犯罪情況（Saegert, Winkel and Swartz, 2002）。這些觀察（稍後我們會再做進一步討論）所隱含的結論就是：能解釋社區在犯罪與恐懼上之變項的並非社會資本的網絡面向，而是其社會規範面向（請參考第一章裡對這些區分的討論）。

社區守望：可供測試社群－犯罪間的假設？

如果較強的社群意識以及非正式控制能夠降低犯罪，那麼打造非正式控制的努力應該也能降低犯罪。這樣一來，自 1980 年代中期起，世界各地試圖創造「社區守望」計畫的努力剛好提供我們一項實用的測試，測試社群在降低犯罪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這個「測試」裡必須先考慮幾個問題。首先，在社區守望計畫成效的評估中，包含了幾個主要的方法論問題。最常推動這類計畫的地區都是富裕且犯罪情況輕微的社區（Laycock and Tilley, 1995）。例如，在一項針對英格蘭與威爾斯 3,700 個社區守望計畫的研究就提到，這類計畫往往較不可能由住在犯罪情況嚴重地區的居民來發起推行，而且這類計畫在這些地區受挫的機會也較高（Husain, 1988）。這會產生在這類計畫與較低犯罪情況之間有總體正向關聯的誤導，並使得傳統的跨區域研究方法變得毫無幫助。

127

社區守望計畫也被認為會提高對犯罪的通報，而這也為貫時性的方法拋出更多方法論的難題，尤其是依賴官方數據時。不少「置換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s）也可能會發生，意思是必須在鄰近區域追蹤更大範圍的犯罪數值與犯罪率。例如，在一項針對降低住家竊盜計畫的大型評估研究裡，雖然住家竊盜率在該涵蓋地區下降了 35%，但汽車失竊率增加了 82%，而非住家失竊率則增加了 124%（J. Webb, 1996）。

其次，社區守望計畫一般都是與其他類型的介入方法一併執行，像是強化易被侵害的目標（如加裝一個門窗鎖）。例如，早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介入方法之一就是 Kirkholt 方案，它在英國犯罪嚴重的社區中展現了犯罪顯著銳減的

情形 (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然而，在 Kirkholt 方案裡，社區守望計畫是伴隨著其他幾項介入方法一起引入，包括強化易被侵害的目標，以及警察與其他機構之間更佳的配合。

第三，有人會認為社區守望方案是一種相當薄弱的社群。雖然這類計畫通常都有一個精力充沛、盡忠職守的領導者，但其「成員」展現出的熱忱通常相對有限 (Barton, 2000; V. J. Webb and Katz, 1997; Laycock and Tilley, 1995; McConville and Shepherd, 1992)。舉立標示及偶爾探頭看看鄰居的車還在不在，這些並不能等同於大多數人所認知的「社群」。

儘管如此，我們從數據上得知，全球已有數以千計的介入方法出現了，因此現在很適合做個快速的結果檢視，看看實行前後人們的觀點有何差別。

在美國，資料尤其混亂。有個典型的研究（針對辛辛那提 53 個社區）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社區守望計畫對犯罪並沒有影響 (B. W. Smith, Novak and Hurley, 1997)。其他的研究則是持較正面的看法，就像芝加哥一項針對社區維安的評估，認為社區維安確實導致犯罪的下降 (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128 在英國，針對萊斯特兩個地區的 1,500 位居民進行的歷時性研究發現，在社區守望計畫推動後的 12 個月裡竊盜案減少了，但該研究也提到之後數字又回升了。作者認為一開始數字的減少可以歸因於環境的改善，因為在計畫進行的期間，只有少數其他計畫在執行，因此可將竊盜案的減少歸因於社區守望計畫 (Matthews and Trickey, 1994)。另一項研究發現，在六個實行的地區裡有三個地區的竊盜案與汽車失竊案顯著減少，但在剩下的三個地區裡都未見成效 (Husain, 1988, 1990)。另一方面，一份針對倫敦兩個社區守望計畫的詳細評估發現，如果真有差別的話，那麼相較於受到控制的地區，推行計畫的地區在犯罪數上有些微地增加，但對犯罪發生的恐懼則下降了 (Bennett, 1988)。另一個研究則總結認為總體效果並不那麼「明確實在」，而且雖然這些計畫的開展有時會為一些人帶來助益，但大多數計畫很快就歸於沈寂 (McConville and Shepherd, 1992)。

至於美國與英國之外的研究結果同樣混雜不清，但稍微偏向正面的結果。荷蘭有一項針對六個社區守望計畫的研究發現，犯罪情況在其中三個地區大大好轉，但也提到有些地區實在很難推動這個計畫 (Lohman and van Dijk, 1988)。有一項對澳洲維多利亞市的社區守望計畫進行的評估做出結論，認為這種計畫在短期內會讓犯罪減少，但由於缺乏可靠的測量指標，因此對它的

長期效益仍必須存疑 (Mukherjee and Wilson, 1987)。而一項針對台灣台北市的社區守望計畫進行的評估結論是，少年犯罪與煙毒犯確實有減少，但這計畫對暴力犯罪、小型搶劫或整體犯罪的情況卻沒有影響。闖空門以及打報警專線的數量增加了，但這在某程序上或許是反映了通報量的增加 (L. J. Lee, Churprakobkit and Denq, 1999)。

我們應該如何詮釋這些文獻？無庸置疑的一點是，既存的社會資本往往成爲社區守望計畫能否成功的先決要件，而在很多地方（尤其在高犯罪率的地區），此計畫的失敗多跟缺乏社會資本有關。先前是否加入社群組織與在當地居住的時間長短，這兩個因素往往能預測居民參與計畫的程度 (Hourihan, 1987; Yanay, 1994)。第二，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結論，即這些計畫造成的影響一般都是有限、不可靠而且通常是短暫的，但是偶爾會有重大的成功出現。針對這些結果，有一個解釋認爲：或許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性被高估了；結果當然是非常負面，以至於讓執法機關興起反思。一項較合理的解釋認爲（這在本節起始處就已事先預告）社區守望計畫太「薄弱」，以至於無法成爲一個嚴謹的工具去檢證 Sampson 的「集體效能」觀點或社區社會資本的假設。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計畫甚至被視爲撤除社區巡邏工作的政治掩護 (Yarwood and Edwards, 1995)。

129

有趣的是，在那些宣稱計畫成功的地方，通常會指稱說社群的特質起了廣泛的變化，包括社會凝聚力的增加；居民對該地滿意度的提升 (Bennett, 1988)；透過居民互動提升社群連繫；警方與社群關係變得更好 (Mukherjee and Wilson, 1987)。總之，社區守望計畫似乎只是個不充分替代品，想用來代換「真實的」、活生生的社群。一個堅實且有自信的社區裡的居民，會主動積極地對發生在家門前的事件採取行動，如果真的相信這樣的社區能減輕犯罪程度（而且的確有可觀的證據讓我們這麼認爲），那麼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地問，是什麼創造出這種社群及共識？（請參見第八與九章）

鉅觀層面：各國與各地區的犯罪差異

Sampson 等人的分析告訴我們，並非社會網絡本身在社區層面上減少了犯罪，而是社群共同的非正式規範及社會習慣，再加上相互信任感抑制了犯罪。假使有鄰居介入干涉輕微的不良行爲，如小孩逃學或在牆上塗鴉，似乎會避免

該社區繼續惡化進而產生更嚴重的犯罪行爲。而彼此信任的鄰居能夠更有效地爲集體利益而努力，不管是爲了更好的教育環境或是更完善的維護安全行動。我們也能說，這等同於認爲社區裡行爲良好的孩子或穩定的家庭比例越高，會讓社區越容易製造共識與信任的氣氛。有了越多行爲良好的孩子及穩定的家庭，當有孩子逃學時，鄰居介入干涉的功效將越大。

普遍的社會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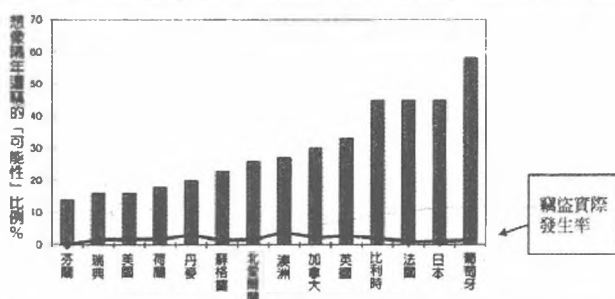
130 規範對犯罪的發生似乎同時具有直接與間接的效果。即使在規模類似的城市內或城市間，某些地區的居民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走路上學，或未將車子上鎖，但其他地區的居民卻不會這麼做。心理學者 Philip Zimbardo 爲此現象提供了一個創新的例證，他在美國各地做了一個實驗，將一輛引擎蓋敞開的汽車置放在路邊，然後觀察其結果。在紐約，這輛棄置的車在半小時內就有零件被拿走，而 24 小時後幾乎就只剩外殼而已。同樣一台車放在加州 Palo Alto 市卻完全沒人碰，除了一位溜狗的老先生在經過時將引擎蓋蓋上，並喃喃自語說著下雨會傷到引擎的話。同樣有助我們思考的是，當實驗設計者結束在 Palo Alto 市幾天無聊的觀察、終於從隱匿的角落出現、要將這台車處理掉時，有人打電話報警通報可疑人物！從外在規範來看，這兩件事並沒有太大不同，但從行爲的非正式認同規範上來看，卻大大的不同。

觀察到的是，對犯罪防治重要的或許是共同的規範而非社會網絡，這個觀察提升了在比社區更大規模的範圍裡也可以看到類似結果的可能性。而這也確實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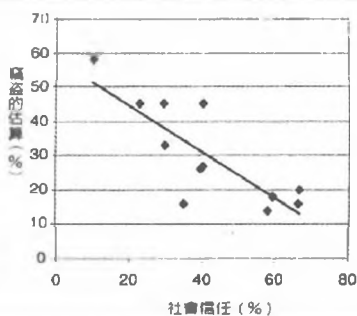
比較美國各州的研究已顯示，社會資本與犯罪程度之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強烈關係。Kawachi 等人發現，（透過標準化問卷題目測到）信任程度較低的州有明顯較高的謀殺率（ $R = .82$ ）、施暴（ $R = .61$ ）、竊盜（ $r = .54$ ）、搶劫或行兇搶劫（ $r = .45$;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再一次，這是一個跨區域性的結果，因此其因果的走向是可以被質疑的。或許有些州的信任度之所以較低，可能是因爲其犯罪率的緣故？普特南曾提出，即使控制了對犯罪發生的懼怕程度，犯罪與社會資本間的關係仍很大——從人們對「擔心家人會成爲犯罪事件下的受害者」這句話的同意度，來測量人們對犯罪發生的恐懼程度（見 Putnam, 2000，第 18 章，註釋四）。如果犯罪真的會導致人們的恐懼，以致不願付出信任或投身於社群之中的話，那麼控制住恐懼應該會削弱該關係，

專題 4.1 什麼能解釋害怕犯罪的變項呢？

許多犯罪學者心中的一個謎團就是：在客觀犯罪率或成為受害者的比率，以及對犯罪的恐懼，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弱關係。例如，各國的人們往往都會過度超估了隔年竊盜案發生的可能性，而且是高估了 10 至 50 倍。更進一步來看，人民預估竊盜發生數值之間的各國變項，事實上與實際竊盜率的差異是沒有關係的。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真正的犯罪事件（在此例為竊盜）相對來說較少，人們乃是從他們與他人關係的一般特質還有媒體來推估犯罪的可能性。



相對於在恐懼與實際竊盜案兩者間缺乏關聯的這件事，假使我們將恐懼及普遍存在陌生人間的信任比率各置於兩個軸線上劃成圖表，會發現一個高度關聯的現象 ($r = -.82$)。我們愈認為他人不能信任時，就愈覺得自己可能會成為受害者。這個發現可能有助於解釋一些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尤其是英國）中令人覺得挫敗的經驗：雖然犯罪減少，但多數人卻覺得它增加了。驅動這類觀感背後的力量並非客觀的犯罪率，反而較可能是社會信任上更廣泛的變化；而近來年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這種社會信任已逐漸衰頹（請見第七章）。

然而並沒有——在某個程度上淨相關被減弱，但仍是極顯著的（在社會資本指標與殺人事件之間 $\text{partial } r = - .53$ ）。

132 近來的一項研究分析了美國各州自 1973-1993 年（已根據年齡調整過的）謀殺案件的比例（Galea, Karpati and Kennedy, 2002）。測量社會資本的方式是取自戶口普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中的社會信任以及每人參與志願性社團數。控制了收入水準與都市化程度，發現具有較低程度社會資本的州很明顯有較高的謀殺比例，這也再次印證 Kawachi 等人的研究結果。然而，時間序列資料也使作者可以檢視社會資本與謀殺案之間隨著時間相互關聯的狀況。他們發現一個複雜的雙向關係，做出了結論，認為暴力的增加可能會減少社會信任，反之亦然，導致兩者間出現一個非線性且動態的關係。

針對此一關係，仍存在進一步的問題。犯罪情況在美國南方各州較嚴重，是因為這些州剛好在比例上特別少有彼此信任之社區嗎？所有社會信任度低的社區，剛好都意外地群集在美國的特定地區，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太具說服力。此外，美國一個典型的州內包含數以千萬計的人；規模大於典型社會網絡的秩序。這種規則性是一個需要鉅觀層面、生態上之解釋的大範圍現象。例如，是什麼不可思議的因素使得路易斯安那州的人民如此相互不信任；無法相互合作，而且還擁有全美最高的謀殺率？

不平等

Kawachi 等人將收入不平等敘述為導致低信任度的一個可能原因。他們發現，暴力犯罪與收入不平等在美國各州中存在著高度正向的關係（ $r = .74$ ）。研究發現這兩個變項都與社會信任共同改變，但與平均收入的共同改變卻沒有那麼大；換句話說，社會信任與犯罪都是由經濟不平等，而非貧窮本身所驅動。

然而，Kawachi 等人不像 Sampson 等人認為在暴力犯罪、社會信任、不平等之間關係裡的關鍵因果連結是自我評價低、沒有尊嚴、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對這個假設的證據，主要來自精神病學法醫 Gilligan 的詳細研究（1996）。Gilligan 的結論是，以他與暴力犯罪者接觸 20 年的經驗為基礎，暴力幾乎從來不是出於簡單的經濟動機，而是出於「對人類社會關係很重要的榮譽與羞恥」的問題。具體的暴力事件幾乎都是源於對自尊、尊嚴的「不尊重」及侮辱。一個人的自尊與尊嚴在受到社會地位低下削弱後，對於侮辱特別無法忍受。因

此，藉由誇大社會地位差異及削弱了「缺乏者」的自尊與尊嚴，不平等因而產生了影響力。

關於經濟不平等與暴力犯罪間的關係，已受到跨國資料的支持。經濟上較為不平等的國家，顯然具有較高的暴力犯罪比例 ($r = .55$; Eisner, 2001)。看來經濟不平等似乎將社會結構延伸到一個臨界點，而這點就展現於縮減的社會資本與增加的暴力（請參考第三章與第八章）。有時讓人們更難與人好好相處的其他差異也有相同效果，像是族群組成上較為異質的人口群（Putnam, 2000, p. 309, 註釋四）。然而，即使在數據上控制了這種社會組成，社會資本在統計上仍然顯著地與犯罪相關，這顯示了在鉅觀層面上社會資本—犯罪關係仍有更多部分有待解釋。

對社會規範扮演的角色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

吻合 Sampson 等人分析的另一個可能解釋是，規範有助於解釋犯罪在地區及國家間的差異。徇私或自利行為可被接受的程度，正是解釋違法行為差異的一個關鍵性規範。有一項針對已知犯罪的共變項（如都市化、年齡、性別）之間關係的分析，顯示在所有情況中，較高的犯罪類型與較高程度的徇私、自利價值觀的表達有相關（Halpern, 2001）。住在大都市的人、年輕人及男性，被測出有較明顯自私表現的傾向，他們將撿到的失物據為已有的態度（「誰撿到就歸誰」）就是一例。² 另外有一點也是很有趣的發現，自從 1960 年代以來這類自利價值觀的表現顯著增加，而這剛好與犯罪的增加同時發生。1969 年時，88% 的歐洲人不贊同這種「誰撿到就歸誰」的舉動，但到了 1990 年時卻只剩 68%，而且在所有國家中都發現這樣的趨勢（Halpern, 2001，請一併參考第七章）。

在一項更為直接的測試裡，國家間在表現自利程度上的差別，被拿來與在國際犯罪受害調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ICVS）的犯罪程度相比較（Halpern, 2001）。ICVS 在各國蒐集資料都是使用同一種方法與同樣的問題，因此不會遭遇一般傳統犯罪記錄統計數據裡固有相似性的問題。假設得到了證實：自利表現程度高的國家，明顯具有較高的犯罪通報 ($r = .51$)，而且在控制了財富、不平等、都市化等變項後，兩者之間的關聯仍然不變。

² 實際的測量方式是來自因素分析的使用，而且是一種複合式的測量方式。「將撿到的錢據為已有」是這個因素中承載性最強的項目。

自利的價值觀會與經濟不平等互相作用；在自利價值觀普遍存在的國家裡，經濟不平等與比例嚴重偏高的犯罪情形有相關。換句話說，並不是經濟不平等一般性地普遍提高犯罪率，而是只在結合了較高程度的自利價值觀，經濟不平等才會增加犯罪。

這為我們開啓了一個新的問題：最初是什麼引發了自利的價值觀或規範？某個程度上來說，自利的規範看來就只是現代生活中必然伴隨而生的一環。一般而言，人們都很樂於留下現代超市中找錯的零錢，但在傳統小型商店裡卻比較少有這樣的情形（Johnston, 1988）。現代的都市生活迫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無數陌生人有所接觸，為了讓日子繼續過下去，我們必須有效地學會忽略其他人（Milgram, 1977）。在《鱷魚先生》（*Crocodile Dundee*）系列電影之一，Paul Hogan 飾演的主角從澳洲內陸到了紐約市，在四處散步時向滿臉疑惑的路人頻頻做自我介紹，當然那些路人會視此舉為一種瘋顛的徵兆。忽視陌生人是都市生活裡很常見的一環，尤其是在紐約市這種大都會裡。

儘管如此，有些城市裡的人民似乎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反社會性，就像 Zimbardo 棄置汽車實驗裡呈現的情形。在自利價值觀上，國家間的差異並不會因控制了都市化而消失，但的確會受到影響（Halpern, 2001）。同樣地，某些國家（像印尼與日本）儘管都市化卻仍維持著低犯罪率，而研究者也認定其主要的原由就是這些社會保留了文化上「社群」（communitarian）的價值觀基礎（Strang and Vernon, 1992; M. D. West, 2002）。

這個說法在結尾處出現了有趣的轉折。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往往有著稍微較低的犯罪率，不過一旦控制了自利價值觀與經濟不平等的程度，你就會發現在國家層面上，較高的社會信任會與較多的犯罪相關。情況可能是，在不平等、人群自利價值觀的某個特定程度上，展現較多的信任（如不鎖門、車子不上鎖）反而是項錯誤。彷彿不平等提供了犯罪的「動機」（看見別人的財富）；社會規範提供了「方法」（如果按利己方式來行事可被接受的話）；而社會信任有時則提供了犯罪的「機會」（如沒上鎖的車子與房子）。至少對跨國差異而言，人們是否值得信任（如同普遍存在的社會規範所指出的）比起人們是否信任他人這件事本身，還更能成為犯罪的指標。

鉅觀效果的總結

例如，暴力犯罪特別容易受到經濟不平等的影響，而吸食毒品則受每人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較大（即愈富有，吸食毒品的情況就愈嚴重）。相對地，財產犯罪受到以上兩個變項的影響都十分微弱，但卻與居住在都市地區的人口比例有顯著關聯（Eisner, 2001）。

這是一幅複雜的狀況，因此以下我們將試著提出摘要。犯罪的問題除了存在著較小規模的社區差異，也存在著大規模的國家與區域差異。在美國各州之間，暴力犯罪與社會信任、社會資本的複合性指標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在各國之間，發現一項更具綜合性測量犯罪情況的數值（也因此是一項較關切財產犯罪而非暴力犯罪的測量值），它會與自利價值觀產生共變。這些分析並不是直接使用可比較的測量方式，而我們的結論也因此必須遭受適切且健康的警告。儘管如此，迄今的證據指出，一個社會若受制於其內部緊繃的社會連繫壓力，如高度的經濟不平等或族群高異質性，那麼它的犯罪率也將會較高。這個事實尤其是在暴力犯罪的層次上，受到社會之社會資本的減弱之中介，範圍包括人們彼此信任與尊重的程度；人們針對願意接受哪些行為達成共識；以及人們維持共識的介入等。在能影響犯罪情況的根本規範上，這些也成為各國與各區域間的變異。就如同棄置汽車的實驗所指出的，在某些地區與國家，其文化較能接受「占別人便宜、有時甚至是欺騙別人」這件事。然而，這算是社會資本嗎？

具有一個看重公民權益的國家文化（認為欺騙他人或陌生人是不對的），並不符合狹義的社會資本定義，即認為社會資本只包含互相認識的人們所組成的網絡（請參見第一章）。但是它確實符合大多數的定義：社會資本是「爲了相互利益而協助合作與協調的網絡、規範與信任」（Putnam, 1996；黑體字爲作者所加）。

結論：犯罪與社會資本——各層面間的互動

證據指出，社會資本在微觀（親密）、中觀（社群）及鉅觀（區域）層面上，都對犯罪情況產生了因果上的影響，以圖 4.1 來表示。在微觀層面上，我們發現，較少受到親密及信任關係牽絆的人，較有可能成爲違法者與受害者。強烈、持續且值得信任的親密關係，會將年輕人拉進一個包含承諾、價值及「主流的」滿足感的網絡，它能抑制犯罪違法行為。有些人發現自己比其他人

更難以建立這種關係，不管是因為其早年的家庭關係中充滿著父母缺席、虐待、斷斷續續的家庭生活等特質，或是因為其家庭結構的因素。但是在生命歷程中的任一時段進入這種主流的親密關係，仍然在抑制違法行為上具有重要的效果。此外，如果傳統的服從社會關係本來就淡薄，「負向」型的社會資本如少年幫派等，就可能會填補中間的空隙，讓個人和另一種且具競爭性的規範與忠誠性產生連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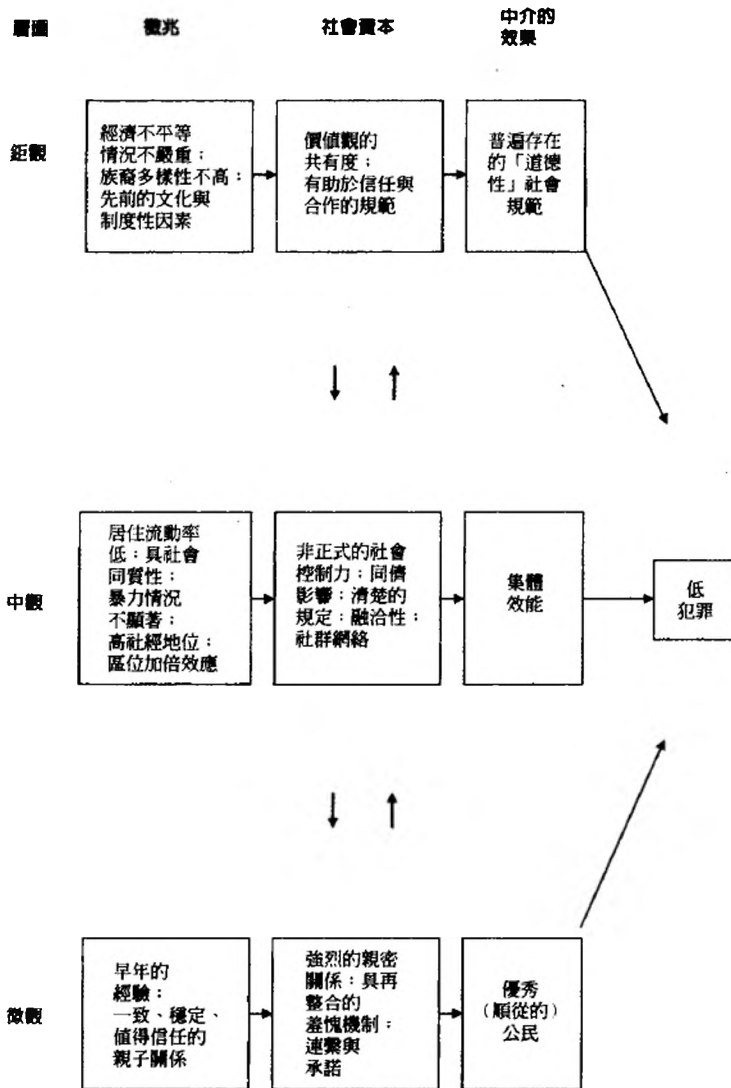


圖 4.1 社會資本與犯罪在微觀、中觀、鉅觀層面的關係一覽

在中觀或社群層面上，我們發現這些個人及家庭敘述相互強化。同儕的影響很強，一群違反社會常軌或是服從常規的年輕人，能驅使「中間分子」（average）開始偏向違反或服從社會規範，在學校或社區裡創造出一個任何個人或家庭都難以對抗的獨特文化。同時，各個社區的「集體效能」就有本質上的相異，範圍包括鄰居是否能彼此信任及集結起來加強執行關於可接受行為的日常規範。社經地位高、居民流動率低、朋友及親屬網絡較密集、組織參與度較高，這些都與高度集體效能有關。各種不利條件齊集、社會或族群組成異質性高，這些則與低度集體效能有關。然而，集體效能並不能被化約成爲上述的這些因素，而且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它對犯罪也有極大的影響。

最後，在顯然與社會資本相關的犯罪層面上，我們也看到大規模的區域甚至是國家間的差異。這些差異裡有部分似乎反映了鉅觀層面的社會及經濟影響力，如經濟不平等，這些影響力伸展了社會結構、降低信任感和相互尊重，以及縮減微觀及中觀層面建立社會資本的共同基礎。地區與國家間的差異也突顯了犯罪在文化與規範上的潛在差異：日常生活的非正規規則。社區間在社會規範上會有所差異，同樣地，整個國家也是如此。

事實上，這些層面的影響是相互纏繞的。心理學者曾提出所謂的「權威式父母管教方式」（authoritative parenting）對孩子的正面效果。這類管教方式的特色包括對孩子的成就給予關懷及贊許；透過明確且一致的標準來指導及管理；讓孩子有決定權並授予一定的自主權（Baumrind, 1973; Shaffer, 2005）。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現象，但它也可以從兩方面來切入：文化基礎的角度，及能被接納的行為和塑造孩子社會化的潛藏價值觀。換句話說，即使是最親密的關係也帶有一些文化決定（鉅觀）因子在裡頭——像是父母會重視孩子該有哪些特質，從強調服從轉向強調獨立思考，或是對性別角色上的態度轉變（Halpern, 1995b）。同時，大多數鉅觀層面的效應最終都需要一個微觀層面的解釋或至少是對應。普遍被信守的價值觀與行為，一般都是源自於個人與社群的行為，而且前者也是透過後者來維繫。

138

對於羞恥的爭議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例子可以突顯不同分析層面間的相互連結，就是「明恥」（shame）現象。Braithwaite 具說服力的主張，認爲社會與社群使可能違法的個人感到「羞恥」的能力，在預防犯罪上是很重要的（Braithwaite, 1989,

1993)。更明確來說，他將「整合性羞恥」(reintegrative shame)與「污名化」(stigmatization)做了對比。兩者都是懲罰的形式，然而：

污名化是創造出被排斥者的羞辱行為，讓「罪犯」成爲一個驅離所有其他認同的最主要地位特徵，這種羞辱讓人們無法維持與違法者之間的尊重連繫。相反地，整合性羞恥則是立基於尊重，在與違法者之間持續的關係內，施予不表贊同的態度；這種明恥把焦點集中在行為之惡上，而非視違法者爲無可救藥的惡人；在這其中，讓人感到羞恥之後是保證不再有偏差行為；在這裡，寬恕、道歉及懺悔受到文化上的重視 (Braithwaite, 1993, p. 1)。

雖然 Braithwaite 並未引用社會資本的文獻，但兩者間的相互呼應之處卻很引人注目。例如，他指出：「當我們被所在意的人羞辱時，我們最能感受到羞恥」，而「身處許多和他人相互仰賴關係之中的人，他們曝露在更多導致明恥的可能來源當中」(1993, p. 12)。同樣地，兩邊的文獻都非常強調社會網絡以及讓它能起作用的內化價值觀或規範這兩者的重要性。看起來整合性羞恥似乎只有139 有在社會資本存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在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裡，它絕非是可能的選項。這類的社會反而必須仰賴不管是經濟上或身體上的直接懲罰。另一方面，僅是社會資本的出現並不足以確保採用的是整合性羞恥，而非污名化。因此，這個關係應該以下列的陳述來表示：社會資本是整合性羞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就像父母的管教行為一樣，無法將明恥化約到單一的分析層面上。明恥是個人的經歷，而且大多時候來自親近的朋友或親人。但它的效用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一個更大網絡或社群的存在，而它的形式及性質也大多由文化來決定。

最後，我們或許注意到，明恥本身就是一個讓社會資本運作起來的機制。事實上，普遍存在的非正規約束力，如明恥，對社會網絡的運作及特性來說都非常關鍵，因此在本書一開始就會指出，非正規約束力可被稱爲社會資本的三大基本組成元素之一（請見第一章）。就社會資本是種公共財的角度來看，它一直都容許個人從別人努力促成的社會資本中得利——即搭便車 (free-ride)。對網絡內的成員來說，明恥是對抗這種搭便車行為最重要的約束力之一。

「行為場景」的概念

心理學者發展出一個概念，可以貼切地捕捉微觀、中觀與鉅觀層面的匯集交錯。生態心理學者試圖透過「行為場景」(behavioural setting) 這個概念來解釋這個現象 (R. G. Barker, 1968)。

例如，想像一個外星人第一次看到圖書館，它看起來就有點像是一種各個組成元素各就其位的行為生態系統。讀者都照著一個普遍被瞭解的程序在運作：他們拿到自己要的書，坐下來並安靜地閱讀等等。在這個場景中的其他人則整理著還書及其他放在桌上未使用的書，並按照次序將它們歸回書架上的位置。更進一步來說，整個實質環境強化及形塑這些行為。一條條木頭都被裝置在適切的高度上讓讀者坐下，而其他人則在正確的高度上放好書籍以供人取閱。即使你過去從未到過圖書館，你也非常有可能會知道自己該如何做。如果你真的做錯了（如開始大聲講話或吃起午餐來），那麼其他同在這個行為世界的人很快會藉由一些方式試著重新形塑你的行為，如盯著你看，告知規則，或最後甚至不得不將你逐出這個場景。

這樣的一個行為場景就像是一個社區、學校或家庭，確實是一個社會及行為生態系統，裡面包含了個別細節、當地規則及文化性的認識，這一切都是共同匯集以形塑出特定結果。同樣地，在每個情形裡，人們都能辨識出告知、執行和逐出這些都是由場景內的人用來面對種種情況的行為，以確保社會規範能被維持。犯罪也可以從行為場景的角度來理解，而有時則要從行為場景崩壞的角度來瞭解。服從社會常規的行為或違法犯紀的出現不僅是出自於個人，而且也是出自於一個行為、關係及共同認知的整體結構。

140

結語

犯罪學者一般都會在「社會解體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的標題下討論本章中提及的多數證據。所謂「解體」指的是在家庭內或微觀環境中的解體，還有社群內的。我並不是想勸阻犯罪學者繼續使用他們當前採用的詞彙，只是必須認清一點：犯罪學家所陳述的內容及所探索的社會現象，必須與經濟學者、健康專家、教育學者等所檢視的是相同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

最後，還有一個關於時間框架的爭議。這一章就像許多文獻的章節一樣，

談論了因果關係，但卻未真正仔細地討論在因與果之間的時間長度。在一件犯罪發生之前，我們或許會考慮直接的主要原因：如違法者的意圖、情境造成的壓力、個人的態度、旁觀者的行為等。但任何特定情境的根源都是歷經很長一段時間才打造出來的；個人的態度與情感依附也是花了好幾年才培養出來的；一個社區的特質以及被接受的規則或許得花上數十年才得以建立；而國家共享文化中的規範則更可能得經歷數個世紀才能發展出來。有些情況下，這些不同的時間框架意味著，在我們所檢視的因果關係層面間可能存在著張力。例如，一個社區內的社會信任可能從長期來看是犯罪之所以減少的基礎，然而從短期來看也可能為某個人提供了犯罪的機會。

141 總之，不管不同類型犯罪之間的重要差異，及許多在此未提到的導致犯罪的原因，還有每個人查看社會資本的方法與層面，社會資本仍然深深地含括在導致犯罪的原因中。我們在整本書裡所不斷看到的，這絕非僅是個「越多越好」的簡單說法，因為某些社會資本的形式確實會助長犯罪。相反地，這比較像是去瞭解由不同社會資本形式所扮演的可能性角色，不管其好壞。要試圖挑出社會規範網絡再相對於約束力的重要性，或挑出某層面相對於另一個層面的重要性，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然而，根據至今所看到的證據，我們確信犯罪與社會資本（特別是暴力犯罪與社會資本）都是同一敘述裡的一環。

進階閱讀

若想瞭解這些過程在個人層面中呈現的方法，請參考 Sampson 與 Laub (1993)。若想查看關於社區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犯罪的論文，可以試試 Robert Sampson：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犯罪或成為受害者方面的調查是很豐富的資料來源，一般認為比警方的統計數據還更值得信賴。這類調查比較常進行，樣本數也愈做愈大，而且還能連結更多的情境脈絡性及地理性資料。許多國家現在都有進行這類調查，而且這些報告都能免費下載。關於美國國家犯罪與受害者調查的結果能在 www.ojp.usdoj.gov/bjs/cvict.htm 找到。

關於英國的同類報告結果則能在 www.homeoffice.gov.uk/rds/bcs1.html。國際犯罪受害者調查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提供 50 個國家以上的有用比較，並以此為基礎做更進一步的研究；這份資料也能在 rujjs.leidenuniv.nl/group/jfcr/www/icvs/Index.htm 找到。

在較為理論性的層次上，一部討論明聰的引人入勝作品：請參見 Braithwaite (1989) 或 Braithwaite 另一個較短的作品 (1993)。

第五章 教育

如今，證據勝過爭論。當學校與家庭並肩合作地支持學習，孩子不光是在學校裡，在未來的一生中也更可能成功，……當父母在家裡參與了孩子的教育時，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就會比較好。當父母參與了學校活動，孩子在學校裡也會進展得更棒，而且孩子也會進入更好的學校就讀。 142

Henderson and Berla, 1994, 引自 OECD, 2001a, p. 92¹

很多研究已將焦點擺在社會資本的不足會導致負面結果的情形上，像是犯罪行為和偏差行為（請看第四章）。社會資本與教育情況之間的關係，透過很多方式反映在犯罪情況上。然而，雖然上述這段開場引文頗顯自信，但文獻顯示的卻並非都是意見一致的狀況（Dika and Singh, 2002）。這些文獻質疑了一些教育社群與政策制定者廣為接受的智慧，尤其是「想在教育上做出成績來，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更多預算」的這個想法。

低教育成就是弱勢循環過程中一個關鍵連接點（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Kiernan, 1996）。有許多變項在這個弱勢循環過程同時起作用，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文化資本，當然還有金錢上的資源（Quinton and Rutter, 1988; Feinstein and Symons, 1999; A. Sullivan, 2001;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請同時參考第八章及圖 8.1）。研究成果顯示，父母的人力資本與財力資本有助於預測孩子在教育上的成敗。但是，社會資本仍能解釋大量其餘的變異量，也有助於解釋由父母的人力與財力資源所造成的影響。 143

我們將以類似前幾章的方式，先從微觀的親密層面進行到中觀或社群層面，最後再進入大規模或鉅觀層面，徹底討論結果的各個層面。然而，教育不像其他我們檢視過的結果變項，它與社會資本有獨特的關係，在這關係中某些人也將教育視為創造社會資本的一項關鍵工具。事實上，如今所有 OECD 國

¹ 此段也曾被普特南引用（2000, pp. 303-4）。

家都有明確的「公民身分」(citizenship)教育計畫，而且少數沒有的國家也正在引進這些計畫 (Torney-Purta et al., 2001)。關於哪些內容創造了社會資本；這個議題將會在第八章中再進行更細節的討論，但本章將就教育明確地隱含在創造社會資本的部分做概要的討論。

微觀：支持性家庭

當前許多研究都表示，孩子最直接的社會網絡主要是家庭，其規模與品質對孩子的教育成就有重大的影響。一如在本章開頭的引文所言，今日這個影響的重要性已廣被接受。

研究發現，有父母陪在身旁且付出關心的孩子，比較可能獲得較好的考試成績、完成高中學業及進入大學就讀 (Valenzuela and Dornbusch, 1994; Furstenberg and Hughes, 1995; Parcel and Geschwender, 1995; Y. Sun, 1999;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這類證據許多都來自美國，使用的資料大多來自國家教育貫時研究 (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NELS)，這是針對二萬多名孩子所進行的貫時研究，讓研究者因此能在統計上控制像社經地位這類的變項。但在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例如，Majoribanks追蹤了澳洲與香港小孩的經歷，發現家庭社會資本（即親子關係）與青少年（尤其是男孩）的教育表現之間，具有中度至高度的相關性 (Majoribanks, 1991; Majoribanks and Kwok, 1998)。同樣地，一項英國的國家孩童發展調查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urvey) 所做的分析表示，在控制了孩子十歲時自身能力與父母所施予的關注程度之後，父母的關注是預測年輕人在 16 歲時教育表現的關鍵指標 (Feinstein and Symons, 1999)。

144

在孩子發展的早期，會付出關注及回應孩子的成人將引領孩子進入社會性世界，強化並重覆孩子自己的互動，此即心理學家所謂的「嚙合」(meshing)，捕捉孩子的興趣，並協助指引這個興趣的走向 (Shaffer, 2005)。簡言之，與關心孩子的成人的互動，這是孩子藉以發展情緒、社會控制的主要管道，然後孩子才會成為能保持注意力且有效率的自學者。

教育企圖心 (aspiration) 的作用

父母對孩子在教育上的影響，有一大部分是透過父母的企圖心中介的。

一般來說，參與孩子事務較多的父母，似乎都會鼓勵孩子擁有更高的教育及職業企圖心 (Majoribanks and Kwok, 1998;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這因此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教育表現是預測其孩子在教育表現上的重要指標。親子互動程度較高，一般都會同時增加孩子及父母的期望 (Hao and Bonstead-Bruns, 1998)，而較頻繁的親子互動有助於解釋許多移民團體擁有較高成就的情形。這結果在父母與孩子感情和諧時最明顯；當他們感情不合時，較頻繁的互動事實上反而會削弱期望。

這些結果與其他結果密切相關，更多一般性研究指出：有較高的期望（即相信自己），對教育表現有非常大的正面效果 (Weiner, 1979)。研究顯示，得到虛幻正向回饋的孩子，之後的表現會比受到控制時更好。有一項著名的實驗顯示，若提供不實測驗成績給一名教師，讓教師認為學生比實際上更聰明，那麼會發現學生一年之後在學業上會有亮眼進步 (Rosenthal and Jacobson, 1968)。² 換句話說，如果其他人相信你的能力，並給你正面的回應，則他人將增加你的企圖心，並激發你立下更高的目標並予以達成。當然，這就是發生在大多數親子互動裡的情形。

量與質

在這些社會關係與網絡中，出現一個關於爭論「量」與「質」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在與單親家庭相關的議題上特別急迫，而大多數國家的單親家庭數目已急遽上升。心理學者已仔細研究早年親子互動的品質對孩子發展的影響，包括他們在智力及學業上的表現。孤兒或社會照顧機構裡的孩子在學業上表現不佳，部分可歸因於他們與成年照顧者之間斷裂的社會關係，特別是成年照顧者的變動率又高 (Hodges and Tizard, 1989; Rutter, Quinton and Hill, 1990)。同樣地，在孩子童年時期母親的抑鬱消沉也會大大破壞母子互動的品質，而會導致孩子在 11 歲時智能測驗的分數顯著偏低，尤其男孩會特別明顯 (Sharp et al., 1995)。

教育學者處理這個議題的方式，是在家庭關係中區分出「結構」與「過程」層面。結構性因素指的是家庭裡成人的人數、他們的關係型態（例如是親

² 後來，這個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為人批評，而之後控制較佳的研究發現其對智商的影響較有限得多，但仍印證了老師的期待顯著地影響一個孩子在學校的普遍表現 (Snow, 1995; Mackintosh, 1998)。

生父母或繼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人數。這大致等同於社會資本裡網絡的組成元素（請見第一章）。過程性因素指的是網絡內互動的層面及品質，不管其結構；還有它與社會規範及非正式約束力的更多相關性。

普遍說來，不管是家庭社會資本的結構或過程層面，都影響孩子在高中教育裡的成就（參見 Israel, Beaulieu and Hartless 於 2001 年分析 NELS 的例子）。然而，我們不能假定孩子在家庭環境裡增加任何一種與成人接觸的機會，都與教育成就的改善有關。事實上，有些類型的親子互動若增加了，確實會增加對教育問題的回應（但這不一定就意味著這些問題毫無幫助）。因此，一項針對 NELS 的分析發現，父母參與度增加，在許多面向上看來都與較佳的學業成就有關，如親子間談論在學校發生的事；但在另一些面向上則會對學業成就造成負面影響，如父母檢查孩子的作業（Desimone, 1997）。同樣的研究也發現，父母的參與度所造成的影響，會隨著社會群體而有所不同。尤其對低收入戶的學生來說，父母的參與度一般比較少造成正面影響（請同時參考 Valadez, 2002）。

但是，單親家庭（就某程度來說，雙薪家庭亦然）的議題，一直都是爭議的焦點。許多研究發現，以教育成效及防止輟學方面來看，一般來說父母都陪在身邊明顯比只有一個家長在更好；換句話說，結構性或網絡性社會資本（數量）都重要（McLanahan and Sandefur, 1994; 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Pong, 1998）。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結果可解釋為：相較於只有一個家長在身旁，父母都陪在身邊意味著更頻繁的親子接觸。支持此一簡單結構性解釋的是一項發現：對於擁有較多兄弟姐妹或是在家裡排行較後面的孩子，都與智商較低及學業成就較差有關（Zajonc and Markus, 1975）。基本上，一個家庭裡有愈多的孩子，就會「稀釋」或減少較晚出生孩子能與父母相處的時間。

然而，詳細的分析顯示，單親家庭的孩子教育成效之所以不佳，是因為親子互動時間以外的原因。其中一項因素就是家庭收入較低，但它絕非唯一或主要因素。單親家庭相較於雙親家庭，結果會擁有較小的社會網絡及較少的社會連繫（McLanahan and Sandefur, 1994）。比起完整的雙親家庭來說，他們明顯地較常搬家，因此會破壞家庭的社會網絡，也使得孩子較常轉學。但研究結果尚未確切指出這種較低的教育成就與較高的輟學率是否源於孩子與父母的社會網絡包括跟學校的社會網絡產生破裂，或者這結果是源於家庭崩解所帶來的創傷（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類似的因素有助於解釋與繼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學業表現較差的原因。例如，孩子與繼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中，其早期的輟學率是與親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兩倍以上（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儘管繼父母家庭的收入比起單親家庭高許多，但前者仍然比親生父母俱在的家庭要更常搬家，而且社會資本更有限與更顯斷裂。

反駁「量很重要」這個簡易假設的進一步證據，來自於關於雙薪家庭的文獻。有個家庭社會資本的簡單結構模型表示，雙薪家庭的孩子也會較處於劣勢，但研究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仔細地研究後會發現，雙薪家庭（或是單親家庭裡唯一的家長要外出工作）可能同時產生正向及負向影響（Parcel, Nickoll and Dufur, 1996）。M. O'Brien 與 Jones（1999）在研究母親為勞工階級的例子時發現，當孩子的母親有工作，尤其是兼職工作時，孩子的表現會最好。較高的教育企圖心似乎解釋了這個正面效應的大半。同樣地，Bianchi 與 Robinson（1997）發現，母親在外兼差的孩子相較於母親為全職家管的孩子，明顯較少看電視，且較常閱讀。看來要工作的家長，至少是有兼職的父母，會很努力地確保自己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有好品質」，或許某種程度上是想彌補自己工作不在家的時間。在另一項驚人的發現中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即相較於母親為家管的孩子，母親有兼職的孩子反而有較多與母親相處的時間（M. O'Brien and Jones, 1999）。這些有趣的發現引起一些人提出建議，鼓勵彈性兼職工作安排的政策將會顯著地有利於孩子的認知發展及教育成果（Parcel, Nickoll and Dufur, 1996）。³

147

不只親子互動才重要

個人的社會資本不能只被化約為家庭內最直接的關係。孩子與父母在許多其他領域中的社會資本各有差異，像他們是否參與了社群或志願活動；或他們是否與孩子的老師或孩子學校朋友的父母建立持存的關係。

Furstenberg 與 Hughes（1995）在一項針對高風險年輕父母所做的詳細研究指出，很明顯地可經由母親的社會資本，而不只是親子互動本身來，預測孩子的教育表現。即使控制了父母的人力資本以及孩子過去的表現，這些預測仍

³ 這個推測受到從社會福利到就業計畫的證據的支持。一般而言，這些證據都發現讓母親回到職場能提升孩子的學業表現，至少會持續到 12 歲左右。這個效果在某程度上被認為是出自於母親自信的提升及社會網絡及資源的擴大。

具效力。在下列情況中，孩子會有較好的在校表現：當母親本身從她自己的母親（即孩子的外祖母）得到（及給予）更多支持時；當母親認識越多孩子的朋友，而援助網絡愈強時；還有當母親每週至少拜訪好友一次時。另外也發現，孩子的朋友及其父母的教育企圖心，對孩子本身的某些教育表現而言也很重要。

同樣地，一項以身處劣勢的鄉下女孩為對象的精緻統計研究發現，不論是家庭內或社群導向的社會資本，都與中等教育之後繼續升學與否；高中畢業與否；以及是否加入勞動力市場有顯著關聯（Doebler, 1999）。這項研究發現，參與課外活動在每項統計顯著的模型裡都有很強烈的效果。

如同先前提過的，NELS 的大規模研究分析顯示，搬家對教育成就有負面的影響，這意味著孩子與父母擁有更廣大的社會網絡很重要。家庭本身以外社會資本的斷裂，解釋了許多家庭結構和教育結果之間的關係（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1997；請同時參考先前的討論）。

148

與老師的關係也會影響教育結果，這個發現並不令人意外；父母—老師的關係以及孩子—老師的關係，都有助於解釋較優秀的教育表現及中等教育之後的教育歷程（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1997; Jordan and Plank, 2000）。

少數族裔的教育表現

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裡，少數族裔群體的教育成就都是很多人關注的焦點。例如在英國，不同族裔群體的教育成就差別很大，相較於多數的白人，許多群體都表現得超出期待，但也有些團體表現得未盡理想（Madood et al., 1997）。

研究發現，在少數族裔群體及多數白人的教育成就上，社會資本都扮演著類似的一般性角色。例如，研究者發現，「家庭主義」（familism）能改善在美國的墨西哥裔、英裔青少年的分數（Valenzuela and Dornbusch, 1994；樣本數為 3,168 人）。Teachman、Paasch 與 Carver（1996）發現，約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美國黑人比美國白人更有輟學的可能，但黑人較差的表現可能可以完全歸因於他們相對來說較缺乏財力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同樣地，Plutzer 在一項針對美國黑人女孩及年輕女性的研究中（1998）發現，對孩子監管較嚴格的父母，能大大地幫助孩子設定並達成其教育目標。而 Qian 與 Blair（1999）以及 Yan（1999）皆利用 NELS，並發現父母有參與學校活動對於非裔與西裔美國人的教育企圖心有巨大影響。

各種團體都陳述過在效果上的一些變異。例如，一個研究陳述了在不同族裔群體間，父母參與的影響力在強度甚至方向上的大量變項 (Desimone, 1997)。尤其這個研究發現，父母參與在內的變項相較於對白人、黑人、西裔的影響，一般而言對亞洲人比較不顯著，雖然這或許反映了在該團體裡較低的變異程度。⁴ 在白人學生及拉丁裔學生學習數學時（以耗費長時間學習及收入回饋而聞名的選擇），父母的參與情形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研究發現，對白人學生來說，父母的參與有其效果，但對拉丁裔學生卻無用，尤其對社經地位低的拉丁裔人來說更是如此 (Valadez, 2002)。

更重要的是，父母—孩子和父母—學校之社會資本的程度上差異，有助於解釋各族裔群體間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 (Qian and Blair, 1999; Yan, 1999)。因此，家庭社會資本低，有助於解釋美國黑人普遍較低的教育成就。那些極少數能成功的黑人學生，都具有和成功的白人學生一樣高的家庭社會資本以及父母參與程度 (Yan, 1999)。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己可取得社會資本的優劣，每個人並非盲目無視。焦點團體的成果清楚揭示了弱勢族裔團體成員感覺自己身處劣勢，因為他們缺少那些地位較鞏固的多數團體，尤其是擁有聲譽卓著的專業人士所擁有的社會網絡（請同時參考第二章）。有證據顯示，這正是少數族裔以及身處劣勢的團體之所以熱衷於投身教育的原因之一，是爲了要跟優勢抗衡。當富有者與各方關係良好者能在自己的連結上建立起一段成功的生涯，那些處於劣勢、各方關係都較有限的人則必須專心致力於學業上的表現 (Zweigenhaft, 1993)。如果家庭關係無法提供個人所需的社會資本，那麼另一個選擇就是集中精力以建立屬於個人的人力資本。此外還有一個選擇，雖然並不總是具有教育上的效果，那就是加入學校的籃球或足球隊，以此做爲取得另一種社會資本的管道 (Eitle and Eitle, 2002)。

輔導：一項實驗性介入

實驗性介入永遠都令人感興趣，因爲在它們起作用時，我們就能更確信自己已弄清正確的因果關係。當然，實驗性介入可指出我們針對當前發生的事可以有所反應上，因此也具重要性。

⁴ 如果在特定族裔團體內，父母的參與普遍來看是高（或低）的，那麼它在統計意義上就無法「解釋」太多事，因爲它沒有足夠的變異項。

談到家庭與親密的社會資本，要進行真正的實驗十分困難，或許也會違反倫理。然而，在這個領域中有個檢驗社會資本假設的有趣試驗：以輔導的方式企圖提升身處劣勢的孩子的社會資本，進而提升他們的教育成就。這種方式的政策介入仍在草創階段，因而很難對它做出有系統的評價。

Johnson 曾評估在費城實行的「贊助學者」計畫 (Sponsor-a Scholar) (Johnson, 1999)。這個計畫的基本理念很簡單：「不管是否有關聯，讓有愛心、有影響力的成人提供一種對年輕人未來發展助益無窮的社會資本」。她發現「贊助學者」計畫對高一、高二的學生學業上的表現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對高三學生則沒有。她也發現，該計畫對準備進入大學及在高中甫畢業第一年就進入大學的人而言，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基於相同的旨趣，她發現劣勢學生在這個計畫中受益最多。此發現符合另一項證據：處於劣勢的學生是最有可能缺乏社會資本以及其他形式資本的人，因此也最有可能從此介入方案中獲益。

另一項可能會讓人印象更深刻的結果則由 Kahne 與 Bailey (1999) 提出。他們描述的計畫所介入的學生，年齡比起費城計畫所介入的年齡要小得多。他們共評估了兩項「我有一個夢想」(IHAD) 計畫，兩項都將重點放在小六學生身上。兩個 IHAD 的贊助者都認養了一整班的六年級生，與計畫合作者一起長期提供這些學生金錢、學業、社會上的資助，期望他們能自高中畢業且進入大學就讀。研究者發現，這些計畫都「無比的成功」。順利畢業率各從 37%、34% 提升到 71%、69%；也就是說，增加了幾乎兩倍。研究者認為，社會資本的提升是這個計畫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因素。他們在結論中指出這些介入方案做為一項協助城市中心貧民區年輕人的政策工具所具備的巨大潛力。

相對於以上兩項極度正面的研究，英國最近的一項實驗性研究則發現了非常負面的結果 (Defty and Fitz-Gibbon, 2002)，樣本取自 120 位來自 15 個學校「企圖心低」的 15 歲孩子。這是根據預期這些孩子在 16 歲後繼續就學的機會不大所做的認定，即使這些孩子的能力與同儕的能力相仿。這些「企圖心低」的孩子裡有半數被隨機分配到一個介入團體，孩子在其中會被挑選出來好讓學校施予額外的牧養指導；控制組則未被挑選出並待在學校裡。研究發現，被挑出而給予額外指導的孩子，事實上在之後的 GCSE 考試 (譯註：即英國大多數 16 歲學生會參加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明考試) 裡的表現明顯比控制組還差。更進一步來說，他們接受的諮商愈多，成績就愈差，雖然這可能是反映出他們有

較多的需求。

我們要如何將「贊助學者」及「我有一個夢想」計畫相當正面的結果與英國研究令人沮喪的負面結果等而觀之呢？介入方案本身的品質，以及計畫中孩子年齡的相對性成熟是可能的解釋。然而，更可能是因為在英國的實驗中，從一群孩子中指名其中一個特定孩子較有失敗可能性的這一個行為，透過將孩子貼標籤及可能地污名化，導致這個實驗造成的傷害反而比益處大。這個結果吻合之前的另一些研究結果，發現將孩子認定為能力較差的行為會影響教師的期望及較差的表現，因而為了避免偏差行為的個別介入方案，反而有可能導致更糟的結果（Rosenthal and Jacobson, 1968; McCord, 1978; Dishion, McCord and Poulin, 1999）。相反地，成功的美國研究是一次介入一整個同儕團體，而不是把孩子當成失敗者似地個別挑出。

這些正面的結果強烈地指出，社會資本匱乏就在許多處於劣勢的年輕人學業表現不佳的現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建議這些匱乏的情況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透過提供其他社會資本形式做為補償。然而重要的是，輔導式介入不會將個別孩子貼上不如同儕的失敗標籤，而且若在年輕人接受教育初期就提供介入方案的話，效果似乎也比較好。

中觀層面：學校與社群效果

柯爾曼在一篇如今已成為經典的論文（1998）中提到，即使控制了父母的財力與人力資本後，在美國，教育失敗的可能性在天主教學校還是比在傳統非教會學校低。他提到，公立中學的輟學率比天主教學校更高三倍。柯爾曼認為這是將父母、孩子及天主教學校串連在一起的網絡強度所造成的。⁵ 父母、學生、教師都綁在同一個網絡裡，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並帶著高度的「緊密性」（closure）特質。換句話說，在典型的天主教學校裡，與你的朋友一塊兒翹課沒有好處，並希望這件事不會傳到父母耳中。

柯爾曼的發現已在好幾個其他研究中得到印證。Bryk、Lee 與 Holland（1993）估計，如果一所普通的公立（州立）學校可以採行人口特徵上與之類似的天主教學校所具有的共同體特質，它將可以在大部分數據上從一般水準往

⁵ 對照天主教學校在微觀層面上對社會資本的正面效益以及天主教在鉅觀層面上對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La Porta et al., 1997；請同時參考第八章）

152 上爬升 20% 到 30%。他們發現學校規模小也有幫助，這是其他研究所印證的結果 (Bryk, Lee and Holland, 1993; Langbein and Bess, 2002)。規模較小的學校比起大學校，較有可能出現學業成績好及動亂較少的效果，但是也可能透過建立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來緩和由規模大小所造成的效果，如最明顯的就是透過大型的校際球類計畫 (Langbein and Bess, 2002)。⁶

柯爾曼的發現同時從較廣的層面來看，也從 Teachman、Paasch 和 Carver 針對 NELS 的再分析中得到印證 (1996, 1997)。他們發現天主教學校的孩子在高一之前輟學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在統計上控制了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居住在鄉間與否、居住在南方與否、性別、族群、兄弟姊妹人數及兄弟姊妹輟學人數，輟學的可能性仍因為唸天主教學校而減低到約 45%。天主教學校的正向效果並無法用結構性家庭特徵 (如雙親裡有一個是繼父或繼母) 來做解釋，但是這些家庭因素對輟學率來說都是有利的獨立影響因素。天主教學校與父母—學校的高度連結有關，而這似乎是驅動整股力量的關鍵變項。在一定程序上，唸天主教學校的家庭其低度居住流動率也能解釋天主教學校的效應。

我們已經解釋了在社會資本的架構內轉學次數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假設轉學會降低父母與孩子做出有關學校之明智決定的能力。他們對學校、老師、班級的瞭解會較少；也較可能無法利用學校及老師所能提供的資源。老師對搬遷的孩子付出的心力也會比較少，因此比較不會將額外的時間與精力花在這孩子身上。孩子可能會覺得與教育過程格格不入，而有較多尋求與非主流社會接觸的可能性。(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p. 782)

緊密性作用引發的爭議

一項最近的分析對天主教學校的正面教育影響提出質疑，尤其是針對緊密性的正面效果。Morgan 與 Sorensen (1999) 使用 NELS 來分析高一及高三學生的數學成績。他們發現，一旦控制了學生之間朋友交往的緊密度，公立學校中

。我們應注意到，美國的學校規模比其他國家大。有項研究英國學校的詳細分析指出，學校規模與學業表現間呈現 U 形關係，這已控制了在校校免費用餐的學生數 (此為測量貧窮的指標)、教學付出及學校的類型 (Bradley and Taylor, 1998)。這些研究者下了結論指出，學校的最適當規模，以 11-16 歲而言是 1,200 人，以 11-18 歲而言是 1,500 人。這個數字規模實際上比英國學校的平均規模都高出些許。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有充足證據支持設立完全學校，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追求學校每年或每個年級收較少學生，但招收的年齡可以更全面。

父母的社會緊密性會與數學成就之間有負向相關。他們反而認為「平面擴張」的學校比起「強制實行規範」的學校更能促發學習，但他們的確注意到在天主教學校的部門裡因緊密性而產生的正向效果。

Morgan 與 Sorensen 的研究已引發些微波瀾，同時也招來批評。有些人認為 Morgan 與 Sorensen 的研究在概念上有所混淆，以至於他們的分析及結論都受到了影響 (Hallinan and Kubitschek, 1999)。其他使用同樣資料的學者則導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Carbonaro, 1999)。

153

我們該如何解釋與 Teachman 等人結論顯然很不一樣的 Morgan 與 Sorensen 的結論呢？主要值得注意的一點是，Teachman 等人把焦點放在輟學率（一如柯爾曼所做的），而 Morgan 與 Sorensen 則是放在學校表現。另一個重要的附帶觀察則是，愈具邊緣性的學生在教育上的表現會愈糟。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成功留住這類學生的學校可能會因此而有明顯較糟的成績。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麼學校間的差異可以真正遮掩住令人佩服的表現。然而，以父母是否認識自己孩子的朋友來測量的緊密性議題上，或許是沒有衝突的。Teachman 等人發現這個特定變項與輟學沒有顯著的關係。因此，儘管他們有效印證了柯爾曼認為天主教學校能減少輟學，且將此效果歸因於社會資本的一般性發現，他們並未能找到太多證據支持柯爾曼關於緊密性是中介這一效果的明確想法。

不論 Morgan 與 Sorensen 的分析細節在更細緻的檢視下是否仍能屹立不搖，他們所提出的概念絕對值得探索。他們做的區辨讓人回想起現今社會資本理論家在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之間做的區辨（請見第一章）。透過稍早的章節架接性與黏著性逐漸變得清楚，這兩者都具有特定助益，因此只立基於其中一種特質的社會網絡或社區就較有可能會陷於劣勢；兩種特質都很重要。因此，當一個社區幾乎或完全沒有外在連結時（即缺乏水平擴展的能力），或許也會限制其成員的教育企圖心，這樣的發現並不令人意外。如果探討的社區碰巧企圖心較低，則其社區居民的企圖心一定會比較低，就如同在許多身處劣勢的都市社區中所看見的一樣（請見第二章中與經濟提升相關的類似分析）。例如，對那些即將結束義務教育的年輕女性而言，她們的教育選擇會大大地受到其社群對所謂「成功」的概念所形塑。對來自劣勢或傳統社群的年輕女性來說，成功可能是指符合「女性特質」，而此概念並不直接包括繼續進入高中、大學升學 (Thomson, Henderson and Holland,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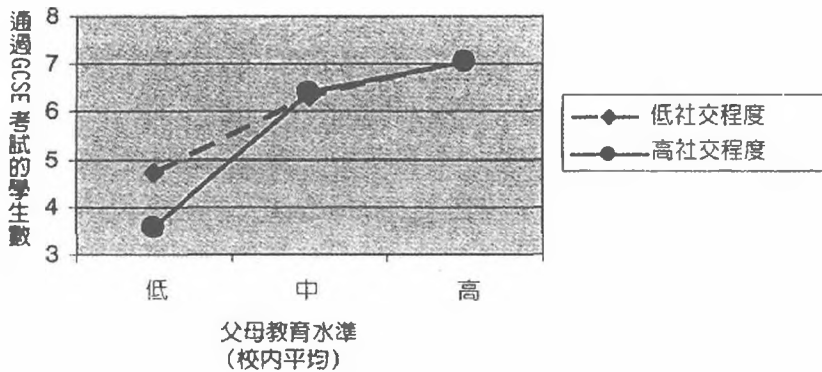


圖 5.1 學業成就與父母平均教育水準及網絡閉鎖程度的關係

附註：學業成就＝參加英國大多數 16 歲學生會參加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明考試（GCSE）而通過的學生數；父母教育水準＝在該校中具有學位的家長比例；緊密程度＝學生家長與該校其他家長社交的程度

154

在針對 15-17 歲的英國年輕人所做的持續研究，我們測試了緊密性的潛在雙面特質。發現的結果和其他的研究一樣，父母的學歷高低能預測子女在個人以及學校層面上的教育表現。換句話說，在其他因素都控制住的情況下，班上其他同學的父母都擁有學位，這就是一種優勢。然而，我們也詢問學生，他們的父母與朋友的父母社交互動的程度。學生所處的學校中若有許多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則學生的表現就會普遍較好，不管這些父母是否有社交互動。但對大多數家長都沒有學位的學生而言，自己的父母與同學的父母有社交互動，這一點卻造成了些微的劣勢（請見圖表 5.1）。

來自世界各地的例證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不具架接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在社群所設定志向較遠大的情況下產生的影響具正面性，而在其他情況下，不具架接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產生的影響卻可能是負面的。在南美洲哥倫比亞所進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例證（Restrepo, 1998；請同時參考第四章）。在這個帶有豐富「不具生產性社會資本」的脈絡下，緊密性很有可能會導致更糟的教育結果。同樣地，雖然較不具戲劇性，但學者也發現，在印度，緊密的社會階層及相關的父母企圖心會互相強化，以至讓許多年輕人身陷低企圖心與低終身成就的循環之中（Dhesi, 2001）。簡言之，印度的學校體系特別清楚彰顯以下這種情況的例證，即父母的企圖心影響年輕人就讀的學校，而後學校本身的企圖心和社會網絡又影響了此人的人生歷程。

所以，在缺乏架接性社會資本的情形下，緊密性或高度黏著性社會資本確實有助於該社群的成員將自己的價值觀傳給下一代。但如果這些價值觀是關於反對智力發展或偏好低成就的，那麼就很難期待會有高教育成效。顯然，未來的教育研究要專注在社群的黏著性及架接性層面的影響，以及專注於潛在價值觀，這類社會資本較有可能在特定脈絡下提供協助。

社群其他的面向會影響學校表現嗎？

美國天主教學校效應的證據指出，它的許多正面影響可能來自於學校所在的社群而非學校本身。這強烈隱含著父母—學校的連接性與居住流動率高的負面影響。

一位頂尖的研究者曾表示，如今已有「清楚的證據顯示，小孩的班級或學校的平均社經地位對其教育的各項表現有影響，即使在考慮了（個人層面的）能力與社經地位後仍是如此」（Willms, 2000, p. 18）。同樣地，連結美國NELS與1990年人口普查的研究發現，不只社區特徵能預測教育的各項表現，同時這些效果的強度也能與相關的、較常被引用的家庭和學校因素相互匹敵（Ainsworth, 2002, p. 117）。這個研究發現，社區的社會資本可以解釋大部分的社區效應，而其中的「集體社會化」（collective socialization）有著最強的影響力。

為了彰顯社群（或真的環境）效應，在理想上應該建立一個「多重層面的」（multi-level）統計模型。應用的範圍並不只在教育上，也在其他變項上（請參考第四章 Robert Sampson 討論犯罪之傑作）。如果在家庭內只有一位親生的家長，往往會導致孩子的教育成就較低；再者，一個社群中假使這類單親或繼父母家庭的存在比例高，平均而言會有較差的教育記錄。這個結果本身並不意味著「社區」的效應。這個結果可用家庭的個人層面來解釋。換句話說，在高比例非傳統家庭社群中的較差教育表現，不一定意味著由親生父母組成的家庭，若住在這類社區，其子女的教育表現就會比住在其他地方更差。唯有當真正的社區或生態效果存在，這類家庭才會被它所處的區域所影響。

已有人建構出這類多重層面模型。Yongmin Sun 建立了一系列的多重層面模型，使用1988年的NELS檢視美國八年級學生的科學、數學、閱讀、社會研究考試分數（Y. Sun, 1998）。在這些模型裡，Sun 涵蓋了如平均家庭收入、少數族群註冊人數、城市所在地等「控制變項」；還有如轉學次數、家庭內兄

弟姊妹平均人數、非傳統家庭的集中程度等「結構性變項」。最後，最大的旨趣還包括了「過程性」變項，如參與宗教活動的學生比例、參與運動的比例、隸屬於其他父母所參加組織的父母、認識其他父母的數目、父母願意齊心合作以支持學校政策的程度。

在個人層面上，Sun 的模型贊成第一節中所提到的多數發現。轉學、有較多兄弟姐妹、身為少數族群、較低的社經地位，這些都與學業表現差有關。同樣地，高度親子溝通、認識其他學生的父母、父母有參與組織、學生有參與宗教活動，這些都與較佳的表現有正相關。

但真正令人感興趣的是社群層面的效果。Sun 在控制性、結構性及過程性變項間發現相當顯著的社群層面效果。談到控制變項，在四個測量值中，家庭收入較低、少數族群註冊人數較高的社區，學業表現也較差。換句話說，住在貧窮地區的貧窮家庭遭受到雙重的劣勢，首先來自於自己本身的貧窮狀態，其次來自於鄰居的貧窮狀況。類似的社群效應被視為非傳統家庭對科學、數學、閱讀表現（但不包括社會研究）的重視，還有兄弟姐妹在數學以外科目的表現所造成的結果（但不包括數學）。

這五個社群過程相關變項都與考試成績有關。在統計上控制了控制變項和結構性變項之後，會減少社區過程相關變數的影響規模，但其影響仍是顯著的。學生參與宗教活動的比例、家長互相認識的比例、家長願意齊心合作以支持學校政策的程度，這些都與四個科目中至少三項的考試成績有顯著關係，即使在考慮了個人層面和社群層面的控制變項後仍是如此。

157 這些結果大大支持了柯爾曼關於社群特徵會影響教育表現的假設。同樣令人驚奇的是，在這個統計方面相當卓越的模型裡，柯爾曼關於緊密性的假設（在此是以父母間的聯繫做為測量標準）重新獲得證實。這個模型也延續了 Teachman 等人的發現，即流動率（以轉學的平均次數做測量值）對教育表現有負面影響。這種流動率似乎不僅直接影響了孩子，還影響了其他同學的表現。但在控制了社群貧窮程度、家長之間和家長—學校間的連結度、學生參與宗教或其他活動的程度後，這個效應就被消除了。這個結論顯示，流動率在社群層面上對學生教育成就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源於流動率帶給社群社會資本的破壞。

針對「究竟是家庭還是社群社會資本比較重要」，尚有一些爭論。看來不管是社群社會資本的結構或過程，都對中學生的教育成就有所影響。近來有另

一個對 NELS 的分析證實，社群及家庭都會對教育產生影響，並評估家庭社會資本在整體上的影響更大 (Israel, Beaulieu and Hartless, 2001)。這一點並指出，研究的結論代表社群社會資本在「協助學生表現更傑出」上特別重要。這有點像接力賽跑：家庭能帶領你的距離有限，但更廣的社會網絡會幫忙帶領你到達更遠的範圍。但重點是它們產生的效應大致上都是附加的。兩者對孩子都有助益。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什麼因素能提升這類社區社會資本。這樣的結果意味著，住在居住流動率低及家長連結度高的區域是為了所有學生的優勢，即便這些因素並沒應用在他們自己的家庭裡。一項針對芝加哥社區進行的謹慎研究發現，預測緊密性（即家長之間與家長—孩子的連結度）及鄰里交流的最佳指標是集中的富裕程度、低人口密度及居住穩定性 (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相反地，各種劣勢集中在一起，似乎不會抑制這類成人的鄰里交流，但它的確會抑制對孩子非正規控制的共同期待，即使在控制觀察到的暴力情況後仍是如此。歷史上已發現，社會同質性、財富及低移動率是美國從 1910-1930 年增加對公立（州立）中等學校教育之投資過程的關鍵因素，這也指出了投資與穩定性的循環 (Goldin and Katz, 2001)。擁有房屋的狀態也有可能是個重要的因素。房屋擁有者在教育上的投資較多，也較少搬家 (DiPasquale and Glaeser, 1998；請同時參考第八章關於因果關係的討論)。

Sun 和其他研究者的研究都指出，強而有力的社會資本並不全能被簡化為等同金錢，但錢確實有助於形成社會資本。樂觀點來看，劣勢的社群（例如有一半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的學校）在社會關係與家長間的網絡很強時，社群在學業上仍能表現優良 (Pong, 1998)。同樣地，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不僅會增加學業上的一般表現，也會減少社會階級在表現上的差異 (Willms, 2000)。

在討論微觀效果的部分曾提到，對於某些團體，如移民到美國的華人及韓國人，移民的身分似乎會與較高的教育企圖心有關；但在移入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等身上卻看不到這種情形 (Hao and Bonstead-Bruns, 1998)。這部分是屬於社群或團體層面效應的表現。同樣地，在其他變項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具備能說自己原本少數族裔語言的能力，一般說來對教育成就有正面助益。例如，一項針對越南移民的研究就發現，識字在越南人當中對族裔認同及學業成就有正向關係 (Bankston and Zhou, 1995)。保留原本的少數族裔語言，提供了取得社群社會資本的額外途徑，因此也有助於而非有礙於在主流的教育中發展。

總之，證據指出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有清楚的影響，這些影響

在家庭層面的社會資本上發揮作用。這對低社會資本及身處劣勢的家庭尤其會產生問題，而這些家庭會因此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貧窮、低社會資本的社區裡；這就是 Willms (2000) 所謂的「雙重危險」(Double Jeopardy)。然而，這個敘述的光明面則是，我們有足夠的信心相信，只要清楚地認識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則政策制定者、家庭與社群就更有可能把焦點集中在社會資本的匱乏上，並開始有所行動。

學校內的社會資本

最近，有些教育專家已經開始思考社會資本在學校內所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即老師之間、老師與校長之間的社會網絡。

159 曾任劍橋大學教育學教授及英國政府顧問的 David Hargreaves 曾擔任制定英國學校課程的政府單位首長，當時他寫過一篇有趣的文章，主張：

許多英國老師缺乏能讓他們更具智慧地工作的互助專業學習文化……在一所具備豐富社會資本的學校裡，高度的信任會在組織成員及股東之間引發出一種互助文化及厚實的網絡。學校內的高度社會資本會強化其智識資本 (Hargreaves, 2001, pp. 5-6)。

Hargreaves 並未忽視強烈的家長—學校連結及家長之間的連結可以扮演的重要教育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在於強調學校內的社會資本也很重要。他點出「教師效能」的跨國比較以證實他的論點。針對美國、日本、德國的數學教學的比較分析指出，教師間的社會資本對日本人較高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Stigler and Hiebert, 1999)。在日本，教師會參與專業發展性團體，這些團體提供諮詢及集體論壇，讓教師在團體中培養或測試新的教學技巧。教師發展出「研究性教案」後，可以進行集體分享或執行。他們在工作中彼此觀察，並發展出一套討論他們所從事之事務的用語。當成果為集體所共同擁有時，教師們更能具建設性地相互批評而不用擔心冒犯他人。簡而言之，教師們積極且例行地集體合作以創新、分享知識；社會資本因而變成知識轉移與培養的潤滑劑，而且它會回饋可觀的教育紅利。

雖然 Hargreaves 並未提及，但失敗學校的證據有力地支持他的假設；不只在英國是如此，在其他國家亦然。失敗的學校一般具有高度人事變動率的特

色，而這往往會破壞職員之間的社會資本，就如同居住流動率高會破壞家庭及社群的社會資本。事實上，有些人認為在都市學校裡進行的改革方案通常會失敗，是因為這些方案削減或阻礙了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的社會資本（Useem et al., 1997）。人事流動率高與禁止教師在課餘時間彼此來往的工會法，都進一步地加深了老師這項工作的孤獨本質。相反地，針對示範學校的個案研究已指出，這些學校表現卓越的因素包括學校職員間的信任感；在學習上願意合作的立場；相互支持而使人願意承擔風險的氣氛（S. A. Wolf et al., 2000）。⁷

這些發現與更多討論成功廠商特色的經濟學文獻的雷同程度令人訝異（請參考第二章）。Stigler 與 Hiebert 對於使日本學校能有效運作因素的敘述，非常近似於對創新且成功的公司裡的管理諮商人員的描述。在觀察到日本學校與僱主間緊密的連繫後，更使得兩者的對比顯得類似（Brinton, 2000）。這代表他們不只具有很高的內部黏著性社會資本，而且和其他重要的經濟及孩子未來生活的參與者也有良好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同樣地，不只在教育制度內對合作重要性有增強的認知，在教育制度之間也有相同的情形（Huotari and Livonen, 2001; Herriot et al., 2002）。例如，如今英國學校都會被鼓勵結成「盟校」或結群，以便學校之間能更積極地相互合作，這異於以往由政策及強調排名所引起相互競爭的作法。

160

鉅觀層面

表 5.1 摘錄了普特南（2000）在一個註解裡所提到的一連串重要統計數字。基本上，在美國，總體層面上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州，都一致地達到了較好的學業結果。

有趣的是，一項類似的區域效果也能在此表格中及 Teachman, Paasch 與 Carver 對 NELS（1996）所做的仔細分析中的迴歸模型裡找到類似的區域效應。他們都發現，住在美國南方各州對輟學率有很強烈、一致的負面效果。住在南部與增加 70% -75% 的輟學可能性有關。此外，這個變項的效果在他們所探試的模型裡幾乎都沒有改變。當然，在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指標裡（請見第八章），南方各州的社會資本一直比較低。

161

⁷ 如同人們所預期得到的，其他的因素包括了持續對學習抱持正面的態度、校長的領導能力及對改革過程本身的反省等。

表 5.1 美國各州社會資本指數與全國教育過程評估測驗之間的相關性
(1990 年的資料)

	四年級 (9 歲)	八年級 (13 歲)
數學 (1992)	.81	.91
數學 (1996)	.67	.88
閱讀 (1994)	.68	
科學 (1996)		.85
學術能力測驗 (SATs, 1993)	.67	
中學輟學率 (1990-5)	-.79	

在國家層面上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間表現獨特關係的情形，並不只有在美國才看得到。英國未出版的資料也在 16 歲時的教育表現（例如拿到普通中等教育證書的比例超過 5%）與英國各區社會資本（根據英國社會態度調查）之間顯示類似的高度關聯性。甚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來有著作比較了從英國公民審計數字得到超過 100 個英國地方政府的社會資本，以更精緻的規模印證了這個結果（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2002）。英國公民審計有超過一萬的樣本數，為每個居民超過 100 人以上的地方當局提供其公民參與及社會信任的估計值。作者發現，控制了社會、人口等其他特徵後，公民參與與地區的平均教育表現程度有顯著關聯，尤其是 16 歲時的考試成績（這個考試是在義務教育的最後階段進行）。

這對在美國發現的結果是一項很重要的印證。在英國，教育支出主要是由中央政府的稅收及經費支付（不像在美國，教育支出大多由地方負責），而且在英國，各地的分數可以相互比較。換句話說，學校資源與區域間評分的差異不能完全解釋英國的結果。

這些鉅觀層面或區域的差異非常可觀。對美國資料來說，普特南的報告顯示，即便因為許多其他因素再加上包括種族組成、財富、經濟不平等、成人教育程度、貧窮比例、教育支出、教師薪資、班級規模、家庭結構、宗教信仰、私立學校所占比例大小等控制項，這些相關性仍會存在。確實，儘管上述這些因素裡有好幾個在統計上都有重要性，但社會資本仍是解釋州層面差異的最重要單一因素（Putnam, 2000, p. 300）。

這些驚人的發現通常會與美國教育學文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謎團並列呈現。一系列大規模的美國研究結論指出，在學校支出及學生成就測量值之間，沒有或幾乎不存在有系統的關係，這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Coleman, 1966; Hanushek, 1989, 1997, 1998, 2003; Burtless, 1996）。另一方面，Card 與 Krueger 的分析發現，教育的報酬率（即薪資）與個人居住的州裡的學校平均素質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關係（Card and Krueger, 1992, 1998）。奇怪的是，這個關係在州的層面上很明顯，但在檢視學校層面時卻幾乎消逝了。換句話說，學校資源較佳的州（即班級規模小、老師薪資高等），其表現會比較好，但具有較佳資源的個別學校，其表現似乎不會比較好（Betts, 1995; Burtless, 1996）。

州層面的社會資本，會不會是這個謎團裡遺落的那個關鍵？例如，或許是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州往往在教育上表現較好（請見前面的討論），還有賺取更高的終生俸（請見第二章），而同時也較傾向投身社會事務，因此會在公共服務上投入更多。其他地方也提到，較多的公共投資以及納稅的意願，都可能是讓社會資本在中觀與鉅觀層面對社會預期結果造成影響的路徑之一（例子請見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所做與健康相關的文章；請同時參考第六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也發現相同的相關性；英國就如同先前所說，當地的教育支出大多由中央政府所決定。換句話說，位於英國境內高社會資本地區的学校並未獲取更多金錢，但仍達至更高的教育效果。

國家之間的差異

社會資本的差異也能解釋各國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嗎？令人驚訝的是，關於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角色的 OECD 報告作者並未嘗試以模型表現這個關係，特別是 OECD 蒐集了在教育表現上跨國差異的相關資料（OECD, 2001a）。

各國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是很可觀的。例如，成人當中具有最佳及次佳讀寫能力者，占總體比例最低的是智利的 20% 以下，最高的是瑞典的 70% 以上（OECD, 2001a, p. 21）。經過詳細研究發現，國家的財富無法完全解釋這個模式中大多數的差異；例如美國雖然擁有過人的財富，卻往往只稍微高過平均值。如果把焦點放在教育表現最優秀的前三名，那麼將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再看看社會信任上的國家差異圖表，更證實這個懷疑：這些國家也都不斷名列信任程度最高國家之列（請看圖 2.1 與第

二章)。如果我們檢視教育成就最低的工業化國家，會發現往往都是南美與前蘇聯國家（即社會信任度最低的幾個國家）。教育表現中等的都是北美與西歐國家，就像它們在社會信任上的排名一樣。

我們藉由計算國民識字程度與社會信任度之間的相關性，檢查了這個關係。⁸ 相關性是非常驚人的 .82 ($N = 18, p < .001$)。這是非常強的關係，但是很類似在美國各州所發現的結果。然而，識字率的確與一國財富有顯著相關。在統計上控制了每人國民生產總值後，將減弱識字與社會信任之間的相關性強度，但它的淨相關是仍算顯著的 .63 ($p < .01$)；另一方面，控制了社會信任，將會完全削減每人國民生產總值的效果，證實在解釋國家教育表現而非財富時，社會信任是重要的變項。

再一次，解釋因果方向的難題又出現了。到底是因為高社會資本，使得北歐人有如此出眾的教育成就；還是因為他們普遍的高教育程度及普遍來說更平等，所以才會比較信任彼此？這是我們目前無法解決的議題。的確，由於缺乏合適的時間序列資料去區分因果關係，所以我們目前無法解決這難題。然而，考慮到在微觀及中觀資料的強度，認定因果方向是從社會資本到教育至少是個可能性。

教育創造社會資本

在稍後的章節裡，我們會回到關於社會資本如何被創造、維持與摧毀的細節上（第八與九章）。然而，關於教育在這個過程裡有個特別重要角色的說法是有爭議的。不只是社會資本能培育出教育成就，教育本身在創造社會資本的過程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教育成就不斷被發現具有預測社會資本的能力。具有較佳教育表現的個人，也會有較高程度的公民與志願參與度；更廣大且多元的社會網絡及對他人較信任。在不同國家與測量方法中，都能發現這個關係的存在。164 例如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出席公眾集會的次數是只受基礎教育者的六倍之多（18%對上 3%；Putnam, 2000, p. 46）。同樣的結果也在澳洲（F. E. Baum et al., 2000）、英國（Hall, 1997, 1999），以及其他國家出現，每多一年的受教育

⁸ 教育成就的測量值是文學與數學能力達到高級人口占總體的百分比平均值。社會信任的資料則是取自世界價值觀調查。我的研究助理 Zoe Morris 將資料彙整在一起以完成這項分析，為此我深表感謝。

時間，社會及公民活動就會急遽增加。

貫時性資料的分析，已證實教育似乎能提升社會資本的想法，但是它也指出這個效應的絕對規模很可能會被橫斷性分析所誇大。例如，英國國家兒童發展世代資料（British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ohort）的分析指出，即使控制了其他變項，從社會信任與社群參與的角度來看，上大學乃與社會資本強烈的提升有關（Bynner and Egerton, 2001）。然而，另一項英國家戶調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分析指出，會繼續升學的年輕人在接近 20 歲時，其社會與公民參與已經比沒繼續就讀大學的同儕高（Egerton, 2002a）。這些孩子擁有較高的公民參與度，反映了部分家庭社會化的模式及父母具有專門職業的這個特質（請看第八章）。儘管如此，即使控制了先前的參與程度和家庭背景，較高程度的教育經驗不管是對年輕或較年長學生的公共參與，仍提供了更進一步的適度提升。

研究不斷試圖辨認出到底能解釋這個關係的是什麼，但至今卻仍未出現決定性的結論。最常聽見且最顯見的可能性是，長時間待在同一個機構內長大的年輕人，彼此間會建立起強大的連繫以及培養出社交的技巧。年輕人積極地投入能讓他們培養社交與合作技巧的經驗，而教育環境以及課外活動、同儕活動、社群活動都能提供他們擁有這類經驗的機會（Dworkin, Larson and Hansen, 2003）。同樣地，學校政策對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也有著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接下來也會對年輕人的社會網絡和社交技巧產生巨大的影響（McNeal, 1999; Langbein and Bess, 2002）。當學生離開了學校或大學後，就會發現這些網絡與技巧是一種可轉換及有彈性的社會資本形式。

至少對特定形式的公民行動來說，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透過教育所能習得的一般性技巧，像是閱讀、寫作及理解複雜的公眾制度，這些都有助於個人的參與。一個偏向認知面的解釋是，教育提供人們心理技巧以預測自己行動的後果及發展較複雜的啓蒙式自利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瞭解，人以建設性、相互信任的方式和他人建立、維持關係，是爲了自身和社會的利益。一個相同的社會學解釋是，大眾教育逐步灌輸能增進社會凝聚的共同規範，並建立一套有助於人們相互合作的共識（Gradstein and Justman, 2001）。

人們甚至可以主張，不只在國家之內，還有國家間的教育相似性帶來全球新規範，以及更多的全球性社會資本。舉個明確例子，來自世界各地到西方國家拿 MBA 學位的畢業學生，把能夠促進國際貿易的共識帶回到母國（Mellahi,

2000；請參考第七章）。然而，仍有一個疑問：在一些教育仍在急速擴張的國家裡，社會資本為何卻似乎在衰退（請見第七章）。

另一個替代性的因果解釋也是有可能的。具有較佳認知技巧與較低貼現率（discount rate）（即爲了之後更大的報償而準備放棄眼前的好處）的人，會投注在自己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上，因爲他們有許多這麼做的理由。因此，教育表現與社會資本的連結或許是虛假的，而可以由背後的認知風格差異來解釋。然而，這似乎也不是國家間或州際差異之所以發生的合理解釋。

這些假設裡有許多正歷經貫時性研究的測試（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但是大多數政府與社會對於正在懷疑的議題並不會等待社會科學家告知答案。大多數人都相信教育在形塑年輕人行爲舉止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形塑未來社會上也是要角。事實上，今日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已採用某種「公民資格式的教育」，通常包括了對社會結構的正式教學，再結合某種實踐或志願性的經驗（Torney-Purta et al., 2001）。

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證據都指出，正式的公民資格式教育雖有用但作用不大（Niemi and June, 1998; 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教導孩子論據與數據可以些微地提升他們的知識，但這似乎無益於增加他們的參與、對效能的感覺或信任。在志願服務上的證據則相當正向，即使實行志願服務並非出於自願，只是爲了課程的學分，因此使參與其中的精神似乎被抹煞掉，但情況仍是如此（E. S. Smith, 1999）。事實上，貫時性證據指出，這個效應會隨著時間而強化，以至於在學校的社區服務會持續增進生命中 10 年，甚至 20 年後的社會參與、志願行動以及寬容程度（Janoski, Musick and Wilson, 1998）。

目前，出現許多將宗旨放在所謂「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一種混合公民教育形式，至少在美國是如此（Sander and Putnam, 1999; CIRCLE, 2003; Drogosz, Litan and Dionne, 2003）。這包括在取得實際志願服務經驗的同時，也在教室的情境中討論志願服務的相關議題。因此，孩子在參與了社區清潔活動的同時，也上了有關回收再利用的經濟學課程，並討論全球暖化的後果。上述說明告訴我們，服務學習很有效，能培養出參與及認知的技巧，並鼓勵大家更常參與社會活動。

儘管如此，問題仍舊是：和一般教育相較，有多少是從公民教育本身獲得的？Sen 在健康領域裡著名的說法是，教育對健康的改善效用，要比健康教育促進的健康多得多！臨時的證據指出，公民教育的確比教育本身提升更多社會

資本，並且儘管這些效果似乎在青少年身上作用有限，但隨著進入成年時期，此效果似乎有強化的跡象。

這個論點的基礎很簡單。形成一個社會之特色的價值觀與行為不是憑空產生，而是在每一代中積極地再更新。家庭、學校、更大的社會都使年輕人社會化而成爲公民。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教育都會在這一過程裡扮演主要的角色。

結語

證據顯示，在微觀、中觀與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對教育的各項結果有顯著的影響（請見圖表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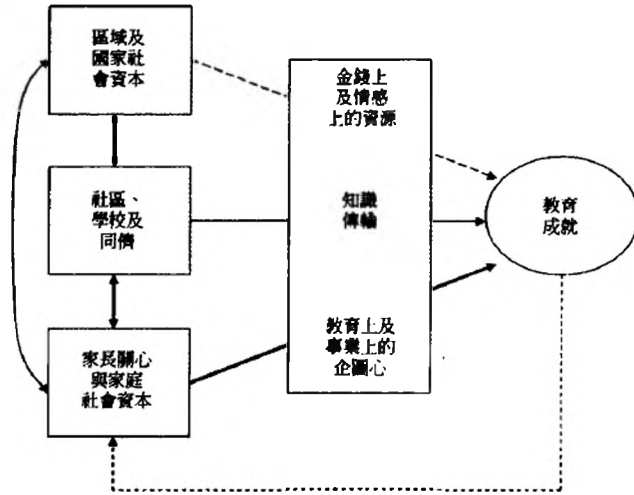
在微觀層面，頻繁的親子接觸一般都會導致較多的教育企圖心與較好的表現，但重要的是所花費時間的品質優劣，而非時數長短。孩子早年若能與專心關注、有回應、持續一致的主要照顧者有互動，對他（她）是否能掌握日後的學習所賴以爲本的基本社會和認知技巧非常重要。父母的社會資本（即他們從其他家庭成員身上取得的支持、他們的朋友網絡與他們跟孩子學校的關係）也能正向地影響孩子的教育結果。這些較廣的連結對於讓能力強的孩子發揮完全潛力顯得特別重要。家庭社會資本的差異，有助於解釋不同家庭類型、社會階級及族群團體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例如來自單親或繼父母家庭的孩子會有較差表現。較頻繁的搬遷及其導致的社會網絡斷裂，都有助於解釋單親家長或其他類型的非傳統家庭之社會資本較爲匱乏的原因。

167

在中層上，學校和社群的效應都看得到。某些學校類型似乎會表現得較好，像是在美國規模較小的學校及天主教學校。較強的家長－學校關係及家長之間的關係似乎有助於解釋這個效應。這效應的正面方向有賴於社群本身向外發展的傾向以及高度企圖心。也有一些證據證明，學校內的社會資本（即教師間的關係）在解釋學校間差異時很重要。但許多所謂的學校效應其實是社群效應，低社會資本的家庭密集地集中在某一地區，使劣勢更加惡化。一個社群的社會資本平均值低，會讓孩子的教育劣勢更加嚴重，造成「雙重危險」的效應。

168

鉅觀層面顯現了社會資本與教育表現之間強烈關係的證據。在美國各州、英國各地方當局及各國，社會資本的測量值乃與教育表現有高度關聯，而且這個關聯無法經由在統計上控制如財富的其他變項來做解釋。



■ 5.2 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的關係

註：線條的粗細程度大略表示兩者直接關係的強度

最後，我們看見在過去教育表現（一般是指受教育的年數）與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關係。換句話說，教育創造社會資本，就像社會資本協助培養教育表現一樣。許多政府都很積極地想透過公民資格教育及志願服務計畫以強化這個社會化效果，但很可能教育與在學校和大學的社會生活經驗就可說明這個連結。

總之，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在各層面之間的一個關鍵中介變項就是教育企圖心。社會網絡與高期待可以延展、激勵與啟發孩子；然而同樣地，某些社群或同儕團體裡的反教育規範也可以產生反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的影響會弱化政府與教育專業人士通常爭辯的一些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如財務資源、班級規模及教師薪資。

最後，本章強調了社會資本在傳統教育表現上所扮演的角色。它強調了在學校、家庭、傳統學習脈絡內的社會資本。然而，我們應該要瞭解，許多、甚至是大多數的學習，都發生在這些脈絡之外。我們所知道的事情裡有許多是習而不察的知識，而這些是來自我們的工作環境、朋友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例如，醫事人員並不是從教科書上學會如何讓病人感覺較舒服，而是從一輩子的非正式學習中學得，其中大部分是同儕及長輩們所分享的知識與經驗

(Gopee, 2002)。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在學習上扮演的角色遠超過它在教育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稍早的章節也曾提過，知識與知識轉移是現代經濟的命脈（第二章），健康行為主要從同儕身上習得（第三章），甚至犯罪相關技巧也必須從其他地方學得（第四章）。因此，一旦社會資本降低了任何場景中知識轉移的門檻，社會資本就提升了學習，而這裡所謂的學習不應該單指學校中的學習。

169

進階閱讀

想知道更多早期關係對孩童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在學業上的表現，請參考如 Shaffer (1994) 所著的完善教科書。Desforges 與 Abouchaar 的評論是關於父母如何影響孩子的教育表現評論 (2003)。

Teachman、Paasch 與 Carver (1996) 及 Y. Sun (1999) 的學術論文檢視了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的影響。由 S. Baron、Field 與 Schuller (2000) 編輯的書冊，提供了一些關於教育與社會資本關係的有趣題材及觀點。

想多瞭解各國在公民資格教育上的差異，以及孩子事實上瞭解多少，請參考像 Torney-Purta 等人關於最近跨國研究的文章 (2001)。若想尋求簡短的實用觀點，並從例子中瞭解學校實際做了什麼以建立社會資本，試參考 Sander 與普特南 (1999) 的作品。由 50 位作者共同撰筆合作的 CIRCLE (2003) 是近來的一篇相關報告，只是略嫌不夠充分。

想概略瞭解社會資本在學習中的作用，可從討論公司行號及經濟生產力的文獻開始。如果你之前略過了本書的第二章，或許可以透過這個學習角度及第二章所提及的文獻著手。

第六章 政府及有效能的國家

雖然現在有許多人將普特南與他記述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著作聯想在一起 (Putnam, 2000)，但他對這個議題的興趣事實上是被一個頗不為人知的研究所點燃的，此研究的內容則是針對義大利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 (Putnam, 1993)。 170

普特南如今被視為關於義大利地區差異的經典研究，其研究結果的要義在於：擁有最具活力社群生活的地區，同樣也擁有最具效能且令人信賴的政府 (Putnam, 1993)。每個地方政府的組織架構基本上都相同，都是在同一時間裡被創設，同時地方政府仍高度地受制於中央政府強加下來的架構。以詳細的經驗分析做為基礎，普特南得出一個結論：政府效能的差異乃起於地方結社生活的特質。在（非家族間的）信任模式與結社生活之中的地區差異存在已久，並發現早在義大利地方政府發展之前地區差異就存在了。其中的因果方向顯得很明確，牢固的結社生活與高度的公眾信任導致更有效能的政府。

本章將檢視從普特南早期的研究以降的成果，對於政府效能仰賴公民社會資本的這個理論能提供多少支持或否定的證據，並查看什麼樣的因果路徑可以解釋這個關係。

一個對本章有助益的區辨，是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或「抽象」民主之間的區辨 (Newton, 1997)。第一級民主指的是彼此幾乎都互相認識的一群人，就好像身處在小型社區中，全都聚集在一起自行決定事務。第二級民主指的是建立在代議原則之上的政治體系，這當中包含了分工，信賴他人代表自己決定議題。第三級民主或「抽象」民主指的是極龐大或「想像」共同體組織其自身的方式。在治理的脈絡下，這些區辨也回應了微觀、中層及鉅觀層面在治理小集合體與治理國家甚至更大單位的方式上之差異。 171

微觀層面：地方或次級地方政府

一群彼此處不來的人會發現，跟一群能處得好的人相比，處不好的人要有所組織或成功地做事都比較難。團隊運動與「真人實境節目」(reality game shows) 都提供我們無數實際的例子。這些運動與節目通常賦予競逐隊伍一些需要隊員間彼此合作才能求得勝利的複雜任務。因為強烈的個人特質而產生衝突以致無法達至內部高度合作的隊伍，儘管個別隊員能力出眾，但最終往往會苦嘗敗果。

真實世界的微觀個案研究也敘述了類似的內容。例如，在軍事基地關閉之後，對於釋放出來的土地常有許多選擇可供決定。Burton 與 Williams 曾做過一項個案研究，對照了在美國的兩個空軍基地關閉後釋出土地之不同命運，兩者的面積大小相仿，自然資源特質也很類似。在其中一個基地中，房地產的發展摧毀了所有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但在另一個基地中，卻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被保存做為野生動物的收容所。作者結論指出，導致如此不同結果的最顯著因素不是任何客觀論點的影響力，而是這些基地周圍社區的社會資本與政治文化讓其中一個社區去進行遊說，並比另一個社區更有效力地行動 (Burton and Williams, 2001)。

同樣地，工作團隊的效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或「自我治理」）上，而這又取決於他們的內部凝聚力。例如，一項針對美國中西部的四個都會醫院其護理團隊的相對表現所做的研究發現，團隊內的社會整合及合作與顯著較佳的表現效能有關 (Barsness, 1997)。許多在第二章提出與經濟表現相關的例子，也都可被視為微觀例子，說明社會資本對治理的重要性。如果一個公司內的員工彼此拒絕合作的話，該公司要想成功，或是公司內的管理團隊要想起作用都會非常困難。

在住宅發展管理上可以看到一個證明社會資本對治理很重要的精緻微觀例子。每個人都知道要跟公寓或住戶協會打交道，但如果有些住戶處不好的話，這件事將會如夢魘般地複雜。以較正面的角度來看，如果住客彼此間能有持續的正向社會關係，那麼大樓的行政庶務就會變得容易。基本上，這是另一研究的關鍵發現，該研究評估紐約市裡維護及再生被屋主棄置的大樓計畫之成效，這些大樓代替稅款被收回後就交由住戶們自行管理 (Saegert and Winkel, 1998)。後來發現這個計畫很成功，作者也因而下了結論認為，住戶擁有房屋

權的正面效應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這些大樓中的較高社會資本所中介 (p. 17)。

有時候，因為個性衝突或其他個人差異，甚至只因為團體內每個人彼此不太熟悉，就會讓團體在微觀層面上難以組織。實質環境形塑了社會互動的模式，對於能否組織團體，以及用什麼樣的組織方式，都有很大的影響（請見第八章）。基本上，讓人更容易互動的實質空間卻無法強迫人們這麼做，而是有助於創造社會資本，讓自我管理變得容易做到。

普遍來說，這些過程都與社會資本之形成的旨趣有關，但在更一般的範圍內也與團體形成及政治作為有關。我們發現，住在大型公寓建築物的人雖然較有可能認識附近的鄰居，但比起住在傳統住屋社區的人卻較少參與地方政治事務 (Glaeser and Sacerdote, 2000)。看來大型公寓裡的住戶雖然與自己的內部社群有較多連結，但卻與鄰近地區和周遭的公共基礎建設較少連結。這種去連結的狀態也有助於解釋在這類大樓附近的空間內較高的犯罪率（請參考第四章）。

相較於小鎮的管理，管理一棟公寓大樓（如收取管理費修繕屋頂或檢修暖氣設備）算是件容易的事。但類似的教訓似乎仍適用於此。具高社會資本的小鎮似乎比低社會資本的小鎮擁有更具效能的地方政府。針對美國鄉村社區進行的貫時性研究指出，社群領導人的水平連結（即與其他重要社群的有力人士的關係）對該社群長期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特別重要 (D. J. O'Brien, Raedeke and Hassinger, 1998)。

高社會資本縱然有助於小社群相互合作及做出具效能的政治行動，但不代表它完全沒有缺點。由高度信任、經常性聚會與密集社會網絡中自由流通的資訊所顯示出的高社會資本，意味著整個社區都參與了決策過程，但也意味過程耗時又冗長。例如，一項針對受到 1997 年加拿大紅河水災影響的各社區所做的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實物資本的社區對於這場水災有較佳及有效的準備措施。但這種高社會資本也會讓整個決策過程變得更複雜，因此帶來了延宕的風險 (Buckland and Rahman, 1999)。這是第一級民主的主要缺點。與上述觀點相反地，一般人都認為這種參與是正面的體驗。瑞士被公認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直接民主或第一級民主，一項針對其各州生活滿意度的研究發現，擁有更多公民投票權人數的州在生活滿意度上也明顯較高 (Frey and Sutzer, 2000)。

如同在稍早的章節中所經常提到的，在不同類的社會資本之間取得平衡

很重要，而對於成功的微觀層面治理也是如此。社會孤立的社群在其內部通常有著高度連繫性的社會資本，然而卻可能缺乏與其他社群連結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例如，美國的小型鄉村社區經常座落在都市通勤者所能到達的範圍之外，而郊區的人口集中區則通常擁有為數不少的當地組織與民主性參與。但它們的孤立位置以及與更廣大社會、政治網絡分割的狀態使它們無法抵擋聯邦政府削減預算的重創，並被企業家視為廉價勞動力（Zacharakis-Jutz, 2001）。諷刺的是，鄉村居民對家庭、農地、社區的強烈連繫感讓他們很難外遷，有時從更廣的政治脈絡來看，這個聯繫感也會使社群陷入劣勢。研究發現，當小鎮領導人在鄰近社區以外還擁有發展完善的社會、政治網絡時（也就是架接性社會資本），此議會最具效率。同樣地，一個針對印度 69 個村莊社群所做的研究發現，既存的社會資本會強烈地影響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的程度。但在有能力幫助個人及社群與公共決策過程做連結的媒介出現（換句話說，就是連結性社會資本）時，這個社會資本的影響就會被擴大。如同對許多其他結果而言，在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間取得平衡對有效能的治理來說顯然很重要。

中觀層面：地區政府

誠如在本章一開頭所提到的，普特南早期對義大利的研究成果激起他對社會資本的興趣，其關注焦點是地區政府（Putnam, 1993）。他的結論指出，義大利 20 個地區的效能差異實際上是根植於地區間社會資本的差異。制度表現的好壞是透過許多要素所測得的，包括預算的及時性、立法的創新程度及官僚政府體系的熱誠。公民對地區政府的滿意度也要進行測量，發現它與制度表現的測量值極度相關。北方有活力且豐富的組織似乎為有效能的政府行動提供了發展的絕佳生長地；而南方的強大家庭和階級結構，包括影響力很大的天主教教會，似乎就顯得沒那麼好了。這個研究指出，非親人之間的信任、友誼關係及相互尊重的文化對政府效能來說是很重要的。

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對於普遍地瞭解治理、社會資本、社會等來說，確實立下了一個里程碑。然而，自從他發表該研究之後受到許多討論與評析，在這些評析與討論中，儘管有許多人普遍認為他對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之間具相關性所提出的證據頗具說服力，仍有三個重要批評反對他對此關聯性的詮釋。第一，對於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之間存在關係之因果方向為何？引發廣泛的討

論。第二，即使接受至少有某些因果關係走向是從社會資本朝向政府效能進行的說法，還是可以質疑普特南仍未真正解釋產生這種連結的方法。第三，對於這個結論的普遍性仍有許多疑問。

在本章最後，我們會在更一般的脈絡下處理第一種與第二種批評，畢竟這些批評提出的問題不僅適用於普特南對義大利的研究，也適用於更廣泛的政府—社會資本關係上。但是，就義大利的例子中因果方向的具體內容來說，有個重要的補充分析值得在此加以檢視。Helliwell 與普特南（1995）曾建立了一個時間序列模型以追蹤隨著時間演進地區相關表現的關聯，尤其是與經濟成長間的關係（請同時參考第二章）。他們發現有力的證據以證明改革前的迎頭趕上效應（pre-reform catch-up effect）（即較窮的地區會漸漸迎頭趕上較富有地區的經濟狀況），這在有關經濟成長的跨國性計量經濟學的著作裡也看得到。但是，地區改革似乎「擾亂」了這個差距的縮減，因為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北部地區又再一次地崛起。結果顯示，改革行動與地區治理的強化雖然在各地區表面上看來都一樣，但高社會資本的北部得到的正面效果卻比南部大。這個謹慎進行的貫時性分析讓我們更確信因果進行的方向，至少有一部分是從地區與改革行動產生互動的社會資本朝向政府效能進行，而非反過來。

175

義大利研究之外的證據

談到第三個批評（即義大利的例子能夠概括到多少其他地區政府的程度），如今有一整個世代的研究者在世界各地想驗證普特南的假設。然而，我們必須說，還未有任何研究能像普特南在義大利研究中所做的，蒐集到關於當地那麼鉅細靡遺的資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來那些試圖進行地方治理的國家裡，在各地進行的方式經常不一致，如英國與西班牙。有趣的是，這種不一致通常在該地區認同上反映出地區間差異，其本身就是社會資本的一個潛在重要形式或指標。因此在英國境內，如今蘇格蘭擁有一個足以進行初級立法的議會，威爾斯則擁有一個僅能對英國國會（Westminster Palace）之立法的解釋加以修改的議會，而在其他地區（除了倫敦之外）就僅有一個非經選舉產生且權力十分有限的地方當局。

儘管如此，在其他國家進行的研究仍指出，義大利的情況並非特例。德國就是一個地區及地方政府具有複雜且變異形式的國家。公民普查顯示，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在地區間就有巨大的差異，幅度從 30% 到近 70%。在一項針

對東西德 30 個小型至中型的市政當局所做的研究中，Cusack 試圖解釋其中的變異性 (Cusack, 1999)。他發現，制度性及社會資本的變項都很重要。普遍來說，在具有較高制度性權力集中的市政當局似乎較有效能，而市民滿意度也會較高。他解釋這一結果是在較中央集權的政府（如有一個強勢的市長）中有較少投否決票的人所造成的，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更具決斷力地行事。但 Cusack 也發現，區域的社會特徵也嚴重左右市民對當地政府表現的評價。以人口規模為基準，較小的自治市會有較高的表現評價；每增加一萬個居民，滿意度就會下降一個百分點。在領導人通報在社群內衝突較少的地區，市民對政府表現的評價也會較高。最後，社群領導人所報告的較高社會信任程度，也與市民對政府表現的評價較高有關。這個模型指出，要從低信任地區轉變成高信任地區，則對地方政府表現的滿意度要再增加 13.5%。

Cusack 的研究是在德國的脈絡下對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的有效複製，但 Cusack 使用的測量方式較粗糙。這份研究再次確認社會資本與制度性結構對政府表現，或至少公民對政府表現的觀感來說都很重要，這也說明了具改革傾向的政策制定者絕非在浪費他們的時間。

雖然在《獨自打保齡球》中政府效能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聯性並非是主要議題，但普特南也以美國為對象回顧了一些證明兩者是相關的證據。他提到，在 Daniel Elazar 的美國政治文化圖像與他自己的社會資本圖像之間有密切的相似性；事實上兩個圖像間的相關性是很高的 ($r = .77$; Putnam, 2000, 第 21 章, 註釋 48)。低社會資本的南方各州被 Elazar 稱為「傳統主義型」，受到抵制創新的菁英分子的支配。相對地，高社會資本的中西部及東北部則被 Elazar 稱為「道德主義型」，其特色是會為特定議題發聲；社會與政策上的創新；貪腐較不嚴重；政府指派職務時重視的是能力而非酬庸。上述情形與在義大利看到的北部—南部的區分非常類似。

經濟學者 Steve Knack 也檢視美國的證據，使用由政府表現計畫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roject) 建構的評等做為他測量政府效能的方法。Knack 發現，由社會信任、志願服務及人口普查的回覆率 (願與全國性調查合作的人口比例) 測量出有高社會資本的州明顯具有較佳的政府表現 (Knack, 2002)。相反地，結社的活動及非正規社會化則與政府表現沒有關聯。他下結論表示，對表現顯得重要的是與「普遍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 相關的社會資本面向，而不是「社會連結度」(social connectedness)；這與他早期對經

濟成長的研究結論相呼應（請見第二章）。

其他的研究也顯示了類似的模式。例如，一項針對匈牙利地方少數族裔自治區的研究，使用了來自地區內領導人士的資料，發現擁有較高的制度性能力的地方，也具有以下的特色：較高度的社會凝聚力、帶有信任及合作規範的主要社會網絡、地方政府與地方外的組織維持較有效能的制度性連結（Schafft and Brown, 2000）。同樣地，我們在世界許多地方也看到，金融發展方案比較能夠成功，端賴地方或地區的社會資本的挹注（Tufarelli and Fagotto, 1999）。

比較印度 15 個大城市的社會發展與表現後得到的證據也支持社會資本有助於發展的說法（Rossel, 2002）。在印度的例子裡，主張制度性因素與特定階級動員形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追隨著 Patrick Heller 那篇關於印度 Kerala 邦頗具聲望的作品，有人主張讓印度發展的成功方案就是在重新分配與經濟成長間取得平衡點，再加上能調和好戰傾向以從地區政府換取進步政策的勞工運動（Heller, 1995, 1996）。這種觀點將社會資本的論述混合了較為傳統的統合主義式發展模式。

對照針對俄羅斯各地區的研究似乎也述說著類似的內容。尤其是針對涅姆佐夫（Novgorod）地區的研究更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這個地區的特色是高度的結社活動、對政府的高度信任感，以及今日的高度經濟成長（Petro, 2001）。

「Novgorod 模式」的成功再一次引發了這個重要的疑問：究竟是社會資本導至較有效能的政府，亦或是地區政府的政策創造了社會資本，或許還引發了公民信賴感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請同時參考第二章）。作者的結論認為，良性循環已被創造出來，而且「即使在缺乏全國性共識的情形下，地方政府仍可以有許多作為，以替他們的社群打造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以及優先考量。」（p. 229）

鉅觀層面：國家政府

關於在政府表現上國家差異的研究也大大地呼應了普特南與其他學者在地區層次上的發現。La Porta 等人（1997）利用 1990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得到的資料，並控制每人的國內生產總值，他們發現高度社會信任（即陌生人間的信心）與下列因素高度相關：

- 在國家層次上政府貪腐程度較低；測量標準為：與進出口許可、外匯管制、稅務核定、保護政策或借貸相關之收受賄賂官員數量。
- 較佳的官僚體制品質；測量標準為：治理的成效與專業度，加上政治壓力下的自治權，及在政策或政府服務上不會有劇烈變化。
- 納稅服從性較高。
- 基礎設施品質。
- 司法環境的較高效能與清廉度。

La Porta 等人研究裡對貪腐及官僚體制品質的評估是根據國際國家風險指引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全球競爭力報告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及商業國際法人團體 (Busines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所各自獨立彙集的資料 (La Porta et al., 1997)。

另外，La Porta 等人也發現證據支持普特南關於社會性社團引導社會信任的形式是橫向而非垂直性的明確假設。他們為每個國家計算隸屬於階級性宗教（如天主教、東正教或伊斯蘭教）的人數在總人口數中所佔的比例。他們發現，這個人口比例與社會信任之間的相關性很高，而且在統計上具重要性 ($r = -.61$)。隸屬於階級性宗教的在總人數上的比例也與較嚴重的貪腐情況及較低度的政府效能大大相關，即便控制了每人國內生產總值後仍是如此。

La Porta 等人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仍是個橫斷性研究，因此其因果方向仍是含糊不清。是透過社會信任而外顯的高社會資本導致了較有效能及更值得信任的政府呢？或是貪腐且無效能的政府更普遍地破壞了社會資本？

在 Treisman 一個密切相關的跨國研究裡發現，在國家層面上較低的貪腐程度與新教徒的傳統；曾被英國統治過的經歷；發展較佳的經濟；還有（可能）較多的進口有關。聯邦政府一般比較貪腐；而且長期實行民主制度也會與低貪腐程度有關 (Treisman, 2000)。這些結果也吻合以下觀點：具有像是外來勢力介入這類特質的歷史事件會為之後的世代，在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上帶來持續的影響。然而，這些結果還被加以解釋並指出，制度本身很重要，如民主制度的存在，還有這些結果也影響了國家的社會資本之特質。

179

前蘇聯國家提供的證據

一系列檢視中歐與東歐等前蘇聯國家的研究匯合出以下的結論，即國家發

生變革之前的社會資本是影響該國政府在變革之後表現的重要因素。這個轉變幾乎可媲美義大利的例子，只不過是在國家層面上。幾乎在同一時間裡，這些國家的公民發現自己身處在嶄新的政府結構當中，而就像義大利的地區一樣，這個結果令人驚訝地多變。有一項重要的研究利用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狀態評估表（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來比較八個前共產國家的演變軌跡，並檢視了以下假設，認為對新民主制度的支持取決於國家後變革時期的經濟成效（Kunioka and Woller, 1999）。儘管找到了一些支持此假設的證據，作者卻下結論指出，在解釋公民是否支持民主制度上，這些國家的社會資本比起其經濟變項來說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這個結果與針對後蘇聯時期個別國家的更詳細研究息息相關。例如，一個比較住在羅馬尼亞與美國（印地安那州）的受訪者之行爲與態度的研究發現，相較於美國人，羅馬尼亞人較少討論政治；投入互動形式的政治參與比例較低；對於自己的鄰居瞭解較少；同時不認為自己社群內居民的利益與更廣泛的政治決定有關聯（Mondak and Gearing, 1998）。作者認為，羅馬尼亞這種不投入社會與政治事務的模式，乃根植於在前蘇聯統治時期遍及中歐、東歐的無數社會與政治約束，這些約束限制了公民的參與行爲。對於羅馬尼亞這類先前社會互動不興盛的背景脈絡，他們對民主化是否能開花結果表達了莫大的擔憂。

相反地，一項針對捷克共和國情況的詳細分析對於其未來前景持著較正面的態度，完全是因為捷克社會中其社會結構的潛在力量（Blomberg, Maier and Yeisley, 1998）。在捷克共和國轉變成市場經濟之前，當地就出現了暗盤市場（灰市）（grey market）及地下市場（黑市）（black market），而這些非法經濟活動又與政治最高層濫用社會資本（也就是貪污）脫不了關係。但 Blomberg 等人仍對未來抱持樂觀看法，因為調查資料顯示了低失業率，以及在社會上的制度中存在著穩定的信任，兩者都是「低脫序」（low anomic）變革過程的指標。簡而言之，雖然在之前政體中一些能呼風喚雨的人物曾濫用社會資本，強大的潛在社會資本仍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平台，讓人們能在其上搭築嶄新的政治與經濟工作。

Kraft（1999）曾下結論表示，既存的制度結構、社會資本及公民社會的發展，都強烈地影響前蘇聯國家的變革結果。經驗顯示，要將有效的民主制度移植到前共產國家中相當困難，但也顯示，如果在建立這種民主制度上失敗了，特別是與控制貪腐與非官方經濟相關的制度，那將會有極大的危險。在那些未

專題 6.1 關於「政治信任」又是如何呢？

有效能又可以勝任的政府較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但這樣的關係卻不能算完美。同樣地，在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係也很有限。但政治信任確實很重要。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或政治領導人，那麼即使客觀地來說他們的表現還不錯，人民還是不會相信他們提供的意見，也不會支持他們的計畫，而且會將他們逐出公職。進一步來說，如果社會信任（即公民之間的互相信任感）低或正在衰退，那麼政治信任就會顯得更重要，因為人民會更仰賴正式的政治制度以確保彼此間能相處融洽（請見第七章，關於社會信任的趨勢）。達到政治信任的關鍵性因素如下：

- **誠實與「開誠布公」(public-mindedness)**：政治人物必須心胸開闊及誠實無偽，而人民對他們的動機也很敏感。從制度上來說，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例如，必須經由絕對客觀公正且獨立不受影響的來源獲取資訊與建議。政黨對財政的安排經常會破壞這種誠實感。
- **勝任的能力**：如果政府或政治人物被認為無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承諾，那麼人民的支持很快地就會化為泡影，儘管如實兌現政治承諾與信任之間的關係常常也很有限。快速地從錯誤中學習，同樣很要緊。人民對重新分配過程的贊成度，尤其明顯地取決於政府是否有妥善使用金錢的觀感。
- **制度上的權力制衡**：相較於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政府與國會明顯地獲得更多的人民信任（例如在英國，前者約 36%，後者則約是 18%）。制度上的權力制衡不僅對大多數誠實的政治人物很重要，而且在極度不被信任的政治體系裡的政治人物更是絕對地不可或缺（如在日本）。
- **尊重人民，與人民溝通**：即使是一個誠實、能勝任、制度上有所制衡的政府，如果沒有成功地把人民放在心上，它仍可能受到人民的懷疑與不信任。提供資訊與「善待人民」一直是受人信賴的公眾服務與私人服務之間的相關性 (MORI, 2003)。普遍來說，直接接觸大眾的服務單位及專業人士，例如醫生或學校，在這一點上做得都比政治人物好，政治人物反而都必須仰賴間接的溝通方式或媒體。有趣的是，在階級分明的社會裡，通常是那些在「金字塔底端」以及自我評價已備受威脅的人，最能懲罰不願傾聽人民聲音及尊重人民的政府。

雖然政治信任已在許多國家中衰微，但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也就是說衰微並非不可避免的趨勢。丹麥、荷蘭及挪威似乎頂住了這個趨勢 (Dalton, 1998)。對政黨缺乏信任及興趣的狀況特別強烈且廣泛，但對政府所提供的多數服務經常仍是保持著強烈的信任感，通常是因為這些服務奉行了上述有助於達到政治信任的因素。

建立起有效制度的地方，如今可以看到明顯的惡性循環，即愈來愈多的政治介入、高稅率、愈來愈蓬勃的非官方經濟與貪腐，然後又是更多的政治介入（Kraft, 1999）。

跨國治理

既然國家層次的社會資本能幫助一國的政府更具效能，那麼很合理地也會認為跨國的社會資本能循同樣的方式協助跨國治理。

一項針對亞太次級區域主義的研究發現，基於祖先及親屬連結的跨國性族群社會網絡，在「聯結」身處不同國境內的公民上有著十分關鍵的重要性（X. Chen, 2000）。這個社會資本能潤滑跨國界的經濟交易，並能誘發橫跨各次級區域間更具回應性、更有效能的政策提出及實行。Chen 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跨國界的社會資本，是否真是跨國次級區域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

182

這是歐洲政治人物已經非常熟悉的議題，畢竟他們努力地在歐盟的言論、邏輯與反對民意間相互做調和。歐洲政治人物漸漸瞭解到，社會資本的基礎在碎裂的前提下，要推動一個統一的政治計畫是很困難的。改變這個碎裂基礎的本質，或建立跨國的連接性社會資本，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好幾年來，歐盟資助大規模的交換計畫，讓許多年輕人到其他歐盟國家生活，也資助建立網絡連結歐盟各國的相關學術與專業團體。簡言之，這些計畫旨在建立個人關係、共同語言與共識（即跨國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結構。

這種跨國社會資本的建立並不僅限於歐盟。電信技術、國際大眾傳媒、低成本旅遊等方面的進步，從心理層面而言已讓我們的世界距離變小了。同時，正如資本與企業變得更加國際化，抗爭及社會運動的行動者網絡也變得更加國際化（Sklair, 1995）。這個愈來愈緊密的連結性顯現在社會態度的改變，還有對遙遠國度的認知增加。同時，當許多富裕國家的一般民眾愈來愈反對將自己的辛苦所得用來資助自己國內的失業人士，他們變得愈來愈願意將自己納的稅款用來資助世界上其他的貧窮國家（Halpern, 1995b）。同樣地，對國內少數族裔的容忍度在近幾十年來也有明顯地提升。¹

這些態度的改變已經反應在制度性政策、實踐與執行能力上（Held and McGrew, 2000）。在數十年的毫無作為後，富有國家如今開始透過取消債務及

¹ 即使是在美國境內，上述趨勢多少都受到了 911 事件的影響。然而，經濟景氣的惡化以及在某些國家中尋求庇護的議題，都慢慢產生反對這個具正面性的長期性趨勢的作用。

擴大援助計畫的規模，來幫助較為貧困的鄰邦。眾所認可的權利法案如今逐漸被納入國家法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權公約（Human Rights Convention）。國際法庭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名詞而已，而是一個實體。像聯合國這類的全球性組織搖搖晃晃地走到今日，如今已成為協調超國家行動及限制無賴國家（rogue states）的真正論壇。歐盟的國家也集結在一起，使用相同貨幣與中央銀行。而且，儘管有許多譏諷言詞，但國際社群對災區進行的人道救援，以及在世界上違反人權的地方進行的介入活動，其規模與大膽程度年年有所增長。

或許會有人將這個日漸提升的共識以及行動能力的一部分歸因為跨國界親屬與族群網絡的延伸，因為經濟移民加上更好的傳播技術已經在遙遠國度的人民間產生了直接或實在的關係。貿易量與經濟互賴的程度增加則是另一項有力的貢獻因素。但另一項也很重要的（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當然是：雖然有時會搖擺不定、但仍逐漸興起的共同規範性框架，它鞏固了周遭貿易及愈來愈強大之國際制度的基礎，即跨國規範性社會資本的建構，包括了國際間領導人的聯繫網絡，如固定會面，像同一俱樂部會員般地彼此熟識等等，但這個建構絕對不僅限於這些。套句前美國總統柯林頓（Clinton）的話，讓我們愈來愈相似的事物似乎比讓我們愈來愈相異的事物更加重要。²

為何社會資本與較佳的政府表現有關聯？

Boix 與 Posner 在對普特南研究的詳盡評論中，處理了社會資本與政府表現之間關聯的因果路徑之性質（1995, 1998）。他們在結社生活、社會信任及較具效能的政府之間，提供了四個可能的因果路徑。他們提出社會資本可能會：

- 讓公民成為「政治場域中更精打細算的消費者」，並提供讓人民更能表達訴求的管道。
- 讓官員能彼此合作更加順利；換句話說，讓官員具備如其他在高度連結、高度信任社會中的公民所具備的相同協助技能。
- 培育「公民間的德性」；換句話說，從特殊主義轉向社群導向的性格，引導

² 在此理想草圖已準備妥當的同時，對伊拉克的戰爭卻愈演愈烈。這項衝突在國際社群間所引發的緊張氣氛，清楚地讓對此草圖持正面觀點的人士備感壓力。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希望並期待此處所述較為正面的長期趨勢，在衝突之後將會重新復甦。

出更守法的公民，因此能促進政策的推行。

- 讓「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得以實現。

Boix 與 Posner 並未就上述哪一種管道最重要提出見解，而是將它們描述成還有待進一步深究的狀態，並視之為合理填補解釋漏洞的方式。這幾種路徑的共同點（除了第一條有可能是例外）就在於高信任文化有助於相互合作。信任與共同規範促使一系列新政策得以履行。

184

J. L. Sullivan 與 Transue (1999) 認為，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有效能的民主取決於公民的態度與行為這兩個關鍵基礎。第一，民主需要公民能容忍他人參與政治的努力。這因而受到對民主價值的致力程度、個人品格及個人視他人為威脅的程度所影響。第二，民主需要公民的參與。這受到信任感及其他促成投入政治活動的文化特質所影響 (J. L. Sullivan and Transue, 1999)。同樣地，其他研究者也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這份資料，並認為社會信任及其他相關的社會心理特質會促進民主政府的發展，一如會促進經濟成長 (Inkeles, 2000)。

在普特南 1993 年的論證裡提到，平等主義式的結社生活很重要，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場域，讓每個人可以從中學到合作行為及社會信任的技巧與規範。因此當人們齊集在一起玩音樂、進行運動及建造鐵路模型時，他們就會發現透過齊心努力可以集體達到個人所無法企及的滿意效果。他們瞭解到，如果自己或是某個人沒出席，就會使團體失望。他們在彼此間建立起情感及社會上的連繫；他們學會了信任彼此；而更重要地，他們讓自己變得更值得他人信任。這種社會資本因而能成為解決政治問題的一種資源，就像教會成為政治轉變與動員過程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一樣。以上說法大致與 Boix 與 Posner 的第一與最後一條路徑雷同。每個人維持著這些能讓自己值得他人信任與信任他人的特質及習慣，然後當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守法並納稅），或者對某些人來說，當一個政策制定者（以積極的態度與政治同僚及對手相互合作，並克制著不貪污且以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利益），這個說法則與 Boix 與 Posner 的第二及第三條路徑雷同。

如今有可觀的證據，至少可支持 Boix 與 Posner 所提出的第一及第三條路徑。在第一條路徑（即社會資本讓公民成為政治場域中更精打細算「消費者」的程度）上，各種研究已說明強大社群結構之存在，如何與通過更得民心，

185 更支持政府本身的提案有相關 (Berry, Portney and Thomson, 1993; Couto and Guthrie, 1999)。回到義大利北部城市的這個經典案例，雖然公民委員會不見得一直都很積極，但仍能動員人群解決當地議題。這些委員會有多種接觸當地政府組織的管道，因而政府也視這些委員會為重要的資訊來源 (Della Porta and Andretta, 2002)。值得一提地，這是研究者不斷標識出來檢視特定政策效果的因果管道之一，像是社區犯罪如何透過較佳維安行動的有效宣傳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以及如何透過政府對增加公共財呼聲之回應，而使民眾健康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也有大量證據顯示，高社會資本與「更有德行的公民品格」有關。例如，有犯罪學文獻指出，有些社區能降低犯罪情況，是因為居民願意時時注意周遭發生的事情，並在犯罪前兆出現時會及時介入；或是普遍的社會規範如何隱含在形塑或抑制犯罪中 (第四章)。另一個例子是普特南關於美國納稅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密切關係的研究：在社會資本高的州裡，納稅依從性也明顯較高 (Putnam, 2000)。事實上，社會資本變項至今幾乎已成了最為人所周知的指標。針對是否接受美國人口普查及捐助公眾傳播，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就像普特南所說：「民主並未要求公民成為無私的聖人，但在許多小地方上，它的確認定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裡會抗拒欺騙他人的誘惑。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社會資本能加強我們更好、更廣延的自我。」 (Putnam, 2000, p. 349)。而且，這個德性似乎具有傳染性。例如，資料顯示，如果周遭的人都有參加投票，那麼一個人去投票的可能性將會大增，這是在控制了所有一般認為與投不投票相關的變項後的結果 (Knack and Kropf, 1998)。投票率也與在其他領域中發生合作性之行為的可能性有相關，如慈善捐款或願意擔任陪審團。

支持 Boix 與 Posner 第二與第四條路徑的證據就少多了，或至少還未在社會資本的文獻中發現過。La Porta 等人關於貪腐與社會資本之間關係的研究，或許可視為支持以下論點的證據：社會資本造就了更多願意合作並值得信任的官僚體系。要建立政治人物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合作關係，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由於政治人物與政黨間的合作程度也與選舉制度和政治體系的本質有密切關係，因此我們可能很難直接去檢視它。

186

我們可從個案研究得到一些贊成政策制定者之間必須互相信任的證據，在這些個案中，政府刻意轉向較仰賴正式合約，而不是非正式的信心。在紐西蘭

的例子裡，一些評論者將一個轉向正式合約的戲劇性轉變和政府表現的退步做了連結，雖然這個觀點仍具爭議性（Gregory, 1999; Wallis and Dollery, 2001）。我們可以檢視不同國家裡類似的政府形式成功的例子，如按比例選出的議會，並且測試這些政府的效能是否會隨著政治人物的合作技巧與文化而有變動或受到中介，從這些檢視與測試中我們也能發現證據。Cusack 針對德國所做的研究在某個程度上也印證了這個論點，即政治人物間的社會信任乃與公民對當地政府表現的觀感有相關性（Cusack, 1999）。義大利的例子也提出這個管道的重要性，還有如日本這類以共同政治著稱的國家也顯示了證據（Broadbent, 2000）。但是，和另一條以公民為主的管道相比，對於政府內部管道的重要性，目前有的分析所能提供的線索仍十分有限。

因果方向有可能是從政府走向社會資本嗎？

上述的例子中，有些暗示著政府的行動與有效能且值得信任的制度能創造社會資本，或者至少可以創造出能讓社會資本蓬勃發展的環境。當然，這種具相反走向的因果關係更是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為它隱含著政府能主動地制定政策介入以創造社會資本，如藉由開啓自己的「政治機會結構」，還有將社群安排在以信賴為基礎的夥伴關係中（Wallis and Dollery, 2002; 請一併參考第八章）。

例如，俄羅斯的涅姆佐夫地區被敘述成很主動地培養社群裡的正向社會關係，而關於前蘇聯國家相對成功的研究則指出，在重建社會資本過程中，保障合法性且貪腐不嚴重的制度很重要（請見之前的討論）。同樣地，有一些試圖瞭解俄羅斯在後共產時代相對較差表現的學者，他們特別指出，政治活動與私人企業活動之間的制度性界線模糊，將會助長貪腐的情況，並強調在俄羅斯的情形裡，政府似乎協助了貪腐而非阻止其發生。例如，它複雜的稅法留下了太多「詮釋」的空間（Levin and Satarov, 2000）。普遍來說，一個正直且有效率的官僚體系，在市場經濟運轉的過程裡應該具有重要作用（Clague, 1997）。非洲的表現不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歸咎於政府的行為」，而基礎設施不良及低社會資本中介了部分結果，但卻不是必然的導因（Collier and Gunning, 1999）。Knack 與 Keefer（1997）針對 29 個國家的跨國差異研究也被從這個反向的因果關係來做詮釋。他們發現，信任與公民合作的規範都明顯與有效保護財產及契約權的正式制度之存在有關；有明確界定的法律，可能有助於替社會

信任背書，而非社會信任協助培養出有效能的制度。以下情況就是如此：貪腐的政府導致許多面向的差勁表現、貧乏成果，特別是對必須忍受這種政權的人民來說，尤其表示其生活滿意度會顯著地減低（Helliwell, 2002a）。

因此有人就主張，與其視充滿活力的社會資本為一個造成好政府的原因，倒不如視其為好政府導致的結果。更精確地說，一些學者質疑「社會資本是好政府的先決條件」的說法：「幾乎可確定是種誤解」（J. Harris and DeRenzio, 1997, p. 919）。

實際上，有很豐富的證據足以說明這個因果過程是雙向的，這其中還包括了從貫時性設計研究中得到的證據（Paxton, 2002）。一個具有高社會資本，尤其是連接性與連繫性社會資本的國家政府或地區政府，比起沒有社會資本的地方已經在起跑點上大大領先，對於這樣的說法很少會有人提出質疑。然而，也有很多證據顯示，政府的行動在某個程度上能影響一國或一地的社會資本的性質。這些過程一般來說都是相互強化的。因此，當政府、企業、非營利或非正式部門為了公利，相互合作共同打造一個社會問責體系時，市場就會以自我調控及「公民」的風範來運作（Bruyn, 1999）。

普遍來說，有效能的政府會「擠掉」社會資本的特定觀點並不受到支持（Woolcock, 1998）。相反地，政府的性質與一國社會資本的性質之間的連結似乎很鬆散，就像是以一條長的彈力繩繫住兩個登山客，兩人能離開對方去行動的距離有限，而他們通常會牽引彼此一同向上，有時也會一同向下。他們也像彼此的定錨。因此，捷克共和國的強大潛在社會資本限制了貪腐行政體系能造成的傷害程度；而在其他的前蘇聯國家中，潛在社會資本的薄弱則成了有效能的民主政府在發展上的阻礙。同樣地，對孟加拉共和國的研究顯示，儘管有政府內的貪污情事，人們仍利用當地的社會資本來推行政策（Mondal, 2000）。

188

一般來說，主動的政府與被動員的社群會相互促進對方的發展效果。一個社會若具有平等主義式社會結構，以及強健、和諧一致的官僚政府，最容易培育出社會與經濟的優勢。然而，即使在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很典型的困境中，都還是可以創建出這類協力作用（Evans, 1996）。

很重要的是，政府行動以及一個清楚的憲法架構有連結不同社群的作用，這個憲法架構能促進、強化以權力平等性為基礎的世界觀。在不同政治架構下，族群多樣性所造成的結果可以解釋上述作用的重要性。一項針對 94 個國家的分析發現，在民主體制中，族群多樣性一般來說不會是問題，但在政治權

利受限的情形下就常會變成問題 (Collier, 2000)。於是就這個意義來看，民主政府與平等權的憲法架構就化身為一種架接性社會資本或「社會能力」(social capability)，提供了一個能在社群間增加合作、減少衝突的共同規範性架構。相反地，在一個民主但缺乏清楚平等權利架構的多元族群國家中，政府有可能會變成造就國內種族衝突最具影響力的管道（一般都是多數族群壓迫少數族群）；或成為協商偏狹的種族結盟的空間，最終使得那些被排除的種族身處在劣勢之中。

社會資本及公民參與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嗎？有影響嗎？

「有效能且具正當性的民主需要公民的參與」，這個論點已廣為流傳，特別是在政治人物的口中。就這一點來看，在美國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投票率不斷下滑的情形引發了許多擔憂（請同時參閱第七章）。在 Boix 與 Posner 的模型中，視社會資本為導致更有效能政府之主要管道之一，就是要讓公民成為政治場域中更為精打細算的消費者，並提供管道讓他們表達訴求。因此，這個論點發展如下：關係良好的公民就會獲得充分的資訊，他們能具建設性地辯論議題，也願意花時間、精力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政府才能依擁有充分資訊的公民的需要去執行。此外，此論點也主張非政治性的社會網絡能提供資源，可用來進行政治行動，就像在美國民權運動期間以教會為基礎所形成的網絡。

189

投票行為與社會資本的其他測量值有高度相關性，就是這種情形的表現。例如，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與普特南的美國各州社會資本指數之間的相關性高達 0.84。然而，其他跨國研究也顯示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的關係相當薄弱（即對政府及其所屬制度有信心），但一般仍是正相關 (Kaase, 1999)。事實上，Kaase 強調在樣本所包含的九個歐洲國家之中，直接的政治參與（即參與連署請願活動、遊行或抵制活動）與政治信任之間存在著負相關。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結果？

歐洲政治學者 Jan Van Deth 撰寫了一系列論文，質疑社會資本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度，尤其是投票率下降，就意味著民主危機，Van Deth 對這種說法特別存疑。

Van Deth 發現，傳統上被歸為測量政治參與的指標中，有一些是該被拆開來看的。雖然有些證據顯示投票率以及政黨黨員人數下降，但他發現平均來看，「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即從未談論政治）的人口比例數值並未下

降。另一方面，他提到「政治顯著」(political salience)，即相對於生活其他面向，政治對人們的重要性則已有下降 (Van Deth, 2000；請同時參考第七章)。

從介入政治的興趣與以社團成員數測量出的社會資本二者之間的關係來看，Van Deth 確認了以下發現：在絕對意義上，凡是參與愈多組織活動的人，對政治的興趣就會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發現了政治顯著的程度（即政治相對於生活其他面向的重要性）在社團成員中實際上較低，當然參與政治黨派的人明顯是例外。這讓他下了這樣的結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社會資本與政治投入幾乎不相干。他解釋，即使公民們並未全心投入政治，但他們仍會隨時注意政治的發展。

190 其他學者，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卻做出了完全相異的結論。支持 Van Deth 部分說法的 La Due Lake 與 Huckfeldt (1998) 發現，社團成員數與政治參與之間只存在非常微弱的關係，而在成員數與政治互動或政治討論的間接次數之間則沒有關聯。然而，他們的確發現政治投入是非正式的個人網絡與在這些網絡裡討論的結果，而且投入的程度是政治專業知識、政治互動的頻率與網絡規模的函數。La Due Lake 與 Huckfeldt 從這些結果下結論，認為將人們拉入政治活動的不是參與正式組織，而是擁有可以討論政治議題的朋友。

La Due 與 Huckfeldt (1998) 的研究很有趣，但卻免不了跟其他研究一樣遭受到相同的批評：因果關係仍有可能是以相反方向進行。要證實這情形需要進行介入式實驗：隨機選取一群投入政治討論的人，他們在之後會比控制組更有可能參與政治活動嗎？很幸運且很不尋常地，有人已進行了一項類似的實驗。

在一項方法論上極為出色的研究中，Alan Gerber 進行了一項針對康乃迪克州 New Haven 市三萬位登記在冊投票者的隨機田野實驗 (Gerber and Green, 2000)。就在 1998 年選舉不久前，這些投票者被隨機指派到控制組或任一實驗組內。然後每個實驗組再以相互不同的進行方法，但是以同樣不帶偏袒任何黨派的訊息提醒人們選舉的到來，並鼓勵投票行爲。使用的方法有：進行面對面遊說，請研究生到隨機選出的投票者家中拜訪、直接寄信，最多達到每人三封、打電話。除此之外，還有三種不同的訊息形式。

結果非常清楚明瞭。面對面遊說大大提升了投票率，投票率提升了 14.6%（控制組中的投票率從 44.5% 提升到 59.1%）。相反地，直接寄信只些微地增加投票率。電話拜訪則似乎減低了投票率。使用多變項模型控制其他變項後，

基本上並不會讓結果產生本質上的改變。調整其他變項後顯示，面對面遊說讓投票率上升 12.8%；直接寄信提升了 2.5%；電話拜訪則沒有顯著影響。³

從傳達內容的角度來談，強調有個選舉將至的訊息，其效果比對執行一般公民責任的呼籲要好一點，而比起強調社區團結的內容要好很多。Gerber 也計算了成本效益，估算出每多一票需要的成本：直接寄信約需要 40 美元，而面對面的遊說則只需約八美元。

Gerber 的研究，對於認為面對面接觸驅使人從事政治行動（或至少投票行為）的假設構成一個重要的確認。他的結果將衝擊許多政黨菁英，因為這些政黨人士已漸放棄傳統的遊說方式，轉而尋求不費力且現代的大眾行銷技巧（請參考第七章）。當然，這個研究並不是要顯示出個人社會網絡對政治的影響，但如果一個陌生人所進行的面對面遊說能夠對投票行為有如此戲劇性的影響，我們就很難相信來自朋友的類似遊說不會產生至少相同的效果。

總之，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是否是民主的基本要素，這問題的答案十分複雜，而且最終還是取決於個人對於民主定義的觀點。如果問題是「是什麼讓人民出門投票？」的話，那麼答案顯然是非正式社會的接觸特別重要；而正式（非政治）組織的成員數則似乎不特別重要。

如果是較深入的問題，像「人們投不投票或願不願意投入政治事務，有差別嗎？」，那麼答案就比較難找到。Van Deth 在他的證據中提出了一些安撫，他指出人們會一直關注監督政治，即便大多時間中這些相關議題的顯著並沒有高到足以促成人民直接投入政治活動。「關注監督」似乎不是取決於組織性的介入。他將此解釋為一項徵兆，代表人們一般對他們在周遭看到的社會與政治結果感到滿意。另一方面，政治不信任是透過非傳統的政治抗議行動來宣洩，而非透過主流的行動，這對政治人物來說或許可視為一個警訊，並警覺到雖然投票率直線下降中，但政治抗議行動卻仍是精力十足。

但照理說，重要的不是每個人是否會去投票，而是每人投給誰。一國的社會資本與共同連繫的潛在崩解，比起投票率具有更重大的意涵。當代社會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於，雖然在許多面向上我們的生活型態、態度變得愈來愈多

³ 之後在一項針對 30 歲以下的投票人所進行的研究中，電話遊說的效果則比較好，提升了約 5%。但面對面遊說仍然是較有效的，提升了 8.5% (Gerber and Green, 2000)。面對面遊說也導致了顯著的外溢效應 (spill-over)，增加了家中其他成員的投票行為，也有助於提升其成本效益，超越了電話遊說（每增加一票需要約 12 美金）。並未有證據顯示任何一種介入方式對政治興趣或投入，能產生維持長時間的效應。

樣化，我們同時也變得更加相互依賴，即使彼此是毫無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如果投票行為與政治興趣的下降是一項指標，表示我們不再認同或關注周遭的人（這當然只是臆測），那麼我們確實就有麻煩了。在一篇令人讀得提心吊膽的論文裡，Alesina、Glaser 與 Sacerdote（2001）主張美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歐洲式的福利國家，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占多數的白人不願意幫助占少數的黑人。問題是，我們愈是讓自己擺脫共同義務，且遁入各自分離的認同以及推卸責任與找藉口的自私文化中，好讓自己擺脫需要他人的不便，我們就愈是削弱了我們所仰賴的各種共同利益。這是場危險的遊戲。如果人們的共識與義務過度腐化，那麼人民將會不再納稅，公共領域從健康照護到共同公民品性之路也會腐化，於是我們的生活將變得耗竭無力。

如果政治不只要成爲與做爲監督觀察者的選民互動的技術運用，即使只要在實際操作上維持具代表性的感覺，還是需要去改變制度上的安排。我們要不是需要找到方法，讓人民得以用較低的個人成本投入政治論述（如藉由讓投票更簡明易懂），不然就需要找到方法讓個人的貢獻更明顯或更受重視。這類機制可能包括政府爲了讓個人的貢獻更顯重要而增加的小單位、審議式投票及公民陪審團，包括從人民中隨機選取一群人來仔細討論特定議題，由人民連署發動公民投票選舉，藉由以上機制將非傳統的政治行動疏通回主流（請見第九章）。

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去投票嗎？其實不然，但是如果當前投票率下滑的情形持續（請見第七章），考慮一個較不費事且具代表性的民主形式，對我們來說確實是較明智的。然而如果投票率沒有持續下降，那麼投票行為只是腐化的共識與共同社會規範的冰山一角而已（而這是我們不應做假設或忽視的一點），這時我們就真的該擔憂了。畢竟這不只會破壞政府的效能，還會侵蝕現代社會本身及其效率、正義，還有它帶給人民的大量滿足感。

總結

有可觀的證據顯示，高社會資本，尤其是社會信任，與較有效能且較不貪腐的政府有關。

在微觀層面上，這可在住戶組織或公寓大樓委員會相對的成功或失敗，以及當地鎮民小型代表會相對地具效能上得到印證。後者的效能不只仰賴社群內

連繫性社會資本及社會信任的程度，也仰賴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範圍，尤其是連結社群領導者與其他社群的架接性社會資本。 193

在地區層次上，普特南對義大利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關係的經典例證，而以其廣泛對政府效能的精細測量值著稱。它尤其彰顯了「水平式」或平等主義式的社會資本，有助於有效能政府的出現，和義大利南方看到的較具階級式的形式相對，如天主教會。雖然尚未有其他針對地區政府的研究能與普特南在全面性及細節上的表現匹敵，但在德國、匈牙利、俄羅斯、美國境內的地區政府研究都提供了類似的發現。

在國家層面上，有愈來愈多研究結果強力支持普特南的初步觀察。跨國研究顯示，政府內部的貪腐與透過陌生人間的信任測得的社會資本二者之間有高度負相關。普特南的觀察指出，愈具階級傾向的社會組織較無助於生成社會信任與有效能的政府；而且經由跨國分析也證實，有較高人口比例是信仰具階級組織形式的宗教（以天主教最明顯），有效能的政府和較低的社會信任有著強烈的相關性。有些針對後蘇聯國家的相對表現以及在許多非洲國家內政府的失敗例子，更詳細研究揭示了在薄弱社會資本與糟糕的政府制度表現之間存在著類似的相關性。

最後，甚至在跨國的層面上也有證據顯示政府行動與制度的效能與社會資本有密切關係。成功的跨國界合作與政策和跨國界的親屬關係及祖先連結有相關。再進一步推斷，相同的跨國看法及規範性架構的出現，與愈來愈有效能且被賦權的全球性制度之間，存在著更廣泛的連結；即使在面對國際間因伊拉克戰爭時的不同意見，或全球對世界貿易協定及環保條約引發的緊張時，仍是如此。

如同我們在整本書中不斷看到的，並非所有社會資本都會產生正面效果，當然也不會時時刻刻都如此。在微觀層面上，有證據顯示，具聯繫性且自我內部組織良好的社群，有時會忽視超出其社群範圍外的人群與空間。在鉅觀層面上，權力濫用通常都源於社會中由有權力的菁英所組成的連繫密切派系，而許多戰爭也可被歸咎於國家或特定族群團體內的高社會資本。連繫性社會資本顯然是好政府的必要條件而非全部條件。較不具階級性及更平面平等型式的社會資本，似乎特別有助於表現出好政府。要能確保有效能政府的出現能直接使整個社會而非特定團體受益，架接性與連結性社會資本似乎也特別重要。 194

在各個層面上，針對社會資本與有效能政府之間的因果聯結走向，及可能

中介此關係的變項，在這兩方面都有許多推測。對此，逐漸達成的共識是兩者之間存在著鬆散而互惠的因果關係，彼此相互強化與限定對方。這絕不是有效能且具正當性的政府行動「擠掉」草根性社會資本的情況。強調公民權利的政府行動與明顯的憲法安排，做為一種架接性社會資本，它們促使彼此迥異的社群更能和平共處。

總而言之，具有高度且具平等主義傾向之社會資本的社群，似乎能培育出更多更易於治理且具公民德性的公民，提供能相互合作的政治領導者，以及讓有效能政府制度更能發展的豐富基礎。這些制度接下來能更進一步地強化那些價值觀與行為，讓它們適用的普遍性得以提升，並翻新它們賴以發展的公民基礎（請同時參考第五與八章）。事實上，有些人或許會視政府的制度或具平等傾向的憲法本身為社會資本的形式之一，尤其當它們所體現的共同規範性架構逐漸播散成為人們該如何彼此對待與尊重的全球共同認知。

進階閱讀

普特南對於義大利的經典研究仍非常值得一讀（1993）。同樣值得參閱的還有 Boix 與 Posner 的評論（1998）。如果想找相異的批判性觀點，可參考 Van Deth（2000）。

想瞭解關於我們的政治體系之健全狀況的跨國比較，請參考 Norris（1999）。Gerber 與 Green（2000）文章中的發現與精緻實驗設計也值得一看。本章最後提及的「令人讀得提心吊膽」的論文是由 Alesina、Glaser 與 Sacerdote 寫成（2001）。它雖受到一些方法論上的批評，但對美國人、歐洲人或其他地區的人來說，若想找個具爭論性的題材，它確實值得選讀。

第二部分

我們能建造出社會資本嗎？

第七章 社會資本的趨勢

1990年代中期普特南將他的注意力從義大利轉回自己的故土美國。他開始依據那個對解釋義大利地區間差異來說，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社會資本角度（參見第六章）來思考美國的情況。他發現美國似乎擁有十分豐富的結社生活及公民生活，但較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生活樣態卻在急速衰退中（Putnam, 1995）。

199

我們將會看到，以下的文章檢視了其他國家長期以來的社會資本發展趨勢之模式是有多麼的複雜且多變。同樣地我們不應該認為社會資本的所有面向，在所有時期都是朝同一個方向演進。在意識到這一點的情況下，本章將會檢視各個不同國家，分別從社團參與、政治參與、非正式社會連結、捐獻及信任等面向來一一分析其發展趨勢。因為有其必要，焦點是放在國家或是鉅觀的層面上，雖然我們也提到了一些團體內的趨勢。

美國的情況：30年來持續衰退

普特南在1995年以學術論文的方式發表了他對美國的初步研究結果。美國的社會資本（在許多人眼中，美國人生氣蓬勃的公民生活就像他們的蘋果派一樣）從1960年代以後即神秘的持續衰退。普特南戲劇化地將這個現象比擬為Agatha Christie（譯註：英國著名的偵探小說家，1891-1976）筆下的神祕謀殺案，而將自己視為Poirot（譯註：Christie所撰寫的故事中的主人翁，比利時偵探）的普特南，則為這場美國社群的慢性死亡案件，逐步地列舉可能的嫌犯。

200

普特南的分析立即引起了各界的興趣。許多學者強烈批評他的分析以及方法論。許多相左的例證出現，雖然這些論點一般而言並未有數據佐證，但卻聲稱社會資本的形式其實正在增加中。因此，既然像環保運動之類的嶄新形式組

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那麼已經有 50 年歷史的老組織在衰減又何妨？普特南沒算錯嗎？難道他的測量方式未偏向較有可能衰減的較老組織，而正在成長的新式組織可能被他忽略了？至於非正式的社交行為呢？或許人們較少加入正式組織，但可能較常非正式地聚在一起？還有網際網路呢？它難道不算是最巨大的一種社會資本形式嗎？

相關的爭議還延燒到學術界之外。政策制定者與一般的觀眾也對它感興趣。¹ 衰退的現象有可能是根源於美國人在其他方面感到抑鬱，像是政治人物的除魅以及都市犯罪率的提升？普特南指名的其中一位嫌犯，就是鬼崇潛伏在犯罪場景之後的電視。單憑這項指控當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辯。這對某些政治人物來說是個簡明的目標，也碰觸到了美國民意討論中既存的歸罪界線。

普特南身為一位專心致志且小心謹慎的學者，本身具有一定的聲譽。他十分認真地看待這些批評，並看出它們當中有不少是言之有物的。如果你曾在普特南家中參與他和同事及研究生的例行授課討論，那麼你鐵定會大吃一驚，原來普特南自己就是對他之前提出的「獨自打保齡球」假設最挑剔且最徹底的批評者，他不斷地尋找自己可能犯下的錯誤與可能錯失的資料。Bob 似乎無時無刻地想被證明自己曾經出錯。他想要挺身而出，與他所尊敬的學界同僚共同完成不可能的任務，而他在與那些現在看來較擁護、支持他的非學界讀者相處在一起時，卻感到有些不自在。

當他得知有一組很獨特但卻鮮少被使用的資料存在的那一刻，為他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與幸運的突破。有個名為 DDB Needham 的資料調查組織建立了一套名為生活型態的商業資料庫，內容橫跨 20 年，裡面包含了種類繁多的社會資本資料。普特南將它與其他來源的資料做比較後，確定前者是值得信賴的，於是與他的團隊開始分析當中反映的趨勢。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資料指出他們過去低估了這個衰退的程度。

201 來自美國的這項資料是極具說服力的。各式各樣的指標都顯示出相當一致的模式：從 1960 年代至今，社會參與的程度是不斷衰退的。

¹ 事實上，雖然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並未在相對較狹小的學術圈之外引起太多的波瀾，但仍有些政策制定者注意到了。我一位在唐寧街十號的同事（譯註：唐寧街十號即英國首相官邸，作者為英國首相策略小組的政策諮詢員）最近告訴我，在他還任職於外交部時曾在 1993 年造訪新加坡，他發現新加坡當時的政治領袖正興趣昂然地在閱讀一本討論義大利治理問題的艱澀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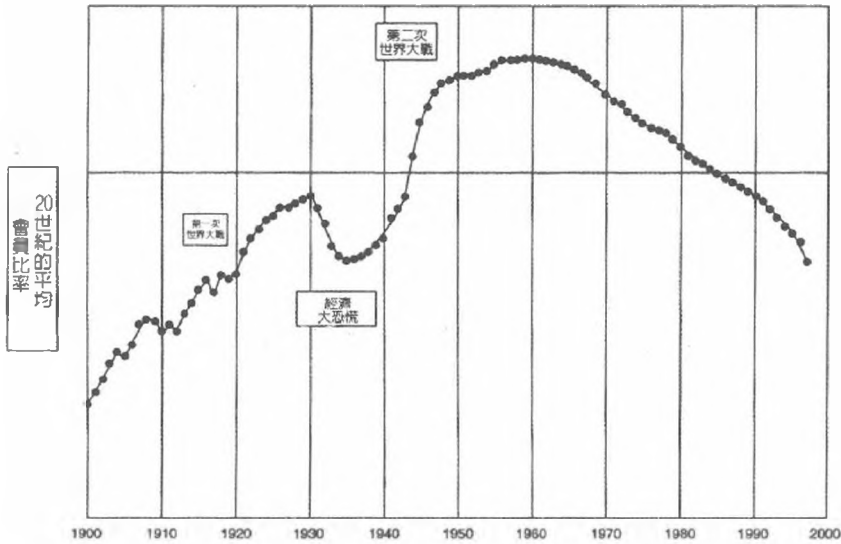


圖 7.1 32 個在全美各地皆有分會的協會的平均會員比率（1900 - 1997）

資料來源：Putnam (2000, p. 254)

社團的參與

普特南在 1995 年時指出，不論是地方上或國家級的各種社團——包括家長—教師協會、聖約之子會（B'nai B'rith，譯註：創立於 1843 年，以關懷世界各地猶太人為宗旨的服務性組織）、童子軍，其成員數的比例在近幾十年來一直往下掉。有趣的是，這個下跌的趨勢需要和 1900 至約 1960 年成員數不斷上升的長期歷史相對照（請見圖 7.1）。有些組織在更早就露出衰退的跡象，就像婦女俱樂部聯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它在 1950 年代達到鼎盛，但其他組織則稍晚，像扶輪社到了 1980 年代仍舊很強盛。

當然，在這個普遍趨勢下也有一些例外。環保團體一般都在近幾十年來表現出驚人的成長，雖然值得注意的是它們似乎也難擋趨勢而減少了一些光芒。例如，在美國已是最龐大的環保團體，且在 1990 年達顛峰時占全國環保團體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的綠色和平組織，到了 1998 年時已喪失了 85% 的前會員。而國內非營利組織的數字也有可觀的成長，《社團大全》（*Encyclopaedia of Associations*）告訴我們，從 1968 至 1997 年相關組織在數字上有一倍以上的成長（Putnam, 2000）。

但是，相對成長與衰退的模式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簡言之，我們發現成長的是那些只擁有「捐款會員」（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會集會或向會員要求非金錢上的義務）或根本沒有會員的社團。過去 20 年來成長驚人的環保團體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不論是領導者或會員本身都將「會員數」視為是種支持，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會員數。會員數很大程度上仰賴的是大規模郵寄活動；會員對社團的投入則非常微弱；對大多數的社團來說，它們的活動從不包括會面或任何形式的直接行動，而只是偶爾寄張支票出去而已。² 相反地，「傳統」社團（也就是會員之間有實際聯繫的社團）幾乎都已經普遍地減少，尤其是那些地方性的社團。因此，有愈來愈多的組織競爭愈來愈少的總會員人口數。

或許，心理治療團體、讀書會、自助團體的興起是一股較重要的反向趨勢。有些團體，如讀書會，其由來已久，現存有限的資料指出它們已經努力在抵抗更正式組織團體的衰退趨勢。然而，自助團體，像是戒酒協會和智能遲緩協會，則是較近期出現並有逐步成長的現象。這些團體都象徵著一個雖然規模有限但重要的反向趨勢，儘管我們也應該注意，幾乎從界定上就可看出它們的涵蓋範圍與焦點都相對狹小。

然而，雖然你現在檢視了許多團體，但還是有一個危險，就是那些你忘了去探詢（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們最近才成立）那些會員數向上攀升的團體。因此，「致命」的方法就是使用了代表普遍大眾樣本的調查數據；這類調查通常會問積極的會員：「去年，你參加過幾次俱樂部的聚會？」結果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平均俱樂部的出席情況從 1975 到 1999 年之間下滑了 58%。在 1970 年代中期，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會出席俱樂部的聚會，但到了 1990 年末期，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從未出席過（Putnam, 2000）。

其他的資料也強烈支持這項結果。針對使用時間及每日行程的研究顯示，美國人花在社團生活的時間從 1965 到 1995 年，滑落了 38%。同樣地，得自美國消費部的資料顯示，在俱樂部的休閒花費以及會費支出從 195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晚期滑落了 40%。

在工作導向和專業性團體的會員數上，也看到類似的衰退現象。工會會員數在 1950 年代達到高峰，勞動人口裡有 32.5% 的人都加入了工會，如今掉到只剩 14.1%（減少的比例高達 57%）。乍看之下，專業團體的會員數似乎一反

² 綠色和平組織的興衰就提供了與直接郵寄之間關係的例證——就是透過直接郵寄的幫助，讓他們在數字上有奇蹟似的成長。在他們決定停止使用這個技巧後，會員數即迅速減少。

大勢，在這個時期裡，數字往上攀升。但專業團體會員數的上升是受益於相關的專業團體在規模上的急遽增加。當我們檢視會員比例，就會發現各個團體的模式幾乎如出一轍。平均來說會員比例在 1950 年代晚期達到顛峰，之後就一直向下滑落，雖然或許比起工會會員數來說，下滑的程度還比較有限。³

美國的教會信徒數，相較其他 OECD 會員國來說，是非常高的，普特南也將它獨立出來分析（2000）。信徒人數下降的模式也相當雷同於其他社團的會員數。教會信徒數在過去 3、40 年來，平均下滑了 10%，但教會實際出席數卻下滑了 20% 以上，⁴ 進行相關宗教活動（如查經班、教友聯歡活動）也下降了 25-50%。有關時間分配的研究指出，相較於 1965 年，美國人如今花在宗教崇拜或宗教相關活動的時間減少了 31%。美國的宗教團體中，能夠較有效抵抗這種下滑模式的都是基督教右派、基本教義派及其他福音派團體（一併參考 Putnam and Feldstein, 2003）。這些團體並未怯於介入政治事務。例如，它們在美國共和黨中占有重量級的地位。雖然關於它們實際教友人數的爭議未曾止息，但它們仍代表著在下滑的普遍法則中一個令人驚訝的異數。

政治參與

儘管很少有證據顯示今日的美國人比起幾十年前對政治更漠視（或認識更有限），但的確有廣泛的證據表示，他們對政治的興趣與投入已經減低。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率從 1920 年的低點（當時是女性首次得以投票）開始到 20 世紀的前半葉都有所攀升，並在 1960 年達到了 63.1%（甘迺迪對決尼克森）。⁵ 後來又下滑，在 1996 年（柯林頓對決杜爾）時只有 49.1%，到了 2000 年（小布希對決高爾）更盪到 46.6%，30 年間共下滑了 26%。⁶ 地方選舉的投票率也循同樣幅度在下降，雖然是從較低的高點開始下滑。

美國人自認「對政治感興趣」的比例在 1975 至 1999 年間，從 52% 降到

204

³ 由普特南（2001）提到的數據所計算得出的百分比可看到，分別有從 -50%（護士）、-32%（建築師）、-28%（工程師）、-10%（麻醉醫師）、+3%（外科醫生）的不同變化。

⁴ 有些證據顯示，美國人會誇大自己上教堂的情況，並且這種誇大的程度也愈來愈高（Hadaway, Marler and Chaves, 1993）。

⁵ 最後一次只允許男性投票的全國性選舉發生在 1916 年，當時投票率是 62%。到了 1920 年被拉低，往後許多年，女性的投票率都較低（Patterson, 1993; Hough, 2000）。

⁶ 數據來自國際民主與選舉援助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在《獨自打保齡球》撰寫之際，2000 年的數據尚未可得，但很明顯的是後來證明情況同樣是持續向下的趨勢。

42% (DDB Needham 資料)。同樣地，表達對時事「很有興趣」的比例從 1974 年的 50% 降到 1996 年的 38% (Roper 資料)。因此在政治興趣方面的減弱幅度分別是 19% 與 24%，其程度也很類似於在投票率上所發現的。

政治捐獻在同樣一段時期則有大量的成長。光在 1976 到 1986 年間，民主黨的財務收入增為雙倍，而共和黨則增為四倍。它們政黨組織內僱用人員的規模也急遽擴張。儘管在財務上有所提升，投票的熱情與公民對政黨的參與則十分萎靡。政黨認同從 1960 年代早期的 75% 跌落到 1990 年晚期的 65% 以下，滑落了 15%。政黨集會的出席情況也下降了約 25%；在競選期間，義工協助政黨的比例也減為一半；參與政見發表會的人數也掉了近 60%。誠如普特南所言：

也不過才 20 年前，當時的選舉造勢期間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而言，是一個積極參與全國性慎思商議的機會。我們參與競選活動而不只是旁觀。如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選舉的競選活動是發生在我們身旁的事件；是日常生活的環境噪音裡一項惱人的因素；是電視螢光幕上一閃即逝的影像。(Putnam, 2000, p. 41)

至於地方或鄉鎮事務的層級，情況並未比較樂觀。在 197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之間，出席鎮民大會或學校事務大會的比例下降了 40%，而為（任何）地方組織委員會服務的比例下降了 39%。較不依賴實際集會的政治活動下降的情況一般而言則較為緩和。寫信給參、眾議員的比例下降了 23%；競選公職的人數下降了 16%；投稿報紙民意論壇者也下降了 14%。

人們最能指認的，呈現出反向趨勢的政治領域便是 1960 年代以來出現的全國性社會運動。從密西西比民權運動、反越戰抗議行動、1980 年代的支持或反墮胎抗議行動，以上運動都漸漸走向「專業化」，有一小群全職、支薪的工作人員待在華盛頓。陸續還是有遊行活動發生，而且證據也確實顯示，曾經參與示威遊行與抗議的美國人比例有些微的增加。然而，它們的性質似乎已有了改變，抗議變成是種舞台表演，目的是要捕捉到媒體稍縱即逝的注意，而不是政治投入的延伸指標。

在美國另一個相反的趨勢是州層面的投票總數。從 1960 年代晚期以來已增加了近四倍（雖然這個發展只適用在約五個州，其中又以加州最明顯）。然

而普特南警告那些過度正面評價這個趨勢的人，他引用的是近來一項研究的結論，即州層面的投標總數「不再是那麼好的測量一般公民興趣的工具，反而比較適合做為募集基金之能力的測試」（Tolbert, Lowenstein and Donovan, 1998, p. 35）。基本上，他將這個趨勢詮釋為那個流傳更廣的美國政治故事（金錢與專業說客有效地取代了以真正的公民參與為基礎的政治）的另一個版本。

直到近來突然湧現的社會資本研究，這些政治參與下滑的程度才開始被視為是根植於（或藉此來解釋）大眾對政治愈來愈抱持犬儒主義的態度，對政治興趣缺缺。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較少談論到政治——自稱在「過去一週」中有討論過政治的美國人比例，從 1980 年代的 51% 掉到 1996 年的 28%，並且在不到 20 年間下降了 45%。更為驚人的是在對政治與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上，我們甚至可稱之為崩潰。1960 年代中期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說「我們可以相信位在華盛頓的政府，一定或至少在大多時候會做出正確的事。」到了 1990 年代，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位在華盛頓的政府（雖然在 911 事件之後，我們看到了更低的數據）。

在美國不投入政治事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而即使政黨漸增的政治獻金也似乎難以阻擋這樣的趨勢。然而，這裡看到的模式很類似在美國其他面向的社會資本上所看到的現象，因此不將因果網絡侷限在政治領域內，似乎是明智之舉。

非正式的社會連結

試圖推翻普特南關於美國社會資本走向衰退之分析的眾多批評裡，最有力且最合理的一個就是「它幾乎完全只衡量正式結社生活的情況」。有人認為，雖然美國人參加俱樂部或正式社團的數字確實在下滑，但這是因為他們現在反而傾向於和朋友、家人、同事發展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當今的美國人不再需要仰賴他們祖父輩那個粗糙的制度來組織社會生活，現在他們可以拿起話筒約朋友共進晚餐。

研究如何調配時間的論文證實了美國人的確投注了更多的時間在非正式的社會活動。例如，相較於正式、非宗教性的組織活動，他們平均花了六倍的時間在拜訪朋友上。但普特南團隊所取得的 1990 年代晚期的商業調查資料卻語帶肯定地表示，那些希望駁倒「獨自打保齡球」假設的人將會發現，他們在非正式社交活動的趨勢中將得不到絲毫的慰藉。

在 1970 年代中期，美國人平均一年在家裡與朋友同樂約 14 至 15 次，但到了 1990 年代末期，這個數字幾乎減半了，一年只剩八次，掉了 55%。不令我們驚訝的是，造訪朋友家的次數也同樣減半了。外出野餐下降了 60%。外出到酒吧、夜總會、舞廳、酒館下降了 40-50%。在 1980 年代是看電影次數三倍多的玩撲克牌遊戲，之後也減半了。寄送賀卡（即便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也掉了 15-20%。雖然社區計畫的數字有提高（請一併參考第四章），但與鄰居社交的夜晚卻下降了 30%。

時間分配的研究也印證了這個總體的圖像：從 1965 至 1995 年花在「閒聊」的平均時間掉落了 40%。這個趨勢未見趨緩，另一個時間分配的研究顯示：單從 1992 至 1997 年的七年間，花在社交的時間就下降了 20%。

美國人是轉而退回到較為私密的家庭內社交嗎？事實似乎並非如此。自稱家人會坐下來共享晚餐的家庭比例下降了 32%，雖說傳統家庭的數目也下降了。家內有 8-17 歲孩子而會全家一起出遊度假的家庭比例也掉了 28%。即使是一同看電視都下降了 24%，而就坐下來聊天也下降了 19%。

美國人是將他們的社會焦點轉往工作環境中嗎？美國人的確投注了很多時間在工作上，平均一年有二千個小時以上，而歐洲人平均則僅近於 1,600 個小時（OECD, 2001b）。普特南也承認，在這個領域裡的相關數據相對而言是比較少的，但是你仍需只看好的一面，然後認為美國人的工作場域已成為社會生活復興後的核心所在。在 1955 年 44% 的美國工作者認為工作的時間比起非工作時間更令他們快樂，但到了 1999 年向下掉到僅剩 16%，下降了 64%。個人網絡的研究發現，只有不到 10% 的美國人認為同事是他們的朋友，而當被問到討論「重要事情」的對象時，只有不到一半的工作者會將某一個同事列名其上。

前往運動俱樂部或去運動的人口則有上升，前往觀賞重大體育盛會也是如此，後者從 1960 至 1998 年幾乎增加了一倍。但參與團體運動的比例則下降，通常是下降了 10-20%。人們更常運動，但卻是自己一個人進行，或至少是跟許多陌生人共處一室進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音樂上：雖然音樂產業向上增長，但玩音樂相關設備器具的人卻減半。打保齡球（普特南著作中的主題）比例其實是上升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在一年之內曾去打保齡球。但保齡球聯盟的會員卻神奇地向下掉了 70%。事實是並非美國人不做這些活動了，而是他們仍在做，只是若不是自己一個人，就是以較小的社會規模來進行。關

於投入運動的方式的性質差異，我們可以觀察以下這件事而得到例證，即保齡球聯盟的會員每人消費的啤酒與披薩是其他打保齡球者的三倍；換句話說，在聯盟內打保齡球是（或曾經是）種社交行爲。

在非正式社交行爲的領域裡，則有一個有別於普遍規則的重要例外情況，即使用電信技術來保持連絡。在 1998 年三分之二的成人在受訪前一天曾打電話給親人或朋友「純聊天」（Pew Research Center, 1998）。擁有電話的家戶比例自 1940 年以來已經增加一倍，雖然在 1960 年代晚期就已屆今日水準了。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將帶來一種嶄新且重要的社會連結形式，對於與位在遙遠一方的朋友及親人的連結而言更是如此，這也反映了過去 30 年來長途電話相較於市內電話的成長。但相對的，人們不會藉由電話來認識陌生人，因此這個媒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維持而非創造社會資本。

另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現在回答這個問題不論對美國或更廣的脈絡而言都嫌太早。這個問題就是新形式的電子溝通在未來的趨勢中將扮演何種角色。我們將在第九章討論政策意涵時，再回到這個問題來。

捐獻與信任

在美國自 1960 至 1995 年間，每人捐款增加了一倍，但收入上升的幅度更大，捐獻占國民生產總額的比例從 2.26% 降至 1.61%，下降了 29%。參與社區計畫的比例下降了 40%；捐血下降了 20-25%；義消的人數也下降了。

即使是相當低度的時間奉獻也難逃這股趨勢。拒絕接受問卷調查的情況自從 1960 年代以來已增加一倍，而公部門人口普查表格的自願回收情況也下滑了四分之一。美國似乎變成一塊更爲吝嗇且具敵意及沒耐性的土地。機車騎士不再依交通號誌來停車，根據針對紐約州一小鎮的細緻研究顯示，駕駛人闖紅燈的比例從 1979 年的 29% 升至 1996 年的 97%。通報的犯罪事件，在同樣這段時期裡上升了三倍，雖然謀殺案件（上升兩倍）到了 1970 年代前都呈停滯狀態，犯罪率自從 1990 年代初期以後則有顯著地下降。

還是有正面的例子。表示自己參與慈善活動或社會服務活動（如幫助窮人、病人或老人）的美國人比例從 1977 年的 26% 上升到 1991 年的 46%，上升了 77%。其他證據顯示，志願服務在過去十幾 20 年來增加了約 25%。這個統計數字在一片下滑聲中以沙漠綠州的姿態浮現。然而，這些增加大多集中在超過 60 歲以上的人口群。我們在下文也會看到，在美國的下降模式具有很強

烈的世代傾向，目前年紀較長的這一代一直都是較具有公民德性的一群。當「公民世代」退休後，他們就被拋入了志願服務領域中，至少在他們走入風燭殘年時，能給予在身體上較失能的同儕協助。然而，在二字頭年紀的世代中，志願服務也有些微的成長，這一部分反映出大學裡將服務課列為必修的結果。

我們有辦法將以上所有的趨勢整合並陳嗎？在第一章，我們提到最簡易、普遍的社會資本指標（同時根據「資料化約」以及「理論討論」）就是社會信任，即人們視他人為可以信任的程度。我們也在二到六章中看到社會信任是諸多後果的關鍵預測指標，這些後果正是大眾及政策制定者所關心的。因此，美國人如今較不能信任彼此嗎？我必須很傷感地說，沒錯！

在 1960 年，55% 的美國人認為一般而言，他們是信任其他人的。到了 1998 年掉到只剩 33%，下降了 40%。普特南等人所記錄下的眾多指標中，上述這種百分比下降的程度，大約落在中等至高等。針對高中學生的研究顯示在信任上有更大幅度的衰退，從 1976 年的 46% 掉到 1995 年的 23%，掉了 50%。在這些概要的統計中唯一正面的微光來自 1995 至 1998 年這段期間，高中學生的社會信任向上爬升了一些百分點，這或許暗示了過去 30 年間的信任衰退趨勢，如今正要開始反彈了（Rahn and Transue, 1998）。

209 關於這個淒慘的美國故事的最後一個統計數字是，在缺乏日常、「厚實」的信任情況下，美國人似乎愈來愈仰賴較為正式的方式與制裁力量來建立另一種形式的信任。警察、警衛、大樓管理員的數字在 1960 至 1996 年這段期間，幾乎增加了一倍，而律師與法官的數字則增加超過一倍。花在預防性執法行為上的費用似乎向上飆升，其程度一如信任向下直落一樣。私下來說，就像一位資深的美國政治人物在造訪唐寧街時所說：「當你能把別人告到傾家蕩產時，誰還需要信任！」。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

有時，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戰爭會強化連帶感或社群意識（黏著性社會資本），至少在有戰事的國家內部是如此。可悲的是，911 事件讓學者得以檢視這一個假設。稍早的資料指出，在恐怖分子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擊紐約市之後，美國內部各項社會資本的測量值都有顯著的提升。

近來完成的社會資本調查（Putnam, 2002）在 911 後的每個月都進行一次。調查顯示公共事務的興趣成長了，尤其是在之前曾表達出很強烈不投入

態度的年輕族群身上（27%以上，相較於 35 歲以上的 8%）。對治理國家人士的信任之變化也在年輕人當中成長了 19%，在年紀較長者當中成長 4%。而有 51% 的人表達出比一年前對聯邦政府有更多的信心，而只有 7% 的人表達出的信心比一年前更低，44% 的變化。這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轉變，也是數十年來未曾再見過的，對政府最大程度的信心。⁷

對地方政府上的淨信任也成長 19%，對警察是 14%，對鄰居是 10%。令人驚訝的是，對其他種族的信任也增加了 11%，雖然對阿拉伯人的信任落在對其他種族之後，而且對「移民權利」的支持也顯示了 11% 的下降。

在行為上的改變則較為不明顯。在捐血、志願服務、為當地社群做事以及參與政治集會的淨增加比例從五到七個百分點不等。上俱樂部、上教堂、捐獻及非正式社交行為（擁有會到你家拜訪的朋友）其實下降了 6%。最後一項則反映在看電視比例的增加，有 16% 的淨增加，這意味著每天增加一個小時（平均達到每天 3.4 個小時）。

210

總之，911 事件似乎急速點燃了美國人對彼此的信任，但對實際的行為則只引發了很輕微的改變。在這段時期裡，白宮當局廣泛地徵詢普特南的意見，這可以從布希總統於 2002 年一月發表的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宣布要創造出公民服務隊來，並敦促美國人「為彼此做點什麼」看出端倪。這些政策計畫造成的影響將在我們理解社會資本的創造與摧毀上，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試金石。

雖然很明顯的是沒有任何美國人會樂見 911 事件的發生，但它確實促使美國人反省什麼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並強化了他們彼此連結在一起的欲望。然而，在我下筆撰寫的這段時間裡的最新資料顯示，在信任與投入方面的提升（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如今大多已煙消雲散。例如在 2002 年有 50% 的美國人說，他們對白宮當局「非常有信心」，這是哈里斯民意調查 40 年來從未測得的水準；但到了 2004 年，數字則退回到了歷史上較常見的水準：31%。看起來似乎即使經歷了像 911 這麼恐怖的事件之後，或至少是他們曾經以恐怖來回應這個事件之後，他們仍無法逆轉美國長期在信任、投入上的下滑趨勢。

⁷ 這裡陳述的數據主要是淨變化。換句話說，如果有 20% 顯示出更多的投入、5% 顯示出較少的投入，那麼「淨變化」就是增加了 15%。在以下這個網站上可以找到對方法與主要發現的摘要：www.ksg.harvard.edu/saguaro/press.html。請一併參考 Drogosz, Litan 與 Dionne 研究（2003）中提及普特南更新過的數據。

小結：美國的故事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拿出了許多非凡但令人沮喪的資料來說明，幾乎從各種測量資料都發現：美國在 1960 至 2000 年這段期間的社會資本是在衰退的。這下滑的趨勢是緊跟在一段始於 20 世紀初期，美國社會資本成長的時期之後。下降的程度隨著我們採用的測量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大多落在 15-50% 之間。

有一些指標或社會組織的形式似乎反駁了這個趨勢。自助團體、以捐款為主的社會運動、宗教基本教義派都設法達到了成長。在政治領域裡，政黨得到的金錢援助是成長的，而且變得愈來愈專業化，雖然大眾的支持度萎縮了；參與抗議活動的人口比例則些微成長。在非正式社交活動上，幾乎所有的指標都下降了，極少數的例外像是上健身房、觀賞運動比賽，或許還有打電話給遠方的親人及朋友。最後，從捐獻與信任上看來，趨勢當中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志願服務的提升（雖然並不是在年齡不那麼大的人們身上），以及在高中生中信任下滑的情況如今已觸底反彈。近年來下降的犯罪率或許也是個好兆頭，雖然這或許是源自於社會資本之外的因素，像是愈來愈普遍的私人保全。

幾乎以上所有的反向趨勢都具有一些共同點：低成本、極小範圍內的社會接觸活動。相反地，若將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做一個橫切、多方位的觀察，會發現整體的圖像幾乎還是下滑的。最終資料指出在 911 恐怖攻擊的喚醒聲中，許多社會資本出現了上升的情況。對聯邦政府的信任顯現出最強力的逆轉，雖然在行為上的轉變是較輕微的。但後來的資料指出，這些增加的情況並未繼續維持下去。

其他國家的趨勢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以許多方法來探索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頹，而他的著作也提供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一個無價的基準點及挑戰。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能在其他國家關於社會資本的資料中找到同樣如此包羅萬象的分析，但我們的確擁有一些資料，它們將提醒我們，不應該把美國的情況視為能推論到世界各地的通則。

在本節裡，我們將使用與普特南用在美國脈絡下的相同分析架構，依次

檢視針對每個國家情況的最佳分析結果。隨後的一節將會確認出一些普遍的主題，並思考若以其他方式來測量，是否會發現有巧妙差異的結果。

其他也看得到社會資本衰退的國家：澳洲與英國

在社會資本指標上或多或少都普遍下滑的模式，絕非美國獨有的特殊現象。雖然不像美國那麼清楚明瞭，但不論是澳洲或英國都看得到下滑的證據。

澳洲

在我們蒐集得到合理資料範圍的國家中，澳洲可說是展現出最近似於美國模式的一個國家。

我們在澳洲可以看到許多歷史悠久的志願團體，在近幾十年來的會員數出現下滑的現象，像是工會的會員數或教會的信徒數。澳洲一如美國，在運動的參與度上有提升（但只限於個人形式的，而非團體的運動）。許多包括環保運動在內的社會運動，似乎像在美國一樣，流失了許多會員（Cox, 2002; OECD, 2001a）。

212

我們發現在國際上，傳統組織的會員數下降並不是個不尋常的現象，但澳洲也幾乎在所有其他的社會資本測量值上，都看到了下滑的情況。志願服務下降了，非正式社交行為也減少了。對政治人物的信任下降，雖然關於政治行動主義下降的證據並非那麼清楚：國會選舉的投票率仍接近 100%，但這只是澳洲強制投票制度下的反映罷了。社會信任，這個重要的一般性指標也下降了，從 1981 年的 48% 下降到 1997 年的 40%。同時，訴訟案件也有可觀的增加，這其中包括了控告地方議會及公家機關。

英國

在稍早的著作裡，我曾認為以社會資本的趨勢來看，英國算是最典型的「混合型」（Halpern, 1997; Aldridge and Halpern, 2002）。資料的逐漸累積促使我重新修正自己對下降趨勢的評估，雖然在各社會階級裡的下降程度是不平均的，而且下降趨勢如今也有趨緩的情況。

由 Hall（1999）所寫的一篇涵蓋甚廣的評論，所評述的時期直到 1990 年左右，它對英國處境的描寫相較而言是較正面的。較近期的資料告訴我們，他或許在某些面向上過於樂觀了，而英國的整體圖像看起來與美國的愈來愈相似

(Grenier and Wright, 2001)。

總體來說，英國的社團會員數似乎是穩定的，甚至從 1960 年代以來是向上升的。每人平均隸屬的社團平均數目來來回回從 1959 年的 0.73 上升到 1999 年的 1.43，這股上揚趨勢主要集中在女性及較上層的社會階級上，這更進一步地拉大了英國原本就很明顯的在會員數上的階級差異。就社團而言，上升主要集中在環保組織，而某個程度上也集中在運動俱樂部。例如，全國名勝古蹟託管協會 (National Trust, 負責照料英國豪華住宅的組織) 從 1971 至 2002 年間會員數成長了十倍，如今已超過 300 萬人。皇家野鳥保育協會也在會員數上增加了十倍，已超過 100 萬人，就像許多環保組織一樣。然而，這些成長快速的大型組織仰賴的是「捐款型會員」的支持。大眾爲了特定議題而註冊表達他們的支持，寄出了一張支票，加入了這個組織，而回過頭也收到了有關該理想的一些資訊。其他組織的會員數就來得單薄許多。例如，全國名勝古蹟託管協會令人印象深刻的會員名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仰賴「會員」在進入該組織所經營爲數眾多的古蹟名勝時，能享有折扣：如果你在未來一年裡要造訪幾個地點，加入該組織將是較划算的。

其他形式的社團則顯示出衰退的情況，至少從 1980 年代以後，這其中包括工會、傳統的婦女組織、教會、青年組織、服務性組織。例如，全國婦女機構聯盟的會員數從 1972 至 2002 年就下降了 46%，只剩 24 萬人，而工會的會員數從 1978 年的顛峰時期降至 2000 年的 780 萬人，下降了 41%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同樣地，教會信徒數與出席狀況在近十幾年來也有驚人地下滑，像是按照當前的推估，英國聖公會將在 10 到 20 年後面臨滅絕的威脅。直到 1950 年，仍有超過 70% 的英國嬰孩接受洗禮，一如 50 年前一樣。自此之後，受洗的情況開始下滑，且下滑的速度有逐步增快的趨勢，到了 2000 年已只剩下 23% 左右 (Voas, 2003)。據我推估，如果當前的趨勢再繼續下去，英國最後一個接受洗禮的嬰孩將在 2016 年出生，這對這項綿延超過千年的習俗來說，是個令人難以致信的改變。⁸

比較各世代研究的結果——也就是對特定時期出生的人們做貫時性研究——也證明了從 1960 年代至 2000 年代各組織的會員數有顯著下降 (Ferri,

⁸ 許多人並不相信這項推估。但至少在當前的英國，宗教性似乎就像是個隱性基因：孩子的宗教性乃跟隨著較無宗教傾向的父母。趨勢線也是緩緩加速，這是因爲在人口中潛在的宗教伴侶一直在減少所致，這讓宗教虔誠者愈來愈難找到相仿的另一半。

Bynner and Wadsworth, 2003)。當出生在 1946 年的人們到了 30 歲時，約有 60% 的男人與 50% 的女人至少隸屬於一個組織。但那些出生在 1958 年的人們到了 30 歲時，百分比分別掉至約 15% 與 25%。對那些出生在 1970 年代的人們到了 30 歲時，分別只剩下 10% 與 15% 的人們隸屬於至少一個組織。因此，從英國世代研究得到的證據告訴我們，出生在二次大戰剛結束後之時期的世代，與就晚 10 年出生的世代，彼此之間在社團會員數上存在著一個顯注的下降趨勢。⁹

就像在美國看到的，我們所擁有最正向的統計數字裡，其中一個就是志願服務，在 1980 年代期間參與志工的人口比例增加了，到了 1990 年代趨勢漸漸走向平緩，甚至是些微下降。更進一步來說，從事志願服務的人花在志願服務的時間量從 1991 年的每週 2.7 小時增至 1997 年每週四小時 (Grenier and Wright, 2001)。就像在美國看到的，在整個 1980 與 1990 年代裡，65 歲以上的人在志願服務上的參與有顯著增長，或許這有部分只是反映了這一群人的身體愈來愈健康罷了。英國的資料告訴我們，目前 50 多歲的世代（也就是緊接在二戰結束後出生的）是特別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的一群。就負面來說，年輕人從事志願服務的比例以及年輕志工貢獻的時間，在 1990 年代期間都下降了。非就業人口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也下降了。年輕人似乎寧可捐錢也不願奉獻時間 (Matheson and Summerfield, 2000)。

214

慈善捐款的趨勢也並不全然是正面的。雖然 Hall 提到捐獻直到 1993 年前這期間都在增加，但此後則開始下降。捐獻的人口比例從 1993 年的 81% 掉至 2000 年的 67% (Grenier and Wright, 2001)。從實際的觀點來說，整體捐獻數目也在 1990 年代下降了，雖然最近的資料佐證這股下降的趨勢似乎是停止了。願意接受問卷調查的比例也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間接測量方式：較高的受測率與較高的社會信任之間有高度相關。英國各主要公共問卷調查的受測率也在過去這十年來有顯著下降。貢獻時間似乎也 and 捐款一樣，也都受害於這股趨勢。

取自英國犯罪調查的資料裡有關社區觀感的部分，它告訴我們從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助人行為有顯著下降。例如，以「人們都一同努

⁹ 在這些資料裡存在著一個謎團，即這些研究裡所顯現的大規模轉變，為何在橫斷面資料裡並未顯得更為清晰、明確。我們是否像在美國那裡看到的那樣，也擁有一個下降的世代模式，還是沒有？

力，試圖彼此幫助」來描述自己社區的比例從 1984 年的 43% 降至 1996 年的 28%。比較令人振奮的是，對社區的觀感從 1996 至 2000 年間有了改善，認為自己社區是樂於助人的比例從 28% 升至 36%。這股反彈似乎反映了犯罪率在 1990 年中期後的下降，而犯罪率在這之前已有數十年的持續上升了。然而，在我下筆這段時期得到的資料卻顯示，這股樂於助人的趨勢已在 2002 至 2003 年趨於平緩，即便犯罪率仍持續下降。

直到最近，人們廣為接受以下觀念：雖然地方選舉或歐盟選舉的投票率一直穩定下滑，但英國仍在抵抗類似美國政治投入下滑的模式。在 1990 年代中期，布萊爾 (Tony Blair) 領導的工黨甚至見證了在黨員數上可觀的擴張（這是由年輕人加入所帶動的趨勢），這扭轉了政黨黨員老化及縮減的長期趨勢。然而，1997 年與 2001 年的選舉卻出現了明顯向下的趨勢。2001 年的選舉投票率是自 1918 年以來最低，而工黨黨員數如今連續七年呈現下降的情況。地方選舉的投票率從 1987 年 50% 的巔峰，掉至 1998 年的 30% 不到，尤其在都會地區更是嚴重。¹⁰ 政治信任及對國會的信任從 1970 年代至 2000 年代期間都一直下降，雖然這股趨勢很容易受到問題本身的措辭所影響。像是政治人物是否將政黨擺第一而國家擺第二，等這類關於政黨的問題即顯現出顯著的信心衰退，尤其是在 1990 年代。更一般性的問題（如對政治人物或政府首長的信心）則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下降，而後在 1997 年選舉之後則有明顯的增加。自此之後，信心又逐漸掉回到原本的水準，雖然並未像 1990 年代初期那麼的低。相反地，對公務人員的信心從 1983 年的 25% 急速攀升至 1997 年的 45%，之後則一直維持平緩 (MORI 資料)。¹¹ 激烈的憲法改革（包括了在 1997 年選舉後成立的蘇格蘭議會）已無法阻擋這股趨勢，政治信任在邊界兩方都同樣是在持續的下跌。

英國另類或抗議性的行動並不像在美國一樣，而只有微微地增加。從 1986 至 2000 年間，參與連署的比例從 34% 提升到 42%；連絡國會議員的比例從 6% 升到 10%。

非正式社交行為的圖像則最吻合於「混合型」。拜訪友人在各種團體裡都顯著下滑，尤其是具有全職工作的男性。但是其他類型的社交行為，例如上酒

¹⁰ 事實上，英國地方選舉的投票率與其他各國相較，是異常的低，尤其與美國相比，這種異常現象或許是反映了其地方政府雖然異常龐大，但卻沒什麼影響力的事實。

¹¹ 與一般民意相左，對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員的信心從 1983 到 2003 年逐漸有些微增加，在 1997 年選出了新工黨政府主政之後，信心大幅提升，隨後又是些微的下滑。

吧、運動俱樂部則有上升。

但是最令英國擔憂且最戲劇化的趨勢就是社會信任（一個關鍵且扼要的指標）也急遽下滑。在 1959 年時 56% 覺得大多數的他人都是可被信任的，但到了 1980 年代時已掉至 44%，到了 1996 年甚至不到 30%，下滑了超過 50%。¹² 有個較為正面的資訊是，世界價值觀調查在我寫作這期間所公布的資料顯示，在 1999 年的社會信任並未有進一步的下降，而來自英國社會態度調查的資料也說，自 1997 年後至 2000 年的社會信任有些微上升。

然而，或許英國相關資料裡最令人吃驚的一點就是 Hall (1999) 以及 Grenier 和 Wright (2001) 皆曾提及的：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不一致。雖然普特南在美國的例子裡強調說，社會上的志願服務與會員數等現象，也存在著龐大的世代差異，但在英國潛伏的則是社會階級間的差異，而且還隨著時間繼續擴大（雖然近來得自世代研究的證據顯示，可觀的世代轉變也出現在英國）(Ferri, Bynner and Wadsworth, 2003)。在不少例證裡讓我們舉以下這則來說明：英國的政治興趣程度看起來似乎是如此，即從 1981 至 1999 年期間，自陳對政治是「感興趣」或「非常感興趣」的比例在總體上的改變很少，從 39% 掉至 38%。但在專業人士與管理階層（AB 階級）之間，興趣從 56% 升至 66%，然而在非技術或半技術員工（DE 階級）之間，興趣從 33% 降至 18%。因此，我們發現政治抗議活動雖然有上升，但都是由中產階級所主導，而投票行為（這項行為較無社會類屬上的偏傾）則下降。這個模式向民主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挑戰。同樣地，一項近來針對英格蘭與威爾斯自 1972 至 1999 年的社團會員數之趨勢進行的評論，做了以下結論：除了主要的穩定模式之外，還存在著「在會員數上的階級兩極化現象」，即勞工階級的男人愈來愈從社團的會員數中被邊緣化了 (Li et al., 2002)。

216

持平而論，總體趨勢也暗示我們，英國在過去幾十年來見證了社會資本的顯著下滑，雖然並不像美國那樣的普遍且明瞭。也有一些證據說明這個衰退的趨勢在最近幾年已經中止了。或許更準確地說，我們應將英國的中產階級置於

¹² 這裡有一個小謎團，即為何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出從 1981 年與 1990 年的曲線到 1995 年與 2001 年的曲線有顯著的下滑，然而英國社會態度調查的資料顯示在 1990 年代並未有什麼變化。MORI 民調公司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一般而言，你會信任街上遇到的一般人，跟他們說實話嗎？」問得的結果顯示出的趨勢是介於以上兩者之間：贊成的比例微微從 1983 年的 57% 上升到 1993 年的 64%，但到了 2000 至 2001 年時掉到 52%。之後一直些微上升到 2004 年的 55%（請參考 www.mori.com/polls/trends）。

社會資本穩定上升的範疇裡，而將體力勞動階級置於急速下滑的範疇。

其他國家

以最簡明易懂的指標——社會信任來看，大多數前蘇聯國家都可以暫時被置於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期間社會資本下降的範疇，包括俄羅斯、匈牙利、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等國。這似乎可能反映出了一個現象，即能讓這些社會在之前體制下運轉的社會資本或網絡之形式被摧毀。社會信任上明顯的下降似乎也在南韓、葡萄牙、及阿根廷和巴西在內的南美國家中發現，後三者從程度上來看也是相對較低的（見圖 7.2）。

社會資本維持穩定或上升的國家：瑞典、荷蘭、日本

或許，針對其他單一國家的分析中最令人訝異的一點是，原本美國下滑的趨勢並不是普遍的。

瑞典

瑞典一如其他北歐的鄰邦，都是具有令人咋舌的高社會資本國家（請見圖表 2.1），也具有非常高度的組織會員數——92% 的瑞典人隸屬於一個志願性組織（Rothstein, 2001）。因此，有人可能會認為它會是社會資本跌幅最淒慘的國家。對政府與國會的信任確實在 1980 年代時曾下降，儘管瑞典的政府組織在面對全球經濟壓力、醜聞、長久以來統合主義式政府架構下所引發的張力時，仍奮力想維持聲譽卓著的「瑞典典範」。政黨變得更加專業化，並將志願參與的黨員推到不被重視的角落，在裡面年輕族群的黨員數也下滑了，雖然整體黨員數仍維持平盤。然而，不像在美國看到的那樣，在這裡下降中的政治信任並未伴隨著社會資本廣為下降的現象，事實上，瑞典社會資本的許多關鍵指標似乎有增加的趨勢。

參與普選的情況仍維持在高檔，高達 90% 上下。雖然有些傳統組織似乎喪失了其支持根基，像婦女組織和自立教會，它們大多數仍維持強盛或成長的情況，這其中也包括運動性、退休人士組成的、文化性、環保等團體及工會。總體而言，會員數的情況自從 1950 年代初期的高檔以來，並未有衰退趨勢出現。同樣地，參與志願服務的意願也未有下降的趨勢，甚至有上升。瑞典社會資本彈性十足的特性並不僅限於「捐款型」組織。讀書團體（這是瑞典社會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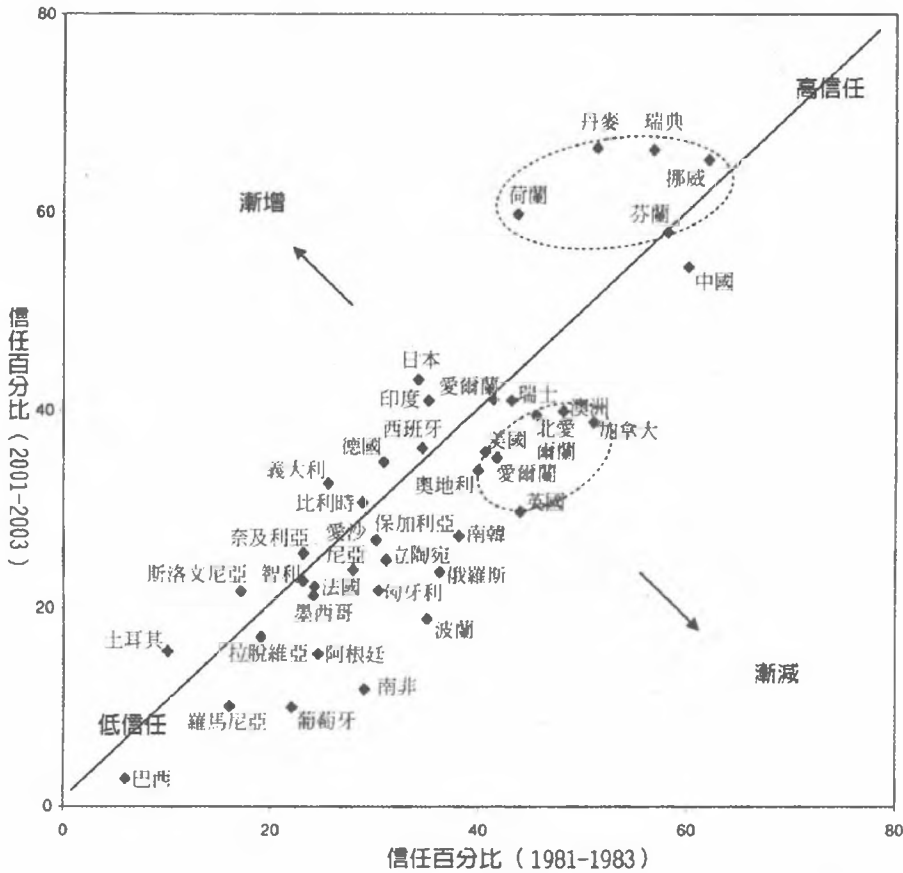


圖 7.2 各國信任度自 1981-1983 年至 2001-2003 年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價值觀調查以及其他資料

註：上圖中對角線以上的國家代表在信任度上是增加的，而在下方的則是減少的。請注意在圖的右上方，信任度高且漸增的北歐國家群，以及在圖中右方，信任度中等但漸減的盎格魯撒克遜語系國家群。

本裡一個特別有趣的類型，它是種通常由八至十人組成，齊聚學習或討論特定議題的非正式團體的參與率從 1960 年時的 15% 成長到 1975 年的 40% 左右。

或許，在美國那裡看到最令人驚訝的資料是在非正式社交行為的下降情況，這些數據反駁了以下的觀點：美國下降的情況只是某種測量方式導致的人造產物，或僅是社會資本私人化的反映。那麼，瑞典的資料告訴我們什麼

呢？瑞典生活情況調查（Swedish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s）以及其他的資料告訴我們的結果似乎是再清楚不過了：瑞典非正式社交行為之程度已向上提升。例如，每週與朋友相聚的人占的比例從 1975 年的 45% 升至 1995 年的 57%，升高了 21%（相對的，美國在同一段時期則有約 50% 的下降）。同樣地，一項從 1950 至 1988 年針對瑞典小鎮 Katrineholm 的研究結論說道，居民在社交活動上變得更加積極，如今「更頻繁地與他們的同事、鄰居、朋友們社交活動」（Perlinski，引自 Rothstein, 2001, p. 224）。瑞典人說自己在過去五年裡上過餐館超過五次的比例從 1982 年的 25% 上升到 1995 年的 41%，上升了 64%。同樣反應出此趨勢的是領有合法開業執照的餐廳數目從 1967 年至 1990 年代晚期已上升了七倍。

最後，瑞典的社會信任（社會資本最簡要的指標）儘管已居於各國中最高的一級，但仍往上升得更高。在 1981 年，57% 的瑞典人覺得大多數的他人都可被信任，到了 1997 年已上升到 67%。在 2001 至 2003 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中也看到程度同樣高的 66%（請參考圖 7.2）。

荷蘭

219 荷蘭擁有與瑞典十分相似的模式（De Hart and Dekker, 1999）。成為會員的比例與投入的強度在幾乎所有類型的組織中都看到增加的情況，除了傳統的婦女組織及政黨之外。然而，雖然相對來看，在政黨黨員數上是下降的，但投票率仍維持穩定，政治行動主義也增加了。志願服務增加了，雖然在年輕族群中是減少的。在各種收入的群體中，認為自己在有困難時，有人可以依靠的人口比例從 1996 年的 40% 左右上升到 2001 年時超過 50%（Eurobarometer data）。最終，社會信任似乎有急遽的增加，從 1981 年的 44% 上升到 1999 年的 60%，在 2001 至 2003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裡仍看到相同的水準。

日本

在許多面向上，日本都可算是不尋常的一個國家，在社會資本的特性上也不例外。日本的資料並未讓人一目了然，但持平而論，我們可以適當地將它安置在「穩定的」、「上升的」社會資本範疇裡。福山廣為人知地宣稱，美國與日本都是高信任的國家，而不像信任往往走不出家族場景外的中國（Fukuyama, 1995a, b）。然而，他的分析常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差異，即傳統來說，日本人是

非常信任透過個人關係而認識的人或組織（但顯然這範圍超出家族之外），但卻對較陌生的人懷有很深的戒心（不像美國人，其信任是較具普遍性的）。

跟上述背景相左的是，日本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本的指標都在上升（Inoguchi, 2000）。日本社團的數目自 1950 年代起已有醒目地上升，非營利社團的數目從 1957 至 1996 年增加了近四倍。然而，我們稍早也曾提過，組織的數目並非是個可預測真實參與情況的可靠指標——即使在美國，這個指標也在上升（雖然其程度絕不像日本）。時間分配的研究顯示，社區或地區內的公民參與幾乎仍維持不變，更普遍的公民「社會福利」活動則緩慢地上升，志願幫助孩童、老人、弱勢者的活動則有驚人的成長，從 1976 年的 1.7% 到 1996 年的 5.5%，增加了三倍以上，雖然其最初的百分比相較來說是算低的。然而，這些增加似乎是由於某個固定比例的人口以更高的強度參與所導致。同時，如果我們能接受公司行號也是種社會資本（尤其在日本的脈絡中），那麼「這種形式的社會資本也已經下降了，至少是有了顯著地改變，因為我們看到了日本傳統上的終身契約制已經勢微」這種論點就有問題。

220

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從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晚期已有顯著地提升。例如，對選舉的信任從 1976 年的 67% 提升到 1996 年的 77%，認為民主是「好的」的比例從 1963 年的 38% 提升到 1993 年的 59%。然而，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卻下降了，贊成「人民應該信任政治人物去解決問題」的這種說法，比例從 1953 年的 43% 掉至 1993 年的 24%。眼見人們對民主制度之信任與對其中的政治人物之不信任，兩者之間不一致的現象，日本學者依據日本長期以來信任、強大的公民服務歷史，以及政治人物被視為是與當地自肥的分配政治生態糾纏不清的「一般」人等角度來解讀。

我們似乎找不到太多非正式社交行為趨勢的資料，但日本對社會信任的資料顯現了一個很清楚上升的趨勢，從 1978 年的 38% 到 1993 年的 38%，上升了近 50%。從世界價值觀調查的也展現了在社會信任的類似增長，從 1980 年代早期的 34% 提升到 2003 年的 43%。日本測量不信任的數值則顯示了相對下滑的情況，贊同「當你露出了弱點，別人就會趁虛而入」的百分比從 1978 年的 39% 掉到 1993 年的 25%。

其他國家

至於其他國家，我們擁有的資料則少了許多，但也能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

的資料將它們置於「穩定的」或「上升的」範疇，這些國家包括在高度信任一端的挪威與丹麥，以及在低度信任一端的墨西哥。

混合型模式的國家：德國與法國

稍早，我們看到了英國確實可被置於「混合型」範疇，至少它內部不同社會階級各自的趨勢是相互矛盾的。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並未像英美一樣，擁有下降的趨勢，但它們也不像瑞典那樣，在社會資本上擁有彈性，甚或成長。

德國

221 德國在大多的時候都顯示出相對穩定的社會資本模式，雖然它是從戰後相對較低靡的程度為起始點 (Offe and Fuchs, 1998)。一般而言正式的參與是增加的，雖然有些傳統組織在會員數上顯示出下降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工會、政黨與教會。在 1953 年時，有 53% 的人隸屬於至少一個的社團，而到了 1996 年，數據幾乎沒有改變，維持在 55% (僅計西德)。志願服務甚至有些微提升。跟瑞典的狀況一樣，非正式社交行為則增加了，社會信任從 1981 年的 31% 微微上升到 2001 至 2003 年的 35% (西德資料，世界價值觀調查)。然而，似乎也存在著一些警告的徵兆，像認為自己在困境中能找到依靠之人的比例就下降了。這在 1996 至 2001 年之間起了劇烈的變化，尤其是收入在最底層之四分之一的一群人之間，在西德從約 50% 掉到低於 25%，而在東德則從約 40% 掉至 30%，雖然這有可能部分反應了當時上升的失業率 (Eurobarometer data)。在最年輕的世代間，也存在著結社活動的顯著下降，隸屬於任何一個社團的比例從 1984 年的 55% 掉至 1996 年的 46%，而一般看來會員數似乎變得較粗淺且短暫 (Offe and Fuchs, 1998)。近來一項針對德國趨勢的研究做出這樣的結論，即「社會資本不論是上升或下降的情況，我們都找得到支持的例證。」 (Jungbauer-Gans, 2002, p. 189) 德國當然不像美國以普遍下滑的模式著稱，也不像在瑞典或荷蘭那裡可以看到成長。

法國

從大多數一般常見的測量值來看，法國社會資本的起始基點相對而言是較低的 (Worms, 2000)。跟英國及一些其他國家一樣，法國在社團會員數的程度上也鮮有改變，但在這個普遍情況裡卻有許多較為傳統的組織，其會員數減少

的情況很嚴重，包括工會、政黨、教會。文化性及休閒性組織，與基於特定興趣組成之團體，都有成長。與英國不同的地方則是，社團會員數在社會階級上的差異似乎降低了：在 1983 至 1996 年間，教育程度最佳的一群人隸屬於至少一個社團的比例從 64% 降低到 56%，而教育程度最差的一群人的百分比則一直維持在 35% 左右 (Worms, 2000)。雖然 Worms 的分析裡並未包含其他國家可搜尋得到的一些面向的資料，但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資料也告訴我們，社會信任從 1981 年的 24% 改變至 2001 至 2003 年期間的 22%，幾乎都維持在不高的程度，這些資料都讓我們認定法國隸屬於「混合型」的範疇。

各國趨勢概述

各國之間逐步浮現的圖象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社會資本在各國都正以齊一的方式在下降當中」這個簡明的假設並無法得到資料的支持。有些國家（像美國與澳洲），在大多數的指標上都顯示出下降或拒絕投身社會的傾向；其他像瑞典、日本、荷蘭等國家則看不到這種普遍下降的趨勢，甚至在許多關鍵指標上還出現了增加的情況；英國的情況看起來與它的盎格魯撒克遜手足——美國，愈來愈相似；然而法國與德國則介於兩個極端之間。

但是，甚至在這種多樣情況共存的环境中，仍可找出幾乎適用於所有國家的趨勢。幾乎在所有國家中，傳統式的組織，像教會、婦女組織、工會、政黨等往往都向下衰退。在衰退趨勢受到阻礙的地方，往往都跟該國特定的環境有關，像瑞典透過工會來支付失業津貼的方式，讓會員身分成為這種獲得津貼的實際條件。¹³ 相反地，在以捐款為主的環保或其他旨趣的團體會員數上，在各國則有近乎一致的提升。這些團體一般來說較不要求會員投入時間，而且看起來愈來愈不像個「社團」（畢竟其會員幾乎不會聚集在一起或彼此交際），比較像是一種表達對特定議題之支持的新式方法。

政治「行動主義」似乎也日漸朝這個方向在前進，大多數主流的政黨也愈來愈不依賴其黨員基礎，轉而較仰賴專業化及具媒體專才的菁英。人們很容易將投票率廣泛地衰減歸咎於政黨的專業化，但我們同樣有可能這麼認為，即政黨如今之所以懂得這麼做，是因為它們知道在選民不再深信無所不包的政黨及其信條的脈絡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功。

¹³ 即使在瑞典，我們也有證據證明，雖然工會會員數維持穩定，但其會員的積極度有顯著地下降。

研究價值觀與態度轉變的學者運用了「道德創業家」(moral entrepreneurs) 這個詞彙來描述人們似乎愈來愈會將價值觀及價值體系加以混用、配對，以形塑出自己獨特的觀點 (Halpern, 1995b)。因此，我們也發現在大多數國家裡，公民如今以前所未有的強力意願來參與連署請願，或參加特定議題的抗議活動，但他們不願意為無所不包且無彈性的一組信念背書。

有趣的是，資料告訴我們，在歐洲各國之間，不論在政治知識與政治興趣上，都少有衰退的情況出現。一般而言，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僅具備十分有限甚至算低度的政治知識與興趣，但這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是如此 (Van Deth, 2000)。這個發現乍看似乎是矛盾的，因為它與投票率廣為下降的現象並不相符。Van Deth 的解釋是這樣的，即雖然政治上的興趣（以「人們討論它的頻率」來測量）並無改變，但政治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突出度」卻下降了 (Van Deth, 2000；一併參考第六章)。換句話說，如果你問人們生活中各種面向對他們而言有多麼重要，政治如今非常穩固地敬陪末座，甚至連宗教都沒那麼糟。相反地，生活中其他面向，如休閒時間、朋友及熟人的重要性，則急速上升。

傳統組織、投票率與對政黨支持都在下降的普遍存在模式，頗為吻合普特南的命題，也很符合以下一般大眾的想法：即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變得愈來愈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甚至是享樂主義傾向。但是，這條簡單的故事軸線並無法解釋為何在各個國家之間，社會資本的其他測量數值所呈現出來的趨勢是如此分殊。為何當澳洲人與美國人如今較少拜訪朋友的同時，瑞典人與德國人卻更常拜訪朋友？為何美國人、澳洲人、英國人變得較不信任彼此的當下，瑞典人、荷蘭人、日本人卻更信任彼此？

Rothstein 將瑞典的趨勢描寫成「從集體的大眾運動轉向有組織的個人主義」(Rothstein, 2001, p. 15)。在此同時，在另一個迥異的脈絡裡，Inoguchi 則將日本的情況稱為「從榮譽至上的集體主義」轉向「相互合作的個人主義」(Inoguchi, 2000)。相反地，美國愈來愈興盛的個人主義的外顯形式，似乎就是較為私有化且具物質主義傾向。

似乎每個國家都朝向一種特定的個人主義來進行轉變，但每個國家的個人主義性質都有極大的差異。在某些像瑞典的地方，人們似乎正在找尋一種方式，以一種能維持與促進人際連結的生活風格中表達他們日益成長的個體性，Rothstein 稱之為「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主義」(solidaristic individualism)。但

在美國，則外顯為一種較為分碎的形式，或許可稱之為「利己型個人主義」(egoistic individualism)。

像「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主義」這樣的一個概念就詞彙本身看來有些自相矛盾，但這個概念的意義其實是，團結在一起並不必然就意味著集體主義，而是人們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共享相同的生活風格，對同一個組織感興趣並投入其中。我使用「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主義這個字眼，想指涉的是個人不只是願意支持其他人，也願意接受「他們是擁有不同價值觀，也因著不同的理由而投入其間」的這個事實。然而，這種支持是在以下條件下被授予的：他們能夠信任其他公民也會對自己不同的生活風格與組織成果，回報以同樣的支持。(Rothstein, 2001, p. 219)

224

如果我們能夠解釋不同國家的個人主義性質與表現方式上的分殊情況，那麼我們似乎就能更有把握地處理不同國家社會資本發展的相異模式。

其他的證據：存在著任何相反的趨勢嗎？

社會資本有較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另一一些面向，但卻可能告訴我們截然不同的故事情節。例如，有人開始注意到了孩童活動的潛在重要性，但我們仍缺乏一套測量它的系統性方式 (Lowndes, 2000)。Lowndes 指出，在對孩童照顧的安排上，人們常會考慮到規律的、共享的、相互的責任，事實上就幾個國家所進行的時間分配研究來看，奉獻於照顧孩子的時間總量在過去幾十年間已有增加。

家戶結構的測量結果是另一項過去鮮少有人關注、頂多就是拿來當控制變項的指標。在這一點上，其測量結果印證了我們之前見證到的趨勢。在許多（甚至是大多數）國家中，單親家庭在各個年齡層中出現的數目有實質的成長，這個趨勢或許是個人主義另一面向的反映，可以看出人們在較廣泛意義上的家庭事務規劃上，選擇的是自己屬意的另一半而非在相互「妥協」下繼續婚姻。

或許在其他種類的制度或文化安排上所發生的變遷，可以補償我們在特定類型的社會資本中見到的衰退趨勢。例如，司法架構可能朝向要人們擔負起更多履約義務責任的方向演進（普特南透過自己蒐集一些律師的資料後指出這一

點)，這類活動可能不會被冠上社會資本的字眼，但它扮演的角色確實發揮了社會資本的功能——你不需要去「信任」別人，畢竟一旦他們不守諾言，你可以「告到他們傾家蕩產」。

225 普特南注意到「衡量誠實與是否值得信任的潛在標準就是犯罪率」（Putnam, 2000, p. 144）。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圖表，裡頭包括美國從 1960 至 1990 年末期被記錄到的總犯罪率以及謀殺率，兩者都有著驚人的成長（而且彼此相關性很高）。當然，他很正確地指認出犯罪是預測信任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或說是一個間接的指標。謀殺則是對預測人群之間信任與合作關係的崩盤來說，極其準確的神奇指標。

事實上，有些令人激賞的研究把各國過去長期以來的謀殺率演變情況描繪了出來，不只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以來（Eisner, 2001）。這些研究立基在辛苦蒐集彙編的法庭與其他記錄之上，再輔以對這些時期裡人口規模的推估。在這些技術的幫助之下，十個不同歐洲國家 500 年以來的謀殺率趨勢於是被計算出來了。發現了什麼呢？所有被研究到的國家都顯示出一個相同的模式：謀殺率在過去幾百年來有驚人地下降，而這下降程度之大，讓許多國家自 1950 年代以來的上升程度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一般來說，謀殺率自從中世紀以來，已下降了大約一百倍！

我們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可以編織出往昔社會資本豐沛的浪漫想像來：在安適愜意的村莊內過著寧靜且融洽的生活。但 Eisner 的驚人數據提醒了我們，人們通常並不是相安無事的。個人或家庭之間相互辱蔑對方的名譽或面子，便很可能引發爭執，而這種意見不和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在過去幾百年來，人們逐漸在痛苦中學會如何相互合作與和平共處，這幾乎都是開始於城市或知識中心。尤其，我們發現所謂的架接性社會資本與明確的社會規範（規範性社會資本）有著長足的成長。

中世紀的村莊經常被誇大地描繪成是擁有相當高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地方。雖然共享的風俗與習慣並未被寫成文字，但人們都非常熟知彼此，因此能夠共同努力，以完成收成的工作或建造穀倉。然而，與外來人士的接觸相對而言就非常困難與有限，而當陌生人真的經過這個村莊時，村民也會抱持著高度的不信任來看待他們。隨著貿易往來與城市的成長，已為人們發展出一套行為規範準則（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打下了根基，這套行為規範準則也使得人們為了相互利益而共同生活與交易變得可能。小團體可以透過直接對彼此的認識與

協調而創造信任，但當這個圈子裡含括的人愈來愈多時，就得仰賴將規則做系統性的整理，以管治人們的互動，進而創造信任。¹⁴

因此，我們看到在中世紀裡發展出的不只是成文法律、強而有力的司法與政府制度，還包括了禮貌與一套廣被接納的行為規範準則。我們今天都廣為接受「不在餐桌上便溺，或把陌生人盤中的食物拿走」這些觀念，同時也奉行不渝，儘管這些行為只是種個人的選擇。同樣地，我們長期以來已變得不加思索地便十分仰賴一個共有的、較為抽象的信用體系：貨幣。當你如齊美爾（Simmel）等社會學家在過去所做的那樣，針對這一點進行反思後會發現，它其實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現象，我們願意拿很實用且有價值的物品，如食物或器具去交換幾張沒用但上頭做了一些記號的紙張。事實上，今日大多數的時間裡，我們甚至連紙張都不用了，僅僅就信任遙遠一端的機器或人員監督下看不見的電子商務交易。由此觀之，在現代歷史的演進中，確實發生了值得一提的事：在共同的認識與信任方面，有著巨大的轉變與長足的成長，而這也大大提升了人們之間互助行為的可能。

在這幅描繪歷史巨變的「誇飾畫作」裡，存在著一個仍待解釋的疑難。人們或許在日常生活或親密關係中較少去相互謀殺對方，但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戰爭與大規模衝突呢？人人都知道，20世紀是被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戰爭和死亡所侵蝕的一個世紀，這必定也會成為我們故事裡的一環。當城市與國家在共同知識和感知的群體成員數日益擴張的循環下逐漸成長、形成之際，這股成長現象也讓團體內的合作更容易出現，同時也加劇了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規模。在本書的開頭也曾指出，社會資本能促進合作行動的產生，但一如其他種類的資本一樣，這不保證它一定會被明智地使用。唯有當社會網絡、共同認知與約束力量體系（社會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擴張，或將各團體匯合起來以包含衝突的各方之時，衝突才可能減少。¹⁵

即使在美國，在這同樣被視為於微觀及中觀的社會資本上有著明顯衰退的幾十年中，人們也見證到了公民權利的擴展，以及對個人與性領域上的容忍度迅速提升，還有種族與性別等偏見之表達也有可觀的減少。

¹⁴ 雖然我未曾拜讀過，但我知道在 Diamond（1996）的研究裡也表達出了相似的論點。

¹⁵ 有一些證據顯示，好的社經表現（擁有健全的福利政府與高度社會資本的現代工業化國家）有助於培養出國與國之間的和平行為（Ohrn, 2002）；此外，很少有證據顯示，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社會凝聚力在 1980 年代後有所增長，雖然可以確定的是各成員國之間尚未發生過戰爭（Berger-Schmitt, 2002）。

在我看來，除非我們將社會資本的當前趨勢以及當前個人主義的揚昇置於更廣背景，即「社會是如何學會和睦相處」的故事之中，否則我們將無法瞭解前兩者。當我們在路上開車時，我們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安全，因為我們與周遭無數的其他駕駛人共享了一套認知。當我們身處在距離家裡有好一段距離的陌生村莊時，也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們不會害怕自己的錢不被接受，或自己會被不信任的村民剝削欺騙。即使當我們走進了美國的一家小店，裡面的店員是我們從未見過而且以後可能也不會再見的情況下，仍能說「祝你今天一切順利」，雖然它的意涵並不雷同於我們向熟識其一切的朋友所說時的那樣，但它仍算是促使當代生活得以持續下去的一套龐大共同認識體系中的冰山一角。

簡而言之，我在申論的是，這些大眾共享認知的完成，是促使社會資本裡某些形式走向衰頹的因素，但對社會來說，是使它不致分崩離析的關鍵。這一點讓我們這個看似講述衰頹的故事，搖身一變成爲一個主要講述轉變的故事。從圖 1.4（第一章）來看，現代社會正見證了社會資本在相當普遍的程度，持續進行的一項轉變，即鉅觀層面上的社會資本的穩定成長，雖然至少在有些國家裡，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是不斷在衰退，畢竟它在功能上變得不再那麼不可或缺。¹⁶

找尋社會資本變遷的原因

既然我們已概述了各國的趨勢，我們便可以來談談現有兩套在解釋方式上迥異的故事。一方面，存在著能適用於各國的特定趨勢，最明顯的就是成員組成複雜、目的廣泛的特定組織，像教會、工會、婦女組織，在民眾間的普及度下降。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去解釋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包括非正式社交行爲及社會信任）如何在各國間出現了如此分殊的趨勢。

普特南對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解釋

普特南在著作（2000）中利用統計模型的技術去探索，究竟是什麼導致了美國在中觀與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向下衰退。透過多元迴歸的技術，他標示出

¹⁶ Tom Sander 已指出（出自私人信件），至少在美國當中是如此，即社會容忍度的增加幾乎是獨立於社會資本的減少，即並不是較少投入的個人引導出容忍度的增加。但是，關鍵的問題是，在區位層面上發生了什麼事，也就是從普遍共同的價值觀與態度的觀點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了四項關鍵性的變項，能解釋長期以來大多數的變化，它們是（括號中的是它大致占的百分比）

- 世代差異（50%）
- 電視與電子娛樂（25%）
- 工作的飽和度（10%）
- 都市的蔓生（10%）

無疑地，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轉變的模式具有很強烈的世代特性。換句話說，每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世代都變得較不願投身社會，但每個世代卻或多或少在生活中維持著一個恆常的投入程度。因此，當老一輩的世代逐漸凋零，投入的平均程度將轉而由年輕世代來決定，因此就會向下滑。

228

雖然普特南極具說服力地描繪出了這個模式，但有兩個很大的問號仍被置於以世代差異做為解釋的作法上。首先，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釋原因，因為它只是以另一個問題來代替眼前這一個，雖然前者是較為明確的：為何較年輕的世代較不投入？普特南確實提出了些見解。他猜想說這或許有一部分是跟戰爭的經驗有關，這個解釋的合理性因為 911 事件後的資料而更被推崇。他也認為有一部分也可以由觀賞電視行為方面的特定世代效果來解釋，即統計學者所謂的互動效果。基本上，年紀較長世代的社會模式較不容易因為大眾電子媒體的發展而受到影響，然而那些在看電視的過程中被養育成人的世代則會受到影響，因而無法傳承他們父祖輩的社會習慣。第二，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美國所見的顯著世代差異，似乎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被談及的（雖然英國的資料也略為暗示出存在著這類效應）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美國有何特殊之處，以至於產生了這樣的模式？

電子娛樂，尤其是電視，在普特南解釋美國衰退的過程中時常隱約可瞥見。這個解釋受到了個人層面資料強而有力支持，其中顯示出了有愈來愈多美國人看電視，愈來愈少人看報紙，而美國人投身社會的程度也就愈來愈少。

同樣地，個人層面的資料支持了以下論點，即美國人日漸飽和的工作情況也成了能解釋模式的因素。雙薪家庭愈來愈多，在美國一般而言工作內容愈來愈密集，這都擠壓了許多有助於傳統社會資本創造的其他活動。這不僅指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件事，也意指更長的工時與不論男女都更密集地投入工作。

都市擴展，郊區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漫長通勤時間，都得到了個人層面資料的支持，成為解釋因果關係的因素。美國人捨棄內城與小鎮的生活，努力工作以賺得在郊區購買如雨後春筍冒出的房子，但這價錢還必須加上買車、養車的費用。歐洲人一般都始終過著密度較高的都市生活，而美國人不管要購買家庭必需品、上體育館、上學、上班都脫離不了一趟車程。在這種事事仰賴汽車的生活方式中，那些圍繞在鄰近小商店、上學路上、在人行道上閒逛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社會接觸也已然消逝。同樣很重要的是，有愈來愈多的時間被花在通勤上；在自己汽車的私人空間內聽著最愛的音樂；能進行較具社會性活動的時間就更少了，同時高速公路與擁擠的一般道路也將社區切割成數塊，讓人行道上更顯冷清。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也極有助益地從各種可能解釋中，消除了一般普遍的疑慮。一旦其他的變項被解釋為：日益提高的犯罪率是一種症候，而不是項病因時，日益提高的犯罪率就似乎無法再為整則故事增添什麼解釋力了。有些人認為美國的多元主義已引發了突變，導致「這個社會在團體特殊主義中分崩離析」，沿著族群、性別及其他的軸線而被裂解開來（Munch, 2002, p. 455），但這種說法不但可當成原因，也可能是結果，而且在各種事件上都無法得到資料的支持。最後，而且在美國政治脈絡下顯得很重要的，一般公民的社會資本被龐大政府所取代的現象，似乎無法拿來解釋衰退的趨勢。在第六章曾提到，美國境內較龐大政府的州（從稅金與支出來衡量）都以較高的社會資本著稱。此外聯邦政府的支出所占美國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比，事實上自從 1950 年代以來就有顯著的下降。

總體而言，美國人已發展出了高度個人化的消費形式。如果你可以待在家裡聆聽剛買下的貝多芬 CD，何必進演奏廳端坐全場，只為聽一曲你不喜歡的莫札特呢？如果你可以在郊區為自己買下一整棟帶有庭院的房屋，何必走入大都市裡的社區公園呢？不管你想做什麼，當你無需去應付那些麻煩的其他人時，何必跟他們攪和在一起呢？從美國的資料中難以讓我們得知的是，是什麼力量造成這結果。是個人化的消費商品促成了個人不投身社會，還是愈來愈不投身社會的個人需要或會去找尋個人化消費的生活方式。

如何把美國的解釋與其他地方的情況放在一起討論

雖然普特南的分析是小心謹慎而且經過深思熟慮的，但它幾乎只完全侷

限在美國的脈絡中，這令它受到許多重要的批評。首先，相反的例證並未被考慮進來。其次，從定義上看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捕捉到任何屬於美國特有的，但卻始終一致的變項的潛在重要性。第三，在普特南撰寫《獨自打保齡球》的時候，他所設定的讀者就不再只是學術圈內人士，同時也關心更廣泛的讀者所認真看待的一些議題。在美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脈絡裡，這有可能導致了在美國會引發困窘與不適的故事情節被低調處理。尤其，至少對歐洲讀者來說，經濟不平等與政府可能扮演的潛在正向角色，這兩項議題的討論篇幅少得令人訝異。

更廣泛的國際比較的確對普特南的美國式敘述投以許多疑問。首先，美國在社會投入上明顯的世代差異在其他國家就顯得不明顯許多，而在一些例子裡，其差異造成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德國）。

我們在那些社會資本幾乎沒有或只有些微衰退的國家（如瑞典與日本）中也直接觀察到電視也十分普及，這也令人開始質疑電視與電子媒體所扮演的推動性角色。電視在美國的普及確實早於其他國家數年，然而 1950 年代晚期與 1960 年代早期之間的差距，並無法解釋隨後 40 年來與他國在方向上的顯著差異。這告訴我們在美國，觀看電視比較算是個症候而非病因，或是存在著一種電視—國家的互動關係，而不是普特南所說的電視—世代的互動關係。以上兩項解釋都能自以下發現中得到支持，即看見電視廣播的一小群人比起不看的要更投入社會。類似的結果也適用於在英國看新聞的一群人身上。有項針對電視與國家間互動關係的解釋是「電視放映的內容是很關鍵的」。有些評論家長期以來比較美國電視與歐洲電視的特色有何不同，發現前者擁有許多能捕捉人們注意力的頻道，摻雜著許多的廣告；後者的頻道較少且風格較穩定，並有許多頻道是由國家資助的，內容中沒有太多廣告，而有較多的公眾資訊。在最近一些年，歐洲因為衛星與有線電視的到來，使得電視的內容愈來愈走向美式風格，其後續的效應為何，是很值得關注的議題。

普特南的工作飽和度與都市擴張的解釋，乍看之下在國際比較中仍十分具有說服力。美國人確實比更為悠閒的歐洲「遠親」要更投入工作，其間的差異是愈來愈大而非愈小。歐洲各國已發展出了包含甚廣的勞動法規（在廣大民眾的觀感支持下所建立的）以確保工作不至「過度」，且能享有長假休息。所有來往各國的商務人士都會告訴你，美國人隨手抓了三明治當午餐的工作生活形態仍為義大利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所鄙夷，後者都認為停止工作以好好享用

一頓正式且完整的套餐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心急地取消附餐。法國人已經實際執行了「奧拜法規」(Aubrey rules)，限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35 小時，而且雖然他們後來在實施過程中有比較寬鬆，但同樣的情況在美國的脈絡下仍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同樣地，許多歐洲國家也強烈抵抗都市擴張，不論在消費模式上，或透過管制性的手段。例如，有些國家與地區就限制了零售店家的最大規模，以確保大型零售商場不會取代小型商家以及傳統都市的中心。歐洲大眾也十分樂意見到油價中課以高額的稅金，對大眾運輸進行補助或投資。

不同性質的電視、勞動法案及都市擴張的抑制，這些因素能夠解釋歐洲大陸的社會資本相對來說並未衰退嗎？論到這類的趨勢，要去區分出因與果、供給與需求實在很困難。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消費模式與社會資本趨勢都是在因果上緊緊相扣的，彼此支持與強化對方，創造出了足以劇烈轉向的長期因果路徑，只是在每一步之間看起來的變化是很些微的（請一併參考第八章）。身居大陸的歐洲人熱愛咖啡廳文化，但我們很難斷言孰為因、孰為果，究竟是咖啡廳先，還是文化？

總之，國際的比較結果只能部分印證了普特南的論點。他所指出造就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原因，在歐洲大陸上看來就不是那麼明顯，當然就社會資本的衰退現象來說也是如此。然而，這些趨勢間的相互關係的因果方向為何，仍是爭議不休的。

政府的角色

在國際比較中發現的一個主要差異就在於政府的角色。在美國，政府的角色是廣被批評的，人們相信個人與社群能夠自行找到出路。但在其他國家，對政府角色的普遍敵意就較不明顯。最重要的是，有些研究美國之外的社會資本的學者，常會發現政府有多積極地在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即使他們並未使用這個詞彙。即使在文化的許多面向上都類似於美國的英國，Hall（本身是美國學者）在他的評論中也提到：「本世紀以來（也就是 1900 年代初以來），英國政府非常努力地耕耘志願服務這塊領域，特別是在提供社會服務上，這一點從跨國的角度來看是很令人驚訝的。這也是他們投入可觀資源所想達成的目標。」(Hall, 1999, p. 440) 政府扮演的角色很有可能也是故事的一章。即使是在普特南的美國例子裡所提及的因素中，政府的行動（或是政府的不作為）總

是隨處可見。郊區的擴展與土地規劃法規、交通運輸、教育、都市政策有關。工作的劇增也與勞動法規及許多其他會受政府行動影響的變項有關。即使是電視也受到政府的管制與資助結構所影響。關鍵的問題是政府制度與政策所產生的影響，是否凌駕於這些政策所反映的，來自民眾價值觀所產生的影響。

在美國的資料中存在著一個誘人的線索，這已由 Brehm 與 Rahn (1997) 所指出。在解釋美國高中生在社會信任上變異的統計模式裡，他們發現對政府的滿意度能夠很顯著且確實地預測社會信任度。當控制了從社會信任到對政府之信心的過程中，有可能產生的雙向路徑後，他們發現對形塑社會信任來說，對政府的信心是極端重要的因素。我們在之前曾經提過，相較於日本，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人對政府的信心有著戲劇地下降，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社會資本的一些趨勢。911 事件後短暫出現對美國政府較正面態度的這種現象，是否對高中學生有影響？這也是個有趣的問題。

經濟不平等

在上述的摘錄裡，Hall 最在意的是政府較為直接地投資於志願性及慈善性組織。但或許一個政府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工作是創造出讓社會投入更為便利的條件，尤其是遏止不平等的擴大。

在這一點上（就像 Hall 也觀察到的）英國雖然維持了它長期以來的傳統，即透過資助非政府的管道來提供人民第一線的一些服務，但至少從 1979 年到 1997 年期間，它都未認真看待日益擴大的經濟與階級不平等，並採取行動，而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也急遽嚴重。在同一段時期，英國社會資本的階級差異也變大，社會信任則下降（Grenier and Wright, 2001）。

233

其他的歐洲國家在遏止不平等擴大的作為上，則都顯得較為成功。因此，在面對這種情況下，不平等程度的變遷不只解釋了各國社會資本的趨勢，也是解釋各國間絕對差異的因果關係的極佳候選人。我們將在第八章裡，再回過頭來討論這個更廣的因果角色。

教育

事實上，對社會資本的每項經驗性研究都有了結論，那就是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和個人的社會資本層面是相關的。人們教育程度愈高，就愈容易加入俱樂部及社團，投入政治的程度也愈高，他們也就愈相信其他人（請見第五

章)。

為何會如此，我們仍不敢下定論。合理的因素包括遠離家園；跟更廣的社交圈接觸；擁有共同文化知識的精髓；獲取團隊合作的基本技能；信任並理解他人。但也有可能是高技術人士而非教育的內容，導致了高信任的工作環境，而且是這些環境中介了我們所熟悉的教育—社會資本關聯。然而，可以確信不疑的是，在 OECD 各國中，教育表現的程度與繼續升學的比例在過去幾十年來，都有顯著地進展。

在教育上繼續升學的比例增加，應該會導致各國社會資本的提升，如果其間的連結是因果關係的話。換言之，如果我們在統計上抑制了教育提升的程度，那麼社會資本的發展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愈走向負面。

這個觀察引發了兩個重要的論點，有一個是方法論上的，另一個是實質層面的。前者暗示了去研讀社會資本統計分析的附屬細則是很重要的。在統計上控制教育的作者會下這樣的結論：比起那些未控制的研究來說，他們發現了較大規模的下降。第二，它意味著在一些國家裡社會資本的潛在趨勢可能比當前分析所呈現的還要更為負面。受教育者愈來愈多的這個趨勢（像英國自從 1960 年代以來高等教育有大規模的擴張）抵銷了社會資本潛在下降的強烈壓力。

小結：主要的變遷因素

234

普特南下結論說，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現象中，很大一部分可由世代來解釋，是「較具公民性的年老一輩逝去」的寫照。這個世代的模式似乎在各國之間並未被發現，其本身需要更進一步的解釋。工作飽和度與都市擴張則都是受到各國印證、可以合理解釋衰退的原因。看電視本身並無法得到跨國證據支持，而成爲衰退的一個原因，雖然電視的內容可能是重要的。經濟不平等日漸惡化也是一個可能的負面因素；教育的提升則是一個正面的因素，但有可能受制於愈來愈嚴重的負面因素，因而無法起到作用。

一項能串起所有因素的常見軸線就是個人化與私人化的消費模式。政府的角色也隱含在其中。但兩項因素都是難以與其他趨勢做出切割，也很難跟一國價值觀的基底一刀兩斷（請參考下文及第八章的討論）。

價值觀與消費變遷的環境學

之前我們曾指出，所謂的影響因素裡有一些（像世代差異）是經過精煉的分析後得出的趨勢描述，才足以被稱為是真正的解釋。即使是變遷中的消費模式、政府行動與經濟不平等，都算不上是有說服力的解釋，畢竟它們還會帶來另一個難題，即為什麼這些模式會產生變化。例如，相較德國，英國的經濟不平等是不斷擴大的，而這一部分可被歸因於政府的政策，但它可能受到民眾態度與價值觀更大的影響，以至於英國比德國更能接受不平等的存在。稅制也有差別，但造成的衝擊一般來說，相較於社經世界觀，這還算是輕微的，後者乃是決定「管理階層的薪資是否該比員工多出百倍，還是只能多出十倍」的因素。

價值觀變遷

Hall 注意到社會信任的減少，原因在於「也許是基於道德價值觀的廣泛轉變」（Hall, 1997, p. 25）。有很明確的證據告訴我們，工業化國家自從 1960 年代末期以來，在道德價值觀上發生了變化（Halpern, 1995b）。然而，變遷的模式相較於最受歡迎的評論家所言，其實要來得細微且有趣的多。在此，我們將集中在特定議題上，即人們是否變得更加自私、自利，以及這種現象是否會侵蝕了社會資本。

235

每當政治人物、市場研究者及其他人發現年輕人如今的價值觀迥異於老一輩時，就會發生間歇性的道德恐慌。許多社會調查都有個共同發現，即年輕人往往對道德上有爭議的行為，抱持著較為寬容（你也可以稱之為縱容的，端賴你的觀點為何）的態度。這意味著，如果你從橫斷面的調查資料來推斷，很有可能會下結論說，價值觀上發生了巨變（例如 Wilkinson, 1996）。然而這個轉變普遍來說並未發生，因為人們的價值觀其實會因為他們年紀漸長而轉變。簡言之，我們往往在年紀漸長後，變得像我們的父母。當我們歷時性地看待它，最為常見的模式就是在長期看來，價值觀的變遷是非常輕微，甚至是不存在的，但仍有例外。

後物質主義的命題

或許，「無變遷」通則的最著名例外是 Ronald Inglehart 對於他所謂「後物

質主義」變遷的研究。Inglehart (1990) 透過詢問人們各種目標裡何者比較重要，來測量後物質主義。選項包括物質性目標（如經濟成長）與「較高層面的需求」（像言論自由）。他運用人們的選擇，將他們分類為「物質主義者」或「後物質主義者」，後者會將較高層面、較不具物質性的需求指認為較重要的。

Inglehart 發現較富有的國家與較年輕的世代，比起較貧窮的國家與較老的世代，要來得更「後物質主義」的多。每個世代或多或少都會維持它的價值觀超過 20 年以上。這意味著當較老的世代逝去，將會出現從傳統、物質主義、經濟成長導向的價值，戲劇性地轉向後物質主義、「較高層面需求」價值情況。簡言之，Inglehart 認為，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中，因為他們的基本物質需求已被滿足，他們就變得較不在意物質性目標，而較為關心限於特定人士所注意的目標，如言論自由與保護環境的需要。

Inglehart 著作裡較令人好奇的一點就是，它似乎意味著社會資本應該要向上提升，因為經濟自利已經被關切範圍較廣泛的自由或社會議題所取代。

236

對於這項謎題的解答，或許就在 Inglehart 研究核心所產生的方法論問題；他使用了強制選擇的方法。如果我說言論自由比起賺錢更重要，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我認為賺錢已變得較不重要，有可能是我認為它們都變得更重要了！Inglehart 的「後物質主義」量表不只涉及了「物質主義」，也包括對自由主義價值（像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愈趨深信不疑。因此他的量表涉及了兩組價值，但兩者並未相互對立，而是同時增長（至少在美國是如此），雖然自由主義的價值成長地稍微較快。

自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個人

Inglehart 的研究告訴我們，有些普遍存在、具世代差異的價值觀轉變已經發生了。我們已經見證了在所有國家裡，事實上教會的出席情況與對政黨的政治忠誠是在下降的。這將導引我們走向一個既存的爭論：傳統規範與風俗的崩解 (Halpern, 1995)。

這個價值觀轉變有一部分包括了對權威本身順從的規範受到了侵蝕。這不僅與我們已經提過的「對政治領袖與制度的敬畏感普遍下滑」有關，也包括了如今父母強調孩子能具有另一種特質的重要性。當要求孩子順從的壓力已經減少的情況下，取而代之的是更強調諸如心智獨立之特質。

現代性的狀況讓個人能接觸到許多另類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這類的接觸會侵蝕對既定道德規則與社會規範不假思索即接受的情況。例如，在個人一性的範圍裡，像是對離婚、同性戀、性交易的態度上，是愈來愈寬容以待。個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從別人所提供的東西中「拾取」並「混成」他們的價值觀，因而才會有人將當前較年輕世代稱為「道德創業家」(D. G. Barker, 1991; Halpern, 1995b)。

這種道德創業家不再欣然認同於過去的傳統共同體。例如，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中，自從 1970 年代初期以來，認為自己願意為他們的國家而戰的比例已下降。但國家自豪感與認同感乃與（個人層面上的）較高的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密切相關，即使在控制了人口統計上的變項後仍是如此 (Whiteley, 1998)。國家自豪感（或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減損，是導致特定種類的社團成員數及信任向下降的合理因素。

237

技術與財富的角色

不只是獨大的價值體系受到傷害，才造成維持較傳統生活方式的連帶被鬆解，由極致的效率及生產力考量所推動的經濟成長，也鬆綁了人們生活方式上的束縛。當然，這個經濟生產力本身有一部分是立基在共同的認識，或是交易的規則與日常交往的習慣之前提上，而這些都已變得日漸普及。

財富意味著人們擁有愈來愈多的資源，可逃離主宰著人類大半歷史的緊密依賴網絡。財富意味著家庭與社群不再需要去分享有價值的資源，像是房子。他們不再需要齊聚在一起收成或建築穀倉。身在富裕的現代世界國度裡，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房子、電視、冰箱、烤箱與汽車等等。財富讓我們遠離各種令我們祖父母輩感到有些困擾的不便事項，我們需要七嘴八舌地爭論的不再是誰該去提水，而是該用鋼琴彈什麼樣的曲調，甚至是電視該看哪個頻道，畢竟人人如今都能擁有自己的電視。

這些變化中有很多都反映在我們房屋或社區的具體設計上。針對居住環境的設計所做的研究已顯示，過去 250 年來，「準公共」空間已逐漸地消失了：

19 世紀期間，內部的集體領地為過渡空間提供了一個最佳的例證，（今天）它已被轉化為一個除了進進出出之外了無功能的凹型、具壓迫感的通道。除此之外，今日比以往更強烈地以住宅區域的公 / 私領域來劃分……

這個轉換已與另一個現象並肩出現，即本世紀（按：即 20 世紀）有愈來愈多在居住的單位範圍內發生的活動已局部化。以往洗衣服的地方是在街上的公共湧泉處或井邊，如今代之以家家戶戶置於自家廚房或洗衣室中的洗衣機；同樣地，私有的收音機及電視日漸普及，也減少了社區咖啡店或電影院做為公共資訊交流、溝通、娛樂的社會功能。（Lawrence, 1990, p. 89）

238

一般說來，在承受極度緊密的鄰里關係所帶來的不便時，其所需付出的相對成本，和所能獲得的相對效益，如今已有所轉變。有些成本如今依然可以感受到，如在我們身上強加令人厭惡的論斷、義務、偏好。但實際上與我們接近且持續維持的關係所帶來的利益（或至少是純粹從經濟上來考量這類密切合作的不可或缺性）很明顯地快速減少。我們不需要與鄰居共同努力，才能確保我們在經濟上還能生存下來。我們如今也擁有許多完全毋需仰賴我們周遭的鄰居或社區，就能享受的娛樂與喜悅來源。借用 Hirsch 著名的說法，即「近鄰經濟學」（*economics of neighbouring*）這門學問已徹徹底底地改頭換面了。

同時，與遙遠一方的人接觸的相對成本效益也有所轉變。電信設備與旅行大大減低了我們與在實質空間上距離遙遠的對方互動的成本。共享的社會規範之建立（包括司法與金融體系）更進一步地降低了這類互動的成本，也讓潛在效益得以浮現。

於是，我們便能料想到，當代社會資本趨勢的主軸線就是有史以來擴張最廣的弱社會連帶，即散布最廣、範圍最大的聯外社會資本，以及極仰賴社會規範而非社會網絡或個人知識的資本。我們正邁向一個由我們經濟體中有效率組織所驅動的世界，而經濟體則愈趨仰賴一些作者所謂的稀薄信任（*thin trust*），即彼此較陌生的人們之間的信任（Newton, 1999）。這個現象不但適用於美國，也能在瑞典發現。但是，這個轉變會讓人們愈來愈重視在最普遍的層面上共享的機制，以解決集體行動的難題，並且維持和發展集體行動所仰賴的集體認識。在這個社會發展最晚近的階段裡，那些一開始就對較集體的機制抱持高度不信任的國家（如美國人在直覺上就不信任他們的聯邦政府）將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倍感困難。

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值觀不必然就是自私的

Inglehart 的著作證實了自由主義價值的普遍上升，但他所使用的「後物質主義」則有誤導之嫌，其他資料顯示人們普遍來說並未變得較不具物質主義傾向。例如，關於工作的調查裡，我們看到薪資所具備的重要性其實在往上升（請看 Halpern, 1995b）。

自 1976 至 1995 年對美國高中學生進行的調查顯示，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有明顯的增加（Rahn and Transue, 1998）。物質主義是經由測量以下項目而得出：物質期望（他們「將比父母擁有更多財富」嗎？）；會感到滿足的最低值為何（比父母多出多少？）；是否選擇「擁有很多錢」做為自己的重要目標。這些增加的情況與在同一批學生身上測得社會信任的減少是相互呼應的。Rahn 與 Transue 發現，物質主義愈來愈高漲將是預測信任下滑的極佳指標，甚至比看電視的趨勢還要有效。同樣令人吃驚的是物質主義在 1990 年代初期呈現持平狀態，甚至有點下滑（尤其是金錢被認為有多重要上），這段時期正好是學生們信任下降的趨勢也走向持平的前一或兩年。

如果在高中學生間上升的物質主義是他們信任下滑的根源，那麼又是什麼在推動著物質主義呢？一個多元回歸的嘗試提供了一些線索。有人或許會預測說，較強的物質主義傾向會與背景中的劣勢處境有關，像是母親教育程度低、父親離家出走、黑人的種族身分。這可以連結到相對不平等、富者恆富、貧者愈貧的趨勢。Rahn 與 Transue 也發現對宗教的熱衷與較低的物質主義傾向有關，而這種熱衷正在穩定地下滑中。

更普遍的是，跨國資料顯示，對自利行為的容忍度（只要自己不會成為明顯或直接的受害者即可）愈來愈高（Halpern, 1995b）。想像一下，倘若你在購物時多找了些零錢時會如何？如果今天是小商店本身犯了這個錯誤，大多數的人認為應該主動告知錯誤並歸還金錢。但如果商店是連鎖的，人們就比較可能認為，將錢留下來是可被接受的（Johnston, 1988）。對這種自利行為的容忍已在過去幾十年間增加。例如，相較於 1960 年代晚期，各國的人民如今較可能抱持著「誰撿到歸誰」的心態，而隨著時間改變的幅度之大，令國家間的差異相形失色（Halpern, 2001）。

在面對自利的情況下，社會信任低似乎是邏輯推衍下的必然結果。如果我知道人們都是自利的，那麼我應該就會在要信任他人之前心有遲疑（或者

像 Hall 所說的，反之亦然），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往往以為自己的價值觀與大多數人通常會抱持的一樣（L. Ross, Greene and House, 1977; Fiske and Taylor, 1991）。

240 針對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資料進行快速的分析會證實這個高度負向的關係。然而，較為小心地加以檢視後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介於自利與社會信任間的高度負相關似乎是逐漸被淡化的。即使我們比較在 1981 至 1990 年這段期間內，同一群國家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上的資料，這個負相關的強度也產生了顯著地下降。因此，一般而言自利價值觀在各國普遍地上升，與社會信任的下降是沒有相關的。這告訴我們，不像一般宿命式的預測，事實上許多現代社會逐漸演進的方向，是同時在自利價值觀及社會信任兩方面做調適。

更進一步來說，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人們變得愈來愈能容忍全然非法的行為（像偷竊、酒後駕車），或明確會有人受害的自利行為。當地方忠誠及國家忠誠式微之際（雖然這一點，仍存在著爭議）但遙遠的連帶及責任卻在成長。我們不能直截了當地斷言人們普遍變得自利了。例如，他們更願意，而非更不願意用繳納的稅金來幫助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

小結：價值觀的轉變，開明的自利觀變普遍了嗎？

更廣泛的價值觀及消費變遷的模式，有助瞭解我們在社會資本的文獻上所看到的趨勢。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人們更普遍地接觸到另類的或競逐人們支持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這種情況破壞了傳統上整體的且唯我獨尊的價值體系，尤其是普遍的宗教與政治信條。經濟成長與技術的發展已加速了傳統與義務受到破壞的情勢，劇烈地改變偏好仰賴與近鄰進行社會互動的相對成本效益，轉而把目光放在遠方的特定個人。意識形態的連結、順從權威、在經濟必需品上仰賴鄰居的種種情況已被鬆懈，讓他們能自由地選取並混用頗具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然而，僅將結果中呈現的價值觀與社會標示為較自私或原子化的，這種作法是相當錯誤的。許多現代價值觀中的個人主義，都是在人們堅定且普遍地信仰一個核心共識的情況下被同意的。這一切都可以概略地用以下這個許多宗教都奉為錦句的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涵蓋。因此，當各國的人民愈來愈願意去同意他人的觀點，尤其是在個人家中的隱私中，他們仍很一致地反對置他人於危機之中的自私或危險行為。

對於這個逐漸浮現的模式，我自己的解讀是現代社會愈來愈懂得「將信任法典化」。他們通常是透過政府的行動來達成，也會透過發生在私人互動的各類對話及大眾媒體來達成。這是社會在自私與社會信任之間取得圓融的平衡點之法。這個法典化的過程不只是（甚至說主要不是）導因於在正式法律及條例中規定出適切的行為。它導因於人們廣為接納的有關「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適切的行為」等觀念的出現。這些認識或浮現的規範乃是立基在共同的文化，而非鑲嵌其中的傳統社群。這些認識或規範包括零售商例常提供的保證；駕駛人形成的習慣，像是遇到前方有障礙事件發生時，會開啓警示燈來警告後方來車的習慣（至少在一些國家是如此）；不斷精煉構成個人關係間可被接納之行為的條件。

241

也就是說，我們仍需要解釋，為何在一些國家中，個人主義朝向較為物質主義與私有化的取向前進，像是美國；而在另一些國家裡卻朝向較「團結一致」的方向進行，像瑞典。就某個程度上而言，這些差異是可以被國家間經濟體、地理、內部多元性上的不同所解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財富充沛、幅員多元性，就能部分解釋它的社會軌跡，消費模式也為私有化個人主義提供了動力，並強化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及更普遍來看的社會同質性也有影響。但這個故事必定還包含了對在國家層面（尤其是政府）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之機制的態度差異，以及這些機制所具有的權力。都市化、工作強度、大眾媒體的特性等都不只是個人行動或「外生的」社會及經濟力量的結果，而且只要存在著這種能做選擇的機制，它們也可以被集體所做之選擇和政府行動所形塑。

總結：當代社會資本的轉化

對社會資本之趨勢做調查研究，會揭露出兩條主要的故事軸線。在各國之中，特定形式的傳統社會資本，像上教堂及積極參與政黨等都在下降。同時，對要求不多、較個人主義傾向的組織「會員數」（像以捐款為主的環保組織，或可以自由進出的自助團體）則普遍上升。

242

社會資本的這個趨勢反映在全球各地漸長而著重在個人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個人主義風潮，這樣的風潮或許正是上述趨勢的部分原因。個人主義本身是經由以下的元素所架構出來的：逐步成長的共同價值核心；對人與人之間差異的容忍度；以及這些價值觀在法律和一般實踐層面的法典化。這個共享且法典

化的認識，能解釋不同國家中自利價值觀與社會信任間逐漸分離的關係。在這個架構下，人們有可能是自利（甚至是享樂至上）但同時又是值得信任的。

愈來愈能認識並法典化共同社會規範的這個趨勢，以及弱社會連帶或網絡的更加擴張，都可以回溯到幾十年，甚至幾世紀以前。在更廣闊的歷史範圍之內，故事變得比較不像是社會資本在一或二個國家內衰退的情節，而是社會關係從傳統社群的「濃厚信任」到現代社會的「淡薄」關係，但強而有力的信任，這個長期的轉換過程。

在這個廣大的但較為一致的故事裡，還存在著第二條故事軸線。在一些國家裡，尤其是美國、澳洲、英國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朝向個人主義及不參與社會的趨勢在過去近幾十年來已漸普及。這也是普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書中焦點所在的故事。人們如今運用他們的財富以及社會、經濟、道德束縛逐漸鬆綁的情勢，使自己在生活各方面得以脫離「他人造成的不便」，從家庭共用的晚餐，乃至於運動俱樂部、各種社團。有時，這個情況會很明顯，像是防衛森嚴的社區愈來愈多，但普遍而言，它仍算是個不顯眼的社會及心理的倒退。相反地，在像瑞典、荷蘭、日本這類國家裡，鮮少有證據顯示存在著不投入社會的現象。反而，還有許多形式的非正式社交行為、志願服務，以及人際間的信任都增加了。

243 我們已指認出一些可能扮演原因角色的候選人，以幫助我們解釋國家差異這第二條故事軸線。至少在美國，郊區化、工作強度升高、大眾媒體有助於解釋或中介不參與社會生活的現象，而這個轉變具有高度的世代差異。檢視跨國資料會讓我們發現，得到民意支持，被認定為適合解決特定問題的政府行動，很有可能成爲一種能完成不可能方案，並確保更爲「團結一致的個人主義」得以出現的方法。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同樣也是如此，雖然我們很難確定它是先或後於政府行動、社會資本與大眾價值觀的形構。而變遷中的價值觀與消費模式（本身源自於當代科技與財富所形成的選擇可能性）則成爲整則故事中穿針引線的因果軸線。

事實上，將這些因素編織在一起的因果組構本身，使得我們難以將它們清楚區分，至少到目前爲止是如此。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或許可以用一些例子來證明，這些被改變的因素與其結果，乃是透過另外一些社會面向而造成的。公共價值、經濟不平等、政府行動、一國社會資本的形構是共同組成一個動態均衡的因果網，我們將在下一章再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紐約 911 攻擊事件

所造成的衝擊將充分地影響美國社會資本與價值觀庫藏，戲劇性地改變政府行動，並顯著地重塑美國的經濟與社會。大眾對 911 恐怖攻擊之衝擊的反應，確實創造了不少美國行政當局可以掌握的契機。同樣地，倫敦工黨在 1997 年選舉勝利並進而組成政府，隨之而來的是對公共服務的投資，這也減少了不平等並產生了較傾向團結一致的價值觀，這些更進一步地將原本走在美國、澳洲軌道上的英國社會資本，重新導引回歐洲近鄰的路上，這是我們即將見證到的。

進階閱讀

如果你希望檢視美國的趨勢，普特南那本大部頭的鉅著（2000）幾乎可算是這領域裡的聖經（尤其，請參考該書的第 1-15 章）。

其他國家之趨勢的相關資料所包含的面向就沒那麼廣泛。或許最令人驚覺與美國趨勢相左的資料則來自於瑞典，Rothstein 則為它做了有用的概述（2001）。想要找尋一個綜合版本的故事，請參考像 Hall（1999）筆下的英國趨勢資料。有些文章已由普特南所彙編成集（2002）。

想要找尋一個較長期的歷史視角的話，可以試著參考普特南（2000）中論及美國的第 23 章。而 Eisner（2001）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其記載了 500 年以前的謀殺率趨勢，毫無疑問地是與社會資本相關的趨勢裡，追溯時期最長的一份資料。

較有獨立冒險精神的勇士們，則可以自行探索可能的一些趨勢。大多數的政府與民調機構，有時會在網路上放置一些它們所蒐集的資料，能提供我們瞭解社會資本趨勢的蛛絲馬跡。同時，你也應該隨時注意更新的資料或近來研究所提供的分析，像是世界價值觀調查每隔一段時期會提供最新的結果，而且它如今含括的國家已超過 60 國（參考 WVS.isr.umich.edu）。在未來幾年當中，也應該注意像國際固定樣本社會調查（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anels）這類會出版時間序列的資料來源。

第八章 原因

在社會資本中有廣泛的國家、地區及社區間變項，而這些都有待解釋。為什麼有些地方能擁有豐富、相互連結的社會網絡與普遍的信任氣氛，而其他地方卻充滿封閉、具敵意的網絡以及不信任的氣氛？ 245

這個變異很大。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贊成「多數人都可信賴」的人口比例從挪威的高於 65% 到巴西的低於 3% 都有（World Values Survey, 1997；請同時參考圖 2.1 與圖 7.2）。同樣地，在美國各州表達不信任（即贊成「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都會想占人便宜」）的人口比例從高於 40% 到低於 10% 都有。政策制定者、學者對社會資本如此感興趣，變異大是原因之一，再加上這個變項接著解釋的政策結果（請參考第一章）。

之前的幾章已討論了各類可能導致或影響社會資本的因素。在這一章裡將會以本書第一部分的「微觀、中觀、鉅觀」架構整合這些因素。

微觀敘述：為什麼有些人擁有較多關聯，及更受信賴？

有些人擁有較大的社會網絡、更積極投入社區與社團生活，而且較容易受到信賴。 246

有些學者覺得在個人層面上使用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不太妥當，他們認為社會資本其實是社群或區位層面的現象（請見第一章）。然而，即便希望遵守此較嚴格定義，檢視在個人層面所發生的情形仍可能提供分析因果關係的重要線索。例如，如果有一個社群的社會資本特別高，居民以非常獨特的方式教養孩子，這或許就表示教養孩童的實踐可以解釋或中介這個社群的高社會資本。如果發現在這個社區之外，那些運用同樣方法教養孩童的人也往往會養育出較投入公民活動與受信任的孩子時，人們將會對這個結論更具信心。

生物學與個性

神經學家，近來尤以「神經經濟學家」居多，都認為人們對他人的信任可能是根深柢固的 (Grimes, 2003)。許多賽局理論 (game-theory) 的實驗不斷地證實人類有信賴他人及回報以信賴舉動的傾向，這與一次性的相遇中所展現的理性明顯不同。當我們互惠、合作時，大腦會釋放出讓人感覺愉快的賀爾蒙催產素 (oxytocin)，刺激大腦皮質裡的快樂中樞 (McCabe et al., 2001; Rilling et al., 2001)。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在回顧人類的演化歷史後會發現催產素 (即「性慾及信任」賀爾蒙) 的作用是發展出來壓制恐懼與攻擊性，讓人類得以配對、強化父母與子嗣間的連繫，且透過情感依附而最後促進合作的產生 (Porges, 1998)。

生物學以及賀爾蒙催產素的作用引發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主張。一名學者在被問到如何提高催產素時做了下列回應：「對每個人來說，想提高增進互信催產素的最簡易方法就是，呃，進行性行為。」 (Paul Zak, 引自 Grimes, 2003, p. 37)。連文章的作者都忍不住做了評論：「如果這樣的話，那實在不是太麻煩的公民義務」。¹

247

現在已廣為接受人類在生物上具有合作傾向的說法。然而，認為生物學能解釋個人甚至國家變項的證據仍備受爭議。心理學家研究個人差異的模式已經一百多年，他們試圖記錄並解釋在不同時期與情境下，不同個人行為的一致性。例如，有些人顯得態度保守且安靜，喜歡閱讀更勝於參加派對；而另一些人則較外向、滔滔不絕且「愛找樂子」。我們發現這個特徵 (即所謂的外向性) 可以透過簡短問卷測出，而且測得的結果終其一生都十分固定；另外，也發現它與其他一些行為有關，並具有強烈的基因元素。個性的變項以及人們基因組成以外的變項會有助於解釋在社會資本中所觀察到的大量且穩定的變項嗎？

最近幾年來，心理學家已凝聚出一個較為簡潔的個性特徵模型，即所謂的「大五性格」 (big five; McRae and Costa, 1987)。這五個人格「大特質」 (或人們隨著變得有所差異的面向) 已在許多研究與國家被發現。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說，被心理學家稱為「親和性」 (agreeableness) 的性格大特質立刻引起注意。有親和力的人往往具有與人合作、受信賴、有同情心

¹ 或像我的同事 Stephen Aldridge 所說：「真希望我們在 2002 年完成論文時，是拿它當政策性結論！」

及會支持他人的習性。在最極端的形式裡，親和性表現在與人相處時是一種依賴、謙遜的態度。與親和性相對的則被稱為敵對性（antagonism），是讓自己處於與他人做對的傾向。具敵對性的人被形容為不受信任、疑神疑鬼、不同情他人、不願合作、頑固及無禮的（Liebert and Spiegler, 1990）。明確且相關的性格特徵，如「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又稱權術主義）（譯註：以利益為基礎，使其行為受到功利的趨使及誘引）的規模，能高度預期僅此一次的討價還價賽局裡的互惠（可靠度）及反叛；但有趣的是它並不一定能預測信賴感（Gunthorsdottir, McCabe and Smith, 2002）。

然而不像其他一些大特質，如外向性及神經質，心理學家很少發現能證明親和性的變項存在於人們基因中的證據。相反地，他們推斷親和性主要是學習與社會化的結果，而非生物學的結果（Costa and McRae, 1988）。

因此看來很明顯地，基因的差異並不能解釋為何有些人的社會資本會比較高；或解釋為何北歐各國的社會資本會出奇地高，而巴西的社會資本就很低。但是，這個特質的存在就表示，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具高社會資本的個人其技巧與習性都很穩定，一旦固定之後，就比較會拒絕改變。這或許有助於說明為何一個信任某一團體或某一對象的人也會具有對他人表達信任的習性（Veenstra, 2002b）。

248

年齡

不同年齡群會展現不同的社會及公民參與模式。年紀大的人習慣跟其社區擁有較強的連繫，而年紀輕的人則往往有較廣大的朋友網絡。例如，英國家戶普查（2000）就發現，16至29歲的人當中有33%每天會與朋友見面，但50歲以上的人只有約14%會這麼做。相反地，50歲以上的人約有50%會每天與鄰居談話，但16至29歲的人只有17%會這麼做。在多數國家裡，志願服務和年齡呈現U形關係，頂點是在接近40歲至40多歲的時期。

這些模式表示了人口統計上的轉變，以及一個地區的人口統計概況會對社會資本層面產生影響。然而，對年齡效應的解釋會因為「世代」（cohort）效應而變得更加複雜；某些世代會比其他世代顯得較具公民性（請見第七章）。例如，在許多國家年輕人的投票率都下降了，這項發現讓人特別感到憂心，因為我們也發現那些一開始就不參與投票的人，日後通常也不會再去投票。

志願服務在退休後通常會增加，但最終會因體能虛弱與老邁而使志願服務

再次減少。同樣地，明確的證據顯示，身心障礙者較不會投入公民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提供了缺席選票（absentee ballot）的服務後，身障者投票率仍會減少，這說明了較少與外界接觸、社會資本及對主流社會的認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家庭：依附理論、塑造及社會化

249 家庭創造規範與社會連結。它們是大多數人首次學習信任他人的環境。心理學家 John Bowlby 曾完善地記錄了嬰孩如何與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逐漸建立起彼此間的強烈連繫（Bowlby, 1988）。Bowlby 根據觀察結果完成的理論主張年幼的孩子會與主要照顧者「穩固地連繫在一起」，而這個連繫會成為孩子的穩固情感基礎，有了這基礎孩子才能安心地探索這個世界。因此當父母坐在公園的座椅上時，學走路的幼兒會緊抓著父母的衣角以尋求慰藉。就是因為存在著這個堅實且安全的連繫，所以孩子最終才能有信心地放手並去探索公園座椅以外的世界：如翻弄草地、撿拾小石子及追逐鴨雁，但偶爾還是會回頭瞧瞧以確定父母（也就是安全的避難所）仍在原地。

如今已有充足的證據顯示，這種早年關係的性質與強度會造成一輩子的影響。雖然並非是決定論式的結果，但有穩固連繫的嬰孩往往會長大成具有安全感、有自信的孩子及青少年。這接著並能預測個人以後是否能形成穩定且成功的成人關係，以及是否會成為可能與自己的孩子建立穩固連繫的父母。

Bowlby 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有力地指出一個正向的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信任關係會從家庭向外延伸到更廣大的生活圈。相反地，破裂、具傷害性的早年關係，或缺乏早年關係往往會在後來的人生中產生負向的骨牌效應：從家庭的脈絡到青少年同儕團體，再變成成年後的孤離與偏差行為（Sampson and Laub, 1993）。最直接地來說，那些記得曾被父母告知不要信任他人的人，以及那些被父母背離的人，在成年後都不會信任他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說法，這個發展軌跡並非總是如此。如果一個人想在自己人生的重要關口上阻止這樣的發展走向（一般都是因為與主流社會的人有了情感上的承諾與連繫），那麼這時此發展軌跡就會有劇烈的改變（請見第四章有關「犯罪」的討論）。

有證據顯示，單親家庭裡的孩子，其社會資本往往較低。單親家長通常會擁有較小的社會網絡，部分是由於居住流動性及家庭破裂所導致，而孩子往往

較少得到成人的關注（詳細內容請參考第五章關於「教育表現」的討論）。在未成年母親的身上也會有類似情況，其伴侶往往不可靠、不具支持性且有虐待傾向，而且這些未成年母親的社會網絡通常又小又貧乏（Moffitt, 2002）。離婚似乎也與普遍性的信任感偏低有關（Hall, 1999），當其中一位家長離開或不盡責（通常是父親），就會剝奪孩子獲得失職父／母社會網絡與其情感支持的機會（Jonsson and Gahler, 1997）。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降低在這種環境下長大之孩子的社會資本，也會導致他們有情緒上或行為上問題的比例偏高、較差的教育表現，且罹病、遇上意外事故及受傷的比例也都會偏高（Moffitt, 2002；請同時參考第三、四、五章）。家庭社會資本對孩子的影響是直接地透過「繼承」較小的社會網絡；同時間接地透過孩子所獲取或沒獲取的個人心理資源或特質：包括安全感、信任能力與建立關係的社交技能。

250

諷刺的是，當人們習慣將家庭認定為黏著性社會資本的主要源頭時（因為這是社會資本中最強有力的一種形式），卻常忽略了在架接性社會資本上，家庭也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正如 Bowlby 所推斷的，有安全感及有自信幾乎肯定是與不同、不熟識的人進行互動時所不可或缺的條件（Kraemer and Roberts, 1996）。孩子若看到自己的父母與家人能自在且尊重地與其他成人互動，往往能以此做為自己在進行這類互動行為時的參考榜樣。

看到父母進行志願服務及致力於社群事務的孩子，往後也較有可能會投入這類行為。當然，父母的影響與社群參與顯然是形成或傳遞社會資本最穩定的一條路徑。在我們對 15 至 17 歲青少年的研究裡，在控制了社經背景、個人能力及其他個人與學校特質後，我們發現擁有較投入政治與社會事務父母的人，會較常參與志願服務、社群事務、有較高社會信任、較高公民與政治知識等特質（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

階級的影響

另一個用來檢視家庭對社會資本影響的視角是透過社會階級的模型。長期以來眾所皆知，每個人累積的社會資本量各有不同，而這種差異是依據階級而劃分的，中產階級具有較大且更多樣的社會網絡，並反映了較高的社會信任（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同樣地，職業分布也有助於解釋社區層面變項在社會資本與社會參與中的顯著比例（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此外這些差異顯然仍持續增加，至少在英國是如此（Hall,

1999; Grenier and Wright, 2001，請參考第七章)。這些差異不只對相關的成人來說很重要，對他們的孩子也很重要（請見圖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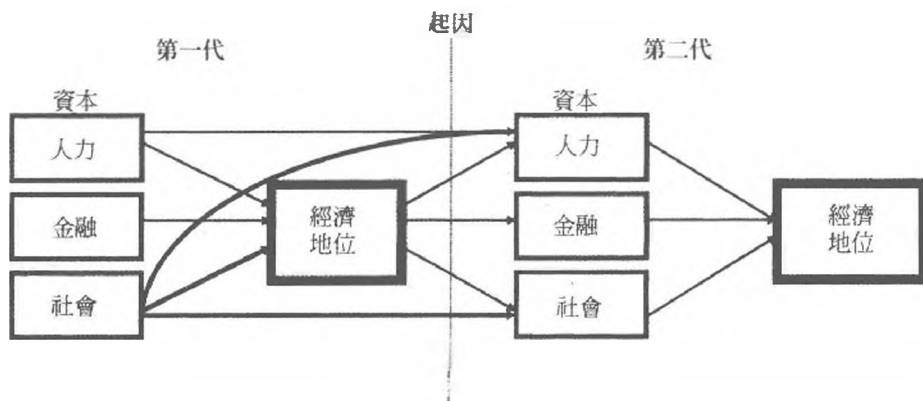


圖 8.1 社會資本在優勢傳遞過程中的作用

學者記錄了優勢與劣勢如何經常在世代間傳遞的過程 (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Kiernan, 1996; Aldridge, 2001)。這種傳送過程並非決定論式的，但即使在面對過去政府要「打破循環」的持續努力時，這個傳遞仍具有驚人的適應力 (Health and Clifford, 1996; Oppenheim, 1998; Esping-Anderson, 2003)。這種傳遞過程似乎並不是可以簡單或完全地就用父母與孩子可獲得的經濟資源來解釋，而是由許多其他較細微的變項進行中介，包括社會、文化及心理因素 (Quinon and Rutter, 1988; Feinstein and Symons, 1999; A. Sullivan, 2001)。

這個劣勢循環過程中的核心就是教育的失敗：無法取得人力資本（請見底下的討論）。但研究顯示，雖然父母的人力與財力資本有助於預測孩子教育上的成敗，但其餘的變異量中也有很多是要以社會資本來做解釋 (Teachman et al., 1996; Furstenberg and Hughes, 1995；欲知細節，請參考第五章)。接下來，在某個程度上，個人取得社會資本的機會仰賴於他成長家庭的所有資源。例如，一個富有的家庭負擔得起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就讀，因此確保孩子能接觸到具有強烈中產階級企圖心、價值觀，以及絕佳「門路」的同儕團體。

針對貫時性調查的分析指出，中產階級的父母，尤其是專業人士，較可能參與公民活動，因此孩子也會較常參與公民事務。管理人士的孩子也較會參與各種社會組織。使用英國家戶固定樣本研究的家庭傳遞社會資本統計模型顯

示，父母受的教育，尤其是母親受的教育，與孩子進行公民活動之間有強烈的相關性 (Egerton, 2002b)。這個效應是由大學畢業且在公家機關工作的媽媽所驅動，這表示了教育程度高與在公家機關工作所形成的結構與孩子具有較高公民活動參與度有相關性，至少在英國是如此。

總而言之，家庭顯然是個人層面中社會資本變項的極重要根源。早年依附對心理傾向、社交技能及往後的個人人際關係都有重大影響。從父母的人際網絡與期望觀點來看，父母給予的社會資本也構成了給予孩子及年輕人的重要「繼承」項目。專業、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特別是在公家機關工作的父母，往往也會鼓勵自己的孩子參與更多的公民活動。這個以階級做為部分基礎的社會資本傳承有助於我們解釋世代之間優勢、劣勢之傳遞過程。

教育

不管是在個人層面或總體層面上，都不斷證實教育與高社會資本有相關性 (Hall, 1999; Putnam, 2000; Bynner and Egerton, 2001; 亦請參考第五章)。一個人受教育的年數愈長，其社會網絡就會愈大且愈具多樣性；愈致力於周遭的大環境事務中，他們反映出對他人的信任度也會愈高。

這個關係的真正因果關係尚無法完全得知。最直接地，或許學校就如同家庭，在創造社會規範、連結、互惠技能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然必定會有人主張，即使對很年幼的孩子來說，都必須去體驗學校與幼稚園的社會環境以便學習未來在社會中生活的必備技能 (Cox, 1995)。

進入大學就讀顯然會特別與社會信任、容忍度、參與社群與志願服務的提升有相關性。針對貫時性世代資料的詳細分析顯示，這個效應很穩定，而且無法用父母的社會階級、收入等背景性的社會變項，或先前表現、個人能力等個人因素等來做解釋 (Bynner and Egerton, 2001)。為何會如此仍尚未有定論，但顯然唸大學的經驗其本身的內容與結構都很重要。西方的大學教育傳統上是開明的，不但挑戰且會增廣年輕人對於生命與他人的信念。這樣的訊息會因大學生活的結構而得到強化，大學生活通常包含了年輕人生命中首次的離家在外生活、周遭混雜了各式各樣的新面孔，以及一個基本上安全、具合作性與相互支持的環境。

顯然教育對社會資本提升的效果有助於抵銷近年來社會資本的下滑趨勢 (請參考第七章)。Hall (1999) 在對英國的描述中主張，增加的教育參與和

教育表現之重要性在女性身上尤其明顯。在 1959 年只有 1% 的女性接受過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而男性則有 3-4%。到了 1990 年有 14% 的女性接受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而這比例已和男性的比例相同了。在經過了相同的這段時期裡，男性的社區參與略為提升了 7%，而女性社區參與所提高的比例卻是男性的一倍。² 在許多國家的投票率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隨著時間的演進女性的投票率有著穩定的成長。簡言之，在總體層面上的社會資本是由社群裡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及（尤其是）女性愈來愈多的參與所維持。有人認為不單在英國，在其他國家中也一樣，這無疑地只是一個偶然出現且未來無法持續的效應。

工作

相對於根據有沒有時間所做出的預測，全職工作者參與志願服務或社群事務的程度大致上至少是與失業者或沒有在工作者一樣高。確實，在許多測量值上，如社會信任，全職工作者顯然呈現出較高的社會資本。當然，在有工作者與沒有工作者之間，社會網絡與其中的資源往往差異極大。例如，失業者的朋友裡有超過一半也是失業者的機率通常是一般人的兩倍。

有趣的是，歐美提供的資料顯示，兼職工作者往往會展現最高程度的社會參與及其他社會資本測量值（Putnam, 2000; 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 2002）。顯然關鍵在於工作本身對社會資本來說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工作強度與工作因而取代參與其他活動的程度確實有因果上的影響（請見底下的討論）。

宗教

254 調查往往會發現，比較虔誠的人較容易去參與志願服務、更信任他人、也會較常參加組織聚會。然而，這些活動裡有許多都與宗教活動及社群利益有直接相關性。因果的說法也因為宗教組織快速且近乎全面地下降而更顯複雜。總體而言，宗教信仰與活動是造成社會資本中個人變項的重要因果要素，但其本身卻受到其他當代因果要素的強力破壞，導致了整體而言在多數社會裡，這些宗教信仰及活動的重要性縮小（請參考第七章）。

² 這項分析受到了 Lowndes (2000) 的批評，他認為 Hall 及其他人往往容易忽略較具傳統女性化型態的社會資本的重要性，而這類社會資本形式可能早已被取代。

電視與個人化消費

電視與其他個人電子娛樂種類既方便、花費低且大多由我們掌控。過去如果想聽音樂，我們必須耗時費力地去參加演奏會，但在今日，我們只要挑選好 CD，便可以隨時聽到想聽的音樂，而不用受到他人需求與愛好的影響。電視無疑地更令人嘆服，它讓我們只要隨手按鍵就能在數十甚至數百個頻道間轉換。儘管個別的節目內容或許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這在錄影帶、DVD、付費有線電視等情形中都一樣），但電視這個媒介本身仍是引人入勝且容易使用。娛樂不再需要忍受他人的打擾，而是可以讓我們躺在自己的沙發上便利地按著遙控器的活動。

普特南（2000）記錄指出在美國那些較常看電視而較少看報紙的人都比較不信任他人、較少參與社區活動。控制了人口統計變項後，那些形容電視為自己主要娛樂的人僅有不到半數會協助社區計畫的推動；較少參加晚餐派對及俱樂部聚會；較少花時間去拜訪朋友；較少在家招待他人；較少捐血；較少寫信或寄電子信件、對政治也較不感興趣。當他們真的外出時，與他人的互動也明顯地較不正面。例如，依賴電視的人與其他人口條件相同的人們相比，自稱近來曾向其他駕駛人比出「不雅手勢」的人，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如普特南指出，「不管是教育程度低、擁有全職工作、在都會區間長時間通勤、貧窮或財務引起的不安，都比不上把看電視當娛樂而和不投入公民事務與缺乏社會連結有著更廣泛的相關。」（Putnam, 2000, p. 231）

在美國，自 1950 年代晚期以來看電視的人數有顯著上升，難怪普特南會將造成這段時期社會資本衰退的大部分原因歸咎於人們花太多時間在看電視而不參與社會活動了（請見第七章）。這個現象又受到以下觀察的進一步強化：有一種不會與公民參與產生負相關的看電視型態，即看新聞報導，但看電視新聞的人數卻有大幅地下降。看電視人數的上升一部分也是因為世代差異，較年輕的世代增加看電視的程度比起較具公民性的老一輩來說更多。因此，在美國的脈絡中有很強的旁證將看電視現象的增加與社會資本的下降做聯想。

有人也對美國的資料做了另一種解釋。一個使用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的分析主張，對未來而言，關鍵的基本變項是樂觀主義，這同時會導致個人更能信任別人，也較少看電視（Uslaner, 1998）。另一個也使用 GSS 的分析則宣稱，人類在心理上無法區分出真實世界的朋友與電視上看

到的虛擬朋友 (Kanazawa, 2002)。這個頗引人非議的論點得到了以下發現的支持，即「看特定類型電視節目的人會更滿足於自己的交友狀態，彷彿自己擁有更多朋友，並較常與他們進行社交活動。」(p. 167)。然而 Kanazawa 的論點幾乎馬上就受到使用相同資料的另一項分析的反駁；該分析顯示，當對朋友的滿足感是與對生活其他面向的滿足感有關，也就是控制了總體生活滿足感之後，看電視與對滿足於交友情況之間的正向關係就會消失大半 (Freese, 2003)。

近來有項研究指出，看電視的程度及觀看節目的類型與居住流動性之間會產生互動效果，並影響公民參與 (Kang and Kwak, 2003)。在居住流動率低或人口較固定的住宅區中，有收看當地公共事務新聞的人會明顯有較頻繁的社群參與。相反地，在居住流動率高的地區，花在看電視的時間與較低的公民參與間有相關。

256 在我們自己的研究裡，我們分析了電視對 15-17 歲的英國年輕人造成的效果 (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 即將出版)。我們發現，即使控制了包括社會經濟、能力及其他變項的範圍後，看電視的行為仍影響了志願參與及社會信任的程度。重現了美國的研究發現後，我們發現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越久，他們參與志願服務或信任他人的程度就越低。另一方面，觀看電視新聞也與更多的活動參與有關。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究中含有貫時性的元素，讓我們得以檢視某一個時點的看電視情況是如何影響另一個時點的參與。我們建構了控制 15 歲時的信任度與投入程度的「改變模型」，然後檢視能解釋一年後信任度與投入程度改變的因素。一般認為這種模型更能掌握因果關係。再一次地，我們發現了類似結果。在這段時期年輕人看的電視愈多，參加志願服務或信任他人的程度就愈低。相反地，觀看新聞與參與志願服務的增加有關，但是與社會信任的增加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大難題，雖然事實上在所有國家中看電視的人數都急遽增加，但社會資本卻未普遍下降。事實上，在某些國家裡，儘管電視普遍，但社會資本卻上升了 (請見第七章)。同時，一般說來各國中那些較常看電視的人確實都較少參與社會活動。

這裡有幾件事在進行。首先，在解釋個人層面上電視與不投入社會參與之間的因果方向上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雖然大量看電視導致不參與社會活動聽起來非常合理，但也有可能看電視本身就是不參與社會活動的症狀之一。在各種可能性中，上述兩者都對。

第二，顯然觀看的電視節目內容也有關係。相較於觀看較多新聞節目及公共廣播的人，觀賞較多綜藝節目及商業頻道的人會表現出較不在意公民事務的態度；在歐美都曾發現這樣的結果（Newton, 1999; Hooghe, 2002; 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但是同樣地，我們很難確認因果的方向。有可能是較常參與活動者選擇要看新聞；但從我們自己的研究顯示，至少有些連結的因果進行方向是從看電視影響活動參與。

第三，雖然有充足的間接證據指出看電視或更一般地個人消費有助於解釋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但在其他地方並不存在相同模式的這個事實卻也顯示，這個關係至少是要在某些情況下才會成立。或許是其他集體消費形式很強，看電視的效果會因此被抵消掉。或者，可能是美國的電視節目特別會對社會資本造成問題：或許是因為電視節目太多；或是因為有太多頻道而破壞其做為集體經驗的本質；或因為商業廣告的量太大。

曝露在不信任的環境下：來自資產調查的負面效應？

北歐的社會學家 Bo Rothstein (2001) 曾進行了一項很有趣的經驗性觀察。他的研究試圖探索在瑞典這個社會資本出奇地高的國家中，某些人不會表達出對他人高度信任的原因。這時出現一個獨特的變項，即呈現在資產調查津貼（means-tested benefits）之下。

257

Rothstein 做出一個假設，即具衝突性的資產調查津貼中有一些特質會破壞信任感。他主張，資產調查的潛在互動是公務員不得不對申請津貼者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同時很合理地，申請津貼者也有動機去扭曲或浮報自己的處境。Rothstein 認為，即使申請人沒有真的進行欺騙，他們也會脫離這個過程並認為欺騙很合理，且認為或許很多人也都這麼做。

普特南 (2000) 曾強調過一個反證，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軍人法案 (GI Bill) 是解釋戰時一世代會顯示出如此高度公民參與的原因之一。他認為美國軍人法案是政府對退伍軍人極為慷慨的一項法案，而這有助於創造出一個退伍軍人與更廣大社群之間信任與互惠的循環，而這個循環會一直延續一生。

這一點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有爭議且很難接受的證據，因為多數國家的福利體系在發放資源給社會中最需要的一群人前，都深深地仰賴資產調查。儘管如此，這仍是個很重要的潛在線索，它呼應了探討信任與社會參與如何在家庭

間能延續下去的文獻。或許，如果我們預期看到別人最糟的一面，那麼有時就會得到那樣的結果（請看稍後更進一步的討論）。

中觀層面的原因及社團的角色

258 同樣地，有些人似乎就會顯得有較高程度的參與度及信任感，並擁有較大且多樣的社會網絡，而有些社群似乎也會展示出比其他社群更多的社會資本。說明此現象的最經典例證就是由 Bruhn 和 Wolf（1979）所敘述的賓州 Roseto 鎮，這個小鎮立基在平等主義與緊密義大利社群之上，擁有特別強烈的社會凝聚（請見第三章）。精緻的多層面分析也顯示出類似結果：社區因素解釋了在社會參與及投入上總變異量中的一大部分，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層面的變項後仍是如此（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問題是：什麼樣的因素會引導出一個具有較多這類社會資本的社區？

公民社會與社團參與

公民社會包含了那些獨立於國家與市場之外而行動的團體與志願性組織。普特南（1993, 2000）主張這類社團在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積累上扮演了關鍵性角色。當個人參與俱樂部或社團時，他們就會與更廣大的一群人有定期的接觸；他們體驗了團體的集體成就與滿足感；並且學到了互惠與互信的行爲。

團體或社團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資本，能被個人或團體所運用，以達成那些不是社團當初組成時所設定的目的，例如教會團體成爲政治行動的仲介。在團體內習得的行爲與信任也能普遍地激發社會資本的創造，如當團體成員將自己的技能與網絡轉移以創造出新的額外團體。

調查顯示，隸屬於志願性組織的個人確實較有可能去信任他人，及投入更廣大的社群。例如，普特南報告指出，隸屬於非宗教性質的俱樂部或社團的人相較於不屬於任何俱樂部或社團的人來說，前者每年平均志願服務的次數是 12 次，後者則是不到兩次（Putnam, 2000）。此外，一個人隸屬的社團數愈多，尤其當社團性質又很多樣時，其社會信任與政治容忍度就愈高（Cigler and Joslyn, 2002; Wollebaek and Selle, 2002）。然而，這樣的相關性也可以解讀爲：

✓ 愈能信任他人且投入活動的個人一開始就比較有可能加入社團。

有證據顯示，雖然會加入組織的個人的確變得較容易信任他人，一開始也較投入社群，但這個效應很快就會回穩（Stolle, 1998）。事實上在組織中待超過五年的個人常會顯出社會信任及活動參與衰退的情形，這或許是由於他們長年看到他人搭便車的緣故。同樣地，根據 1965 到 1982 年的密西根社會化研究（Michigan Socialization Studies）的追蹤調查資料所做的仔細分析也發現，僅有少數的證據顯示隸屬於某個團體會讓人更能信任他人（Claibourn and Martin,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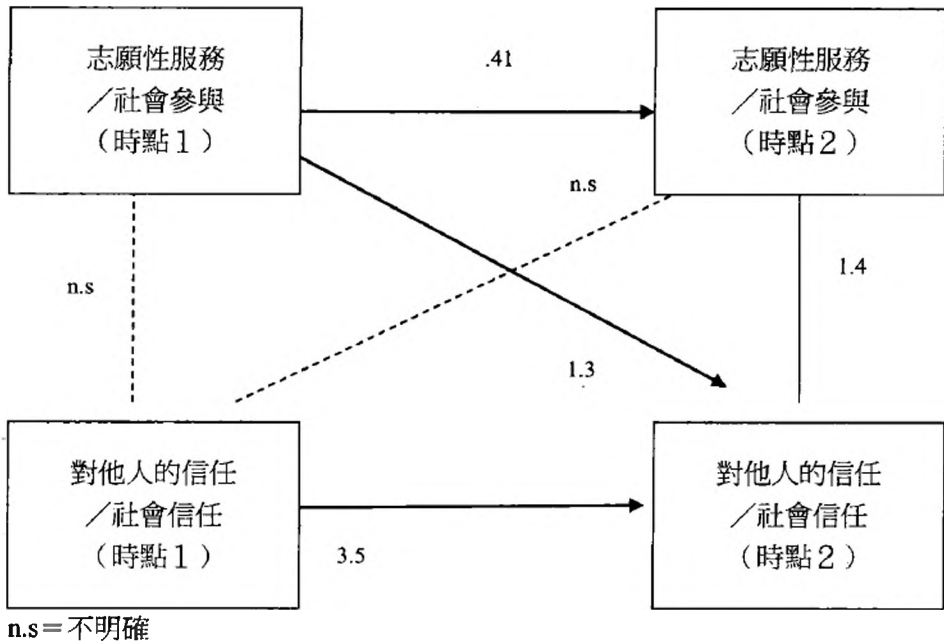
Stolle 主要取自瑞典與德國的資料指出，參與者與非參與者間多數的差異是出現在他們加入組織之前。有可能這個個人層面的發現過於負向，因為它並未捕捉到這些團體活動的外在性。但是毫無疑問地，我們還是要將它視為一個警訊，以預防「創造更多組織將導致一般性信任與社群參與的大規模提升」的簡單假設。

方法論的原因可能是解釋成為社團會員的年數與信任間的關係之所以不明顯的原因之一。研究設計往往只注意目前是否具會員身分，而忽略了過去是否具會員身分。比利時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先前的會員身分狀態對公民態度與賦權意識有很大的影響（Hooghe, 2003）。沒有測量過去會員狀態很有可能導致低估社團會員狀態對信任的影響。

Stolle 的分析也顯示，某些形式的志願性組織能刺激更廣泛的社會資本形式產生。例如，會員背景較多樣的組織（包括不同國籍或不同族裔），相較於組成成員同質性高的組織，前者明顯能刺激更高度的一般性信任與更頻繁的社群參與。相反地，或許也同樣令人驚訝地，只有一些證據指出，積極參與的成員會比消極的成員提升更多社會資本（Wollebaek and Selle, 2002）。

我們針對 15-17 歲青少年的研究結果相當正面，至少在關於志願服務與社群參與對社會信任造成的影響上是如此。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社會信任的改變能透過志願服務的經驗與投入無涉及學校事務的社區活動來準確預測。相反地，社會信任（至少在個人層面上）並無法預測日後的志願參與情況。這個發現提出，因果關係是從投入社群影響信任，而不是反過來。這些結果在青少年身上可能比在成人身上更清楚明確，因為毋需考慮數十年來參與志願服務及組織的經驗。³

³ 上述的模型是一個邏輯式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是在控制時點 1 的社會信任，及一系列社會人口變項及其他因素的情況下，預測時點 2 的社會信任。但是，在不同時點間的相關性中也能看到此基本模式（請見本書頁 242 圖）。



學校與社區

260 有一些證據顯示社會資本「具有傳染性」。父母的影響已在先前討論過，但有證據也顯示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學校與社區上。證據顯示，投票的傾向、信任或社會參與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周遭有多少人也這麼做」的函數。確實，如果進一步反思，就會發現某些形式的社會參與一定要仰賴其他人的參與：如果沒有人陪你一塊兒做，你就必須獨自完成 (Jenkins and Osberg, 2003)。這有助於解釋為何某些參與形式在瀕臨絕跡時會顯現加速的衰退率，如玩橋牌，或甚至是某些宗教 (請見第七章)。

關於年輕人的資料再一次地說明了這個論點。我們發現，最能預測個人社會信任的指標就是社會信任在學校的盛行程度，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因素與社會組成後仍是如此。換句話說，這有著強烈的環境效應 (ecology effect)。這顯然有點道理：如果說自己是身為社群內唯一具信任感的人，這似乎不太合理。其他學校因素也很重要。例如，會鼓勵在課堂上有多一點合作的學校似乎會提升個人的校外志願服務與社群參與程度。事實上，至少從短期看來，這樣的學校特質比起正式的公民教育似乎能對投入造成更大的影響 (請見第五章)。

族群與社會的異質性

有大量證據顯示，團體間與團體內成員的社會、族群異質性都與較低的社會資本有關。社會同質性讓社會連繫更加容易。相反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及文化差異愈大，人們就愈難形成社會連結，而直接曝露在偏見、歧視與衝突下的可能性也就愈高。這有助於解釋為何族群團體聚集在一起時往往會有較佳的健康狀態，即便族群聚集在一起會同時結合較差的社經狀況（Halpern and Nazroo, 2000; Franzini and Spears, 即將出版；請見第三章）。

有不少關於美國的未發表資料顯示，社會與族群的異質性可能是最能解釋美國社會資本中地方或地區變項的因素之一。一個區域內的族群混雜程度愈高，其社會信任、結社活動與平常的社交往來程度就愈低。也有相關論點指陳，美國之所以缺乏福利體系，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白人不願幫忙美國黑人（Alesina, Glaser and Sacerdote, 2001）。在美國之外有一些可供比較的國家。例如在非洲就發現，擁有高度不同族群及宗教團體集中程度的地區，該地往往都有衝突頻繁的歷史，這是證明「現實團體衝突理論」（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的經典例證（Sherif and Sherif, 1953; Struch and Schwartz, 1989）。

261

另一方面，如果社會與族群團體根本沒有接觸，就完全不可能形成跨團體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並破除隔閡。心理學者 Gordon Allport（1954）曾提出極具影響力的「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即「多數團體與少數團體在追求共同目標的過程中若能以對等的狀態進行接觸就能減少偏見。若這類接觸能導致對兩個團體的共同利益及人性的瞭解，還能大大地提升接觸的效果」（Allport, 1954, p. 267）。近來一項針對 203 項研究的後設分析提出以下結論：在對等地追求共同目標的前提下，團體所進行的面對面接觸確實能有效地減少偏見的產生（Pettigrew and Tropp, 2000）。當然，不幸的是，在各團體所居住的真實世界裡往往很難實現這些前提。

要讓這個艱難循環達成一致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所謂的「保護區」（protected enclaves），即特定的社會與族群團體能與自己人進行社交的地方（Charlesworth, 2000）。在這種環境中，團體成員因為能遠離對立團體的冷嘲熱諷及敵意而可以得到安全感，並覺得自在；而當團體之間有所接觸時，也比較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進行接觸。或許一如 Bowlby 在家的脈絡下所進行的討論：覺得自己有一個避風港以便能安心去探索外在世界的成人，也較可能可以

與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建立起接觸的橋樑。

有證據支持這個重要見解。例如，在健康上的團體密集效應顯示，達到關鍵數額而非最多數的極限效應（ceiling effects）在對於團體密集效應出現支持性效果上是必要的（Halpern, 1993）。同樣地比較阿姆斯特丹不同移民團體的研究發現，那些具有較多連繫性特質之移民團體也與更廣大的社群間有較強烈的架接性連結，同時也較能成功（而非較難）地融入荷蘭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中（Fennema and Tillie, 1999）。

262 這些研究結果表示，只要有黏著性社會資本做為穩健基礎，提供一個讓團體間彼此信任的平台，那麼即使是在族群與社會區隔很明顯的地區，各團體間還是可以合作並避免衝突。在普特南最初的義大利研究裡也有一個例子，在 Emilia-Romagna 這個擁有高社會資本的地區，顯然遏止了壁壘分明的天主教社群與共產主義社群間的衝突（Putnam, 1993）。同樣地 Helliwell 近來的一項分析指出，跟美國不同，移入加拿大民者的後代所具有的社會信任程度與全國社會信任的平均值是很類似的（Helliwell, 2003；相對於 Rice and Feldman 對美國的研究結果）。這結果尤其令人吃驚，因為學者通常認定加拿大的移民模式是移民會維持各自族裔差異的模式。諷刺的是，這種模式卻也顯示在各個族裔團體維持一個牢固的內部認同意識及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同時，各團體間的連繫也會變得更堅實。

總之，整體來說，社會與族群的異質性會讓團體內成員及各團體間的黏著性社會資本難以形成。另一方面，某個程度上的混雜是形成團體間架接性社會資本的先決條件，但是想要減少偏見的話，這樣的團體接觸還是要有一些特定條件，如瞭解彼此共同的人性。諷刺的是，如果這類團體能完成信任感的建立；在社會上或族群上具同質性；有一個「保護區」；或有內部的黏著性社會資本的話，上述情況才較有可能發生。

移動性

一直以來，學者發現在社區層面上居住移動性與社會資本呈現負相關（Crutchfield, Geerken and Gove, 1982; Teachman et al., 1996;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 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 Kang and Kwak, 2003）。同樣地，居住移動性有助於解釋個人層面上的社會資本變項：搬遷次數越多的人，或在一地居住時間愈短的人，往往

會有較弱的社會資本。這種流動性也有助於解釋單親家庭貧乏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離婚之後；因為家庭崩解經常會與搬家有關。即使是對「會搬家」的預期都會降低個人的公民與社會參與（Glaeser, Laibson and Sacerdote, 2002）。

在人口轉換快速的社群中，人們往往不會去認識鄰居或安定下來。這個模式會自我強化，因此在時序推移中往往會趨向穩定。然而，有時社區會被如犯罪情形、都市整潔、交通基礎建設的斷裂或人口大量內遷等第三因素影響而被「推入」低社會資本的均衡狀態中。

特別是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在很大程度上一波波移入城市之人口其斷裂且微弱的社會網絡會造成大型城市的疏離與孤立。同樣地，上升及下降的社會流動性通常在統計數字上也會與孤獨感增加；及會反映出支持性社會網絡瓦解的精神症狀有所相關。

263

然而，發展快速的電信通訊設備以及更平價的旅行，在某個程度上也改變了流動性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這些發展讓遷移者得以與遠距的原生社群維持原有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同時還可以與新環境的經濟及社會機會有所連結。雖然從許多面向上看來是好處多多，但遠距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可能反而會減緩人們在新居住地形成新的黏著性社會資本。

交通運輸與通勤

通勤意味著社會資本的下降，因為人們得以用來參與家庭、社區活動或日常社交的時間變少了（Putnam, 2000）。據估計每十分鐘的通勤時間會削減掉10%的各種形式公民參與（Saguaro Seminar, 2000）。先不論地區或國家中其都市的擴散程度，以及在都市間移動所需的平均時間上的明顯差異，「通勤」可能有助於解釋社會資本的差異，也有助於解釋各國在社會資本發展趨勢的不同（請參閱第七章）。

通勤，尤其是高度仰賴汽車的通勤，藉由創造出能區隔且降低社區生活品質的繁忙交通動線對社會資本也會造成破壞。例如，經過一條街的車子愈多，該條街上的居民就愈難認識自己的鄰居，或愈難將鄰居視為友善的人（Halpern, 1995a）。愈頻繁的通勤與交通也會影響零售業的結構，有可能破壞了當地的社區型商店，而以超商取而代之。這股動力提供了清楚的例證說明路徑依存的消費狀態。人們愈習慣開車到大型超市購物而非走到社區型商店，社區性商店就愈有沒落及消失的可能性。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了，那麼即使先前不

會開車到大型超市購物的人都變得必須這麼做。

實體環境與都市規劃

264 實體環境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是透過它在日常社會互動之可能性與可控制性的效應而達成。實體環境影響社會互動模式的能力已由一系列針對戰後大學生住所的研究所展現。這些研究發現，住所的佈局與設計，特別是鄰居間的「實用距離」，對社會團體的形成有著近乎決定性的影響。有一個學者研究了提供曾為退役軍人的學生所居住的大學城，他觀察到「彼此的互動提升到極高的程度，並且從社群的空間模式來看，是以極精密的簡單性自組而成」（Caplow and Forman, 1950, p. 366）。一旦社會網絡形成了，它們就會對許多社會態度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可以發現，在每個院落與住宅區都會出現對住戶協會的一致觀點（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 1950）。Festinger 等人也注意到，那些會抱持著不同於其他住戶觀點的所謂偏差者，他們最有可能住在院落中最遠且面對另一個方向的地方。因為院落中的房子都朝向不同方向，被隨機分配的居民較不會與人互動或與其他住戶成為朋友，因此就較不容易發展出共同觀點。

在工作場所裡，實體環境的運用也是一個不斷被試驗與檢驗以形成有效工作團隊的方法：在特定團隊周遭圍起分隔版能增加團體成員彼此的互動，而隔版也象徵了團體的認同感，並協助形成一個有效團隊（Sundstrom, 1986）。同樣地，針對軍隊的研究也顯示，只是在（沒有門的）營房內搭起簡單隔版將空間隔成六人一間的小隔間就能增加這六個人的凝聚力，讓外人更難以滲透。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這種介入方式能增加黏著性社會資本，但可能會減少架接性社會資本。

針對像 Festinger 等人對曾為退役軍人的學生所做的這類經典研究，有一個批評：即被研究的對象在社會的條件上極具同質性。大多數的環境所包含的人口在社會條件及人口性質上都是混雜的，而實體環境通常是被刻意設計出以避免社會接觸並維持隱私。例如，比佛利山（Beverly Hills）風格的住宅佈局（即必須開車經過漫長的私人車道才能抵達住屋）就是被設計來確保即便是附近鄰居也不會彼此碰到面。

265 強迫居民進行互動的住宅設計能產生非常負面的效果，即鄰居會變得封閉且具敵意。大規模的公共住屋計畫，如美國聖路易惡名昭彰的 Pruitt-Igoe 計畫就說明了這個現象（Yancy, 1971; Newman, 1980）。建築師原本想像能讓居民自

然而碰面並認識彼此的公共空間，如今反而變成令人畏懼及迴避的地方。

哪一種實體環境才會導致居民或員工間較正向的關係呢？最終的結論是：重要的不是環境是否會使人產生互動，而是環境是否給予居民選擇去產生互動。

經由 Baum 與 Valins 一系列（1977）針對學生宿舍的巧妙研究設計說明了這兩者的對比。他們對大學新生的行為做了研究，這些大學新生被隨機分配到兩種不同設計的住所：一種是標準的「雙邊通道」設計，即房間排列在長通道的兩旁，再加上一個大型的公共浴室區。另一種是「套房」設計，即一個單位內有三間三人房，還有一間浴室提供三間寢室共用。

從設計的角度來看，雙邊通道設計是有效率得多；想想看，把 20 間浴廁集中在一區內，與每九個學生共用一間浴廁相比，哪一種較容易找到沒人使用的浴廁？然而，事後卻證明，住在套房設計的學生比較快樂、較不封閉、成績較好，並且在學期結束後較有可能繼續與室友待在一起。該研究的設計者發現，住在套房與「通道設計」住所之學生的行為差異並不僅限於宿舍環境內。在其他地點所做的實驗與觀察裡也發現，住所是通道設計的人會較封閉，較不會與陌生人交談、在反對運動中的合作策略時也較容易與人起衝突，並且一般來說，他們在與陌生人互動時也較容易發生不舒服與不愉快的經驗。

基本上，住在通道設計住所的人對宿舍裡頻繁、「難以控制」的社會互動會感到厭惡、不悅，而且會採取心理上的封閉且具敵意的反應策略。一般說來，人並不喜歡在開門時不確定自己將會碰見誰的那種感覺。

同樣的過程也影響了大多數環境。有個針對鄰居行為的延伸研究做出了以下結論：「有好的圍籬才有好鄰居。」（Bulmer, 1986）。換句話說，正向的社會關係取決於管控自己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的能力，如此在與相關人等進行互動時才會覺得對何時進行互動及要互動到何種程度有所掌握（請見圖 8.2）。

這個理論的最後驗證顯示，在這類有問題的居住環境裡，簡單的實質改變就會對居民間的人際互動品質產生正向影響。Baum 等人發現，只要以一連串的內門拆開長通道就足以消除負面效應（A. Baum and Davis, 1980）。Newman 注意到，在惡名昭彰的 Pruitt-Igoe 計畫裡，在其中一個街區的周圍築上臨時圍籬就能轉變其特質，讓空屋率大幅下降，並出現居民想保留籬笆的遊說行動（Newman, 1980）。Halpern 也發現，將橫跨問題住宅的巷弄封起來會大幅提升鄰居間的正向行為與相互扶持，並能降低居民間的恐懼、憂慮及沮喪（Halpern, 199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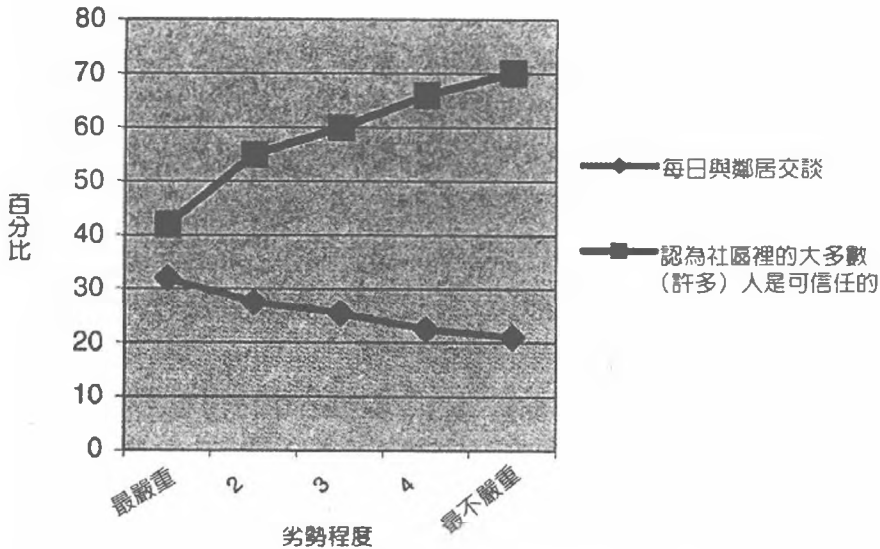


圖 8.2 社會接觸與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2000 年英國家戶普查

註：社會接觸不一定會導致社會信任；住在居劣勢地區的人們較可能習慣性會與鄰居交談，但也會比較不信任鄰居。

267

很明顯地，從交通運輸及空間如何影響居民管控自己與他人產生社會互動的能力這兩個角度來看，打造出來的環境對社會資本有很明顯的影響。這也引發了特別多的興趣，不但因為因果關係得以被特別清楚地展現，也因為它是一個相對來說較容易被改善的潛在因素。

規模的重要性

證明實體環境對社會資本有影響的證據隱約透露了規模的重要性。相較於建築的各出入口只由十名住戶共用的大樓，在由 200 位居民共用唯一出入口的建築中，其住戶間會比較難產生正向的社交關係。

類似談及規模的論點也出現在許多脈絡中。我們發現小村莊裡的公民參與、志願服務與社會信任度往往會比大型市鎮中的更高 (Putnam, 2000)。在距離短的街道上的居民也被認定是比在距離長的街道上的居民還友善；小型學校比大型學校更讓人覺得友善，前者的學生表現也較好；一旦工作場所裡的工作人數超過 200 人上下的這個門檻，整個工作環境的特質也會大幅變化

(Willmott, 1963; Sundstrom, 1986)。

然而，規模較小的社群及組織可能會減少建立架接性與黏著性社會資本的機會，至少在社群或組織內是如此。同時對黏著性社會資本來說，如先前所述，最關鍵的成分可能不是規模，而是可控制性。同樣是由 200 人共用唯一出入口的建築，有門房（如高級大廈或辦公大樓）及沒有門房（如公共住宅）控管出入者，其造成的結果會很不一樣。

鉅觀論述：文化、經濟及制度

如同社會資本中有微觀與社群層面的變項，社會資本也會有明顯的國家與地區變項。雖然這些鉅觀差異可能會以鉅觀與微觀的形式顯現，如「個性」上的各國差異，但在這個層面上還是無法解釋它們。一般說來，英國人「保守」，美國人「外向」，而北歐人則是「謹慎」的。但多數美國人外向、北歐人保守的這個現象仍需要更深入的解釋，而不能光只是說因為他們的家庭就是將他們養育成那樣的個性。我們必須要能夠解釋為什麼在瑞典會有超出一般比例的父母以特定的方式養育孩子，或會普遍地展現高度的公民參與、信任等。

歷史與文化

普特南關於義大利地區間差異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1993）發現，義大利地方政府在效能上的差異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經由其資源或結構來說明，而是以社會資本的地區差異來說明（請參閱第六章）。普特南認為，義大利北部地區的成功祕訣在於這些地區有活躍的結社生活形成的豐富社會組構；相對於此，較不成功的南部地區則以「無涉道德的家族主義」（amoral familism）著稱（即家族成員間的連繫強，但對陌生人則採不信任態度）。

268

普特南的分析將這些源遠流長的文化差異與一千年前的歷史事件連結在一起討論。他看到了北部有活躍的公民生活，其根源於數世紀之前的北部城邦。相反地，他看到南部的不信任根源自入侵與壓迫的歷史、恩庇傳統及天主教會的位階制性質。

要檢視這類源遠流長的歷史論述非常困難。歷史往往提供一套敘述而不是因果論述。有可能即使氣候也有關。總體說來，有沒有可能在嚴寒氣候裡的社會只有發展合作的文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而這是不是也有助於解釋在歐洲國

家中，北方的國家為何會比南方的國家擁有更強大的合作文化及社會資本？或者這只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與基督教的出現所導致的事件？

雖然我們難以確定社會資本任何特定文化的因果起源，但在之後的著作中卻強化了關於「隨著時序推移，一國、一地、一社群的社會資本不太有變化」的觀感。有一個研究發現可以說明這個即使時間改變仍有的穩定性：在今日美國各地，社會資本中的大量區域性差異幾乎或完全吻合現代美國人祖先的來源國間社會資本差異（Rice and Feldman, 1997）。例如，明尼亞波里與聖保羅附近地區在社會資本的各項數值上都居全美最高，而此地區就是高信任度的北歐裔群集之地。今日明尼蘇達州以及北歐各國的居民仍維持著社會連繫緊密、人們相互信任的情況，能解釋上述現象的是一個持續數代、相隔數千哩及處於不同政治結構下仍存在的東西。

即便在人口群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社會資本隱含的穩定性明白指出了文化的重要性。這股穩定性告訴我們，一個社群或國家的社會結構會達到一種穩定的均衡狀態，此均衡狀態外顯在對應的制度、期待與社會化模式中，同時也受到對應制度、期待與社會化模式所強化（Rossteutscher, 2002）。理論模型的著作證實了系統往往如何朝向一個穩定的合作或衝突均衡狀態聚集的情形（Axelrod, 1984; Good, 1988）。基本上，模型指出了當周遭有至少一定比例的人能信任他人且願意合作時，一個人會信任他人且與人合作就很合理了。在這樣的脈絡下可以發現合作策略，如互惠或一報還一報，一直都占有優勢。但是，在大多數人都不值得信任的情況下，合作策略將無法適用，而且將會隨著時間演進而消逝。因此，這樣出現的均衡狀態在時間推移中就不太會有變化。

綿延久久、根深柢固的文化有其明顯的重要性，而許多人將此文化重要性解讀為它意味著社會資本是無從改變的。然而，一個系統能在長時間中保持穩定，這個事實並不會排除變遷發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此系統受制於某種外部力量的撼動時，就會被導引進入一個同樣穩定的嶄新均衡狀態。重要的是，近來有關模型的著作顯示，合作策略在網絡不具有地理基礎的情況下（即基於較陌生的人們之間的互動的情況下）仍可以出現。作者下了這樣的結論：「令人驚訝的結果是，如果互動的模式是隨機挑選，但卻長期地持存，那麼出現的合作強度仍會一如在互動具有地理基礎時一樣。」（Axelrod, Riolo and Cohen, 2002, p. 341）這為我們樂觀的態度打下一個根基，讓不同的文化持續彼此互動，在某一天將會達致高度合作與高社會資本之間的均衡狀態。

社會結構與階級制

即使文化在時序推移後仍維持變化不大，我們仍可找出社會的關鍵結構與制度，而這有助於解釋在時間改變中是如何維持與散播一個社會的文化。在某些情況中，這些結構與制度甚至能提供我們有關穩定的均衡狀態最初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緣由。

低社會資本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嚴格且不太改變的階級性社會結構。這種結構通常表現出高度父權傾向，任何地位的提升都取決於對處於權力位階上層者的忠誠，及他們所施予的恩寵。這些不平等主義傾向的結構顯然無法提供充分基礎讓公民在彼此間發展相互尊重與互信，而這種安排所造成的結果又會蔓延數代。

再一次地，義大利南部各州的低社會資本又成爲經典例證，在那裡，階級嚴明的天主教會仍支配社會達幾世紀，同時再加上同樣階級分明的黑手黨。還有另一個例子，即美國低社會資本的州與奴隸制度盛行區域（特別是盛行大規模種植業的南方），這兩者間的高度相似。

270

在義大利的例子裡，普特南認爲這些具排他性的階級制，在幾世紀以來的外力入侵及派系爭戰中生根，這些外力與派系有系統地強行推動殘酷的控制階級體制，並壓迫更具平等主義傾向的社會結構，這因此可能成爲反抗的目標。同樣地，在美國南方各州，強大且殘忍的社會實踐強化了做爲奴隸經濟之基礎的權力階級體制，包括對所有膽敢挑戰鑲嵌在各制度內之階序體制的人施以殘忍、暴力的迫害。

階級制度貪腐與自我繁衍的特質在曾爲奴隸的 Fredrick Douglas (1855) 筆下顯露無遺。在一篇極爲生動的文章裡，Douglas 描述了他的新女主人如何因爲還不熟悉這些壓迫性階級制度，因此在一開始時展露了他從未見過的親切和善。但很快地，權力階級與社會期待改變了 Douglas 的女主人的態度與行爲，最後她也變得跟當時的其他白人一樣，以殘酷嚴厲的方式對待奴隸：

一度我和湯米及他母親能很順利地聚在一起。我之所以說「一度」，是因爲不負責的權力其致命毒性及奴隸制度傳統的自然影響，很快地就爲我那位溫和又令人喜愛的完美女主人塑造出適合她身分的形象。一開始，Auld 女士很明顯地將我當成一個和一般小孩沒兩樣的孩子；她並未把我

看成是她的財產。把奴隸當成財產是常見的普遍想法，而把奴隸看成小孩則是自然且不由自主的。像她所具有的這種高尚本質並不會立刻就遭到徹底的扭曲；要將她脾氣中天生的溫柔氣質轉變為惱人的殘酷得花上好幾年（Douglas, 1855, pp. 144-5）

271 父權的社會階級制度與低社會資本之間的密切符合並不僅限於對義大利與美國的研究發現中。針對社會信任的跨國變項研究也發現上述關係是很常見的。例如，La Porta 等人發現，各國在貪腐與低信任程度上的差別與參與階級性宗教組織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有高度相關性（La Porta et al., 1997，第六章）。同樣地，心理學研究也顯示，即使是一個正常、調適良好的人，在被隨機分配到一個嚴謹、界線明確的社會階級體制中去擔任某些角色，如在史丹佛監獄實驗裡（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擔任守衛或犯人，那麼受試者的行為也會很快地就融入該角色；若以史丹佛監獄實驗為例，就是在擔任守衛時會表現出能嚇阻人的殘酷，而擔任犯人時會表現消極的退縮（Zimbardo, 1971）。事實上，從犯人心理的崩潰、守衛逐步增加的殘酷程度來看，這些結果太過劇烈，以至於該實驗在原定為期兩週的時程完成前就喊停了。

階級性社會結構不僅反映了低社會資本，也破壞了多數正向的黏著性、架接性及連結性社會資本，總之，這個證據非常令人信服。

經濟不平等

有人會主張，經濟不平等只是另一種反映社會階級制度的形式（請見上述的討論）。這樣的觀點絕對會為社會學家布迪厄（1986）所接受；但因為這個觀點可能會受到其他如經濟全球化等外生因素的影響，且同時其本身也具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概況，因此憑它原本的條件，就值得好好討論這個觀點。

在各國之間（Knack and Keefer, 1997）及各州的地區之間（例如美國與義大利：Putnam, 1993; Kawachi et al., 197），都已經發現經濟不平等與社會資本有密切的負相關。另外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村莊層面上，經濟不平等也與社會資本有負相關（La Ferrara, 2002）。我們很難根據現有的資料建立起這個關係的因果方向，但似乎兩種走向的因果關係都很有可能。超越一定（因國家而異的）門檻後，不平等會將社會結構拉大，增加每個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減少彼此的共同利益、社會組織、規範及相互尊重的可能性。同時，低社會資本也會

減低一個社群發展共同社會願景，或致力於建立公共財或福利政府的能力。

或許，如果世界變得更以能力為導向（這是頗具爭議的一點），而能力與生產力取代了以種姓制度、出身來決定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那麼由經濟決定的地位所扮演的作用將更擴大。不管如何，看來經濟不平等絕對會出現在我們追尋因果關係的候選名單中。

勞動力市場趨勢

勞動力市場參與的模式也對社會資本有影響。有人主張，我們工作得愈多，我們花在像拜訪朋友或參與公民社團等其他活動的時間就會愈少。有人更微妙地認為，市場的世界觀有時會與禮物或「公民經濟」的世界觀產生衝突。我們愈認為錢最重要，我們當然就愈會忽視社會上的非金錢面向，例如愛、關懷及歸屬感。

272

傳統上，女性在志願性組織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人們或許會預期女性勞動力參與的上升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社會資本總量。Hall（1999）與普特南（2000）兩人都已檢視過這項論點，但幾乎都沒發現可供證實的證據。

在美國，不論是否擁有有給薪的職業，社群參與在女性與男性方面明顯都下降了。換句話說，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件事本身並無法解釋這股普遍存在的減少模式，但在不論男女工作強度普遍的增加上，因為時間的壓縮，已經對社會活動參與產生了負面的顯著影響。

從英國也出現了相當類似的證據。Hall 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增加（其中多數又都投入職場中）實際上會緩和社會資本的下降趨勢，畢竟教育和社會資本的增加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請見之前的討論）。事實上，勞動力市場趨勢顯然存在著相互矛盾的效果。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及中產階級有了驚人的擴張已導致中產階級的社交模式更普遍的得到採用。既然平均來說，中產階級表現了較高的信任度，且比勞工階級有多一倍的組織結盟，那麼儘管經濟不平等還是在增加，這還是可能有助於維持社會資本。另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在各階級中，工作的密集程度都有顯著地增加，而這很有可能會因為時間的壓縮而抑制了社會資本的成長（Burchell, 1999）。

福利國家的規模與本質

另一個對於決定社會資本之可能因素的廣泛爭議則是國家所扮演角色的規

模與本質。有些人表達了擔憂，尤其是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這些人認為國家愈龐大就有可能弱化或取代了志願性及非正式的連繫。例如，在福利國家提供津貼給失業者、身心障礙者之前，許多工人參與了信用合作社或「互助會」(Friendly Societies)，他們定期繳納費用以在有需要時得以換取急難保護。這些會社不只是私人保險方案，因為成員相互仰賴，而且都深入參與其行政組織。

然而，還是有許多人沒有被含納在互助會裡。福利國家被規劃來接手會社所扮演的社會保護角色，並將這個保護功能擴展到全民。問題是，這個理性的福利官僚組織的效能是否擠壓出一種極具價值的社會資本形式？

雖然直覺聽來這個取代假設似乎很合理，但一般證據卻都不支持這個假設。確實，人們可以指認出特定的例子說明，一個龐大的政府隱含取代社會資本，甚至是壓制，如在前蘇聯的部分國家裡所看到的低社會資本 (Small, 2002)；然而，在檢視各國時，我們會發現，在那些高福利國家中，像荷蘭、挪威及瑞典，其社會信任、志願服務、日常社交與社群計畫參與度都普遍地明顯偏高 (OECD, 2001a；請同時參考第七章)。同樣地，在美國，具有較完善福利及公共計畫的州也會有較高的社會資本。

要解釋這個相關性的因果本來就很困難。比較有可能是高社會資本國家與地區因為其價值觀、不平等現象較不嚴重、解決集體問題的能力較強，所以較容易也較願意去組織高福利政府。另一方面，這種高福利政府也因而較可能培養出讓社會資本得以發展的條件來，像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情況（請見先前的討論）。

也有可能像 Rothstein 所說，較少仰賴會進行資產調查的高福利政府有助於避免不信任的動力產生（請見之前的討論）。就這方面來看，英國社會學者 Julian Le Grand 在 1980 年代英美福利國家改革的脈絡下所做的觀察就十分有趣 (Le Grand, 1997, 2003)。他認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改革裡包含了一個心態的轉變，從視公僕為可信任的、有榮譽的「騎士」(knight)，及視人民為值得信任但被動的「卒子」(pawn)，轉變成將所有人視為「無賴」(knaves)，即不值得被信任且只要有機會就會占體系便宜的傢伙。同樣地，有人認為美國黑人的處境也惡化了，因為福利國家的制度已變成了「監督、懷疑、排他的工具，而非社會整合與建立信任的良器」，並且加速了貧民窟本身社會資本的縮減 (Wacquant, 1998, p. 25)。同時，美國境內的非營利組織 (NPO) 正與缺乏

志工與贊助的困境奮戰，一般而言，都沒有成功地扮演「影子政府」(shadow state) 角色的願望。如近來一項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推論指出，非營利組織意味著「對窮人提供的協助較少，因為志願部門無法與福利國家的能力相匹配」(Merrett, 2001, p. 407)。

英美與主流歐洲的福利模型在對於非營利組織議題的想法是天差地別的。美國、英國及澳洲的政策制定者幾乎難以理解德國、北歐國家式的高福利國家如何能夠運作。德國人、法國人的福利非常豐厚，以至於就算不工作仍可以領到幾乎和工資一樣多的福利津貼，既然如此，為什麼德國人和法國人仍願意工作？先不論工作會帶來的固有滿足感（及取得社會資本的途徑），這個對比顯示了一個區別，它開啓了我們對人類本性與更深層預設的視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預期似乎成爲一種自動實現的預言。如果我們對彼此傳達了「人們普遍而言不能被信任」的這個說法，那麼人們就會接下這個暗示，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事，如同 Rothstein 在個人層面所曾提過的。然而，如果我們傳達的期待是「多數人是值得信任、誠實且應受尊重的」，那麼人們似乎會起而迎接這個挑戰；而在多數情況下，結果都不會令人失望。

個人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選擇

個人與社會價值觀之議題存在於許多之前討論過的原因之背景中。社會信任低的國民往往也呈現出明顯較高的自利價值觀，像能容忍「將撿到的東西占爲己有」，或「爲己利而撒謊」等情形 (Halpern, 2001)。同樣地，我們也發現，具有以我爲人人的價值觀做爲基礎所形成熱忱的成人，較有可能參與社區事務，並努力解決集體問題 (Funk, 1998)。在小孩的身上也發現了類似結果 (Crystal and DeBell, 2002)。

有趣的是，這樣的關聯在個人層面上並不特別明顯。如果再思考這一點，就會發現這是說得通的。如果某人恰巧住在瑞典且是自私的人，同時他又表示爲己利而撒謊沒什麼大不了的時，他同時也可以告訴別人他周遭的多數人都值得信任（或許這會讓這個人成爲一個成功的小型犯罪者）。然而，如果這個人周遭有許多人也開始跟他一樣，以自私自利的方式生活，那麼在某個時刻之後，人們會更爲普遍地表示其他人都不能信任。因此，雖然在個人層面上自利價值觀與社會信任之間只有些微相關，但在總體層面上，兩者應該有高度相關，這也正是我們發現到的結果。

這些議題的細節已在第七章討論過了，因此在此只會強調某些重點。價值觀與社會資本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直線性關係，有些形式的價值觀改變幾乎明確地衝擊了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例如近來對思考的獨立性、個人自主性上的重視愈來愈普及，而對服從權威的重視度則下降了。這個愈來愈普及的意識形態之自由已塑造了年輕世代的特質為「道德創業家」，混合及符合年輕世代根據個人偏好及想法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變遷有助於解釋為何投身於如教會、政黨、工會這類涉及所有大眾的傳統機構的熱情會普遍衰退。因此，近來OECD一項報告（2001a）注意到，在1980年代的多數國家中，人民對政府、公務機關、警方、教會、教育體系及媒體的信心或信任都下降了。這些價值觀的轉變或許緊接著反映了經濟、技術及財富上的轉變：這些轉變將個人從早期許多直接的經濟互賴中釋放。

另一方面，價值觀的轉變並未導致社會信任或社會秩序的普遍崩解。例如，雖然個人普遍變得對個人的性向領域更加寬容，他們也沒有變得對違法行為，尤其是有明顯受害者的犯罪行為抱持更寬容的態度。事實上，在許多領域上，如對貧窮國家的態度上，人們的態度普遍變得更慷慨。同樣地，在對人權與言論自由的重視上也有顯著的提升。同時，當這些價值觀傾向逐步削弱許多支持地方或教區層面的社會資本時，如狹窄的民族主義，這些價值觀也提升對其他較廣泛制度形式與規範的支持，如對人權條例、對種族不寬容的厭惡及對民主的信念。

在此列舉的所有原因中，個人與社會的價值觀被認為最難以與個人和社會價值觀所涉及的社會資本做切割。如同第七章所述，從各國演化的社會資本及個人主義的本質來看，不同國家顯然都會有些微不同的過程。由於人們會、也的確討論與調整了自己的價值觀（不論是集體或個人的價值觀），因此價值觀至少必需部分在因果上優先於社會中表現的社會資本形式。同時，如同在本書中不斷看到的，個人的價值觀接著會受到經由個人社會資本所接觸到的他人經驗與價值觀所影響。這是長久以來社會學及哲學的一個爭論，但如果我們還相信個人能動性與思考、預期及選擇自己價值觀的能力，那麼這個選擇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能力就應該放在我們討論因果關係的名單中。

綜觀：朝向一個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的模型

現在是時候整合各種各樣的原因並將它們放置到一個更大的系統模型中了。這個模型需要反映長期以來社會資本的相對穩定性；因果關係的重覆發生特質：沒有明確的起始與結束，無法辨識因果；以及這些原因在不同層面上（微觀、中觀、鉅觀）的作用。

社會資本的「旋轉車輪」(Catherine Wheel) 模型及其結果

當我在數年前首次嘗試將這一切因素整合時，我設計了一個名為「旋轉車輪」的社會資本形構模型（請見圖表 8.3; Halpern, 1998）。基本上，它是一個鉅觀層面模型，說明了像瑞典這類的國家如何在公共財中安排一個集體投資的穩定模式，如教育與福利國家，這個安排減輕了經濟與社會地位差異，接著又創造出一個能激發社會信任、社群生活及結社生活的環境。一如前幾章所述，這些條件往往能輕鬆達成正向的政策效應，例如更良好的健康狀態、低犯罪情況、經濟成長、人民少動亂不安的情況，及具有「德性」的公民性格。這些正面結果是從旋轉車輪出現的「啓發」，同時也有助於讓它持續轉動。在這類的社會中，公民普遍對國家事務感到滿意，也願意納稅及選舉以讓輪子保持運轉。而占據輪子核心或軸心的是社會的共同社會價值觀，如相互尊重、互信與顧及他人感受。

惡性循環的情況也可能出現，與另一種均衡狀態對應。一個有著低信任度的社會通常無法建立令人信任的制度性結構。其政府與法律體系將會像廣大社會一樣，受到此不信任情形的影響而腐敗且無法增加公共財。這些制度將無法傳遞相對於它的高信任制度的助益，而會強化不平等與人民社會地位的差異，並破壞發展公民生活所需依據的信任。遺憾的是，這種情形可說是許多開發中國家，及近代一些前蘇聯國家的粗略寫照。

277

278

拓展旋轉車輪的模型

當時有些社會資本學者將旋轉車輪模型暱稱為「普特南加強版」模型，因為旋轉車輪借用了許多普特南的想法，但再加上國家角色的重要性。這個模型是一項很有用的發展，但它仍存在著一些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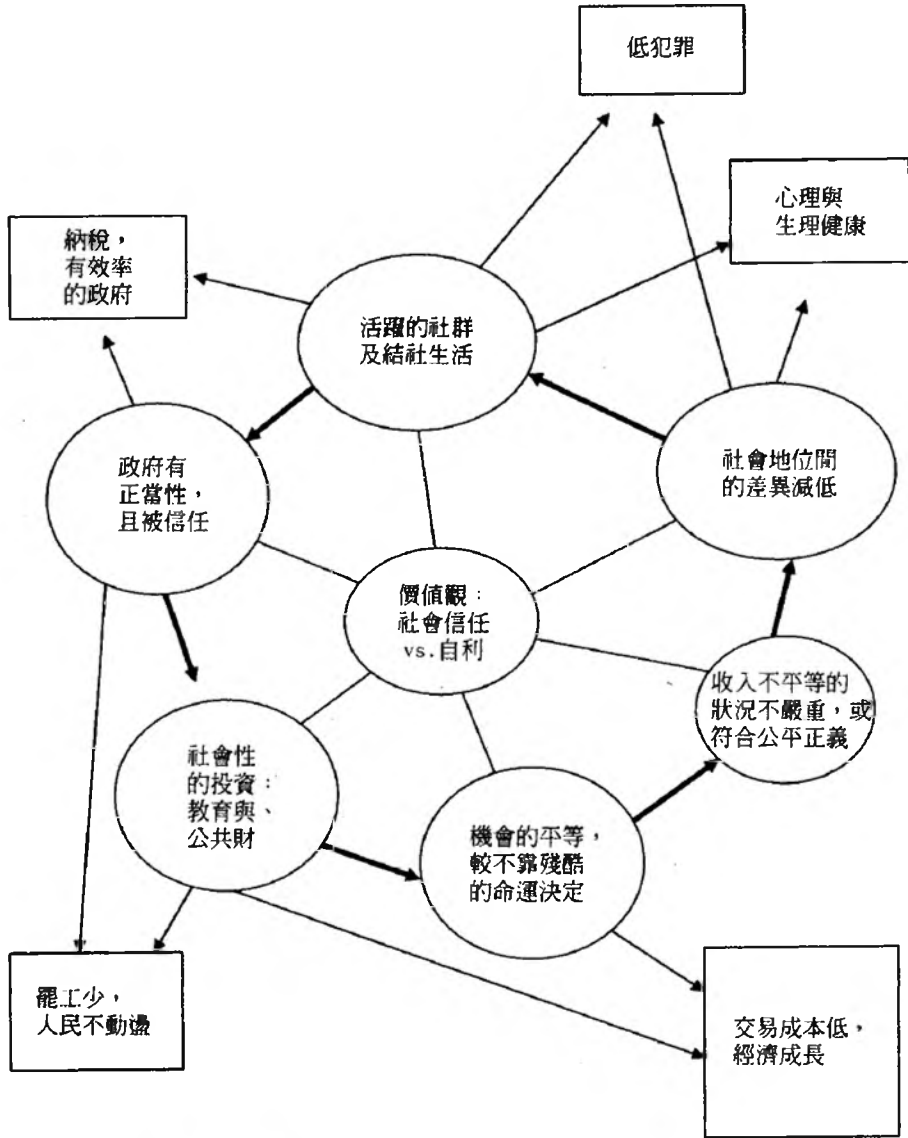


圖 8.3 良性旋轉車輪的社會資本型構

資料來源：Halpern (1998)

首先，此模型放在鉅觀層面的焦點忽略了微觀與中觀因素的重要性。第二，每個箭頭都簡潔地指向下一個因果區塊也不完全符合現實，現實世界要比此模式混亂得多，有許多因素更直接地影響彼此及影響社會資本。第三，它可

能太過於強調傳統結社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它無疑地忽略了可能可以解釋為何會達成一個既有均衡狀態的歷史因素。

持平而論，這些問題裡有很多在當時就很明顯，但也有一些理由支持儘可能把模型弄得愈簡潔愈好的作法。然而，經過了六年來研討會、論文發表會及學者的討論後，是時候提出一個更為複雜的模型了。一開始我們需要把旋轉車輪當成會以螺旋狀持續演進的模型，以便在這個循環的終點，它所描述的國家與社會之性質會產生些微差異，這也是日後這個循環的轉變。這應該有助我們具像化系統特徵如何在時間中變遷，例如整個系統儘管普遍具有維繫一個穩定均衡狀態的傾向，要如何受制於像勞動力流動、稅額競爭等外在或外生壓力。

但是，我們也需要在系統中加入關於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自動轉動的微觀與中觀的旋轉車輪。這些其他層面的循環可能會在非常不同的時間架構下進行轉變。政府與其計畫的推行及消退得花上幾年的時間，政策制定者經常會抱怨要讓主要政策運作所花費的時間太長。然而，在微觀層面上，循環主要是沿著世代的分界在運作：通常得花上 30 多年才能讓一個嬰孩經由家庭、同儕與成人的經驗被社會化；而對一個成人來說，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後又會開啓另一波循環。當然，在這些層面之間還存在另一個關鍵性差異。雖然在鉅觀或國家層面上，有人會主張有一個特定的循環建立在選舉與民主程序周圍；在微觀層面上，則有數以百萬計的循環正在運轉，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套跨越世代的故事。

279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去想像的不僅是鉅觀因果過程裡的螺旋，也包括中觀與微觀層面的多樣性，兩者一同形成了一條長期的持續性軸線。或許這個想像的圖比較像是有數以千計的細小因果線編織在一起成為細繩，然後再將這些細繩綁成繩索。

圖 8.4 顯示了一個呈現多層面模型的固定方式。由於這些層面相互連結，我們通常會期待這些層面大體上會被驅向相同的均衡狀態。然而，至少在短至中期而言，顯然不一定是如此。例如，即使在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區域或地區中，也還是有可能看得到低社會資本的社區及家庭在其中形成獨立區塊；事實上，這還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在缺乏積極介入的情況下，這些「社會資本貧乏」的獨立區塊往往會延續一段很長的時期，特別是會透過由社會階級的區隔所強化的管道而世代傳衍。

實際上，這個旋轉車輪模型仍應該有更多因果的箭頭，而且在各分析層面之間要有更多的連結。但至少它讓我們瞭解正在處理的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並

在下一章考慮政策選項時提供一套有用的架構。

結語

本章指出了幾個主要的原因，解釋了大量觀察到的社會資本變異。

在最基礎的層面上，人類顯然有著互惠與合作根深柢固的傾向，但這並不表示這個傾向不會被其他相左的天性所壓制，如競爭的傾向、建構宰制階級體制的傾向。

281

在個人或微觀層面上，個性差異沿著被標示為「親和性」相對於「敵對性」的面向，試圖去解釋在投身或激發社會資本的傾向上的變異。這些解釋個人變異的原因顯然在於社會化與環境因素上，而非基因中；因此，它們標明而非解釋了社會資本的微觀變異。家庭裡的社會化經驗有最主要的影響，如同個人從其父母與親人那裡「繼承了」留傳下的社會資本。這些早年的影響透過孩子的同儕團體與日後的人際關係產生了骨牌效應。教育表現本身部分是由家庭與社會階級出身所決定，教育表現也具有額外效果。上大學在擴展個人社會網絡的規模與多樣性以及提升自己信任他人的傾向上，有特別強烈的效果。相反地，一個根據個人化休閒消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量觀看商業性電視節目，和不參與社會活動有著很強烈的相關性。最後，有一些證據顯示，接觸不信任的官僚組織程序，最明顯的就是會產生對立的資產調查，會與低信任和不投身社會有相關。

在中觀或社群層面上，參與公民結社會導致社會參與及信任度的些微上升，但證據也顯示，這股提升的力道大多發生在參與組織的第一年，而且或許更多是在成年之後不久的幾年。參與以及信任度會因為參與了其成員較具多樣性的社團而得到更多提升。族群與社會的異質性被發現具有抑制社會資本的功能，不僅降低了團體間的信任與投入，也減少了團體內成員的信任與投入。也就是說，假使沒有混合其他團體，有價值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將不會有發展的機會，這意味著在考量社群發展的前提下，要做出能平衡各力量的行動很困難。極重要的是，有證據顯示，這類的架接性社會資本較有可能在族群團體也具有堅實內部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地方發展，從這個避風港出發讓人得以穿越所有的文化區隔向外探索。高度的流動性、通勤及使人難以管控自己與他人社會互動的實體環境，這些因素全都有可能導致低社會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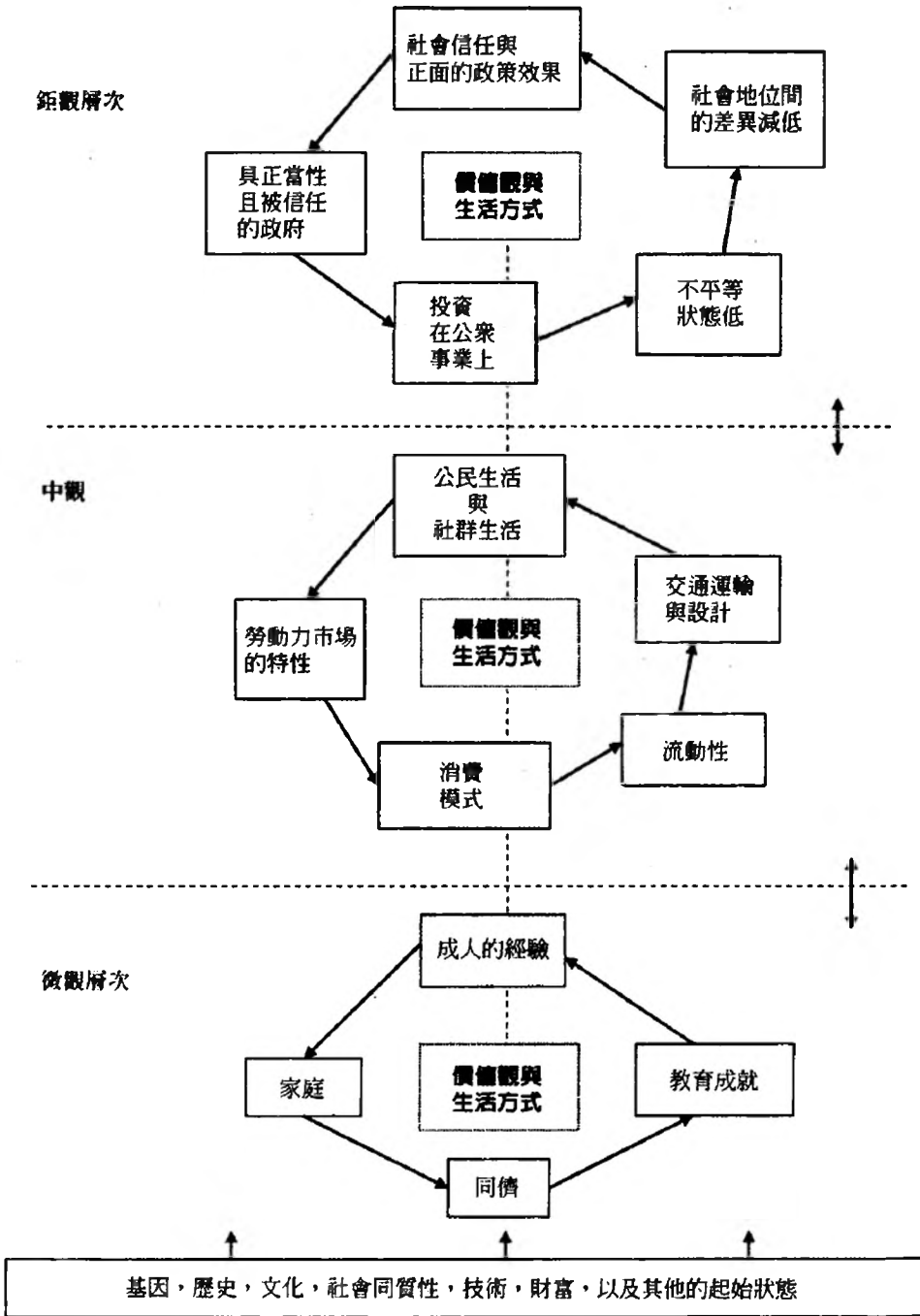


圖 8.4 社會資本的形構與傳播

在鉅觀、地區或國家層面上，歷史與文化都可能有助於解釋觀察到的巨大且穩定差異。在這片廣闊的背景下，嚴密的階級社會及制度性結構顯然藉由破壞相互尊重與平等來抑制社會資本的形成；在一些情況下，甚至是藉著主動壓制較多元且具平等主義傾向的公民社會形成來抑制。更具體地說，研究發現經濟不平等與低社會資本有密切關聯，這意味著社經結構的伸展往往會破壞許多社會資本得以構築的共同基礎。勞動力市場的某些特質也隱含著這個效果。較高的工作強度會替代原本要花在社區及社會參與的時間，而它也與更廣泛層面上對禮物經濟學（gift economy；譯注：禮物經濟學是相對於計畫經濟，即提供商品或服務者並沒有明確的預期回饋對象與回饋內容，有許多出自非制式習慣的分享行為），或公民生活的貶抑有關聯。然而，愈來愈多女性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似乎並無法比其他因素更能解釋社會資本中的變項。最後，規模更大、更高福利的國家會提升而非取代社會資本，或許這是因為福利國家透過降低不平等情形與提供讓社會資本得以發展的優良情況所達成的。

在環視所有層面後，我們發現在價值觀與普及的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一個緊密的關係。由於個人與社會可說是選擇了自己的價值觀，因此這些選擇有助於形塑人們居住的社會，以及形成社會特色的社會資本形式。更個人主義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由於財富與技術的發展而得以出現，從個人化娛樂到各種白色家電用品（white goods，譯註：包括冰箱、洗衣機、爐具等在傳統上以白色外殼為主的現代科技產物）、汽車，乃至於房屋的供應。甚至社會資本自身的轉化都可能有助個人價值觀的表達，就像陌生人間的信任及合作的社會規範將人們從家庭的連繫及地理上的臨近社區中釋放出來。

我們說明了一個社會資本形構的鉅觀層面模型，即所謂的「旋轉車輪」，有時又被稱為「普特南加強版」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國家在支持與激發社會資本上所扮演的潛在關鍵角色。它衍生成一個更為普遍的模型，捕捉了微觀與中觀層面上在形構與傳播社會資本中運作過程的重要性。

進階閱讀

本章所觸及的文獻十分廣泛，所以讀者要努力找到一些比上述討論過的議題涵蓋更廣的資料。因此，以下的建議將不會是全面性的，而是會提供一些特別有趣的導引。

發展與社會心理學的文獻在研究探索「基因、早期社會化及家庭變動如何影響個人的未來人際關係與培養關係的方式」此問題上有著豐富的貢獻。所有一般性的教科書都能提供各式各樣能引發興趣的指引，例如 Shaffer (2005) 或 Fraser 與 Burchell (2001)。John Bowlby 的著作旨趣或許較為明確，並且也是他 1998 年另一著作的易讀版。

關於資產調查造成之影響的議題，可參考 Rothstein (2001)。想瞭解社團組織的會員參與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考 Stolle (1998)。想瞭解打造出的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考 Halpern (1995a)。

283

想要瞭解對因果關係的綜合討論，或甚至是以美國為例者，可參閱普特南 (2000) 的第十章至第十四章，或提供概述的第十五章。Szreter (2002) 則提供了一個具建設性的批判評論。Delhey 與 Newton (2002) 曾以其他方式比較不同的因果理論。最後，Stolle 與 Hooghe (2003) 新編的一部論文集，討論了在不同國家裡會造成社會資本的因素。

第九章 政策意涵

我們一直都說人力資本是新經濟的核心，但愈來愈多人發現社會資本也很重要——即把事情做好、與人合作的能力，是創造全新局面的神奇要素。過去政府的計畫中傷害社會資本的例子是司空見慣——派遣專家忽視社區組織，把投資的重心擺在磚瓦而非人身上。未來，我們必須堅定地投資在社會資本上，就像我們投資在技能與建築物上一樣。

284

英國首相布萊爾

於 1999 年英國國家志願組織協會 (NCVO) 年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在過去幾章內，我們描繪了社會資本、經濟成長、健康、犯罪、教育、政府效能之間的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全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如今對社會資本的興趣日益濃厚 (Ahern, 2001; OECD, 2001a; Bush, 2002; Aldridge and Halpern, 2002; Brown, 2004)。然而，雖然這些關係已明確地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目光，但他們自己完全無法提出介入方案或界定一項政策計畫。例如，生育對我們經濟與社會長期的運作來看，是一項絕對不可或缺的活動，但大多數的 OECD 政府都將這個議題留待個人自行決定。事實上，生活中有許多領域對這類議題的重要政策後果產生鉅大的影響，像是我們日用的飲食、個人投資決定、我們抱持的信念。所以，首先我們需要瞭解為什麼主動的介入行動，很有可能是必須的。

285

在我們這麼做之前，還有一點必須在最後一章提出請大家留意。證明社會資本對社會與政策都是很重要的證據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然而，政策是需要因應特定脈絡而調整的。我自己熟悉的範圍主要在 OECD 各國，實際上也只是這些國家裡的少數——尤其是英國與美國。我希望在此提出的政策建議在其他國家的脈絡下也具意義，但我也確信在有些國家裡，這些建議是無用的。尤其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及政策適切操作化的方式，在這兩方面上，開發中與已開發

國家間的差異是巨大的（請參考世界銀行的網站；DeFilippis, 2002; Bebbington, 2002; Mayer and Rankin, 2002）。本章原則上是把焦點集中在已開發國家；對其他國家狀況有深入瞭解的學者應針對當地的脈絡，寫出適當的處方來。

主動介入的建議

主動介入去改善社會資本的建議是很有說服力的，它仰賴以下五項關鍵的論點。

首先，社會資本如今顯示出與現代社會和政府，幾乎所有的關鍵政策目標有關係，甚至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也有關係（請見本書第一部分；Donovan and Halpern, 2003）。

其次，「市場失靈」的論點適用於此。社會資本具有很明確的公共財特性（請見第一章）。因此，它無力抵禦理性的個人搭便車行為以及系統性的低度投資。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或集體對社會資本進行介入行動，就非常類似對公共基礎建設的投資、技能訓練或政府資助研究的計畫一樣。

第三，平等的論點也適用於此。研究發現，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本並不純然是公共財，常常也會以「俱樂部財」的形式出現，只將優勢提供給有管道擁有它的人。社會資本在社會階級間的顯著差異是這個問題中最顯而易見的外顯形態（請見第二、七與八章）。這個俱樂部財的特質之所以會產生，部分原因是因為有些個人或團體無法或難以直接對社會資本進行公共投資的情況下，試圖自己來打造社會資本，所產生的自然反應。因此，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抱持著平等的觀點，就很像要求政府對幼兒教育、健康或福利投注公共經費來資助，或加以控管。在不見政府介入行動的情況下，社會資本將會在人民之中形成不平均地分配，這種情況會讓特定團體在實質上處於劣勢之中。

286

第四，證據顯示，社會資本的衰退趨勢是對某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如美國、澳洲或愛爾蘭造成影響的重要來源（請見第七章）。這種衰退狀態增加了政策制定者關切的急迫性。社會資本的衰退暗示了即使社會資本本身受到了關注，但社會和經濟狀態的變化卻可能會損害到這種脆弱的平衡。

第五，同時或許是實務上最重要的一點，的確還有很多事可以做。以我的經驗來說，不管是做什麼樣的簡報，老練的政策制定者都會很迅速地提出這個

簡單的問題：能夠做些什麼？如果你沒有一些很具體可行的提案，那麼將很快地失去他們的注意，甚至可能馬上就被忽略。在制定政策的世界裡，一個沒有解決方案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政策議題，只是生活中嚴酷的事實罷了。如果健康的人擁有 700 歲而非 70 歲的平均餘命，我們就可省下教育經費及退休金了；對環境的態度也會轉化得更良好；犯罪或許也會大幅降低。但在有人能發現停止讓人類衰老的祕訣之前，政策制定者還毋需花太多時間去擔心這點。

我們可以說，最後一點正是當前政策最大的阻礙。學術界的論點是相對先進的，引發的關切和共鳴且隨著許多政治人物的直覺而定。但是，影響社會資本的歷史性與文化性因素之重要性向許多人暗示，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地介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請見第八章）。而本書最後一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翻轉這個經常不被言明的預設。

如何介入？

在檢視特定的政策提議之前，我們必須先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反思我們可能用來影響與思考社會資本的方式。

理解與測量方式

它似乎有點乏味，但建立在良好測量方式之上的好資料對於介入行動是否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對社會資本的各種面向及其對政策效果的相對重要性，所知仍然非常有限。有效的介入方式有賴於對問題的清清楚楚分析，同時也得對事情的孰重孰輕有充足的資訊去判斷。

287

好的資料對判斷「什麼會起作用」是很基本的因素。政策介入過程裡不可或缺的一環就是評估——介入方式會產生預期的效果嗎？其付出的成本有多少？這不僅適用於那些希望直接增加社會資本的政策介入方式，也適用於那些目標非常不同的議題，但可能對社會資本產生非預期性效果的政策介入方式（請見下一節）。

值得一提的是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也對常見問卷調查方法提出了一些挑戰。如需要用小群體抽樣的設計去估量環境層面或社區的效果。同樣地，直接行為的測量，像「遺失信封研究」與捐血，也證明需要比常見的問卷調查設計出更可靠的估計方式，常見的問卷調查設計往往有偏誤，會導引人們回答出社

會上可欲的答案，或讓人變成相左於一般大眾的異議者。事實上，對常見問卷調查之拒答率本身就是社會資本的一項重要指標。

在我執筆之際，世界各地正在努力發展有效測量的社會資本工具，在一些地方，甚至將這些工具集結到國家測量與統計的計畫裡。世界銀行已在這個領域裡主動投入多年，而且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資本測量上，獲得巨大的成就。¹ 在 OECD 對人力與社會資本的報告 (OECD, 2001a) 發表之後，OECD 又進一步主持了一個會議來討論測量方法的議題。²

國家統計機構也投注努力於其中。在英國，測量方式的議題是由國家統計局 (ONS) 所主導，它創造出了一個與社會資本相關的問題調查基礎，並將社會資本的問題納入其執行的國家問卷調查裡。這些資料於是會連結到各式各樣其他資料的來源上，甚至還廣及小地區的層次上。³ 在美國，部分是由於受到普特南於 2000 年發表著作中「基準點調查」(Benchmark Survey) 的成功與影響力所激發，白宮也已在適當的國家調查中納入社會資本的測量。⁴ 其他國家也正朝向類似的測量計畫邁進，最明顯的就是加拿大、愛爾蘭與澳洲。⁵

還有幾個國際性的集會在協助各國協調測量方法的異同，最著名的就是 OECD-ONS 的聯合會議，有超過 20 個國家與聯合國中以社會資本為主軸形成的錫耶納團體 (譯註：聯合國曾於 2002 年在義大利中部城市錫耶納舉行團體會議，會中主要討論的議題就是社會資本，在此錫耶納團體指的是當時與會國家) 聚集一起；另外像美國－歐盟的聯合會議也正在籌備之中。⁶

288

直到今日，測量的活動似乎仍以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最為龐大。這或許反映

¹ 世界銀行的計畫是由其內部的著名學者 Deepa Narayan 與 Michael Woolcock 所主導。

² 在 OECD 內部主導的也正是該 OECD 報告的作者之一：Sylvain Cote，而近來則是 Simon Field。然而，OECD 內的成員並不是每個人都渴望探索社會資本，在 Tom Healy 離開了後，興趣就減弱不少。

³ 身為普遍家戶調查的主任但任職於內政部的 Alison Walker，以及 Roz Harper 主導了這項計畫。他們大多的題材都能在 ONS 那個很棒的網站上被找到。

⁴ 在白宮裡，John Bridgeland 是關鍵的學者，這也是因為需要有更充足的資訊，以評估布希政府資助的志願服務、信仰相關的計畫成效如何。最初的計畫是將測量納入 2002 年的當前人口調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但這後來遇到了有些人堅決反對，而把原企圖轉移到了美國犯罪調查上。在美國若談論到任何有關社會資本測量的事務，位在甘迺迪學院的 Bob 普特南團隊將非常清楚整個狀況。

⁵ 在加拿大，StatCan 已實地進行了各種問卷調查，同時經濟學者 John Helliwell 也是其中重要的人物。在愛爾蘭，2001 年 OECD 報告的共同作者之一 Tom Healy 如今在愛爾蘭政府的教育科學部中影響力頗大，而且還要針對社會資本相關議題舉辦國家經濟與社會論壇調查。

⁶ 美國－歐盟原定會議的日期恰好碰上了伊拉克戰爭開打，因此只好取消。

出了我們自己測量方法的偏誤——以及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有限的社會資本——或者反映了這個事實，即受到社會資本衰退影響最大的就是這些國家，因此它們最在意這個議題。

思索——同時試著不要摧毀

關鍵政策性結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在規劃與實行政策時，需要連同許多其他的因素來思索社會資本。藉由比較的方式，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國家裡都有大量的專業知識與草案，可供政策制定者衡量思索政策選項會造成的潛在影響（DoE, 1991; Halpern and Wood, 1996）。我們需要將這個邏輯延伸，以含括其他類型的外在性，包括對社會資本的可能影響。

至少有一個政府：愛爾蘭，很主動在思考社會資本的「審計」政策，檢視未來的政策對社會資本的可能衝擊（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 2003）。同時，在新英格蘭的一個團隊近來也進行了這類的審計，去檢視擴寬道路的提案。這類方案被認為會增加通勤的距離與總量，於是可能對社區參與，通勤者及道路橫越過的社區之社會資本，造成不利的影響（請見第八章）。審計的動作是爲了讓這些負面效果能用量化的方式呈現，並提出通過補償性的社區設施與支持來抵銷負面效果。

這種審計或思索又因爲社會資本的形式五花八門而更顯複雜，並不是所有形式都與正向的社會效果有相關。尤其，有些種類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可能被用來替狹窄的地方利益服務，但也有可能爲了公共財而貢獻力量。最惡名遠播的例證就是組織型犯罪，但更常見的例子則包括了企業聯盟、專業性社團、對外界不關心的社群。

畢竟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對相異的政策效果有著相左的影響，所以單憑一個社會資本的架構無法讓我們自信滿滿地做出政策優先順序的先後抉擇。例如，經濟成長顯然特別容易受到鉅觀層次、架接性、立基在規範之上的社會資本所影響，而健康則尤其容易被微觀、黏著性、立基在網絡之上的社會資本所左右。負責催生出生堅實經濟的官員與負責打造公眾健康的官員，不必然皆會贊成同一套社會資本的政策方案。對於必須同時考慮這些相互競爭之論點的資深政策制定者而言，第一章曾概述過的「維他命模型」是一項有用的選擇。健康的社群需要均衡攝取各種社會資本。特定種類的社會資本「維他命」太少或實際上經常看到的過多，都在經濟上與社會上證實是有害的。政策制定者（與社

群本身)需要確保他們已達到了這種均衡的狀況。

社會資本政策中最直截了當的目標當然就是避免去摧毀它——除非這麼做的理由非常充足。在市區掃除計畫、集中公共住宅方案、某些福利計畫、甚至是一些社區發展計畫裡，我們都可以看到政策對社會資本產生了非預期傷害性效果的例證。

1950、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的掃除貧民窟計畫通常會錯誤地造成人們把焦點放在實體環境極差的品質上，而忽略了居民社會資本的潛在價值與重要性。在大西洋兩岸都看得到，經典社會學研究描繪了那些發現到自己的社會網絡與終其一生建立的友誼，因為這些掃除計畫強制安置他們於他地而四分五裂，因而造成心理上與社會上巨大損傷的當地居民(Young and Willmott, 1957; Gans, 1962)。這些研究揭示了許多居民在掃除計畫後罹患了長達三年的憂鬱症，這反映出了他們的社會網絡斷裂或遭到破壞後帶來的心理傷害。回顧過往，如果社會資本曾被列入考慮的話，就地整修、翻新將很有可能是較佳的政策選擇。可悲的是，3、40年來，有些同樣的錯誤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Halpern, 1995a)。

另一項相關的例證是大規模集中的公共住宅，以及無法處理這些集中地區，卻又非預期地創造出劣勢叢集地的都市計畫政策。即使此地區原本擁有品質不差的居住環境，它們經常也很快地變成了「沈淪地帶」或貧民區，其中的居民想盡辦法要離開，而搬進來的都是走投無路的人。這類地區一旦因劣勢與絕望彼此相互加強後，通常就會具有不信任、原子化的特徵。即使某種社區精神確實在孕生，也經常是僅注意內部情況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居民仍缺乏連結至較具優勢，超越自身邊界的架接性或連結性社會資本。公共住宅的集中有可能讓正式的福利服務更容易地進行，但它往往將居民與架接性社會資本割裂開來，而後者卻很可能幫助許多人跳脫這種依賴的狀態。

290 在許多傳統的福利計畫裡，我們同樣可做出類似的批評。例如，以許多社會安全津貼來激發失業人士找工作的誘因，往往鼓勵他們把焦點放在正式勞動力市場的機構，像英國的就業輔導中心，儘管證據顯示大多數的人要脫離失業的困境，往往是透過非正式網絡與連繫。

包含過度中央集權及破壞地方政府的政策，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也都代表了一種退步的政策。事實上，有些跨國的證據顯示財政的去中央化有助於提升社會資本，雖然這個證據的因果方向是有爭議的(de Mello, 2000)。然

而我們也該注意到，在社會資本變遷的轉換解釋之下，特定形式的中央集權化（或至少是各地區的公有化）可被視為是一個正向的發展（請見第七章）。

諷刺的是，即使是許多傳統再生或社區發展計畫，都會侵害到社會資本的分析。傳統社區發展（如今仍廣被實行）往往強調自助或有能力排除掉連往更大社群或經濟體的連結。以此而論，這類計畫創造出了更強的黏著性社會資本，而非架接性社會資本，有關的社區成員仍繼續被排除在能連往大社會的、能提高他們孩子的企圖心及教育表現的，且能將成人與就業市場連結的網絡之外。

我們不應該過於天真。在某種形式之社會資本的毀壞，以及另一種的創造，兩者之間要做抉擇取捨，經常是很困難的，更遑論在社會資本與其他成效之間去做取捨。舉一個非常明確但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美國貨車運輸業在州層次上的限制鬆綁讓地方社群的權力與控制顯著地下降了，過去的貨車運輸業是十分仰賴緊密的社會及家族網絡的（Gardner, 2002）。但限制鬆綁也為其他的族裔、地域及性別團體開創了新事業，有效地打破以社群為基礎形成的企業聯合壟斷情況，也讓如今競爭的機會較為均等。

總之，雖然政府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是有利於社會資本的（請見第八章），但設計不良的政策與管制方式（還有市場）都會排擠掉很重要的社會資本形式（Bowles and Gintis, 2002）。Hall 在評論英國的社會資本趨勢時認為，英國之所以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並未像美國一樣，在社會資本上顯出衰頹之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英國政府一般而言是竭盡所能的不取代現存的社會資本形式。英國政府往往與志願服務部門共同合作，並提供財務支援，而不是一切活動都由自己直接執行。但是，有時消除一種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行動是有憑有據的，若不是因為更長遠的目標，就是為了創造嶄新風貌的、更具開放性、更能適應環境的社會資本形式。

291

將條件調整到正確位置

前一章透露出一些一般性的因素，它們在因果上是與社會資本息息相關的。這類因素經常是政策介入行動的目標所在，而社會資本的行動議程就僅僅是強化在它們身上有效運作的需要。

不平等，尤其是相對貧窮，就是個例子。有很明確的證據說明人與人之間社經距離被拉開後，往往會破壞社會資本形塑的共同基礎。因此，減少貧窮

(或以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說就是讓他們能抵禦貧窮)的方案應該在社會資本上會看見報償的。這些報償最終將不僅讓窮人，包括整個社會也都會受益，因為社會資本對經濟成長、人口健康、生活安適與否、犯罪與教育等等都會造成影響。

旨在掃除貪腐的政策是另一個例子。絕不縱容貪腐，尤其是在政府內，是建立起集體機制及對他人信任的重要步驟。再者，不管是不是關注社會資本，大多數的人也都會認同這樣的政策，但社會資本的行動議程讓它更具迫切性。

直接激發出社會資本

原則上，建立社會資本最直接了當的方式就是走出來，直接地投資它。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們走出來、與鄰居見面、加入或贊助社團、參與志願服務，或說是多幫別人想一想——雖然證實社會資本趨勢的證據告訴我們，這種情況在一些國家愈來愈難看到。

政府或社群直接投資在社會資本上，這是可能的嗎？政府確實已著手進行。在大多數國家中，政府都慷慨資助志願服務部門，慈善事業能夠免稅，志願服務能透過某種方式被支持，教育能被補助，與公民相關的知識則在學校中被教授，以及也許最重要的是，政府將人際之間值得信任之行為法典化，並去執行這些法律，尤其是透過司法體系。本章剩下的大部分篇幅將檢視政府與社群可以怎麼做，才能夠直接地投資在社會資本上。

代替社會資本

有些環境裡極少有能被發展出的社會資本可供投資；或者如果投資在既存的社會資本庫中將是不公平或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認為有些環境投資在正式制度比在社會資本上更有效能、公平且令人想投資。

例如，雖然 19 世紀的互助會有很多正面的社會資本特徵，卻只有少數 OECD 國家的民眾希望將時間倒流到 50 年前，並省去福利國家的效能、公平與穩定性。事實上，當人們看到在發展中國家裡有數以百萬人仍絕望地仰賴自己殘破的社會網絡，只為了求得每天能活下去，可以確定的是許多能置換掉目前僅有的選擇（即仰賴社會資本）的環境都將是非常受歡迎的（Dhanani and Islam, 2002）。我們不應該天真地以為世界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非正式社會資本，就像我們應該謹慎小心完全仰賴福利國家的世界。

同樣地，在微觀層面上，當面對一個無父無母或飽受長期虐待的孩子時，

我們實在不可能將直接投資到孩子家庭上的社會資本，當成是解決策略。在這種情況下，社群或國家所能做的最佳選擇，可能就是尋求代替社會資本缺乏的情況或適應不良的社會資本。

介於直接投資與代替之間的界線端視你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為何。例如，政府資助的養育照顧政策算是一種直接投資還是代替呢？這又引領我們回到第一章提及的定義問題上，雖然這類問題不太可能引發政策制定者太多的興趣。早先的討論告訴我們，任何有助於人與人之間合作與信任的社會結構（缺乏完整地正式制度），都可被視為是一種社會資本的形式。

政策的意涵：美國的教訓

受到衰退證據的提示，美國的觀察家們都認為在明確思考社會資本如何主動地提升時，應該要「搶在曲線出現之前」。普特南（2000）提到，社會隱憂之類的情況成為美國在上個世紀之交時的特色。當時，是以一個前所未見的社團及社會打造來回應，其作法大多是仿效十餘年前在英國創建以回應類似社會關注的社團。

293

普特南下結論說，我們不應認定只要重新投資於維多利亞時代創造出的社會資本形式上，就能在情況大不相同的 21 世紀脈絡下成功。相反地，他協助將許多政策制定者與學者聚集在一起，一同研商超過三年，討論出重建社會資本嶄新且可行的方法。這些會議被稱之為「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Saguaro Seminars），取自沙漠中的該種植物能在開花之前於地下生長數十載的意義，而其結論也摘要至《在一起更好》（*Better together*）這份報告裡（Saguaro Seminar, 2000）。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標示出的六大政策領域可見於圖表 9.1，一旁還有針對向其他國家提議之適用性所做的簡短評論。有幾項普遍的意見是適用的。

許多提議無可避免地反映出美國的文化及制度脈絡，像提到競選活動的財務改革。更基本且重要的是，其中有兩項引人注目的疏漏，至少從歐洲的政治與文化角度來看是如此：不平等的角色與國家的潛在角色。這兩項疏漏引發了一連串的文章抨擊普特南的「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分析」（Navarro, 2002），尤其是歐洲學者，他們強調「政府在美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也是近來急遽改變的角色，成為了『失落的連結』（missing link）」（Szreter, 2002, p. 586），並宣

稱「美國無法扮演原型的角色」，因為「它似乎無法忘懷歐洲福利國家對社會與經濟的崇高價值」(Lampert, 2002, p. 346)。

在這些議題上，我們必須先檢視普特南的學術性格，而暫且不論他的政治判斷。從未犯下錯誤的普特南（至少在私下）是充分意識到不平等在破壞社會資本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潛在重要性。但是，在當代美國政治脈絡中，他知道這是難以（甚至是不可能）推銷出去的說法。事實上，他會認為能讓政策直接針對減少美國不平等來推行的唯一方法，就是先建立起架接性社會資本與同理心，在此之上而後才能形成支持這類計畫的平台。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判斷是前一章提及的良性社會資本形構的凱薩琳之輪，其基礎在美國或多或少已被中斷；因此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另一個方向：由基礎向上打造的社會資本，以減低社會性差異，並支持政府減少貧窮的計畫。

295 政府無法扮演正向的角色之情況同樣必須被考慮。在美國，這種對中央政府近乎不加思索地不信任態度，是非常根深柢固的。美國人不信任以政府的機制來解決集體行動問題，這種情形似乎也很可能是導致以下困境的部分因素：即美國很難去更新或轉化它的社會資本，以符合現代的需求（請見第七章）。然而，僅斷言說美國需要的就是北歐式的福利國家，這也是不對的；你必須針對該國的脈絡，提供出一條合理的路徑來。對政府的不信任在英國，也是一樣，雖未如美國那麼嚴重，但眾所周知的問題是，20年來右傾的政府（包括在柴契爾的影響下）減低了國家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要求公共服務的信念。在布萊爾首次執政任期中，一直都在努力，開始要扭轉這個信念；當然，如果想在美國達成一樣的目標，可得花上一個世代，甚至更久的時間。

或許這些評論有助於去解釋，為什麼雖然在仙人掌的提議中有許多都引起人們的興趣，但人們仍不由自主地感覺自己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面對普特南書中以23章、400頁的篇幅所記錄的強大沉淪趨勢下，它們的效用就像是小巫見大巫一樣。在這一點上，普特南是有反省力但仍樂觀以待。他私下這麼回應：「每逢星期一與星期二，我都很樂觀。」他想著的正是一些近來巡迴美國各地目睹社會資本建立的正面例證。「但每逢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時，我是悲觀的，因為想在全美各地複製出這樣的社會資本，得花上30年的時間。」我們進行討論的那天似乎是星期五，但我仍必須坦誠我的感覺是，在打造社會資本的積極政策這一點上，我對美國以外的地方要比對美國境內樂觀的多，這主要是因為在美國境內缺乏對政府的信任。

表 9.1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對重建美國社會資本提出的建議，
以及對其他國家的適用性

領域	政策（例證）	評論
教育	<p>在學校提供公民教育、服務課程。</p> <p>大學中設有志願服務的學分</p>	<p>在此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服務課程效果之前景甚被看好，而有證據顯示大學推動志願服務的計畫對年輕世代有很顯著的影響。</p>
工作	<p>制定法律，讓受雇者的工作更有彈性，且有時間去參與社區活動。</p>	<p>一般咸認為歐洲在這一方面成就非凡，並為該類法律與實際作法提供了具體的例證。</p>
城市規劃	<p>減低都市蔓生的情況以及通勤的時間。提供方便行人的設計。讓人們能享有公共空間。</p>	<p>美國依賴汽車的程度及其通勤時間，比起大多數的國家都要高的多，儘管如此，這也是政策上能有所創新的重要領域。</p>
信仰	<p>能在某些可以提供意義的靈性社群中興起另一次的「大覺醒」(great awakening, 譯註：指的是 18 世紀在美國掀起的大規模基督新教復興運動)。</p>	<p>普特南也承認，這將不會是一項純粹的宗教祝福。它與宗教在美國脈絡中扮演十分特別的角色密切相關。</p>
技術	<p>研發出能強化而非破壞社區參與的新形態電子娛樂及通訊技術。</p>	<p>這一點具有潛在的不確定性，至今仍停留在盼望多於實際成果的階段。</p>
藝術	<p>更能夠參與文化活動，包括集體舞蹈活動、民謠歌唱大會，或是 Rap 音樂節。</p>	<p>這一點的進展是緩慢的，但對於打造架接性社會資本而言具有潛在的重要性，而且相較於有傳教導向的組織來說，較不會產生問題。</p>
政治	<p>提高參與程度。改革競選活動的財務狀況。</p>	<p>這反映了普特南長期以來抱持的觀點：金錢已取代了美國政治中的行動主義與草根參與。政治的專業化也是一個存在於各國的問題，雖然有不少國家已對財務狀況明定了嚴格的規範。</p>

激發微觀或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

社區及政府還能再做什麼，以鼓勵個人參與社區、投身志願服務、與朋友社交？尤其是在社會資本異常的基礎下，做什麼能讓個人與家庭的社會資本提升？

對家庭與教養職責的支持

296 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對黏著性及架接性社會資本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幸運地是透過許許多多的方式，現代家庭已變得更能負起滿足孩子與青少年需求的責任了，雖然現代社會要求家庭應擁有的功能與技能也變得更多樣化了（Larson et al., 2002）。

現有的證據告訴我們，父母與孩子互動的方式會對孩子的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如果父母得到幫助，而能與年幼嬰孩建立起連帶且有效地互動的話，這對孩子發展自信、在往後人生中能擁有建立互信的社會關係能力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如果父母是被信任且肯花時間在孩子身上的話，孩子往往在日後會成為信任他人、能投入的成人。第三，父母的社會網絡、父母之間的連結、家長與學校的互動都對孩子的教育表現、偏差程度、及往後的生涯機會有著顯著的影響。能相互連結的父母可以協調並強化他們所期待的價值觀及行為於孩子身上；教養的職責變成是一項較為集體性而非個人性的行動。

這條取徑支持了像美國「贏在起跑點」（Head Start）或英國「在開始打好基礎」（Sure Start）等介入性計畫，兩者都試圖協助父母去支持自己的孩子。早期先驅的介入性研究，如追蹤受試者至 27 歲為止的美國培利學前計畫（Perry Pre-school project），後人對它們的效果投以十分正向的評價。然而，今日在進行的大規模計畫往往比起以往先驅的研究，其介入的方式要審慎的多。進一步來說，我們對「這些多目標的計畫哪些面向可解釋其所造成的正向效果」所知很有限。對這些計畫有系統地評估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來改善我們對「這些介入行動如何起作用，且未來類似的行動該如何更準確地設定其目標與架構」的理解。以下幾點是更明確考慮進行的措施：

- 當青少年還在學校時，讓他們更能理解教導他們的父母心裡在想什麼，改善

親子關係與孩童的發展情況；不僅是「指導」年輕人，還要在他們自己成為父母前先提供他們知識，且讓他們有機會參與。

- 主動協助父母（特別是出身於劣勢環境的）改善他們在父職—母職及家長—學校的互動；建立起信心，讓社會網絡及相互支持得以產生。
- 提供給父母積極的導引、諮商與支持，改善他們的親子互動技巧，或許還能開授胎教班，或建立起像英國的衛生隨訪員體系（health visitor system）。這可能包括去訓練能幫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能與年幼的孩子打成一片或更有效互動的方法，或提供便於理解的資訊，讓父母知道何謂有效的或權威式的教養方式。
- 國家可以透過像是稅制體系，對父母有更多的支持，也能提供二歲以上的所有孩童，高品質的孩童照顧服務。⁷

297

這些政策中有很多已在一些國家裡推行，而藉由檢視一些成功的實行案例，⁸ 也會讓我們瞭解更多。

顧問諮詢的服務

顧問諮詢的方案是提供人們取得架接性社會資本之機會的潛在有力機制，在某個程度上也能補充貧乏的黏著性社會資本。適用此方案的領域有很多，包括孩童發展、教育，乃至於商業發展。例如，研究者曾下結論說，有效的引導能夠幫助身處危機的年輕人避免在之後非受教育或就業時期的傷害性效果，也能幫助他們成功地安渡到成年生活中（Bynner and Parsons, 2002）。假使有一位適當的顧問加入，計畫能被適切地規劃，諮詢就能發揮很大的助益。

美國的研究告訴我們，早年的顧問諮詢能為教育帶來顯著的助益。針對費城的「贊助一位學者」計畫所做的評估顯示，由一位有愛心的成人進行的諮詢

⁷ 來自美國與英國，研究學前各年齡群供應的福利服務帶來之影響的證據告訴我們，二歲是適當的門檻。

⁸ 北歐各國所提供的普及性學前福利服務特別完善，雖然也因此花費了可觀成本。然而，證據指出這個福利服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些國家裡所看到的高社會流動現象（Esping-Anderson, 2003）。有品質的學前福利服務似乎能打破原生的社會出身及最終的階級位置之間的連繫，其效果比起傳統教育要來得顯著。這項觀察吻合了貫時性研究所發現的情況，即在五歲孩童的認知能力上看到了巨大的社會階級間的差距，而認知能力又與孩子在社會上及情緒上之自我控制有密切相關。基本上，學習成為人類的過程是一種社會技能，而缺乏這些技能的孩子在日後將很難再迎頭趕上。

活動，不論這個人與其對象是否有先存的關係，都能夠顯著地提升學業表現並減低輟學率（Johnson, 1997）。評估結果發現對學業表現的正向結果只存在於高一與高二的孩子（年齡在 15 到 16 歲），而不存在於高三生（17 歲）身上；而對準備進入大學的過程以及進入大學後第一年都有正向的影響。身處劣勢的兒童特別能從這些計畫中受益。同樣地，針對「我有一個夢」計畫所做的評估（Kahne and Bailey, 1999）甚至發現更驚人的成果。這個計畫讓每位顧問負責一整個國小六年級的班級（11 歲），同時再加上一位計畫協調人負責提供學生長期的財務、課業及社會支持，以幫助他們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評估報告發現這個計畫使得內城地區的高中畢業生比例加倍，從約 35% 升高到近 70%（請見第五章）。

298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確保這個顧問諮詢計畫不至於淪為污名化的行動。尤其當計畫是針對個人，並因此演變為失敗或劣勢標籤的情況下，可能造成特別嚴重的傷害，就像在英國的教育介入方案中發生的一樣（Defty and Fitz-Gibbon, 2002）。有能力待在學校但卻自願離開的年輕人會被個別地挑選出來，然後分配到一個實行介入方案的團體，並給予額外的支持與來自學校的諮詢服務，或是被分配到在組中維持匿名身分的控制組中。結果發現，被標示出來的人當中，被分配到給予額外支持的人顯著地在往後的考試中表現較差。額外的焦點似乎變成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帶來低成就的結果。相反地，在美國實行成效卓著的計畫則是介入整個班級或整個同儕團體，而非個別地挑選低成就的學生。

這點以及其他的證據都顯示以下措施的潛在重要性：

- 應更廣泛地在教育場域裡使用成人顧問諮詢的作法，尤其是針對背景較為劣勢的年輕人。結果告訴我們，早期的顧問諮詢比起經過時間推遲的更加有效，而針對全班比針對個人的，取得的成效要更加顯著，這有部分原因是同儕效應與文化的力量導致。
- 更普遍地運用孩童對孩童、孩童對年輕成年人的顧問諮詢計畫。重要的是，這類顧問諮詢顯然也讓擔任顧問者受益；有項研究的結論是，「志願參與協助弱勢孩童的學生自陳得到很多的收穫，最常見的就是自我形象上——發現自我嶄新的一面，感覺自我形象有了改善，或是在人際關係上……，以及在思想上更有彈性。」（Osterweil and Feingold, 1981，引自 Halpern, 1989）。

- 針對年輕的父母所做的顧問諮詢（請見之前的討論）。
- 商業「天使」的顧問諮詢計畫，藉由讓有經驗的（經常是）退休生意人貢獻時間與知識，協助生嫩的商場新手或創業人士起步。

英國的「銜接」諮詢服務設定的對象是 13 到 16 歲之間的孩子，它代表著一項想提供年輕人顧問諮詢幫助的嘗試。同時間在美國，總統於 2003 年發表的國情諮文裡也宣示要以 450 美元來促進顧問諮詢計畫的推動：「政府將支持顧問的訓練與招募；而美國的男性或女性都可以加入。只要一位顧問，只要一個人，就能永遠改變他人的一生。我懇請你成為那一個人。」（小布希總統，2003 年 1 月 28 日）未來的研究必須進一步地澄清我們對以下這點的瞭解，即在什麼情況下，顧問諮詢計畫能最完善地發生作用；不良的顧問諮詢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是大於正面的。同時，就如底下所要探討的更廣泛地使用顧問諮詢計畫（尤其在公務機關之內）時會看到的，我們必須對「潛在的顧問如何可得、如何篩選出來」有更多的著墨。

299

處理潛在違法者的新方法

犯罪的過程包括與主流社會價值的決裂，以及標示出缺乏約束力的個人及社會關係。高風險的年輕男性（也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之所以能避免違法是因為有個主流的關係（通常是有個女朋友，但有時是有個同儕或家庭成員），將自己拉回到大社會的價值觀、責任與滿足之上。

相反地，當一個年輕人被送進監獄中，以往擁有的鮮少關係（與家庭、與有感情但還未步入軌道的伴侶、與老師或工作夥伴）再被撕裂與弱化（請見第四章）。同時，這位年輕的違法者又與一個具有「犯罪社會資本」的網絡產生連結，結識了幫派或其他違法者。強化潛在年輕違法者的「正向」社會資本，弱化（或至少不要加強）他們「負向」的社會資本，因此就成為了降低犯罪發生的重要策略。可採取的措施如下：

- 提供課餘時間或團隊共同參與的志願服務活動，使孩子能遠離自己的家、社區及同儕團體，以便讓他們可以培養出新的個人及社會關係，以及「正向」的社會資本。
- 提高孩子志向之計畫。例如，帶他們到他們過去不熟悉的專業人士工作場域

中，或請他們信任的諮詢顧問多給予鼓勵（請見之前的討論）。

- 將送進監獄服刑當成是最後不得已的選項。這一選項不應被用在犯了輕罪或非暴力犯罪的人身上。⁹
- 將年輕違法者帶去與受害者面對面地建立關係，聆聽他們的行為對受害者造成的影響，藉此在這些潛在再犯罪者心中擬像出未來可能受害者的形象。

300

我們需要再深思熟慮才能更有效地針對那些有高風險的團體採取措施。在美國與英國，這類政策總是難以躲過「姑息犯罪」的指責，儘管政策的成效卓著。

施行課餘時間或團隊共同參與的志願服務活動的一種可能模式就是 Raleigh 青年發展計畫。在英國，加入這個規模不大之計畫的年輕人（17-25 歲）參與了社區服務、社會服務、實習服務，以及其他地方性服務。在 150 位 2001 年參與這個計畫的身陷危機青年中，有 40% 是處於長期未就業的狀態，有 35% 曾被判決有罪，而有 50% 染有毒癮及酗酒的毛病。

這個計畫的內容包含一系列在英國各地的住宿活動，隨後是為期十週的遠行，然後是為期一週的住宿以計畫未來。每個地點都得花上 5,500 英鎊。參與的年輕人必須籌到足夠的金錢來支應各項用具與住進去的費用。而其他所有的花費則由 Raleigh 組織來支付，包括辦護照的費用。另外也從歐洲社會基金、公營樂透、企業贊助者那裡募得款項。志願參與「一般」的 Raleigh 計畫者必須籌到 3,300 英鎊才能成行，其中有部分會被用來補助危機青年的旅費。

在這些完整參與整個計畫的危機青年中，有 65% 找到了工作或進行訓練；95% 認為自己的信心及溝通技巧有了改進；90% 認為自己的動機、責任、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有了提昇；70% 說自己的人生規劃與抱負最終有了正向的改變。

志願服務

早年具有志願服務與結社活動之經驗，顯然是預測日後社區參與的極佳指標。資料告訴我們，社團參與了較短的時間，激發人們去信任或參與更大社群的效果一如參與了較長時間。參與了成員較多樣化的社團相較於參與了成員同

⁹ 普遍來說，懲罰的迅速與確實比起它的嚴重與否要來得重要。因此，例如英國將逮捕到判罪確定之間的時程減半的作法，被認為是導致英國近幾年來犯罪顯著下降的主要因素。

質性較高的社團，前者更能激發出較高度的信任與對更大社群的參與（請見第八章）。

證據顯示，將焦點擺在讓年輕人能取得一些志工經驗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即使只是很有限的時間；同時，這個經驗應該也能讓他們與來自各個不同社會和族群背景的人合作。或許努力的方向應特別放在那些不可能進入大學的年輕人身上，藉此使他們複製出一些高等教育能帶來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之利。

301

以下是可行的介入方案：

- 發展或贊助年輕人參加六週至六個月長的離家志願服務計畫，尤其是針對來自劣勢環境的。這不只是提供給失學者，也針對仍在學但難再升學或有輟學危機的年輕人。
- 拓展給來自各行各業年輕人的國際交換計畫，讓他們能在十分不同的脈絡下參與志願服務，並與他人打成一片。
- 提供從事志願服務者金錢獎勵或大學學分數。例如，Bell 與 Chen（2002）曾提議將美國服務隊（Americorps）方案中年資的應用推廣開來。美國服務隊是由柯林頓政府所設立的機構，用以鼓勵年輕人參與志願服務。在美國服務隊的會員服務期滿之際，他們每個人每年可獲得 4,725 美元以幫助他們支應學費或貸款。

有項批評是說這類年輕志工愈來愈把志願服務當成是達成功利目的之手段，像是讓自己的履歷表更漂亮（Price, 2002）。然而，分析美國服務隊志工加入前後兩年期間的證據發現，會員們對社區團體變得更加主動，並在這段期間顯現出價值觀上的轉變，同時也發現這個計畫有助於解決原本未被滿足的人力及社區需求（Simon and Wang, 2002）。其他的研究顯示，有志願服務經驗的人雖然很年輕，但往往能維持參與到日後；另外它也造成了正向的敲門磚效果，帶領人們走入社會與政治參與，並有更願意投入社會的態度（Janoski, Musick and Wilson, 1998; 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

一如在 2002 年國政聯合宣言所說的，鼓勵 55 歲以上的人參與志願服務的銀髮服務隊（Senior-corps）計畫被推廣開來，並引入新條例規定參與者可以取得獎學金，並將之轉移給孫子或其他人使用。

在英國，由教育與技術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資助的千

302 禧年志願服務計畫，旨在 2003 年底前吸引超過十萬名年齡介於 16-24 歲間的新志工加入。由內政部所資助的經驗服務隊（Experience corps）也共襄盛舉，旨在 2004 年以前吸引超過 25 萬名 50 歲以上的新志工，這項活動首先始於 2001 年 11 月，而在 2002 年 5 月則成爲了全國性的活動。最後，在本書撰寫之際，已有人在商議以下的建議，即爲 14-19 歲間的年輕人創造一紙新的大學學位證書，而取得此證書的必要條件是完成某個最低時數的志願服務。

在個人層面激發社會資本的其他構想

只要帶點想像力，我們都能夠研擬出各式各樣有助於激發個人層次社會資本的構想；雖然在大多構想中，政府都不想插手，只願留給個人或社區自行去組織。

例如，現代生活的特徵之一似乎是較晚進入持存的個人關係，並（經常是無限期地）延後擔任父、母職的時間。這股趨勢的最簡明指標之一就是單獨一人組成的家戶數量在穩定增加中（這也導致在許多工業化國家中住屋市場存在著不小的壓力）。如果從這一趨勢只是反映生活方式選擇的觀點來看，它們應該完全是與個人相關的事務。然而，存在一些證據包括這陣子在電視上常看到年輕或有點年紀的單身男女哭訴著渴望一段戀情；這意味著在關係形塑的過程中或許存在著一些較爲系統性的錯誤。

解答不可能是去創設一個由政府贊助的約會機構（可以拿日本的經驗來參考），或是開始打廣告，推展「離開你的沙發，起身找一個伴侶吧」。但這裡或許存在著一個問題。例如，一般醫療從業人員看待醫療問題時多歸咎於身心失調或社會心理失序所導致。這些經常表現在那些過度工作、寂寞，以及情緒得不到支持的病人身上。假使情況的確如此，那麼醫生們還要繼續開立 β 受體阻滯藥（譯註：治療高血壓、心臟病的一種藥物）、安眠藥、抗體以治療壓力過度的免疫系統嗎？還是應該引導這些被孤立的病人彼此認識，讓他們能相處融洽？在住屋市場上，政府應該修法使互不相識的成人們能更容易地一同買賣房子嗎？

診斷兩性相處問題的醫生或許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有時最佳的政策提議就是始於這麼一個愚昧的構想。

激發社區層面或中觀的社會資本

在社區層面或中觀上，已經有相當多的政策構想與發展在進行了。例如，大多數國家都有廣泛的、由政府支持的志願服務部門。同樣地，中央政府將權力下放給地方及地區政府也在許多國家進展順利，而且應該會對地方及社區層面的社會資本有所助益。因此，本節將把焦點集中在一些能在社區層面激發社會資本較為創新的構想上。

303

謹記「許多存在著大多數問題的社區也同時是社會資本最缺乏、居民或組成分子最原子化、最不信任彼此，以及連結最少的地方」這一點是重要的。政府或外部的機構經常必須在打擊犯罪或提供基本服務，以創造社區繁榮基礎條件的過程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社區鄰里以及其他在地性的治理

在一些國家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國），「地方」政府並不是非常在地。它的規模要遠超出大多數人的認知。雖然特定的功能可以用較大的規模來更有效能地處理），雖然證據顯示這些規模的效應一般而言是非常些微的（許多功能也可能被委派到非常地方的層面上來執行。例如，兩或三條街道或許可以很輕易地達到夠大的規模，去組織或支持一個公共休憩空間或公園的成立，以及有個社區管理員來守備此公園及周圍街道。

同樣地，雖然特定的維安功能需要在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的層面上被執行，其他功能也可以並應該在社區這片土地上開展。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降低犯罪這件事，我們必須更早、更頻繁、更快地介入。社區及其居民需要有信心與制度性的架構，讓他們能在看見青少年遊蕩，惹上事端、塗鴉日益顯現、毒品日益猖獗之際，可以行動。或許，社區自治委員會應該不只擁有雇用管理員或打造年輕人可使用設施之權力，也可以發布懲罰性的規定讓他們遵守。這類懲罰性規定可能是很輕微的，但如果它們可以儘早將年輕人從犯罪窘境中拉出，給他們一個機會「找回一切」、讓周遭的人能很快地原諒他們。那麼這些懲罰就很有可能比起較嚴厲但不確定、遙不可及，以及推遲的正式司法體系裡防止犯罪的懲罰要有效的多。

304

- 缺乏地方層級的行政機構（即轄區內少於幾千人居住的地區，甚至更少），

應該考慮去設置社區自治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將有自己的預算，並對地方上各種「生存」相關的議題負起職責，例如社區公園、雜亂問題、給年輕人使用的設施、社區或公園的管理員等等。

- 這類委員會也有權力制定程度輕微的社區罰則，並有明確的管道能連絡警方或有關當局來處理較嚴重的問題。或許他們也有權力去組織地方性的公民投票，例如讓社區共同決定是否同意地方稅徵的輕微上升。
- 處於劣勢的地區會需要以更結構化與支持性的方式來進行，至少就短、中期來看是如此。

總是有些議題會讓地方自治的實行導致在財富、高低社會資本的地區之間的不平等擴大。但地方主義並不意味著身處劣勢的地區不可以或不應該從更大的社群中接受額外的支援。當然，這點憂慮不應該被用來當成什麼都不做的藉口。

以社區資產為基礎的福利

在社會資本與地方公共資產的社區所有權之間是有關聯的。例如，有些地方及國家當局會實驗性採行或考慮將公共資產（例如社區中心）轉化為「社區信任」的提案，或設置上述的社區自治委員會，讓社區擁有更大的控制權或完全的所有權。在適當的治理配置及護衛之下，這一類的社區信任將能成為地方公民參與的重要據點，有助於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的培植。

打造廠商、員工與社區間的網絡

第一章已指出，廠商也算是一種社會資本。我們已經證實廠商之間存在的社會網絡在促進與推廣創新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結果，不管是私人企業或政府部門如今都積極地試圖複製「矽谷效應」，將商業及研究活動群聚起來，以達到地理鄰近性、社會網絡激發創新與經濟成長極大化的可能性。然而，有時可能忽略的是非正式社會互動，而不是地理鄰近性所扮演的重要性。

- 廠商需要去確認他們在廠商內部黏著性與廠商間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適切的平衡狀態。商業組織、大學與地方當局能幫助潛在競爭的行動者，彼此以非正式的形式來互動。

- 政府贊助鼓勵廠商間形成網絡的方案也證明對廠商是有助益的，方案最終能使廠商自給自足，這暗示了政府能扮演播種這個更廣泛的角色（請見 Cooke and Wills, 1999）。
- 以公司形式出現的「贊助者」扮演了企業利益與更大社會利益之間的中介者與促進者，我們也發現這些擁護者能有效的促進社區與產業間的對話（Scott and Sexton, 2002）。
- 我們發現在公司內的倫理守則對社會規範有顯著地影響，並增加對多樣性的容忍度（Valentine and Fleischman, 2002）。
- 允許並資助職員們能在工作之餘參加有啟發性的活動，讓他們能和來自不同團體的人互動，這將十分有益於廠商（請一併參考專題 9.1）。例如，將各種「另類」且有啟發性的表演組織在一起的倫敦戲劇節，近來開始進行一項很成功的計畫，即讓將成為企業主管的員工至少可以觀賞四場另類表現，之後再與由兼融各種背景的觀眾團體一同進行有啟發性的討論座談。主管們發現團體動力配合上具啟發性的題材，能讓員工們重新省視自己的預設，更有創意地進行思考。這個方案亦為戲劇節募得可觀的資助，並完全轉變了企業贊助的性質，以及企業與表演工作者間的關係，使得原本意興闌珊的捐助者轉變為令人尊敬的客戶與伙伴。

以上許多議題都已廣泛地以某些方式來推動，但通常是隱而未顯的，且其價值常被低估。

社區的資訊與溝通技術（ICT）網絡

普特南已在以下這個問題上尋思甚久：是否 ICT（尤其是網際網路）會變成是另一種「更炫的電視」，使人更進一步彼此孤立，或是變成另一種「更炫的電話」，協助人重新連結起來。DDB 生活方式研究（這是常被普特南使用的資料來源）的分析告訴我們，使用能交換資訊的網際網路可以促進年輕美國成年人之間的信任（Shah, Mcleod and Yoon, 2001）。約有 63% 的美國人如今固定會使用 e-mail 來跟家人、朋友保持連絡，而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使用網際網路的人相較於不使用的人，前者看電視的時間要明顯較少（UCLA, 2003）。ICT 已讓新的、龐大但分散的各種利益社群得以集結在一起，並發展出新的產品與軟體，例如 Linux，並且建立起某些立基在特定議題上形成的專業知能或評述

專題 9.1 公司與社區參與：三項個案研究

Yorkshire Water 設定了一個目標，希望公司籌劃的社區活動一次能有 20% 的員工來參與，這個目標已大致完成。社區參與也是大學畢業生必修的訓練課程之一，同時在所有職員表現管理過程裡也是被肯定的。針對「閱讀很重要」，旨在改善 14 歲以前文字能力的方案；公司也提供住宿與其他的支持。公司希望提升社區參與的策略乃是與商業計畫融為一體，它已導致了公司與社區的連結更緊密，並且使員工與顧客忠誠度都很高，形成了員工個人發展的基礎。

Connex 是一所鐵路營運公司。它們同意在工時中給予員工每月 16 個小時，與英國交通警察局合作，擔任義警的工作，並在三個月裡分別給予總額達一千英鎊的獎勵金，以表彰他們的貢獻及額外習得的技能。Connex 也同意支付英國交通警察局費用，以請求他們固定加派額外的警察隊員協同這些義警出勤。社區、公司與員工在以下兩個關鍵的面向上都得到益處：透過警察在交通體系中得到愈來愈多的曝光，而 Connex 的員工也改善了其技能，在同仁間或與顧客的身體互動及言辭應對上，都有所進步。

蘇格蘭皇家銀行決定只要其員工捐款一英鎊，它們就再額外捐助二英鎊。而經過政府更進一步的免稅政策，對每一位一般的納稅人來說，員工每捐出一英鎊就等於讓慈善機構在實際上獲得了將近四英鎊。員工若積極加入一些組織的志工行列，也可以申請社區現金回饋獎勵金，最高可達一千英鎊。最後，銀行鼓勵員工直接參與由此集團中「社區投資計畫」資助的社區組織。如此一來，個人捐獻、主動投入志工行列、公司捐獻及支持，三者相互強化，而且都得到了肯定（以上三個例子都節錄自 Her Majesty's Treasury, 2002）。

的團體，例如如何將程式中的錯誤抓出來（Pruijt, 2002）。

另一方面，有些變項控制更得宜的研究已指出，愈常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在社會上往往顯得更加孤立，而非更加投入社會。個案研究指出以 ICT 為基礎形成的社群網絡發展模式很大程度是視社群既存的社會資本之性質而定

(Sullivan et al., 2002)。近來，普特南更推論說網際網路不但無法打造社會資本，而且也被證實最終只是一種偏狹的黏著性社會資本，讓人們只與在極細微、狹窄的想像意義上，共享同樣興趣的人們（不只是與其他喜好追風車系的車主，而且更是只與喜好 1959 年出產的追風之車主），相互認識與連結。¹⁰

儘管至今各類證據都已過時，但 ICT 在增強社會資本上仍具有明顯的潛力 (Davies, 2003)。ICT 能讓新形態的跨地域團體得以成形，能讓人們不受空間與時區的分隔仍可以維持連繫，能促進「及時」的社會連帶出現，能將社會網絡的價值透過自動「推薦」系統（這系統能自動把相關的資訊轉寄給朋友的朋友）推展出去 (Resnick, 2002)。

例如，既存的鄰居網絡會自動自發地建立起共享的 e-mail 名單，這已被證實是股能強化地方社群的巨大力量。其寓意似乎就是「細微枝節這回事」。更深一層而言，ICT 網絡極有可能在較傳統的潛在或實存社群已負荷過重的情況下，仍能提振社會資本。細緻一點來說，ICT 提升社會資本的潛力很有可能仰賴它運作的管控性環境，或不斷在結構中的環境。在政策上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308

- 當鄰居建立了一組共同的 e-mail 名單時，將會成為提升當地或街坊層面之社會資本的堅實資源。而在急速增長的穿透比例之下，應該會變得愈來愈普及。但這並不必然經由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而是起初僅由二或三位鄰居分享 e-mail 開始有機地增長，然後其他人漸漸加入。以下是一些有創意的計畫，包括了製作出一個有照片、基本連絡方式與 e-mail 內容的社區資料庫，伴隨著從當地蒐集而來的資訊所調查列出的嗜好與興趣 (www.whothat.org)。這個構想結合了詳細的鄰里資訊以及科技的威力，讓我們更容易能找出興趣相投的鄰居。
- 有很強的理由支持我們進行全面性的 ICT 初探性計畫，這將使在社會性質上混居且地理性質上稠密的區域連結起來。尤其，這些網絡應該試圖連結起富有與貧窮的受雇者，因為這能在跨越社會區隔的情況下提供強大互通就業機會之管道。ICT 訓練應該提供給那些需要的人，也應該架設地方上的網路設備，使家戶間的資訊交流、交易活動得以可能，並促進集體性的社區行動。資訊交換可能也包括對如何進行商業交易、取得公私部門的服務等建議。商

¹⁰ 普特南是在 2003 年五月於英國的 Leverhulme 劍橋講座演講中，提出了這個頗具爭議性的論點。

業交易可能包括孩童照顧、協助園藝、學校選擇以及較正式的工作機會。而社區行動可能包括俱樂部、地方性競選或遊行活動、空間規劃議題等等。

- 我們應該再多考慮資訊的品質以及網路上電子聲譽的建立，應如何管制的問題。在許多國家，這可能會涉及對資料保護與隱私權規定的再思考。

至今絕大多數已進行的社區 ICT「實驗」並未符合上述的條件。它們常常只是設立了一個基本的網站，提供關於交通、天氣與零碎社區事務之資訊，很少會去孕育出社區的對話來（Tonn, Zambrano and Moore, 2001）。從這些初探性研究來看（像「倫敦街頭」計畫，有一百個家戶結成網絡），最終出現的益處往往來自偶然的社會互動，而非 IT 本身的巧妙裝置¹¹。然而，近來有關控制組

309 的研究已顯示出共享鄰居 e-mail 名單中所存在的 150 到 200 個家庭，不僅提高了 e-mail 的連繫，同時也使鄰居中聊天的數目倍增了；認識的數目變為三倍，亦導致社區鄰里意識的提高（Hampton, 2003）。

總之，ICT 網絡可能具有龐大的潛力能提升地方上的社會資本，只要它們在地理上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說能聰明地將你與身旁的鄰居連結起來、能沿著自然社群建立，並促進集體知識的累積，包括其信譽（請見專題 9.2）。它們特別有潛力能將富有與貧窮的受雇者連結起來（其前提是在英國這些團體有地理上的鄰近性），並能增加需仰賴信譽進行的低成本、高信任型交易之數目（例如在孩童照顧上）。這類交換行為能讓物質情況不那麼樂觀的人有收入（減少了津貼補助發放的成本），並給物質情況優渥的人有更多的閒暇時間。

打造環境過程中，規劃與設計的新方向

310 我們知道都市設計對社會網絡及透過社會網絡造成的結果都有顯著的影響（如犯罪與健康情況）。非常簡單且低成本的介入方式可以帶來極度正面與驚人的成效，尤其是當這些介入方式給予居民對他們在居住地點附近會遇到什麼人這件事上，有更足夠的控制感（請見第八章）。例如，在美國惡名昭彰的公共住宅區 Pruitt-Igoe 附近圍起藩籬，就導致了當地空屋率從約 70% 降到了低於

¹¹ 英國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就是由內政部活躍社區小組（Home Office Active Community Unit）（以及其他政策計畫，如健康行動區 Health Action Zones）贊助的近期時間銀行（Timebank）方案下的一個初探研究，雖然並不會事先排除掉立基在傳統貨幣交易下的交換行為。

專題 9.2 各地郵遞區號的威力：upmystreet.com 的例子

在許多國家中，郵遞區號常被用來辨識某個地理上界定好的小區域。在美國，郵遞區號所指的是相當大的地區——多達數萬人居住的地方；較多號碼的郵遞區號能指涉較少的家戶組成地區，但它們並非廣為人知。相反地，英國的郵遞區號指涉的地區要小的多，通常是某一條街甚至更小。因為在英國的郵遞區號也使用英文字母，所以就比較短而且便於記憶；在英國，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居處的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能夠證明在地方層面上，是重建社會資本的一項有力工具。這股潛力已經由 upmystreet.com 所證實，在這個網站上，你可以在輸入自己的郵遞區號後，找到當地學校與其他設施的資訊。同時，也有可能加入因為地理因素（住在相距你住處最近的一些人），或興趣因素所形成的討論群。這個新式地方媒介的威力已席捲了倫敦的一個住宅地區，在那裡，以前互不相識的左鄰右舍如今能相互得知彼此近況。

Upmystreet 後來遭遇到了財務上的困難，但其他服務仍扮演著它的角色，像是英國 BBC 的“i Can!”。

5% (Newman, 1980)。同樣地，在英國有項實驗性的介入方法，在某個問題住宅區域內封閉了其巷弄，這使得社區的社交程度有顯著的上升，並且居民在臨床上的焦慮及憂鬱情況也有減少一半以上的成效 (Halpern, 1995a；請見第八章)。

政策上的進一步建議包括：

- 採取措施改變居住區裡的街道性質，讓它們從汽車優先轉變為行人優先。這種街道設計已成功地為 1970 年代後的荷蘭所採用，而如今也在許多其他國家中試驗。例如，英國政府近來花了三千萬英鎊（約合五千萬美金）來進行 Homezones 這類的初探計畫。通常，這類方案的細節會包括重新去鋪設道路的表面，以便讓道路與人行道之間沒有分別——讓它看起來就像是整塊遍佈的行人特區。另外，也替小孩開創遊樂空間，替居民設置桌子與長椅，並種植造景植物以及設置路樁以避免機車呼嘯而過。汽車通常是集合斜放在某個

區域，而不再能沿著整條街停放。在英國，這類特區的限速是 20 英哩，雖然由此可推知汽車將以步行的速度前進。這類方案讓街道成爲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創造了非正式互動的機會，因此也促進了鄰居間社會資本的發展。¹²

- 建造短小的道路以及死胡同，而不是打造一條長直大道。事實上，如今這一課已爲大多數私部門的開發人士所熟知，即較短的道路與死胡同能創造出一個較易管理、較易相互認識的鄰近社區。
- 封閉攔腰切分住宅區域的十字型巷弄，以便讓居民能有充分的信心說，他們在家戶外看見的人都是附近的鄰居，這尤其應用在大規模的公有住宅計畫上。
- 311 • 讓居民更容易舉辦街頭派對。因爲這需要封閉公共道路，所以在許多國家經常需要繁複且困難的程序，但其實是可以加以簡化的。
- 將當地的公園與遊樂區域升級。支持這類設施的預算通常很容易成爲政策制定者及行政官員減少支出的目標，它卻能在建立地方社群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設施本身的品質以及種類的變化非常大——生鏽的鞦韆與一片泥土地並不足以成爲社區遊憩的中心。公園照護者身兼社區設備維護者，以及支持當地商店、咖啡店生存下去的補助方案，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F. Baum and Palmer, 2002）。
- 讓居民組成的團體更容易成形，並能購買準公共空間的區域（欲知概要的例子，請見圖 9.1）。這類空間的邏輯是它讓居民及其孩子能在他們願意的情況下，在一個安全且封閉的環境中彼此融合在一起，但如果他們不想被打擾，仍可以選擇坐在自己私有的庭院內。或許與這類設計最接近的模型是在曼哈頓的一些住宅區裡，在其中心部分有著私有的共享庭院（Drayton, 2000）。這類空間設計是得到高度讚賞的，這一點反映在附有庭院的房地產價格高昂上，也反映在居民的熱忱上，他們一年至少一次會在社區植樹日時聚集在一起，整理花圃並種下植物球莖。然而，準私人的庭院仍是很少見的，因爲想將許多人的所有權合併在一起，這在嚴謹的法令限制下是很複雜的，而且這類方案很可能因爲一或二個反對者而受到阻礙。

在一些脈絡中，我們或許可以主張應該積極地與選定的私有企業開發者合作，進行促進社區關係更堅實的住屋形式實驗。理由在於，造屋者往往在他

¹² 就像所有的交通方案一樣，在此我們也需注意移位的效應——交通被推往其他的街道上，這會潛在地破壞了另外一些地方的社會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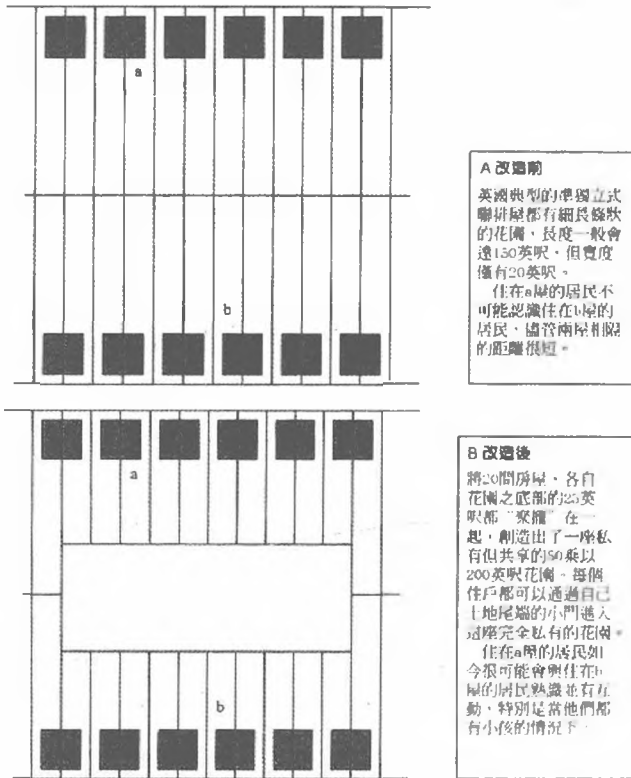


圖 9.1 創造集體花園

們的設計上顯得保守，而這會導致同質且原子化的住宅開發狀況。基本上，讓社會互動更容易卻不使之強迫發生的設計，能讓鄰居間較易產生正面且廣泛的關係，這對黏著性及架接性的社會資本都有影響（A. Baum and Valins, 1977; Halpern, 1995a）。

讓社會住宅分散

社會住宅在物理上大量集中在一起的設計，讓身處劣勢的社群更難以形成並維持架接性社會資本，提供較分散的社會住宅將可以避免這點缺失。政策上的選擇包括：

- 增加與私人開發商締結規劃—獲利型的合約，以保障一定比例的新設住宅給低收入租客。很重要地是鼓勵低租金的單一住屋能分散開來，與較昂貴的

住屋混合在一起，而不是讓這類低租金的住屋聚集成常見的龐大、孤立的貧民窟城區。

- 透過住屋協會或其他供應商，主動的購得人們負擔得起的住宅，或是在較富裕地區中的住屋，以提供為社會住宅。¹³

這種分散的政策帶來的益處不是立竿見影的，而且可能得花上數十年才見成效。收益的程度也仰仗社區既存網絡的互惠及互助之程度而定（Blokland, 2002）。收益顯然得視個別家戶的分散而定，而非小型住宅區或居住街區而定。即使如此，住在較富裕地帶的社會住宅租客並不會立刻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見到自己的收入三級跳。最大的受益者會是他們的孩子以及青少年，因為這些人得以在較多元的社會網絡優勢下成長，並有機會得到周圍中產階級的設備及企圖心。例如，在芝加哥法院命令將 Gautreaux 公共住宅去隔離化後的 15 年，研究發現搬去郊區者的孩子們較不容易輟學，較容易走上念大學的這條路，較容易受雇，擁有較高的薪資，且較有可能找到帶有健康福利或其他津貼的工作（Kleit, 2000）。

使用個人人際網絡，將個人及社區從貧窮的泥沼中拉出來

身處劣勢者可能因為他們個人人際網絡中，僅僅那麼一位受雇的個人出現，使得他們的生涯機會得到轉化。因此，制定出有助於個人性與社會性網絡發展的政策，將有助於將身處劣勢的個人與社區重新連結回社會與經濟的主流上。例如：

- 首先，應鼓勵（或許是藉由經濟上補貼的誘因）廠商從劣勢地區招募員工。
- 接著，應鼓勵廠商，利用那些招募自劣勢地區的成功員工，進一步從同樣的網絡與地區中招募新人。

這是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中提出的一項構想，但在美國之外的脈絡下應該也同樣適用。此項計畫對廠商的好處之一是，個人會小心翼翼地推薦人選給廠商，以免找到的是不合適或不值得信任的人，因為這涉及了他們自身的信譽。

¹³ 這類的購買行動已成為許多國家政策的一環，像是住屋當局的計畫就是在英格蘭提供額外的社會住宅。

能激發中觀社會資本的其他構想

以下是一些值得深思的政策構想，可能有助於建立中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 各國境內區域間在經濟成長上的差異，或許有部分可經由各區域在社會資本上的性質與程度之差異來解釋。有些區域擁有很堅實的黏著性或俱樂部型社會資本（例如商業協會），但架接性及連結性卻相對微弱，它們可能就需要找尋能主動促進社會資本重新回到均衡狀態的政策。例如，去改變限定會員資格的俱樂部規定，強制讓它們變成是整個社區內的人都可以進入的社團。
- 政府可以支持讀書會或非正式的研習性團體成立。這類方案在瑞典被認為相當成功，激發了社會網絡的成形，這是在私下的閱讀及研習當中無法產生的。
- 一個街頭與咖啡廳的文化可以因著主動的鼓勵而產生的。如英國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往往將所謂「地中海型」文化無法出現的情況，歸咎於天氣，但事實上咖啡廳文化在一些更嚴寒的國家中也能興盛起來，像是丹麥，只要加裝街道暖氣機以及在椅子上鋪毯子。咖啡廳文化能促進公共空間的出現，創造更普遍的社會互動自然而然出現的機會。
- 廠商也是種社會資本。許多廠商已經著手推動讓員工有時間參與志願服務的計畫，甚至是鼓勵他們去參與，例如使用像是減稅的誘因。許多廠商已受益於希望在工廠內部執行能夠建立社會資本的活動，像愈來愈普遍的員工外出日：特別是這共同的活動涉及社區參與。
- 行動電話設有緊急協助號碼或按鍵，能以最接近的三通電話指出手機持有者正陷入危險或需要協助的情況。這則求救訊號的接收者理應給予回應，至少要確定問題是什麼，或連絡相關的緊急服務。這個方案能破除抑制陌生人遭遇危急時，在幫助意願上產生「責任的分散」之迷思（Latane and Darley, 1976）。這是一種利用科技來強化（而非弱化）較大社群內互惠與信任的社會規範之方式。

315

激發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在國家或超國家的層面上（鉅觀層面），社會資本變得與特定社會網絡不

相關，而變得與共享的規範、理解及日常生活中合作與尊敬的習慣有關係。這一點也反映在努力追求的政策上，其中大多都是需要人民與政府間形成伙伴關係才可行的。

公民教育與服務課程

傳統的公民教育是教授孩子與他們的權利、政治體系、憲法相關的「事實」。證據顯示，這類計畫對政治知識的多寡是有一些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很輕微且並不深遠（Niemi and Junn, 1998）。相較於傳統公民教育，服務課程則是採用較動態、實作取向，以做而非正式學習的方向來認識公民身分。

- 相較於傳統公民教育，服務課程可能可以提供較有效的方法來建立社會資本。它包括了實作（例如蒐集可回收的垃圾）、討論（例如集結成一個團體，分享彼此的經驗）、學習（例如橫跨眾多課程而形成的知識，像資源回收就會涉及化學、生態學、全球暖化）。目前，在歐洲或美國的學術研究，都在評估這類課程的成效。¹⁴
- 值得考慮的是將這類課程計畫配合參與社區服務的必修課程以及顧問諮詢計畫（請見之前的討論），一同進行。讓學生對自己的校園環境與課程（至少是與公民教育相關的）有更多的控制權。整個社會能給予年輕人更多正式的肯定，例如將投票的年齡門檻降低到 16 歲或更低（請見以下的討論）。

社區服務點數方案

316 社區服務點數方案的內容通常是根據服務時數，提供志工非金錢性的點數。這些點數之後能交換，像交換其他種類的服務。這類方案首先盛行於 1980 年代中期的美國，當時民權律師 Edgar Cahn 在華盛頓發展出了一套社區服務現金方案。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瞭解，這些方案令人產生特別興趣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它們是金融體系的偏門，讓人們可以避免賦稅（有些 LETS¹⁵ 就是這麼認為），

¹⁴ 針對這類議題進行研究的團隊包括在荷蘭的 Van Deth 等人，在英國的 John, Halpern 與 Morris，在美國的 Saunders 與普特南。

¹⁵ 即地方交易與貿易體系（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ystems）。很多稅務稽查人員懷疑這不過又是地下經濟的另一環；人們想透過付出其他財貨或勞務的方式取代現金，以達成避稅的目的。

而是這些方案承認關懷與金錢價值之間不能完全轉換的特性——用日常生活的語彙來說，即「你無法買到愛」。這些方案試圖藉著將較抽象交換的益處應用在非貨幣或禮物「經濟」中，使得關懷與互惠的行為得以延伸。如果一位朋友邀請你到家中享用晚餐，在離開之前你爲了回報朋友的恩惠而掏出錢包，想支付這頓晚餐的費用，這種舉動很顯然是不得體的。同樣地，不管是窮光蛋或大富翁都曾被母親告誡過，在那種場合下，如果對方不常來拜訪你，你就得送上更昂貴的禮物。重點在於有幾種禮物或關懷責任，是無法僅以金錢支付的方式來清償的。反而我們以特定一種行動來回報：藉由回邀朋友；藉由在對方需要我們時挺身而出；藉由許多其他「日常生活」裡表達情感與歸屬的行動。¹⁶

服務點數方案在世界各地漸漸散布開來。在政府與社區本身現金短缺的開發中國家則特別有用。例如，巴西境內的一座城市開始了從事資源回收者可能換取公車票的點數，而在幾個月內，孩子們已將貧窮區域內髒亂的街道撿拾得乾乾淨淨。這個方案的成效如此顯著，以至於其成爲同規模城市中唯一毋需使用昂貴的資源分類機器之城市。這類方案能成爲現金有限的行政機關，在渴望針對公共財進行投資的事務上，一種威力十足的方式。在同一座城市中，其他涉及交易的點數方案（像是爲了增加公共綠地），都有助於讓此城市的成長率高於該區域的成長率，同時也讓它成爲國際知名的綠化模範城市。

英國是 OECD 國家裡很典型的一個，帶有這類構想的實驗方案雖然不多但日益增加。目前在英國至少有 25 個時間銀行（Timebank）方案大略以 Kahn 的想法模塑成形，而至少有另外 14 個方案是在執行中，其中經常接受政府某種形式的支持。這些方案包括志工依時數可換得隨後與其他志工一同「花用」之點數的方案，而這個點數也可以捐給他人，讓此人接受額外的幫助。在某些地區裡，這些點數也可以用爲使用地方當局擁有之設備的權利，或支付圖書館借書逾期的罰款等。然而，目前這些方案的規模都很小，而且也都僅限於當地，最大規模僅含括 120 至 130 人之間，這與一些美國的方案很不一樣（像在聖路易的，如今就含括了超過一萬二千人）。

317

這類方案是有潛力可推廣到更廣的層次，甚至是全國的規模。例如，日本人已直接成功地引進了一個針對老人照顧方案（在日本人口老化的脈絡下，這

¹⁶ 《讓愛傳出去》（*Pay it forward*）這部電影裡以一個簡單的架構來鋪陳我們互惠的習慣。有個小孩想出了一個構想，即在學校內推行做三件好事的計畫，而受益者必須照著這個簡單的規則做下去，不是向施恩者「回報這個恩情」，而是必須「讓愛傳出去」給另外一個人。因此，創造出了一個正向施恩的金字塔，而這個世界也因此變得更美好一點。

是個獨特的問題)。志願照顧老人家者能獲得點數，而且這點數因著付出的時間與提供服務的性質而有不同（例如，協助整理個人衛生，能獲得的點數就比協助購物來得多）。這些點數可以被轉移給其他人，例如自己住在國內其他省份的年邁親人，也可以基於需求的關係而捐贈出去，還可以用來支付自己未來可能的照顧需求。經由此方案付出之關懷的品質，經研究發現比起付費取得的要高，而且老人家也偏好前者，他們將之視為是種善舉。

因此，雖然特定政策構想可能變異很大，但可能包含：

- 擴展並推廣地方性的時間銀行方案，理想上這能連結到地方上的 ICT 網絡；透過 ICT 網絡，志工可以在地方層面上媒合到有此需求或身陷困難者（請一併參與前面討論到 ICT 的小節）。
- 在教育體系內，可以將點數施予參與服務課程的孩子；擔任低年級學生顧問的高年級學生；或志願擔任課程助理的學生。例如，在英國就有提議，即給予孩子一張極具吸引力的「連結卡」，讓他們可取得特定的教育服務，或是可以去上某些課的權利；能取得免費的餐點等等。這個卡也可用來儲蓄非貨幣形式的志工點數。另一項替代方案是這些點數可用來換取學生日後教育所需的信託基金（Paxton, 2002）。
- 在健康服務上，點數可用來換取志工照護者、翻譯人士、律師等，這是我們從日本略為汲取到的成功經驗。
- 在津貼體系上，以社區服務的點數能獲得的額外非金錢益處，可以補充傳統上以金錢形式進行的津貼。它們之後可被用來「購買」由志工提供的服務，例如親職教育的諮商，或是取得其他形式之社會資本的管道。
- 創造出在全國甚至是國際間都被承認的社區服務通行貨幣。

318 社區服務點數所面臨的一項難題是，它們到底與一般通行貨幣之間的可互通性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在美國，小布希總統擴張了志願服務的方案，讓志工能以明確的金錢價值受益，尤其是以大學獎學金的形式（請見之前的討論）。有些州推行的方案，例如明尼蘇達社區服務幣，可以在信用卡以及一般的現金卡中累積數值，而且社區服務幣也被一些商家接受，可用來部分地支付商品。例如，在美國大賣場中的一家餐廳允許你以社區服務幣來支付餐費的半價（至少在用餐尖峰時段之外是可以的）。對商家而言，這算是一種低成本的

捐獻行爲，畢竟額外的服務對他們來說只需要很低的邊際成本。

這類的模式是可以被普及化的。例如，醫院的志工或許可以在一般信用卡中累積社區服務點數、英鎊與歐元，然後可以使用它們來支付一頓早午餐的花費。或許，他們也可以用在自己的一位年輕親人身上，幫他（她）付清學費貸款；也可以用來在當地學校聘請一位諮詢顧問；用來換得博物館免費入場的許可；或乾脆用來購買在該醫院的其他照顧。

假若點數過度完全或輕易地可代換爲一般金錢的話，就存在著很大的風險，即志願服務所體現的互惠與關懷之獨特精神可能被腐蝕。另一方面，特別是對那些經濟狀況不佳但時間充裕的志工來說，使用點數購買特定商品的能力是這些方案中很重要的一項特色，需要被保存下來的是交換行爲中的關懷性質。因此，當國家支持這些方案時，爲了要保存此特質必須做的是強化關懷互惠的邏輯。一位使用這些點數來支持孫兒能接受大學教育的爺爺似乎就是合宜地在交換，但使用點數來壓低購買跑車的開銷就不是了。

創造一項當代共享的「道德性」論述

能促進陌生人及朋友間合作的共享認識也是社會運轉的動力與讓它能生氣蓬勃的因素。這類認識包括「不可殺人」(Thou shall not murder；譯註：作者應暗指聖經中的十誡)，乃至於在電扶梯上必須靠右站立。但這類規範從何而生？

偶爾，我們可能見證一項有益社會運作之行爲的嶄新集體規範發展出來，像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警示燈來警告其他駕駛「前有危險」。心理學研究緊急情況的成果裡，已有個針對這個現象所進行的精巧微觀例證 (Latane and Darley, 1976)。當一群人面對一個模擬兩可的情境，在其中應如何舉措方向不明時，他們會暗中地觀察其他人以尋找行動的線索。心理學者觀察到，當一群人坐在一個煙霧繚繞的房間時，每個人彷彿都不覺得有什麼異常，沒有人要求幫忙，也沒有人大喊「失火了」，這全是因爲他們都注意到了其他人並不驚慌，因此不可能是緊急事件！這真是令人難以致信，研究發現實驗設計中包含的人數愈多（像是以八個人來代替僅有二、三個人）任何一個人介入的可能性就愈小。同樣地，研究也顯示一旦有人以特定方式行動（例如破壞一台車子），隨後就會有其他人很快地有樣學樣。

此研究成果的一項寓意就是社會規範；對於什麼構成了可接受或合宜的行爲認識；甚至是目前情境爲何的定義，都是由那些在場者或其他人提供的暗示

之中去「協調」的。這一點尤其可適用在新的不熟悉情境。社會規範並不會無中生有，而是演變出來、協調出來的，一般都必須經歷漫長的時間。

傳統上來說，宗教社群是許多這種論述的棲居地，但今天已愈來愈常見於政治的場域以及大眾媒體上。它是一項圍繞在種種文化模糊性而進行的活動。西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自由主義與較個人主義式的傳統，讓我們懷疑政治人物或其他領袖闡述的種種道德應然願景。我們更進一步該思考的是，在當代社會中這類的辯論與論述應如何、在何處可以產生，並且要如何才能促進之。

- 各個社會及社群需要去思考，什麼類型的討論場合是在 21 世紀中最適宜用來商議共享的道德及行為習慣，並對此達成協議的。
- 利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來進行公共決策審議式論壇，包括在政府最高層級內，是值得更廣泛考量的形式。這些論壇進行的程序包括將民眾中隨機抽樣選出的人員集合在一起，通常約 100 人以上，向他們報告爭辯之議題的兩造之論點，最後讓他們投票表決來決定政策的走向。審議式投票不論在歐洲或美國（事實上，在此所有審議式民主都是接受媒體委託而進行的）都已顯示參與者能達到對複雜議題（包括政府預算）進行理性判斷的程度。¹⁷
- 肥皂劇與其他通俗媒體秀在審議與發掘社會及道德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政府與有共同利益的團體已經以某些形式施壓，希望他們所關切的問題也能在這類節目中播送，像是毒品、墮胎等。或許這個過程還得讓更多的民眾參與，而節目製作人也有義務在探索難有結論且重要的議題之後，允許有公共辯論的播送時間。在兩者相互妥協下，可能存在著一些輕微的政府保護措施，這主要是透過一個小團體來管控主要頻道內容進行。或許，經驗共享本身（擁有一個特定節目是大部分的人民都會收看的）跟分享的內容一樣地重要。如果對話者都有管道取得相同經驗的話，要開啓對話就會容易得多。¹⁸

320

¹⁷ 同樣地，有個能在 2100 年發展出的細緻、永續且可欲的美國共享願景之創意練習，作出了這個結論，即它將體現出一個徹底被強化的「強民主」來（Farley and Costanza, 2002）。

¹⁸ 例如，像 *Big Brother* 這類節目已在許多國家被模仿。它不只常吸引大量的觀眾，同時也得到許多媒體評論人的廣泛關注，並在國內各工作場所、學校與家裡引發熱烈的討論。雖然在某個層面上看來是十分俗氣，但這類評論（特別當它們在更廣闊迴響的光照下得到修正後）將成爲一個社會在其中能達成何爲可接受行爲之共識的論壇。常常欺騙的行爲會被貶視，而他人的行爲也會冷靜地受到尊重。有時即使是評論者本身都會被抨擊，而且當他人持不同見解時，必須更改自己的立場。在這場談話的所有過程當中，社會正針對什麼構成了可接受的行爲，在與自身協調，澄清自己的位置。

- 一般常見的方法，例如公民教育或普遍的教育，在擴展人民對自己團體的觀感、激發架接性社會資本、共享的認識與減少衝突上（請見以上的討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這些方法亦需要加以散布、流通開來。當我們在學校教授數學、科學與英文時，課程與內容大多是由上而下制定好的，並且對何謂「正確答案」有著相當明確的概念。但這並不需要應用到公民身分上。或許，學校公民課程裡很重要的一環應該包括來自其他學生認定為正確或錯誤的回饋，同時也應該包括由學生組織進行的調查與討論，回饋到持續辯論上的清楚意識。

促使相互尊重得以產生

互惠、信任及大多數的社會資本形式都極仰賴於相互尊重。從微觀到鉅觀層面，假使少了相互尊重的基礎，正向社會關係都不可能發展出來。地位的差異之所以有可能摧毀社會資本，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會破壞尊重，許多廠商及一些公部門已經學會這個教訓，如今它們跳脫了過度階序化的控制體系，取而代之的是打造團隊合作的氛圍與平等的傾向（請一併參考第八章）。

可能的政策意涵如下：

- 打破通往相互尊重的障礙以建立信任（有時就是字面上所說的障礙，例如福利津貼辦公室、醫院、銀行櫃台中擋板）。物理上的障礙經常傳達一個訊息，即位在擋板另一側的人是很危險且不能信任的，而且讓服務人員維持著疏遠且冷漠的態度。在這類隔離中，身體上的保護常常成爲了一個藉口而非理由。
- 更廣泛地使用一些機制，讓政治與企業領袖能直接接觸一般民眾的觀點，像是透過「公民陪審團」的方式。公民評審委員會（citizens' juries）包括將 12 位左右的一般民眾聚集在一起達一週之久，以聆聽針對特定議題的證據，並提出自己認爲應該怎麼做的意見。他們通常擁有權力宣喚專家或資深人士來提供證據。在英國，一般認爲每五個地方代表委員會中就有一個是使用公民陪審團，且成效非常好，雖然在更高層級的政府裡鮮少採用。非常重要是公民評審委員會與其他類似的機制都試圖與廣大的民眾溝通，政府聆聽他們的聲音，且關心那些「像我一樣的人」，也就是「一般」人。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審議式投票中（請見之前的討論）。

- 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信任他們並賦予更多的責任，包括降低投票的年齡門檻（請見之前的討論）。年輕人在更期待自己擁有更多個人自主性的同時，卻在政治參與度上有了劇烈的下降。研究發現一旦年輕人在某次選舉裡未投票後，往後也很有可能不再投票，也因此上述問題獲得特別的關注。有項回應前述矛盾的作法是傾聽年輕人的聲音，信任他們並賦予更多的責任，像是降低投票的年齡門檻至 16 歲。另一個可能的作法是發展「青年議會」，像在族群混合的英國小鎮 Bradford 已在進行的那樣。¹⁹ 如果我們要青少年對於公民資格有更深入的瞭解，還有什麼比起授予他們投票權要更能展現出對他們（以及政治人物）參與的尊重呢？針對這個構想，還有另一項有趣的調整是將投票權授予年紀更小的人民，甚至是 12 歲以上即可，但前提是要得到（或被授予）監護人或父母的信任。²⁰ 這項前提是認定了父母會與孩子討論這個議題，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雖然這不必然意味會受他們意見左右。再次，我們看到相互尊重是這個訊息裡關鍵的一環。
- 推展人權、民主與法治，讓它們在現實生活中實現。這一組價值與制度已被稱之為「世界主義式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的發展（Held, 1995），或許也預示著終極的全球型社會資本將演進發展。

322

上述構想的替代方案是確保我們都可以被含納到政治與公民參與中的一些想法。最為人所知的例證就是澳州實行的強制性投票的概念。更為激進的想法是國家應該設立所謂的「審議日」，在這些時間內，全國人民就可以花一天的時間專注於討論某些議題（事實上時間前後達二天，以便讓一些在關鍵性服務業的從業人員也能參與；Ackerman and Fishkin, 2004）。這些概念當然值得去思考，但令人擾憂的是它們較具義務的特質會在考慮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失敗。

其他能促進鉅觀社會資本的構想

有些人或許覺得上述的構想已經夠激進了，但底下還有其他的：

- 從較「理性」的地理與文化區域中積極召集出各自的運動隊伍，如此一來可

¹⁹ 類似的情況請參考 Wallerstein（2002）的報告，內容提及了新墨西哥州一項賦權青年計畫的正面成效。

²⁰ 這個構想乃是劍橋大學歷史學者 Simon Szreter 提出，而引起我注意的。

讓特定的團體認同更加鞏固。例如，地區政府的效能與民主責信的能力變異非常大，很大的原因是只有一些地區擁有具意義的地區性認同。像在西班牙或英國，有些地區性政府機關擁有強大的民選議會，有些地區政府機關則很低調且未有民選基礎，它們僅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已。這也製造出國會的問題，因為裡頭有些地區可以針對一些對自己無直接影響，但對其他地區有影響的議題去投票表決。由於運動隊伍能創造出強而有力的歸屬，地區性隊伍可能可以加速較為平等且普及的民主責信能力的產生。或許，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超國家的結構上。也許組成一支歐洲足球聯隊來對抗美洲聯隊，比起在布魯塞爾的官僚體制（譯註：即指歐盟議會，其總部設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更有助於孕育歐洲民主的肥沃土壤？

- 經由集體及審議的方式參與人類有願景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有潛力去改變我們看待自己與他人的方式。戰爭是很經典且負面的例子，但正面的例子也不少。當我們看到從外太空看地球、火星上的登陸車拍下的、透過哈伯望遠鏡看到的遙遠銀河系，或地球遠古的奇異生物等影像時，它往往能將我們的地方認同與爭議轉移到人類一致團結的共同認同上。我們很難知道要有多少這類認同上的轉移才能避免戰爭與衝突，但從「這類宏大的集體任務是我們融鑄一個更為全球性的認同所僅有的機制之一」來看，它們確實是值得花錢的刀口。

323

結論

本章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能做什麼來創造社會資本嗎」。即使有人質疑這裡所提出的某些建議，針對這個問題的整體回應仍是毫無遲疑的「是的」。

很強且明確的理由讓我們將社會資本的思維應用在各種政策的制定上。這種應用並非不會受到批評，社會資本取徑已因為範圍太廣的缺點而被批評，包括試圖建立一個「無成本」的重分配方式 (Mohan and Mohan, 2002)、與女權之間的張力，尤其在發展中國家 (Molyneux, 2002)。當然，並非所有形式的社會資本都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再者，也應該運用維他命模型。尤其，狹隘地把焦點集中在愈來愈增加的社區黏著性社會資本假使未有其他架接性或連結性社會資本加進來均衡的話，可能會帶來顯著負面的外部性（像是團體之間的衝

突；強化社會區隔；有時會使個人身陷貧困的泥沼)。

最後，一個很實際的政策問題是政府是否需要一個明確的「社會資本策略」。雖然有些政策制定者視打造社會資本或「公民再造」本身為一項重要的目標 (Blunkett, 2001)，但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對社會資本的興趣都是做為其他政策目標的手段，像減低犯罪或提高教育表現。這個普遍但有限的興趣導致許多政府各部會都著力於這個議題，有時抱持著相互衝突的旨趣，有時是在推動成效矛盾的政策。往往所有個別部會都無法達到議程中的最終目標，即使它們對政策的總體衝擊是很大的。它也往往會導致不斷重覆進行傳統形式社會資本的努力，像透過社區再造計畫，然而更具創意的構想卻常被忽視。這些考量告訴我們，圍繞在傳統政策分類：健康、犯罪、福利、經濟發展等等，組織起來的政府，不論在地方或全國層級上，都需要發展出有清楚主責劃分的明確社會資本策略。

324

社會資本應該被視為給予政策制定者一根有用的扳手，可改變社區與社會組構的性質與重要性，它也是一個有用的創見資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政策施力點。我們可以帶著夢想地這麼認為，未來的學術與政策發展將改善在此呈現的構想。或許有些構想是無效的；或許，有些聽來很古怪的構想卻是效果奇佳。然而，我最信心滿滿的一點是這個概念、這些構想以及它所促發的議題在未來數十年間，仍將是重要且不斷被討論的。

社會資本對我們的個人生活安適與否、我們的經濟、我們社會十分要緊，因為我們是扎扎实實的社會性存在，它深植在我們的血與肉之內，不管是在概念上或實際日常生活中。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政策與辯論勢必顯得淺陋、毫無說明力。社會資本當然還是會繼續存在。

進階閱讀

想要得知在美國脈絡下政策發展的朋友可以參考以下這些有用的資源：仙人掌專

題討論會議的出版品，你可以在 www.ksg.harvard.edu/saguaro 找到它們。這場會議的重要結論被摘錄在普特南（2000）的最後一章。另外，普特南與 Feldstein（2003）中可發現有趣且能激勵我們的個案研究，其中講述著打造社會資本的成功案例。在 www.usafreedomcorps.gov 或 www.americorps.org 上都可看到小布希的志願服務方案細節。

在 OECD 的這份報告（2001a）之後，我們可以預期它還會跟進且發表成果。或許得花上一些時間，但 OECD 通常會出版一些有趣的報告，其中會蒐羅各個國家的政策發展情況，並歸納出較一般性的教訓與分析。同樣值得一看的是 OECD 報告作者群之一的 Tom Healey 近來應愛爾蘭政府之請所寫出的概要性報告（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2003）。報告中充滿著許多在愛爾蘭實際應用的政策與資料，但也記下了許多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構想，以及一套有用的相關詞彙彙編表。

至於英國，讀者或許可以選擇 Aldridge 與 Halpern（2002），雖然這份文獻與之前的討論有不少重覆之處。在寫作的同時，英國內政部與副首相辦公室都針對了公民再造與社區再生的議題起草政策走向的論文。

想瞭解非 OECD 國家情況的讀者，從世界銀行的網站開始是個明智的選擇：www.worldbank.org，你只需要鍵入你在這個社會資本連結中最感興趣的國家即可。

325

最後，我推薦 David Held 關於《世界主義式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發展的著作，像 Held（1995），這麼做並不是基於他曾是我的編輯的關係。社會資本的議程常常會換變成傳統社群的議程，以全球的維度來思考這些議題，能提升我們的心智，同時讓我們在思考「該往哪裡去」時，給予我們一個既實際而且又正向的觀點。

參考書目

- Abbott, S. (2002) Prescribing welfare benefits advice in primary care: is it a health intervention, and if so, what sort?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edicine*, 24(4): 307–12.
- Ackerman, B. and Fishkin, J. (2004)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dams, D. (2002) Poverty: a precarious public policy id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1(4): 89–98.
- Ader, R. and Cohen, N. (1975) Behaviourally conditioned immunosuppress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7: 333–40.
- Aguilera, M. B. (2002)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00 Social Capital Benchmark Surve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3(3): 853–74.
- Aguilera, M. B. (2003) The impact of the worker: how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nfluence the job tenure of formerly undocumented Mexican immigra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3(1): 52–83.
- Ahern, B. (2001) Social capital: lessons for public policy development. Speech by an Taoiseach, Mr Bertie Ahern TD, at a seminar on social capital, Dublin, 29 March. <http://www.ex.ac.uk/shipss/politics/research/socialcapital/other/ahern.doc>.
- Ainsworth, J. W. (2002) Why does it take a village? The mediation of neighbourhood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Social Forces*, 81(1): 117–52.
- Aitchison, A. and Hodgkinson, J. (2003) Patterns of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Simmons, J. and Dodd, T. (eds)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2/2003*. London: Home Office.

- Aldridge, S. (2001) Social mobility.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www.number-10.gov.uk
- Aldridge, S. and Halpern, D. S. (2002) Social capital: a discussion paper.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www.strategy.gov.uk
- Alesina, A., Glaser, E. and Sacerdote, B. (2001) *Why Doesn't the U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tate?*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1933. post.economics.harvard.edu/hier/2001papers/HIER1933.pdf
-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 Anand, V., Glick, W. H. and Manz, C. C. (2002) Thriving on the knowledge of outsiders: tapping organisational social capit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6(1): 87–101.
- Anderson, A. R. and Jack, S. L. (2002) The artic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a glue or lubric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4(3): 193–210.
- Andrews, G. (1997) The inclusive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EXUS stakeholder and social inclusion group.
- Anheier, H. and Kendall, J. (2002)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xamining three approach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3): 343–63.
- Annen, K. (2003) Social capital, inclusive network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50(4): 449–63.
- Araujo, L., Bowey, J. and Eastern, G. (1998) Social capital, industr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Halinen-Kaila, A. and Nummela, 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MP Annual Conferenc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s: Visions for the Future*, Vol. 1: Competitive Papers: 55–83.
- Argyle, M. (1987)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London: Methuen.
- Ashford, S. and Timms, N. (1992) *What Europe Thinks: A Study of Western European Values*. Dartmouth: Aldershot.
- Astone, N. M., Nathanson, C. A., Schoen, R. and Kim, Y. J. (1999) Family demography, soci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in social capit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1): 1–31.
- Au, K. Y. and Fukuda, J. (2002)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urs of expatriat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4): 285–96.
- Autiero, G. (2000) Market functioning and social rules. *Economic Analysis*, 3(1): 49–65.
-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Axelrod, R., Riolo, R. L. and Cohen, M. D. (2002) Beyond geography: cooperation with persistent links in the absence of clustered neighborhoo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4): 341–6.
- Aye, M., Champagne, F. and Contandriopoulos, A. P. (2002) Economic role of solidar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accessing modern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the Ivory Coas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11): 1929–46.
- Azam, J. P., Fosu, A. and Ndung'u, N. S. (2002) Explaining slow growth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14(2): 177–220.
- Bankston, C. L. and Zhou, M. (1995) Effects of minority-language literacy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Vietnamese youths in New Orlea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8(1): 1–17.

- Bankston, C. L. and Zhou, M. (2002) Social capital as a process: the meanings and problems of a theoretical metaphor. *Sociological Inquiry*, 72(2): 285–317.
- Bard, M. and Sangrey, D. (1979) *The Crime Victim's Book*. New York: Basic Books.
- Bard, M. and Sangrey, D. (1986) *The Crime Victim's Book* (2nd edition). New York: Brunner/Mazel.
- Barker, D. G. (1991) Changing social values i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Unexpected Europ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5 Novemb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Barker, R. G. (1968) *Ecological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u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H. W. and Crawford, R. G. (1986) Relationships: the lubricant of Asian market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east Asia, June.
- Baron, S., Field, J. and Schuller, T. (2000)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on, R. A. and Markman, G. D. (2003) Beyond social capital: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social competence in their financial suc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1): 41–60.
- Barsness, Z. I. (1997) The impact of contingent workers on group effectiveness: a process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composition and group effectivenes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7(11-A):4816.
- Barton, A. (2000) A tale of two project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wo Neighborhood Watch schemes in South Wales.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3): 7–16.
- Bassuk, S., Glass, T. and Berkman, L. (1999) Social disengagement and incid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rson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31: 165–73.
- Baum, A. and Davis, G. E. (1980) Reducing the stress of high-density living: an 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3): 471–81.
- Baum, A. and Valins, S. (1977)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Behaviour: Psychosocial Studies of Social Density*. Hillsdale NJ: Erlbaum Associates.
- Baum, A., Revenson, T. A. and Singer, J. E. (2001) (eds) *Handbook of Health Psychology*. Mahurak, NJ: Erlbaum Associates.
- Baum, A., Singer, J. E. and Baum, C. S. (1982) Stres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Evans, G. W. (ed.) *Environmental St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m, F. (1999) Social capital: is it good for your health? Issues for a public health agend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3(4): 195–6.
- Baum, F. and Palmer, C. (2002) 'Opportunity structures': urban landscape,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Australia.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7(4): 351–61.
- Baum, F. E., Bush, R. A., Modra, C. C., Murray, C. J., Cox, E. M., Alexander, K. M., and Potter, R. C., (2000) Epidemiology of participation: an Australian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4(6): 414–23.

- Baumrind, D. (1973) Will a day care center be a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Young Children*, 28(3): 154-69.
- Baumrind, D. (1989) Rearing competent children. In Damon, W. (ed.) *Child Development Today and Tomorrow*. Jossey-Bas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Seri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Pfeiffer.
- Beattie, J. M. (1984) Violenc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Doobar, A. and Greenspan, E. (eds) *Perspectives in Criminal Law*. Amora: Canada Law Book.
- Bebbington, A. (2002) Sharp knives and blunt instruments: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studies. *Antipode*, 34(4): 800-3.
- Bell, K. and Chen, S. (2002) *An Experience Year for All*. London: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 Belle, D. (1982) *Lives in Stress: Women and Depression*. Beverly Hills: Sage.
- Belle, D. (1987)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moderators of stress. In Barnett, R. C., Biener, L. and Baruch, G. K. (eds) *Gender and Stress*. New York: Free Press.
- Bennett, T. (1988) An assessment of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Neighbourhood Watch in London.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7(4): 241-255.
- Berger-Schmitt, R. (2002) Social cohesion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as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for an enlarged union. *Sociologicky Casopis*, 38(6): 721-48.
- Berkman, L. F. and Glass, T. (2000)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In Berkman, L. F. and Kawachi, I. (eds) *Social Epidem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kman, L. F. and Kawachi, I. (2000) (eds) *Social Epidem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kman, L. F. and Syme, S. L. (1979) Social networks, host resistance and mortality: a nine-year follow-up study of Alameda County resi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09: 186-204.
- Berkman, L. F., Summers, L. and Horwotz, R. I. (1992). Emotional support and survival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17: 1003-9.
- Berry, J. M., Portney, K. E. and Thomson, K. (1993) *The Rebirth of Urb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etts, J. R. (1995) Does school quality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7(2): 231-50.
- Bevis, C. and Nutter, J. B. (1977) Changing street layouts to reduce residential burglary.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Cited in Mayo, J. M. (1979) Effects of street forms on suburban neighboring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11(3): 375-97.
- Bianchi, S. M. and Robinson, J. (1997) What did you do today? Children's use of time, family composi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2): 332-44.
- Bjarnason, T. and Sigfusdottir, I. D. (2002) Nordic impact: article productivity and citation patterns in sixteen Nordic sociology departments. *Acta Sociologica*, 45(4): 253-67.

- Blair, T. (1998) *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London: Fabian Society.
- Blanchard, A. (1998) Virtual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6(3): 293–307.
- Blaney, P. H. and Ganellen, R. J. (1990) Hardiness and social support. In Sarason, B. R., Sarason, I. G. et al. (eds)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Oxford: John Wiley.
- Blazer, D. G. (1982) Social support and mortality in an elderly community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15: 684–94.
- Blokland, T. (2002) Neighbourhood social capital: does an urban gentry help? Some stories of defining shared interes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mutual suppor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7(3): U29–U54.
- Blomberg, T., Maier, K. D. and Yeisley, M. (1998) (eds) Democracy,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8(3–4): 189–327.
- Blunkett, D. (2001) *Politics and Progress: Renewing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Politico's Publishing.
- Boix, C. and Posner, D. N. (1995) Making social capital work: a review of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Draft review.
- Boix, C. and Posner, D. N. (1998) Social capital: explaining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686–93.
- Bolino, M. C., Turnley, W. H. and Bloodgood, J. M. (2002) Citizenship behaviour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s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4): 505–22.
- Borcherding, T. and Filson, D. (2002) Group consumption, free riding, and informal reciprocity agree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47(3): 237–57.
- Borgida, E., Sullivan, J. L., Oxendine, A., Jackson, M. S., Riedel, E. and Gangl, A. (2002) Civic culture meet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role of community electronic network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1): 125–41.
- Bornschiefer, V. (1989) Legitimac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success at the core of the world system: an exploratory stud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215–30.
- Bothwell, S. and Weissman, M. M. (1977) Social impairments four years after an acute depressive episod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7: 231–7.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Bowles, S. and Gintis, H.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Economic Journal*, 112(483): F419–F436.
- Bowling, A., Banister, D., Sutton, S., Evans, O. and Windsor, J. (2002)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ge.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6(4): 355–71.

- Boxman, E. A. W., de Graaf, P. M. and Flap, H. D. (1991)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on the income attainment of Dutch managers. *Social Networks*, 13: S.51–73.
- Bradley, S. and Taylor, J. (1998) The effect of school size on exam performance in secondary school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3): 291.
-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ithwaite, J. (1993) Shame and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 1–17.
- Brannigan, A., Gemmell, W., Pevalin, D. J. and Wade, T. J. (2002) Self-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ldhood misconduct and aggression: the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hyperactivity, and hostile parenting.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4(2): 119–42.
- Brehm, J. and Rahn, W.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999–1023.
- Brinton, M. (2000) Social capital in the Japanese youth labour market: labour market policy, schools, and norms. *Policy Sciences*, 33(3–4): 289–306.
- Britten, J. R. (1977) *What is a Satisfactory House? A Report of Some Households' Views*. Watford: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 Broadbent, J. P.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labor politics in Japan: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Policy Sciences*, 33(3–4): 307–21.
- Brown, D., Dickens, R., Gregg, P., Machin, S. and Manning, A. (2001) *Everything Under a Fiver: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n Lower Paying Labour Markets*.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Brown, D. W. and Konrad, A. M. (2001) Granovetter was right: the importance of weak ties to a contemporary job search. *Group and Organisation Management*, 26(4): 434–62.
- Brown, G. (2004) Civic renewal in Britain. Speech by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Gordon Brown, at the NCVO Annual Conference. <http://www.ncvo-vol.org.uk>
- Brown, G. and Harris, T. (1978) *Social Origins of Depression*. London: Tavistock.
- Bruhn, J. G. and Wolf, S. (1979) *The Roseto Sto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Bruni, L. and Sugden, R. (2000) Moral canals: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work of Hume, Smith and Genovesi.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6(1): 21–45.
- Bruyn, S. T. (1999) The moral econom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7(1): 25–46.
- Bryk, A. S., Lee, V. E. and Holland, P. B. (1993) *Catholic Schools and the Common Go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ck, N. (2001) Identifying neighbourhood effects and cultural exclusion. *Urban Studies*, 39(S): 85–93.
- Buckland, J. and Rahman, M. (1999)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management during the 1997 Red River Flood in Canada. *Disasters*, 23(2): 174–91.
- Bulmer, M. (1986) *Neighbours: The Work of Philip Abr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chell, B. (1994) Who is affected by unemployment? Job insecurity and labour market influence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Gallie, D., Marsh, C.

- and Vogler, C. (eds) *Social Change and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chell, B. (1999)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job insecurity, 1966–8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3(3): 437–58.
- Burrough, B. and Helyar, J. (1991) *Barbarians at the Gate: The Fall of RJR Nabisco*. New York: Harper.
- Burt, R. S. (1999) The social capital of opinion leade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6: 37–54.
- Burt, R. S. (2002) Bridge decay. *Social Networks*, 24(4): 333–63.
- Burtless, G. (1996) *Does Money Matter? The Effect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Adult Succe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urton, L. and Williams, T. (2001) This bird has flown: the uncertain fate of wildlife on closed military bases.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41(4): 885–917.
- Busfield, J. (1996) *Men, Women and Madness: Understanding Gender and Mental Disord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 Bush, G. W. (2002)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ww.whitehouse.gov
- Bynner, J. and Egerton, M. (2001) *The Wider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Report 01/46.
- Bynner, J. and Parsons, S. (2002)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the case of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ur*, 60(2): 289–309.
- Cabinet Office Strategy Unit (2002)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terim analytical report. www.number-10.gov.uk/files/pdf/interim.pdf
- Camerer, C. and Thaler, R. H. (1995) Anomalies: ultimatums, dictators, and mann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 209–20.
- Campbell, A., Converse, P. and Rodgers, W. L. (1976) (eds)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aplow, T. and Forman, R. (1950)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 a homogeneous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357–66.
- Carbonaro, W. J. (1999) Opening the debate on closure and school outcomes: comment on Morgan and Sorens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5): 682–6.
- Card, D. and Krueger, A. B. (1992) Does school quality matter?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1): 1–40.
- Card, D. and Krueger, A. B. (1998) School resources and student outcom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9: 39–53.
- Case, R. B., Moss, A. J., Case, N., McDermott, M. and Eberly, S. (1992) Living alone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mpact on progno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7(4): 515–19.
- Casey, T. (2003) *The Social Context of Economic Change in Britain: Between Policy and Perform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spi, A., Entner-Wright, B. R., Moffit, T. E. and Silva, P. A. (1998) Early failure in the labour market: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predictor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3): 424–51.
- Chance, M. and Jolly, C. (1970) *Social Groups of Monkeys, Apes and Men*. London: Jonathan Cape.

- Charlesworth, S. J. (2000) *A Phenomenology of Working Class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se, R. S. (2002) Supporting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impact of the Armenian Social Investment Fun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6(2): 219–40.
- Chen, N. (2004) Intra-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y do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3(1): 93–118.
- Chen, X. (2000) Both glue and lubricant: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al capital as a source of Asia-Pacific subregionalism. *Policy Sciences*, 33(3–4): 269–87.
- Cigler, A. and Joslyn, M. R. (2002) The extensiveness of group membe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n political tolerance attitud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5(1): 7–25.
- CIRCL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2003) *The Civic Mission of Schools*. New York: CIRCLE and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civicyouth.org/research/areas/civicmissionofschools.htm
- Clague, C. (1997)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lague, C. (e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Governance in Less-Developed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laibourn, M. P. and Martin, P. S. (2000) Trusting and joining?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ciprocal nature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Behaviour*, 22(4): 267–91.
- Clark, A. E. and Oswald, A. J. (2002) A simple statis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how life events affect happ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1(6): 1139–44.
- Clausen, C. and Olsen, P. (2000)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k: a case study in a Danish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plant.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2(1): 59–74.
- Cohen, S. and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310–57.
- Cohen, S., Doyle, W. J., Soner, D. P., Rabin, B. S. and Gwaltney, J. M. (1997) Social ti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7: 1940–4.
- Colby, A., James, J. B. and Hart, D.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nd Competence through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eman, J. S.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S95–S120.
- Collier, P. (2000) Ethnici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2(4): 225–45.
- Collier, P. and Gunning, J. W. (1999) *The Microeconomics of African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ommission on Citizenship (1990) *Encouraging Citizenship*. London: HMSO.
- Cooke, P. and Wills, D. (1999) Small firm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innovation programm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3: 219–34.
- Costa, P. T. and McCrae, R. R. (1988) Personality in adulthood: a six-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f-reports and spouse ratings on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5): 853–63.
- Cottrell, J. S. (1976) The competent community. In Kaplan, B. H., Wilson, R. N. and Leighton, A. A. (eds) *Further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ulthard, M., Walker, A. and Morgan, A. (2002)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ir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Results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Module of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0*.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HMSO.
- Coumarelos, C. and Allen, J. (1996) Predic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1996 women's safety survey. *Crime and Justice Bulletin*, 42. Sydney: New South Wales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 Couse, R.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16(4): 386–405.
- Couto, R. A. and Guthrie, C. S. (1999) *Making Democracy Work Bette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ovey, H. C., Menard, S. W. and Franzese, R. J. (1997) *Juvenile Gangs* (2nd ed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Cox, E. (1995) A truly civil society. Boyer Lectures 1995. Sydney: ABC Books.
- Cox, E. (2002) Australia, making the lucky country. In Putnam, R. B.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ok, T., Raskin, A. and Elliot, J. (1981)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adult dep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52(3): 950–7.
- Cross, R. and Prusak, L. (2002) The people who make organisations go-or-sto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0(6): 104.
- Crutchfield, R. D., Geerken, M. R. and Gove, W. R. (1982) Crime rat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metropolitan mobility. *Criminolog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3sup4): 467–78.
- Crystal, D. S. and DeBell, M. (2002) Sources of civic orientation among American youth: trust, religious valuation, and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3(1): 113–32.
- Currie, D. (1996) Prospects and strategies for UK economic growth. In Halpern, D. S., Wood, S., White, S. and Cameron, G. (eds) *Options of Britain: A Strategic Policy Review*. Dartmouth: Aldershot.
- Curry, G. D. and Decker, S. H. (2003) *Confronting Gangs: Crime and Community* (2nd edn). Los Angeles: Roxbury.
- Cusack, T. R. (1999)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man local gover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5(1): 1–34.
- Cuoto, R. A. (1999) *Making Democracy Work Better: Mediating Structure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emocratic Prospect*.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Dalgleish, T., Joseph, S., Thrasher, S., Tranah, T. and Yule, W. (1996) Crisis support following the 'Herald of Free Enterprise' disaster: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833-46.
- Dalton, R. J. (1998)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In Norris, P.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ly, M. C., Duncan, G. J., Kaplan, G. A. and Lynch, J. W. (1998) Macro-to-micro link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Milbank Quarterly*, 76(3): 315-39.
- Dasgupta, P. (199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capital.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ambridge.
- Dasgupta, P. and Serageldin, I. (2000)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avies, W. (2003) *You Don't Know Me, but . . . :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Software*. London: Work Foundation.
- De Hart, J. and Dekker, P. (1999) Civic engagement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Netherlands: a Putnamian analysis. In Van Deth, J., Maraffi, M., Newton, K. and Whiteley, P. (eds)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 De Mello, L. (2000) Ca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trengthen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 De Souza Briggs, X. (1998) Doing democracy up close: cultur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in community building.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8: 1-13.
- De Tocqueville, A. ([1840] 1969 trans.)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New York: Doubleday.
- De Uizurrún, L. M. D. (2002)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note on the problems of measure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30(3): 497-523.
- DeFilippis, J. (2001). The myth of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Housing Policy Debate*, 12(4): 781-806.
- DeFilippis, J. (2002) Symposium on social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Antipode*, 34(4): 790-5.
- Defty, N. and Fitz-Gibbon, C. (2002) *Underaspirers: How Can We Help Them?*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Centre Research Report, University of Durham.
- Del Favero, M. (2003) Faculty-administrator relationships as integral to high-performing governance systems: new frameworks for study.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46(7): 902-22.
- Delhey, J. and Newton, K. (2002)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 in Seven Nations*. Berl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http://skylla.wz-berlin.de/pdf/2002/iii02-402.pdf>
- Della Porta, D. and Andretta, M. (2002)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ontaneous citizens' committees in Flo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2): 244.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0) *National Service Framework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 Desforges, C. and Abouchar, A. (2003)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Support and Family Education on Pupil Achievement and Adju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DfES Research Report 433. London: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 Desimone, L. (1997)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 involvement and locus of control to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an analysis of racial/ethnic and income difference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7(12-A): 5109.
- Desimone, L. (1999). Linking parent involvement with student achievement: do race and income matter?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3: 11–30.
- Dhanani, S. and Islam, I. (2002)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a period of crisis: the case of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30(7): 1211–31.
- Dhesi, A. S. (2001) Factors influencing post-school choice: some data from Ind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47(3): 451–72.
- Diamond, J. (1996)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 Diener, E., Sandvik, E., Seidlitz, L. and Diener, M. (199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8: 195–223.
- Dika, S. L. and Singh, K. (2002) Ap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a critical synthe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2(1): 31–60.
- DiPasquale, D. and Glaeser, E. L. (1998) *Incentives and Social Capital: Are Homeowners Better Citize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363.
- Dishion, T. J., McCord, J. and Poulin, F. (1999) When interventions harm: peer groups and problem behaviou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9): 755–94.
- DoE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991) *Policy Appraisal and the Environment: A Guide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London: HMSO.
- Doebler, M. K. (1999) Successful outcomes for rural young women: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9(8-A): 2867.
- Donalson, T. and Dunfee, T. W. (1999) When ethics travel: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global business ethic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1(4): 45–63.
- Donkin, R. and Lewis, C. (1998) Tim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individual: winning back employees' trust should be a top management priority. *Financial Times*, 21 January.
- Donovan, N. and Halpern, D. S. (2003) Life satisfaction: the state of knowledge and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www.pm.gov.uk
- Douglas, F. (1855)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New York: Miller, Orton and Mulligan. <http://docsouth.unc.edu/neh/douglass55/douglass55.html#p143>
- Drayton, W. (2000) Secret gardens. *Atlantic Monthly Company*, 285(6): 108–11. www.theatlantic.com/issues/2000/06/drayton.htm
- Dressler, W. W. and Badger, L. W. (1985)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black communiti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order*, 173: 212–20.

- Drogosz, K. M., Litan, R. E. and Dionne, E. J. (2003) *United We Serve: National Service and the Future of Citizenshi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Durkheim, E. ([1893] 196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Durkheim, E. ([1897] 1951) *Suicide*. Trans. J. A. Spalding. Toronto: Free Press/Collier-Macmillan.
- Durlauf, S. N. (2002) Bowling alone: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47(3): 259–73.
- Dworkin, J. B., Larson, R. and Hansen, D. (2003) Adolescents' accounts of growth experiences in youth activit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2(1): 17–26.
- Eby, L. T. (2001) The boundaryless career experiences of mobile spouses in dual-earner marriages. *Group and Organisational Management*, 26(3): 343–68.
- Edwards, B. and Foley, M. W. (1998)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capital beyond Putnam.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42(1): 124–39.
- Egeland, J. A. and Hostetter, A. M. (1983) Amish study: 1. Affective disorders among the Amish, 1976–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56–61.
- Egerton, M. (2002a) Higher educ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4): 603–20.
- Egerton, M. (2002b) Family transmission of social capital: differences by social class, education and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7(3): U133–U155.
- Egolf, B., Lasker, J., Wolf, S. and Potvin, L. (1992) The Roseto effect: a 50-year comparison of mortality r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2: 1089–92.
- Eisner, M. (2001) Modernization, self-control and lethal violence: the long-term dynamics of European homicide rat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4): 618–38.
- Eisner, M. (2002) Crime, problem drinking, and drug use: patterns of problem behavior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80: 201–25.
- Eitle, T. M., and Eitle, D. J. (2002)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ducation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2): 123–46.
- Engels, F. ([c.1844] 1969)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Frogmore: Panther.
- Engstrand, A. K. and Stam, E. (2002) Embeddednes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wo region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23(3): 357–88.
- Esping-Anderson, G. (2003) Why no socialism anywhere? A reply to Alex Hicks and Lane Kenworth. *Socio-Economic Review*, 1(1): 63–70.
- Evans, P. (1996)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World Development*, 24(6): 1119–32.
- Evans, M. and Fletcher, D. J. (1998) Residential burglary within an affluent housing a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sk, Security and Crime Prevention*, 3(3): 181–91.
- Fabrigoule, C., Letenneur, L., Dartigues, J., Zarrouk, M., Commenges, D. and Barberger-Gateau, P. (1995) Socia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nd risk of demen-

- tia: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merican Geriatric Society*, 43: 485–90.
- Fafchamps, M. and Minten, B. (2002) Returns to social network capital among trader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54(2): 173–206.
- Fang, J., Mahavan, S., Bosworth, W. and Alderman, M. H. (1998)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mortality in New York c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7: 469–76.
- Faris, R. E. and Dunham, H. W. (1939) *Mental Disorders in Urban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rley, J. and Costanza, R. (2002) Envisioning shared goals for humanity: a detailed, shared vision of a sustainable and desirable USA in 2100. *Ecological Economics*, 43(2–3): 245–59.
- Farrington, D. P. (1986) Age and crime. In Tonry, M. and Morris, N.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 V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rrington, D. P. (1992) Criminal career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4): 521–36.
- Farrington, D. P. (1994) Human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careers. In Maguire, M., Morgan, R. and Rieners, 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ulkner, D., Hough, M. and Halpern, D. S. (1996)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Halpern, D. S., Wood, S., White, S. and Cameron, G. (eds) *Options for Britain: A Strategic Policy Review*. Dartmouth: Aldershot.
- Fawzy, F. I., Fawzy, N. W., Hyun, C. S. et al. (1993) Malignant melanoma: effects of an early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 coping, and affective state on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six years lat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681–9.
- Fedderke, J. and Klitgaard, R. (1998)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dicator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3): 455–89.
- Fedderke, J., De Kadt, R. and Luiz, J. (1999)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fle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8(5): 709–45.
- Feinstein, L. and Symons, J. (1999) Attainment in secondary school.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1(2): 300–21.
- Feldstein, M. and Horioka, C. (1980)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Economic Journal*, 90: 314–29.
- Fennema, M. and Tillie, J. (199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in Amsterdam: civic communities and ethnic network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5(4): 703–26.
- Ferrary, M. (2002) Regulating the structure of job qualif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ity of human capital: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apital of financial advisors in banks. *Sociologie du Travail*, 44(1): 119–30.
- Ferrary, M. (2003) Managing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life cycle by externalising the research: social network and corporate venturing in the Silicon Vall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5(1–2): 165–80.
- Ferri, E., Bynner, J. and Wadsworth, M. (2003) *Changing Britain, Changing Lives*.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S. and Back, K. W.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ne, B. (2001) *Social Capital Theory Versus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Science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Routledge.
- Fisher, C.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sher, I. (1906)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New York: Macmillan. Repr. New York: A. M. Kelley, 1965.
- Fiske, S. T. and Taylor, S. E. (1991) *Social Cognition* (2nd edn).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 Fletcher, G. and Allen, J. (2003) Perceptions of and concern about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Simmons, J. and Dodd, T. (eds)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2/2003*. London: Home Office.
- Florida, R., Cushing, R. and Gates, G.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Foley, M. W. and Edwards, B. (1999) Is it time to dis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2): 141–73.
- Forrester, D., Chatterton, M. and Pease, K. (1988) The Kirkholt burglary prevention project, Rochdale. Crime Prevention Unit: Paper 13. London: Home Office.
- Fountain, J. E. (1997) Social capital: a key enabler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Branscomb, L. M. and Keller, J. (eds)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Toward a Consensus Strategy for Federal Technology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rank, R., Gilovich, T. and Regan, D. (1993)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159–71.
- Frank, R. H. (1987) If *Homo economicus* could choose his own utility function, would he want one with a con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4): 593–604.
- Franzini, L. and Spears, W. (forthcoming)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context to inequalities in years of life lost to heart disease in Texas.
- Fraser, C. and Burchell, B. (2001) *Introducing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 Fratiglioni, L., Wang, H., Ericsson, K., Maytan, M. and Winblad, B. (2000)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occurrence of dementia: a community-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Lancet*, 355: 1315.
- Freeman, H. F. (1986)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 *Stress Medicine*, 2: 291–9.
- Freese, J. (2003) Imaginary imaginary friends? Television view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friendship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 24(1): 65–9.
- Frey, B. S. and Sutzter, A. (2000) Happiness prospers in democrac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 79–102.
- Friedman, M., Thoresen, C. E., Gill, J. J. et al. (1986) Alteration of type A behaviour and its effect on cardiac recurrences in post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summary results of the recurrent coronary prevention project. *American Heart Journal*, 112(4): 653–65.

- Fukuyama, F. (1995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Fukuyama, F. (1995b)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4(5): 89–103.
- Funk, C. L. (1998) Practicing what we preach?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interest value on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601–14.
- Furniture Resource Centre (1997) *Directing Social Fund Expenditure*. Liverpool: FRC.
- Furstenberg, F. F. and Hughes, M. E. (1995) Social capital and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mong at-risk you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580–92.
- Galbraith, J. K. (1992)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 Galea, S., Karpati, A. and Kennedy, B.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4–1993.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8): 1373–83.
- Gambetta, D. (1988)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Gamm, G. and Putnam, R. D. (n.d.) Association-building in America, 1840–1940. Unpublished paper.
- Gans, H. J.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Toronto: Macmillan.
- Gant, J., Ichniowski, C. and Shaw, K.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 in high-involvement and traditional work organis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1(2): 289–328.
- Gardner, A. M. (2002) The long haul from deregulation: truck drivers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Louisiana oilpatch. *Human Organisation*, 61(4): 390–8.
- Garland, D. (1985) *Punishment and Welfare*. Aldershot: Gower.
- Geib, P. and Pfaff, L. (2000) (eds)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5(4), special issue.
- Gerber, A. S. and Green, D. P. (2000) The effects of canvassing, telephone calls, and direct mail on voter turnout: a field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3): 653–63.
- Gilbert, L. and Walker, L. (2002) Treading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HIV/AID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 a South African case stud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4(7): 1093–110.
- Gilligan, J. (1996) *Violence: Our Deadly Epidemic and its Causes*. New York: G. P. Putnam & Sons.
- Gittell, R. and Vidal, A. (1998) *Community Organis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laeser, E. L. and Sacerdote, B. (2000)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housing.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9(1–2): 1–23.
- Glaeser, E. L., Laibson, D. and Sacerdote, B. (2002)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Journal*, 112(483): F437–F458.
- Glass, D. C. and Singer, J. E. (1972) *Urban Stress: Experiments on Noise and Social Stresso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lennester, H. (1998) Tackling poverty at its roots? Education. In Oppenheim, C. (ed.) *An Inclusive Society: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PPR.

- Gold, R., Kennedy, B., Connell, F. and Kawachi, I. (2002) Teen births,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l pathway. *Health and Place*, 8(2): 77–83.
- Goldin, C. and Katz, L. F. (1998)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 rise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America, 1910–194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439.
- Goldin, C. and Katz, L. F. (2001) The legacy of U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notes 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 18–23.
- Goldsmith, A. A. (2002)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better governance in Afric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2(1): 39–49.
- Goldthorpe, J. H., Llewellyn, C. and Payne, C.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omme, I. M. (1986) Fear of crime among Canadian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4(3): 249–58.
- Good, D. (1988) Individual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rust. In Gambetta, D.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Gopee, N. (2002)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s facilit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nursing. *Nurse Education Today*, 22(8): 608–16.
- Gotlib, I. H. and Macabe, S. B. (1990) Marriage and psychopath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In Fincham, F. D. and Bradbury, T. M. (eds) *The Psychology of Marriage: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ottfredson, M. and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dstein, M. and Justman, M. (2001)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schooling.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4(4–6): 879–90.
- Granovetter, M. (1990) The old and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In Friedland, R. and Robertson, A. F. (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 Granovetter, M. S.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Green, D. P. and Gerber, A. S. (2001) *Getting Out the Youth Vote: Results from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s*. Pew Charitable Trust. www.pewtrusts.com/pdf/pp_youth_vote.pdf
- Greenberg, S. W. and Rohe, W. M. (1984) Neighbourhood design and crime: a test of two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50(1): 48–61.
- Gregory, R. J. (1999)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maintaining ethical probity in public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9(1): 63–75.
- Grenier, P. and Wright, K. (2001)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an update and critique of Hall's analysis. Presentation at ARNOVA's 30th Annual Conference, 29 November–1 December.
- Grimes, K. (2003) To trust is human. *New Scientist*, 10 May: 32–7.

- Grisham, V. (1999) *Tupelo: Evolution of a Community*. Dayton, OH: Kettering Foundation Press.
- Grootaert, C., Oh, G. T. and Swamy, A. (2002)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1(1): 4–38.
- Grossman, G. M. (1997) Comment. In Frankell, J. A. (e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ellec, D. and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 (2001) R&D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panel data analysis of 16 OECD countries. STI Working Papers 2001/3. Paris: OECD. www.oecd.org/dataoecd/26/32/1958639.pdf
- Gunnar, M. R. and Nelson, C. A. (1994)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year-old infants: relations with emotionality and cortisol. *Child Development*, 65(1): 80–94.
- Gunnar, M. R., Tout, K., deHaan, M., Pierce, S. and Stansbury, K. (1997) Temperament, social competence and adreno cortical activity in preschoolers.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31: 65–85.
- Gunnthorsdottir, A., McCabe, K. and Smith, V. (2002) Using the Machiavelianism instrument to predict trustworthiness in a bargaining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3(1): 49–66.
- Guttman, J. M. (2000) On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of preferences for recipro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1): 31–50.
- Hadaway, C. K., Marler, P. L. and Chaves, M. (1993) What the polls don't show: a closer look at U.S. church attend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6): 741–52.
- Hagan, J. and Coleman, J. P. (2001) Returning captives of the American war on drugs: issues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re-entry. *Crime and Delinquency*, 47(3): 352–67.
- Hagan, J. and McCarthy, B. (1997) *Mean Streets: Youth Crime and Homeless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gan, J., Merkens, H. and Boehnke, K. (1995) Delinquency and disdai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tro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among East and West Berlin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4): 1028–52.
- Hagell, A. and Newburn, T. (1994) *Persistent Young Offenders*.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Hall, P. A. (1997)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Paper for Bertelsmann Stiftung Workshop on social capital, Berlin, June.
- Hall, P. A. (1999)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3): 417–61.
- Hallinan, M. T. and Kubitschek, W. N. (1999)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school social networks: comment of Morgan and Sorens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5): 687–93.
- Halpern, D. S. (1989) Active citizenship and a healthy socie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mmission on Citizenship.
- Halpern, D. S. (1992) Entry into the legal professions. Research Study No. 15, Law Society, London.
- Halpern, D. S. (1993) Minorities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6(5): 597–607.

- Halpern, D. S. (1995a) *Mental Health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More than Bricks and Mortar?*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Halpern, D. S. (1995b) Values, morals and modernity. In Rutter, M. and Smith, D. (eds) *Psychosocial Disorder in Young People: Time Trends and their Caus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Halpern, D. S. (1996) Can moral values explain cri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Causes of Crime' symposium, Edinburgh, 5 June.
- Halpern, D. S. (1997) Social capital. Nexus discussion paper.
- Halpern, D. S. (1998) Poverty,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road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 Oppenheim, C. (ed.) *An Inclusive Society: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PPR.
- Halpern, D. S. (1999) Social capital: the new golden egg? Nexus discussion paper.
- Halpern, D. S. (2001) Moral values, social trust and inequality: can values explain crim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2): 236–51.
- Halpern, D. S. and Bates, C. (2004)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changing behaviour. 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www.strategy.gov.uk/files/pdf/pr.pdf
- Halpern, D. S. and Nazroo, J. (2000) Mental health and ethnic group concentration: a confirmation of the ethnic density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46(1): 34–46.
- Halpern, D. S. and Reid, J. (1992) Effect of unexpected demolition announcement on health of resident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4: 1229–30.
- Halpern, D. S. and White, S. (1997) The principle of partitioned responsibility: a basis for a fair and efficient tax-benefit system. www.netnexus.org
- Halpern, D. S. and Wood, S. (1996)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Halpern, D. S., Wood, S., White, S. and Cameron, G. (eds) *Options for Britain: A Strategic Policy Review*. Dartmouth: Aldershot.
- Halpern, D. S., John, P. and Morris, Z. (2002) Before the citizenship order: a survey of citizenship practice in Eng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7(2): 217–28.
- Hampton, K. N. (2003) Grieving for a lost network: collective action in a wired suburb. *Information Society*, 19(5): 1–13.
- Hanifan, L. J. (1916)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cience*, 67: 130–8.
- Hanifan, L. J. (1920) *The Community Centre*. Boston: Silver, Burdette.
- Hannan, C. (1999) *Beyond Networks: 'Social Cohesion' and Unemployment Exit Rates*. Institute for Labour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99/28.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 Hanushek, E. A. (1989) Expenditure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o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2): 46–51.
- Hanushek, E. A. (1997)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an updat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2): 141–64.
- Hanushek, E. A. (1998) Conclusions and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resourc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4(1): 11–27.

- Hanushek, E. A. (2003) The failure of input-based schooling policies. *Economic Journal*, 113(485): F64–F98.
- Hao, L. and Bonstead-Bruns, M. (1998) Parent–child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3): 175–98.
- Harding, S., Phillips, D. and Fogarty, M. (1986) *Contrasting Values in Western Europe: Unity, Diversity and Chang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Hargreaves, D. H. (2000) The Production, Mediation and Us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mong Teachers and Docto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Learning Society*. Paris: OECD. 219–38.
- Hargreaves, D. H. (2001) A capital theory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7(4): 487–503.
- Harriss, J. and De Renzio, P. (1997) 'Missing link' or analytically miss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 introductory bibliographic ess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9(7): 919–37.
- Harris, T., Brown, G. W. and Robinson, R. (1999) Befriending as an intervention for chronic depression among women in an inner city. 1: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4: 219–24.
- Hart, C., Ecob, R. and Smith, G. D. (1997) People, place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facto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Scottish Heart Health Study archiv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5(6): 893–902.
- Hawthorn, G. (1988) Three ironies in trust. In Gambetta, D.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Heath, A. and Clifford, P. (1996) Class inequalities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20th century Britain. In Lee, D. and Turner, B. S. (eds) *Conflicts about Class: Debating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ism: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London: Longman.
-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 Held, D. and McGrew, A. (2000)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 In Higgott, R. and Payne, A. (ed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sation, Vol. 2*.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MA: Elgar.
- Heller, P. (1995) From class-struggle to class compromise: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a South Indian Stat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1(5): 645–72.
- Heller, P. (1996) Social capital as a product of class mobiliz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dustrial workers in Kerala,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24(6): 1055–71.
- Helliwell, J. F. (2002a)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9065.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ub. 2003 in *Economic Modelling*, 20(2): 331–60.
- Helliwell, J. F. (2002b) Measuring the width of national bord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3): 517–24.
- Helliwell, J. F. (2003) Maintaining social ties: social capital in a global information age. Keynote address to the 75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y of Tilburg, 26–8 March, on Sustainable Ti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 Helliwell, J. F. (forthcoming) Well-being and social capital: does suicide pose a puzzle? Working paper.
- Helliwell, J. F. and McKittrick, R. (1999) Comparing capital mobility across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border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2(5): 1164–73.
- Helliwell, J. F. and Putnam, R. D. (1995)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taly.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1: 295–307.
- Henderson, A. T. and Berla, N. (1994) *A New Generation of Evidence: The Family is Critical to Student Achieve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itizens' Education.
- Hendryx, M. S., Ahern, M. M., Lovrich, N. P. and McCurdy, A. H. (2002)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7(1): 87–103.
- Her Majesty's Treasury (2002) Next steps on volunteering and giving in the UK: a discussion document. Stationery Office Ltd, or www.hm-treasury.gov.uk
- Herriot, A., Crossley, M., Juma, M., Waudo, J., Mwiroti, M. and Kamau, A. (2002)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headteacher support groups in Kenya: a mechanism to create pockets of excellence, improve the provis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arget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2(5): 509–26.
- Hillman, A. and Ursprung, H. (2000) Politic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clin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89–213.
- Hills, J. (1995) *Income and Wealth, Vol. 2*.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Hinde, R. A. and Groebel, J. (1991) (eds) *Co-oper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F. (1977)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 Hirshleifer, J. (1994)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Economic Inquiry*, 32(Jan.): 1–10.
- Hodges, J. and Tizard, B. (1989) IQ and behavioural adjustment of ex-institution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30(1): 53–75.
- Hogarty, G. E., Anderson, C. M., Reiss, D. J. et al. (1991) Family psychoeducation, social skills training and maintenance chemotherapy in the aftercar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 340–7.
- Hogwood, B. (1987) *Trends in British Public Policy: Do Governments Make any Differen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okanson, J. E., Rubert, M. P., Welker, R. A., Hollander, G. R. and Hedeon, C. (1989) Interpersonal concomitants and antecedents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8: 209–17.
- Holmes, B. (1985) *Victimization of the elderly: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social functioning in the community: an exploratory study*.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 Holmes, T. H. and Rahe, R. 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18.
- Holohan, C. J. and Moos, R. H. (1981)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0(4): 365–70.

- Home Office (2003) Offender statistics. www.homeoffice.gov.uk/justice/sentencing/rehabilitation/statistics.html
- Hooghe, M. (2002)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time, programs, and st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2): 84–104.
- Hooghe, M. (2003)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value indicators: the effect of current and previous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2(1): 47–69.
- Hough, L. (2000) The American vot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Bulletin Archives*, Spring. www.ksg.harvard.edu/ksgpress/ksgnews/publications/theamericanvoter.html
- Hourihan, K. (1987) Local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Neighbourhood Watch: a case-study in Cork, Ireland. *Urban Studies*, 24: 129–36.
- House, J. S., Robbins, C. and Metzner, H. L. (1982)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ctivities with mortality: prospective evidence from the Tecumseh community health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16: 123–40.
- Hunter, M. L. (2002) 'If you're light you're alright': light skin color as social capital for women of color. *Gender and Society*, 16(2): 175–93.
- Huotari, M. L. and Livonen, M. (2001) University library: a strategic partner i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processes? *Proceedings of the 64th ASIST Annual Meeting*, 38: 399–410.
- Husain, S. (1988) *Neighbourhood Watch in England and Wales: A Locational Analysis*. London: Crime Prevention Unit, Home Office.
- Husain, S. (1990) *Neighbourhood Watch and Crime: An Assessment of Impact*. London: Police Foundation.
-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 Idler, E. L. and Benyamini, Y. (1997) Self-rated health and mortality: a review of twenty-seven community studi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 38(1): 21–37.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keles, A.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nd its consequences. *Policy Sciences*, 33(3–4): 245–68.
- Inoguchi, T. (2000) Social capital in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73–112.
- Ireland, R. D., Hitt, M. A. and Vaidyanath, D. (2002) Alliance management as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8(3): 413–46.
- Irwin, H. J. (1999) Violent and nonviolent revictimization of women abused in childhood.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4(10): 1095–110.
- Isham, J. (2002)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fertiliser adop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Tanzani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1(1): 39–60.
- Israel, G. D., Beaulieu, L. J. and Hartless, G. (200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Rural Sociology*, 66: 43–68.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ahoda, M. (1972)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London: Tavistock.
- Jahoda, M. (1982)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hoda, M. (1995)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In Nicholson, N. (ed.)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Oxford: Blackwell.
- Janoski, T., Musick, M. and Wilson, J. (1998) Being volunteered? The impa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ro-social attitudes on volunteering. *Sociological Forum*, 13(3): 495–519.
- Jenkins, M. (2001) Technology clusters and knowledge architecture.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Magazine*, 16: 21–3. www.drive.cranfield.ac.uk/cluster.pdf
- Jenkins, S. P. and Osberg, L. (2003) Nobody to play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leisure co-ordination. ISER Working Papers 2003-19.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 Johnson, A. W. (1999) *Sponsor-a-Scholar: Long-term Impacts of a Youth Mentoring Program on Student Performance*. London: Commonwealth Fund. www.cmf.org/programs/youth/johnson_sp-a-sch_355.asp
- Johnston, M. (1988) The price of honesty. In Jowell, R. et al. (ed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5th Report*. Aldershot: Gower.
- Jonsson, J. O. and Gahler, M. (1997) Family dissolution, family reconstitu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careers: recent evidence for Sweden. *Demography*, 34(2): 277–93.
- Jordan, W. and Plank, S. B. (2000) Talent loss among high-achieving poor students. In Sanders, M. G. (ed.) *Schooling Students Placed at Risk: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Education of Poor and Minority Adolescents*. Mahwah, NJ: Erlbaum Associates.
- Jungbauer-Gans, M. (2002) Is social capital on the decline? *Soziale Welt-Zeitschrift für Sozial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und Praxis*, 53(2): 189–208.
- Kaase, M. (1999) Interpersonal trust, political trust and non-institutionalis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2(3): 1–21.
- Kahne, J. and Bailey, K. (1999)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youth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I have a dream' program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1(3): 321–43.
- Kamarck, R. L., Manuck, S. B. and Jennings, J. (1991) Social support reduces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to psychological challenge: a laboratory model.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2: 42–58.
- Kanazawa, S. (2002) Bowling with our imaginary friend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 23(3): 167–71.
- Kang, N. and Kwak, N. (2003)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civic participation: individual length of residence, neighborhood residential stability,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with media u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1): 80–106.
- Kaplan, G. A., Pamuk, E., Lynch, J. W., Cohen, R. D. and Balfour, J. L. (1996)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and potential pathway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2: 999–1003.
- Kaplan, R. M., Sallis, J. F. and Patterson, T. L. (1993)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ur*. London: McGraw-Hill.

- Kaplan, R. M., Salonen, J. T., Cohen, R. D., Brand, R. J., Syme, S. L. and Puska, P. (1988) Social connections and mortality from all causes and fro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ospective evidence from eastern Finland.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28: 370–80.
- Katz, E. G.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ten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uatemala. *Land Economy*, 76(1): 114–32.
- Kawachi, I. and Berkman, L. F. (2000)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In Berkman, L. F. and Kawachi, I. (eds) *Social Epidem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wachi, I. and Berkman, L. F. (2001) Social ties and mental health. Paper prepared for September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 Kawachi, I. and Kennedy, B. P. (1999)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4(1): 215–27.
- Kawachi, I., Kennedy, B. P. and Glass, R.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a contextu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8): 1187–93.
- Kawachi, I., Kennedy, B. P. and Wilkinson, R. G. (1998) Mortalit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rime and violenc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special issue.
- Kawachi, I., Kennedy, B. P., Lochner, K. and Prothrow-Stith, D. (1997) Social capit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9): 1491–8.
- Kawachi, I., Colditz, G. A., Ascherio, A., Rimm, E. B., Giovannucci, E., Stampfer, M. J. and Willett, W. C. (1996) A prospectiv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in relation to total 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men in the USA. *Journal Epidemiology Community Health*, 50: 245–51.
- Keller, W. (2002)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 120–42.
- Kennedy, B. P. and Kawachi, I. (1998)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Russian mortality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26(11): 2029–43.
- Kennedy, S., Kiecolt-Glaser, J. K. and Glaser, R. (1990)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the immune system. In Sarason, B. R., Sarason, I. G. and Pierce, G. R. (eds)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Chichester: John Wiley.
- Kentworthy, L. (1997) Civic engagement,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5): 646–57.
- Kiecolt-Glaser, J. K., Malarkey, W. B., Caioppo, J. T. and Glaser, R. (1994) Stressful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mmune and endocrine function. In Glaser, R. and Kiecol-Glaser, J. K. (eds) *Handbook of Human Stress and Immunit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Kiecolt-Glaser, J. K., McGuire, L., Robles, T. F. and Glaser, R. (2002) Psychoneuroimmunology: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on immune function and healt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0(3): 537–47.
- Kiernan, K. E. (1996) Family change: parenthood, partnership and policy. In Halpern, D. S., Wood, S., White, S. and Cameron, G. (eds) *Options for Britain: A Strategic Policy Review*. Dartmouth: Aldershot.
- Kleit, R. G. (2000) Book review of *Segregation in Federally Subsidized Low Income Hou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Modibo Coulibaly, Rodney D. Green and David M. Jam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2(1): 103–4.

- Klunenberg, Erik (2002) *Heat Wa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nack, 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4): 772–85.
- Knack, S. and Keefer, P.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251–88.
- Knack, S. and Kropf, M. E. (1998) For sham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co-operative context on the probability of vot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585–99.
- Koba, B. R. and Prescott, J. E. (2002) 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9): 795–816.
- Kobassa, S. C. (1979) Stressful life events, personality, and health: an inquiry into hardiness. *Journ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11.
- Kolankiewicz, G.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3): 427–42.
- Kposowa, A., Singh, G. K. and Breault, K. D. (1994)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and social isolation on adult male homici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0(3): 277–89.
- Kraemer, S. and Roberts, R. (1996) (eds) *The Politics of Attachment: Towards a Secure Society*.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Kraft, E. (1999)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somewhat opinionated survey.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view*, 1(1–2): 7–52.
- Krishna, A. (2002) Enhanc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ies: what i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4): 437–60.
- Krug, B. (1999) On custom in economics: the case of humanism and trade regim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5(3): 405–28.
- Kunioka, T. and Woller, G. M. (1999) In (a) democracy we trust: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for democratic proced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8(5): 577–96.
- La Due Lake, R. and Huckfeldt, R. (1998)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567–84.
- La Ferrara, E. (2002) Inequality and group particip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rural Tanzani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2): 235–73.
-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W. (1997) Trust in large organis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Papers and Proceedings): 333–8.
- Laing, R. D. and Esterson, A. ([1964] 1970). *Sanity, Madness and the Family: Families of Schizophren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Lampert, H. (2002) Zur Suche nach neuen sozialen Ordnungen im europäisch-nordamerikanischen Kulturkreis [The Search of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s in European and North-American Societie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Bard, vol. 222/3, pp. 346–65.
- Landry, R., Amara, N. and Lamari, M. (2002) Does social capital determine innovation? To what ext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9(7): 681–701.
- Lane, C. and Bachman, R. (1995) Risk, trust and power: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supplier relation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Working Paper WP 5 2/9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RC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 Lane, C. and Bachman, R. (1998) *Trust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bein, L. and Bess, R. (2002) Sports in school: source of amity or antipath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3(2): 436–54.
- Larson, R. W., Wilson, S., Brown, B. B., Furstenberg, F. F. and Verma, S. (2002) Changes i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s: are they being prepared for adult relationship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2(1): 31–68.
- Latane, B. and Darley, J. M. (1976) *Help in a Crisis: Bystander Response to an Emergency*.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Latkin, C., Mandell, W., Oziemkowska, M., Celentano, D., Vlahov, D., Ensminger, M. and Knowlton, A. (1995)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study patterns of drug use among urban drug users at high risk for HIV/AID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38: 1–9.
- Laub, J. H. and Sampson, R. J. (2001) Understanding desistance from crime. In Tonry, M. (ed.)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vis, J. and Stoddart, G. (1999) Financing health care. In Hurley, J. 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s and Analytical Tools of Health Economics*. Hamilton, On.: Centre for Health Economics and Policy Analysis, Special Report, May.
- Lawrence, R. J. (1990) Public collective and private space: a study of urban housing in Switzerland. In Kent, S. (ed.) *Domestic Architecture and the Use of Spac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Cultural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ws, G. (1997) Glob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in US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1: 89–104.
- Laycock, G. and Tilley, N. (1995) Policing and Neighbourhood Watch: strategic issues.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Series Paper, 60. London: Home Office Police Research Group.
- Leadbeater, C. (1998) *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 London: Demos.
- Leadbeater, C. (1999) *Living on Thin Air*. London: Viking, Penguin.
- Lee, G. R. (1985) Ki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geing and Society*, 5: 19–38.
- Lee, L. J., Cheurprakobkit, S. and Denq, F. (1999) Neighbourhood Watch programs in Taiwan: police attitudes, crime rate and community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1): 57–77.
- Leffert, N. and Petersen, A. C. (1995)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In Rutter, M. and Smith, D. (eds) *Psychosocial Disorder in Young People: Time Trends and their Caus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Lefkowitz, M. M. and Tesiny, E. P. (1984) Rejection and depression: prospective and contemporaneous analy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5): 776–85.
- Le Grand, J. (1997) Knights, knaves and pawns: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 149–69.
- Le Grand, J. (2003) *Motivation, Agency and Public Policy: Of Knights and Knaves, Pawns and Quee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pper, M. R., Green, D. and Nisbett, R. E. (1973)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s: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129–37.

- Levin, M. and Satarov, G. (2000) Corrup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Russ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1): 113–32.
- Levine, R. V., Miyake, K. and Lee, M. (1989) Places rated revisited: psychosocial pathology in metropolitan area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21(5): 531–53.
- Levy, L. and Herzog, A. N. (1974) Effec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rowding on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 15: 228–40.
- Lewis, D. A. (1981) *Reactions to Crim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nnuals, 16. London: Sage.
- Li, Y. J., Savage, M., Tampubolon, G., Warde, A. and Tomlinson, M. (2002) Dynamics of social capital: trends and turnover in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2–1999.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7(3): U97–U132.
- Liebert, R. M. and Spiegler, M. D. (1990) *Personality: Strategies and Issues* (6th edn). Belmont,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 Lindstrom, M., Merlo, J. and Ostergren, P. O. (2002) Individual and neighbourhoo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city of Malmö, Swede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4(12): 1779–91.
- Lindstrom, M., Moghaddassi, M. and Merlo, J.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a population based multilevel analysis in Malmö, Swede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7(1): 23–8.
- Lindstrom, P. (1993) *School and Delinquency in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Stockholm: National Council for Crime Prevention.
- Liu, J.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covariates of reoffending risk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9: 39–55.
- Lochner, K., Kawachi, I. and Kennedy, B. P. (1999)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 measurement. *Health and Place*, 5(4): 259–70.
- Loeber, R. and Farrington, D. P. (2000) Young children who commit crime: epidemiology, developmental origins, risk factors, early interven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2: 737–62.
- Lohman, P. M. and van Dijk, A. G. (1988) *Neighbourhood Watch in the Netherlands*. The Hague: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Bureau.
- Lorcher, S. (1982) Japan's social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13(1–2): 103–35.
- Loury, G. (1977) (ed.)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Loury, G. (198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Econometrica*, 49: 843–67.
- Loury, G. C. (1977)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Wallace, P. A. and LeMund, A.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Loury, G. C. (1987)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group inequalit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5: 249–71.
- Loury, G. C. (1992)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getting to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Harvard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Public Policy*, 1: 91–110.

- Lovell, A. M. (2002) Risking risk: the influence of types of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on the injection practices of drug us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5): 803–21.
- Lowndes, V. (2000) Women and social capital: a comment on Hall's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 533–7.
- Lowry, S. (1991) *Housing and Health*. Londo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Lundberg, O. (1993)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living conditions on illness and mortality in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6(8): 1047–52.
- Luzzati, T. (2000) Norme sociali e sanzione: il ruolo del singolo individuo. (Social norms and individual sanctioning.) *Economia Politica*, 17(1): 53–67.
- Lynch, J., Due, P., Muntaner, C. and Davey Smith, G. (2000b) Social capital: is it a goo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4: 404–8.
- Lynch, J. W., Davey Smith, G., Kaplan, G. W. and House, J. S. (2000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importance to health of individual incom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r material condition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0: 1200–4.
-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a, Z. D. (2002) Social 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10): 1763–84.
- Mackay, J. R. (1958) The interactance hypothesis and boundaries in Canada: a preliminary study. *Canadian Geographer*, 11: 1–8.
- Mackintosh, N. J. (1998) *IQ and Human Intellig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dood, T., Berthoud, R. et al. (1997) *Ethnic Minorities in Brita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Majoribanks, K. (1991) Ethnicity,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ocial-status attainment: a follow-up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2(1): 15–23.
- Majoribanks, K. and Kwok, Y. (1998) Family capital and Hong Kong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1): 99–105.
- Mann, W. (1995)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Self-Help in a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 London: IPPR.
- Marmot, M. G. (1986) Social inequalities in mortalit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ilkinson, R. G. (ed.) *Class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Longitudinal Data*. London: Tavistock.
- Marmot, M. G., Davey Smith, G., Stansfield, S., Patel, C., North, F. and Head, J. (1991) Health inequalities among British civil servants: the Whitehall study II. *Lancet*, 337: 1387–93.
- Marsh, A. and MacKay, S. (1994) *Poor Smokers*. Research Report, No. 771.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Martin, L. R. (1963) Research need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social and community capital to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45(1): 73–94.
- Massey, D. S. and Espinosa, K. E. (1999) Undocumented migration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Soziale Welt*, 12: 141–62.

- Matheson, J. and Summerfield, C. (2000) (eds) *Social Focus on Young People*. London: Stationery Office.
- Matthews, R. and Trickey, J. (1994) *The New Parks Crime Reduction Project*. Leicest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rd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Mayer, M. and Rankin, K. N.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North/South perspective. *Antipode*, 34(4): 804–8.
- McCabe, K., Houser, D., Ryan, L., Smith, V. and Trouard, T. (2001) A functional imaging study of co-operation in two-person reciprocal ex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20): 11832–5.
- McCallum, J. (1995)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615–23.
- McCarthy, B., Hagan, J. and Martin, M. J. (2002) In and out of harm's way: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the social capital of fictive street families. *Criminology*, 40(4): 831–65.
- McConville, M. and Shepherd, D. (1992) *Watching Police, Watching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Cord, J. (1978) A thirty-year follow-up of treatment eff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284–9.
- McCulloch, A. (2001)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health: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3: 208–9.
- McKenzie, K. (2000) Neighbourhood safety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sctalk/talk28.htm
- McKenzie, K., Whitley, R. and Weich, 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1: 280–3.
- McLanahan, S. and Sandefur, G. (1994)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Neal, R. B. (1999) Participation in high schoo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vestigating school effec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0(2): 291–309.
- McRae, R. R. and Costa, P. T. (1987) Validation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cross instruments and obser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1): 81–90.
- Mellahi, K. (2000) Western MBA education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val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tudy of Asian, Arab and African MBA graduates.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5(2): 59–73.
- Merrett, C. D. (2001)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nsequences for small towns after welfare reform. *Urban Geography*, 22(5): 407–23.
- Metz, I. and Tharenou, P. (2001) Women's career advancement: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Group and Organisation Management*, 26(3): 312–42.
- Miethe, T. D. and Meier, R. F. (1994) *Crim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Offenders, Victims, and Situatio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ilgram, S. (1977) *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 Essays and Experiment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Miller, R. (1996) *Measuring What People Know: Human Capital Accounting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 Paris: OECD.

- Mittleman, M. S., Ferris, S. H., Shulman, E., Steinberg, G., Ambinder, A., Mackell, J. A. and Cohen, J. (1995) A comprehensive support program: effect on depression in spouse-caregivers of AD patients. *Gerontologist*, 35: 792–802.
- Moerbeek, H. H. S. and Need, A. (2003) Enemies at work: can they hinder your career? *Social Networks*, 25(1): 67–82.
- Moffitt, T. E. (2002) Teen-aged mother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43(6): 727–42.
- Mohan, G. and Mohan, J. (2002) Placing social capit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2): 191–210.
- Molina-Morales, F. X., Lopez-Navarro, M. A. and Guia-Julve, J. (2002) The role of local institutions as intermediary agents in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4): 315–29.
- Molyneux, M. (2002) Gender and the silences of social capital: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3(2): 167–88.
- Mondak, J. J. and Gearing, A. F. (1998) Civic engagement in a post-communist state.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615–37.
- Mondal, A. H. (2000)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 the role of NGO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Bangladesh.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3–4): 459–75.
- Montgomery, J. D. (1991)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market outcomes: toward an economic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5): 1408–18.
- Morenoff, J. D., Sampson, R. J. and Raudenbush, S. W. (2001) Neighbourhood inequ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rban violence.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port No 00–45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organ, S. L. and Sorensen, A. B. (1999) Parental networks, social closur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 test of Coleman's social capital explanation of school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5): 661–81.
- MORI (2003)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New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Quantitative Survey*. London: MORI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 Morris, M. (1995) Data driven network models for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Mollison, D. (ed.) *Epidemic Models: Their Structure and Relation to Da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kherjee, S. and Wilson, P. (1987) *Neighbourhood Watch: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rends and Issues, 8.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Mulgan, G. (1997) *Connexity: How to Live in a Connected Worl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Muller, C. (1995) Maternal employment, parent involvement,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1): 85–100.
- Munch, R. (2002) The limits of the self-organisation civil society: the American debate on multiculturalism, public spirit, and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12(4): 445–65.
- Muntaner, C., Lynch, J. W., Hillemeier, M., Lee, J. H., David, R., Benach, J. and Borrell, C. (2002) Economic inequality, working-class power, social capita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wealthy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4): 629–56.
- Murphy, J. T. (2002) Networks, trust and innovation in Tanzan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orld Development*, 30(4): 591–619.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ervice Learning (2002) Learning in deed: the power of service learning for American schools. www.wkkf.org/Pubs/PhilVol/Pub3679.pdf
-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 (2003)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Forum Report No. 28, by Tom Healey. <http://www.nesf.ie/documents/No28SocialCapital.pdf>
- Navarro, V. (2002). A critique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3): 423–32.
- Neace, M. B. (1999) Entrepreneu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creating trust,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 148–61.
- Neaigus, A., Friedman, S. R., Curtis, R., Des Jarlais, D. C., Furst, R. T., Jose, B., Mora, P., Stepherson, B., Sufian, M., Ward, T. and Wright, J. W. (1994) The relevance of drug injectors' social and risk network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HIV infe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 67–78.
- Neeleman J., Halpern, D. S., Leon, D. et al. (1997) Tolerance of suicide, religion and suicide rates: an ecological and individual study in 19 Western countri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7(5): 1165–71.
- Newcomb, M. D. and Bentler, P. M. (1988) Impact of adolescent drug use and social support on problems of young adult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64–75.
- Newman, O. (1980) *Community of Interest*. New York: Anchor Books.
- Newton, K.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40(5): 575–86.
- Newton, K. (1999) Mass media effects: mobilization or mass media malai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577–99.
- Niemi, N. and Junn, J. (1998) *Civic Educ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ed.)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va Institute (1977) *Reducing the Impact of Crime against the Elderly*. New York: Nova Institute.
- Nuckolls, K. B., Cassel, J. and Kaplan, B. J. (1972) Psychological assets, life crisis and the prognosis of pregnanc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95: 431–41.
- Nuissl, H. (2002) Elements of trust: an analysis of trust-concepts.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12(1): 87–98.
- O'Brien, D. J., Raedeke, A. and Hassinger, E. W. (1998) The social networks of leaders in more and less viable communities six years later: a research note. *Rural Sociology*, 62: 109–27.
- O'Brien, M. and Jones, D. (1999) Children, parental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 English case stud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3(5): 599–621.
-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2000)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 NBER Working Paper 777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 OECD (2001a)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Paris: OECD.

- OECD (2001b)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01: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OECD. www.oecd.org/publications/e-book/92-2001-04-1-2987/index.htm
- Offe, C. and Fuchs, S. (1998) A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The German case. In *Society and Civic Spirit (Gesellschaft und Gemeinsin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 2002 in Putnam, R. D.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ffer, A. (1996) (ed.) *In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 *Social Trends 33*. London: HMSO.
- Ohrn, K. G. (2002) Democracy, trade and welfare: three theories of lasting peace. *Tidsskrift for Samfunnsforskning*, 43(3): 333–58.
- Oigenblick, L. and Kirschenbaum, A. (2002) Tourism and immigration: comparing alternative approach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9(4): 1086–100.
- Oppenheim, C. (1998) *The Inclusive Society: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Orbanes, P. (2002)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business I learned from Monopol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0(3): 51.
- Ornish, D. (1998) *Love and Survival: How Good Relationships Can Bring You Health and Well-Being*. London: Vermillion.
- Orth-Gomer, K. and Johnson, J. (1987) Social network interaction and mortality: a six-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 sample of the Swedish population.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40: 949–57.
- Orth-Gomer, K., Rosengren, A. and Wilhelmsen, L. (1993)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incidenc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middle-aged Swedish me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5(1): 37–43.
- Paldam, M. and Svendsen, G. T. (2000) An essay on social capital: looking for the fire behind the smok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2): 339–66.
- Parcel, T. L. and Dufur, M. J. (2001) Capital at home and at school: effect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Social Forces*, 79(3): 881–912.
- Parcel, T. L. and Geschwender, L. E. (1995) Explaining southern disadvantage in verbal facility among you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73(3): 841–74.
- Parcel, T. L., Nickoll, R. A. and Dufur, M. J. (1996)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work and maternal nonemployment on children's reading and math achievement. *Work and Occupations*, 23(4): 461–83.
- Patterson, T. (1993) *Out of Order*. New York: Vintage Press.
- Pattie, C., Seyd, P. and Whiteley, P. (2002) Does good citizenship make a differe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POP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alford, 13–15 September.
- Pattie, C., Seyd, P. and Whiteley (2004) *Citizenship UK: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P.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54–77.
- Pearce, N. and Smith, G. D. (2003) Is social capital the key to inequalities in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3(1): 122–9.

- Perry, S., Difede, J., Musgni, G., Frances, A. J. and Jacobsberg, L. (1992) Predictor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burn inju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7): 931-5.
- Petersen, D. M. (2002)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capital measures in the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community-based health initia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23(1): 55-64.
- Petersen, T., Saporta, I. and Seidel, M. (2000) Offering a job: meritocracy and social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3): 763-816.
- Petro, N. (2001) Creating social capital in Russia: The Novgorod model. *World Development*, 29(2): 229-44.
- Pettigrew, T. F. and Tropp, L. R. (2000)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Recent meta-analytic findings. In Oskamp, S. (ed.) *Reduc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The Claremont Symposium on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Mahwah, NJ: Erlbaum Associates.
- Pew Research Center (1998) www.people-press.org
- Piazza-Giorgi, B. (2002)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 growth: extending our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4): 461-79.
- Pike, A. (2000) A complex responsibility: there are measurable benefits for companies in community involvement – even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Financial Times Guide to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Awards 2000*: 24-6.
- Pilkington, P.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 at a local level could help to tackle health inequalities more effectively.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edicine*, 24(3): 156-9.
- Plutzer, E. (1998)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Colby, A., James, J. B. and Hart, D. (ed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nd Competence through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dolny, J. and Baron, J. (1997) Resources and relationships: social networks and mobility in the workpla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673-93.
- Pong, S. L. (1998) The school compositional effect of single parenthood on 10th-grade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1): 23-42.
- Porges, S. W. (1998) Love: an emergent property of the mammalian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3(8): 837-61.
- Portes, A.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ortes, A. and Sensenbrenner, J. (1993)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1320-50.
- Portes, A. and Zhou, M. (1992) Gaining the upper hand: economic mobility among immigrant and domestic minorities. *Racial and Ethnic Studies*, 15(4): 491-552.
- Posner, R. A. and Rasmusen, E. B. (1999) Creating and enforcing norm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9(3): 369-82.

- Potot, S. (2002)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 new social figure in Romania. *Revue d'E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33(1): 149–77.
- Povey, D. and Allen, J. (2003) Violent crime. In Simmons, J. and Dodd, T. (eds)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2/2003*. London: Home Office.
- Poyner, B. (1983) *Design Against Crime: Beyond Defensible Space*. London: Butterworths.
- Price, B.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factors affecting civic engagement as reported by leader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9(1): 119–27.
- 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2003)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www.pm.gov.uk
- Pruijt, H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qualizing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2): 109–15.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1–20.
- Putnam, R. D. (1996)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 the American prospect. www.prospect.org/print/V4/13/putnam-r.html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 D. (ed.) (2002)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and Feldstein, L. M. (2003) *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 D. and Yonish, S. (forthcoming) New evidence on trends in American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engagement: are we really 'bowling alone'?
- Qian, Z. and Blair, S. L. (1999)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high school senior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2(4): 605–25.
- Quinton, D. and Rutter, M. (1988) *Parenting Breakdow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Links*. Aldershot: Avebury.
- Quinton, D., Pickles, A., Maughan, B. and Rutter, M. (1993) Partners, peers and pathways: assortative pairing and continuities in conduct disorde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5: 763–83.
- Rahn, W. M. and Transue, J. E. (1998) Social trust and value change: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youth, 1976–1995.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545–65.
- Raiser, M., Haerpfer, C., Nowotny, T. and Wallace, C. (2002) Social capital in transition: a first look at the evidence. *Sociologicky Casopis*, 38(6): 693–720.
- Rath, J. (2002) A quintessential immigrant niche? The non-case of immigrants in the Dutch construction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4(4): 355–72.
- Reppetto, T. A. (1974) *Residential Crime*.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Requena, F. (2003) Social capital,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workpla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1(3): 331–60.
- Resnick, P. (2002) Beyond bowling together: socio-technical capital. In Carroll, J. M. (e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 Restrepo, P. P. (1998) Capital socia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y políticas públicas. *Lecturas de Economía*, 48: 33–65.
- Rice, T. W. and Feldman, J. L. (1997)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from Europe to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59(4): 1143–72.
- Rich, P. (1999) American voluntarism,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5: 15–34.
- Rilling, J., Gutman, D., Zeh, T., Pagnomi, G., Berns, G. and Kilts, C. (2001) Imag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co-operation and non-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Neuroimage*, 13(6): S465.
- Rob, R. and Zemsky, P. (2002) Social capital, corporate culture and incentive intensit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2): 243–57.
- Roberts, E. (1997) Neighbourhood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ow birthweight in 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 597–603.
- Robey, J. S. (1999) Civil society and NAFTA: initial resul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5: 113–25.
- Robinson, P. (1998) Employment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Oppenheim, C. (ed.) *An Inclusive Society: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PPR.
- Rose, D. R. and Clear, T. R. (1998) Incarcer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crim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Criminology*, 36(3): 441–80.
- Rose, R. (2000) How much does social capital add to individual health? A survey study of Russia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 1421–35.
- Rosenthal, R. and Jacobson, L. (1968)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 Ross, C. E. and Jang, S. J. (2000) Neighborhood disorder, fear, and mistrust: the buffering role of social ties with neighbo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8(4): 401–20.
- Ross, L., Greene, D. and House, P. (1977) The 'false consensus effect': an egocentric bias in social perception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5: 485–94.
- Ross, N. A., Wolfson, M. C., Dunn, J. R., Berthelot, J. M., Kaplan, G. A. and Lynch, J. (2000)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oss sectional assessment using census data and vital statistic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0: 898–902.
- Rossel, J. (2002) The quality of democratic regimes: Robert Putnam's and Patrick Heller's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Italy and India.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43(2): 302.
- Rossteutscher, S. (2002) Advocate or reflection? Associ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udies*, 50(3): 514–28.
- Rothstein, B. (2001) Soci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29(2): 207–41.
- Rowan, W. (1998) *Guaranteed Electronic Markets: The Backbone of a Twenty-First Century Economy*. London: Demos.
- Ruberman, W., Weinblatt, E., Goldberg, J. D. and Chaudhary, B. S. (1984) Psychosocial influences on mortality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1: 552–9.

- Rubio, M. (1996) *Social Capital, Education and Delinquency in Colombia. (Capital social, educacion y delincuencia juvenil en Columbia.)* Santa Fe de Bogota: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Desarrollo Economico Universidad.
- Rupasingha, A., Goetz, S. J. and Freshwater, D. (2002)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untie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1(2): 139–55.
- Russek, L. G. and Schwartz, G. E. (1997)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caring predict health status in midlife: a 35-year follow-up of the Harvard Mastery of Stress Stud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9(2): 144–9.
- Rutter, M. and Smith, D. (1995) *Psychosocial Disorder in Young People: Time Trends and their Caus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Rutter, M., Quinton, D. and Hill, J. (1990) Adult outcome of institution-reared children. In Robins, L. and Rutter, M. (eds) *Straight and Devious Pathways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egert, S. and Winkel, G.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New York City's distressed inner-city housing. *Housing Policy Debate*, (9)1: 17–60.
- Saegert, S., Winkel, G. and Swartz, C.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rime in New York City's low-income housing. *Housing Policy Debate*, 13(1): 189–226.
- Saguaro Seminar (2000) *Bettertogether: The Report of the Saguaro Seminar: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www.bettertogether.org/thereport.htm
- Sampson, R. J. and Laub, J. H. (1993)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mpson, R. J., Morenoff, J. D. and Earls, F. (1999) Beyond social capital: spati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for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5): 633–60.
- Sampson, R. J., Raudenbush, S. W. and Earls, F.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918–24.
- Sander, T. H. and Putnam, R. D. (1999) Rebuilding the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School Administrator Web Edition*, September.
- Sanders, J., Nee, V. and Sernau, S. (2002) Asian immigrants' reliance on social ties in a multiethnic labor market. *Social Forces*, 81(1): 281–314.
- Sarason, B. R., Sarason, I. G. and Pierce, G. R. (1990)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aunders, L. S., Hanbury-Tenison, R. and Swingland, I. R. (2002) Social capital from carbon property: creating equity for indigenous peop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60(1797): 1763–75.
- Saxenian, A. L.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antlebury, K. (2002) A snake in the nest or in a snake's nest: what counts as peer review for a female educator in a chemistry department?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32(2): 157–62.
- Schafft, K. A. and Brown, D. L.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grassroot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Roma self-governance in Hungary. *Social Problems*, 47(2): 201–19.

- Schoenbach, V. J., Kaplan, B. G., Freedman, L. and Kleinbaum, D. (1986) Social ties and mortality in Evans County, Georgia.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23: 577–91.
- Schuller, T., Baron, S. and Field, J. (2000) Social capital: a review and critique. In Baron, S., Field, J. and Schuller, T. (eds)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r, L., Shields, T., Kruse, D. and Schriener, K. (2002) Enabling democracy: disability and voter turnou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5(1): 167–90.
- Schweitzer, J. H., Kim, J. W. and Mackin, J. R. (1999) 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crime and fear of crime in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6(3): 59–73.
- Scott, B. and Sexton, K. (2002) Promot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through community–industry dialogues: the good neighbor model in Minnesot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6(10): 2130–7.
- Scott, K. (1993) *Mons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L.A. Gang Member*.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2nd edition 1978. New York: McGraw-Hill.
- Servadio, G. (1976) *Mafioso: A History of the Mafia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 Shaffer, D. R. (2005)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5th edn). Belmont, CA: Brooks/Cole.
- Shah, D. V., McLeod, J. M. and Yoon, S. H. (2001)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mmunity: an exploration of print, broadcast, and internet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464–506.
- Shane, S. and Cable, D. (2002) Network ties, reput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new ventures. *Management Science*, 48(3): 364–81.
- Shane, S. and Stuart, T. (2002) Organisational endow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 start-ups. *Management Science*, 48(1): 154–70.
- Sharp, D., Hay, D., Pawlby, S., Schmucher, G., Allen, H. and Kumar, R. (1995) The impact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on boy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6: 1315–37.
- Sherbourne, C. D., Hayes, R. D. and Wells, K. B. (1995) Personal and psychological risk factor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nd course of depression amongst depressed pati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3(3): 345–55.
- Sherif, M. (1956) Experiments in group conflict. *Scientific American*, 195(5): 54–8.
- Sherif, M. and Sherif, C. W. (1953) *Groups in Harmony and Tension: An Integration of Studie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Shiverly, C. A., Clarkson, T. B. and Kalpan, J. R. (1989) Social deprivation and coronary artery atherosclerosis in female cynomolgus monkey. *Atherosclerosis*, 77: 69–76.
- Sigelman, C. K. and Shaffer, D. R. (1995) *Life-Span Human Development* (2nd edn). Belmont, CA: Brooks/Cole.
- Silver, H. (1993) Na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36–54.

- Silver, H. (1994)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 Simcha-Fagan, O. and Schwartz, J. E. (1986) Neighborhood and delinquency: an assessment of contextual effects. *Criminology*, 24(4): 667–703.
- Simmons, J. and Dodd, T. (2003) (eds)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2/2003*. London: Home Office.
- Simon, C. A. and Wang, C. H. (2002) The impact of AmeriCorps service on volunteer participants: results from a 2-year study in four western state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34(5): 522–40.
- Simpson, A. E. and Stevenson-Hinde, J. (1985)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o four-year-old boys and girls and child–family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6(1): 43–53.
- Six, P. (1997a) *Escaping Poverty: From Safety Nets to Networks of Opportunity*. London: Demos.
- Six, P. (1997b) Social exclusion: time to be optimistic. *Demos Collection*, 12: 3–9.
- Sklair, L. (1995)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2nd ed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kogan, W. G. and Hartnett, S. M. (1997) *Community Policing, Chicago Sty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ogan, W. G., Hartnett, S. M., DuBois, J. et al. (2000) *Public Involvement: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cago*. Washington, DC: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 Skrabski, A., Kopp, M. and Kawachi, I. (2003) Social capital in a changing society: cross-sectional associations with middle aged female and male mortality rate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2): 114–19.
- Small, L. A. (2002) Social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what does it mean if there isn't any?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n Dmitrov Rayon, Russia.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3(1): 7–25.
- Smith, A. ([1776] 1979)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mith, B. W., Novak, K. J. and Hurley, D. C. (1997) Neighborhood crime prevention: the influences of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nd neighborhood watch.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20(2): 69–86.
- Smith, C. J. (1984) Ge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mental health. In Freeman, H. (ed.) *Mental Health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Churchill-Livingstone.
- Smith, D. J. (1992) *Understanding the Underclass*.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Smith, D. J. (1995) Youth crime and conduct disorder: trends, patterns and causal explanations. In Rutter, M. and Smith, D. (1995) *Psychosocial Disorder in Young People: Time Trends and their Caus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mith, E. S. (1999)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s 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youth on political and civic behaviour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 553–80.
- Smith, S. S. and Kulynych, J. (2002) It may be social, but why is it capita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Politics and Society*, 30(1): 149–86.
- Snow, R. E. (1995) Pygmalion and intellig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6): 169–71.

- Social Exclusion Unit (1997) *Social Exclusion Unit: Purpose, Work Priorities and Working Methods*. London: Cabinet Office.
- Soobader, M. J. and LeClere, F. B. (1999) Aggreg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on morbid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8(6): 733–44.
- Soskolne, V. and Shtarkshall, R. A. (2002) Migration and HIV prevention programmes: linking structural factors, culture, and individual behaviour – an Israeli exper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8): 1297–307.
- Soubeyran, A. and Weber, S. (2002) District formation and local social capital: a (tacit) co-opeti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1): 65–92.
- Spangnolo, G. (1999) Soci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8: 1–26.
- Spiegel, D. (1993) *Living Beyond Limits: New Hope and Help for Facing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New York: Times Books.
- Spies-Butcher, B. (2002) Tracing the rational choic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 is social capital a neo-liberal 'trojan hor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2): 173–92.
- Stansfeld, F. (1997) Relating the concepts of organisational commi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EXUS Quality of Life Group.
- Steinberg, L., Darling, N. E. and Fletcher, A. C. (1995)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n ecological journey. In Moen, P., Elder, G. H. et al. (eds) *Examining Lives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tigler, J. W. and Hiebert, J. (1999) *The Teaching Gap: Best Ideas from the World's Teachers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Free Press.
- Stolle, D. (1998) Bowling together, bowling alon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49–525.
- Stolle, D. and Hooghe, M. (2003)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Basingstoke: Palgrave.
- Stone, L. (1977)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Strang, H. and Vernon, J. (1992)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Crime: East meets West*.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Distributed in North America by 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Y.
- Struch, N. and Schwartz, S. H. (1989) Intergroup aggression: its predictors and distinctness from in-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3): 364–73.
- Sullivan, A. (2001)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35(4): 893–912.
- Sullivan, J. L. and Transue, J. E. (1999) The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emocracy: a selectiv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toleranc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0: 625–50.
- Sullivan, J. L., Borgida, E., Jackson, M. S., Riedel, E. and Oxendine, A. R. (2002) A tale of two towns: 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resources in a community electronic network. *Political Behavior*, 24(1): 55–84.
- Sun, L. and Jiang, Q. (2000) Community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I-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7(1–2): 99–113.

- Sun, Y. (1998) The academic success of East-Asian American students: an investment mode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7(4): 432–56.
- Sun, Y. (1999) The contextual effects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8: 403–26.
- Sundstrom, E. D. (1986) *Work Places: The Psychology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Offices and Fact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omi, S. J. (1997) Early determinants of behaviour: evidence from primate studies.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3: 170–84.
- Szreter, S. (1999)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for New Labour: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Policy paper 15.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 Szreter, S. (2002) The state of social capital: bringing back in power, politics, and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31(5): 573–621.
- Tajfel, H. (1970) 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23: 96–102.
-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 (2002) Enterprise, embeddedness and exclusion: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in Fiji.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3(3): 302–15.
- Taylor, S. and Taylor, B. (1996) Tran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alpern, D. S., Wood, S., White, S. and Cameron G. (eds) *Options for Britain: A Strategic Policy Review*. Dartmouth: Aldershot.
- Taylor-Gooby, P. (forthcoming) Markets and motives: trust and egoism in welfare markets.
- Teachman, J. D., Paasch, K. and Carver, K.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dropping out of school ea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773–83.
- Teachman, J. D., Paasch, K. and Carver, K.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Forces*, 75(4): 1343–59.
- Temple, J. (1998) Initial condi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 7(3): 309–47.
- Temple, J. and Johnson, P. A. (1998) 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3): 965–90.
- Therell, T., Blomkvist, V., Jonsson, H., Schulman, S., Berntorp, E. and Stegandal, L. (1995) Social sup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e function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7: 32–6.
- Thomas, C. B. and Duszynski, K. R. (1974) Closeness to parents and the family constellation i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five disease states: suicide, mental illness, malignant tumor, hyperten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hn Hopkins Medical Journal*, 134: 251.
- Thompson, B. and Aikens, S. (1998) If only Jefferson had email. *New Statesman*, 20 February.
- Thomson, R., Henderson, S. and Holland, J. (2003) Making the most of what you've got? Resources, values and inequalities in young women's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Educational Review*, 55(1): 33–46.
- Titmuss, R. M. (1970) *The Gift Relationship*.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Tolbert, C. J., Lowenstein, D. and Donovan, T. (1998) Election law and rules for using initiatives. In Bowler, S., Donovan, T. and Tolbert, L. (eds) *Citizens as Legislators: Direc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onn, B. E., Zambrano, P. and Moore, S. (2001) Community networks or networked communitie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9(2): 201–12.
- Torney-Purta, J. (2002) The school's role in developing civic engagement: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twenty-eight countries.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6(4): 203–12.
- Torney-Purta, J., Lehmann, R., Oswald, H. and Schulz, W. (2001)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in Twenty-Eight Countries: Civic Knowledge and Engagement at Age Fourteen*.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
- Trasler, G. B. (1980) Aspects of causality, culture and cri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a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ociological, Penal and Penitentiary Research and Studies, Messina.
- Treisman, D. (2000)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3): 399–457.
- Trower, P., Gilbert, P. and Sherling, G. (1990) Social anxiety, evolution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Leitenberg, H. (e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valuation Anxiet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Tufarelli, C. and Fagotto, E. (1999) Operationalising the social capital hypothesis for development finance. *Economic Analysis*, 2(3): 223–44.
- Tyler, K. A., Hoyt, D. R. and Whitbeck, L. B. (2000) The effects of early sexual abuse on later sexual victimization among female homeless and runawa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5(3): 235–50.
- UCLA (2003) *The UCLA Internet Report: 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 <http://ccp.ucla.edu/pdf/UCLA-Internet-Report-Year-Three.pdf>
- Urry, J. (2002) Mobility and proximity. *Soc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6(2): 255–74.
- U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93) *Consumer Fraud and the Elderly: Easy Pre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eem, E. L., Christman, J. B., Gold, E. and Simon, E. (1997) Reforming alone: barriers to organisational learning in urban school change initiative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tudents Placed at Risk*, 2(1): 55–78.
- Uslaner, E. M. (1998) Social capital, television, and the 'mean world': trust, optimism,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441–67.
- 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5–67.
- Uzzi, B. (1999)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4): 481–505.
- Valadez, J. R. (2002)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mathematics course selection by Latino high school student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s*, 24(3): 319–39.
- Valentine, S. and Fleischman, G. (2002) Ethics codes and professionals' tolerance of societal divers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40(4): 301–12.

- Valenzuela, A. and Dornbusch, S. M. (1994) Familism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exican origin and Anglo adolesc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5(1): 18–36.
- Van Deth, J. W. (2000) Interesting but irrelevant: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aliency of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 115–47.
- Van-de-Klundert, T. (1999)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thics. *De Economist*, 147(2): 127–49.
- Vaughn, C. E. and Leff, J. P. (1976)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course of psychiatric illness: a comparison of schizophrenic and depressed neurotic 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9: 125–37.
- Veenhoven, R.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 1–34.
- Veenstra, G. (2000) Social capital, SES and health: an individual leve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0(5): 619–29.
- Veenstra, G. (2002a)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plus weal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health governan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4(6): 849–68.
- Veenstra, G. (2002b) Explicating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ivil spac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7(4): 547–72.
- Veiga, J. F. et al. (2000) Using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to uncover the trac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1(2): 223–38.
- Voas, D. (2003) Intermarriage and the demography of secular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 83–108.
- Vogt, T. M., Mullooly, J. P., Ernst, D., Pope, C. R. and Hollis, J. F. (1992) Social networks as predictors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cancer, stroke and hypertension: incidence, survival and mortality.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45: 659–66.
- Vuille, J. C. and Schenkel, M. (2002)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smoking in Swiss adolescen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chool stress and social capital in schools. *Sozial und Präventivmedizin*, 47(4): 240–50.
- Wacquant, L. J. D. (1998) Negative social capital: state breakdown and social destitution in America's urban cor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3(1): 25–40.
- Waldinger, R., Aldrich, H. and Ward, R. (1990) *Ethnic Entrepreneurs*. London: Sage.
- Walker, R. (1998) Unpicking poverty. In Oppenheim, C. (ed.) *An Inclusive Society: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PPR.
- Wallace, R. and Wallace, D. (1997) Community marginalis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disease and dis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1341–5.
- Wallerstein, N. (2002) Empowerment to reduce health disparit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0(3): 72–7.
- Wallis, J. and Dollery, B. (2001) Government failur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New Zealand model for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9(2): 245–63.
- Wallis, J. and Dollery, B.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ment capa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1(3): 76–85.

- Walmsley, D. J. (1988) *Urban Living*. Harlow: Longman.
- Wang, H. Z. and Hsiao, H. H. M. (2002) Social capital or human capital? Professionals in overseas Taiwanese fir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2(3), 346–62.
- Warr, P. (1987) *Work, 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tson, G. W. and Papamarcos, S. D.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16(4): 537–52.
- Watt, R. G. (2002) Emerging theories into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oral health promotion. *Community Dentistry and Oral Epidemiology*, 30(4): 241–7.
- Watts, F. and Morant, N. (2001) Health and illness. In Fraser, C. and Burchell, B. (eds) *Introducing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 Webb, J. (1996) *Direct Line Homesafe*. Nottingham: Janice Webb Research. Unpublished report for Crime Concern.
- Webb, V. J. and Katz, C. M. (1997) Citizen ratings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policing activities.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20(1): 7–23.
- Wedmore, K. and Freeman, H. (1984) Social pathology and urban overgrowth. In Freeman, H. (ed.) *Mental Illnes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 Weijland, H. (1999) Microenterprise clusters in rural Indonesia: industrial seedbed and policy target. *World Development*, 27(9): 1515–30.
- Weiner, B. (1979) 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 3–25.
- Welin, L., Tibblin, G., Svardsudd, K., Tibblin, B., Ander-Peciva, S., Larsson, B. and Wilhelmsen, L. (1985) Prospective study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mortality: the study of men born in 1913 and 1923. *Lancet*, 1: 915–18.
- Wenger, G. C. (1997) Nurturing networks. *Demos Collection*, 12: 28–9.
- West, A. and McCormick, J. (1998) Citizens' involvement in combating poverty at local level. In Oppenheim, C. (ed.) *An Inclusive Society: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Poverty*. London: IPPR.
- West, M. D. (2002) The resolution of karaoke disputes: the calculus of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8(2): 301–37.
- Whitbeck, L. B. and Hoyt, D. R. (1999) *Nowhere to Grow: Homeless and Runaway Adolesc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 White, M. (1991) *Against Unemployment*.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Whitehead, A. (forthcoming) Recovering communitarianism. Paper circulated to NEXUS Quality of Life group.
- Whiteley, P.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Sheffiel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 Whiteley, P. (1998) Th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 Paper presented to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workshop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Bath University, 6 November.
- Whyley, C., McCormick, J. and Kempson, E. (1998) *Paying for Peace of Mind: Access to Home Contents Insurance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Wilkinson, R. G.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Wilkinson, R. G. (1997)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ohe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 104–6.
- Wilkinson, R. G. (2000)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power: further issues for a public health agend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4: 409–13.
- Williams, A. W., Ware, J. E. and Donald, C. A. (1981) A model of mental health,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s applicable to gener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 22: 324–36.
- Williams, J. (1997) On the dynamic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crime. Dissertation, Rice Universit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 Williams, J. and Sickles, R. C. (2002) An analysis of the crime as work model: evidence from the 1958 Philadelphia birth cohort stud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7(3): 479–509.
- Willmott, P. (1963) *The Evolution of a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illms, J. D. (2000) Three hypotheses about community effects relevant to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o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well-be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OEC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Well-Being', March.
- Wilson, P. N. (2000)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the agribusines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5(1): 1–13.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 J. (1997)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Wolf, S. and Bruhn, J. G. (1993) *The Power of Clan: The Influ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 on Heart Diseas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Wolf, S. A., Borko, H., Elliott, R. L. and McIver, M. C. (2000) 'That dog won't hunt!': exemplary school change efforts within the Kentucky reform.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7(2): 349–93.
- Wollebaek, D. and Selle, P. (2002) Doe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to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intensity, scope, and typ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1(1): 32–61.
- 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s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151–208.
- Woolcock, M. and Narayan, D. (2000)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5(2): 225–49.
- World Bank (1999) 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
- World Values Survey www.worldvaluessurvey.org
- Worms, J. P. (2000) Old and new civic and social ties in France. In *Society and Civic Spirit (Gesellschaft und Gemeinssin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 2002 in Putnam, R. D.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 W. (1999) Successful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the rol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68(1): 5–22.
- Yanay, U. (1994) The 'big brother' function of block wat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4(9): 44–58.
- Yancy, W. (1971) Architectur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control: the case of a large-scale public housing project.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3: 361–70.
- Yarwood, R. and Edwards, B. (1995) Voluntary action in rural areas: the case of Neighbourhood Watch.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4): 447–59.
- Yin, P. (1982) Fear of crime as a problem for the elderly. *Social Problems*, 30(2): 240–5.
- Young, M. and Willmott, P. (1957) *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Zacharakis-Jutz, J. (2001) Strategic planning in rural town meetings: issues related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In Campbell, P. and Burnaby, B. (eds)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in Adult Education*. Mahwah, NJ: Erlbaum Associates.
- Zajonc, R. B. and Markus, G. B. (1975) Birth order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82(1): 74–88.
- Zimbardo, P. G. (1971) *The Psychological Power and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Statement prepared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Ceremonial Courtroom, San Francisco.
- Zoccolillo, M., Pickles, A., Quinton, D. and Rutter, M. (1992) The outcome of childhood conduct disorder: implications for defining adult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conduct disorder.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2: 971–86.
- Zweigenhaft, R. L. (1993) Prep school and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of Harvar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4(2): 211–25.

索引

(頁編碼為原文書頁碼，檢索時請按頁編碼查詢)

- Abouchaar, A. 169
- Africa 非洲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族群與宗教衝突 261
 - farming communities 農耕社群 53
 - government and 政府以及 187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8, 60, 62, 193
- African-Americans 非裔美國人
-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48-9
 - age 年齡
 - generational changes 世代變遷 227-8, 235
 - mutual respect 相互信任 321
 - patterns of engagement 投入社會的模式 248
- Aldridge, S. 324
- Alesina, A. 191, 195
- Allport, Gordon
- Contact Hypothesis 接觸假設 261
- Americorps 美國服務隊 301
- Amish community Amish 社群 88, 110
- Argentina 阿根廷 216
-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3
- Arrow 29
- arts policies 藝術政策 294
- Asia-Pacific regions 亞太區域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 62
 -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跨國治理 181-2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62
- Boix and Posner's review of Boix 與 Posner 對它的討論 183-6
- data on U.S. decline 美國衰退的資料 201-3
- de Tocqueville on 托克威爾對它的討論 3, 5
- government 政府 170-1
- Putnam on U.S. 普特南論美國 199-211
- rising types of groups 上升的群體類型 202
- trends 趨勢 211-21, 222-7, 241-3
- attachment theory 依附理論 248-9
- Australia 澳洲 287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1-12, 222
- compulsory voting 強制性投票 322
- families and education 家庭與教育 143
-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242
- Bailey, K. 150
- Bangladesh 孟加拉 188

- Barker, R. G. 139-40
- Baron, S. 169
- Baum, A. 265-6
- Beaulieu, L. J. 145
- behaviour 行爲
- appropriate and moral 合宜的及符合道德的 241
 - 'behavioural setting' 行爲場景 139-40
- modelling on families 模塑家人的行爲 250
- Belgium 比利時
-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96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願性組織 259
- Bell, K. 301
- Berkman, Lisa 81-2
- Berkman, Lisa F. 17, 94, 112
- Berla, N. 142
- Bettertogether* (Saguaro Seminars) 《在一起更好》(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 293-5
- Bianchi, S. M. 146-7
- Blair, S. L. 148-9
- Blair, Tony 布萊爾 214, 284
- Blomberg, T. 119, 179, 181
- Boix, C. 183-6, 188, 194
- bonding and bridging 黏著性與架接性 19-22, 153
- Bourdieu, Pierre 布爾迪厄 271
-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概念 6-7, 10, 23
- Bowlby, John 248-9, 261, 282
- Bowling Alone* (Putnam) 《獨自打保齡球》(普特南) 176, 230, 242, 243
- decline of US civic life 美國公民生活的衰退 199-211
- Braithwaite, J. 138, 141
- Brazil 巴西 99, 216
- Breault, K. D. 120
- Brehm, J. 232
- Britain 英國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22
 - changing values 改變的價值觀 234-5, 243
 - 'Connexions' advisory service 「銜接」諮詢服務 298-9
 - cultivates voluntary sector 耕耘志願服務的領域 232
 - devolution of nations 國家的權力下放 175
 - education 教育 143, 150-1, 161
 -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族群與教育 148-9
 - Experience Corps 經驗服務隊 302
 - failing schools 失敗的學校 158-60
 - heart disease 心臟病 93
 -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242
 - Millennium volunteers 千禧年計畫志工 301-2
 - Pakistani community 巴基斯坦社群 90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6-7
 - social capital trends 社會資本趨勢 212-16
 - widening inequality 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232-3

- Britain 英國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 British Crime Surveys 英國犯罪調查
120, 122
- helpfulness of others 他人是樂於助人的
214
- British Household Survey 英國家戶普查
34, 88, 164
- education of mothers 母親的教育
251-2
- British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ohort
英國國家兒童發展世代資料 164
- British Telecom 英國電信(公司) 57
- Brown, G. 76-7, 83, 88
- Bruhn, J. G. 257
- Bryk, A. S. 151
- Buck, N. 51
- Bulgaria 保加利亞 216
- Burchell, B. 282
- Burton, L. 171
- Bush, George W. 小布希 38, 210
- volunteering programmes 志願服務方
案 299, 301, 324
- business 商業
- citizens' juries and 公民陪審團以及
321
- firm as social capital 廠商做為社會資
本 53-4
- links and clusters 連結與群聚 54-6
- local networks 當地網絡 304-6
- optimizing social capital 極大化社會
資本 57-9
- personal networks 個人網絡 313-14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與發展
57-8
- trust and 信任及 2-3
-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社會資本的
種類以及 67-9
- Cahn, Edgar 316
- Cambridge, England 英國劍橋 55
- Canada 加拿大 287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18
- health and environment 健康與環境
105, 109
- Red River flood 紅河水災 173
- Card, D. 162
- Carver, K. 148, 152, 153, 160, 169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會 193, 268,
269-71
- Cavendish, Will 181
- Chen, S. 301
- Chen, X. 181-2
- Chicago 芝加哥
- community health 社區的健康 89,
93
- crime 犯罪 124-5, 127
- education 教育 157
- social housing 社會住宅 313
- child abuse 虐待孩童 121
- Chile 智利 162
- China 中國 68, 118, 119
- Church of England 英國聖公會 213
- Cincinnati, Ohio 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127
- Cisco Systems 思科集團 57
- Citizens' Audit (UK) 英國公民審計
161

- citizens' juries 公民陪審團 321
- citizenship education 公民教育 165, 169, 315, 320
- civil and human rights 公民權 (資格) 與人權
- moral discourse 道德論述 321
- rise in expectations 期待的上升 275
- transnational action 跨國行動 182-3
-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
- co-operation 合作 187
-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1
-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教育與參與 163-6; see also associational life 請一併參考結社生活
- class 階級
- British political interest 英國政治興趣 215-16
- civil involvement and 公民參與以及 250-2
- effect on health 對健康的影響 103-6
- inequalities 不平等 232-3
- upwardly mobile 向上流動 49-50
- women's labour and 女性勞動 272
- Clinton, Bill 柯林頓 182, 301
- Cohen, Sheldon 80-1
- Coleman, James S. 2-3, 7, 14, 28, 39, 113
- Catholic education 天主教教育 151-2
-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定義 16
- education 教育 156-7
- New York diamond merchants 紐約的鑽石商人 50-1
- Columbia 哥倫比亞 118, 153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通訊科技
- community network 社群網絡 307-9
- migrants and 移民以及 263
- mobile phones 行動電話 314-15
- social contact 社會接觸 207
- upmystreet.com 309
- communities and neighbourhoods 社群與社區 10
- assessment 評估 288-91
- associational life of 其結社生活 257-9
- built environment 被建造的環境 91-5, 264-7, 289, 310-13
- business networks 商業網絡 304-6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通訊科技以及 307-9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21-9, 303-4
-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1
- effect of transport 交通的影響 263
- ethnic heterogeneity 族群異質性 260-2
- low tolerance of 容忍度低的 90
- membership 其成員 11-12
- mental health/ happiness 心理健康 / 快樂 87-91
- meso-economics 中觀的經濟情況 51-3
- public spaces 公共空間 237-8
- residential mobility 住戶流動 262-3
- scale 規模 267
- schools and education 學校與教育

- 167-8, 259-60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8
- social housing 社會住宅 311-13
- striving neighbourhoods 不斷搏鬥的
社區 122
- trusts 信任 304
- Connex 306
- Contact Hypothesis 接觸假設 261
- Coase, R. 6, 66
- crime 犯罪
- all levels 各種層面的 135-8
- 'behavioural setting' 「行為場景」
139-40
- 'collective efficacy' 「集體效能」
124-6
- community/ neighbourhoods 社群與社
區 121-4
- as contagious 具傳染性的 123
- corruption 貪腐 291
- effect of prison 監獄的效果 119
- gangs 幫派 125
- Mafia social structure 黑手黨的社會結
構 270
- meso-economics 中觀的經濟情況 52
- murder rates 謀殺率 130, 132, 225
- 'negative' social capital 「負向」社會
資本 118-19
-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
守望計畫 126-9
- offenders 加害人 114-19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9-300,
303-4
- security over trust 信任帶來的安全感
209
- self-interested values 自利的價值觀
133-4
- shaming 使人感到羞辱的方法
138-9
-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社會解體
理論 140-1
- social norms and 社會規範以及
129-32, 130-2
- theories of 的理論 113-14
- tolerance of 對其容忍 275
- victims and fear 受害者與恐懼
119-21, 126, 131
- Crocodile Dundee* (film) 鱷魚先生 (電
影) 134
- Cross, R. 58
- culture 文化
- 'bohemian' index 「波希米亞」指標
64
- cause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原
因 267-71
- close communities 閉鎖的社群 95
- difference and research 差異與研究
36-7
- habits and customs 習慣與風俗 15
- Curobato, Brazil 巴西的 52-3
- Cusack, T. R. 175-6, 186
- Cushing, R. 72
- Czech Republic 捷克 (共和國) 179,
181, 188
- Davis, G. E. 266
- DDB Needham Life Style studies DDB
Needham 生活方式調查 200, 307

- De Filippis, J. 50
- De Kadt, R. 20
- Delhey, J. 282
- democracy 民主
-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鼓勵參與 183-6, 188
 - ethnic diversity 族群多樣性 188
 - local decision making 地方做決策 173-4
 - regional efficacy 地區效能 7-8
 - tolerance and participation 容忍與參與 184
- Denmark 丹麥
- business networks 商業網絡 55
 - café culture 咖啡廳文化 314
 - education 教育 163
 -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96-7
- Desforges, C. 169
- diamond merchants 鑽石商人 2-3
- component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組成元素 12
 - meso-level economics 中觀經濟學 50-1
- Douglass, Fredrick 270
- Duffy, Bob 181
- Durkheim, Émile 涂爾幹 3, 5
- suicide studies 自殺研究 73-4, 87, 90-1, 98-9
- Earls, F. 141
- economics 經濟學
- crime and inequality 犯罪與不平等 132-3
 - ethnicity, social and gender 族群、社會及性別的 47-8
 - forms of capital 資本的種類 4
 - game theory and 賽局理論以及 66-7
 - health and 健康以及 101-9
 - inequality 不平等 107-9, 232-3, 271
 -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65-6
 - inhibiting effects 抑制性的效果 70-1
 - interpersonal networks 人際關係網絡 43-4
 - labour and earnings 勞動與所得 44-7
 - meso-level effects 中觀的影響 50-9
 - micro-level effects 微觀層面的影響 44-50
 - money and happiness 金錢與快樂 80
 - national performance 各國的表現 59-63
 - public service and 公眾服務以及 107-9
 - social capital effects 社會資本的影響 48-50, 69-70, 70-2
 - in sociology 在社會學裡 31
 - trust and performance 信任與表現 8
 - wealth and values 財富與價值 237-8
- education 教育 166-9, 251
- aspiration 企圖心 144, 150, 152-5
 - business networks 商業網絡 306
 - Catholic schools 天主教會學校 151-2, 167-8
 - citizenship 公民權 165, 169
 - closure controversy 緊密性的爭議 152-5
 - communities and 社群以及 151-60, 167-8, 259-60
 - creates social capital 創造社會資本

- 163-6, 233, 281
- cycle of disadvantage 劣勢的循環 142
- ethnic minorities 弱勢族裔 148-9
-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 164
- families and 家庭以及 142-51, 144-7, 155, 166-7
- local economics and 地方的經濟情況以及 157-8
- mentoring 顧問諮詢 149-51, 297-9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 reading groups 閱讀團體 314
-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地區與全國的層級 160-3, 168-9
- schools' social capital 學校的社會資本 158-60
- social engagement and 社會參與以及 252-3
- Edwards, B. 39
-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18
- power relations 權力關係 22, 23, 25
- Eisner, M. 225, 243
- Elazar, Daniel 176
- employment 就業; see work 請參考工作
- environment 環境
- associations 社團 212-13, 222
- associations for 環保團體 201-2
- collective gardens 集體花園 312
- designed 設計而成的 264-7
- and economics 以及經濟情況 52-3
- education for 環保教育 166
- and health 以及健康 103-6
- physical 物理上的 289
- planning policy 都市規劃的政策 310-13
- Estonia 愛沙尼亞 216
- ethnicity and race 族群與種族 281
- Allport's Contact Hypothesis Allport 的接觸假設 261
- community social bonding 社群的社會黏著 260-2
-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社會資本的概念以及 14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25
- diversity in democracies 民主的多樣性 188
- economic differences 經濟差異 47-8
- education 教育 148-9
-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78, 88-9
- politics and 政治以及 191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2, 64
- volunteering 300-1 志願服務
- Europe 歐洲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參與 189-92
- Putnam's thesis and 普特南的命題以及 229-31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 62-3, 66, 67
- view of Saguaro Seminars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的觀點 293
-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歐盟)
- Social Fund 社會基金 300
-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跨國治理 182

- families 家庭
- Bowlby's attachment theory Bowlby 的
依附理論 248-9
- child abuse 虐待孩童 121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29
-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2
-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42-51, 155
- generational change 世代變遷 227-8,
235
- health and 健康以及 77, 81
- modelling behaviour on 模塑行爲
250
- mothers' education 母親教育 251-2
- parenting styles 父母管教的方式
116, 136-7
- policy-making 政策制定 295-7
- single parents 單親 249
- social base 社會基礎 205-7
- step relations 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146
- structure and process 結構與過程
145-7
- trust and business 信任與商業 67-8
- wider social networks 更廣的社會網
絡 147-8
- working parents 有工作的父母 228
- youth and crime 年輕人與犯罪
115-18
- Fawzy, F. I. 83
- Fedderke, J. 20
- Festinger, L. 264
- Field, J. 169
- Fine, Ben 13, 31, 39
- Finland 芬蘭 95, 162-3
- Fisher, Irving 6
- Florida, Richard 64, 72
- Foley, M. W. 18, 22, 23, 25, 39
- Fountain, J. E. 55-6
- France 法國 96-7, 221-2, 231, 274
- Fraser, C. 282
- free-riding 搭便車 22
- Freeman, H. F. 84
- Friedman, M. 83
- Friendly Societies 互助會 273, 292
- Fukuyama, Francis 福山 8, 59, 67-9 ;
Trust 《信任》 72
- Furstenberg, F. F. 147
- game theory 賽局理論
- trust and economics 信任與經濟情況
66-7
- Gates, G. 72
- gender 性別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14-15, 117
- economic differences 經濟差異 48
- health differences 健康差異 110
-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76, 78
- mortality rates 死亡率 101
- voluntary work and 志願工作以及
272
- working mothers 職業婦女 146-7
-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Britain 英國
家戶普查 248
-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 一般社會
調查 255
- Gerber, Alan S. 190-1, 194

- Germany 德國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21, 222
 - changing values 改變的價值觀 234-5
 - crime and family 犯罪與家庭 117-18
 - education 教育 159
 - local government 當地政府 186
 - regional government 地區政府 175-6
 - reunification 221 東西德統一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願性組織 258-9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4
- Gilligan, J. 132-3
- Gittell, R. 19, 20, 21
- Glaser, E. 191, 195
- Glass, T. 94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 economics and social capital 經濟情況及社會資本 69-70
 - transnational government 跨國治理 181-3
- Goldthorpe, J. H. 23
- Government 政府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170-1, 183-6
 - caus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因果關係與社會資本 186-8
 - corruption 貪腐 178
 - local groups 地方上的團體 171-4
 - means-tested benefits 經過經濟狀況調查後發放的補助 257
 - national level 全國層面的 177-81
 - participation 參與 184
 - political trust 政治信任 180
 - post-Soviet case 後蘇維埃的例子 179, 181
 - promoting social capital 促進社會資本 231-2
 - reciprocity 互惠 176-7
 - regional 地區的 7-8, 174-7
 - transnational 跨國的 181-3
- Granovetter, Mark S. 19-20, 45, 58
- Greece 101 希臘
- Green, D. P. 194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組織 201-2
- Grenier, P. 215
- Guttman, J. M. 66
- Hagan, J. 118
- Hall, P. A. 243
-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社團的會員數 212, 214, 215
 - British voluntary sector 英國的志願服務領域 232
 - voluntary sector 志願服務領域 290-1
 - women and education 女性與教育 253
 - women working 職場上的婦女 272
- Halpern, David S. 182, 261, 282
- 'Catherine Wheel' model 「凱薩琳之輪」模型 276-9
 - crime statistics 犯罪的統計數字 133
 - individualistic values 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值觀 238, 239
 - physical environment 物理環境 263, 266
 - strategy paper 策略小組的文件 324

- Hanifan, L. J. 6, 10
- Hargreaves, David 158-9
- Harnz Polls 210
- Harris, T. 76-7, 83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社群心理健康 88
- Hartless, G. 145
- Healey, Tom 324
- health and well-being 健康與生活安適
 air travel example 飛機的比喻 104-6
 blaming the victim 責怪受害者 104
 causal relationships 因果關係 74-5
 communities and 87-91, 91-5, 110 社群以及
 education about 相關的教育 166
 happiness 快樂 79-80, 87-91
 individuals 個體 109-10
 inequality 不平等 107-9, 111-12
 material versus psycho-social 物質性
 相對於心理-社會性的解釋 101-6, 111-12
 nations and 各國以及 95-9, 99-101, 106-12, 110
 physical illnesses 80-4 生理疾病
 self-rated 110 自我評斷的
 stress and causes 壓力與原因 84-6
 suicide rates 自殺率 73-4, 110
 unhealthy behaviours and isolation 不健康的行為與孤離 86
- Hegel, Georg W. F. 黑格爾 20
- Held David 182, 325
- Heller, Patrick 177
- Helliwell, John 64, 72, 112, 262
 nations and mental health 各國與心理
 健康 97-9
 regional governance 地區的治理 174-5
- Henderson, A. T. 142
- Hierbert, J. 160
- Hirsch, F. 238
- Holland, P. B. 151
- homosexuality 同性戀 64
- Hong Kong 香港 143
- Hooghe, M. 259, 282
- housing 住屋 172-3, 311-13; *see also*
 under environment, built 請一併參考環境, 被建造的
- Huckfeldt, R. 189-90
- Hughes, M. E. 147
- 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 4
-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人權公約 182
- Hungary 匈牙利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governance 治理 177
 physical health 生理健康 100, 106-7
- Iceland 冰島 101
- identity 認同 192
- immigrants and migration 移民與遷移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58
 global social capital 全球社會資本 69
 post-9/11 U.S. 911 事件以後的美國 209
 residential mobility 住戶的流動 262-3
 social trust and 社會信任以及 262

- upward mobility 向上流動 49-50
- India 印度 153, 177
education 教育 153
- individuals and individualism 個人與個人主義
and associational life 以及結社生活 223-4
consumerism and 消費主義以及 229
effect on national values 對國家的價值觀的影響 274-6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17-18, 279-81
not necessarily selfish 不必然是自私的 238-40
trends towards 其趨勢 242
- inequality 不平等
case for intervention 介入的例子 285-6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32-3
economics 經濟狀態 271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281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階序社會結構 269-71
omitted from Saguaro Seminars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遺漏的 293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54
- Inglehart, Ronald 235-6
- interest groups 利益團體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2
internet connections 網際網路的連接 307
-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國際犯罪受害調查 133-4, 141
- Ireland 愛爾蘭 55, 90, 287
- Israel, G. D. 145
- Italy 義大利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170, 174-5, 185, 231, 261-2, 268
regional economics 地區的經濟情況 63-4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97
- Jacob, Jane 6
- Japan 日本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9-20
corporate politics 企業政治 186
education 教育 159
health 健康 101
Putnam's analysis and 普特南的分析以及 230
service credit 服務點數 317
trust and 信任以及 8, 59, 60
- Johnian News* 《聖約翰人通訊》 43
- Johnson, A. W. 149-50
- Jones, D. 146
- Kahne, J. 150
- Kanazawa, S. 255
- Kang, N. 255
- Kawachi, Ichiro 16, 106-7, 112, 130, 132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層面 17, 18
trust and illness 信任與疾病 99-101, 102
- Keefer, P. 72
civic co-operation 公民合作 187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63
- Kentworthy, L. 62
- Kirkholt project Kirkholt 方案 127
- Knack, Steve 16, 72
- civic co-operation 公民合作 187
- reciprocity 互惠 176-7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3
- Kposowa, A. 120
- Kraft, E. 181
- Krueger, A. B. 162
- Krug, B. 69
- Kunioka, T. 179
- Kwak, N. 255
- La Due Lake, R. 189-90
- La Porta, R. 177-8, 185, 270-1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59, 60
- Latvia 拉脫維亞 216
- Laub, J. H. 115, 117, 141
- Lavis, J. 108
- law 法律; see also sanctions 請一併參考
考約束力量
- Lawrence, R. J. 237-8
- Le Grand, Julian 273
- Lee, V. E. 151
- Leffert, N. 115
- Leicester Neighborhood Watch Leicester
社區守望計畫 128
- Lithuania 立陶宛 216
- Llewellyn, C. 23
- Lochner, Kimberly 16
- London Theatre Festival 倫敦戲劇節
305
- lottery winners 樂透彩得主 80
- Loury, Glenn C. 47, 72
- Lowndes, V. 36, 224
- Lui, J. 119
- Luiz, J. 20
- Lynch, J. W. 104, 107, 112, 105, 115
- McCarthy, B. 118
- McGrew, A. 182
-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46
- Maier, K. D. 119, 179, 181
- Majoribanks, K. 143
- Making Democracy work* (Putnam) 《讓民主
運轉起來》(普特南) 7-8
- Marks and Spencer 54
- Marmot, M. G. 103
- marriage 婚姻 76, 79-80; see also
families 請一併參考家庭
- Martin, Lee 6
- materialism 物質主義
- individualism and 個人主義以及
229, 238-9
- post-materialist thesis 後物質主義的
命題 235-6
- values and 價值觀以及 237-8
- McKenzie, K. 112
- media 媒體
- moral discourse 道德論述 319-20
-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親密關係以及
76-7
- families and 家庭以及 77
- local/ community 當地/社群 87-91
- schizophrenia 阿茲海默症 78-9
- social support and 社會支持以及

- 75-9
- Mexico 墨西哥 62, 220
- military 軍事 91
- Minnesota Community Service Dollars 明尼蘇達社區服務幣 318
- Mittleman, M. S. 76-7
- Morgan, S. L. 152-3
- MORI (社會研究機構) 180-1
- motor industry 汽車製造業 54-6
- Muntaner, C. 112
- nation-states (民族) 國家
- 'Catherine Wheel' model and 「凱薩琳之輪」模型以及 276-9
- citizenship education 公民教育 315, 320
-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29-35
- economics and social capital 經濟情況與社會資本 59-63
- education 教育 160-3
- levels of trust in 對之的信任程度 59-61
- mental health of 其心理健康 95-9
- omitted from Saguaro Seminars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所遺漏的 293, 295
- physical health of 其生理健康 106-12
- policies of 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的政策 320-2
- regional economics 地區的經濟情況 63-5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8
- shared 'moral' discourse 共有的道德
- 論述 318-20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134
- trust and illness 信任與疾病 99-101
- National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Survey (U.S.) 美國犯罪受害調查 141
- 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NELS) 國家教育貫時研究 143, 145, 147, 152, 155, 157
- regional differences 地區的差異 160-1
- National Trust 各國的信任 212-13
- neighbourhood 鄰里 (社區); se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s 請見社群、社會網絡
-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守望計畫 126-9
- The Netherlands 荷蘭 46, 273, 310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9
- neuroeconomists 神經經濟學家 246
- New Haven,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州的新哈文 190-1
- New Zealand 紐西蘭 186
- Newton, K. 282
- Norris, P. 194
- Norway 挪威 162-3, 273
- O'Brien, M. 146
-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ONS) 國家統計局 287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03
- confidence in state institutions 對政府

- 機關的信心 277
- education 教育 162
- increased education levels 教育程度的增加 233
- intervention policies 介入性的政策 284, 285
- policy development reports 政策發展報告 324
- report on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關於人力與社會資本的報告 287
- research 研究 38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7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cont'd) 經貿組織合作暨發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316-17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92
-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國家之安和樂利》 31, 40
- Ornish, Dean 83-4, 112
- Paasch, K. 148, 152, 153, 160, 169
- Page, Ben 181
- Payne, C.
- Patersen, A. C. 115
- Petersen, T. 47
- Philadelphia Birth Cohort Study 費城出生世代研究 117
- physical capital 實物資本 4
- Plutzer, E. 148
- Poland 波蘭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 case for intervention 介入的實例 284, 285-6
- caution in assessment 對於評估的告誡 288-91
- community/ neighbourhood level 社群/社區的層面 303-15
-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社會資本的概念以及 1-2
- individual level 個人層面 295-302
- investment and substitution 投資與替代 291-2
- macro level 鉅觀層面 315-24
- measurement and date 測量方式與日期 286-8
- planning built environment 都市計畫中建造出的環境 310-13
- young offenders 年輕的違法者 299-300
- politics 政治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192-3
- in Britain 在英國 214-16
- compulsory voting 強制性投票 322
- participation 參與 188-92, 203-5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 trust in politicians 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205
- world trends 世界的趨勢 222
- Portes, A. 17, 18, 39
- Portugal 葡萄牙 216
- Posner, D. N. 183-6, 188, 194
- poverty 貧窮
-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56
- and health 以及健康 99, 101-6, 107-9

- initiatives to reduce 減少的方案 291
 personal networks 個人人際網絡
 313-14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2-4
 power relationships 權力關係
 public good and social capital 公共財
 與社會資本 22-5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兩難 67
 Pruitt-Igoe Project Pruitt-Igoe 計畫 310
 Prusak, L. 58
 psychology 心理學 35
 personality 人格 246-8
 public good 公共財
 power relations and 權力關係以及
 22-5
 public/ private sphere 公 / 私領域
 designed physical environment 經設計
 的物理環境 264-7
 public/ private spheres 公 / 私領域 237
 public service 公眾服務
 health and well-being 健康與生活安適
 107-8
 Putnam, Robert D. 普特南 viii-xv
 analysis centred on U.S. 針對美國的分
 析 229-31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62,
 183-6, 193, 194, 201-3
 'Benchmark Survey' 基準點調查
 287
 Bowling Alone 《獨自打保齡球》 176,
 199-211, 230, 242, 243
 on causes 論原因 234, 282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ty association 社群的結社
 258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概
 念 1, 6
 on crime 論犯罪 123, 225
 education 教育 161
 factors in decline 衰退的因素 227-9
 on happiness 論快樂 80
 on health 論健康 73, 86-7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階序社會
 結構 270
 on Italy 論義大利 170-1, 261-2, 268
 Making Democracy work 《讓民主運轉
 起來》 7-8
 post-war GIs 戰後的美國軍人法案
 257
 regional economics 地區的經濟情況
 63
 Saguaro Seminars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
 議 292-5, 324
 social trust measurement 社會信任的
 測量 32, 35
 on television 論電視 254-5
 transaction of capital 資本的交易 30
 'Tuning In, Tuning Out' 8
 women's labour 女性勞動 272
 and world trends 以及世界的趨勢
 223
 Qian, Z. 148-9
 Quinton, D. 117
 race 種族; see ethnicity and race 請見
 族群與種族
 Rahn, W. M. 232, 238-9

- Raleigh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me
 Raleigh 青年發展計畫 300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20-1
 Raudenbrush, S. W. 141
 Reagan, Ronald 雷根 273-4
 religion 宗教
 church membership 教友人數 203,
 211, 212, 213, 221, 222
 hierarchical 階序的 178, 268
 moral discourse and 道德論述以及
 319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social engagement 社會參與 254
 suicide and 自殺以及 73-4
 research 研究
 measurement 測量 31-2
 models for 研究模型 35-8
 social trust measurement 社會信任的
 測量 32-5
 trends 趨勢 37-8
 Restell, Tony 43
 Rich, P. 36
 Robinson, J. 146-7
 Romania 羅馬尼亞 179
 Roseto, Pennsylvania 賓州的 Roseto
 92-3, 110, 257
 Rothstein, Bo 223, 243, 282
 means-testing and trust 經濟情況調查
 與信任 273
 trust in Sweden 瑞典的信任情形
 257
 Royal Bank of Scotland 蘇格蘭皇家銀行
 306
 Rupasingha, A. 65
 Russia 俄羅斯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emotional health 情緒健康 77
 government in Novgorod 在 Novgorod
 的政府 186-7
 levels of trust 信任的程度 8, 60
 low social capital 低社會資本 273
 Novgorod government Novgorod 政府
 177
 physical health of 其生理健康 100-1,
 106-7
 Sacerdote, B. 191, 195
 Saguaro Seminars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
 324
 Bettertogether 《在一起更好》 293-5
 personal networks 個人人際網絡
 313-14
 St Louis, Missouri 密蘇里州的聖路易
 Pruitt-Igoe Project Pruitt-Igoe 計畫
 265
 Sampson, Robert 133, 155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crime 集體
 效能與犯罪 124-6
 Sampson, Robert J. 115, 117, 141
 sanctions 約束力量
 component of networks 網絡的元素
 11, 12
 traffic behaviour 交通行爲 15-16
 Sander, T. H. 169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101
 Scandinavia 北歐各國 (斯堪地那維
 亞)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衰退的社會資

- 本 216, 217
- trust 信任 60, 66; see also Denmark, Finland, Norway, Sweden 請一併參考丹麥、芬蘭、挪威、瑞典
- Schuller, T. 169
- Scotland 蘇格蘭 175
- Selle, P. 259
- Selye, Hans 84-5, 86
- Servadio, G. 6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8
- sexuality 性
- child abuse 虐待孩童 121
- teenage birth rates 青少年生育率 100
- tolerance 容忍 275; see also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s 請一併參考婚姻與伴侶
- Shaffer, D. R. 169, 282
- shame, crime and 羞辱、犯罪以及 138-9
- Singh, G. K. 120
-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3, 66-7
- idea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概念 5-6
- trust in business 商業的信任 68
- Smith, D. J. 115
-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
- academic research 學術研究 2, 9
- basic components of 其基本的組成元素 9-13
- as a 'big tent' 大帳幕 16-17
- bonding and bridging 黏著性與架接性 19-22, 21
- in businesses 在商業上 53-9
- as 'capital' 做為一種資本 29-31
- case for active intervention 積極介入的實例 285-6
- 'Catherine wheel' model of 「凱薩琳之輪」模型 276-9, 293
- causal direction of success 成功的因果方向 48-50
- components of 其組成元素 39
- concept of 概念 26, 27, 27-8, 38-9
- culture and social history 文化與社會史 267-71
- defining 界定 1, 2-3
- economic growth and 經濟成長以及 48-50, 70-2
- education as creator of 創造社會資本 163-6, 233
- forms of 各種種類 67-9
- free-riding 搭便車 22
- function of 其功能 39
- government creation of 政府創造社會資本 186-8
- historical view 歷史的觀點 3-9, 225-7
- individuals and engagement 個人與投入社會 246-57
- levels of 各層面 23-4, 28, 39, 276, 278-82
- macro-level 鉅觀層面 14-17, 315-24
- measuring 測量 31-7
- meso-level 中層 257-67
- models of 模型 35-8
- negative effects 負向效果 118-19, 152-5

- overstretching 過度擴張 13-14
 phenomena of 其現象 vii-viii
 policy making and 政策制定以及
 1-2
 power relationships 權力關係 22-5
 Putnam explains U.S. decline 普特南
 解釋美國的社會資本衰退 227-9
 trade-offs 取捨 288-91
 transformation of 轉化 241-3 ; see
 also trust 請一併參考信任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社會解體理
 論 140-1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impact on U.S. politics 對美國政治的
 影響 204-5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access and power 獲得的途徑與權力
 23
 closure 緊閉 10
 density 密度 10
 global 全球的 69-10
 levels of 各層面 13-19
 sanctions 約束力量 11, 12
 social norms 社會規範 10-11, 12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30-2
 shaming 令人感到羞辱 138-9
 social relations 社會關係
 café culture 咖啡廳文化 314
 crime victims and isolation 犯罪下的
 受害者以及孤離 119-21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2
 and happiness 以及快樂 79-80
 hierarchy 階序 269-71
 and illness 以及疾病 109-10
 social base 社會基礎 205-7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歷史的觀點
 3-9
 sociology 社會學 31
 Solow 29
 Sorensen, A. B. 152-3
 South Korea 南韓(韓國) 216
 Spain 西班牙 231
 Sponsor-a-Scholar 贊助一個學者(計
 畫) 149-50
 sports and recreation 運動與娛樂 322
 bowling alone 獨自打保齡球 207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史丹福監獄
 實驗 271
 Stigler, J. W. 160
 Stoddart, G. 108
 Stolle, D. 258-9, 282
 stress 壓力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一般適
 應症候群 84-5
 suicide 自殺
 Durkheim's study of 涂爾幹的研究
 73-4, 87, 90-1, 98-9
 empirical analysis of 實證研究 5
 Sullivan, J. L. 184
 Sun, Yongmin 156, 158
 Sweden 瑞典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18,
 222, 223
 community health 社群健康 94
 crime prevention 犯罪的避免 117
 education 教育 162-3

- high trust 高信任 257
- Putnam's analysis and 普特南的分析
以及 230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願性組織
258-9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3
- Swedish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瑞典
生活情況調查 218
- Switzerland 瑞士 96, 173
- Szreter, S. 25, 282
- Taipei, Taiwan 台灣台北
-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
守望計畫 128
- Tanzania 坦尚尼亞 63
- taxes 稅
- attitudes towards cheating 對欺詐的態
度 98
- compliance 順從 162, 185
- inequality and 不平等以及 234
- Teachman, J. D. 148, 152, 153, 157, 160,
169
- technology 技術 237-8
- television/ 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電視
/ 電子娛樂
- Putnam's thesis and 普特南的假設以
及 227-9, 230
-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rogrammes 節
目的質與量 255
- social engagement and 社會參與以及
254-6
- terrorism 恐怖主義
- post-9/11 U.S. 911 事件後的美國
209-10
- Thatcher, Margaret 柴契爾
-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沒有社會這
種東西 2
- welfare institutions 福利制度 273-4
- Timebank schemes 時間銀行方案 316,
317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維爾 3, 5
- Torney-Purta, J. 169
- trade unions 工會 203, 211
- traffic rules 交通規則 15
- transport 交通運輸 263
- Transue, J. E. 184, 238-9
- Treisman, D. 178
-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Wilson) 《真真正正的劣勢》 51
- trust 信任
- causes 原因 246
- codified 被列入明文的法律中 240-1
- crime levels 犯罪的程度 130, 132
- diamond merchants 鑽石商人 2-3
- economics and 經濟情況以及 8,
70-2
-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類
型 67-9
- game theory 賽局理論 66-7
- and illness 以及疾病 106-12
- means-testing and 經濟情況調查以及
257, 273
- national differences 各國差異 59-61,
134, 245
- policy making and 政策制定以及
291
- political 政治的 180, 205
- Trust* (Fukuyama) 《信任》(福山) 72

- 'Tuning In, Tuning Out' (Putnam) 8
- Tupelo,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的 Tupelo 52, 68
-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01
- United Kingdom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英國國家統計局 40
- United States 美國
-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5, 205-7
 - civic activities 公民活動 164
 - education 教育 143, 149-50, 158
 - effect of September 11 911 事件的效應 209-10, 243
 - ethnic heterogeneity 族群異質性 260-2
 - factors in social change 社會變遷的因素 227-9
 - families and 家庭以及 143, 296
 - giving and community 捐贈以及社群 207-9
 - health 健康 101
 - individualism of 其個人主義 231, 242
 - inequality 不平等 109
 - physical health of 其生理健康 106-7
 - policy-making 政策制定 292-5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參與 179, 188-92
 - Putnam's 'Benchmark Survey' 287
普特南的基準點調查
 - Putnam's Bowling Alone thesis* 普特南《獨自打保齡球》中的命題 199-211
 - qualitative data 量化資料 9
 - regional economics 地區的經濟情況 63-4
 -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8, 35, 59, 60, 67, 132, 208-9
 - tax compliance 納稅 185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3-4
- upmystreet.com 309
- urban-rural life 城市—鄉村生活
- crime 犯罪 122
 - designed physical environment 經過設計的物理環境 264-7
 - ignoring strangers 忽視陌生人 134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 scale 規模 267
 - suburbanization 郊區化 227, 228-9, 232
- Vallins, S. 265
- values 價值觀
- causes of change 變遷的原因 234-5
 -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開明的自利觀 240-1
 - 'finders keepers' 「誰檢到歸誰」 239
 - individualist 個人主義者 238-40 ; 274-6
 - mixing and matching 混雜與吻合 222-3
 - moral discourse 道德論述 318-20
 - moral panics 道德恐慌 235
 - post-materialism 後物質主義 235-6
 - self-interest and crime 自利與犯罪 133-4

-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ism 傳統與個人主義 236-7
- Van Deth, Jam 189-90, 191, 194, 223
- Veiga, J. F. 36
- Victoria, Australia 澳洲的維多利亞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守望計畫 128
- Vidal, A. 19, 20, 21
- volunteering 志願服務
- age differences 年齡差異 248
- Australia 澳洲 212
- in Britain 在英國 212-14, 232, 290-1
- business and 商業以及 306, 314
- character of individuals 個人的特質 258
- The Netherlands 荷蘭 219
- policy making and 政策制定以及 300-2
-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8
- Sweden 瑞典 218
- U.S. 美國 207-9
- Wales 威爾斯 175
- Weich, S. 112
- welfare programmes 福利計畫 289-90
- factor in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中的因素 272-4
-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ECD) 《國家之安和樂利：人力與社會資本的角色》 31, 40
- Whiteley, P. 59-61, 68
- Whitley, R. 112
- Wilkinson, John 112
- Wilkinson, Richard 103-4, 105
- Williams, T. 171
- Willms, J. D. 158
- Wilson, P. N. 44
-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真真正正的劣勢》 51
- Wolf, S. 257
- Wollebaek, D. 259
- Woller, G. M. 179
- Woolcock, Michael 20, 21, 23-4, 39
- work 工作
-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281-2
- individual earnings 個人所得 45-7
- individual networks 個人人際網絡 44-5, 48
- labour market 勞動力市場 272
- local governance 地方治理 171-2
- mental health and 心理健康以及 77
- meso-economics 中觀的經濟情況 51-2
- migration 遷移 45
-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 Putnam's thesis and 普特南的命題以及 227-9, 230-1
- social relations and 社會關係以及 2, 206-7, 253
- and volunteering 以及志願服務 272
-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 'big tent' definition 「大帳幕式的」定義 16-17
- interest in social capital 對社會資本的

- 興趣 38
- website resource 網路上的資源 40
- World Values Survey 世界價值觀調查
97, 220, 244
-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各國的治理
以及 177-8
- self-interest 自利 239-40
- on trust 關於信任 245
- Worms, J. P. 222
- Wright, K. 215

- Yan, W. 148-9
- Yeisley, M. 119, 179, 181
- Yorkshire Water 306

- Zak, Paul 246
- Zimbardo, Philip 130, 134
- Zoccolillo, M. 117